



回忆

尤利乌斯·伏契克

(纳粹占领时期)

〔捷〕古丝塔·伏契科娃 著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

（纳粹占领时期）

〔捷〕古丝塔·伏契科娃著

何 雷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

(纳粹占领时期)

〔捷〕古斯塔·伏契科娃 著

何 雷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125印张 411,000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950册

统一书号：11203·062 定价：3.50元

ISBN 7—5011—0029—2/k·7

前 言

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2.23——1943.9.8）是捷克著名革命新闻工作者，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出生于工人家庭，从少年时代起就亲身体会到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鼓舞下，他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运动。1921年，刚满十八岁的伏契克便加入了诞生不久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年，进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热情地为党报、党刊和其他进步刊物撰写文章。后来，党指派他任文艺与政治评论周刊《创造报》的总编辑和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1929年秋和1932年春他两次参加了捷克北部矿工大罢工，和矿工们一起向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和由它支持的矿山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0年他随工人代表团首次访问了苏联，1934年他又作为《红色权利报》驻莫斯科记者在苏联居住达两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满腔热情地向捷克斯洛伐克读者介绍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1936年以后，德国法西斯开始日益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安全。1938年9月30日，捷资产阶级政府接受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主权的“慕尼黑协定”。此后，卖国政府又下令解散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查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和其他一切进步报刊。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被迫离开祖国，党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共产党仍继续存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捷国内坚持斗争的唯一政党），新的地下中央委员会继续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

1939年3月15日，德国法西斯完全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同年5月，伏契克被迫离开布拉格的寓所移居霍季姆涅日村。一年后（1940年7月30日），由于盖世太保的跟踪追捕，伏契克又不得不告别霍季姆涅日村，重新来到布拉格并转入地下。1941年夏天，他被任命为捷共第二届地下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政治宣传与出版工作。1942年4月24日，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于1943年9月8日在柏林普勒岑湖监狱英勇就义。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纳粹占领时期）是伏契克夫人所写的关于伏契克的革命回忆录。它收集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记述了德国法西斯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伏契克生活、工作和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热情地歌颂了伏契克及其他许多捷克斯洛伐克革命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反抗外来占领者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迹。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纳粹占领时期)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霍季姆涅日村”记述了从1939年5月起至1940年7月止伏契克隐居于父亲的乡间别墅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在这个时期内,伏契克的主要活动是对捷克十九世纪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写了《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等专论文章。

“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德国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采用欺骗手法,号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与德国人“通力合作”。一些出卖灵魂的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从阴沟里爬出来,为纳粹分子和国内反动派的阴谋鸣锣开道,炮制了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投降主义文学。当时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必须对德国法西斯的反动宣传及其捷克走狗的阴谋进行无情的揭露与坚决的反击。

德国法西斯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党领导的所有进步报刊全部被查封,因此,伏契克只得用各种笔名(或不署名)发表历史专论文章去和敌人进行斗争。伏契克曾多次谈到研究和宣传民族复兴时期捷克作家作品的必要性问题。1937年,当集中营的血雨腥风从德国法西斯向捷克斯洛伐克袭来时,当捷资产阶级反动派向一切进步力量发起疯狂进攻时,伏契克这样写道:“如果要想找到与我们今天相类似的某个历史阶段的话,我们会常常回忆起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这个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当时整个欧洲正处于变动之中,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存在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公民,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希望和行动,尽管这个影响不如伟大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存在给人们的影响那样直接和强烈。当然历史决不会重演。只有落后于历史发展的人类表达方式有时会使我们回忆起这个相似之处。如果你能正确地和谨慎地去对待这个相似之处，那么你将能更容易地找到前进的方向。”（1937年《创造报》）“慕尼黑事件”使伏契克回想起了捷克民族在历史上所蒙受的、后来又幸运地战胜了的那些苦难。伏契克坚信，这一次，捷克民族也一定能战胜德国法西斯，创造出“真正的时代”来，因为他从捷克民族的历史中知道，“从我们民族健康的机体中，历来都产生了不朽的民族英雄，他们把个人的安危得失置之度外，勇敢地传播真理的声音。”伏契克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勇敢地传播真理声音”的战士们，他们“在最黑暗的时代为我们民族灌输了民族自决权的意识，在捷克民族的心灵深处点燃起对未来的希望。”因此，必须大量地、深入地研究和宣传民族复兴时期捷克伟大作家们的作品，以便“能从中吸取营养”，使读者“能从中找到有关纳粹占领时期最迫切的问题的答案”。伏契克常说：“在暗无天日的苦难的岁月里，听一听捷克文学的呼声吧！你将能听到人民的声音，这个声音会万无一失地使你在黑暗中永不迷航。”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纳粹占领时期）的第二章“地下活动时期”记述了：伏契克在霍季姆涅日村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因盖世太保跟踪追捕，不得不告别这个新居转入地下。他来到布拉格，秘密居住在工人、教师、职员、演员和其他同志家里，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另一

方面积极争取和捷共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1941年2月，以爱德华·乌尔克斯为首的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除一人外）全部被盖世太保逮捕。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同年夏天，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幸存者杨·齐加和伏契克接上了关系。7月，第二届地下中央委员会成立，伏契克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委员。

捷共第二届地下中央委员会成立后，继续高举团结战斗的革命大旗，领导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积极开展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斗争。至1942年初，共产党在许多工厂和工人住宅区散发了大量的秘密报刊和传单，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狠狠打击侵略者，支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许多工厂的工人重新掀起了罢工浪潮，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又有了新的发展。

伏契克在秘密传单《一九四一年的“五·一”节》中这样写道：“是的，我们现在已转入地下。但是，我们不是埋葬在墓穴中的死尸，而是萌动于沃土中的社会主义种子。当春回大地时，这些种子必然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而‘五·一’节正预示着春天的来临——这个春天是自由人的春天，是各民族及其兄弟情谊的春天，是全人类的春天……”同年10月，伏契克在题为《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永远坚强》的社论中这样写道：“戒严令颁布后，希特勒刽子手们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疯狂镇压丝毫不能改变我们全民族坚定不移的决心，那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团结起来，把反抗妄图从肉体上消灭我们民族的禽兽行为的正义斗争进行到底。”在这个时期内，

伏契克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惊人的毅力写了大量的社论、专论、评论、特写和秘密传单，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创造报》（周刊）和《塔博尔》等六种杂志，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号外”和小册子。伏契克的所有这些文章，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和投枪，连续不断地向法西斯占领者和捷克反动派刺去。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纳粹占领时期）的第三部分记述了伏契克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的全过程。1942年4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伏契克不幸被盖世太保逮捕。在敌人的审讯室和监狱里，他受尽了非人的拷打和折磨，多次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是，伏契克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表现出了共产党员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当他随时都可能被拉上绞架进行处决的日子里，在两位狱警的秘密帮助下，伏契克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举世闻名的不朽之作《绞刑架下的报告》（已被翻译成八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他的英雄事迹也被全世界的革命者和进步人民所传诵。1943年9月8日，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在柏林普勒岑湖监狱被盖世太保杀害。

德国法西斯之所以无法使伏契克屈服，无法在精神上把他打垮和摧毁，就是因为他具有“坚贞不屈的革命者的品格和产生这一品格的共产主义觉悟”。伏契克在《在共产主义旗帜下》（1942.1.）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人是热爱人、热爱自由、热爱劳动、热爱和平、热爱自己民族的人。这一切向他们提出了非常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员们，不管你

们在哪一个部门工作，不管你们在哪一条革命战壕里为人类的自由战斗，也不管你们是否被捆绑在暴君们的监狱里，每天都给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做一个总结吧，看一看你们是否无愧于作为伟大列宁的战士的光荣称号！”伏契克光辉的一生向我们证明，他正是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爱祖国、爱人民，他爱捷克斯洛伐克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爱捷克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当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时，他才能为了祖国的独立，为捷克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英勇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1943年5月22日，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写道：“决定性的时刻只有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才显得特别的残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一颗子弹射入胸膛，这该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但是，总得有人去当这最后的一名士兵。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名士兵就是我的话，我将心甘情愿地立即死去。”1943年9月7日，伏契克就义前还对狱中难友鲁道尔夫·贝德日赫这样说：“你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死的，而且我们的牺牲将给后人带来好处！”

1943年5月19日，伏契克在《我的遗嘱》中写道：“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43年8月25日，纳粹法庭宣判他死刑后的第六天，伏契克在给妹妹们的

信中这样说：“相信我，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丝毫没有夺去我的欢乐，欢乐活在我的心里，欢乐天天以贝多芬的曲调表现出来。人并不会因为被砍掉脑袋而变得渺小。我热烈地盼望着：当一切都变为陈迹之后，你们在回忆起我时不是心怀悲哀，而是心怀欢乐，如同我在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那种欢乐一样……”是的，伏契克是一个彻底的革命乐观主义者，因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他便把个人的得失和生死置之度外，直至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一刻为止，他坚信社会主义的苏联必将战胜德国法西斯，坚信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坚信未来一定属于共产主义。因此，当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向被打得血肉模糊、气息奄奄的伏契克提出“你还相信共产主义能够胜利吗？”的问题时，他才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毫无疑问，结果只能是这样！”

1943年8月25日，法西斯德国法庭审判伏契克的目击者、幸存下来的原伏契克的联络员莉杜什卡·普拉哈在回忆审讯情况时这样写道：“尤列克（尤列克和尤拉均为尤利乌斯的爱称——译者）慷慨陈词，从被告变成了原告。法庭乱作一团。法官们纷纷站了起来，冲着他大喊大叫，喝令他‘住嘴！’，但是尤拉继续说道：‘你们将宣读对我的判决书。我知道，上面写的是：判处一个人死刑。但是，我早就宣布了对你们的判决：判处法西斯主义死刑！人民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纳粹占领时期）的作者为古斯塔·伏契科娃（Gusta Fučíková, 1903——），她是伏契克的夫人和战友，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劳动勋章、共和国勋章和二月革命胜利勋章获得者。1945——1967年任政治文献出版社编辑，1969—1974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妇女联合会主席，1969—1975年任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1970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议员，1971—1976年任联邦议会主席团委员，1971年起还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4年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42年4月24日，伏契科娃与伏契克同时被德国法西斯的秘密警察所逮捕，并先后被关押在捷克和德国的监狱里达三年之久。1945年4月苏联红军解放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时，伏契科娃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伏契科娃所编写的《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纳粹占领时期）于1961年在布拉格出版。出版后它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广大读者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现已翻译成多种文字）。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用质朴的语言忠实地再现了尤利乌斯·伏契克伟大战斗的一生。伏契克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鼓舞和激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其他进步人们为争取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本书还收集了有关伏契克的丰富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伏契克夫人和亲属、以及其他幸存

下来的战友们的回忆和各种书面材料，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俘获的原德国盖世太保头目、德国和捷克狱警以及叛徒、特务的口供、证词和其他旁证材料，此外作者还引用了伏契克的许多重要文章和书信，因此，本书是了解和研究 尤 利 乌 斯·伏契克的重要材料之一。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帮助。特别要感谢北京外语学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梁克家同志和姚金中同志，感谢新华出版社的耿健同志，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本书的翻译出版是不可能的。此外，戈宝植同志还为译者审阅了全书，丛林同志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译 者

1982年元月初稿

1985年8月改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霍季姆涅日村	(1)
第一节 德国法西斯开始入侵	(1)
第二节 我们怎样生活的	(13)
第三节 霍季姆涅日村 从保护国到保护国	(22)
第四节 不平凡时期中的平凡日子	(41)
第五节 多马日利采城 博热娜·聂姆措娃寻踪	(50)
第六节 在老伏契克家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61)
第七节 鸟的世界	(67)
第八节 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	(76)
第九节 旧书店里	(94)
第十节 卡雷尔·萨宾纳著作的发现 和译成捷文	(101)

第十一节	盖世太保跟踪	(114)
第十二节	最后一次回到霍季姆涅日村	(126)
注 释	(142)
第二章	地下活动时期	(151)
第一节	转入地下	(151)
第二节	敌人第三次扑空	(162)
第三节	与尤列克在布拉格重逢	(177)
第四节	论萨宾纳的变节行为 为反对叛徒而斗争	(190)
第五节	尤列克在庞克拉茨定居	(204)
第六节	《罗伊》青年杂志 与《回忆世界之窗》	(218)
第七节	尤列克任捷共第二届地下中央 委员会委员	(244)
第八节	在德军统帅部内为《红色权利 报》收集情报	(263)
第九节	纳粹黑暗统治下的盛大节日	(277)
第十节	红色报刊的海洋	(284)
第十一节	在共产主义旗帜下	(300)
注 释	(321)
第三章	在狱中	(324)
第一节	被捕	(324)

第二节	在庞克拉茨监狱	
	戒严令	(351)
第三节	插入盖世太保司令部的反法西斯战壕 ...	(395)
第四节	“400号”被瓦解	(455)
第五节	在查理广场监狱	(478)
第六节	去向不明	(499)
第七节	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	(510)
第八节	红十字会对大屠杀置若罔闻	(549)
第九节	苏联红军带来了自由	(568)
第十节	《绞刑架下的报告》发现始末	(594)
第十一节	历史的见证	(611)
第十二节	人民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645)
注 释	(657)

第一章 霍季姆涅日村

第一节 德国法西斯开始入侵

1939年3月14日晨，我们对德国法西斯开始入侵一事尚一无所知，但是到了中午，尤列克^①已把这个消息带回家中。据说斯洛伐克已经宣布独立。古斯塔·巴雷什^②连午饭都没有吃便出去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布拉格德伊维采区的寓所，在那里尤列克（我常常象苏联朋友那样称呼他为尤列克）和我住一个房间，古斯塔和他爱人住另一间。尤列克吃完午饭也从家里走了出去。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是无法呆在家里的。我和他约定在艺术家俱乐部会面。

下午，哈哈总统^③前往柏林晋见希特勒。不论在大街小巷、机关工厂，或者在咖啡馆里，到处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去秋以来，我国的原料基地、自然国境线以及大部分工业已被肢解殆尽，而昔日的“同盟国”——英国和法国——却从未答应将保护我国残存的疆界。德国报纸和电台极力煽起反对慕尼黑事件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狂热。（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词中间是要用连字符来隔开的）。毫无疑问，不管第二共和国的反动政府是何等的奴颜婢

膝，希特勒依然会想方设法蚕食我国残存的土地。这不过是个时间和方式问题而已。人们都在纷纷议论下一步德国人将霸占我国的哪些地方：是尔布诺、奥斯特拉发，还是布杰约维采^⑤？今天的斯洛伐克只不过是只“头羊”。它是否预示着我们民族末日的来临？

晚上，我和尤列克来到位于维诺赫拉迪区的苏联公使馆特雷扎别墅，那里正在举行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柯诞辰125周年纪念晚会。伊万·塞加宁纳^⑥也到会了。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在他的余生中仅剩下了最后十二小时自由的时光。其他许多同志和友好也都出席了。那个晚上也成了我们和他们中的许多同志最后诀别的时刻。

在公使馆门口，身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特务在来回巡逻，监视着每一个进入公使馆的人。

谢甫琴柯讴歌自由的壮丽诗句的余音早已消逝，钢琴的旋律也已经停息，许多晚会参加者都已经纷纷离开了公使馆，但是，同志们并没有走。现在，他们根本就没有回家的念头。伊万和尤列克不时地去打电话。他们拿起话筒，向邮政总局和捷通社打听消息，他俩在那边都有好朋友。午夜时分他们得知：在俄斯特拉发，捷克人已跟入侵的德国法西斯士兵展开了巷战。

现在是祖国和人民生死攸关的决定时刻。但是，同志们却神色镇定，谈笑自若，尽管他们都尽量压低着自己的声音。

我忧心如焚。深深的忧虑宛如浓黑的影子爬上了我的心

头：我们的民族将无法手拿武器去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全部边防要塞早已落入希特勒手中，要政府发布动员令已毫无希望，去秋形成的坚定的、团结一致的战斗意志已经瓦解。尤列克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的心思。他鼓励我，要我记住：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已经多次经受住了考验，这一次她也必定能够战胜希特勒。苏联决不会抛弃我们。他说话的语气是如此的坚定和自信，以致使我更加强烈地、更加具体地感受到了和苏联人民相互间的同志情谊。在这里，在苏联公使馆里，我们沉浸在这种真诚的友谊之中。因此，同志们都不愿离去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在这里，我们熔化在具有无穷力量的集体之中。

3月15日凌晨四时左右我们离开了苏联公使馆。我们是乘出租汽车回家的。尤列克沉思不语，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我也默不作声。只有一次，他大声地说出了他正在考虑的问题：去年秋天我们就应该奋起自卫，尽管政府已屈膝投降，现在斗争将会艰苦多了。

清晨，街道上寂无一人。布拉格对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仍毫无觉察。

四点半钟左右我们回到家里。尤列克习惯地打开了收音机。我心里想，他这是多此一举，因为我国所有的电台这时都还没有开始播音。布拉格电台第一次播音时间是早晨六点。但是，收音机刚一发热，便响起了斯美塔那^⑦《维舍赫拉德》乐曲的呼号声。旋律优美极了，但是，从1938年秋天

起我就再也不愿听到这种呼号声了。当时它虽然还是那么悦耳动听，不过它已经沦为宣告投降的序曲了。

尤列克叫我快去听收音机。他说，电台在这一不寻常的时刻播音，说明发生了重大事件。又响起了电台的呼号声，接着又沉默了几秒钟，又是呼号声，又是沉默。我们紧张地站在小小的收音机旁。播音员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他用不很自然的声调宣读着令人震惊的消息：从清晨六时起，德国国防军将占领并越过我国边界。政府号召居民不要抵抗，否则将立即遭到他们最严厉的、毁灭性的打击。德军将于上午九时许进驻布拉格……

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仿佛我们身上的血液也都凝固了一般。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布拉格即将遭受法西斯铁蹄的蹂躏！尤列克两手插在口袋里，默默地听着。我绝望地看着他那严肃的脸。我们的祖国再也不会有美好的前途了。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就是在去年十月由于投降派政府强令部队不开一枪便放下武器之后退伍回来的。在不抵抗的卖国政府把我国大片的土地拱手让给了希特勒之后，祖国的命运再也不会变得美好起来，这是他想像得到的。但是，现在的这种结局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我鼓起勇气，极力劝说道：“尤列克，你再也不能呆在家里了，盖世太保^⑧首先会来抓共产党的干部的，希特勒一上台，他们在德国就是这样干的！”

他没有回答。他在书架前慢慢地踱来踱去，目光深情地落在他心爱的图书上。他点着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然后，用三个指头倒捏着它，让燃烧着的一端藏在手心里——这是他在狱中时为了躲过狱吏的眼睛而学会的特殊拿烟方法。电台的呼号声，可怕的《政府声明》和尤列克脚步声在房间里回荡。

“你不能呆在家里，”我重复着。

他回答说，他必须好好地想一想该到哪里去。他不能去找其他党员同志，因为他们和他一样都处在危险之中。必须找到一位同情我们而又不受怀疑的人。尤列克沉默了一会之后，决定去找演员拉季斯拉夫·博哈奇。博哈奇的家离我们不远，尤列克决定去试试看。

但是，他久久没有动身。他谈了许多。他说，我们的民族决不会甘心沦亡，正如在奥匈帝国时期多少世纪以来她都不甘心沦亡一样。党将进行斗争。不过，斗争将会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困难和艰巨。

我们商定，第二天我去找他。如果我没有去，那说明家里已经出了事。

我独自一人留在家中。整个房间突然显得如此的冷清和凄凉！书架上的图书似乎更深地往格子里龟缩了起来。堆满词典、杂志、翻开的书本和写就的文稿的宽大的写字台，尤列克工作时杂而不乱的这块桌面，现在——当它的主人离去以后——如同被鼯鼠糟蹋过的草地。此刻，窗外是乌云蔽日、天色阴沉。不久，便下起了漫天大雪。

我也走了出去。我得去探听一下消息。我来到斯米霍夫区，兹登涅克·内耶德利教授^⑨住在那里。他肯定也不会在

家。天晓得，此刻盖世太保是否正在他家里搜查呢？占领者驾驶着摩托车，如同举行阅兵典礼那样，徐徐地开了进来。欢迎他们的只有那挥洒着冰花雪泪的昏暗的天空。

人们对擦肩而过的纳粹士兵不屑一顾，就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们一样。只有一个女人端着一杯热茶从屋里走出来，向一个德国士兵递了过去。就在此刻，一群人向她围了上去。不知是谁推了她一下，茶水洒了满地。一位陌生的男人正言厉色地斥责她竟会如此厚颜无耻地出来犒劳占领者；不用多久，她就会明白，这些家伙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我回到家里，开始收拾尤列克的手稿。它们大部分时间是放在编辑部里的，多数放在印厂，最后被扔进字纸篓中。因此，放在家里的手稿并不多，计有：《在明天已变成了昨天的国家里》一书的手稿，这是该书出版后应我的要求把它留下来的；《战线的代表大会》的手稿，它是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文章；开始动笔的小说《大个子雅库布之死》；1936年在莫斯科时所构思的《帕塞帕尔图特世界游记》开头的章节，以及另外几篇尤列克没有写完的文稿；一些照片和他从狱中、部队和从苏联给我的来信，还有从中亚细亚天山地区寄来的、干枯了的龙胆草。它的产地是如此之遥远，所以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自己身边。

我把全部东西装入一只柳条筐里，几天后把它带到了比尔森尤列克父母家中。后来，我又和莉巴把那只柳条筐埋藏在地下室的煤堆里。在那里，它安然无恙地一直保存到战争结束。

第二天，我前往博哈奇家。我小心翼翼地穿过静寂的街道，提防着是否有人跟踪。尤列克在博哈奇家虽然终日闭门不出，但是，他对外面的情况却了如指掌。比如，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捷克人是怎样冲着德国兵挥舞拳头的；他们又是怎样大声疾呼、表示抗议的；许多人又是怎样伤心落泪、泣不成声的；捷克籍警察又是怎样消极怠工、对爱国者的示威游行袖手旁观的。我向尤列克讲述了昨天我在斯米霍夫区的所见所闻。这一切使他认识到：在捷克人民的心里埋藏着多么巨大的反对占领者的仇恨，他们是怀着何等痛苦和悲愤的心情去“欢迎”这伙占领者的。

当尤列克只身留在演员拉季斯拉夫·博哈奇 的房子里时，他反复思考着如何把我们民族所蒙受的磨难全部记录下来，以便使在未来的、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能在人类不再遭受战火威胁时认识和理解到：我国人民从未甘受屈辱，他们中最有觉悟的分子准备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面临民族危亡的最后时刻，尤列克所感受到的和想到的一切，宛如一股山涧清泉从他的心灵深处一下子喷射出来。他写下了《给彼得的信》，这是一部小说的前言，可惜这部小说仅仅开了个头便成了尤列克的未竟之作。当时，他给我念了《给彼得的信》，我听后十分感动。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彼得，亲爱的小彼得！我紧张地工作了两个通宵，第三个晚上，乡思缠绵，夜不能寐。我闭上眼睛，梦见了你。我看见你呱呱坠地，长大成人……一天，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因为我担心你是无法理解它的。是的，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打破对我们父辈们的情面，把多年积压在你心头的这个问题向我们提出来的。你会责问我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搞的？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它似乎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但是你会说，我的父母就生活在那个年代……那时，奴役和屠杀席卷着整个欧洲，正义遭受到最严重的践踏，而嗟来之食决不会是味道香甜的。我们的父母怎么能忍受那种非人的生活？为了不任人宰割，他们又干了些什么？……那帮家伙又是何等的歇斯底里和惨无人道！他们还有一点儿人的味道吗？他们还有一点儿人的良心吗？他们还象正常人吗？他们究竟是不是人的同类？

我的孩子，也许我永远不会见到你……

彼得，我们是播种在泥土中的种子。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当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时，我们并不能全部破土而出、发芽开花。在我们头顶上走动着的——一只只铁蹄随时都可能踩死我们，把我们踏得粉碎——它们可能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者出于肆意妄为，或者仅仅是为了寻开心，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而且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但是，彼得，别以为我们会感到害怕。虽然我们不可能全都活下来，但也不会全都同时死去。这一点我们也是清楚的，而且它也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沙沙作响的麦浪将淹没坟场上的脚印，人们将忘掉他们，忘掉一切，忘掉

忧愁和悲伤。只有那累累的果实将以活着的和死去的我们的名义向你们这一代年青人说：‘请随便拿吧！请随便吃吧！这些就是我们躯体的化身！’

这一点我们也是清楚的，我们也正是为此而活 在 人 世
.....

我把这封信象珍藏在瓶子里的书信一样投进时间的海洋。但愿大海的波涛能幸运地把它冲到你的脚下。当你揩拭干净这封发了霉的、充满我们激情的书信时，读一读它上面关于我们这一代人永久的记录吧。这样，你就能了解我们，我亲爱的、而又陌生的孩子，我的彼得！”

法西斯入侵后的第四天，不知是谁按响了我们的门铃。铃声象电流一样通过了我的全身。我已经知道，盖世太保正在到处搜捕我们的同志。墙上到处贴满了“依法惩处”的告示。

我走上去打开房门。不，来人不是盖世太保。门口站着的是尤列克的妈妈。她从比尔森来。她走进前厅，小心翼翼地四周巡视了一番，然后小声地问：“尤列切克在哪儿？”从尤列克的孩提时代起，她就用爱称称呼他，即使他已长大成人，甚至比她高出了两头，她也还是这样。“他不在家，”我回答说。“怎么回事，他不在家？那么他在哪儿？”她的声音由于不安而颤抖，她的双眼环视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妈妈，他平安无事！但是他不在家。”我的回答并没有使她安下心来。她有一种预感：尤列克正处在危险之中。她要求我，

恳请我，坚持要与他当面谈谈。我终于答应了她，把她带到了演员博哈奇的家中。这样一来，我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地下工作的一条规定是：除联络员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得知道秘密住所的地点，即使个人关系至为密切的人也不能例外。这一规定如果遭到破坏，秘密住所便必须立即转移。因此，当天尤列克便不得不离开博哈奇家，以免他和主人发生意外。妈妈倒是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因为她已经见到自己心爱的儿子。

我们的邻居、建筑师霍利把尤列克带回家去。在天井上方他家有一个小阳台，它正好和我们家的储藏室紧挨着。尤列克很快就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他站在小阳台上（因为我们住在最高的一层楼上，从楼下谁也看不见我们），从小窗把头伸进我们的储藏室，然后轻轻地用口哨吹出革命歌曲《千百万双臂膀在黑暗中高高举起》的头一句旋律。它就是我们的联络暗号。我快步跑了过去，我们便在一起——他在小阳台上，我在储藏室里——窃窃私语起来。他开玩笑地说，我们成了罗密欧和朱丽叶了。从这个小窗，我还给他送饭，送报和我们自己收藏的书刊杂志。当时，在德国法西斯入侵后的最初日子里，如同慕尼黑事件发生后那样，尤列克经常阅读维克多·迪克^⑩和杨·聂鲁达^⑪的诗作，从中不断吸取新的营养和力量。1938年秋我们没有起来抵抗，对此他是悔恨莫及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有过悲观失望或者妥协动摇。

他在霍利家又住了一个星期。当外面的气氛似乎和缓了

下来以后，隐藏了十一天的尤列克重新回到家里，回到朋友们和同志们中间。

在占领者入侵后的短时期内，以莉布舍·特尔内奇科娃的假名出版的捷共唯一合法的杂志《画中世界》还能继续发行。从1938年秋起，尤列克就为该杂志撰稿。纳粹占领时期他在《画中世界》上发表的文章（文章手稿都是由我送交编辑部的）计有：《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和《世界与诗人》

（1939年3月19日），《捷克文学作品阅读指南》和《论弗·拉·切拉科夫斯基》^⑫（4月2日），《杨·阿莫斯·考门斯基^⑬与和平》和《论奥托卡尔·布热津纳^⑭》（4月9日）。以上文章均未署名。

1939年出版的《画中世界》第15期是最后一期。此后，纳粹分子便勒令该杂志停刊了。在第14期上，尤列克还这样写道：“最近的形势瞬息万变，读者因此而产生的问题和要求当然也会随之而迅速变化。我们往往来不及迅速作出回答。就连印刷工人的快速滚筒都已无法跟上事态发展的速度，毫无疑问，在将来它们也会无法跟上事态发展的速度。”

读者都清楚地知道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们的言外之意是：祖国的沦亡只不过是暂时的。在《捷克文学作品阅读指南》一文中，尤列克向读者建议：应该多阅读我国作家创作的、蕴藏着民族力量的那些作品。同时，他还指出：

“就连出版工作也必须作这样的调整，以便能满足捷克读者希望从书本中找到鼓舞力量的殷切期望。”尤列克写道：应

该出版捷克古典作品的普及本，首先要出版优秀的古典作品的普及本。他向读者推荐阅读杨·聂鲁达选集，他的诗作，特别是《星期五之歌》，以及他的散文《小城故事》和其他特写；阅读弗兰季舍克·帕拉茨基^⑮的《捷克民族历史》，特别是第四、五卷，即胡斯时期^⑯；阅读阿洛伊斯·伊拉塞克^⑰的作品，首先是民族复兴时期的五卷本小说《弗·勒·维耶克》；阅读维克多·迪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写的诗作《艰难的和轻松的脚步》、《或者》和《窗》；阅读斯瓦托普卢克·切赫^⑱和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德克^⑲的诗集。

尤列克写了论弗·拉·切拉科夫斯基的许多文章，如《论〈俄罗斯民歌乐府〉》，《论〈捷克民歌乐府〉》，《论〈红玫瑰〉》，《论〈斯拉夫民族成语汇编〉》（这些成语包含着许多渴望自由的思想）。尤列克还向读者介绍了切拉科夫斯基艰难的一生，他怎样与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反动的书报检查机关是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稍稍具有自由思想的语词的。读者心里明白，尤列克的这些话是在影射法西斯的书报检查制度，而它比前者更为严厉和可耻。在文章的结尾处尤列克写道：“切拉科夫斯基由于发表了批评沙皇专制政体的文章而被革除了教授职务，他被迫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列克的这些话以及其他文章中许许多多类似的隐语，都激励人们决不甘心祖国的沦亡，鼓舞他们在威吓面前永不退却，号召他们为反对希特勒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时，读书之风盛极一时。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当时的读者对文章的每一句话都能仔细分析和研究，希望从中吸取力量。尤列克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也总要反复琢磨和推敲，力求使读者看了能一目了然，同时，又必须使文章的真谛能避开法西斯的书报检查而珍存下来。但是，当时许多杂志已迅速与敌人同流合污，肆意炮制亲纳粹的反动文章了。

第二节 我们怎样生活的

1939年春，我们常常到艺术家俱乐部去（尤列克是该俱乐部的成员）。思想进步的演员、画家、作家、雕塑家、新闻工作者等经常在那里聚会。俱乐部书记是卢博米尔·林哈尔特同志，管理员是一位和善的捷克老人米蒂斯先生。当时，在俱乐部内就有关进步文艺的问题（纳粹分子把进步文艺污蔑为“堕落了”的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每次会议首先讨论的必然是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以及当时看起来是多么遥远的、光辉的前途问题。会议的参加者没有一个相信纳粹占领能够维持下去。有时，俱乐部又活象一个火车站。许多亲朋好友就是从那里出发移居国外或转入地下的。

虽然，俱乐部成员中远不是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但是，大家对纳粹占领全都义愤填膺。某些成员还同保护国^②政府、同它的要员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从政府要员那里弄来可靠的情报，并定期把它们交给尤列克。他们知道，这些情报到了他的手里以后才能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我们回到家

后，由尤列克口授，我用打字机把它们复打多份，然后分送给已转入地下、但和他保持着经常联系的同志们。直到1940年夏天，他在被迫转入地下以后才停止了这项工作。起初，我们把情报稿藏在厕所里的水箱上。时间一久，情报稿越积越多，有些便散落到地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把它们全都销毁了。有几份情报稿纯属偶然的机会一直保存至今。1942年6月，盖世太保在洗劫我们的住宅时，抢走了我们的衣物、家具，烧毁了我们的书刊杂志，然后把房子分给一家白卫军分子。藏在水箱上的那几份情报稿除了蒙上厚厚的灰尘以外却一直未被发现。直到十一年后的1950年，当第四批房客迁入以后，他们才发现了这些纸片。纸片上所记录的情报有如下一些内容：

“从财政部（情报来自该部——作者注）获悉：帝国^②财政部提出了‘保护国费用一览表’。我国每年应向帝国交纳的领地保护税，其数额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1938年的预算费用加上国防部1938年的实际开支（即国防部二十年来最大开支）的总和。”

又如：“内务部消息：虽然报上宣传劳改营将继续存在，但实际上正在拆除之中，并把失业者运往帝国。在上周五天内，从捷克中部的三个县（布拉格郊区、兹布拉斯拉夫和伊洛瓦）运往帝国的失业工人总数已达14,000人。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被一同带走。”

另一情报说：“财政部托马内克处长将出任正在筹建中的价格管理局局长，价格管理局对捷克和摩拉维亚的经济将

起指挥作用。这一任命已经政府批准。托马内克是一位专家，在政治上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但是，帝国当局没有批准对他的任命，反而建议由他们所宠信的工程师内恰斯（社会民主党人——作者原注）担任该局局长之职。（共济会^②会员们亦透露：内恰斯负有特殊使命，他效忠于德国当局。）”

“企业日耳曼化：在纯属捷克企业的拉德利茨基牛奶厂董事会中（该厂52%的股票属日夫诺，其余部分属农业银行）任命了新董事长——德国银行（Böhmische Escompte Bank und Creditanstalt——波希米亚贴现信贷银行——译者注）的克伦茨勒和利丁毫森的一个贵族，那位德国贵族还参与了斯科达工厂、兹布罗约夫卡工厂以及其他企业董事会的领导工作。”

1939年我们俩都失业了。我们没有任何定期收入。后来，记者联谊会每月给我们六百克朗的补助。但是，这笔补助金仅够支付我们在德伊维采区列特茨卡大街11号（即现在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大街11号）两间单身宿舍的房租。巴雷什夫妇迁走后，两个房间都归我们使用。1939年初，尤列克用笔名为下列杂志撰稿，这些杂志是：《行动》、《新自由》、《私人企业职工的道路》、《我们的道路》、《蜜蜂》和《画中世界》。后来，上述各杂志均被迫停刊。尤列克不定期地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接济（我们把《行动》杂志出版社称为“中国人”）。^③当时，《行动》杂志出版社的经理普日克里尔工程师，以及在他被逮捕后接替他职务的塞德拉切

克均约定尤列克为他们出版的书刊作书评。那都是些半为书评、半为广告的小文章，每篇长2—3页。尤列克称之为“广告文章”的这种书评每篇稿费为50—100克朗。写书评是一件很费力气的工作，你必须首先通读全书，然后把你的观点写出来。虽然，许多书尤列克都已经读过了，但为了写书评他必须对它们重新进行详细的研究。《行动》杂志社把他的书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人民报》上，但常常作了删节。今天保存下来的他写的“广告文章”共有35篇，其中有关于西奥多·德莱塞^②的《嘉莉妹妹》和《金融家》的书评。尤列克在书评中写道：“我们阅读德莱塞的《金融家》不仅是为了能从中吸取艺术力量，而且是为了能从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启示。因为，当我们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占上风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利害关系时，我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个世界许许多多非正义的和丑恶的东西……”

在为玛丽亚·玛耶洛娃^③的作品《最美好的世界》一书所作的书评中，尤列克写道：“千千万万捷克读者已经读过或正在阅读这本书，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这是一本具有特殊意义的书。它是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能给子孙后代起直接教育作用的珍本之一，特别是当我们的民族从形成之日起就具有的大部分东西早已被遗忘殆尽的时候。《最美好的世界》之所以是一本好书，那是因为作者在这本书中敢于并善于鲜明地表现这样的主题：在大战年代我们是靠什么生存下来的，而推动世界奔向更美好未来的动力又是什么……”

不论在何时何地，甚至在法西斯书报检查最严厉的时

刻，在任何一篇哪怕是最普通的小文章中，尤列克从不忽略对我们前途的看法问题。他认为，只有和“最美好的世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我们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纳粹占领后不久，我们在电车站碰见了约瑟夫·哈沙。我们邀请他到我们家去，因为他要把在梅兰特里赫出版社听到的一些消息告诉尤列克。他到我们家来的那天是星期日临近吃午饭的时候。谈话间他无意中问了一句：“你们今天没有烧饭？”“没有，”我简短地回答说。“那么你们是上饭馆去吃午饭吧！？”他关切地问道。“一会儿再说，”我这样回答。哈沙没有再往下问，尤列克岔开了话题。当时我们正处在经常断炊的境况之中。

晚上，我们在信箱里找到了瓦茨拉夫广场瓦沙塔饭店午餐券三十张。除了哈沙外，还有谁会给我们留下这些餐券呢！尤列克把这些餐券放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

“我们也不能只顾自己呀！其他的同志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们和他们分着用，怎么样？”他把十张午餐券分给了杨·克雷奇，另十张分给了弗里采克·赖青，他们两人都是《红色权利报》^{②⑥}的前任编辑。

大概是在1939年5月初，尤列克被叫到记者联谊会去，联谊会的工作人员通知他，要他到与德国法西斯合作的“民族职工工会总会”去报到。他问：“为什么？”回答是：该工会总会曾要去了一份失业记者的名单，大概想给他们安排工作。尤列克回家后考虑了很久，他该不该到那个工会总会去。我们商定，他还是去看看情况，这样才能知道他们到底

要干什么。

在“民族职工工会总会”，工会主席斯托切斯和尤列克谈了话，并建议他前去工作。据说，已经和帝国总督的政治新闻专员沃尔弗拉姆·冯·沃尔马尔谈妥（后来，我们按照灯泡商标Tungsram Von Osram挖苦地称他为通斯拉姆·冯·奥斯拉姆），要尤列克到《捷克工人》杂志社（专为在帝国工作的捷克籍工人出版的一种杂志）去负责文化专栏的编辑工作。

当尤列克在比尔森高中毕业、动身去布拉格上大学时，妈妈曾送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在照片的背面她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你的妈妈。”尽管尤列克是一个非常浪漫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但是应该说，谨言慎行依然是他的一种品德。现在，他需要加倍谨慎行事。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捷克工人》是法西斯杂志，他不能接受他们给他安排的那个职位。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让斯托切斯立即看出他的这一心思。相反，他要求让他考虑几天。捷奸工会总会的主席知道，尤列克是共产党员。他也许会这么认为：当尤列克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就会“悔过自新”了！

难道尤列克能在法西斯杂志上发表反对他们占领的文章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他尝试一下，他就会立即被捕，而文章也同样不会被刊登出来。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如果尤列克到“民族职工工会总会”去申明他拒绝接受他们给他安排的工作，他会不会被当场逮捕？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最后他还是决定去走一趟。后来，他叙述了他和斯托切斯谈

话的情况。起初，尤列克并没有马上说拒绝工作。他采用了“幽默战术”。他先是打听月薪多少。喏，据说那是一份周刊，其中有一页是文化专栏。负责这一专栏的编审工作月薪为1000克朗。此外，个人撰写的文章稿酬另付。尤列克表示月薪太少，对方说可以增加至1,500克朗。尤列克觉得还是少，他们又加至2,000克朗。尤列克还是不满意，金额又继续往上升。最后，当月薪数额已增高至四倍左右时，尤列克感到，再进行讨价还价的把戏可能招致过大的风险，因此他回答说：“不论你们出多大价钱，我也决不会出卖自己的信仰。你们要我写的文章我是不会写的，而我要写的文章你们又不会发表。”

他前去告诉记者联谊会，说他拒绝了在《捷克工人》杂志社给他安排的工作。不少记者听后都为之愕然。他们说尤列克简直是个疯子，他因此而可能被关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这一点本身便已构成了把他“逮捕法办”的根据。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尤列克只能这样做，舍此别无他法。

1939年5月，尤列克通过苏联驻布拉格领事馆的文化专员库尔特·康拉德同志给莫斯科电台寄去了一篇文章，文章底稿已经遗失。1945年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后，尤列克的朋友瓦西尔·普罗库佩克从莫斯科带回了该文章的最后一段。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佩特任的丁香花象往年的五月那样盛开着。列特纳和金斯基花园绿草如茵的山坡上黑山鸟象往年的五月那样欢跳

着。鸭妈妈也象往年的五月那样领着小鸭子们奔向春江水涨的伏尔塔瓦河。在明媚的春光中布拉格是多么美丽。但是，一向为自己的城市感到无限自豪的布拉格人，今天只能怯生生地暗自领略她那迷人的丰采，怨恨那些在1939年的五月依然争奇斗艳的树木花草是多么的麻木不仁！”

四月和五月中旬，党中央派了一位同志来看望我们。他说尤列克应该到国外去。当时有几位同志秘密地（没用护照或者用假护照）到了波兰，然后转道去苏联或英国。尤列克回答说，党的专职干部必须留下来，以便组织国内的反占领的斗争。虽然他当时的回答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事实上他是不愿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的。

当那位同志第二次来访时，他随身带来了护照和路费。他逐字逐句地说：“尤拉，党要我转告你，如果你愿意，可以马上离开。”尤列克表态说，据他的理解，党的意见是：去留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他本人，换句话说，这还不是党的最后决定，因此他决定留下来。我劝他走，但没有用，因为他的主意已定。他去留的问题就这样最后决定下来了。

来访的同志走后约一个小时，尤列克也出门去了。不久，我们家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那铃声不是乞丐登门乞讨时所按动的怯生生的铃声，也不是朋友来访时的那种安详的铃声。门铃声是急促的、命令式的。我心里一阵紧张。我出去把门打开。进来了两个男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是“盖世太保”。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当翻译的捷克人。他们问我叫什么。我说出了门牌上写着的那个名字。他们感兴趣的倒是想

知道巴雷什是否也住在这里。此时我才松了口气，镇定地回答说，巴雷什全家早已搬走了。他们问是什么时候搬出去的，我想了一下说，是在今年年初。这不是实话。巴雷什离开家是在3月14日。他走后不久，他的妻子也便搬出去了，不过，她还偶尔回来串门儿。我骗盖世太保说，我对巴雷什意见很大，因为一来他不付房租，二来他行踪诡秘，干什么事都从不让我们知道。

盖世太保要把巴雷什的东西抄走。但是，当他们把箱子打开时，却发现它是一只空的，他们问这里住的人还有谁。我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人了。”如果他们反问我，怎么说“没有人了，”我不是还有丈夫吗？我准备回答他们：丈夫不能算作外人。我没有暴露自己的伏契科娃的名字，他们也没有细问。我信守这样一条格言：“雄辩是银，沉默是金。”这两个盖世太保还不象我后来所见到的那样粗鲁和傲慢。当时他们在我国尚未站稳脚跟。后来，这两个盖世太保命令我说，如果巴雷什或者他妻子到这里来，我必须立即向他们报告。我没吭一声。临走时他们还向我道了“再见”。我回答说“还是不见为好！”

当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以后，我敲开了邻居霍利家的房门。在霍利家我给巴雷肖娃同志（即巴雷什夫人——译者注）的哥哥打了电话，要他转告她，晚上务必到艺术家俱乐部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告诉她。巴雷肖娃的哥哥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找到了她，因此，当天晚上我便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叮嘱她千万多加小心。

第三节 霍季姆涅日村从 保护国到保护国

如同党的地下工作所规定的那样，在纳粹分子占领我国以后，并非所有的职业革命家都立即转入地下（地下工作要求他们隐姓埋名，要求他们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在抗击占领者的艰苦斗争中，党在进行战斗部署时并没有忘记保存后备力量。尤列克没有被派往第一线。虽然他和党的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保持着秘密联系。他的生活是半公开的。他必须避开盖世太保的注意，不得无故引起他们的怀疑。

拒绝给法西斯杂志撰稿和盖世太保在我们布拉格住所中的出现，这些就是我们决定离开布拉格到霍季姆涅日村去的原因。此外，当时还有一个情况。1939年4月24日，在《政府通报》上刊登了布拉格州刑事法庭的决定，决定说：根据第50/23号法律第18条第2款，尤列克在1938年夏天所写的题为《红军会来援助我们吗？》的小册子，因“散布流言蜚语而构成了犯罪行为”，应予以没收并禁止其进一步扩散。稍后，1939年6月15日，《政府通报》上又刊登了布拉格州刑事法庭关于没收尤列克另一著作《在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的相同的决定。

我们来到霍季姆涅日村——离多马日利采城^①不远的波舒马维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尤列克的父亲于1939年用他弟弟作曲家尤利乌斯·伏契克^②留下的遗产买了一所房

子。

老伏契克在霍季姆涅日村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房。上下两层各有四个房间。后来，楼上加盖了一个阳台和一间称为客厅的小房间，楼下也增加了两个小房间。阳台朝南。客厅的东墙上有四扇窗户，墙壁中央挂着一座老式的黑森林杜鹃钟。客厅的北墙根处放着一架钢琴，每年夏天，尤列克的两个妹妹常在这里弹奏演唱。客厅中央摆着一张带有一个大抽屉的笨重的长桌。它是爸爸的专用桌。里面放满了铁钉、小螺丝钉、各式凿子、锤子、钳子、锉刀、鱼钩、鱼漂等物。另外还有一本流水账，上面记录着菜园子里栽种的圆白菜、生菜、苤蓝株数及其收获情况，以及：母鸡每天下多少个蛋，玉米饲料又购进了多少；老母鸡何时开始抱窝，母山羊莉津卡又将在何时产羔，等等。爸爸的这个抽屉是谁也动不得的！窗户对面，靠西墙放着一张长沙发。这个客厅便成了尤列克和我的工作室。每逢夏天的星期日，我们必须把书桌收拾干净，以便当午饭时的餐桌使用。当时，在1939年的暑假里，每星期日在霍季姆涅日村吃午饭的人常常多达十位：妈妈、爸爸、我和尤列克、尤列克的大妹妹莉巴和小妹薇拉、莉巴的丈夫、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薇拉的未婚夫。

父亲在买下这所房子以后便退休了。他整年居住在霍季姆涅日村。虽然他有时也到比尔森去（妈妈和薇拉住在那里，薇拉当时还在上学，后来她在比尔森郊区农村任教），但是，他常常是席不暇暖便急着要回霍季姆涅日村。只是在圣诞节时他才在那儿呆上几天。妈妈和薇拉则从初春至深秋

——两个月的暑假除外——每星期六上午到霍季姆涅日村的爸爸那里去，下个星期一返回比尔森。夏天的霍季姆涅日村真是热闹极了。爸爸全家，莉巴和孩子们，有几天再加上尤列克和我，大家都在那里聚会。在这个时候，妈妈是最幸福的人，因为她能和所有的儿孙们欢聚一堂。和尤列克团聚，对她来说那更是个大喜的日子。他们见面如此之少，而她又是多么地疼爱他啊！

1939年5月底我们回到了霍季姆涅日村。那是从去年以来的头一回，也是纳粹入侵后的第一次。我们痛切地体会到，这次回家是多么不容易啊！从布拉格至比尔森倒不麻烦，但是，从比尔森至霍季姆涅日村的最后四十公里却叫人历尽了艰辛。在德寇占领时期，从比尔森开往多马日利采（即去霍季姆涅日村方向）的每一列火车上都有三种车厢。火车头后面的三节车厢（冬天供暖情况最佳的车箱）挂着“从帝国至帝国”的牌子，是德国人乘坐的专车。在祖国土地上旅行的捷克人是不得登上上述任何一节车厢的。第三节车厢后的四节车厢上则写着“从保护国至帝国——从帝国至保护国”的字样，捷克人也是禁止入内的。捷克人只允许乘坐标有“从保护国至保护国”字样的最后一节车厢。在占领者看来，把最后一节、在冬天几乎是没暖气的车厢留出来给被奴役的民族使用就已经是够宽容的了，尽管这一节车厢是如此的拥挤不堪（因为从多马日利采和周围地区每天都有许多工人乘车去比尔森上班），尽管在其它车厢里常常有半数座位是空无一人的。比尔森下面的第二站——尼冉尼站，以及

其余五站：兹布赫、霍杰肖夫、斯多德、斯多德—赫拉德茨、霍利肖夫以及沿线的工矿企业，早在1938年秋就已经并入了帝国的版图。当火车驶过这些“德国”版图时，就连车窗也不准打开，以防捷克乘客偷看一眼惨遭掠夺的捷克土地。读者定能想象得到，在饱受摧残的祖国土地上旅行的每一个捷克爱国者对占领者是怀着多么强烈的仇恨，他们又是以何等憎恶的目光投向那些占领者的！

过了卡缅尼采站又是保护国了。接下去便是捷克车站斯坦涅科夫和奥斯符拉青。我们在奥斯符拉青站下了车，因为下一站布利热约夫站（虽然它离霍季姆涅日村较近）又属帝国的版图了。

从奥斯符拉青站沿铁路线前行是一条捷径，因此尽管它禁止通行，但被踏出来的蜿蜒小路仍然依稀可见。半小时不到我们便抵达了霍季姆涅日村。在许多年以前，爸爸便常来此地钓鱼。从1923年起的十年中，伏契克全家常到这里来度暑假，当时，他们住在从一家农民那里租来的亭子间里。据妈妈说，爸爸整天在外面钓鱼。当他把钓到的鱼带回家时，妈妈又总是唠叨说，她真是腻烦死了，谁有功夫去收拾它们。但是，话音未落，她又马上动起手来把鱼收拾干净，然后满心欢喜地在煤油炉上把鱼煎好。妈妈煎的鱼我们大家都爱吃极了。

1939年5月末，当我们站在爸爸家漆成深蓝色的大铁门旁按响门铃时，几只狗首先跑了出来。耶里克习惯地冲向铁门，不断地往上蹿，它乐不可支地汪汪叫个不停。我们喝令

它安静点。但是，我们越是说话，它就越是来劲，摇头摆尾地闹得更凶。它的尾巴都快要摇折了，但是，大铁门还是结结实实地紧关着。耶里克向着楼房跑了回去。另一只狗——被关在笼子里的维克多（显然，它是一只叫人生畏的猛犬）也叫开了，虽然它什么都还没有看见。一群母鸡也咯咯咯地惊叫起来，一只公鸡极力想使母鸡安静下来，但显然也只是徒劳而已。第三只狗布兰卡边叫边跑地冲到铁门旁边。“布兰卡，别叫了！耶里克，听话，别闹了！”尤列克向它们吆喝着。但是，此时我们连自己的说话声也已经听不清了。

接着，妈妈拿着铁门的钥匙走了出来。当然，我们事前并没有写信说我们要来。因此，她更是喜出望外。当她又见到了生气勃勃、体格健壮的尤列克时，她是多么地高兴啊！

“孩子们，欢迎你们！尤列切克，欢迎你！”耶里克活蹦乱跳地往妈妈的肩上蹿，她随手把它推倒，而耶里克却象个皮球似地从地上弹了起来，绕着圈子奔跑着。此时，布兰卡正站在那里用腿蹭痒。耶里克因被布兰卡挡住了路而大为生气，它便向后者扑了过去，把它按倒在地。不一会儿，这两只狗便在地上打起滚来。妈妈挽着尤列克愉快地走着。尤列克弯下身去，想抚摸一下正在他身旁打转的耶里克，而耶里克却敏捷地舔了一下他的脸庞。这几只狗对我都视若路人，因为我从来也不那么喜欢它们，相反，我还怕它们三分呢！

自然，爸爸又是到河边钓鱼去了。妈妈赶忙弄来了点心。
“尤列切克，告诉妈有什么新闻！这场灾难何时才能了结

啊？”“我们还得耐着性子等一等。至少也要等上三年。但是，为了让这场灾难尽早过去，我们大家都得加油干才行啊，”尤列克严肃地回答。妈妈还希望听到其它一些令人快慰的消息，对这样的消息她也同样会坚信不移，因为这些都是尤列克告诉她的。

“孩子们，这回你们可不走了吧！？”妈妈问道。尤列克半开玩笑、半带正经地回答：“妈妈，如果您不撵我们的话，我们就不走了。”妈妈诚恳地对我们说：“只要你们乐意，你们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好了。”

这就是尤列克的新居。除了有几次短期外出以外，他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工作了十四个月。

他要办的头一件事是找个地方，把我们带来的书刊安置好。目前书还不算多，只有雅库贝茨、符尔切克和诺瓦克各人编写的《捷克文学史》和其它几本常用的书，但是总得有个放书的地方才行。尤列克跑遍了整所楼房，想找点木料做一个书架。他在阁楼上终于找到了几块床板。他立即用它们钉成了一个有三个格子的书架，把它放在客厅中靠阳台的墙根处，然后把随身带来的书放在书架上。不久，他又制作了第二个书架。当这个书架也挤满了书时，他便把剩下的书排列在钢琴上。后来，他又弄来了一张小孩用的写字桌，把它放在客厅的一角，把日益增多的书刊放在那张小写字桌上。

客厅的阳台上放着一张圆桌，桌面是红色的，看上去活象一朵圆形的毒蝇蕈。圆桌是单腿的，粗大而中空的桌腿被油漆成了深蓝色。桌面中央有一个圆孔，它是供安装阳伞用

的。用红黄两色条纹缝制成的阳伞的伞柄穿过这个圆孔，直插到空心桌腿的底部。夏天，有时候我们就在这把宽大的阳伞下面吃早饭或用茶点。在阳台的栏杆旁边，摆满了由妈妈、薇拉和莉巴精心布置的蓝色花盆，花盆里盛开着逗人喜爱的黄色、红色、橙黄色的矮牵牛花。在爸爸和妈妈的卧室里，有两扇窗户从春天起便必须一直敞开着，因为燕子在那堵墙上搭了个窝。当妈妈在鸟窝下面打扫卫生时，每次她都要长吁短叹地抱怨说，那些燕子老是把屎拉得满地。但是，她同时又总是关怀备至地查看窗子是否开着，生怕燕子无法回窝歇息。

在楼房正面的窗台上以及顶楼上，到处都摆满了矮牵牛花。只是在底层走廊的窗台上放着两盆茂密的天冬草，它们郁郁葱葱，苍翠欲滴。当妈妈住在霍季姆涅日村时，每天早上她都拿着水壶给它们浇水。如果碰上家里吃肉，那么，在下锅以前，她总要把鲜肉放在水里洗涮好一阵子，然后用洗肉水去浇那两盆天冬草。也许这就是天冬草长得如此茂盛的缘故吧。不过，只要被爸爸看见猪肉泡在水里，他就会立即下令把它从凉水里拿出来。

整个楼房窗明几净，四壁皆白。爸爸老是在修修补补、忙个不停（当然，只是在无鱼可钓时他才这样做）。一会儿，他给铁门涂油漆；一会儿，他在铁门口装上个门铃直通楼内；一会儿，他又忙着粉刷阳台上的栏杆；一会儿，他又忙着焊接洗衣间的锅炉。但是，夏秋两季他最忙的活儿是到河边钓鱼，或者到附近的林子里去采蘑菇。他向村公所租用

了一直延伸至奥斯符拉青的小河祖布日纳。每天清晨、下午和傍晚，他总是手持钓杆坐在这条小河的河岸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来到霍季姆涅日村以后，我们没有向村长申报长期居住的户口。我们不想让盖世太保知道我们的这个住地。每两三周尤列克总要到布拉格去一趟，有时他只身前往，有时我和他结伴同行。

就我所知，这一时期尤列克反抗纳粹占领者的斗争活动主要是：他从与某些地位很高的人或与保护国政府要员有来往的人那里定期得到可靠的秘密情报，同时他自己也四处收集，然后把这些情报转交给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特别是交给了杨·克雷奇同志。

每次去布拉格，尤列克总是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上火车。不论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他总是慢慢腾腾、从不着急。妈妈和爸爸却十分焦急地一会儿看看手表、一会儿又看看他，生怕这个孩子误了点。最后，爸爸只好用洪钟般的男低音提醒他说：“尤尔恰，快走吧，别误了火车！”而尤列克又总是回答说：“来得及，爸爸！”临走时他又才想起要多带一本书，供火车上阅读。去布拉格时他总是轻装前往，而回来时他又总是被大包小包的书压得喘不过气来。

1936年，尤列克从苏联回国后，他便开始大量收集民族复兴时期的捷克文学作品。在布拉格离查理大学哲学院不远的老城区卡普洛瓦大街上有一个霍克尔旧书店，那是尤列克定期光顾的地方。在希伯恩斯卡大街上还有一家大书店叫诺伊

伯特书店，尤列克也常到该书店的旧书门市部去。在霍克尔旧书店，尤列克曾发现一个叫杨·马哈利茨基的人收藏的、非常有趣的书刊：1864年和1865年出版的《文艺报》，它是有关文学、艺术、教育和娱乐的周刊；1855年出版的杂志《捷克珍宝》，上面刊登了博热娜·聂姆措娃^{②9}笔下多马日利采地区的风景画；卡雷尔·雅罗米尔·埃尔本^{③0}编写的童话《高个子、大胖子和千里眼》；温岑茨·瓦夫拉·哈什塔尔斯基的小册子《四十八岁中年老头的狱中日记》；奥古斯丁·斯美塔那^{③1}——被革除了教籍的牧师——的《回忆录》以及1841年和1845年出版的《捷克蜜蜂》、1833年出版的《今昔》、1861年出版的《生活画廊》等杂志。尤列克把上述各种书刊以及许多其它书刊，统统买了下来，有些还带到了霍季姆涅日村。每次进旧书店，他总要挑选一大批书，因此，他买书的钱从来是不够用的，结果，书店老板只得把他需要的书替他留出来。而尤列克呢，只要他手头有一点儿钱，便要把它送到书店里去。

在纳粹占领期间，尤列克不断地从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他常对我说：“在暗无天日的苦难的岁月里，听一听捷克文学的呼声吧！你将听到人民的声音，这个声音会万无一失地使你在黑暗中永不迷航。”

1939年7月，尤列克的妹妹莉巴带着两个女儿来到霍季姆涅日村。我们常常回忆起一年前我们在舒马瓦^{③2}森林里度过的一段往事。当时在罗克兰山上我们遇上了倾盆大雨。大家飞奔下山。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跑进避雨的树林时，大雨

已把我们的衣服鞋袜全都浇透了。在罗克兰山下护林人的房子里，我们把衣服烤干，并在那里呆了一夜。尤列克、我和小莉布什卡都发起烧来，只有莉巴一人安然无恙。她给我们煮茶，跑前跑后地侍候着我们三个人。今天，罗克兰山下那位好心的护林人和他的老伴会在哪儿呢！？他们也都是捷克人。然而，整个舒马瓦山区现在都已并入了纳粹德国的版图。他们必定流落他乡了。但愿他们躲过了纳粹的魔爪，平安地活在人间！

为了驱散积压在我们心头的愁云，尤列克建议说：“今年我们再出去游览游览，你们的意见怎样？”

在尤列克的建议下，1939年7月25日，尤列克、我、莉巴、她的丈夫和小莉布什卡，我们一行五人动身去捷克南部和东部地区旅行。莉巴的丈夫有一辆小汽车，经莉巴和他商定，由我们贴补他汽油费，他开车带我们同去。

过去每当我们要外出旅行时，尤列克总要在几天前便着手制订旅行计划。这次也不例外。他穿着在霍季姆涅日村常穿的灰色条绒裤和带色的格子衬衣，坐在客厅里的书桌旁边，桌上摊着地图和导游手册。他一边翻阅着它们，一边思考着，然后把散乱的思想串连起来，逐一记在笔记本上。他制订了一个七天旅游计划。过去我们最喜欢去休假的山区，现在再也不能去了，因为它们已全都落入异国之手。就连绿草如茵的克尔科诺舍山和森林密布的舒马瓦山，我国的自然国境线，也都已并入了第三帝国的版图。克鲁什内山我们也不能去旅行。它们的被肢解，我们祖国的被摧残，这些本应该

换来欧洲的和平。但是没过半年，希特勒便占领了我国残存的土地；再过半年，便爆发了世界大战。

在保护国的第一个夏天，我们乘车跑遍了祖国大地。城市和乡村在原地屹立着，沙沙的林涛依旧在低声吟唱，大自然依旧是那样悠然自得——我们被剥夺了的自由与它们是毫不相干的，无法摧毁的生活在继续着自己的航程。

尤列克对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了如指掌。他多少次跑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南北西东。他熟知我国的文化古迹，知道我国伟大诗人、作家或音乐家出生在什么地方，甚至在哪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按照他的计划，我们首先访问了具有光荣的胡斯运动传统的塔博尔地区^③，接着参观了卡雷尔·哈弗利切克·博罗夫斯基^④的故乡，他出生的村子以及这位杰出的讽刺作家惨遭奥地利警察追捕的城市。尤列克常对我说，每当他拜读哈弗利切克的作品、看着他的头像和他那哥萨克式的胡子时，总觉得他起码已有五十岁了；但是，他去世时总共才只有三十五岁！这叫人多么不可思议啊！

我们与尤列克是在德国的布罗德（即今天的哈弗利奇库夫·布罗德）分手的。我们留在那里过夜，尤列克则乘车去布拉格。两天后，他到波奇特伊诺与我们会合。然后我们一同游览了博热娜·聂姆措娃和她的不朽之作《外祖母》中的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游览了阿洛伊斯·伊拉塞克和他的光辉的小说《弗·勒·维耶克》中的人物生活过的地方。尤列克充当了我们的导游。他的解说非常详尽。他向我们介绍了他

悉心研究的、而现在与之同呼吸的久远的历史时代。他说：

“我回顾历史，是为了能正确地对待未来。”他领着我们来到捷克东部地区第三帝国的边界线上。在第一共和国时期^④，我国人民就用自己的钱在那里构筑起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我们和附近的居民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是怎样参加构筑工事的劳动的，这一切又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而后来卖国政府又怎样把它们拱手让给了希特勒。现在，纳粹分子正在炸毁我们的防御工事。他们梦想永远占领我们的祖国。尤列克补充说：我们的想法却与他们完全不同。防御工事虽然是如此的坚固，以致难于把它炸毁，但是，我们的民族却比任何防御工事更坚强。

我们参观了阿洛伊斯·伊拉塞克生活过的城市——赫罗诺夫。我们走进他出生的小木屋，双脚小心翼翼地踩在用木板条镶嵌起来的陈旧的地板上，如同幼儿学步一般。我们观看了伊拉塞克青年时代的照片，这些照片挂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的墙壁上。我们站在只有巴掌般大小的小窗户前眺望着外面的花园。

在纳粹占领时期，分卷出版了伊拉塞克描写赫罗诺夫地区的长篇小说《在我们这里》的平装本。尤列克预订了这部小说。他每次去布拉格，总要到捷克印书馆去把新出版的分册取来带回霍季姆涅日村。直到今天，这部小说的所有分册都完好无缺。

7月31日我们结束了在捷克地区的旅行，踏上了归途。当时，在多马日利采的瓦弗日内奇科正在准备举行传统的庙

会。以往，每年到这里来赶庙会的都有好几百人。人们可以尽情地观赏多马日利采地区千姿百态的民族服饰，特别是妇女们心爱的节日盛装。我们必须到那里去看看。这不只是为了饱眼福，而完全是另有原因。关于这个庙会，通常在它举办之前早就成了多马日利采地区以及全国人们谈话的中心。当时前来参加的人也多得不可胜数。但是，在多马日利采的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象1939年8月里的那个星期天那样，成千上万的人摩肩接踵地穿过它古老的街区走廊。赶来参加的还有从布拉格来的人——《红色权利报》主要编辑之一博霍乌舍克·诺沃特尼同志以及民族大戏院的演员们，甚至还有从“帝国”（即从1938年秋被希特勒占领的边境村镇）来的霍德族人^③。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非法越过了纳粹德国的边境。从霍德各村镇来的一些妇女还随身带着藏有民族服装的提包（在“帝国”是禁止穿这种服装的），当她们到达多马日利采后才把它穿在身上。这一切尤列克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曾亲自到群众中去，打听他们是从哪些村子来的。薇拉还替他和几个霍德族妇女拍照留念。

多马日利采庙会成了捷克爱国者在第三帝国的国境线上自发组织的、巨大的反对希特勒的示威游行。在这里，捷克歌曲响彻云霄，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微笑问好，他们兴高采烈，欢畅无比，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为了共同反抗纳粹占领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当时，德国法西斯对参加庙会的捷克人的巨大力量尚无准备，因此，他们不敢出面干预。但是后来，他们判处多马日利采城数十万克朗的罚款。



1939年8月，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事件在群众当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它也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许多人来找尤列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抱怨说：

“看，俄国人把我们甩了！我们过去只相信他们，把帮助我们打倒希特勒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现在呢？他们却和他——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成了朋友了！”

一个铁路工人对尤列克说，在斯多德站，德国人怒气冲冲地把希特勒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揉成一团扔到壕沟里，大声地骂着。他们说，他们的上司前几年还一直在教导他们说：纳粹分子的头号敌人是布尔什维克，而现在却又和他们签订了条约。那位工人问尤列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叫人无法理解！

但是，尤列克没有动摇。他对苏联坚信不移。他向人们分析了西方国家的出卖政策和反苏立场。他劝大家相信，苏联决不会对我们民族见死不救，苏联是唯一能叫法西斯碰得头破血流的铜墙铁壁。他的论据明确、有力，但他也需要找同志们，进一步了解一下互不侵犯条约的细节。

使我国人民如此震惊的这一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星期，法西斯德国便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战争爆发了。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是在9月1日星期日的中午。全家人都跑来找尤列克。说起来似乎非常奇怪，我们当时的第一个感觉是喜出望外。我们高兴的是：终于有一个民族手拿武器奋

起反抗希特勒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邻居们和村子里其他的人，比尔森人以及布拉格人，总之，在整个保护国，人们都和我们一样怀着喜悦的心情。原来，大家满心以为，保证波兰疆界不受侵犯的英、法两国必将进行援波抗德战争，这样，希特勒的垮台便指日可待，我们祖国的自由也就能失而复得了。我多么希望尤列克也同意这样的推断。但是，他只是耸了耸肩膀。他对英、法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不久，事态的发展证明：尤列克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英、法两国都对德宣战了，但是，人们很快便发现：它们这样做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它们让抗击希特勒的波兰孤立无援。在进行了十七天英勇的保卫战以后，孤军奋战的波兰人终于宣布投降。捷克人民很快便能获得解放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接着，尤列克从布拉格带来了新的消息：盖世太保正在全国大肆搜捕捷克爱国者。

希特勒德国在不断加强控制。

在那些日子里，尤列克多么需要倾听捷克人民的心声。因此，他一心扑在民族复兴时期的研究工作上。他研究了弗·马·克拉采尔^⑦、卡雷尔·萨宾纳^⑧、博热娜·聂姆措娃、哈弗利切克和其他民族复兴时期作家的作品。他常常在耳朵上夹着一小段铅笔，久久地阅读雅库贝茨^⑨编写的《捷克文学史》。有时他用铅笔划出一些人的名字，比如：博热娜·聂姆措娃的朋友之一弗·马·克拉采尔，有时他又在另一些地方划上波纹线，比如，雅库贝茨写道：从通过书报检查获准出版的克拉采尔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作者深信，我们

的民族定能创造出“真正的时代”来，而且克拉采尔也和科拉尔^⑩一样，他们都认为：这种“真正的时代”只能在斗争中诞生。在另外一些地方，尤列克又用红铅笔加上感叹号，比如，雅库贝茨写道：从现存的手稿看，克拉采尔的原诗比经过书报检查后出版的诗作要大胆得多，政治上也成熟得多。

在雅库贝茨对杨·普拉沃斯拉夫·科乌贝克^⑪的评语旁边，尤列克写上了这样的眉批：“偏激！”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尤列克在研究杨·普拉沃斯拉夫·科乌贝克时所作的许多问号、波纹线、横线。这一切表明，他是不同意雅库贝茨的观点的。

夏天，尤列克总是在较为安静的客厅里学习和写作。当他埋头工作时，谁也不去打搅他。如果爸爸要把放在大桌子上的新鱼钩取出来，他总是怀着歉意似地走进去。而妈妈只是到吃饭时才敲敲房门，然后推开一条门缝儿招呼儿子：“尤列切克，吃饭了！”两位老人如此尊重他的工作，实在令人感动。他们从不把自己的爱子之心挂在嘴上，而尤列克也从不要父母如此宠爱自己。他早已习惯于在嘈杂声中，在穷乡僻壤的小酒店里，在通都大邑的咖啡馆里，或者在游客云集、笑语喧哗的布拉格，进行阅读、思考和写作，他还常常在火车里写东西，就连在编辑部里他也从来没有过应有的安静。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至少坐着两位编辑，而这个小房间的门又老是响个不停。来自布拉格和农村的在职工人或失业工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如果在家里写东西，尤列克还常常打开收音机收听音乐节目。不论噪音多大，他都能专心致

志地写作、阅读、思考或研究问题。此刻如果你跟他说话，他常常是答非所问，因为他完全忘却了周围的世界。他这种能使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习惯也许是在儿童时代逐渐培养起来的，当时他们住在比尔森，全家人白天黑夜都挤在一间狭小的厨房里，而小尤列克还要在那里看书和学习呢。

1939年夏天妨碍他工作的却是其他一些“捣乱分子”。起初是一只斑鸠，它从阳台上敞着的门飞进客厅里来。它如此的温顺，一下子便飞落在桌上，不断地点着头，咕咕地叫着。尤列克虽然听它叫了一会儿，但是他接着说：“别在这儿捣乱了！”斑鸠不懂他说的话，因此，他只好采用它能听懂的语言把它“嘘”走了。有时，耶里克会闯进客厅来挡住尤列克的去路，它总是千方百计地往客厅里钻。只要通向厨房的房门打开一条缝儿，它便机灵地从门缝里挤进来，然后，依偎在尤列克的脚下，嘴里还不停地哼叫着。那只斑鸠还常常落在耶里克的背上用嘴啄它。有一次，斑鸠可因此而赔了性命。当时，耶里克突然向它扑了过去，而它又来不及飞开，结果，被耶里克一口咬死了。耶里克为此挨了一顿毒打，但是谁也没有把它的野性改过来。尤列克自己是从来不打它的。他力争能说服它、教育它。当它把他惹火了时，他便大声训斥它说：“你这个狗东西！”这句话显然极大地羞辱了耶里克，因此它便夹着尾巴溜了出去。对耶里克进行体罚那是爸爸或者住在耳房中的内耶德利先生的事。

秋冬两季，我和尤列克独自住在霍季姆涅日村。只要我们一离开家门，耶里克总是躺在锁好的房门前面的空地上，

两三天都不吃一口东西。邻居们的劝告只会气得它呼噜呼噜地吼个不停，然后它站起来，跑下楼到院子里去。在那里，它肯定又要胡闹一场：或者把母鸡咬死，或者跟别的狗死命地干起架来。有一次，耶里克溜进了杂物间，科内肖娃太太在那里用大筐养了一只过节时吃的大鹅。结果，耶里克用嘴拱开了大筐，把那只大鹅咬死了。

夏天，我们常常把客厅里通向阳台的门敞开着。只是到了雨天我们才把它关上。新学飞的小燕子往往搞不清东南西北，有时候偶然会闯进客厅里来。当它发现头顶上不是辽阔的天空而是低矮的天花板时，它便急速地飞向窗口，因为从那里它看到了树木、屋顶和飞鸟。然而，窗子却紧闭着。为了让小燕子飞到外面去，我们便急忙跑过去把窗子打开。每一次，小燕子总能安然无恙地飞向自由的天空。然而，此时尤列克却必须急忙抓住被风从桌子上吹起来的那些手稿。

有一次，一只刚出窝的小燕子又闯进客厅里来。陌生的世界使它惶恐不安。它猛地向窗口冲去，却一头撞在玻璃上，直挺挺地摔了下来。尤列克用手捧起小燕子，把它放在桌上，给它做人工呼吸。他小心翼翼地提着它的两个小翅膀一张一合地摆弄着。

过了好久，小燕子终于睁开了眼睛。我们给它弄来了些牛奶。但是，它的小嘴碰也不碰一下。尤列克试着让它站立起来，可它老是站不住。我们找来了一个纸烟盒，孩子们又弄来了几块碎布片儿铺在纸烟盒里，然后，尤列克象是那只小燕子的保护人一样把它安置在新絮好的窝里。过了大约一个钟

头，我们大家又围拢来看它。小燕子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但是两只小眼睛已经睁开了。尤列克把它的小嘴放在盛着牛奶的碟子旁边，然而，小嘴还是紧闭着。我们发现，这只小燕子自己还不会喝水呢！尤列克小心地把它的小嘴掰开，往里面滴了一滴牛奶。小燕子一口就把牛奶吞了下去。

下午，我们想试一试小燕子会不会吃东西。它喜欢吃什么，我们对此毫无经验。尤列克说给它找一个大苍蝇吧。有人捉来一只苍蝇。尤列克又掰开小燕子的小嘴把苍蝇塞了进去。小燕子若无其事地吞下去了。我们又捉来第二只苍蝇，小燕子又一口吞了下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不一会儿，两个孩子、莉巴和我都去打苍蝇来喂小燕子，而小燕子活象个“饭桶”，吃个没够。爸爸钓鱼回来也对妈妈说：“苍蝇拍子干吗用的？你把它扔到哪里去了？”“妈妈把蝇拍找来，因为家里的瓶瓶罐罐放在什么地方只有她才知道。爸爸挥动蝇拍在墙上轰打苍蝇，孩子们就把打死了的苍蝇拣起来给小燕子送去。不一会儿，全家人一齐出动了，我们在厨房里、客厅里、走廊上、院子里，到处追打苍蝇。我们还找来火柴盒专为盛苍蝇用。尤列克作了记录，看看小燕子一天能吃多少只苍蝇。几小时后，小燕子的神志已清醒多了，也不害怕我们了。只要你把手向它伸过去，它就自动地张开小嘴，盼望着又能吃到一只苍蝇。

第二天，我们把小燕子从盒子里取出来放在桌子上，它还是站不稳。我们计算了一下，那天它一共吃了五十多只苍蝇。第三天，尤列克又把小燕子放到桌子上，它扑扇着翅膀

飞到地板上，但从地下往上飞它还不行。尤列克又把它放到柜子上。小燕子张开翅膀，相当平稳地飞了下来。我们把窗子打开一点儿，把小燕子放在外面窗台上。它呢喃了几声，张开双翅，扑棱一声便飞到院子里去了。就在它从我们楼上往下飞的一刹那，突然出现了两只老燕子，它们围着小燕子飞舞，把它带到连接门铃的电线上。三只燕子在电线上休息片刻以后便一齐飞去，终于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次日清晨，门铃线上聚集着许多燕子。它们象串珠那样一个挨着一个地呆着，嘴里愉快地呢呢喃喃叫个不停。尤列克认为，它们是来感谢我们救了它们的孩子的。也许，这是它们结伴南行前的演习吧，等到秋天，它们就将离开我国飞往遥远的热带。

第四节 不平凡时期中的平凡日子

霍季姆涅日村喧闹的夏天过去了，接着开始了宁静的秋天。妈妈带着薇拉、莉巴领着孩子们回比尔森去了。此后，妈妈和薇拉每逢星期六下午来霍季姆涅日村，下星期一早上再回比尔森去。爸爸忙着在菜园子里收洋葱，把青菜埋在杂物间的沙堆里。我们也帮他收摘水果。

我们的卧室从客厅搬到厨房，客厅里显然太凉了。晚上，当爸爸在隔壁卧室里就寝以后，我们俩便留在厨房中。尤列克到客厅去把我们带到霍季姆涅日村来的《创造报》（1929年、1931年、1932年全部和1938年部分）抱来，他浏览着，

阅读着，在他自己撰写的文学评论文章处停下来，夹上书签，有时还微笑着说：“读了这些文章以后，我觉得自己还不是那么笨呢。这里发表的文章慢慢便可以收集成册了。”

他决心着手小册子的出版工作。他把发表在《创造报》上的文章，凡有双份的，都把其中的一份剪下来，贴在1938年出版的《安托宁·索瓦言论集》的纸页上，同时，他还用打字机打下了《圣瓦茨拉夫时代的文学》一文。但由于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工作，因此，编书的事后来就被迫搁下了。

几个月以后，尤列克又动手写小说《彼得的父辈们》的开头部分。它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几天后，第一章写成了。他念给我听，我鼓励他继续写下去。但是，当时我们必须靠写文章挣钱，因此，他本来可以用于写小说的时间，只好用来修改我的译稿和写一些“广告文章”了。

他长期以来的理想是献身于我国的文学事业。献身于它的研究和创作。因此，他日以继夜地学习。他曾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在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她的大学里讲授捷克文学史课程。

纳粹占领使他再也不能与人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再也不能通过发表自己的政论文章、报告文学、戏剧和文艺专著去保持与人民的联系了。1938年秋天以来落在我们头上的悲惨事件^②使他回想起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所蒙受的、后来又幸运地战胜了的那些苦难。尤列克坚信，我们民族这一次也一定能战胜异族的占领。他从我们的民族史中知道，“从我们民族健康的机体中，历来都产生了不朽的民族英雄，他们

把个人的安危得失置之度外，勇敢地传播真理的声音。而那些给英雄们横加罪名的分子正是民族苦难的制造者，在一段时间内（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手段），他们还夺取了对捷克民族的统治权。”现在，尤列克不由地想起那些历史上英勇无畏的斗士们，他们“在最黑暗的时代为我们民族灌输了民族自决权的意识，在她的心底点燃起对未来的希望。”尤列克拟订了《捷克丛书》出版计划，并把它送给了《行动》出版社。根据他的计划，《捷克丛书》将包括民族复兴时期至现代的主要的捷克文学作品，共分四十至五十分册，读者应该知道的有关捷克文学的知识，都能在这部《丛书》中找到。

每一分册的内容必须包括：文学史概论（2—3印张——捷克手稿字数计算单位，每张约36,000个印刷符号——译者注），作者生平简介、书目提要 and 插图。根据尤列克的设想，各分册的前言部分、改写部分和总的安排都应该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感人的艺术性，使读者在阅读它们时能得到仿佛身临其境的感受。

尤列克甚至提出了《丛书》前二十分册的编写提纲：

1、 捷克民族复兴的源泉（民歌，民间传说，启蒙读物，杨·胡斯^⑬和启蒙文学中的胡斯运动^⑭，保卫捷克语言的斗争，弗·福·普罗哈兹卡，弗·马·佩尔茨尔^⑮）；

2、 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⑯；

3、 民族复兴时期的诗歌、戏剧、新闻（泰姆^⑰，舍季维，克拉麦里乌斯^⑱，希布尔，普赫马耶尔^⑲，赫涅夫科夫斯基^⑳，维·内耶德利^㉑，齐格莱尔，雷迪戈娃^㉒，黑克，

布拉特日采的耶尼克^③，杨·内耶德利）；

4、 爱国主义浪漫主义流派（约瑟夫·荣格曼^④和他的学派——马雷克，波拉克^⑤，林达^⑥，斯沃博达，汉卡^⑦，普雷斯尔兄弟^⑧，普尔基涅^⑨，塞德拉切克^⑩）；

5、 杨·科拉尔（《斯拉夫民族的女儿》，《礼拜日、节日和平日布道言论选集》，《意大利游记选集》等）；

6、 弗兰季舍克·帕拉茨基^⑪（《捷克民族简史》，《历史、政治、美学论文选》）；

7、 巴·约·沙法日克^⑫及其时代的历史（帕维尔·约瑟夫·沙法日克，阿·沃·申贝拉^⑬，瓦·伏·托麦克^⑭，卡·弗·扎普^⑮）；

8、 弗·拉·切拉科夫斯基（I）（诗集《六书》）；

9、 弗·拉·切拉科夫斯基（II）（讽刺作品，论文集和书信集）；

10、 民族诗歌流派（卡马里特，赫麦伦斯基，维纳日茨基，什纳伊德尔，安·卡麦尼茨基^⑯，皮采克，雅布朗斯基，苏希尔^⑰，约·雅·卡林纳，约·雅·兰格尔^⑱）；

11、 卡·雅·埃尔本；

12、 初期的捷克戏剧（杨·内·什捷潘内克^⑲，瓦·克·克利茨佩拉^⑳，弗·图林斯基，卡·西·马哈切克）；

13、 约·卡·蒂尔^㉑；

14、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纯文学作家（弗·雅·鲁贝什^㉒，杨·艾·沃采尔^㉓，哈伊尼什，菲利佩克，赫维耶兹达的杨，霍霍洛乌舍克，普拉夫达，伊·多赫纳尔^㉔）；

- 15、卡雷尔·希内克·马哈^⑥；
- 16、捷克拜伦主义流派（瓦·博·内贝斯基^⑦，卡雷尔·萨宾纳，西格弗里德·卡佩尔^⑧，杨·普·科乌贝克）；
- 17、博热娜·聂姆措娃（I）（《外祖母》）；
- 18、博热娜·聂姆措娃（I）（小说，童话故事，书信集）；
- 19、卡雷尔·哈弗利切克·博罗夫斯基（I）（政治新闻记者）；
- 20、卡雷尔·哈弗利切克·博罗夫斯基（I）（诗人和文艺批评家）。

如果出版《捷克丛书》的计划无法实现，尤列克还建议《行动》出版社出版一部很好的《捷克读物1939》，它将是包括文学、诗歌、纯文学、政论等作品的一部选集，其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在这本选集中找到有关纳粹占领时期最迫切问题的答案。尤列克认为，谁也无法写出如此明确的、如此有力的、鞭挞高压政策的文章，如同斯瓦托普鲁克·切赫^⑨在1890年所写的诗歌《模式》那样。因此，出版这样的读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会带来好处。尤列克还建议，每册《读物》约二十印张左右，书价不要超过二十克朗。

然而尤列克的这些建议却一项也未能实现。



秋天，我们对霍季姆涅日村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妈妈力图使我们相信，她之所以要急着离开这里，是因为对独自

留在比尔森家里的薇拉不放心。事实上，她是不喜欢秋冬两季的霍季姆涅日村的。入秋以后，这里每天浓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树叶儿都已经枯黄，秋风阵阵，黄叶飘落地上。如果天气放晴，满地的落叶被风卷起，劈头盖脸地向你袭来，你只好一筹莫展地躲在篱笆旁边喘气。此刻，只有篱笆旁边的紫菊花和西番莲还盛开着，宛如装点在坟地上的白色、黄色和赤红色的花环。道路泥泞，即使是晴天，依旧是烂泥满地。我们到院子里去也只得穿上木屐。墙根处开始出现潮湿的斑纹。后来，这些斑驳的花纹日渐扩大，一直延伸到了二楼靠窗台处的地方。最后，整所楼房都变得阴森可怕、寒气逼人了。

城市里的条件比农村要好上千百倍。在比尔森，房子里温暖如春。在厨房和浴室，只要你开一下水龙头，自来水便源源而来。而在霍季姆涅日村，我们必须从二楼走到院子里的水井边去打水，而且，要到楼外的洗衣间的大木盆里去洗澡。

只要天气晴朗，爸爸总要到河边去钓鱼，或者到林子里去采蘑菇。多年来，他一直被脚趾痛的疾病折磨着。每天清晨脚趾格外疼痛，使他无法继续安睡。此时，他只好起身下床，在房子里踱着步，或者拿起望远镜，看看是否有人偷偷地到“他的”祖布日纳河去钓鱼。尤列克对父亲的这一举动始终无法理解。尽管他非常尊重他，也非常同情他身受顽疾折磨之苦，但他还是批评他说，为什么不让乡亲们也到祖布日纳河去钓鱼。爸爸冷冰冰地回答说，这种事尤列克不懂。

不过，此后他在尤列克面前再也不提禁止别人去河边钓鱼了。

有一次，爸爸去比尔森看病，村长拿着一根钓杆来找我们。他把钓竿交给了尤列克。尤列克笑着问道，他从来不去钓鱼，村长干嘛给他送钓杆来？村长疑惑不解地说：“这是我从偷你们家鱼的那个家伙手里缴来的！”尤列克笑容满面地说：“您为什么不让他钓鱼呢？”村长一本正经地解释说：“那家伙是偷着到老伏契克先生的河里去钓鱼的呀！”尤列克却安详地回答说：“那您就让他去钓吧，钓杆也请您还给他吧！”

尤列克从来没有拿过钓杆。当他看见爸爸钓住了鱼时，他宁愿走开。他不愿看见动物遭到杀害。他多情，但并不伤感。比如，拿参加示威游行来说：当他看见警察为了驱散群众而殴打示威者时，他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跟那个警察扭成一团。他臂力过人，但是他从不依仗自己力气大便去欺凌手无寸铁的弱者。妈妈也从不在他跟前干宰兔杀鸡的事。尤列克真正是连小鸡也不肯伤害的好人。为此，他还养成了不吃羊肉的习惯哩。

我们的母山羊莉津卡在复活节以前快要下羔了。爸爸斩钉截铁地说：“不用担心，一切我自有安排。”到了羔子出世的那天，他往羊圈里跑得更勤了。为了照顾好莉津卡，他甚至忘掉了脚趾的疼痛。晚上，他告诉我们说，在羔子落地之前，他一刻也不离开羊圈。

厨房里的时钟转了一圈又一圈，但还是不见爸爸回来。

尤列克建议看看他去。我们提着马灯来到羊圈。羊圈里乱成一团！只见爸爸躺在草堆上，母山羊站在食槽旁，不停地舔着身边的小羊羔。爸爸比母山羊还要疲乏许多。第二只小羊羔偎依在他的胸前，而第三只羔子又马上就要落地了。“天呀，爸爸，你怎么啦？”尤列克吓了一跳。爸爸叹了口气说道：

“母山羊真受罪，真叫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天晓得还有多少只羔子没有出世啊！”

我跑出去把普拉斯大叔找来。爸爸回屋里去煮蜜糖啤酒给母山羊滋补身体。普拉斯大叔忙着给第三、第四只羔子接生。一胎生下四只洁白如雪的小羊羔，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罕事儿！尤列克打趣说：“我们这里就是古怪多哩！”普拉斯大叔却一本正经地说：“一胎生了四只羔子，了不起呀！母山羊通常是一胎生一只，最多也只生两只，生三只就不多了。而现在却生了四只——我也是头一次见到哩！”

小羊羔用纤细的小腿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当它们细弱的小腿儿还无法站稳时，它们却试图开始蹦跳了。“母山羊恐怕养不活这么多羔子，”普拉斯大叔以怀疑的口气说。“如果死了，那就太可惜了！”三只羔子是公的，另一只是母的。早饭时尤列克建议：两只羔子由我们人工饲养，另两只由母山羊饲养。过了一会儿，我们便把两只小羊抱到二楼的厨房里，安置在壁龛中，里面再铺上干草。然后，我们抬来了两只盛煤用的木箱，把壁龛做成的小羊圈挡好。我们还准备好了一瓶牛奶，奶瓶口装上奶嘴。尤列克抱着一只小羊羔坐到旧沙发上，然后他用手掰开它的小嘴，我便把奶瓶上的奶嘴

塞进它的小嘴里去。那只羔子（是一只母的）立即大口大口地吸食起来。它吃得那样地津津有味！

照料小羊羔的工作可把我们忙坏了。两只羔子喝足了奶，活蹦乱跳可高兴了。它们在小羊圈里来回走着，不停地咩咩直叫。忽然，一只小羊四脚一跳，前脚便跳进了木箱中，而后腿却依然站在小羊圈的地板上。不一会儿，这只小羊的后脚又往上一蹦，四只蹄子便都在木箱里了。不久，第二只小羊也跟着跳了进来。这一下两只小羊羔可碰得够呛！第一只小山羊又急忙一跳，便在厨房中奔跑了起来。不一会儿，第二只小羊也跟着跳了出来。两只小羊羔发疯似地相互追逐着，围着菜桌跳跃着。四对小蹄子把地板敲打得咚咚直响，连窗子上的玻璃也随着颤动。小山羊在厨房里闹翻了天，弄得我们连自己的说话声也无法听见，特别是当两只狗也蹿了进来一起胡闹的时候。

但是，周末妈妈一到，两只狗和两只小山羊便再也不能胡闹了。厨房成了羊圈，这还成何体统！然而妈妈有所不知，爸爸还正在楼下房间里让老母鸡抱窝哩，据说，这样老母鸡才不至冻坏。当妈妈知道以后，抱窝的母鸡也必须立即搬家，搬到鸡窝里去。“这太不象话了，把人住的房子都变成猪圈了！”她生气地嘟囔着。但是，不一会儿她的气便消了，因为这些都是尤列克干的。

后来，妈妈和爸爸商定，把小公山羊宰来烤肉吃，小母山羊则留着下奶。如同尤列克自己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曾亲手“抚养”了小山羊，所以此后他再也不吃羊肉了。

秋天，当妈妈到霍季姆涅日村来度周末时，总要给我们准备出足够几天食用的饭菜。她总那么认为：她不在那里时，我们连饭也吃不上哩！

冬天，爸爸到比尔森去了。经医生确诊，他的脚趾得了坏疽病。

大概在十月里，尤列克从布拉格的“中国人”那里带回来一本亚历山大·尼克利奇所著的德文书《到处充满奇迹》。《行动》出版社建议我们试译一个印张（因为它是科普作品），然后决定是否采用。我兴致勃勃地把它译好，最后尤列克在文字上替我作了润色。翻译这本书确实很不容易，对我们说来确实是到处充满着奇迹，因为我们不懂物理、化学、植物学、技术以及该书所论述的宇宙奇观等方面的专业术语。但是，我们终于把试译的一部分工作完成了。尤列克去布拉格时把我们的译稿交给了《行动》出版社。经他们研究后，我们终于接受了该书的翻译任务。

第五节 多马日利采城 博热娜·聂姆措娃寻踪

博热娜·聂姆措娃120周年诞辰来到了。从夏天起，尤列克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女作家，他正在构思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在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上个世纪一位有趣的人物：作家兼记者杨·奥海拉尔。雅库贝茨在谈到这位作家时写道：“他尤为熟悉社会问题”，“对他来说，

社会的进步比民族问题还要重要”。在雅库贝茨所著的《捷克文学史》一书中，尤列克重点划出了如下一些论述：奥海拉尔也为聂鲁达主办的杂志《生活画图》撰稿，把博热娜·聂姆措娃的《外祖母》一书很好地译成德文，并且发表在他自己主办的《回忆》杂志上。他是当时居住在捷克地区的最进步的人士之一，因此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尤列克。奥海拉尔用德文写作。尤列克希望能仔细研究他主办的《牧歌书信》。尽管他到处搜寻，但还是未能弄到。只是当他写的《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出版很久以后，他才在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它。1940年6月15日，他从布拉格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谈到他发现《牧歌书信》的情况。他说：“明天我终于能得到大学图书馆的阅览证了——它是奥尔毕斯出版社替我搞来的——因此，我不仅能弄到沙伐日克主编的《世界之窗》第34、35期，而且还能弄到奥海拉尔的作品，只是因为有人忘了把它编进图书目录里，才害得我白找了好一阵子。”

起初，尤列克为自己的书选的标题是：《论博热娜·聂姆措娃和〈外祖母〉的第一个译者（即：杨·奥海拉尔——作者注）》。后来，书的主题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尤列克才把书名改为《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

秋天，尤列克每次去布拉格时，总把我们翻译的尼克利奇作品的部分译稿随身带上。在修改译稿时，他还完全脱离原文，自己加写了一段（在《时间的机器》一章里）。他选用了“乌托邦速度”，写道：“……我踩了一下踏板，时间

的机器立即把我带回到遥远的年代。我回到了1847年，我在布拉格停了下来，信步来到卡纳尔花园，后来这里便是布拉格的维诺赫拉迪区。在卡纳尔花园里，我遇见了正在散步的、美丽的博热娜·聂姆措娃太太，她是从多马日利采到这里来小住几天的；或者，我碰见了年轻的音乐家贝德日赫·斯美塔纳，我对他未来的作品《被出卖的新嫁娘》深表敬佩，而对那位漂亮太太未来的小说《外祖母》也表示了景仰之情；可能我还会碰见青年学生杨·聂鲁达，我将对他不朽的伟大精神脱帽致敬——然后我重新登上时间机器的座舱，开动第三宇宙速度，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

1939年夏天，当霍季姆涅日村的家里来人最多时（当时有尤列克的双亲，他的两个妹妹，以及莉巴的两个女儿），我们俩便把卧室搬到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去，当时那个房间空着，没人居住。晚上，大家都回卧室就寝后，尤列克便提着煤油灯到楼下的房间来挑灯夜读，通宵达旦那是常有的事。

秋天，我们一天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早上八—九时吃早饭。早饭是代用咖啡，一小片面包或一小块夹心蛋糕，尤列克吃起来也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就象每次吃饭那样。我早已经吃完了早饭，而他却还是慢条斯理地吃个没完。当他独自留下来时，他便一边吃、一边读起报来。从九时起我们坐下来开始工作，直到下午一点，接着吃午饭。当时，我们的午饭常常是一盘蒜泥汤加面包。尤列克吃饭相当讲究。但是如果没有好菜，蒜泥汤他吃起来也如同山珍海味一样香甜。他用打字机打了一份漂亮的菜单，菜单上用各种文字打出一

大串菜谱名称，而所有这些菜名翻译成捷语的话，就叫“蒜泥汤”。

午饭后，我们经常外出散步，有时顺便也去买点东西。霍季姆涅日村是没有商店的，因此我们常常到邻村——普日沃泽茨或奥斯符拉青去采购。那时，我们偶尔还能在肉铺里不用肉票就买到一小块尤列克最爱吃的猪肝，或者一小块肉。

下午四时，我们回到家里。我把代用咖啡烧好，接着我们又开始工作。晚上收听外国广播，首先收听苏联电台。晚饭后继续工作，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

尤列克几乎每年都要去看看古城多马日利采。他第一次访问那座古城，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才十四岁，还是个中学生。他非常喜爱广场两边古老的长廊，为此他还特意作画留念。他的那张画一直保存至今。后来，当我们结伴同游多马日利采时，他常常吟诵起刻在古城城门上的诗句：

“多马日利采啊，
祖国的铁壁铜墙！
你过去坚贞不屈，
祝愿你永远坚强！”

在纳粹占领的今天，古城门上的这些诗句便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了！

尤列克对多马日利采人怀着炽热的感情，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着悠久的、感人的霍德族历史，而且是因为博热娜·聂姆措娃、约瑟夫·卡耶坦·蒂尔和雅罗斯拉夫·弗尔赫利茨基曾经在他们的城市的广场和街头漫步过。

还是在1938年夏天（8月27日），“苏联之友协会”在多马日利采举办了题为《苏维埃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关系问题》的报告会。会上，尤列克发表了演说。“苏联之友协会多马日利采分会”是在报告会举办前不久，在大难临近之日（即在6月17日）成立的。尤列克的发言充满着火热的激情和坚强的信念：苏联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朋友。

1939年11月2日，我们来到多马日利采图书馆。当我们走进图书馆时，里面空无一人，只有一位管理人员坐在书桌旁在写字。尤列克向他借来图书目录，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十分投机。我们从书目中发现，这个图书馆拥有许多珍本，而那位管理员也了解到：尤列克是一位嗜书成癖的人。这时，我们彼此更是无话不谈了。尤列克也立即成了这个图书馆的会员，他的借书证号码为447号。他第一次借来了杨·埃·索伊卡的著作《古代》和约·舒斯塔编写的《捷克历史》（两卷本）；第二次借来了由约·瓦·弗里奇^⑨编写的、于1856年出版的《拉达·尼奥拉年鉴》。《年鉴》这本书他已寻找了很久，他多么希望在自己的书架上也有这样一本好书啊！

管理员还主动提出领我们参观图书馆。我们看了所有的

书库。我们还发现了放着许多书箱的黑咕隆咚的小房间。尤列克很想知道里面收藏的是什么书。他意外地发现，那里尽是些民族复兴时期古典作家们的选集（原版简装本）。他问管理员，为什么把这些书积压在箱子里。那位管理员解释说，这种书他们有好几套。在书架上我们还找到了博热娜·聂姆措娃著，由克维德·马内斯插图的早期出版的《外祖母》。这种稀有的珍本却随随便便地放在这里供读者借阅！尤列克爱不释手地翻阅着它。要不是他几乎能背诵此书，他真想把它借回家来呢！

尤列克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图书馆。他多么希望能得到他跑遍旧书店没有找到、而现在却安然存放在书箱里的那些珍本啊，这样的珍本一定要供放在书橱中最显眼的位置上才行！回到霍季姆涅日村后，对珍贵古籍的渴望之情还长久地萦绕在他的心间。

多马日利采图书馆我们共去过三次。最后一次是在1940年2月29日。出发时尤列克建议步行。夏天步行倒也无妨。但是当时还是寒风刺骨、大雪封山的时节！后来我们还是踏雪前往。路难走极了，我们常常陷入没膝深的积雪中，而尤列克却不顾一切地、不管有路没路径直朝前走着。我们穿过田野和林间小道，经过几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情绪饱满地到达了多马日利采城。图书馆管理员象欢迎老朋友那样接待了我们。自然，我们首先谈到了政治形势。管理员以为，身为记者的尤列克必定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些，他甚至还应该知道，希特勒还能支撑多长时间。尤列克告诉他，希特勒必然

要跨台，但是，第三帝国何时完蛋，他也不能未卜先知。此时，管理员露出了几分失望的神色。

尤列克问管理员，他们是否能把民族复兴时期的诗人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原版简装本）与其它对多马日利采的读者有用的图书相交换。管理员对尤列克的这一建议表示赞成。这样，我们便从书箱里找来了马哈、克利茨佩拉、兰格尔[®]、科乌贝克、克拉采尔的作品，只是在《鲁贝什全集》（共十五分册）中没有找到该集的第八分册。总的说来，它并没有使尤列克感到失望。作为交换，他给多马日利采图书馆寄去了许多书报。我们把交换来的全部书籍带到了比尔森，请装裱工人希林格尔重新装订了一番。

希林格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图书装裱工人。我们和他认识是通过莉巴介绍的。他在离戏院不远的一幢老房子里有一个装订车间。穿过院子，沿着陡立的楼梯便可以进入位于二楼的这个车间。车间里放着一张张长长的工作台，靠墙摆着一排排几乎要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书架上满放着各种颜色的粗麻布、皮革和羊皮纸，书架旁边是装订机，空气里散发着胶水、浆糊和皮革的气味。希林格尔很喜欢书，他装订的书既细致精巧又美观大方。第一次我们送去装订的书是《博热娜·聂姆措娃书信集》，那是我们在布拉格从博罗维那里买来的。从纳粹占领期间装订工人仅有的材料中，尤列克挑选了奶油色的猪皮作书脊和书角，淡蓝色的厚纸作书皮。据说装订只需两个星期。

当希林格尔把装订好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书信集》交

给尤列克时，他是如此地满意，甚至下定决心，当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我们都将获得解放的时候，要把我们所有的书都陆续送去装订一番。他还幻想着在布拉格我们的寓所旁边再弄一套房间，把它们全部辟为藏书室，而现在的两间单身宿舍将继续留作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一批一批地把书籍送给希林格尔请他装订。我们从多马日利采图书馆交换得来的所有简装本以及在布拉格诺伊伯特旧书门市部和霍克尔旧书店买来的某些书籍，希林格尔都用半皮革封面把它们装订好，比如：奥托编写的《戏曲词典》，切拉科夫斯基的《斯拉夫民族成语汇编》，鲁贝什的《歌谣集》，哈列克的《夜歌》，温岑茨·瓦夫拉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以及其他许多书籍。我们只要有一点儿钱，便把书送到希林格尔那里去装订。尤列克几乎把所有的书都装订上半皮革的封面。每次去布拉格，他总要去拜访心爱的旧书店，仔仔细细地翻阅和选购新补充的旧书，然后把许多书送到希林格尔那里去。他从布拉格还带回了杨·卡贝利克为纪念克拉采尔一百周年诞辰而写的《弗兰季舍克·克拉采尔》一书，这本书也请希林格尔装订了。尤列克每到一处，哪怕只呆很短的时间，也立即要搞一个私人的小图书馆。图书成了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霍季姆涅日村的小图书馆是他拥有的全部图书馆中的第五个，同时也是最小的一个，然而它保存下来的图书却最多。这个小图书馆可惜给盖世太保的跟踪留下了脚印。

1939年11月7日即将来临。对尤列克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当他在《红色权利报》工作和主编《创造报》时，他总是力求使这一天的报纸更加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以便能更好地、更令人信服地向读者证明：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权正在一年年地成长、壮大，她对全人类的影响也正在日益扩大。在1939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之际，尤列克已不可能再在《红色权利报》上或在《创造报》上发表文章了。他期待着届时能到人民中去。和他们谈谈我们的忠实朋友——苏联。我们来到了布拉格。11月7日晚，当进步的艺术家的俱乐部聚会时，尤列克发表了关于苏联的热情洋溢的谈话。他的谈话是对所有与会者的巨大鼓舞和支持。当时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在这个俱乐部发表庆祝十月革命的谈话，因为从俱乐部正门往前几步有一间咖啡馆，在这间咖啡馆的顾客中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其中包括德国法西斯分子和大兵。他们中不少的人常常把俱乐部错认为是咖啡馆。但是，尤列克可不在乎这些！他认为，当我们（或者说特别是当我们）生活在法西斯恐怖统治之下时来纪念光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个时期，法西斯分子还没有宣布戒严令，他们还没有枪杀捷克公民，还没有禁演捷克戏剧。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法西斯政府下一小时将干些什么。只要他们骑在我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就别想能过上好日子——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当时他们的权力尚处于上升阶段。事实证明，这种看法

是完全正确的。十天后，即11月17日，纳粹分子们便血腥镇压了布拉格高等院校学生的示威游行，关闭了捷克所有的高等院校，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好几个地方宣布了戒严令，在布拉格和布尔诺逮捕了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并把他们送进设在德国境内的集中营。

挚友中早已被捕的有伊万·塞卡宁纳、巴维尔·普罗科普和约什卡·雅布尔科娃，在纳粹分子开进布拉格的最初日子里，他们便落入了魔掌。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盖世太保也在搜捕尤列克，因为，1935年议会选举时，捷共候选人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不过，当时尤列克向警方申报的住址是“布拉格木匠街”，盖世太保在该住宅并没有找到尤列克。我们也已知道，1939年的初春，我们党的领导人萨波托斯基同志^⑩、多兰斯基^⑪同志和其他同志在秘密越境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关进了集中营。我们在霍季姆涅日村居住时从未报过户口。尤列克每次去布拉格，在进入我们的寓所之前，他总是先给邻居霍利家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我们的寓所是否平安无事。

自从尤列克在艺术家俱乐部发表了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说、回到霍季姆涅日村以后，他便投身于对下列杂志的研究工作：由卡雷尔·哈弗利切克·博罗夫斯基主编的、于1848年出版的文学、艺术和娱乐性杂志《捷克蜜蜂》，1855年出版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为之撰稿的《捷克珍宝》，以及《拉达·尼奥拉年鉴》。他对自己悉心研究的民族复兴时期的杂志和原版书籍推崇备至。他说，民族复兴时期浓郁的

气氛跃然纸上，这有助于他能深入地去了解那个时代。

那年秋天，尤列克还从布拉格带回一本由玛格达莲娜·多布罗米拉·列蒂戈娃编写的《捷克菜谱》。他是在霍克尔旧书店买到它的。《菜谱》前言中的日期为1838年，据此可知，这本书大概也是在同年出版的。尤列克买它时只花了一个克朗。当他用低价买到了珍本书时，他总是那样的欣喜若狂。但是，他在旧书店也经常发现，同样一本书，各家旧书店的标价可以相差好几倍。他深信，不管他买来的书是多么便宜，书店老板同样也是赚了钱的。

有时候，尤列克把《捷克菜谱》整段地念给我听，特别是烹调方法，比如“烤小猪制作法”：“乳猪经精心收拾并在开水中烫洗干净后应先晾干。晾晒时猪头朝下，膛内抹上食盐并加小茴香。如乳猪个头小，可将黄油面包或面包片填入膛内，然后将乳猪缝好，置于铁叉上烤制。开始时应把乳猪慢慢转动，直至把它烤干为止，继而烤成焦黄色。如果发现仍有残存的猪毛，可浇上热啤酒，加涂滚烫的黄油，并逐步加快转动速度。应注意，不得在烤小猪上出现水泡……”我们俩一边读着，一边大笑起来。当时，我们正经历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难时刻。也正因为这样，尤列克才能更加亲切地体会到，博热娜·聂姆措娃在短促的一生中多次经受的苦难是什么滋味。

第六节 在老伏契克家 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1939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老伏契克家每年的圣诞节总是一年中规模最大的盛典，特别是由于所有的孩子届时都回家团聚。节前几天，妈妈和薇拉便预先烤制好各式糕点。到了圣诞节那天，她们便把五颜六色的糕点整齐地摆在玻璃盘里，然后放在小房间的一张桌子上。我和尤列克通常要等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才到比尔森去。这时，妈妈早已在热烘烘的锅台旁忙得不可开交。她在准备鱼汤，再把爸爸买来的鱼煎好。有几年，爸爸手头较为宽裕，他便买来一大堆鱼，急得妈妈搓手顿脚，不知从何下手是好。但是，爸爸却用他的男低音瓮声瓮气地说，买来的鱼越多，找到带鱼子的鱼的希望才越大。“没有鱼子的鱼汤算什么鱼汤！这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提醒妈妈说，“尤尔恰最喜欢吃的菜就是鱼汤了！”的确，晚饭时尤列克总要吃上满满的两大盘。这种鱼汤可好吃了！尤列克说，妈妈烧的鱼汤是天下第一的！不过，住在兹布拉斯拉夫的外婆烧的土豆汤也是无与伦比的。

张罗圣诞节的饭菜要比平日忙得多。这天如果爸爸有事外出，那是妈妈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据说他什么事都要插嘴，到处碍手碍脚。但是，1939年的圣诞节，这位可怜的老人却病倒在床上。每天莉巴都要跑来看望他几次，或者拿来一包礼品，然后又立即把它送到另一房间里的圣诞树下，或者

又跑来打听一下，“孩子们”——老伏契克家的男女老少都这样称呼我们——是否已经到家了。她每次推开房门，便象太阳一样把整个房间照亮；她又象来去无踪的清风，总在自己的身后播种下欢乐。她在许多方面跟尤列克非常相象。

布置圣诞树的人是莉巴和妈妈，后来薇拉也参加进来。如果尤列克从布拉格回来得早，那么，他也会前来帮忙。圣诞树必须用枞树。它立在地上，而树梢儿几乎要碰到天花板。用晶莹透亮的玻璃制成的、闪闪发光的饰物，用金银丝线编成的、五光十色的彩带，以及红黄蓝绿各种颜色的金箔纸片，把圣诞树装点得五彩缤纷、光采照人！圣诞树下面摆满了礼物。妈妈需要的大衣，爸爸需要的裤子，薇拉的整套新衣服，全都能在那里找到。

晚饭前，妈妈通常总先找我谈话。她说：“古丝蒂奇卡^⑥，请你告诉尤列切克，在雅拉（莉巴的丈夫）面前就莫谈国事了，就让大家过一个消停的圣诞节吧！”这些话妈妈不敢在尤列克面前直说。我向她保证，尤列克尊重她的意见，但是，如果雅拉要挑起争论，那么尤列克肯定是不不会沉默的。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只要碰在一起，雅拉便总要先跳出来说上几句，而尤列克则一句也不饶他，接着两个人便要争吵一番。有时候，妈妈必须施展母亲的权威出面干预，甚至用手里正握着的炊菜勺去吓唬他们，要他们彼此都少说两句。因此，莉巴他们在回娘家过圣诞节之前，她也总先劝说丈夫，求他在见到尤列克时千万别挑起政治争论，至少在那个晚上能让全家人高高兴兴地过一个圣诞节，何况

尤列克回家的机会又是如此之少！

老伏契克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这些日子以来，妈妈不停地扫呀、洗呀、擦呀、熨呀，累得她浑身酸痛，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晚上七时，大家坐下来开始节日的晚餐。餐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装饰着槲寄生和松树枝，放着一年中只用上两三次的节日餐具。从盛满鱼汤的大汤盘里散发出香喷喷的热气，在椭圆形的海碗里满满地盛着炸鲤鱼块，另一只同样大小的海碗里放着土豆色拉。主食过后，妈妈端来了果馅甜饼、点心和核桃。正在此刻，莉巴全家走了进来。大家围坐在餐桌旁边，只有雅拉选择了长沙发一端的座位，心里牢记着莉巴的叮咛，默默地坐在那里，不时还打起盹来。莉巴的孩子们却是兴致勃勃、喜气洋洋，因为她们在家里的圣诞树下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那份礼物，现在，她们又满怀信心地盼望着能在外婆家里收到新的圣诞礼品。大女儿已经不再相信有什么“圣诞老人”了。一方面说什么这套新衣服是圣诞老人送给她的，一方面又事先把她叫到裁缝店去试衣服尺寸，为了穿起来能合身美观。爸爸的睡衣是她陪着妈妈替他买来的，但是，后来当爸爸在圣诞树下找到它时，又说什么圣诞老人送来的。她也曾多次亲耳听见妈妈和姥姥在一起议论，圣诞节时该给谁送什么礼物。但是，她不愿意让妹妹小汉妮奇卡扫兴，因为小汉妮奇卡正在不停地打听，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接待”圣诞老人当然又是尤列克的任务。他总是乐于给人们、特别是给孩子们带来快乐。他悄悄地从房间里溜了出去，来到卧室，点亮圣诞树上的彩灯，然

后不声不响地回到房间。他总是最先听到前厅里的门铃在响的人，尽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那回事。他走到前厅，乒乓作响地打开通向走廊的门，大声地跟某人说着话。然后回到房间告诉大家，他刚刚和圣诞老人谈了话，圣诞老人叫咱们到卧室中去，他在圣诞树下给大家准备好了节日礼品。孩子们一马当先向卧室冲去。他们打开房门，卧室里靠窗的地方一棵五彩缤纷的圣诞树正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大半间卧室的地板上摆满了大包小包的各种礼品，包上都写着礼品所有者的名字。1939年，尤列克和全家共同欢度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当时他在每个礼品袋上都写下了幽默的题词，比如，在送给爸爸的一本侦探小说的封皮上，尤列克写道：“送给卡尔·伏契克先生，愿他无须再去阅读有关曼德拉草的介绍文章了。”

（迷信的人认为，曼德拉草具有包治百病的神效，在我们翻译的尼克利奇的著作《到处充满奇迹》一书中，爸爸曾读到了有关这种药草的报导。当时爸爸的脚趾痛得厉害，我们希望他从这种报导中能得到某种慰藉）在送给小妹妹薇拉（当时她正准备结婚）的桌布包上，尤列克写道：“送给薇拉·伏契科娃小姐，以期在我们来访时能用它宴请我们。”在送给妈妈的节日礼物袋上，尤列克写道：“宴会用晚礼服一套，送给霍季姆涅日村的女主人、贝内肖夫区的大家闺秀、扎麦茨基的玛丽亚·伏契科娃太太。”（尤列克这个风趣的献词的含义是：“霍季姆涅日村的女主人”——因为妈妈在那里总是马不停蹄地忙个没完；“贝内肖夫区的大家闺秀”——指她出生于贝内肖夫区；而“晚礼服”者不过是一件睡衣而

已。)在送给爸爸的两瓶葡萄酒上,尤列克这样写道:“此二容器乃最新发明的、灵巧的安全装置,其所有权属卡尔·伏契克先生。该装置的安全原理在于:如果一个容器的溶液过早地挥发干净,另一容器便能迅速开启。”

每个人都在礼物袋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尤其是妈妈和孩子们——甚至收到了好几份礼品。此外,每个人在圣诞树下还找到了尤列克赠送的一小包礼物和一本书。给小汉妮奇卡的是一本画册,其它书籍有博热娜·聂姆措娃的短篇小说,杨·聂鲁达、维捷斯拉夫·内兹瓦尔^⑧、伊日·沃尔克尔^⑨、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⑩的诗集等。在最后一次圣诞节,莉巴收到了博热娜·聂姆措娃的《书信集》;在1938年,她收到的是克洛斯塔曼的著作《在舒马瓦的密林深处》。尤列克在题词中写道:“莉巴留念,为了纪念我们曾经漫游过的、而且将来还要去的地方,1938年12月24日。”尤列克送给我的书是博热娜·聂姆措娃的《外祖母》和《山脚下的村庄》。我们的书架上虽然早已有这两本书,但是,现在的这两本是由阿道尔夫·卡什帕尔插图的非常漂亮的精装本。尤列克收到的圣诞礼物是一件晨衣、一套睡衣,几条手绢和一些香烟。当时他立即穿上睡衣,把晨衣披在外面,再把新手绢插入晨衣的前胸口袋里,然后,他又点着一支礼品香烟,开始在房子里来回踱着方步。每年的圣诞夜,尤列克还要加吃一顿鱼汤,这使妈妈十分满意。我心里明白,他这样做与其说是肚子饿的缘故,倒不如说是为了使妈妈高兴!尤列克还非常耐心地向小汉妮奇卡讲解书中的图画。1939年

暑假，小汉妮奇卡正好念完了小学一年级。当时她的语文课相当吃力，她妈妈莉巴便在霍季姆涅日村替她补习功课。但是每次补习，过不了多久，便会惹得莉巴大发脾气。结果，尤列克便和小汉妮奇卡坐在一起，耐心地教起她来。

1939年最后的那个圣诞节，我们在老伏契克家共呆了一个星期。当然又没有到警察局去申报户口。圣诞日那天，当我们正在比尔森城里散步的时候，突然，弗里采克·赖青从对面马路上向我们走了过来。他在1939年春被盖世太保逮捕，几个月后获得释放。我们衷心地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采取了什么手段才被释放出狱的。他对我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尤列克也诚挚地握了他的手。弗里采克希望找他谈谈，但是不能在马路上。我们便把地址告诉了他。就在圣诞节的星期一，有人按响了老伏契克家的门铃。妈妈打开了大门。一个陌生的男人走了进来，打听这里是不是尤列克的住址。妈妈把我叫了出去，让我看看是什么人。“赖青！快进来，弗里采克！”“请他在前厅这里把鞋脱了，”妈妈提醒说，“外面湿漉漉的，别把地毯给弄脏了！”赖青脱下了鞋，我给他拿来了便鞋。房间里没有生火。但是，尤列克从早上起便坐在这里，翻阅着书架上的书刊。弗里采克走了进来，尤列克把他让到靠书桌的沙发上。“我们一定要煮点咖啡，”尤列克说。我照办了。他们两个在房间里谈了好几个钟头。我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我们把地址告诉了他，这样，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

第七节 鸟的世界

秋天，霍季姆涅日村楼房中充满阳光和欢乐的客厅变成了仓库。爸爸在那里准备了一条横竿，上面挂满了编成一辫一辫的、金灿灿的葱头。地板上铺着干草，上面放着从花园里摘下来的苹果。我们在厨房里布置起了自己的工作室。

厨房的北墙上有一个窗口，从窗口向外眺望，可以看到邻居的花园、它后面的田野以及近处的树林。几年前，爸爸用铁丝在窗外编织了一个碗架，上面用一块防雨的木板盖好。夏天，我们常用它贮存食物，因为那里十分阴凉。当妈妈和拖着病腿的爸爸在暑假结束相继离开以后，窗外的那个碗架上还剩下了一小块人造黄油。

秋凉以后，我们便把卧室搬到厨房隔壁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是莉巴全家来度假时居住的地方。由于我们喜欢新鲜空气，所以总是让卧室中的一个窗子昼夜敞开着。1939年冬，有一天突然来了寒流。我们是第二天早上才感觉到的。当时我们看见两只小山雀停在敞开着窗子的窗台上。过了一会儿，一只小山雀飞了进来，落在尤列克睡觉的床沿上，然后又飞到鸭绒被上。此时，小山雀向着尤列克的头部敏捷地跳了过去，嘴里还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当它跳到床中央时，尤列克将身子扭动了一下，两只小山雀吓了一跳，飞走了。我们不明白小山雀要向我们说些什么，还为此伤了一番脑筋。后来，尤列克去看了看窗边的温度计。“我们怎么会不冷

呢！你知道几度吗？”他问我道。“零下十七度哩！”

早饭时，我们又对山雀之谜猜度了好一阵子。尤列克认为，它们大概是来求我们帮忙的。这些话引得我哈哈大笑，真亏他想得出来！

第二天烧饭时，我发现橱柜里的猪油只剩下最后一小块了，便到窗外的碗架上去取人造黄油。本来准备去拿半公斤重的人造黄油的手，在抓住那个小包后却轻飘飘地抬了起来。小包空空如也，但外形却依然如故，只不过旁边多了一个小洞而已。人造黄油大概就是从这个小洞“不翼而飞”的吧？！尤列克见后，打趣地说：“这不是石子儿，这是铅弹。”丹尼尔·笛福^⑧描述鲁滨逊在渺无人迹的荒岛上找到了一粒铅弹时，就是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一章的。尤列克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也发现了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的东西。他把这个空空的小纸包托在手上，翻来覆去地打量着它。突然，他提出了一个假设：这包人造黄油是那两只小山雀吃掉的，昨天早上它们飞进卧室里来，大概是想骂我们对它们漠不关心。我觉得这种推测不合情理，从来没听说过小山雀还吃人造黄油。尤列克也不清楚，不过他说很快就能找到答案。他立刻找来了农业杂志《桥头堡顾问》，上面经常刊登有关作物栽培、种植和家禽（甚至鸟类）饲养等方面的知识。果然，他读到了“山雀喜吃兽脂”的报导。他认为，现在它们弄不到兽脂，当然也会吃人造黄油的，因此，我们要给山雀喂食，特别是当今隆冬天气！此后，我们便喂养起小山雀来了。

1940年的春天快到了。3月初，时刻挂念着霍季姆涅日村的爸爸从比尔森回到这里。妈妈也在这里住了两天。风和日丽，人们和飞禽走兽都显得格外快活；草地披上了新绿，池边的垂柳吐出了一串串鹅黄色的枝条；在春风和阳光的作用下，楼前和院子里的泥泞小路已开始变硬，耶里克和布兰卡常常在这些小路上追逐嬉戏。被关在大铁笼子里的维克多发现了它们，便用后腿站立起来，把前腿搭在铁丝网上，尖声嗥叫着。它为自己不能参加它们的游戏而愤愤不平。爸爸非常注意维护猛犬维克多的声威。白天他总把它关在铁笼子里，只是到了夜晚才把它放出来。其实，维克多徒有虚名而已，它是三只狗中性情最温驯的一只。我自己便有亲身的体会。一天晚上，我拿着一碗饭来到院子里给维克多送去，当时我以为它还关在笼子里呢。当我把碗放在地上时，它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且舔起我的手来。我大吃一惊，跳了起来，使劲跺了跺脚，维克多便逃走了。

圈维克多那只铁笼子里原来养着两只浣熊。当时，这所房子的主人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一次，他买了两只浣熊带回家来，又用铁丝为它们编了这只大笼子。后来浣熊咬坏了铁笼逃走了，并在邻村咬死母鸡、偷吃小鸡和鸡蛋。母鸡的叫声惊动了村里人。他们发现，原来是浣熊干的好事。于是全村展开了围捕浣熊的运动。当时正是夏天，我和尤列克正是在那个时候来到霍季姆涅日村的。一只浣熊逃到了爸爸正在钓鱼的河边草地上。他一见浣熊，便抓起鱼抄向它扑了过去。在岸上追了好一阵子后，爸爸终于把浣熊网住了。从那

时起，尤列克便经常打趣说，他父亲是一位“捕熊英雄”。

妈妈打开羊圈，母山羊莉津卡跑了出来。坐在柳树下长凳上的爸爸把它唤到自己跟前。它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叫他喜欢。去冬以前它那洁白的羊毛，如今在腰部和腹部都已变黄，胡子也被露水弄得湿漉漉的。莉津卡把两只前腿艰难地蹬在长凳上（不久它又要生小羊了），把下巴搭在爸爸的肩膀上。爸爸以为这是莉津卡在欢迎他。其实，莉津卡因为看到了爸爸头上有一根鲜嫩的柳枝儿，正伸长脖子去够它呢！

“莉津卡，你太难看了，”爸爸对母山羊说。“这样可不行。孩子妈，把剪刀给我拿来，我要把它身上的脏羊毛剪掉！”一会儿，妈妈抱住莉津卡，爸爸便替它修剪起来。剪下来的羊毛被风吹起，弄得院子里满地白花花的。

不久，真正的春天降临了。一天，我们正坐在客厅里工作。忽然，我莫名其妙地听见尤列克说：“古丝蒂娜，你想看一看长胡子的鸟老头吗？你瞧！”我疑惑地向他手指着的阳台望去。只见一只奇怪的小鸟在栏杆上来回跳跃，它的嘴角上长着比它的身躯还要长的白胡子。这只小鸟在栏杆上又跳了两下，接着一个小飞，便飞到放在阳台上的圆桌上。然后，它跳到圆桌中央安装阳伞的小孔旁，一下子便钻进空心桌腿里去了。我们好奇地等待着，要看个究竟。一会儿，一只没有胡子的小鸟从圆桌中央的孔眼里飞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小山雀！不久，栏杆上又出现了另一只“长胡子”的小山雀。它们哪来这些胡子？原来它们是把晾在院子里的、从母山羊身上剪下来的羊毛叼来了！

1940年春，小燕子再没有回来。妈妈白费苦心地把两扇窗户敞开着，毫无结果地注视着墙上被遗弃的燕窝。“它们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她焦急不安地重复着这些问题，但是，谁又能把答案告诉她呢？

繁忙的工作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小山雀。一天，外面的天气暖洋洋的。尤列克建议我们搬到阳台圆桌上去看书。他从客厅里把书和笔记本抱了出来，把它们放在阳台上的圆桌上。突然，他一动不动地、呆呆地站住了。他把食指放在嘴边，暗示我不要说话。阳台上一片寂静，只是从花园里传来了婉转动听的鸟鸣声。尤列克把桌面上的纸抖动了几下，我们便听到从空心的桌腿里传出来的清晰的咝咝声。我好奇地向圆桌中央的小孔探过身去。里面漆黑一团。尤列克划着了一根火柴，但是，那个孔眼太小了。我取来了手电筒，但是，手电筒又太大。尤列克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用灯泡只有豌豆般大的电路测试器，这种测试器是用以检查收音机的蓄电池的。他用手把电路测试器联接在手电筒上，把测试灯放入圆桌中央的孔内，这样，人眼便可以看到空心桌腿中的东西了。在里面很深的地方，在空心桌腿底部，我们看见一只小山雀趴在那里，它的小脑袋侧向一边，一只小眼睛惶惑不安地盯着自上而下的强烈的光线。它屏息凝视，完全吓呆了。

为了不惊动小山雀，我们急忙把圆桌上的东西收拾干净，并把圆桌稍稍移到我们从客厅内能够看得到的地方。此后，我们便不时地看到一只小山雀飞落在栏杆上，从栏杆上再飞到圆桌上，三跳两跳，就消失在圆桌中央的小孔里。如

果你走近圆桌，便可以听到轻轻的滋滋声。但是，桌面上或桌腿中却毫无动静。有一次大雨滂沱，尤列克从书桌上抬起头来，注视着阳台上的那张圆桌。他看见，雨滴正劈里啪啦地敲打着圆桌桌面，同时也落进了圆桌中央的孔眼里。显然，山雀窝正遭受着大雨的袭击。他立即站起身来，找寻能给山雀防雨的东西。他找来了一个铁盒盖，把它弯成小屋顶，然后用支架把它支在圆桌的小孔上。他惊叹不已地说：“这些小山雀可真会找地方啊！”

一天早上，我们查看了一下山雀窝。里面卧窝的老山雀不见了。但是，我们却看见了七只光秃秃的幼雏，他们高抬着乳黄色的小嘴挤成一团，宛如一束金黄色的报春花。正当我们观赏着这些小山雀时，一只老山雀嘴里叼着食物飞落在栏杆上，它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离去。在客厅房顶上，另一只老山雀正在高声歌唱。当尤列克看到，老山雀历尽艰辛才能喂饱自己的幼雏时，他便偷偷地把妈妈的人造黄油拿来投喂它们。有一次，给妈妈当场碰见了，妈妈开玩笑地警告他说：

“过去我老是纳闷儿，为什么人造黄油会用得这么快。好呀，原来有贼偷呐！”“妈妈，我们总不能看着老山雀累死吧！”他笑了笑，一把抱住了妈妈。结果，逗得妈妈也笑了起来。

有一天，两只老山雀突然停止了给幼雏喂食，它们老是呆在房顶上，发出异乎寻常的尖叫声。翻译成人类的语言，也许是说：“来吧，到这儿来吧！”当它们的尖叫声没有带来应有的效果时，一只老山雀便跳到圆桌中央的小孔旁，把头伸进小孔里，向着沙沙作响的空心桌腿唧唧喳喳地叫了起

来。此时，尤列克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必须看个究竟，否则他就不能成为尤列克了。先是他看，后是我看。原来，窝里的小山雀全都拍打着翅膀，争先恐后地要从小孔中飞出来。但是，鸟窝深如水井。不久，一只灰黑色的小脑袋终于从圆桌中央的小孔里钻了出来，紧接着露出了纤细的身躯，一只幼雏终于爬到了桌面上。它十分惊奇地举目四望。两只老山雀根本就不给它任何喘息的机会，急切地、不停地呼唤着它，叫它赶快飞到它们所在的栏杆上去。小山雀扑棱着翅膀，晃晃悠悠地腾空而起，接着便飞落在栏杆上。但是两只老山雀又一飞，飞到了附近的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小山雀也飞了起来。此刻，老山雀双双向它迎了上去，并把它领到稍远的一根树枝上。接着，老山雀又领着幼雏一程一程地向远处飞去，最后，终于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此时，第二只小山雀又正尝试着从空心桌腿的深处飞出来。

上午，七只小山雀全都安全地离开窝飞走了。我们都无法理解天公的这种巧妙安排：老山雀竟能准确地知道，它们已把全部幼雏如数带走了，因为，此后它们便不再向鸟窝呼叫了。

我们以为，今后我们能在圆桌上安安静静地工作了，山雀再也不会回到空心桌腿中去了。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没过多久，它们又飞回了原处。我们只好再一次把圆桌让出去。不过，这次孵出的幼雏不是七个，而是九个！可惜，并非九只幼雏全都目睹了这广阔的宇宙。小山雀离巢的那天，

我们又是多么地激动！当时，激动的不只有尤列克和我，还有刚刚到达的妈妈。尤列克说，连鸟类都会挑选一个吉日良辰去引雏离巢哩！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只老山雀停在对面房顶上，召唤着幼雏们赶快飞出来。当第一只、第二只和第三只小山雀钻出了巢穴、飞落在圆桌上时，那是多么欢乐的景象呵！面对这浩瀚的世界，小山雀们一个个惊喜交集。八只幼雏早已经飞到邻近的树枝上去了。巢中剩下最后一只小山雀。两只老山雀在不停地召唤着它。一只老山雀还把一条小青虫放在巢穴通道的出口孔边，企图把那只小家伙引出来。要知道，它已经好几个钟头没有吃上一口东西了。

我们走近圆桌，侧耳听着里面的动静。只听得巢中的幼雏一会儿往上飞，一会儿又掉了下去。当我们用电路测试灯查看鸟窝时，只见那只小山雀蹲在那里，侧着小脑袋，一只乌黑发亮的眼睛正瞧着上面。我们不忍心再去打扰它，还是让它好好地恢复一下体力吧！

午饭后，妈妈派我们到奥斯符拉青去采购。我们带上面包口袋出发了。我们想，在我们回来之前，窝里的那只小山雀必定早已跟随着其它的山雀在外面飞翔了。为了谨慎起见，我们是沿着铁路线、而不是沿着公路去奥斯符拉青的。我们避开了位于公路旁的一个磨坊，那里的磨坊主是个纳粹分子。尤列克穿着灯芯绒裤，上身穿着格子衬衫，肩上背着面包口袋，嘴里不停地吹着口哨。我们几乎每天都这样到外面去。只不过每次都预先选好目标、决定要去的地方。有时

候，我们把蓄电池带到斯坦涅科夫去充电。到了外面，尤列克便不管有路没路，一忽儿走田埂，一忽儿穿树林，只要方向没错就行。别的时候，我们也到林子里去散步，或者到镇上去买东西。当时，凭票购买的东西数量都很少。但是，奥斯特拉青的肉店老板有时不收肉票便卖给我们一些肉或大油，那里的磨坊主也卖给我们喂鸡的玉米饲料。

通常，我们总喜欢绕道散步回家。这一次，由于我们急着想知道最后一只、即第九只小山雀的最后情况，便从原路匆匆赶回家去。我们一回到家里，尤列克立即用电路测试灯查看了鸟巢。小山雀依旧留在那里，侧着它的小脑袋。巢外面，老山雀的呼叫声响个不停。但是，巢里却静悄悄的。尤列克非常纳闷。为了让小山雀飞到外面来，尤列克卸去了圆桌面的固定螺丝，妈妈和我，还有刚刚抵达的莉巴和孩子们，大家一齐动手，帮着扶住桌腿，放倒圆桌，把桌面抬走。桌腿中的山雀窝终于露了出来，里面还留着一只小山雀。但是，这只小山雀已经死了，它是自己撞死的。

孩子们把死去的小山雀埋葬在长着几棵银松的“尤利小丛林”里。“尤利小丛林”这个名字是爸爸为纪念死去的兄弟、作曲家尤利乌斯·伏契克而起的，因为，如果没有他留下的那笔遗产，老伏契克一家是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的。当孩子们掩埋那只死去的小山雀时，几只山雀落在不远的一棵银松上，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有人说，它们一定是从阳台上的鸟窝中飞出来的小山雀，它们是来与死去的小妹妹告别的。至少尤列克是这样认为的。妈妈还告诉我们，当我们出

去买东西的时候，一只老山雀飞进客厅，焦急地唧喳了好一阵子。尤列克说它大概是来向我们求援的，而我们未能及时给予帮助，多么令人遗憾啊！

有几天，老山雀依旧从房顶和栏杆上死劲地呼唤它们的小宝贝，但是，阳台上的圆桌里却寂静无声。

（尤列克于1942年9月4日从布拉格监狱和1943年8月8日从德国鲍岑监狱发出来的信里均回忆起了小山雀，本书在其他地方还将提到。）

第八节 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

几个月来，尤列克对博热娜·聂姆措娃的作品，对她生活的时代以及有关她的文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的构思后，他开始动笔了。1940年1月12日的日历上，尤列克写了如下几个字：“《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文动笔。”

这篇文章原是他自己的学习心得，起初他并没有考虑到将来它会发表。

当他激情来潮、文思泉涌之际，他用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秀丽的蝇头小字在纸上奋笔疾书，一会儿就写完几段，有时甚至能写满两页八开纸。他不时地抬起头来对我说，他很想再念一段给我听听。他念文章时声音单调，这是为了使我能集中注意力去理解文章的内容。他非常希望能听到我的意见，希望知道我的印象和文章是否通俗易懂。我经常

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总是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每一个哪怕是细小的意见，他总是那样谦虚地和我讨论他所写的东西。

我对他也总是推诚相见，从不恭维奉承。当我要求他把某个句子或某段话重读一遍时，对他来说这便是一个信号，他必须把自己写的东西再仔细地通读一遍，他一定会停下来，再三琢磨，反复推敲。我想，也许是我没有留心听的缘故吧，但这样的解释完全是徒劳的。尤列克总是力争做到：不只是知识分子，而首先是普通群众要能够看得懂他的作品，因为，他首先就是为工人群众进行写作的。他力求用最明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决不滥用华丽词藻以致影响自己的真意，但同时他又十分注意语言的修饰。华而不实之词他是不屑一顾的。我也象没有任何文学野心的一个普通读者那样去发表自己的评论意见。

我们常常对他写的东西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我喜欢他的作品时，也对他如实相告。当他受到读者的称赞时，他是多么的高兴啊！此后他便倍加努力，争取把文章写得更加流畅，思想更加明确，更具有说服力。他不断地充实自己的语汇，从不吝惜时间去阅读用最纯粹的捷语写成的作品和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诗句。他能背诵许许多多的诗歌作品，比如：沃尔克尔、聂鲁达、内兹瓦尔、马哈、塞弗尔特、荷拉、迪克、什拉麦克、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维龙以及其他许多诗人的作品。他还会唱许多支歌，比如，他会唱“解放”戏院上演的耶热克、沃斯科维茨和维里赫等人的全

部作品，他会唱无数革命歌曲和民歌，会唱捷克民歌、斯洛伐克民歌、俄罗斯民歌、法国民歌，甚至还会唱一首吉尔吉斯民歌。他会唱风靡一时而后便销声匿迹的伤感歌曲和流行小调，也会唱集市上演唱的、很长很长的民间小调。他对兰克编著的《捷德词典》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当特拉夫尼切克编著的《捷语词典》在三十年代问世以后，它便成了尤列克须臾不可缺少的案头工具书之一。同样他悉心研究了切拉科夫斯基的作品《斯拉夫民族成语汇编》，他还阅读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他的丰富的词汇知识正是来源于这些作品和活的语言。

尤列克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工作啊！他多么喜欢《创造报》——他最喜爱的一份报纸——的编辑工作啊！在纳粹占领时期，他曾这样设想过：等我们获得解放以后，一定要用最漂亮的纸张来印刷《创造报》，它至少应有96页（六大印张），它将成为一种大型的、报道国内外政治文化大事的、图文并茂的报纸（插图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宣传教育手段）。尤列克编辑《创造报》时，每期出版前他总要先设计一个小版样——一份小型的《创造报》。他裁好八页纸，每页对开折好，再把它们叠起来订成有十六页的一个小本本（那时出版的《创造报》正好是十六页），然后把计划发表的各篇文章和插图的位置画在各页上，同时，对这份小《创造报》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样，他对即将出版的一期周报便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这个工作他有时要干上一个小时。当你们看见他在那里叠小纸片、勾划插图、报道文章和漫画的示意图时，

你们会认为他是在做游戏哩。是的，正是这样。他工作起来就象做游戏那样快活，因为他是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

尤列克撰写《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文是在霍季姆涅日村住宅的厨房里进行的，那里是唯一有火取暖的地方。写作时他背对炉膛坐着，两脚用棉被裹上，因为我们必须节约用煤。厨房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的挂钟有节奏地、滴滴嗒嗒地走着。每天他从上午九点起开始工作，工作时他不时地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猛地把烟雾从嘴里喷出来。他机械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因为他的思想已飞到了遥远的上一个世纪。有时他收住手中的笔凝神深思，此时，他甚至忘记了吸烟，双眼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枯树。

尤列克撰写《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文的直接原因是：第一，1940年是作家博热娜·聂姆措娃诞辰120周年；第二，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机关、学校和各服务性行业中的已婚妇女常常被无故开除，就连著名的女演员也不能幸免。对已婚妇女以及全体妇女所遭受的歧视和迫害，尤列克必须表明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

他常常一直写到下午一点，然后，我们吃午饭，饭后外出散步。当时正值隆冬天气，我们带上滑雪板，沿着道路或小山坡练习滑雪。我用的滑雪板较小，那原是尤列克的侄女的；尤列克用的滑雪板则比较大，那原是莉巴的。崎岖不平的道路已经上冻。由于我是平生第一次穿滑雪板，两只脚常常疼得利害，所以我常常远远地落在后面。尤列克不时地向

我转过身来，以悠扬的声调呼唤我的名字，或者问我：“怎么样，好滑吗？”我不好意思唉声叹气，只好回答说：“行”。他清楚地知道我不会滑，但是我们俩彼此都心照不宣。有时候我们也到附近的小山上去滑雪。我摔倒在雪地上的时间比滑行的时间还要多呢！后来，尤列克为我写了下面这首打油诗：

古丝塔和滑雪板之歌

小山脚下有间板房，
小山顶上堆满白雪。
雪地里蹒跚着古丝塔，
她呀她在那里学滑雪。

穿上滑雪板呀，
真是找罪受。
你想往左转呀，
它偏要向右！

不行不行可不行，
这样滑雪可不成！

两只脚呀要听话，
步调一致力量大。

要往前走齐向前，
切莫你上我偏下。

加劲滑呀不怕难，
恰似猛虎冲下山。
人人都把记录创，
古丝塔却摔断了滑雪板。

不行不行可不行，
这样滑雪可不成！

苦练再苦练，
苦练莫放松。
不怕苦和累，
日久自见功。

山下小板房里，
响起欢声笑语，
从佩克利克山顶，
古丝塔滑到了山底。

只要功夫深，
铁杵也能磨成针！

1939年冬，有一次，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一团团的雪花不停地飘落在房顶和树枝上。房上的雪越积越厚，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厚重的积雪压得树枝儿深深地低下了头。接着开始了寒风刺骨的天气。在积雪的重压下，树枝儿弯曲了、断裂了。从花园里，特别是从附近的树林里，不时传来树枝断裂时发出的劈啪声。大自然在呻吟。树木的哀叹传进了村庄，透过厚厚的墙壁传进了我们的卧室。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心疼。尤列克建议，为了保护树木，我们到花园里去把树杈上的积雪扫掉。在花园里，我们一棵树一棵树地清理着积雪。虽然我们减轻了它们的负担，但是许多树最后还是没有挽救过来，大部分都被冻死了。第二天，我们出发到林子里去。虽然我们避开了被埋在雪地里的田野小路，但我们还是常常深深地陷进积雪里，有些地方雪一直没到了我们的腰部。

松柏枝头积满了厚厚的雪。尤列克扶着一棵树，试着摇晃了一下。那棵树如同被一根羽毛轻轻地拨弄了一下一样纹丝不动。尤列克使出全身力气，用自己的身躯猛地往树干上撞去，尽管他被震得疼痛难忍，但那棵树还是毫无反应，只不过有几个雪疙瘩落到了地上。我们只好把能够到的树杈上的积雪打掉。我们把积雪打落以后，这些树枝顿时抬起了头，恢复了挺拔秀丽的姿态。我们虽然忙碌了几个小时，但是工作成效还是微乎其微。我们清除了几棵树上能够够到的积雪，然而周围其他几十棵树还是被积雪压折了。

我们常常在苍茫的暮色中又冷又饿地回到家里。白昼越

来越短，下午四时，便必须把我们忠实的伙伴——煤油灯点亮了。我们一回到家，尤列克便把炉子里的火生好。生火是他的工作，他常常开玩笑说他是“司炉长”。我们吃些点心，有时我还给他烧上点黑咖啡。这使他非常高兴。当时，咖啡只能在黑市用高价才能买到。我们还是在1939年夏天买到了两公斤生咖啡，只有必要时，我才炒上几粒煮来喝。

下午四时左右尤列克又开始写作，直到晚上七点。然后我们稍事休息，接着是听广播，首先是听苏联电台广播。我们能清晰地收听到莫斯科电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电台以及其他苏联电台。我们收听俄语和捷语节目。尤列克非常关心世界大事。我们的收音机是用蓄电池的。音响清晰，不怕干扰。它藏在我们储藏室中放小柜的壁龛里，在壁龛与沙发之间的墙上我们挂上了一张欧洲地图。

晚上是尤列克写作的最好时光。此刻万籁俱寂，家里人和全村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只有我们俩坐在厨房里的书桌旁，尤列克背着炉子，我坐在他的对面。他有腰疼的毛病，这样坐可以避免腰部受寒。炉子四周暖烘烘的，耶里克躺在尤列克的脚边睡着了。夜深人静之际，外面常常是狂风大作，飞砂走石，猛烈的暴风在房屋的四周发出凄厉的呼啸声。

尤列克写作时用的是八开办公用纸。他把每一张纸对折折好，再仔细地裁成两半。此外，在写作时尤列克还要准备一张较小的草稿纸，有时候他把某些不成熟的句子先写在草稿纸上进行研究，这样的句子他是从不直接写到稿纸上去

的。如果写作时没有抽烟，他便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托住下巴，把左胳膊肘儿支在膝盖上。

1940年11月的最后一天，尤列克终于写完了《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和句点。在11月31日的日历上，他写下了“《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文告成”几个字。他总共用了十九天的时间完成了这篇论著，剩下的工作便是把手稿用打字机誊写清楚。尤列克一直没有学会用打字机直接进行写作。据他说，打字机似乎是他进行构思和把思想写到纸上之间的某种障碍。因此，每篇文章他总是先用钢笔写出初稿，然后再用打字机打成清样。诚然，当他在编辑部工作时，也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必须赶写某条“编者按语”，这时，尤列克能够在印刷厂的排字机旁直接口授赶排。不过，他这样做只是一种例外。同样，如果他事先没有写好手稿便直接向打字员口授文章，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少见的。

《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文，大部分是他自己用打字机誊清的。我只是偶尔给他帮一下忙而已。我打字时由他口授。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每页文稿上四边留出的空白必须大小一样，以保证稿样格式的整齐美观，同时，这样才能使他对未来出版该书时心中有数。在誊写他的手稿时，如果我把一段的结尾放在下一页开头的第一行，那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样便会产生排字工人称之为留下“私生子”的毛病。如果他要在某一页上附加脚注，他就逐字逐句地进行计算，脚注的第一个词应该从哪一个位置开始，才能把整条注

释放在同一页上，而它后面的空白又不会过大。他这种近似迂腐的、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在印刷厂排印《创造报》、《红色晚报》、《红色权利报》以及从前的《树干》或《先锋队》等杂志时养成的。他熟悉每个印刷厂的所有字型，他能熟练地读出反写的铅字，他要查看排好的、只用绳子捆着的铅字版时，印刷工人们也非常放心。

《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文终于誊写完毕。现在该把它送到哪里去发表呢？1940年2月12日星期一，我们从霍季姆涅日村动身来到比尔森。我们出门的事是不能让耶里克知道的。但是当它发现我们不在家时，照样会大闹一场。

几个月来，爸爸一直卧病比尔森。一位医生经常来家为他看病打针。那位医生是个犹太人。当我们在比尔森老伏契克家里和他见面时，尤列克常向他讲述一些使他十分开心的、讽刺希特勒的政治笑话。

我们每周有一两次托人把鸡蛋和牛奶从霍季姆涅日村带到比尔森去。妈妈和莉巴则为我们在霍季姆涅日村的几只狗收集肉骨头。托内耶德利先生带到比尔森去的每个包裹里，尤列克都要附上一封信，把爸爸和妈妈留在村里的家务事幽默地描述一番，比如：狗呀、兔呀、母鸡呀、母山羊莉津卡等的近况如何等等。尤列克把爸爸称呼为“内曼尼采村的老爷”^⑧，这位“老爷”屁股坐在霍季姆涅日村（意指爸爸坐在祖布日纳河边钓鱼），而身子却躺在比尔森。尤列克把他自己和我称为“忠实的仆人约瑟费克和巴鲁什卡”。他希望这些幽默的话能给爸爸带来快乐和安慰，因为医生已经向妈

妈暗示说，爸爸的那条腿恐怕无法保全了，但是他不敢把这个不幸的情况告诉爸爸。

我们在比尔森只住了两天，2月14日晨便前往布拉格。尤列克带着《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的文稿，希望或许能找到一家愿意出版它的出版社。我们在布拉格寓所里还未坐定，尤列克便急着要出去联系。他收拾停当，便到斯米霍夫区去找昔日的好朋友、进步的出版商奥托·吉尔加尔，向他了解一下哪家出版社能够出版《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尤列克的话刚开了头，吉尔加尔便打断他的话说：“我来替你出版。”他的话是那样痛快、明确，使尤列克喜出望外，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吉尔加尔虽然是一位进步的出版工作者，但他不是共产党员。在纳粹占领时期，出版著名的共产党人的作品是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的。吉尔加尔说的是真心话吗？是的，他完全是真心诚意的。尤列克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对我说，他已经找到出版的地方了。

第二天，2月15日星期四的早晨，尤列克带着《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的打字稿来到斯米霍夫区。他亲自选定了字型和装璜设计。他在当天的日历上写了下列几个字：“《聂姆措娃》一文已交吉尔加尔。”他是多么幸福啊！

2月20日我们在布拉格完成了亚历山大·尼克利奇的著作《到处充满奇迹》的翻译工作（尤列克笑着说，作者的名字是一个绝妙的德文人名，译成捷文便是尼克利切克）并把译文交给了《行动》出版社。1940年秋该书出版，出版社用了K·斯特尔纳德这个化名作为译者的名字。

二月份在布拉格逗留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到艺术家俱乐部去，我们和作家雅罗斯拉夫·克拉托赫维尔常常在那里聚会，尤列克和他的关系非常好。

大约是在2月19日早上，尤列克从吉尔加尔那里收到了他的专题论著《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的校样，他立即进行了校对，同时加写了版权页：尤利乌斯·伏契克著：《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论著）。布拉格波乌尔印书公司印，出版者奥托·吉尔加尔，1940年2月于布拉格。”在校样上，尤列克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排字间主任先生，明晨八时左右，最晚不超过九时半，我将去您处。在我到达之前，请勿开始拼版，我有事与您商量。再见！伏契克。”尤列克当时要和主任先生商量什么事，今天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1940年2月21日，尤列克在台历上写道：“聂姆措娃一书停印，听候书报检查。”他以紧张的心情等待审查结果。在他的手稿和打字稿中都有这样的句子：“她（指女作家博热娜·聂姆措娃——译者）对海涅的一生十分了解。然而可惜的是，她并不了解海涅的朋友们！”这里，尤列克指的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纳粹占领时期，上述三个名字是禁止在书刊中出现的。如果必须出现的话，那么它们必须是贬义词才行。在后来印行出版的《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小册子里，这两句话被删去了。我知道，当时尤列克曾为此大伤脑筋。但是，这两句话最后是由他自己删去的，还是被书报检查员砍掉的，这一点我也记不起来

了。

1940年2月23日，正值尤列克37岁生日之际，他从吉尔加尔那里收到了出版小册子的预付稿酬500克朗。他在台历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吉尔加尔，预付稿酬500克朗。”

当时，我们从《行动》出版社又接受了翻译第二本书的任务，该书是恩斯特·桑哈贝尔的作品《南美洲史》。

2月25日我们离开布拉格回比尔森去。在比尔森尤列克的双亲那里稍事停留后，我们便回霍季姆涅日村了。到家后，我们立即着手新的翻译工作。但是，尤列克一刻也不能忘记在布拉格时的那些谈话，事实上他是非常希望能够留在那里，因为他的¹小册子《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三月初就要出版了。

3月6日，尤列克又到了布拉格。3月7日，《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书问世。这是一本只有64页、红皮黑字、装帧精美的小册子。选用红色书皮是尤列克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如他所说的那样，红色是红旗的颜色，是我们胜利的颜色。小册子的出版，特别是在暗无天日的时代里得以问世，使尤列克欣慰万分。3月8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古丝蒂娜，我是多么高兴啊！小册子竟有幸得见天日，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现把今天发表的第一篇书评寄给你，这是特雷格尔撰写的。他写文章的速度够惊人的，不是吗？……我握笔的手指快要发麻了。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围上来要我签名留念。这一点我简直不能相信。最使我感动的是维德拉老头。黄昏时分，当我来到俱乐部

时，他向我迎了过来，当着全俱乐部的人拥抱了我，还对我说：‘一年半以来，您的大作《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第一次在我心里重新燃起了争当自由人的火焰！论文学我一窍不通。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地谈一谈，对吧！？’”

特雷格尔在关于《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书的书评中写道：“出版家奥托·吉尔加尔出版了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内容深刻、见解精辟的论著《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伏契克的这一著作如此透彻地论证了聂姆措娃在社会活动方面的全部意义，如此完美地重现了她的光辉的形象，因此，它不愧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论说文之一。”

一个月后，尤列克又到了布拉格。他在4月6日或7日的来信中（该信未署日期）把其余的剪报和书评一齐寄给了我。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喏，吉尔加尔在信封里已准备好了两份剪报文章，现在我把它寄给你。其中的一篇是从《民族工作报》上剪下来的（作者为皮沙），另一篇是从《捷克语言报》上剪下来的（作者是沃达克）。当然，在评论蒂尔的问题上他（沃达克）是有错误的。正是在《伊日克奇遇记》中，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蒂尔的表现是相当反动的。但是，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权利或者其他权利，起码在纸面上应该如此。”

1940年4月6日，英德日赫·沃达克在谈到尤列克的小册子时，写道：“尤利乌斯·伏契克以巨大的、感人的激情再现了博热娜·聂姆措娃所处的整个时代和历史环境，描写了她周围的、与她来往密切的许多知名人物，使她置身于普

遍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广阔的背景上，同时也记述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常琐事。他善于处理自己的激情。诚然，如果说尤利乌斯·伏契克把玛格达莲娜·多布罗米拉·雷蒂戈娃和杨·普拉沃斯拉夫·科乌贝克以及他的毕德迈耶尔式的保守的诗歌加以比较的话，那么他是为了在说明聂姆措娃所经历的社会变革时有意指责蒂尔，因为他要从这个方面去阐明和解释她的小说创作活动，并且对她的所谓‘转变’给予更高的评价。然而在社会斗争方面，蒂尔在文艺上的实践要大胆得多和坚决得多，比如：他的作品《破产者》或者《伊日克奇遇记》中的第四场有关工厂的描写就是证明。”

我收集到了尤列克在赠送这本小册子时的一些题词。在第一批收到尤列克的小册子《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并有他的题词的人们中间，就有老瓦茨拉夫·维德拉。尤列克赠给他的书中题词是：“瓦茨拉夫·维德拉留念，尤利乌斯·伏契克敬赠，1940、3、7、”他在给曾经在《红色权利报》和《创造报》编辑部共事多年的忠实的老朋友拉季斯拉夫·什托尔同志的书中，留下了这样的题词：“送给曾不断逼我进行创作的好友拉札·什托尔，尤利乌斯·伏契克敬赠，40.3.7.”尤列克在“逼”字（poháněl）中的长元音á下面画了个着重符号，以示与“侮辱”（pohaněl）一词的区别。什托尔是深知尤列克天资过人因而不断鼓励他进行写作的朋友之一。他常常对尤列克这样说：“尤拉，你应该多写点东西！”或者，象尤列克所说的那样，他常常“逼”他写作。同一天，尤列克还把自己的小册子写上题词送给了

艺术家俱乐部秘书、曾在编辑部长期共事的卢博米尔·林哈尔特，题词是：“送给老朋友卢博米尔·林哈尔特，尤利乌斯·伏契克敬赠，1940.3.7.于布拉格。”尤列克还给好些人写了题词。在送给他的好友作家卡雷尔·康拉德的书（他是在俱乐部门口碰上康拉德的，当时他刚从出版商吉尔加尔那里带回第一批小册子，就立即取出一本来送给他）他这样写道：“送给卡雷尔·康拉德，供睡觉前消遣之用，而不是临别纪念！尤拉·伏契克赠。”在送给演员小瓦茨拉夫·维德拉的书，尤列克这样写道：“送给敬爱的伙伴瓦舍克·维德拉，因为我喜欢他。尤利乌斯·伏契克，1940.3.7.”

在送给作家雅罗斯拉夫·克拉托赫维尔的书上，尤列克的题词是：“赠给我所热爱的、珍贵的朋友雅罗斯拉夫·克拉托赫维尔，尤利乌斯·伏契克，40.3.9.”他在送给我的那本书中写道：“古丝蒂娜留念，尤拉。”在送给布拉格V·诺伊伯特书店和旧书门市部的青年店员的小册子中，尤列克的题词是这样的：“埃米尔·哈夫拉内克先生惠存”尤利乌斯·伏契克敬赠，1940.3.8.于布拉格。”在送给大妹妹莉巴的小册子中，尤列克写道：“送给容貌和心灵同样美丽的妹妹莉巴，尤拉，40.3.10.于比尔森。”在送给装裱工人希林格尔的书，尤列克写道：“赠给曾为我装订了许多漂亮书籍的希林格尔先生，尤利乌斯·伏契克，1940.3.10.于比尔森。”在送给铁路工人沃依切赫·季霍塔（他们全家是在1940年春迁入霍季姆涅日村的）的书，尤列克的题词是：“纳霍

希采村的邻居沃依捷赫·季霍塔先生惠存，尤利乌斯·伏契克敬赠，1940.4.15.于霍季姆涅日村。”

季霍塔一家是从离此不远的捷克村庄纳霍希采逃出来的难民，1938年秋慕尼黑事件以后，纳霍希采村便并入了第三帝国的版图。季霍塔在该村有一所三间一套的小农舍。他是如此地思念着它，犹如它是一座价值连城的宫殿。有时，在星期天，他们全家——季霍塔、他的妻子和两个男孩——穿过田野，登上纳霍希采村后面不太高的普兰特小山，从捷克边界这一侧无限深情地眺望田野那边的第三帝国。在那边，他们看到了季霍塔出生的、全家人居住过的老房子。在那个“小房子里”他们生下了两个孩子；而德国纳粹分子却把他们全家人从那里轰了出来。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所矮小农舍的方向，焦虑地谈论着房顶已需要翻修，否则恐怕要漏雨了。而现在住在里面的那个德国人肯定是不大会修理它的，因为他知道，这所房子本来就不是他的。这样下去，季霍塔全家将来只好回到不蔽风雨的破房子里去了。

每当季霍塔被乡愁折磨时，他便拿起尤列克的小册子，反复诵读上面的题词，这个题词给予他莫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在纳霍希采村的房子总有一天必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全家也一定能回到自己的故居中去。

在送给父母亲的书中，尤列克的题词是：“爸爸和妈妈惠存，作者赠。”（此书已经遗失。）

此外，尤列克还写过不少题词。他把《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一书的打字稿也写上题词送给了我，题词是这样

的：“赠给助手古丝蒂娜！”后来我在比尔森时请希林格尔把打字稿装订成册了。

三月份，尤列克到布拉格去。他随身带上了我们新翻译的恩·桑哈贝尔著的《南美洲史》的部分译稿，译文中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尤列克准备到布拉格查阅一下大词典和地图册，把那些不准确的地方改过来。3月8日他来信告诉我说：“今天，我：第一、跑遍了所有地方；第二、详详细细地进行了考证；第三、耐心地坐在图书馆里对译文进行修改。许多地方我必须加以改动并且重读一遍，为了能找到所有那些‘香料群岛’，因为那些被我们译得不够准确的岛屿其实就是一般地理书上所说的摩鹿加群岛。”

三月初，爸爸从比尔森回到霍季姆涅日村。他病得很厉害，但他死活就是不去医院。“去医院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他顽固地重复着这句话。尤列克对爸爸十分同情。在许多细小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他的孝心。他不时从布拉格给爸爸带包烟斗丝回来，当时这种烟丝很难弄到。自从爸爸开始爱看惊险小说或侦探奇案以后，尤列克每次去布拉格总要替他买上一两本，让他能借以调剂精神，忘却病痛。去年夏天，当我们初到霍季姆涅日村时，爸爸还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每天从清晨到下午，他或者上山去采蘑菇，或者抽着烟坐在祖布日纳河畔钓鱼。哪些地方可以钓鲤鱼，哪些地方可以钓鲈鱼或者鲫鱼，他都了如指掌。下午，有时候我们也到河边去看他钓鱼。尤列克在离爸爸不远的河岸旁坐下来，聆听着赤杨和垂柳的窃窃私语，观赏着小河水面轻轻泛起的阵

阵涟漪，有时候他又注视着辛勤的小蜜蜂，看着它从一朵花上飞落到另一朵花上，停下来，钻进花芯里去，在寻觅了一番之后，采集了一小滴花蜜飞走了，向祖布日纳河对岸飞去。突然，它掉进水里，无可奈何地挣扎着，再也飞不起来了，因为它那双湿漉漉的翅膀太重了，它必死无疑了。但是它没有死。尤列克迅速折来一根柳条，向水面探过身去，帮助那只小蜜蜂，让它爬到柳条叶上。它终于爬了上来，耷拉着翅膀呆在柳条上。等它的翅膀稍微晾干后，它便拍动着它们飞走了。我们都为它的安全脱险感到高兴。

第九节 旧书店里

1940年春，尤列克在布拉格逗留期间，有一次曾和我们的朋友拉季斯拉夫·什托尔^⑨谈到我们想给巴维尔·普罗科普出版社出版的《人民丛书》翻译出版卡雷尔·萨宾纳的著作《至十九世纪初捷克地区的剧院和戏剧》，尤列克还准备写一篇有关萨宾纳的专论文章，并为译文撰写详细的注释。

尤列克认为，萨宾纳以笔名莱奥·布拉斯和用德文写成的这本著作是非常重要的和不可多得的。他是1938年夏天在旧书商霍克尔那里发现这本书的。当时他负责《创造报》的编辑工作，我则在《红色权利报》编辑部任翻译。每个星期，当他完成了一期报纸的编辑任务后，便约我同去逛旧书店。下班后，我们——他搂着我的腰——一起穿过布拉格的大街

小巷，向旧书店走去。当集中营的血雨腥风从法西斯德国向我们的祖国袭来的时候，当我们国内的反动派向一切进步力量发起疯狂进攻的时候，民族复兴时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尤列克。他自己曾谈到了其中的原因。他写道：“如果要想找到与我们今天相类似的某个历史阶段，我们常常会回忆起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这个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当时，整个欧洲处于变动之中，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存在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公民，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希望和行动，尽管这个影响不如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存在给人们的影响那样直接和强烈。当然，历史决不会重演，只有落后于历史发展的人类表达方式有时会使我们回忆起这个相似之处。如果你能正确地和谨慎地去对待这种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你将能更容易地找到前进的方向。”（《创造报》，1937年）

从三十年代起，尤列克便经常阅读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卡雷尔·萨宾纳、卡雷尔·哈弗利切克·博罗夫斯基的某些作品。他经常研究民族复兴时期，好似当时他已经预见到必须从这里为我们民族未来的艰苦岁月找出经验教训和鼓舞力量。

每当尤列克完成了《创造报》下一期的编辑工作之后，我们便相约同去逛旧书店。离《创造报》编辑部最近的旧书店是位于希伯恩斯卡大街的诺伊伯特旧书门市部。书店老职员弗兰季谢克·扎伊切克在回忆中描述了该店当时的营业情况：

“我在诺伊伯特书店连续工作了四十六年，其中三十年是在布拉格希伯恩斯卡大街上的旧书门市部上班。任职期间，我结识了许多旧书和珍本收藏家。根据他们的爱好，这些藏书家又可以分成若干类。第一类喜欢收藏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捷克古籍；第二类爱好古老的木刻、版画；第三类又爱好收集原版本、手稿本、或者古旧的青年文学读物。根据藏书家们的个人癖好（某些癖好甚至达到了怪诞的地步），上述分类还可以增加许多倍！

人数最多的一类藏书家是由收集我国民族复兴时期作家的原版作品的藏书家构成。他们买起书来是从不吝惜自己口袋中的钱的。甚至还有这样的人，他们在购买某一种书时往往要买上三、四份，把其中最珍贵的版本留给自己，其余的用于交换。当然，只有家境富裕的藏书家才能这样做，只有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收集各种奇异的珍本。不过，这些书籍审美学家和嗜书成癖者对自己的珍本都缺乏内在的感情，他们藏书的唯一目的是把它们当作一种豪华的摆设，以便能向人炫耀一番。此外，还有一类藏书家，他们收集古籍则纯粹是为了囤积居奇。

尤利乌斯·伏契克对待民族复兴时期书籍的态度则与此迥然不同。原诺伊伯特书店的顾客们清楚地记得，旧书门市部设在宽敞的书店的右侧，它的书库构成了整个书店的‘国中之国’。尤利乌斯·伏契克首次来旧书门市部买书大约是在1936年。当时，他谈了自己的要求，选购了几本书。也许是他喜欢我们书店这个环境，或者他了解我们书店藏书丰

富、种类齐全，因此没过几天他又再度光顾。此后，他便成了我们的常客。我经常看到他笑容可掬地走进书店，然后向旧书门市部的柜台走去。他的到来意味着给死气沉沉、工作繁重的旧书店带来恬适和欢乐。此刻，一切工作都可以抛在一边，我们立即交谈起来。我们谈到图书杂志，也常常谈论民族复兴时期。顺便说一句，民族复兴时期也是我个人喜爱的一个专题。由于爱好相同，伏契克很快便成了我的‘熟人’，因此，他能优先于其他顾客得到我的某种‘照顾’。我经手的一切有价值的旧书都事先存进‘他的抽屉’，然后，或者等他亲自上门选购，或者我们打电话通知他。当书店弄到一批珍贵的书籍时，我们也预先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信’，让他能‘捷足先登’，任意挑选。伏契克从诺伊伯特旧书门市部购买了数量可观的旧书，我相信，他当编辑时的大部分收入都流进我们书店的钱柜中来了。由于事隔多年，而且数量很大，所以，我很难回想起他在我们这里购买的全部书籍。不过，我清楚记得，除了民族复兴时期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以外，伏契克最喜爱下列文学家的作品：博热娜·聂姆措娃、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卡雷尔·萨宾纳、奥古斯汀·斯麦塔纳和弗兰季舍克·马托乌什·克拉采尔的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伏契克从我们书店还买到了好几册奥古斯汀在利托米什尔出版的《博热娜·聂姆措娃选集》原版本，他还选购了瓦茨拉夫·肖尔茨^①的《报春花》和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在国外出版的某些作品。如果伏契克的藏书能保存至今，我定能将它们辨认出来。但是非常可惜，盖世

太保对待他的藏书比臭名远扬的科尼亚什^⑩还要野蛮得多。

伏契克特别用心收集切拉科夫斯基主编的《捷克蜜蜂》和蒂尔主编的《花朵》（合订本）。只要我们书店有货，他便一一购买。后来，他还购买了1848年革命时期的各种杂志。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在伏契克经常光顾我店旧书库的日子里，我曾弄到一本非常珍贵的书《捷克民族启蒙大师简介》。这本书的作者是维也纳政论家安托宁·里比奇卡，书中包括了我国民族复兴时期几乎全部名人的详细传记。‘这本书一定要留给伏契克编辑，’我对自己说道。后来，当他来店选购时，我便把那本书拿给他看。他把书买下了。没过几天，他亲自来店向我致谢。‘您知道，这本书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他对我说。‘我从书里发现了许多有益的、过去从未见过的东西。’这是1938年春天里发生的事。

《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出版后，伏契克给我带来了一本。在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里，他给我写下了一个幽默的题词：‘宫廷书库总监弗兰季舍克·扎伊切克先生留念，尤利乌斯·伏契克敬赠。1940.3.9.于布拉格’。我把这本书作为对亲爱者、朋友、藏书家的珍贵纪念一直保存至今。我总是在可能范围内尽力满足像尤利乌斯·伏契克那样的藏书家们的愿望和要求。但是有一件事——由于客观原因——我未能替他办到。有一次，伏契克需要弄到一本由卡雷尔·哈弗利切克·博罗夫斯基审编的杂志《捷克蜜蜂》1846年合订本，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在这一年的合订本里有

博热娜·聂姆措娃的《多马日利采地区的风光》和其它许多文章，以及哈弗利切克的《我的批评意见》一文）。虽然，过去在诺伊伯特旧书门市部常常可以见到这一杂志的各年合订本，但是这一年的合订本找来找去也无法找到。我未能及时地满足伏契克的这一要求，这使我非常难过。

后来，伏契克突然再也不来我们书店了，我们和他的联系就此中断。不久我们听说他已经被捕。他未能等到我向他报告‘那本杂志已经弄到’的一天，他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愿望我未能予以满足，今天回想起来仍深感不安。在伏契克就义前半年，德国法西斯也对诺伊伯特旧书店宣布了‘死刑’。由于书店对他们效忠不力，所以被迫关闭，彻底解散。伏契克曾在那里悉心选购旧书的那个书库，也被纳粹分子彻底捣毁，遭受了与这位可敬的顾客同样悲惨的命运。”

除了这家旧书店以外，我们也到离哲学院不远的、位于布拉格老城区卡普罗瓦街上的霍克尔书店去。有时，我们正好碰见在该店旧书门市部的地板上放着一大堆旧书。这是书店回收来的私人书籍。如同在诺伊伯特书店一样，霍克尔书店的工作人员也常常让尤列克优先选购。他能在书堆旁不知疲倦地蹲上好几个钟头。这是他在访问中亚细亚时练就的特殊本领。天冷时，他身穿大衣蹲在地上，为了不致挡住视线，他把头上戴着的礼帽或便帽远远地推到脑后。在诺伊伯特旧书门市部的地下书库里（年轻的店员哈符拉内克常常领我们到那里去），他也经常这样蹲在一堆堆的旧书旁边，或者在书店后面堆放着满是灰尘的旧书的书架上爬上爬下。

有一次，霍克尔从一个叫杨·马哈利茨基的人那里买进了一大批旧书，其中有许多是民族复兴时期的杂志和上个世纪我国作家作品的原本。在这批旧书里，尤列克找到了由第一位捷克新闻工作者瓦茨拉夫·马杰伊·克拉麦里乌斯^②编审和出版的《皇家爱国报》1793年合订本。尤列克非常推崇这位捷克记者，尽管他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在法兰西大革命问题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旧书店的藏书往往沾满灰尘，又黑又脏。尤列克老是把它们拿在手里翻来翻去，结果，弄得他活象个打扫烟囱的工人。但是，尤列克却毫不在乎。他把满是灰尘然而珍贵的旧书如同奇珍异宝一样带回家中。他没有力量把心爱的图书全部买来。有时，书价对他来说太昂贵了。那种书他买不起，只好到另一家旧书店去碰碰运气。他每次都挑选出一大批书，但是，每次买书的钱都不够用。不论是霍克尔书店老板还是诺伊伯特先生，他们常常把尤列克选好的书暂时存起来，然后让他随时付钱、随时取货。当时只要一领到工资，我们便马上到旧书店去。有时候，尤列克把所有的钱都付给了书店老板，结果，弄得我们连第二天的饭钱也没有了。这种情况已多次发生。有一次，偏巧给妈妈碰上了。她对我们说，这样过日子她可受不了！但是，我们却从一本好书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尤列克经常说，不管他的工资有多少，到了月底他总缺50克朗。朋友们问他为什么正好是50克朗？尤列克回答说：“50克朗是买书的最低价钱。因为我不停地买，所以我的钱老是不够用！”我们在布拉格的寓所靠墙的

书柜里全放满了书，存放被褥用的一只衣柜里也放满了书，在储藏室的橱架上、甚至在前厅的躺椅上，到处都是书。家里几乎再没有放书的地方了。但是只要尤列克身边有几个钱，他马上又要去逛书店。

在短促的一生中，尤列克共设置了五个藏书室，这里还不包括他带到每个秘密住所里去的几十本、上百本书。在我的记忆里，尤列克的形象总是和书联系在一起的。

第十节 卡雷尔·萨宾纳 著作的发现和译成捷文

春夏秋三季，只要天气晴朗，霍克尔旧书门市部入口处两边各放着一个长方形、带槽的书刊陈列架，架上陈列着从二十哈莱什^⑨到五克朗一本的廉价旧书。奥托世界书局出版的经典作品、廉价的长篇小说、缺边少角的侦探奇案，以及陈旧的自然科学读物错杂地放在一起。每当我们从这儿走过，尤列克总要在书刊陈列架旁停下来。虽然这里很少能找到他心爱的读物，但是，他还是要取下陈列着的一本本旧书，翻开书页，粗略地看上几眼，然后把它合上，放回原处。1938年夏天，他从这里的书刊陈列架上取下一本灰色软皮封面的德文书。他仔细地瞧了瞧它，又重新读了一遍标题，他愣住了，接着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这是他发现了某种不同凡响的东西的信号！他急忙把书打开，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翻到最后一页，接着又看了一下标题。

“这本书有意思吗？”我好奇地问了一句。“太好了！”他愉快地回答，然后咂了一下嘴巴。每当他在旧书店选中了某一本书时，我从不立即当场向他打听。因为我有这样的印象：如果书店老板发现我们对该书表现出特殊的兴趣，那么，在最后一刻钟他也要敲我们一下竹杠的！所以，我们总是从书店出来之后，才尽情地高兴一番。这一次，我们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沿着阶梯来到低于人行道的地下书店里。尤列克按照该书的标价付了五个克朗，然后我们转身来到街上。只有在此时此地，他才激动地向我透露了他的巨大发现：他只花了五个克朗买到的那本书是卡雷尔·萨宾纳的作品《至十九世纪初捷克地区的剧院和戏剧》。长期以来没有人知道：笔名为莱奥·布拉斯的该书作者到底是谁。在旧书店，这本书已是很难找到的珍本了。

自从我们买到萨宾纳的著作以来的日子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悲惨事件，这些事件深深地触动了尤列克，致使他暂时忘记了把萨宾纳的作品翻译成捷语的计划。1939年春，当我们动身来霍季姆涅日村时，我们把萨宾纳的这本书和其它一些书带到了这里。在霍季姆涅日村，这本书又搁置了一年。直到1940年春我们才开始它的翻译工作。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8年我们买到这本书时，尤列克当时想，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出来，交由《人民丛书》编辑部出版。《人民丛书》编辑部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的好朋友拉季斯拉夫·什托尔同志便在那里担任编辑工作。

1939年春，盖世太保逮捕了普罗科普同志。长期以来，《人民丛书》就是在普罗科普出版社出版的。普罗科普同志被捕以后，他的妻子和拉季斯拉夫·什托尔同志合作继续承担了《人民丛书》的出版工作。在纳粹占领时期，他们的工作是无比困难的，因为正如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一样，他们只出版进步书刊，但是，他们又必须想方设法躲过纳粹的书报检查，否则，翻译工作者的劳动将付诸东流，而且普罗科普出版社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也将成问题。《人民丛书》的最大功绩在于：在最困难的法西斯占领时期，它继续忠于自己的进步传统，出版了许多为普罗科普同志和翻译工作者本身赢得巨大荣誉的进步书籍。以笔名发表译著的翻译工作者们全都是捷共地下中央机构中的同志，他们靠这些翻译作品的稿费补贴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纳粹占领时期，在什托尔同志的倡议下，《人民丛书》曾出版了脍炙人口的狄德罗^④的作品《拉莫的侄子》。纳粹书报检查机构之所以准许该书出版，是因为它还收集了我们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布隆茨利克翻译的哥德的《前言》和埃克曼写的《和哥德的谈话纪要》，以及我们的另一位朋友杨·克雷奇翻译的莱辛的作品《汉堡剧评》节译本。此外，杨·克雷奇还审编了帕茨尔特的游记《南非十七年》的第二部分，并为它作序。什托尔还建议由他审编和出版切拉科夫斯基的作品选集《斯拉夫民族成语汇编》。后来，该作品选集也由《人民丛书》出版了。斯坦尼斯拉夫·布隆茨利克同志也为《人民丛书》出版社着手翻译司汤达^⑤的作品《吕西

安·娄凡》。可惜，他的这项工作成了未竟之业，1943年夏天，他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了。

在尤列克就翻译出版萨宾纳著作一事向什托尔提出后，我们一直等待着普罗科波娃同志的最后决定。我们左等右等，总是没有消息。尤列克以为，《人民丛书》编辑部对我们的萨宾纳一书不感兴趣。在他的头脑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计划：《行动》出版社可以出版一种纪念性的戏剧选集，萨宾纳的作品便可以包括进去。因此，当他在4月初到了布拉格后，便向《行动》出版社建议采纳他的计划。1940年4月6日，他从布拉格给我寄来一信，谈到了那次谈话的结果。尤列克在信中写道：“有关创办历史性戏剧期刊的事，目前尚无结果。今晚我准备再找‘中国人’（指《行动》出版社编委成员作家克拉托赫维尔和纳弗拉季尔博士）谈谈。塞德拉切克（《行动》出版社社长）只考虑到营利问题，出版这种刊物对他来说似乎有些得不偿失。”

那年春天，我们常常中断自己的工作到菜园中去收拾菜畦。傍晚，我们还和邻居季霍塔家的人（有时也和莉巴）一齐到林子里去拾柴。我们寻找被大风雪吹落的或折断的枯树（冬天，当大风雪过后，这种枯树比比皆是），我们用手锯把树干锯成若干段，把木头扛回家去。作为抵偿，此后我必须在林区小学校工作几天。

上山拾柴后的第二天，我们并不觉得全身酸痛，反而是身心愉快、精神饱满。早饭后我们开始劈柴。尤列克先把一根根的木头仔细量好，务必使他自己劈出来的木柴长短大小

几乎一样。然后，我们在杂物间下面把劈柴摞成一个大肚子的柴堆，如同我们在斯洛伐克见到的那样。柴堆越摞越高，宛如一座金色的宝塔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原希望到冬天至少再砍上两堆这么多的木柴。但是结果连一堆木柴也来不及准备了。其中原因后面还会谈到。

直到午饭后我们才能安静地坐下来工作。

在这个时期，尤列克收到了拉季斯拉夫·什托尔的来信。什托尔在信中说，他正在准备出版一套评论丛书，他问尤列克是否愿意参加这一工作。什托尔还建议，作为丛书的第一集可以先出版瓦格纳的《艺术与革命》一书，该书曾得到克拉拉·蔡特金^⑥的高度评价，同时，早在1938年，兹登涅克·内耶德利教授就曾向什托尔建议，应该把该书翻译过来。由于什托尔不能在信中谈论这些出版计划的背景和意义，因此尤列克并不了解，这套丛书首先是一套译丛，以便使转入地下的同志们能找到工作。所以，尤列克在回信中提出了首先出版沙尔达^⑦的作品。此外，什托尔已经听说尤列克曾向《行动》出版社建议出版萨宾纳的作品。什托尔在信中说，希望我们把萨宾纳的作品还是送给《人民丛书》编辑部出版。1940年4月25日，尤列克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拉扎^⑧，拖到现在才给你回信。两个星期以来，我完全中断了与外界的书信联系，因为这里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坚持翻译计划，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菜园子。在早春时节，它向人们的要求又是如此之多！其次是上山打柴，为了冬天有火取暖。总而言之，拉扎，

我们已成了彻头彻尾的乡下人了。此刻，我挥动大斧的本领必定比握笔写字要熟练多了。

不过，在编辑部工作了这些年以后，这样的生活不论在体力或脑力方面对我都大有好处。虽然不能说干累活、重活会有助于思考问题，但是，当你充分休息以后，你冥思苦想了一年的某些难题，却常常能在五分钟内变得明确起来，因为你绞尽脑汁的脑袋瓜子是无能力进行思考的。

现在还是少发议论、言归正传吧！夫罗麦克已经把你在信中提到的我们的出版计划告诉我了。出版评论丛书是一件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我个人当然乐于参加这项工作。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可以干些什么，这在目前也许不必着急。我估计，你们要等到秋天才能动手吧！？

关于计划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第一册还是出版捷克作家的作品为宜。先从沙尔达开始怎么样？或者先出版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天主教徒们’控制了他，并给他捏造了种种罪名。但是，他仍不失为捷克评论文的奠基人，他的优点跟我们是如此接近——或者谦虚一点说，我们跟他是如此接近——，因此总有一天我们必须把它们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加以发扬。我认为，评论丛刊规模不宜过大——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样，我们便可以从沙尔达的作品中挑选三、四篇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比如，《用〈为了明天而战斗〉那样的激情和灵感去开展批评活动》，其次是他的创作实践，如关于捷克近代文学的专论）。掌握着沙尔达的全部重要文献资料的沙尔达问题研究协会一定会同意我们这样做的。这个

研究协会——顺便说一句，我也是该协会会员——从组织上看是纯洁的，但是它毫无干劲。有时候它似乎也表现出某种劲头，然而，它很快又会变得软弱无力。

出版瓦格纳的作品《艺术与革命》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前言恐怕不行，但是，谈论费尔巴哈的优缺点那将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你不这么想吗？一方面，观点必须明确，而同时又必须采用外交词令——现在，我愈加相信，外交词令和观点的明确性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

现在谈谈萨宾纳作品的翻译问题。由于雅尔米拉久未来信，我以为她对此事不感兴趣，所以我已另有安排。具体说来，我将把它并入《捷克戏剧选》一书中，该书也许我将交由《行动》出版社出版了。不过，第一，这还只是‘也许’；第二，如果萨宾纳的作品将来能单独出版，我当然会十分高兴；这样的话我就不送交‘中国人’了，而是请雅尔米拉帮忙出版了。‘中国人’可能会很生气（因为，萨宾纳的著作是该戏剧选中最精彩的作品），但是，至今我和他们还没有最后签订合同。还是‘衬衣比外套更贴身’吧（我是把《人民丛书》编辑部视为更加贴身的‘衬衣’的）。请将此事转告雅尔米拉，我就不给她写信了。下月一日我们将到布拉格去，届时可以把一切都定下来。我想出版两卷集，因为我计划附上详尽的注释和序言。这样做是值得的，我深信，它将引起出版界的注意和读者的兴趣。不过，有一点我不清楚：雅尔米拉的出版经费是否充足？你知道，赊欠稿费将使我们

无法生活了。比如，《行动》出版社和我们是这样安排的：他们按我们交付的手稿的页数付给我们稿酬。在这方面，我们也许不必（恐怕也不可能）严格地照此办理，但是必须安排一个类似的办法，以便使我们能从替《行动》出版社翻译稿件的工作中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专门翻译萨宾纳的著作。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是我们仍未见到雅尔米拉的复信。现在，我们最好采用这种根本的解决办法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这一切，待我们到布拉格后再面谈决定吧……”

1940年5月24日，尤列克从霍季姆涅日村给雅尔米拉·普罗科波娃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雅尔米拉，我已函告拉扎，我保证把萨宾纳的作品译文交由你们出版。这一点我说到做到。根据以往的情况，我知道你们的条件，对此我也表示同意。使我高兴的是，你也赞成分期支付稿酬的办法。现在，没有稿费的贴补我们已无法生活了。交稿时间问题较大。正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们还接受了另一件工作，它计划在七月初便可完成。因此，我们能否从七月初开始把萨宾纳作品的译稿陆续寄给你？当然，首要的问题要看印刷厂（帕兰印刷厂吗？）是否来得及排印了。如果行，那么问题便好办了。我们再花上大概两周的时间便可以把目前手头的工作结束，然后全力投入萨宾纳著作的翻译，七月初你便能收到我们的部分译稿（约三分之一，即五——六印张）。然后我们把其余部分译出，七月底你便可以收到第二部分（也是三分之一）的译稿，

到八月上半月全书翻译完毕。我想，这样安排完全不会影响出版，或者最多只耽误几天。虽然，该书的部分章节我们已经粗略地译出来了，但是我们不想向你随便许愿，为了今后我们的计划能切实得到遵守。问题不只是要把书尽快翻译出来，而且要把它译好。翻译萨宾纳的著作理应这样。

因此，请你暂时先考虑一下日期安排问题。我大约于星期三到布拉格来，我会找拉扎和你的，届时我们再面谈决定吧！

谨致最衷心的问候！

古丝塔和尤拉。”

尤列克从《行动》出版社还接受了一项翻译任务，即：翻译H·内尔松教授的著作《睡眠的艺术》。后来，捷文译本是由我署名作为译者发表的，但是，该书大部分是由尤列克和弗里采克·赖青翻译的。如同在翻译尼克利奇的作品《到处充满奇迹》时有一处作了润色一样，在翻译内尔松的这部作品时，尤列克也采用了捷克诗人奥托卡尔·布热津纳、安托宁·索瓦、伊日·沃尔克尔、维捷斯拉夫·内兹瓦尔、杨·聂鲁达的诗去代替德国诗人的诗，例如，他采用了聂鲁达的《圣诞节摇篮曲》：

睡吧，圣婴，安睡吧！

在安睡中你将重新获得力量，

你还要走漫长的路——

人类得救的路，
渺无尽头的路。
睡吧，圣婴，安睡吧！

尤列克每次去布拉格，几乎都要和弗里采克·赖青会面。弗里采克告诉我们，他每星期都必须到盖世太保那里去。当尤列克问他“为什么”时，他回答说，他必须向盖世太保报告他的一切活动。他出狱后曾对我们说，他现在在建筑队工作。我们相信，他作为一个非雅利安人^⑨生活一定很苦。因此，我们把翻译恩斯特·桑哈贝尔和H·内尔松著作的工作分了一半给他。假如我们知道他为了求得盖世太保的释放曾付出了多么可耻的代价，我们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从前我们是多么相信他啊。我是在1929年认识他的，尤列克认识他也许还要早些。那年秋天，我们三人在莫斯特茨科矿工大罢工^⑩中相逢了。我是由红色工会派到那边去的，尤列克来自《红色权利报》，弗里采克则来自共青团。此后，尤列克便经常与他来往。

1940年的圣灵降临节^⑪（那年的圣灵降临节是在5月12日至13日），弗里采克突然到霍季姆涅日村来找我们。霍季姆涅日村这个住地我们从没让别人知道过，因此他的来访使我们大为惊讶。但是我们还是由衷地欢迎了他。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妈妈、莉巴和孩子们都到了。尤列克要到奥斯符拉青去买肉，弗里采克立刻也要到那边去。他们回来时早已过了十二点，大家都饿极了，但是锅里还是空空如

也，妈妈非常生气。下午，弗里采克走了。我们把他一直送到了火车站。

5月4日起爸爸住进了比尔森医院。长期以来他顽强地忍受着不可名状的痛苦，我们大家对他十分敬佩。五月底尤列克去布拉格时，顺路到比尔森医院去探望了爸爸。当时他看到爸爸情绪很好，他和几位患有同样疾病（糖尿病和坏疽病）的病友躺在一个病房里。其中一位病人有一条腿必须做截肢手术，但是爸爸坚信他的腿不会锯掉。他的主治大夫也很乐观，虽然乐观的程度比不上爸爸。那位大夫说，他相信爸爸的腿能够治好。尤列克打算到布拉格后就爸爸的病情请教一下我们的朋友米拉·内德维耶德博士同志。1940年5月28日，尤列克从布拉格给我的来信中谈到：

“我约好与普罗科波娃相见，但是她没有来。我并不感到奇怪，相反我倒十分高兴。她托人告诉我们，她恳请我们不要中断这项工作。古丝婷卡，那就干吧（指翻译卡雷尔·萨宾纳的作品）。

现在是晚上，我要去和内德维耶德博士会面了。今晚和他谈话时我的心情可以平静多了，因为比尔森医院的大夫对我说过，爸爸的情况大概会好起来。当然，现在也只能说‘大概’吧！

这里没有更多的新闻，有些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仅此而已。据说伊万（指塞加宁纳）病情严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天又出了太阳。与此地相比，我更喜欢留在家里。家

里的丁香花明天大概就要开了。替我闻一闻它们吧！但是，留点儿花香给我啊！现在，什克拉舍克正好进来找我，就此搁笔。他要我写点有关聂鲁达的文章，大概要出一本集子，又有事干了……”

五月底，尤列克心情沉重地从布拉格回到家里。他带来了确实的消息：两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们的朋友巴维尔·普罗科普^②同志和伊万·塞加宁纳同志已光荣牺牲——普罗科普同志被纳粹分子折磨致死，塞加宁纳同志则在集中营里被他们活活打死。

我们不能相信他们已不在人世，他们已不可能和我们一起进出党中央大楼（党报编辑部和伊万的律师事务所都设在党中央大楼里）。伊万的腿走起路来稍有点瘸，而尤列克则永远浑身是劲、健步如飞。他们俩常常是同进同出，一边走、一边聊得火热。无法忍受的悲痛折磨着我们的心。尤列克回忆起伊万，回忆起这位漂亮、健壮、充满朝气的男子，这位笑容可掬、笑起来是那样感人的人；尤列克回忆起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深厚的同志情谊：1925年他们首次合作出版了为工人和学生创办的杂志《先锋队》；1926年夏天他们同游法国，一起在杜瓦尔纳内兹访问了布列塔尼的渔民；他们还常常一起在麦特罗咖啡馆下棋和打弹子球，有时候他们又一道坐在布拉迪斯拉伐的酒店里同席共饮。尤列克回忆起曾为他主编的《创造报》撰写了许多有关文化问题专论文章的伊万，这个伊万非常喜欢唱歌，他会唱的摩拉维亚民歌和斯洛伐克民歌简直数不清。他们俩曾经就进步文艺问题进行过无

数次的讨论。他们俩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经历了1928年夏天破产了的“红色日子”^⑤，那时党内深刻的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在位于奴斯列区的伊万的寓所里，他们俩曾通宵达旦地进行了讨论。在党处于艰难的时刻，他们俩都坚决地、毫无保留地和她站在一起，为反对取消派而进行斗争。尤列克回忆起党和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伊万，在第一共和国时，他常常在资产阶级的法庭上为尤列克进行辩护；1933年，当伟大的革命家季米特洛夫站在莱比锡纳粹法庭上时，也是这个伊万，他自告奋勇充当了季米特洛夫的第一批辩护律师中的一个。现在纳粹分子向他进行了报复。正当他年富力强之际（他刚满四十岁），他们便把他杀害了。

然而，巴维尔·普罗科普同志罹难时却年仅三十六岁！1940年5月，他妻子收到了法西斯匪徒们寄来的一份电报，电文说：“你丈夫死于心脏病发作”。当时，他们还向死者家属通报一声。但是一年以后，那些法西斯杀人犯便开始随心所欲地杀害捷克爱国志士而不再寄送死亡通知书了。

伊万·塞加宁纳和巴维尔·普罗科普同志是我们所知道的惨遭杀害的亲密战友中的头两位同志。

尤列克并没有把噩耗告诉妈妈。他不愿让为他本人操够了心的妈妈又增添忧虑和不安。只要尤列克留在霍季姆涅日村，她还是感到放心的。她似乎认为，尤列克呆在家里会很安全。然而，在尤列克面前她又从不提及此事，因为她知道，仅仅让他在某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尤列克的为人她是再清楚不过了。

尤列克时刻思念着死难的同志们。这也是他从萨宾纳事件中选择了“叛变问题”作为专论选题的一个原因。后来，他把写成的文章附在我们翻译出版的萨宾纳著作《至十九世纪初捷克地区的剧院和戏剧》一书中。

第十一节 盖世太保跟踪

1940年6月7日，星期五，早晨，晴。我们在农村已度过了整整一个年头。这天，在霍季姆涅日村的家里只有我们两人。爸爸因病住院，妈妈和薇拉要到星期六才到这里来度周末。

蔚蓝的天幕上，飘动着几朵白云。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田野上，一只云雀在凌空飞翔，它那婉转动人的歌声从敞开的大门传进我们正在工作的客厅。楼前一行行的田垄上，黄色、紫色、兰白色的三色堇盛开着。在它们的叶子上，露水珠儿闪耀着五色缤纷的光芒。田垄四周的草根上也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宛如一粒粒的珍珠撒满草地。沿着篱笆，一簇簇的丁香花倾吐着芳香。闪电般掠过的燕子在捕食苍蝇，有的飞落在门铃线上呢呢喃喃地叫着。近处农舍的烟囱上，袅袅炊烟直上云霄——它预示着好天气的来临。

突然，维克多在院子里叫了起来。接着，布兰卡也跟着汪汪直叫。趴在客厅里的耶里克听到了它们的吠声，也立即叫了一阵。尤列克和善地对它说：“你什么都还不知道，胡叫些什么呢？”几秒钟后，我们听到了厨房的开门声和急促

的脚步声，接着，客厅的门猛地被推开了。门口出现了米雷克——薇拉的未婚夫，他脸色异乎寻常的严肃，眼里露出惶恐不安的神情。今天不是节假日，他不去上班，却突然到霍季姆涅日村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爸爸出事了吗？”尤列克惊奇地问道。

米雷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盖世太保到比尔森抓你去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他们会来抓你的！”

我的心咚咚咚地直跳。我们三人来到厨房，以防外人听见我们在客厅里的谈话声。

“怎么回事？”尤列克问。“今天早上，盖世太保到了你们家，要抓你。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米雷克焦急地重复着。“他们几点钟到我们家去的？”尤列克问。“大约在凌晨五点。”米雷克回答。尤列克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时针正指着差几分就到十点。“这样看来，盖世太保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否则，他们早就到这里来抓我了，”他一边说、一边思量着。“离最近的一趟火车还有两个小时。米雷克，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薇拉叫我来的，”米雷克回答说。“她先到了我的宿舍，但我已经上班去了。她便托房东太太的儿子叫我到车站去。在车站，她要我到这里来找你，让你有个准备。幸好我很快便赶上了火车。为了不惹人注意，说我在上班时还到你们这儿来，我是从菜园那边跳篱笆、穿过院子进来的。”

“这样一来，你不是格外惹人注意了吗？”尤列克象平日那样风趣地说。

米雷克的到来，薇拉把事儿办得如此妥贴，这一切使尤列克感到高兴。但是，他每次在比尔森爸爸家都只作短暂的停留，盖世太保为什么会到那里去抓他呢？

米雷克紧张、不安地坐着，我心里也十分着急，生怕盖世太保闯到霍季姆涅日村来把尤列克抓走。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他正在准备出门用的衣物。他装作只到比尔森去，而不是要去布拉格。天晓得他还要去哪些地方？在那里他又要呆上多久？他带了一套灰色衣服和一件深蓝色的风雨衣，他把便帽塞在口袋里，还把萨宾纳著作的部分译稿放入手提包中。我们商定了今后的联络办法。往布拉格寓所写信是危险的。尤列克对我说：“最好把给我的信寄到斯米霍夫吉尔加尔那里，我给你的信则用假名吉尔加尔或弗兰塔寄。如果盖世太保没来抓我，你来信的开头一句就用‘萨宾纳的作品尚未译出。’如果他们来过了，你就写上‘萨宾纳作品已于某月某日译好。’一到布拉格，我便用假名弗兰塔给你来一个电报。”

我们三人一齐出了大门，穿过楼前的小花园和铁门，沿铁路线朝开往奥斯符拉青方向的火车站走去。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翻滚：尤列克要离家多久？他要到哪里去？他将如何生活和工作？我们又何时、何处才能重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都深深地埋在心底，因为他也无法给我回答。难道我还要用这样的问题去增加他的不安吗？

我们在车站道了别，如同他只到比尔森去一样。我坚信

一切会平安无事。他可千万不能发生意外啊！

在回家的路上痛苦和悲伤折磨着我。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尤列克没有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之中。他也一定会平安地抵达布拉格。

第二天，邮差送来了一份电报，收报人的名字是玛丽亚·伏契科娃，即：电报是寄给妈妈的。电文写道：“祝万事如意！弗兰塔。”虽然，那天是“玛丽亚”的命名日，但是，妈妈从来没有庆祝这一节日的习惯。我马上意识到，这个电报是尤列克寄来的。他发报的地点和时间是：“布拉格，6月7日19时38分。”

我高兴极了！我好像看到：骄阳横空，雨过天晴，人们的脸上都浮现出幸福的微笑，世界变得那么美好！更使我高兴的是，没有一个人到霍季姆涅日村来找尤列克，也没有一个人打听他。我在书桌旁坐了下来，以轻松愉快的心情给吉尔加尔（尤列克）写信，信的开头一句是：“萨宾纳著作尚未译出。”然后，我从菜园子里摘来了几朵小花，把它们装在信封里，以表示我从多马日利采给他捎去的问候。这封信是我亲手从奥斯特拉瓦的邮局寄出的。

下午，妈妈从比尔森来到了霍季姆涅日村。她十分焦急，心里老惦念着尤列克。我给她看了电报，她才放心。她向我谈了在比尔森发生的事情：清晨五时左右，有人按响了门铃，紧接着便是猛烈的敲门声。妈妈和薇拉从梦中惊醒。她们翻身下床，披上睡衣，急忙跑去开门。她们以为是发生了火灾。门开了，门口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男人恶狠狠地用

德语说：“我们是盖世太保！”接着便冲着妈妈吼道：“您的儿子在哪里？”另一个男人把话翻译成捷文。妈妈的心里虽然极度紧张和害怕，但是她以平静的声调回答说：“不知道。”盖世太保旁若无人地把整个房子搜查了一遍。他们把卧室里的床板和被褥翻了个底朝天；把起居室内的书报字画弄得狼藉满地；在厨房里，他们还检查了所有的抽屉，好像尤列克变成了一根大头针藏在里面似的。薇拉和妈妈要穿上衣服，他们也不允许。两个家伙——一个讲德语，一个说捷语——连连大声吼叫：“您的儿子在哪里？”妈妈回答还是那几句话：“我不知道。他离开家已经很久了。他很少到我们这儿来。最近的一次还是在1938年的圣诞节哩！”那个盖世太保问妈妈：“您丈夫那儿去了？”她回答说：“他住院去了。”另一个家伙转身冲着薇拉，冷言冷语地问道：“您的父亲要是死了，您怎样通知您哥哥呢？”薇拉机敏地指着收音机说：“我们可以通过无线电通知他。”她装得那么一本正经，致使他们根本没有看出来，她是在骗他们呢。

盖世太保走了。妈妈和薇拉惊魂未定，但她们清醒地估计到，现在盖世太保一定会到苏多瓦街去找莉巴。但愿她没有忘记尤列克和我们约定的谈话“口径”，她也必须说：最后一次见到尤列克是在1938年的圣诞节。薇拉急忙穿上风雨衣，准备跑步到莉巴家去。她刚走出大门便看见一辆汽车从大门旁驶过，在大街的拐角处消失了。薇拉暗自想道，汽车里一定是盖世太保。就在那大街的拐角上，她迅速躲进了一家面包店。透过面包店的玻璃橱窗，她小心翼翼地向上察

看了一番。也许他们已经把她“盯上”了！就在此刻，她看见刚才的那辆汽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车内有人向这家面包店鬼头鬼脑地打量着。她找机会跑了出去，侧身钻进隔壁的一家食品店里。但是，几个盖世太保也已经走出汽车，向她追了上去。他们认为，她是出来给“同伙”打电话通风报信的。盖世太保们冲进食品店，向着店老板大吼一声：“这个女人在这儿干什么？”店老板只是耸了一下肩膀，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薇拉还没有走到柜台跟前，这几个盖世太保便已经跟进来了。“您撒谎！”他们向店老板怒气冲冲地嚷道。接着，一个盖世太保转向薇拉大声喝问道：“你是来打电话，对吗！？”“不，我是来买胡萝卜的！”她回答说。话音未落，她便想起了：她的口袋里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凶残的盖世太保把整个食品店翻了个遍，他们要找到电话，但是，店老板却连一台电话也没有！

当薇拉回到家后，妈妈大惊失色地说：“糟了，他们一定会去找莉巴。天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到霍季姆涅日村去给尤列克通个信！”不久，薇拉又从家里出来，找她的未婚夫去了。此刻，盖世太保已经到了莉巴家里。她也没有向他们泄露任何消息。在审问时，她的回答也和妈妈没有两样。薇拉赶到未婚夫的宿舍时，他已经上班去了。房东太太的儿子主动跑到工厂，把薇拉的口信告诉了她的未婚夫。以后的一切，我们已经知道了。

妈妈和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尤列克的最新消息。收到电报后第三天，我们又接到了他的来信，署名是：吉尔加尔。

尤列克在信中说，他已“知悉一切”；他很高兴，我“仍在继续翻译萨宾纳的作品”；他期望我们的合作“完全成功”。但是，他说，他现在不急于要我“把书译出来”。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盖世太保没有到霍季姆涅日村来抓他，这使他十分高兴。全信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布拉格平安无事！

我按吉尔加尔的地址给尤列克写了回信，开头第一句话还是“萨宾纳的作品尚未译出。”这使他十分放心，所以在6月15日给我的来信中签署了他自己的真实名字！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亲爱的，昨天，我是如此强烈地思念起你，以至我几乎立即要动身到火车站去。今天，这种思念依然没有离去。而你关于小鸡的动人描述又使它有增无已。如果说，丢下分内的工作不管那是不明智的，那么，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生活的那个村庄，你经管的那些事务，现在在我的心目中都变得那样高大和绚丽多彩。它们已完全占据了我的心。只要我的心没有回到它们身边，它将永远无法从思念中解脱出来。

因此，我在这里只有努力工作，拚命工作，以期能驱散我无法与之抗争的乡愁于万一。至于我干了哪些事，首先，我经常去图书馆，而且找到了不少东西；其次，我已为老板写完了三篇较有分量的广告文章（头两篇各得稿费100克朗，第三篇得稿费50克朗），现在还在写另外两篇。这也不坏，因为这些稿费足以支付我的全部生活费用。此外，我还为《世界之窗》杂志写了一篇专稿——昨天已发表，随信寄去

(专稿标题是：《〈世界之窗〉几岁了？》，发表于1940年6月14日第24期——作者)。那篇专稿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促使他们就撰写那些历史文章作出决定。果然它起了作用，今天我已和他们商议停当，甚至我向他们建议的对我来说最为合适的那种编写形式他们也十分满意：版面的一半用于写历史，另一半是引文和插图。全文将从9月起到12月止，共分16—17期连载完毕。稿酬共约1500克朗，不过我还没有同意，我觉得太少了。当然，从物质报酬的角度来看，这个数目也算得上相当优厚了，因为我个人的学习费用已不成问题。不过，这跟他们毫不相干，还是让他们多出点钱吧……

此外，我还商定不定期地为《世界之窗》杂志撰写专稿，目前他们把它刊登在第一版上（我写的那篇关于《世界之窗》历史的专稿算作第一篇。

以上就是我一周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喏，你看我没有偷懒吧，你说呢？

《行动》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厚书《永恒的马哈》。外表看还不坏，现在我十分想了解一下它的内容。维利麦克书店出版了阿尔贝斯的三篇《传奇》，书中附有弗兰塔·季希创作的插图，那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该书经卡拉塞克改写后更为通俗易懂，而且，季希还画了插图——喏，夫人，此书可不能不读啊！的确那是一本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好书……”

后来，尤列克还给我买了一本带回霍季姆涅日村来。这本书一直保存至今。

称我为“夫人”是有来历的。有一次，我们在成衣店买

衣服，一个正在接待一位女顾客的男店员每说完两个字后便说一声“喏，夫人”。尤列克听了觉得很可笑，因此后来不时开玩笑地称我为“夫人”。

我深信，既然他写信的情绪如此之好，我们不久一定能见到他回家了，因此，我便没有给他写回信。但是他还是没有回来。6月19日他寄来一信，收信人是季霍塔，寄信人是弗兰塔，信中称我为“亲爱的（男）朋友”。他这样做是出于下列原因：他一点也不知道霍季姆涅日村最近的情况，他必须提防信件落到敌人手中。他在信中要我给“安琪儿拍个电报”（“安琪儿”即吉尔加尔的住址斯米霍夫区安琪儿胡同——作者），告诉他“书刊是否出售”（意即尤列克能否回霍季姆涅日村来）。

见信后，我立即从奥斯符拉青给吉尔加尔拍了一个电报，电文是：“书刊出售”。就在我给尤列克拍电报的时候，他也正在布拉格给我写信，信上说他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消息。

全部情况得到澄清以后，尤列克回家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不过，大概是在6月22日至28日这个星期内，因为妈妈已经在霍季姆涅日村，而莉巴和上学的孩子们却还没有来。妈妈和我整天以万分紧张和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尤列克，尤其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家的确切时间。我们两个人中谁更希望能立即见到他呢，是妈妈呢还是我？对妈妈来说，尤列克是所有孩子中她最疼爱的一个；对我来说，他又是最亲爱的人！我们俩都热烈地、深

切地爱着他。他也以热诚的赤子之心去孝敬妈妈。她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妇女得到他的尊敬，他对她的深厚感情表现在他是绝对地信任她。从童年起，他就从不在妈妈面前隐瞒任何事情。但是，那些恼人的不愉快的事儿是不能告诉爸爸的，因为他要是知道了准保会大发脾气、痛骂一顿。比如，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尤列克还在理科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同学用猎枪误伤了他。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圣诞节前夕。尤列克刚巧穿着一件用军大衣改成的新上装，爸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那么一件军大衣。同学们把受伤的尤列克抬到医生那里。医生检查了他背部的伤势以后宣称，他必须到警察局去报案。尤列克和他的同学维纳·索乌库普、科斯佳·乌尔姆都央求医生千万别报告警察局，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将面临被开除学籍的危险。尤列克经包扎后，便被朋友们送回家了。

尤列克心事重重，他担心的倒不是疼痛的伤口，而是新上装背上的那个弹孔。父亲如果知道了，免不了又会大骂一通。幸好只妈妈一人在家。尤列克回到家里，也没向妈妈问好，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妈，我被人枪毙了！”妈妈大吃一惊，但旋即又镇静下来。“被人枪毙了”——这是怎么回事？不错，他脸色苍白，但是，如果他已经被枪毙了，怎么还能站在面前说话呢？上帝保佑，他还活着！接着尤列克便把发生的意外告诉了妈妈。他把被射穿了的上装和自己背上包着的伤口给妈妈看过以后，便恳求她千万别告诉爸爸，而且也不要让科斯佳的父母知道，因为这是科斯佳无意中闯下

的大祸。妈妈同意了儿子的请求，并对自己的诺言信守不渝。要知道，**尤列克**是他心爱的儿子啊！

两天后，圣诞夜到了。晚饭时，尤列克微弯着腰坐在饭桌旁边，因为他背上的伤口还隐隐作痛。爸爸向他瞟了一眼，接着在他背上拍了一下，意思是让他挺起胸来。不料爸爸的手掌正好打在伤口上，尤列克“唉哟”一声就瘫倒在桌子底下。妈妈责备爸爸，说他干么打打闹闹的，明知……但是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诺言，就把话咽回去了，这样才算平安无事。只有爸爸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轻轻一拍，这孩子就受不了了呢！

妈妈仔细地把上装背上的弹孔补好，尤列克背上的枪伤也慢慢痊愈了。只是在他的肩胛骨中间，靠近脊椎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纽扣般大小的伤疤。过了二十年（到了193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尤列克在霍季姆涅日村光着膀子晒太阳——爸爸才发现了这个“秘密”。爸爸看了看他背上的伤疤，问他是怎么回事。这时，尤列克才叙述了事情的本末。爸爸自己也十分纳闷，这一切他当时竟会毫无觉察，再说，尤列克穿的那件上装不是打了补丁了吗？尤列克对他解释说：“那时每逢在家碰到您，我总是面对着您，让您看不见我背上的补丁，或者我索性把上衣脱掉。”

尤列克尊敬妈妈还表现在：不论是吃午饭还是晚饭，只要妈妈还未就坐，他决不动手吃东西。他给家里写的信，开头总是先写妈妈而后爸爸。他非常喜欢听妈妈讲故事，妈妈讲起故事来是多么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啊！尤列克还非常佩

服妈妈的烹调技术。“妈妈煮的豆荚，谁也做不出来！”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这样说。他也没有忘记，妈妈在霍季姆涅日村时，只要有一点儿闲空，便来修路。她常常弯着腰，飞快地用小锄平整路面，同时把冒出来的杂草一一拔掉。尤列克还专门为她买了一把特制的钐子，钐齿的间距可以调整，用来钐粗细不等的砂粒。经它钐过以后，小路上寸草不留，同时妈妈也不用再弓着背干活了。尤列克还从苏联给妈妈带来了穿着梁赞地方民族服装的洋娃娃、描着画的漆盒和绣花台布，他还给妈妈买来了一套专门喝土耳其咖啡的用具，妈妈说（当然不是在尤列克面前），她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用这套咖啡用具，因为她和爸爸都不喝黑咖啡。但是她感到高兴的是尤列克心里老是想着妈妈。尤列克从布列塔尼给她带回来一个花瓷盘和一个磨光玻璃制成的托盘。妈妈把所有他赠送的礼物都保存在房间里的玻璃柜内，放在杯盘与塑像等小纪念品之间最显眼的地方。每次从柜前走过时，她总要停下来喜滋滋地欣赏一下里面的东西，首先是因为那里放着尤列切克赠送的礼品。就连吃饭时她也是常常给尤列克专门加一些好菜，但是尤列克却不同意这样做。当妈妈把较大块的肉放进他的盘子时，他总是把肉一分为二，让我和他分享，虽然我总是绝拒接受那半块肉，因为我个子比他小，饭量自然也不如他大。

第十二节 最后一次回到霍季姆涅日村

妈妈和我都热切地盼望着尤列克回来。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分，耶里克忽然在楼前小花园里汪汪地吼叫着向铁门扑去。不一会儿，它又大步跑了回来，发出欢快的叫声，好象在说：它心爱的主人回来了！接着，耶里克又转身跑到铁门旁边。大门口正站着铁路工人季霍塔和尤列克。尤列克向耶里克弯下身去，它立即舔了一下他的脸，表示向主人的问候。我们的高兴劲儿就更无法形容了。“妈妈！古丝蒂娜！”

“尤列切克！”妈妈愉快地喊着他的名字。“我的尤列克！”我向他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三人一同来到楼上的厨房里。妈妈立即生起火来，她要给尤列克先弄点吃的。虽然，她一时还不知道做什么饭才最好，但是，首先得把炉子生起来才行。尤列克脱下风雨衣，放下手里的提包，然后一一打量着厨房里的陈设。他要好好地看一看，在他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厨房里的东西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们好吗？”他这样问道。他搓了搓手，愉快地拍了一下巴掌。他先拥抱了一下妈妈，接着拥抱了我，搂着我在厨房里转起圈来。

尤列克回到了霍季姆涅日村！

他向我们谈起了离家后三个星期的生活情况：

起先他住在契霍娃太太家里（在布拉格近郊佩特罗维采

的霍斯季瓦日），她是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的母亲。我们和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是在艺术家俱乐部认识的，她是作家阿洛伊斯·伊拉塞克的儿媳妇。尤列克在契霍娃太太家住了两个星期，第三周他是在比尔森的中学同学德拉贝克同志家里度过的，德拉贝克同志住在布拉格的庞克拉茨。

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向母亲介绍尤列克时说他是沃伊捷赫·弗兰塔先生。两周内的大部分时间，尤列克只是在晚上到佩特罗维采去过夜，白天他便到布拉格的博物院的图书馆去研究萨宾纳的资料，或者到艺术家俱乐部去写作。

尤列克回到霍季姆涅日村后，立即开始校阅我翻译的萨宾纳著作的译稿，因为七月初我们必须把部分译稿送到《人民丛书》出版社去。

1940年7月1日，尤列克给《人民丛书》出版社负责人普罗科波娃同志写了一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夫人！

因为七月份——即‘七月初’的广义概念——刚刚开始（我们应该在这个时期把萨宾纳作品译稿的三分之一交给您），我现在通知您，我的夫人和合作者将于本月九日星期二前往布拉格，她将随身带去我们答应过的三分之一（准确地说：七印张）译稿。第二批三分之一译稿将继续抓紧译出，交稿日期不变。您能否在上述日期接待她，请您简单地通知一声。我们夏天的通讯地址为奥斯符拉青邮局，霍季姆涅日村，沃伊捷赫·季霍塔收。此致敬礼！沃·季霍塔。”

尤列克全信的措词十分谨慎，他对普罗科波娃同志以“您”相称，他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名，而是借用了我们的朋友沃依捷赫·季霍塔的名字——尤列克这样做是得到他完全同意的。

为了给两只山羊和几只兔子准备过冬饲料，邻居帮助我们祖布日纳河边一块草地上的青草割了下来，祖布日纳河是爸爸在村公所那里租用的。妈妈、带着孩子们来此度假的莉巴和我常常到河边草地上去翻晒草料。尤列克则留在家里，为了尽量不被村里的人看见。自从盖世太保在比尔森的家里进行了搜查以后，尤列克已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十分安全了。然而这一点他可没有告诉妈妈。妈妈却相信盖世太保不会知道霍季姆涅日村的情况；她认为尤列克不跟我们到草场去是因为他工作太多无法分身。只要满载干草的大车回到院子里的草料棚中时他出来帮个忙，把车上的干草用杈子挑下来，放到草料棚里堆好也就够了。

尤列克在布拉格作必要停留时，总是要利用这种机会到博物院附属图书馆去查考资料，这些资料在别的地方几乎是无法找到的，而对于给萨宾纳的著作作注释又是必不可少的。尤列克回到霍季姆涅日村后便从事这种注释工作了。在谈到注释时，他这样写道：

“今天，萨宾纳关于捷克地区戏剧的论著不只是一种文学文献，而且是认识早期捷克戏剧的活教材。因此，它必将受到大多数读者的欢迎。当然，象每一部具有纲领性的、在自己的领域内几乎是前无古人开拓道路的著作一样，萨宾纳的

这一著作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在经过了六十多年争论后的今天已经得到了纠正和消灭。如果对他文章中的缺点和错误直接地、逐字逐句地加以改正，那么我们出版的将不是萨宾纳的原著，而只是它的修订本了。因此，我在这里附上一份较为详尽的注释，其主要内容除最必要的说明以外，正是对他作品的修正意见和补充。”

在舒马瓦山区这个僻静的小村子里，尤列克工作得非常顺利。有时候，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他有一种预感，这样舒心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他的话勾起了我心底的悲哀，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他：“别吓唬人！”每当门铃响起，我的心就吓得怦怦直跳。但是，在任何人面前我都只字不提这件事。

白天，妈妈或者莉巴不时地把一些草莓、生苜蓝、胡萝卜或樱桃送进客厅里来，她们一声不响，只用慈爱的目光看看我们。妈妈常常在厨房里这样说：“我们不能去打扰孩子们，他们在工作呢！”

1940年7月11日晨，我动身去布拉格。尤列克留在霍季姆涅日村，他全力以赴地工作着，如同预感到危险正在逼近一样。我需要到博物院附属图书馆去查找被萨宾纳译成德文的某些捷克诗歌的名称，其次还要顺便了解一下我们在布拉格的寓所是否平安无事。

这天，尤列克给普罗科波娃同志寄去了一部分我们的译稿，并附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夫人！按照合同，我现在把萨宾纳关于捷克戏

剧一书的译稿第一批三分之一（略多一些，根据我个人的计划已超过七印张）给您寄去。由于我不能把译稿当面奉上，故随件寄上这封长信。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

1、新书将包括各自独立的三个部分：a、前言部分（有关萨宾纳的评论文章）；b、萨宾纳用布拉斯这个假名发表的论早期捷克戏剧一书的译文部分；c、萨宾纳关于捷克戏剧的其它文章和报告。上述三个部分各立标题，自成一章。

2、注释部分（随函寄上它的开头部分）将附于书后，因为它是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正文各页上不加注释，相反，在注释部分将标明相应的正文页码。这样可以使读者避免因忙于查阅注释而影响阅读，同时如果他们愿意作进一步研究的话，又有注释可供参考。

3、我建议，在用布拉斯笔名发表的原著前面，加制用灰色纸张印就的原封面铅版插页。这样，看起来象原版本一样，而且，我想花钱虽然不多，但装璜却很美观大方。

4、是否可以在扉页上附加一幅萨宾纳的肖像？

5、用布拉斯笔名发表的原著共有三章。我们现在寄上的头两章在原书中共有69页，最后一章——最长的，也是最有趣的——在原书中是从第70页起到第124页止，这一主要部分将占我们全书的11印张左右。

6、译稿第58页上有两处引文（洛姆尼茨基的诗歌）暂时空着。我虽然已经把一大堆必要的资料带到这里的乡间小屋中来，但是在这里我却无法准确地找到那六句倒霉的诗歌的出处。解决的办法是：或者，目前正在布拉格的我亲爱的

夫人和合作者能够找到它们，或者等我自己去布拉格时亲自到博物院附属图书馆去查考。我去布拉格将是8月1日以后的事，届时我将把第二批译稿（七印张）随身带去，同时把那几句诗补进毛样中去。这样做一点也不影响排版。

7、最后，我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我曾经和巴维尔（即：巴维尔·普罗科普——作者）谈起过它。巴维尔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也准备作同样的调整，不过后来他已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了。这里讲的是文章段落的调整问题。我认为，目前所采用的不空行的段落安排对读者颇为不便，因为段与段之间无明显的界线。对散文作品来说这种形式已非常糟糕，而对论说文来说这几乎是灾难。因此我向您建议：至少要把萨宾纳著作中的各个段落用空行区别清楚。当然，这只是建议而已。如果您认为维持现状的理由更加充分的话，那么我也不坚持。

8、罗嗦了一大篇，就此搁笔。不过我请求您给我回一封信（请寄：奥斯符拉青邮局，霍季姆涅日村，沃依捷赫·季霍塔收），谈谈您对我寄给您的东西是否满意，您对它又有些什么意见。

9、现在，为了实现我外出的合作者的心愿，我代表她多多地向您问候，同时我自己也衷心地问候您。

您的 J。

40.7.11.于霍季姆涅日村”

我到达布拉格后的第二天，尤列克便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古丝蒂娜！

昨天你动身后，我坐在阳台上——过了一会儿，小燕子飞落在屋檐上呢呢喃喃叫个不停。午饭以后，下午和傍晚，小燕子又回来了。甚至现在，虽然在下雨，它也来此呆了一会儿。它问我在写什么，我告诉它，什么也没写，我在等待你的报告。

好吧，既然你的报告还没有到，那么，我自己先向你报告一下吧：

1、《行动》出版社寄来的《健康的睡眠》一文稿费的补付款（1,000克朗）收到了。这是给Fr.（即：弗里采克·赖青——作者）的，但是你不要全部交给他，因为要付所得税。请你找他一下，给他600或700克朗（不要再多了，其余的你先留下）。你也先别告诉他这笔补付款的总额，让他以后好再高兴一番——对吗？

2、再没有收到别的东西。相反，我用一个漂亮的信封口袋把我们所拖欠的第一部分译稿寄出去了。

3、我开始读有关萨宾纳的资料。想起来了，我非常需要1848—1850年度的《布拉格晚报》。在其他任何书刊上，我们都无法看到一篇萨宾纳的政论文章。当然借阅那种《晚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齐内克收藏过它。他们的《晚报》虽然残缺不全，但没有关系。他们把它放在店铺入口处的一个柜子里，约在五个月前他们曾开价90克朗。现在我考虑把它买下来。齐内克处还有少量的哈夫利切克主办的《民族报》。古丝蒂娜，如果你能抽空去办理一下，把这些

资料带回来，我将对你感激不尽。

4、如果你还要到吉尔加尔处去告别的话，请告诉他，当他见到霍乌斯卡博士时，就说我很想把萨宾纳的文章《我的申辩》借到霍季姆涅日村来。如果他（霍乌斯卡）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待我去布拉格时，我将到他家去借看一下就行了。

5、在霍克尔处我的信封口袋里还存有1848年出版的《花朵》杂志。如果你还要到他那里去的话，请把该杂志带回来（价格50克朗——10%）。但是，不要耽搁行期，我会写信和他们联系的。

6、你必须尽早赶回家来，因为不只是我想念你，而且那些小鸡也十分想念你。昨天，最小的那只小鸡生了病，不过看样子很快便会好的，它只是有点儿便秘而已——不过，你这位鸡妈妈的“鸡妈妈”不在家里，谁还能知道什么东西能治小鸡的便秘呢！

最后，大家都问你好，似乎你出门已有好些日子了！你能相信吗，古丝蒂娜，连我也有同感哩！客厅跟从前一样，阳台和花园也依然如旧，不过，一切地方都如同缺少了一半似的。这一点，我从前是想象不到的。今天，我开始查阅了火车时刻表，我想了解一下你大概什么时候可能回来，乘哪一次列车对你又最合适，我将到那趟火车的终点站去等你。

总之，古丝蒂娜，回来吧！

吻你，拥抱你。

你的尤拉。”

我到弗里采克·赖青家去送稿费时还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呢。赖青住在布拉格拉扎尔斯卡大街。我记不清他住哪一层楼了。我在三楼的一家门口按了一下电铃。房门开了，从里面突然冲出来一条黑白花的大猛犬，它向我一扑，两只前爪猛地搭在我的肩上，弄得我直摇晃。我大惊失色，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位穿着白色长衬裤的中年男人走到门口，猛犬听到了他的吆喝声后才把我放开了。后来，他把赖青的住址告诉了我。

我给尤列克带回来了《布拉格晚报》和《花朵》杂志。这两种资料都保存下来了。此外，我还在博物院附属图书馆找到了我们翻译萨宾纳的作品时需要查考的资料。这样，1940年7月15日尤列克便给普罗科波娃同志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夫人，由于我的合作者及时从布拉格赶回家里，并从博物院附属图书馆带回来了我们这里所有资料中无法找到的某些引文的确切出处，因此，我立即把修改和补充意见给您寄去，这样，译稿中残留下来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

尤列克在信末又使用了季霍塔这个署名。

我们又平静而紧张地工作了两个星期，而后便迎来了性命攸关的日子——1940年7月29日，星期一。在那个烈日当空、暑气逼人的日子里所发生的每一件细小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天，我们一整天都坐在客厅里工作。我在翻译，尤列克从清晨起便用打字机誊写他的注释。他不时地沉思着，用左手托住下巴，望望呈现在远方地平线

上的小山，然后又用右手的四个指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着键盘。当我需要找到一个贴切的捷克词语时，或者当我在翻译中碰到某件趣闻时，我便要和他谈上几句。当他听到厨房里响起空水桶的碰撞声时，他总要把工作停下来——这是妈妈取水桶准备下楼到水井旁去提水。尤列克马上站起来喊道：“妈妈，你干么不说一声？！”说着他便跑过去从她手里夺过水桶下楼去了。他是不忍心看着妈妈、莉巴或我到水井边去提水的。他向我们解释道：“对我来说，提几桶水是体育锻炼嘛，而对你们却是受罪。我是很喜欢体育锻炼的。”

中午时分，妈妈把客厅的门推开一条缝，喊道：“孩子们，出来吃饭了！”那天午饭后，我还给尤列克煮了一点儿黑咖啡。他非常喜欢黑咖啡，然而我们天天喝是喝不起的。喝过黑咖啡后，我们又继续工作了。

下午，当落日的余辉从客厅隐去后，尤列克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说道：“古丝蒂娜，我们到林子里去散散步怎么样？”我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出了后门，走进菜园子，沿着石级（我、莉巴和薇拉把石级缝里的杂草清除得干干净净，使石级整洁美观，因为妈妈就喜欢这样。）来到“尤利小丛林”——长着四棵银松的地方，再往前走就到了用木板条钉成的篱笆旁边，我们打开低矮的篱笆门，来到了后院。我们俩手拉着手，向一条不太低洼的田间小路走去，小路两旁种着小白桦树，细嫩的树叶儿摇曳生姿、沙沙作响，宛如在和从它们脚下流过的小溪窃窃私语一般。田野里整齐地排列着一行行的黑麦麦垛，麦穗不时地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

声，如同炒咖啡豆一般。夕阳正挂在切尔霍夫山顶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山上去旧地重游啊？！”我叹了口气说。

“将来我们一定还要常常到那边去玩的，”尤列克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这样回答。当我在眺望被希特勒匪徒霸占的我国领土时心头所涌现出来的凄凉和悲哀，都被尤列克的这些话驱散了。

我们走在暮色苍茫、凉风习习的林间小路上。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乌黑的、挂满果霜的覆盆子随处可见。尤列克不停地谈论着占据他全部身心的萨宾纳。他正是要通过萨宾纳的一生向读者说明：一位真正的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对自己的言谈举止无不负有巨大的责任，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他。他的每一个错误——哪怕是最细小的错误——都可能被敌人加以利用，用来损害他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因此，一位真正的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必须时刻牢记自己为之献身的崇高理想，而且要把它变为个人生活行动的准绳。当萨宾纳宣称：“我是一个自由人，我有自己衡量事物的标准”时，他的这个“标准”必须是与众不同的，而且较之于一般的标准要严格得多。但是，这样一来，人们也必然会用严格得多的尺度去衡量这位自由战士的缺点和错误。

我给尤列克一把覆盆子。他不要。我说了他很久，他才分了一半去，另一半我只好自己吃了。后来他也摘了满满一把，我从他手里也分到了一半。

我们穿过林子。尤列克谈到，一年前他自己也无法想象怎么能在这样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生活，远离布拉格，没有剧

场和电影院，当然，今天的戏剧和电影大都一文不值，倒不如一概不理睬的好！而现在，这个小村子已经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尤列克喜欢霍季姆涅日村，所以我也喜欢它。尤列克回忆起什拉麦克的诗——《水闸》，便朗诵起来：

草原上滚动着绿色的波浪，
草原多么慷慨大方。
它是人生中最朴素的餐桌，
你掰下半个面包，塞到妻子手上。
面包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满意的微笑在闪着光，
小小的花环又何等平常……

突然他看见不远的树枝上有一只小松鼠。它听到响声，吓呆了。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过了一会儿，我向前跨了一步，小松鼠飞也似地逃跑了。

尤列克的情绪极佳，因为我们关于萨宾纳一书的编写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他订了一个计划，规定每天应该校阅我的译文多少页，应该写出多少条注释，我翻译的桑哈贝尔的作品，他每天又必须审订多少。7月28日他作完了最后一页笔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看见一帮小男孩在我们家菜园子旁边的小块空地上踢足球。我们在一旁停下来。一个男孩子壮着胆子向尤列克喊道：“请您给我们当裁判吧！”尤列克欣然同意，他在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们中间跑来跑去，

替他们计算着双方的比分。

后来，村长穿过林子向我们走来。尤列克离开了那些男孩子们。我们和村长握手寒暄之后，他跟我们来到大门旁边，他想知道目前的世界大事。他和我们聊了一会儿便告辞了。妈妈用这样的话迎接我们：“孩子们，我真高兴你们终于回来了。我一个人在家可闷死了。”那一天，家里的确异常寂静。爸爸一直躺在比尔森的医院里，莉巴和孩子们也不在，薇拉则几乎整个夏天都没有到霍季姆涅日村来。现在她正在摩拉维亚的布兰斯科。我们正说着话，突然门铃响了。我们都警觉起来。不一会儿，从院子里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宪兵！宪兵！”对孩子们来说，宪兵的出现倒是一件好玩的事儿。他们不害怕宪兵，因为他们是在妈妈常常用这个词儿去吓唬他们的年代里长大的。他们认为：宪兵与众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们身穿制服而已。宪兵的到来引起他们一阵起哄，如同村子里出现了打扫烟囱的清洁工或邮差时，他们也会齐声叫喊一样。

但是，对尤列克和我说来，“宪兵”这个词儿却令人感到厌恶、怀疑和担心。尤列克从心底里就憎恶宪兵和警察。他曾多次跟他们较量过。这些家伙或者捣毁他正在发言的会场，或者驱散示威游行的群众，或者公然向矿工开枪，或者跳出来袒护工人阶级的败类！在纳粹占领时期，尽管宪兵中不乏爱国的仁人志士，但我们对“宪兵”这个词儿却依然没有好感。特别是自从盖世太保在比尔森搜捕过尤列克以来，对我们来说，“宪兵”这个词儿已成了盖世太保的同义语了。

“尤列克，等一等。让我先去看看他是来找谁的。”我走出房门，来到走廊上，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下走。此刻，我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楼下从远而近也传来了脚步声。来人已上了楼梯，一步，两步，三步……在楼梯的转弯处，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宪兵。他身穿制服，头戴钢盔，肩上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过去，奥斯符拉青镇公所的宪兵队长有时也来找过父亲，不过，他是前来串门聊天的。现在，那里的宪兵队长早已易人，新任队长是一位我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拦住宪兵的去路搭讪说：“您好！真是贵客临门！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小心谨慎地和他攀谈起来，似乎他是来我们这里串门儿的客人。我心里也暗自奇怪，我当时竟能如此地神态自若、声音自然。那位宪兵以一本正经的、冷冰冰的语调问道：“小伏契克先生在家吗？”我略加思量之后回答说：“不在。您找他有事吗？他回来时我可以转告他。”这是一位新调来的宪兵，过去我从来没见过他。我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着话，以便让厨房里的尤列克也能听见我的声音。我预感到，这个宪兵是到这儿来逮捕尤列克的。

“不行，”宪兵严厉地回答。“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山里去了。”我们面对面地在那里站着。我心里焦急万分，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相隔仅几个阶梯的、在楼上的尤列克能听见我们的谈话，但是，楼下两个房间里的房客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我打定了主意。“我们别站在这里，我们上去吧！”我把他领到我们居住的厨房隔壁莉巴的房间里。

“请坐！”我给宪兵搬来一把椅子。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房子中间。我关好房门。一会儿后，宪兵问道：“他是在1903年2月23日出生的，对吗？”“对。不过，请您告诉我，您找他有什么事？”我恳求他道。他粗鲁地回答了一句：“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猛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说：“求求您，您不能伤害他！”

宪兵开始犹豫起来。他跟我也是素不相识，他也不知道我这个人是否可靠。当时，我已顾不及这些。我把他的手紧抓不放。一忽儿后，他握了一下我的手，同时用另一只手取下头上的钢盔，郑重其事地说：“我不想伤害他。但是，您得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但是，他的话也使我松了口气。“我真的不知道，”我这样重复着。

“我去看看，他是否已经回来了。”

我来到厨房里，把刚才和那个宪兵的谈话向尤列克和妈妈简单地重复了一遍。尤列克点着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厨房里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孩子们的欢叫声从窗外传了进来。他考虑了几秒钟后斩钉截铁地说：“古丝蒂娜，我去找他谈谈！”

妈妈和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旧沙发上，墙壁那边尤列克和宪兵正在说着话。我们屏息凝神地听着，希望能透过墙壁捕捉到他们的谈话声。但是什么也没有听见。过了很久尤列克终于推开厨房门走了进来。他用压低了的嗓音轻轻地对我说：“我必须离开这里。古丝蒂娜，现在你来一下，他要跟你谈谈。”

我再次来到隔壁房间。宪兵用相当友好的语气对我说：“现在，我请您信守诺言，因为除您以外，再没有人知道我和您丈夫谈话的事。如果走漏了风声，我是要掉脑袋的。这是盖世太保的逮捕令。您丈夫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我诚挚地向他伸出手去，表示我将信守不渝。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在宪兵站，队长向我们宣读了盖世太保的命令，命令说：必须将潜伏在霍季姆涅日村的共党记者、您的丈夫立即逮捕法办。命令宣读完毕后，队长问我们在场的四位宪兵，谁愿意前去执行任务。谁也没有吭声。后来我自告奋勇接受了命令。上头的命令说：立即进行逮捕，并把伏契克押解至宪兵站。现在我回去只能报告说，我在这里没有抓到他了。”

我把宪兵送出了大门。

尤列克叙述了和宪兵的谈话情况：当他一走进房间时，宪兵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他已经把尤列克逮捕了。尤列克问他：“您是不是捷克人？”对方回答说“是”。尤列克接着对他说：“您既然是捷克人，但却替德国盖世太保逮捕捷克人，您不为此感到羞耻吗？”宪兵回答说，这是盖世太保的命令，他有什么办法？接着他们便一起商议起对策来。最后他们商定：尤列克离开这里，他回去报告说没有抓到。

这位宪兵是一位好人。他就是今天的约瑟夫·霍沃尔卡同志。

注 释

- ① 尤列克、尤列切克、尤尔恰、尤尔卡、尤拉等均为尤利乌斯的爱称。
- ② 古斯塔·巴雷什即古斯塔夫·巴雷什（1910—）作家，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
- ③ 埃米尔·哈哈（1872—1945）捷克法学家。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事件”后被选为共和国总统。1939年—1945年成为捷克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统。他是纳粹占领时期捷克投降派的总代表。
- ④ 第二共和国 指1938年9月30日至1939年3月18日纳粹入侵为止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共和国。
- ⑤ 布尔诺 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南摩拉维亚州首府。奥斯特拉伐 位于摩拉维亚北部，与波兰接壤。布杰约维采 位于南捷克州，靠近奥地利。
- ⑥ 伊万·塞加宁纳（1900—1940）捷克法学家，文化工作者，“左翼阵线”缔造者之一，“支援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委员，进步知识分子、反法西斯斗争运动的组织者。1939年被捕，1940年牺牲于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监狱。
- ⑦ 贝·斯美塔那（1824—1884）捷克著名作曲家，近代捷克民族乐派创始者。所作歌剧八部，如反映民间生活的《被出卖的新嫁娘》，表示13世纪捷克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布兰登堡人在捷克》、取材于反封建历史故事的《达里博尔》（又译《达里波》）和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莉布舍》（又译《里布舍》）等，是捷克民族歌剧最早的代表作；交响套曲《我的祖国》讴歌祖国的山川、历史和人民，是世界著名的、伟大的音乐作品之一。
- ⑧ “盖世太保” 为法西斯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称。

- ⑨ 兹登涅克·内耶德利（1878—1962）捷著名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音乐评论家、哲学家、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192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39年德国法西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侨居苏联，任莫斯科大学教授。1945年返国，历任捷克斯洛伐克教育文化部部长、社会福利部部长、科学院院长，政府副总理等职务。
- ⑩ 维克多·迪克（1877—1931）捷克著名作家和记者。
- ⑪ 杨·聂鲁达（1834—1891）捷克著名诗人、记者、文学与戏剧评论家、作家。捷克进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捷克民族复兴和自由解放的英勇战士。
- ⑫ 弗·拉·切拉科夫斯基（1799—1852）捷克诗人、作家、语言学家。
- ⑬ 杨·阿·考门斯基（1592—1670）捷克教育家。年轻时被选为捷克兄弟会的牧师，并主持兄弟会学校。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十年被迫流亡国外，继续从事教育和社会活动。他尖锐地抨击中世纪的学校教育，号召“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提出统一学校制度，主张采用班级授课制度，普及初等教育，扩大学科的门类和内容；强调从事物本身获得知识。又认为教育必须“遵循自然”，论证了教育的“简易性”、“彻底性”、“简明性和迅速性”等原则，还编写了多种教科书，认为地上的生活只是永生的一种准备，《圣经》是智慧的泉源。主要著作有《母育学校》、《大教学论》、《语言和科学入门》、《世界图解》等。
- ⑭ 奥托卡尔·布热津纳（1868—1929）捷克诗人。
- ⑮ 弗兰季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政治家。
- ⑯ 胡斯时期 指胡斯运动时期（1419—1437），是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反封建革命运动时期。
- ⑰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捷克著名作家，擅长写

历史小说，所作长篇小说《斯卡拉奇》、《狗头军》（又译《还我自由》），反映18世纪末期的农民起义运动；《在激流中》、《反对一切》、《兄弟军》，描写15世纪初期胡斯革命运动；《在我们的土地上》、《弗勒·维耶克》反对奥匈帝国的专制统治和封建压迫。此外，还著有《父亲》、《杨·胡斯》等剧本。

- ⑮ 斯瓦托普卢克·切赫（1846—1908）捷克作家、诗人。
- ⑯ 约·瓦·斯拉德克（1845—1912）捷克诗人，翻译家。
- ⑰ 保护国 指德国法西斯占领下的捷克。
- ⑱ 帝国 指希特勒德国。
- ⑲ 共济会 为带宗教色彩的一种帮会组织。
- ㉓ 在捷语中，“行动”（čín）一词与“中国”（Čína）一词谐音。
- ㉔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美国小说家。
- ㉕ 玛丽亚·玛耶洛娃（1882—1966）捷克著名女作家。
- ㉖ 《红色权利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 ㉗ 多马日利采城 捷克西南边境上的一个古城，靠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㉘ 尤利乌斯·伏契克（1872—1916）捷克作曲家，尤列克的叔父，两人同名。
- ㉙ 博热娜·聂姆措娃（1820—1862）捷克著名女作家，现代捷克散文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外祖母》、中短篇小说《宫堡内外》、《野姑娘芭拉》和《贫穷的人们》等。
- ③① 卡·雅·埃尔本（1814—1870）捷克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
- ③② 奥古斯丁·斯美塔那（1811—1851）捷克民族解放运动民主派的代表，黑格尔学派哲学家。
- ③③ 舒马瓦山 位于捷克西南边境，与德国接壤。
- ③④ 塔博尔 位于南捷克州，著名的历史古城，胡斯运动的中

心。

- ③④ 卡雷尔·哈弗利切克·博罗夫斯基(1821—1856)捷克著名记者,捍卫民族、民主与自由的伟大战士。他的讽刺诗强烈抨击和鞭笞了极权主义和教会的黑暗。
- ③⑤ 第一共和国 指1918年10月28日(奥匈帝国崩溃)起至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签订之日)止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 ③⑥ 霍德族人 是居住在波希米亚西部边境的一种山地居民。
- ③⑦ 弗·马·克拉采尔(1808—1882)捷克自由派牧师,黑格尔派哲学家。
- ③⑧ 卡雷尔·萨宾纳(1813—1877)捷克著名文艺批评家、作家,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他继承了卡雷尔·希内克·马哈的传统,奠定了民主文学的基础。1872年他投降奥匈帝国当局的历史被揭发以后,遭到了整个社会的严厉批判。
- ③⑨ 杨·雅库贝茨(1862—1936)捷克文学史专家、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著有《捷克文学史》等。
- ④⑩ 杨·科拉尔(1793—1852)捷克著名诗人,捷古典诗歌的代表人物。
- ④⑪ 杨·普拉沃斯拉夫·科乌贝克(1805—1854)布拉格大学捷克语言和文学教授、诗人,捷克启蒙运动的先驱。
- ④⑫ “悲惨事件”指“慕尼黑事件”。
- ④⑬ 杨·胡斯(约1369—141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出身农家。毕业于布拉格大学,历任该校教授、文学系主任和校长。1401年受神父职,次年起兼任布拉格伯利恒教堂教士。深受英国威克里夫思想影响。他反对德意志封建主与天主教会对于捷克的压迫和剥削,严厉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行为,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教徒与主礼教士在弥撒仪式中同领面饼。

（“圣体”）和葡萄酒（“圣血”）（天主教规定教徒在弥撒中只能领面饼）。教皇和德意志天主教会视之为仇敌。

1414年天主教会康斯坦茨会议诱骗胡斯到会，然后加以逮捕，并于次年7月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胡斯之死激起捷克人民的极大义愤，加速了胡斯战争的爆发。

- ④④ 胡斯运动：参看本章注④③。
- ④⑤ 弗·马·佩尔茨尔（1734—1801）捷克启蒙运动先驱，布拉格大学第一位捷克语言与文学教授。
- ④⑥ 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1753—1829）捷克启蒙运动先驱，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 ④⑦ 瓦·泰姆（1765—1816）捷克戏剧家，演员。
- ④⑧ 瓦·拉·克拉麦里乌斯（1792—1861）捷克新闻工作者，出版家。
- ④⑨ 安·雅·普赫马耶尔（1769—1820）捷克诗人，语言学家。
- ④⑩ 舍·赫涅夫科夫斯基（1770—1847）捷克作家。
- ⑤① 维·内耶德利（1912—1945）捷克著名作曲家，指挥。
- ⑤② 玛·多·雷迪戈娃（1785—1845）捷克爱国主义女作家。
- ⑤③ 布拉特日采的耶尼克（1756—1845）捷克启蒙运动先驱，古文物收藏家。
- ⑤④ 约瑟夫·荣格曼（1773—1847）捷克语言学家，翻译家。
- ⑤⑤ 马·米·兹·波拉克（1788—1856）捷克民族复兴运动抒情诗人。
- ⑤⑥ 约·林达（1789—1834）捷克小说家。
- ⑤⑦ 瓦·汉卡（1791—1861）捷克哲学家、出版家。
- ⑤⑧ 普雷斯尔兄弟 即：杨·斯瓦多布鲁克·普雷斯尔（1791—1849），捷克自然科学家，启蒙运动先驱；卡雷尔·博西沃依·普雷斯尔（1794—1852），捷克医生、植物学家。
- ⑤⑨ 杨·普尔基涅（1787—1869）十九世纪捷克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泛神论者，民族启蒙运动先驱。

- ⑥⑩ 阿·塞德拉切克 (1843—1926) 捷克历史学家。
- ⑥⑪ 弗兰季舍克·帕拉茨基 (1798—1876) 捷克历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活动家。
- ⑥⑫ 巴·约·沙法日克 (1795—1861) 捷克斯拉夫语言学专家、诗人。
- ⑥⑬ 阿·沃·申贝拉 (1807—1882) 捷克哲学家。
- ⑥⑭ 瓦·伏·托麦克 (1818—1905) 捷克历史学家。
- ⑥⑮ 卡雷尔·弗拉吉斯拉夫·扎普 (1812—1871) 捷克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 ⑥⑯ 雅·卡麦尼茨基 (? —1574) 捷克福音派新教牧师和著名医生。
- ⑥⑰ 苏希尔 (1804—1868) 捷克作家、牧师，摩拉维亚地区民族运动的组织者。
- ⑥⑱ 约·雅·兰格尔 (1806—1846) 捷克诗人。
- ⑥⑲ 杨·内·什捷潘内克 (1783—1844) 捷克戏剧家、导演和演员。
- ⑦① 瓦·克·克利茨佩拉 (1792—1859) 捷克作家。
- ⑦① 约·卡·蒂尔 (1808—1856) 捷著名作家、戏剧家、记者。捷克民族戏剧的奠基人。曾参加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编过进步刊物，屡遭奥地利统治者迫害。
- ⑦② 弗·雅·鲁贝什 (1814—1853) 捷克诗人，散文作家。
- ⑦③ 杨·艾·沃采尔 (1803—1871) 捷克考古学家、文学史专家。
- ⑦④ 伊·多赫纳尔 (1905—) 捷克戏剧和电影演员。
- ⑦⑤ 卡雷尔·希内克·马哈 (1810—1836) 捷克著名诗人、散文作家，捷克革命浪漫主义派的主要代表。
- ⑦⑥ 瓦·博·内贝斯基 (1818—1882) 捷克文学评论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 ⑦⑦ 西格弗里德·卡佩尔 (1821—1879) 捷克作家，新闻工作

者。

- ⑦⑧ 斯瓦托普鲁克·切赫(1846—1908)捷克作家、诗人。
- ⑦⑨ 约·瓦·弗里奇(1829—1891)捷克著名作家、记者,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 ⑧⑩ 约·雅·兰格尔(1806—1846)捷克民间诗人。
- ⑧⑪ 安托宁·萨波托斯基(1884—1957)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02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创立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22—1925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9年任红色职工会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囚禁于德国法西斯监狱和集中营。解放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5—1950)。1948—1953年出任政府总理,1953年3月21日起任共和国总统直到逝世。
- ⑧⑫ 雅罗米尔·多兰斯基(1895—1973)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1922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9年起任捷共中央委员,1930年起为红色工会领导人之一,1939—1945年被囚禁于德国法西斯集中营,1946—1968年为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6—1949年任政府财政部部长,1951—1963年任政府副总理。
- ⑧⑬ 古丝蒂奇卡、古丝蒂娜、古丝婷卡都是古丝塔的爱称。
- ⑧⑭ 维·内兹瓦尔(1900—1958)捷克诗人、戏剧家、散文家、翻译家。
- ⑧⑮ 伊日·沃尔克尔(1900—1924)捷克著名诗人,捷克20世纪社会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
- ⑧⑯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捷克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⑧⑰ 丹尼尔·笛福(约1660—1731)英国小说家,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
- ⑧⑱ “内曼尼采村的老爷”意译为“穷棒子村的老爷”。
- ⑧⑲ 拉季斯拉夫·什托尔(1902—)捷著名理论家,文艺批评

家，捷共中央委员，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捷克和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 ⑨⑦ 瓦茨拉夫·肖尔茨 (1838—1871) 捷克诗人。
- ⑨⑧ 安托宁·科尼亚什 (1691—1760) 捷克耶稣会传道士，反对教会改革的顽固分子，曾烧毁改革派新书三万余册。
- ⑨⑨ 瓦茨拉夫·马杰伊·克拉麦里乌斯 (1753—1808) 捷克作家、记者和出版家。1789年起他编审并出版了《布拉格邮报》，1791年起改名为《皇家爱国报》。
- ⑩① 哈莱什 为捷辅币名称，一百哈莱什等于一克朗。
- ⑩② 丹·狄德罗 (1713—1784) 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
- ⑩③ 司汤达 (1783—1842) 又译斯丹达尔，法国著名作家。
- ⑩④ 克拉拉·蔡特金 (1857—1933)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共创始人之一，曾领导反对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
- ⑩⑤ 弗·克·沙尔达 (1867—1937) 捷著名文艺批评家、作家、诗人。
- ⑩⑥ 拉扎为拉季斯拉夫的爱称。
- ⑩⑦ 雅利安人是欧洲十九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人民不科学的总称。种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法西斯分子捏造“雅利安人”是高贵人种，并以当代具有某些体质特征的人群是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嫡系等谰言，为其种族主义理论张目。
- ⑩⑧ 莫斯特茨科矿工大罢工 1932年3月23日至4月19日，捷克北部地区的矿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为期四周的大罢工。罢工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
- ⑩⑨ “圣灵降临节”亦称“降灵节”，是基督教纪念所谓“耶稣门徒领受圣灵”的节日，在每年“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
- ⑩⑩ 巴维尔·普罗科普 (1904—1940) 捷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及

其他进步书籍出版家。

- ⑬ “红色日子”指1928年7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反对禁止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而举行的抗议示威游行。当时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遭到失败。1929年举行了捷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党内危机得到了解决。

第二章 地下活动时期

第一节 转入地下

尤列克就要远走高飞了。他把有关萨宾纳的文稿和几件必须的内衣裤放入皮包。为了使妈妈和我能暂时忘却那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可怕事件，他幽默诙谐、谈笑风生。我在妈妈面前也装成临危不惧、坦然自若的女中豪杰。尤列克不同寻常地、频频地吸着香烟——只有这一点才说明他正在思考着问题。

晚上，我们家的常客、好朋友沃伊捷赫·季霍塔来了。尤列克告诉他，明天一早他要跟他一同到比尔森去。不用多问，季霍塔便立刻意识到：尤列克此去比尔森不同往常，因为，宪兵的来访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向尤列克建议：“伏契克先生，您把我的铁路员工制服穿上吧！”但是，尤列克拒绝这样做。他回答说，他不愿连累别人。

季霍塔告辞了。妈妈长吁短叹起来：“这种鬼世道何日才能到头啊！叫人如何忍受得了啊！？”尤列克说：“妈妈，情况很清楚：1938年秋我们没有抵抗，结果，我们今天便成了亡国奴，我们现在也只能在更险恶的环境中进行斗争了。”

“但是这种鬼日子太长了！”妈妈叹了一口气说道。

“现在恐怕要更长了，因为希特勒的力量比过去更大了。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希特勒赶出去的！”

我和尤列克回到卧室。妈妈在厨房里准备第二天的早饭。明晨两点半钟我们必须起床。

尤列克站在敞开的窗户旁，仰望着灿烂的星空。他在向霍季姆涅日村——他居住了一年多的可爱的故乡——告别。夏夜是短暂的。整个村子漆黑一团，到处都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但是，天上却星光灿烂。花园里促织争鸣，村子里偶尔传来了犬吠声。我们全神贯注地站在那里，就连近处树叶儿轻轻颤动的声音几乎都能听得清楚。在铁路那边，祖布日纳河缓缓地流着。远处山峦起伏，渐渐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尤列克低声对我说：“再见了，古丝蒂娜！”我扑到他的怀里，轻轻地回答说：“我的尤列克！千万保重！”

“尤列克，你怎样把平安到达布拉格的消息告诉我们呢？”尤列克回答说，一到布拉格，他立即了解一下我们寓所的情况，然后写信告诉我们。我要知道的消息可以在信中的某一段话里找到，该段话起头的第一个单词他将把它划去。如果起头的这个单词被拦腰划上一条横线，那就是说，必须把这个单词后面的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连接起来组成新词；如果起头的这个单词被拦腰划上两条线，那么，必须把这个单词后面的每一个词的第二个字母连接起来组成新词。按上述方法组成的新词内就包含着我要知道的情报。如果我收到他寄来表示问候的明信片，那么在一个星期以内我

必须到布拉格的艺术家协会去，那里会有人告知我和他接头的地点。“你不用担心！”他补充说。

我依旧是忧心如焚。万一盖世太保现在就闯了进来怎么办？尤列克怎么能从这儿逃走呢？他现在却心满意足地、酣畅地睡在床上。他在养精蓄锐，为了迎接黎明时的战斗啊！

1940年7月30日凌晨2时30分（实际上是1时30分，因为纳粹占领者在我国实行了夏季作息时间），群星已经隐去，万物已进入梦乡。但是，我们三人——妈妈、尤列克和我却已经起床。尤列克和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尤列克和妈妈永别的最后一顿早餐。尤列克显得轻松愉快。他打趣地说，我们女人家已经睡够了，但是，一会儿后我们还会鼾睡一通的。他也多么想再睡上一觉啊！不过，这只能等到上了火车以后再说了。

我和妈妈——她手里打着电筒——陪他下楼。在楼下，季霍塔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妻子。尤列克和妈妈告别。他拥抱着妈妈说：“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我的尤列切克，上帝保佑你！”妈妈把尤列克紧紧地搂在怀里。

他们走了。我一步跟了上去。季霍塔拦住我说：“太太，您上哪儿去？”“跟你们去，送你们到奥斯符拉青去！”季霍塔说：“没有必要，万一沿线有纳粹分子把守呢？”

“季霍塔先生说得对，古丝蒂娜，”尤列克对我说，“还是留在家里吧！”这样，我只得在这里和他告别了。我们俩站在楼梯下面，拥抱着、吻着。季霍塔夫妇和妈妈都流下了

眼泪。而我几乎就要失声痛哭了。

“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放心吧，再见！看好耶里克，别让它溜出去追我们，”尤列克说。过样，我们又回到了现实之中。似乎他两天后就会回到家里一般。

他消失在黑夜里，为了给人们带来光明——我这样对自己说。

他不能出事！他千万不能出事！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竟不停地数着食橱中的杯子，还自言自语地说着：“会出事”、“不会”，“会出事”、“不会”，“他能到”、“他走不到”，“他能到”……这令人感到可笑，但是，可笑的事情难道我们干得少吗？他大概哪一天能寄信来？但愿他摸清了我们布拉格寓所的情况之后再开门进去！我想起了他身无分文。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凑足了车钱。他在布拉格怎样生活？他不能出事！他千万不能出事啊！

上午，莉巴带着孩子们来了。她一迈进空旷的客厅劈头就问：“怎么样，尤尔恰在哪儿？”

中午，我拿着五公升大的罐子到树林中去摘覆盆子。如果我能摘到满满的一罐子，尤列克一定能平安到达。我一边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他能到，他走不到，他能到……此刻，他应该早就抵达布拉格了。昨天我们还在这里一同散步，然而只几个钟头，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用不了一天的功夫，尤列克已远在天涯。昨天他还有一个温暖的家，而今天他却成了一个流浪者！

开始下起雨来，但我没有回家。丝丝细雨连绵不断。我

竟然把尤列克的命运和摘覆盆子连在一起，这是多么的愚蠢啊！我真想成为童话中的“千里眼”，能够看见他现在在做什么该多好啊！

快到傍晚时分我才从林子回到家里。我全身上下湿漉漉的，然而却带回来了满满一罐子的覆盆子。妈妈骂我发昏，我则告诉她为什么不采满一罐子就不回家的原因。最后我们三人——妈妈、莉巴和我——都大笑起来。一则看上去我完全成了个落汤鸡，二则我们的心情突然轻松了许多，我们原来不愿让对方知道的焦急不安象心上的石板一样落了地。

我们急切地等待着季霍塔先生下班回家。我们不停地察看墙上的那台老式的黑森林杜鹃挂钟。挂钟的钟摆象往常一样规律地来回摆动着，但是，表盘上的指针似乎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对别人来说，时光的流逝依然如故，但在我们看来，今天与昨日相比真有天渊之别。这一点必须绝对保密。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列克已经远走高飞。知道这一点的只有我们全家、宪兵霍沃尔卡和季霍塔夫妇。

季霍塔下班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我起身下楼。刚下班回家的季霍塔正在把提包放在凳子上。他笑了笑对我说：“一切都非常顺利。他要我向您问好！”此刻，我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尤列克终于顺利地闯过了难关！我陪着季霍塔上楼来找妈妈。见面时他并没有寒暄，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一切都非常顺利！”接着他便叙述起来：“早上离开家后，我们选择了沿铁路线的小路走。我走在前面，伏契克先生跟在后面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这样，万一有事，便于我掩护他脱离

危险。快到奥斯符拉青时，我们俩会合在一起。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车站周围的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一会儿后，从多马日利采方向开来的火车进站了。我们二人上了最后一节车箱。一名乘务员——我的一位老朋友——向我们走了过来。要知道，我在这条线上来来往往已有好几年了。我们寒暄了几句后，我指着伏契克先生对他说：‘这位是我的朋友，他到布拉格去。路上请多加关照！’乘务员对我说：

‘没问题，你放心就是了！’为了便于分散活动，我便和伏契克先生道了别。他还对我说：‘请代向古丝蒂娜和家里所有的人问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握了握手，以后我便走开了。”

除星期日以外，每天都有邮差从奥斯符拉青来到雷季姆涅日村。他定期给我们送来《人民报》。今天——1940年8月1日星期四——邮差送来了一封信。在浅灰色的信封上用七扭八歪的字迹写着：“奥斯符拉青 霍季姆涅日村伏契克先生转 尊敬的莉布什卡·纳赫季加洛娃小姐收”。我把来信交给了莉巴的孩子莉布什卡。他拆开信念了起来，念着念着，她突然停了下来对莉巴说：“妈妈，这封信太奇怪了！在布拉格我哪有叫玛妮亚的熟人呀？”我对莉布什卡说，让我看看来信。信封上的地址显然出自孩子的手笔，上面盖有用英、捷两种文字写成的邮戳：“布拉格25，40年7月30日22时发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女友！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无奈近来工作很忙。

这一次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暑假，因为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我们甚至参观了‘外祖母故居’。本来我们还计划参观更多的地方，但后来未能实现。”

下面一段的开头字母被拦腰划了一条短线：

“我本来很高兴，但是我现在累坏了，我饶恕了爱娃。拉姆博乌塞克家的艾达一直到达了杜尔诺夫。父亲靠打鱼为生。

他捕到了许许多多的鱼，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因此我们准备把它们分给大家。

明天我们动身来布拉格，我是多么地高兴啊！但是这里也很美，不过生活费用非常昂贵。一顿不带汤的午饭要花上15克朗，饭后还能喝上一杯黑咖啡，但是比起姑妈烧的咖啡来可要差多了！

我们生活得很好，只是这里的天气糟透了。你的生活也一定过得不错吧，我热切地盼望着暑假后我们能好好谈谈。请代我向小汉妮奇卡和你亲爱的妈妈问好。

衷心问候你，盼望着能早日再见！

你的朋友 玛妮亚”

这是尤列克的来信。它貌似天真无邪、平淡无奇，但是其中却隐藏着重要的情报。来信第二段开头的字母被拦腰划上一条短线。那就是说，我必须把这一段中的每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重新组合成词。结果，新组合成的单词意思是：

“他们正在搜捕我们的编辑。”

我回忆起尤列克在《红色权利报》、《创造报》、《哈

罗报》编辑部中的朋友们，回忆起爱多·乌尔克斯、库尔特·康拉德、杨·克雷奇、瓦茨拉夫·辛库列、弗兰季舍克·克日热克、瓦茨拉夫·克然、斯坦尼斯拉夫·布隆茨利克和弗里采克·赖青。赖青在清明节时还到过我们在霍季姆涅日村的家里。瓦舍克·辛库列也访问过我们一次。那是在1939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村子里碰上了他。当时，他肩上背着干粮袋轻装向火车站走去。我们把他带回家里。当时莉巴正在烤圆面包。她把面包从烤炉中取出来，放在外面的窗台上等晾凉以后用来招待瓦舍克。我们谈论起克洛斯特尔曼，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严峻的舒马瓦山区的自然风光。我们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兴致勃勃地说着话，甚至忘记了外面正风狂雨暴、雷电交加，直到看见去钓鱼的爸爸全身湿淋淋地走了进来，我们才省悟过来。爸爸立即去检查门窗是否关好了，可我们连下雨都不知道呢。他在外边窗台上发现了被雨水泡得鼓鼓的圆面包。1940年春，当我们在布拉格的民族戏院旁边碰到瓦舍克·辛库列时，他还回忆起这件事哩！

他们是一群年轻的、有天才的、富于牺牲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都朝气蓬勃地在共产党的报纸编辑部里工作。与资产阶级报纸相比，我们的报纸有着非常不利的条件，因为印刷前必须把版样送去检查，编辑部和印刷厂的机器往往要等上一、两个钟头以后，检查部门才能把版样送回来。而资产阶级的报纸则不同：一方面它们的版样送去检查，另一方面报纸又能立即开印。因此，它们在开印时间上总是优先于

共产党的报纸，而且能及时刊登最新消息。然而，我们报纸的消息比资产阶级报纸的消息往往还要快。我们的编辑们常常到人民群众中去采访，人民群众也常常来访问我们的编辑部。每天有多少工人进出位于卡尔林区克拉洛夫斯卡大街的、只有几个房间的编辑部啊！他们是来控诉工厂主、建筑公司老板和地主的罪行的，他们还送来许多信件。它们是资产阶级报纸千方百计要加以隐瞒和拒绝刊登的消息，比如：因工资太低或因解雇工人而爆发的罢工斗争；因缺少足够的安全措施而造成的矿井爆炸事故；由于唯利是图的公司老板无视安全措施而造成建筑物倒塌、工人死亡的事件；反战的和反对物价飞涨的示威游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庆祝活动，等等，等等。



妈妈回比尔森去了。她必须到医院去看望爸爸。我和莉巴以及她的两个孩子留在霍季姆涅日村。我们常常谈起尤列克。莉巴向我讲述了下面一段往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赚几个铜板，尤列克和她常到火车站去帮助到站的旅客提拿小件行李，帮他们拿箱子、提包或包裹等物。但是，旅客常常并不理睬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年纪还小——尤列克十二岁，莉巴才九岁。到火车站去当搬运工人是尤列克的主意。有一次，一位太太让他们帮忙拿一个提包，结果，他们每人赚得了一个铜板。

晚上9时左右，莉巴已安置孩子们就寝，我正在厨房里

洗刷碗筷。突然，大门外传来了门铃声。客人大概是找邻居家的。自从尤列克出走以后，我们再不用牵肠挂肚了。

然而客人却是来找我们的。他是宪兵霍沃尔卡。这一次他身穿便服。“伏契科娃太太，我想和您单独谈谈，”他低声对我说道。

莉巴走了出去。她把身后的房门带上以前，用无限惊恐的目光望了我一眼。房子里只剩下我和宪兵了。“小伏契克先生真的不在，真的走了吗？”他诚恳地问我。“真的，就在您来我们家的那天夜里走的。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件事呢？”

“因为我要搜查你们的房子。现在我也用不着再搜查了。最主要的是：他已经走了！”宪兵已打定主意。“不！您搜查吧！这样，您既可以核实一下我丈夫是不是在家，同时左邻右舍又都会知道，您已经例行公事了。您的脚步愈重愈好，这样楼下的人全都能听到了！”我对他说。“好吧，那就走走走过场吧。”霍沃尔卡说完，便开始用力地在楼板上踱来踱去。把房门开得乒乓作响，用电筒在客厅里晃了一会儿，然后踏着重重的步子来到莉巴的卧室里。他用电筒在孩子们睡觉的床底下照了照，接着，他便咯噔咯噔地沿着楼梯登上阁楼。我和莉巴紧紧跟在他的后面。莉巴异常紧张。我劝她放心，但我不能告诉她这一切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为了保护霍沃尔卡，我必须守口如瓶啊。

季霍塔夫妇匆匆地从楼下跑了上来援助我们。他们确信我们家遭到了突然袭击。但是，对他们我也不能如实相告。现在，宪兵完全可以这样说：他已经进行了搜查，但是没有

抓到尤列克。最后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尤列克已经不在霍季姆涅日村。当我把宪兵送到大门口时，他低声告诉我，从霍季姆涅日村到奥斯符拉青的铁路线已经封锁好几天了。

每天我都焦急不安地盼望着邮差的到来。8月3日——尤列克出走几天以后——，邮差给季霍塔送来了一封信。我直觉地猜想到，这封信是寄给我的。我拆开信封，从中取出了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笺。我迅速地向它扫了一眼。根据签名笔迹——尽管信上写的是个假名，我一看便知，这封信是尤列克寄来的。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先生！

养蜂人。现就有关问题解答如下：由著名专家们所撰写的《养蜂指南》一书系由约瑟夫·奥帕日尔汇编出版。该《指南》旧版本早已售完。《养蜂工艺》一书无货。我们书库不日将把某些有关农业经济及消费问题的专门著作投放市场。其余著作尚未弄到。现谨向您推荐下列各书：

斯瓦特克著：《蜂群回收方法》；

埃米尔·图马著：《蜂蜜的产量》；

奥斯卡·恩麦里赫著：《良种蜜蜂在堆房中的混杂问题》；

杨·斯姆尔什—乌热尔斯基著：《蜂蜜——良种草蜂酿造的果实。（1、养蜂；2、采蜜）》；

布热季斯拉夫·麦尔卡—奥萨达著：《计件工资制为养蜂业广开财路》。

顺致崇高的敬礼！

弗兰季舍克·齐布尔特

我们刚刚收到您寄来的第二封信。我们希望，我们的上述答复已能满足您的要求。再一次向您表示敬意！弗·齐又及。”

在局外人看来，这封信是寄给季霍塔的，他是一位养蜂爱好者，在豪斯里附近的花园里他饲养着十箱蜜蜂。但是，事实上，这封信是尤列克寄给我的。信中第一段开头的“养蜂人”一词被划上两条横线，这就是说，我应该把这一段的每一个单词的第二个字母连接起来组成新词。结果是：“寓所被占。多加小心。我也盼望着你们的来信。你不可回家。我期望一切会好起来。”

盖世太保占领了我们在布拉格的寓所。但是尤列克是一位彻底的乐观主义者，即使是现在，不论他回霍季姆涅日村或者回我们的布拉格寓所去都已毫无希望的时候，他依然相信“一切会好起来”。

第二节 敌人第三次扑空

8月4日星期日上午，骄阳似火。院子里和楼前的空地上孩子们正在追逐嬉戏。他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传进了客厅。妈妈和莉巴在厨房里准备饭菜。我正坐在客厅的桌子旁边给尤列克—吉尔加尔用密码编写回信，向他报告宪兵第二次来家搜查的消息。突然，我好似听到一个男人在说话，他不

停地用单调的声音重复着“Die geheime Staatspolizei, die geheime Staatspolizei”（德文，意为秘密警察——译者注）。最近一个时期，盖世太保的影子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因此，在我的耳边响起这个词儿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还是抬起头来，朝说话声的方向看了一眼。在房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两个男人。一个是瘦高个儿，他不停地在重复着“Die geheime Staatspolizei, die geheime Staatspolizei”；第二个男人比前者要矮一头，两人都有一头黑发。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不一会儿，这两个男人象追捕猎物的猛兽一样把整个客厅搜查了一遍。瘦高个儿的男人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在手里翻阅着。突然，他用德文、用命令式的、威严的口气问我说：“伏契克太太，您为什么不报户口？”小个子盖世太保开始翻译起来。“我报过户口，”我回答说。“您没有报户口！”高个子叫了起来。“我报过户口，您可以到村公所去问嘛！”我这样重复着。我虽然去报过户口，但这是尤列克出走以后的事，当然，这一点我是不会告诉他们的。“您是在什么地方领取粮票的？”瘦高个儿盖世太保审问起我来。“在布拉格。”我站在桌旁，两只手使劲地捂在尤列克寄来的密信上，生怕他们发现了它。

瘦高个儿盖世太保手里拿着书，两眼恶狠狠地盯在我的脸上。“您丈夫在哪里？”他突然问道。我也紧紧盯住他的眼睛，坚定地回答说：“他在布拉格。”“他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我沉默了几秒钟，装成急事难想的样子，而实际上我正在苦苦思索着对策。“大概是在一个月以前吧，”最

后我决定这样回答。

尤列克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书籍被扔得满地都是。瘦高个儿盖世太保还打开了我们谁也不许翻动的爸爸的抽屉。也许他并不喜欢它吧，结果他把它翻了个底朝天！

“谁跟您的丈夫通信？”瘦高个儿盖世太保审问我。

“没有人跟他通信，”我撒了个谎这样回答。他们打开钢琴，并把它上盖揭去。那个瘦高个儿盖世太保突然又问了一句：“您的丈夫在哪里？”“在布拉格，”我重复说。“布拉格的什么地方？”我念了一下我们布拉格寓所的地址：

“布拉格X I X区，列特茨卡大街11号”。盖世太保怒气冲冲地把书摔在地上吼叫起来：“您还装什么糊涂！”

我惊奇地问道：“他不在那边吗？”我惊恐的神色把盖世太保们弄得莫名其妙。瘦高个儿盖世太保用凶神恶煞般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我装成若无其事。接着，那家伙大声地自言自语起来。他说他是把我抓起来送到集中营去呢，还是就地……他完全可以把我抓起来，或者关进集中营。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尤列克的来信依旧放在桌上。瘦高个儿盖世太保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它。他拿起信来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交给矮个子的捷克翻译。后来，时间过了还不到两年，我又和这两个盖世太保相遇了。那是在佩切克宫^①内的盖世太保司令部里。在那里我打听到，瘦高个儿盖世太保就是大名鼎鼎的弗里德里希。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他见到我时，厚颜无耻地装了个鬼脸用德语说：“啊，伏契克太太，真可谓条条道路通

向盖世太保！”第二个矮个子是捷克人，他是弗里德里希的狗腿子。狱中的难友们称他为内尔格尔，他跟他的主子一样残暴凶狠。

“这封信是别人的，怎么会放在您这里？”内尔格尔这样问道。“这封信是邻居拿来的，他请我用打字机替他写封回信。”此刻，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万一他们跑到楼下找季霍塔夫妇去核实怎么办？但是，盖世太保们对我的回答显然感到满意，因此他们没有离开房间。内尔格尔把这封信扔在钢琴上，那里放着《行动出版社》寄来的其他几封信件。

突然，莉巴走了进来。她美丽、健壮，头发金黄，她笑容可掬、妩媚动人。她装出对面前两个人一无所知的样子。弗里德里希站在桌子旁阅看着我正在翻译的恩·桑哈贝尔的德文书《南美洲历史》。当莉巴走进客厅后，他抬起头望着她。她用捷文跟他说了几句来取葱头的事。我向她转过脸去。我的眼睛迅速地看了她一下，又看了一下放着尤列克来信的钢琴。接着我又重复了一遍，示意她把钢琴上的尤列克的来信收走。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了我的用意。她如果已经心领神会，但又敢不敢那样做呢？此刻，内尔格尔也盯了莉巴一眼，接着，他又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又一本的书，不停地翻阅着。这时，莉巴正把葱头装在围裙里。我转向内尔格尔低声问他说：“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丈夫？”他谨慎地回答了一句：“我不知道！”

当我和那位捷克翻译谈话的时候，莉巴正用围裙兜着葱头准备回厨房去。当她在钢琴边走过时，她敏捷地把尤列克

的来信扫进围裙内，笑容满面地消失在房门后面。弗里德里希呆呆地望着她那光彩夺目的金发，但是全然没有觉察到她带出去的东西。他又把尤列克——弗兰塔写的第二封信拿在手里看了一下，然后准备把它和内尔格尔不久前放在钢琴上的那封信放在一起。可是，那封信却失踪了。两个盖世太保在地上、桌上找呀找呀，但就是没有找到。而挽救了那封信的莉巴却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

盖世太保从客厅出来到房子的其它地方进行搜查。他们沿楼梯向阁楼走去，我紧紧跟在他们后面。弗里德里希问我：“您是干什么的？”“我搞翻译，”我回答说。他们把阁楼里破旧的家什杂物翻得乱七八糟，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在院子里，他们查遍了每一个角落。接着，他们还搜查了爸爸的工具房和菜园。这两个盖世太保决没有料到，尤列克把爸爸的两支步枪就埋在这个菜园子里。爸爸把这两支步枪里外都上足了黄油，并且用防水布把它们包好，这样，埋在土里便不会生锈。只要时机一到，便可以让它们出来发挥作用了。

可惜，尤列克未能看到这两个盖世太保当时的狼狈相！如果能亲眼目睹他们只带着可怜的战利品——两三封无关紧要的信和几本书——离开我们的家时，他必然会心满意足地搓起手来。

弗里德里希在临走时命令我说：“如果您一得到有关您丈夫的消息，或者，如果他写信给您时，您必须立即向盖世太保报告！”我没吭一声。“听懂了没有？”他用威胁的口

吻问我。“听懂了，”我这样回答。我这话的意思是：我听懂了他所说的话，但是，我决没有向他做出某种许诺。

两个盖世太保走了。敌人在追捕尤列克的行动中第三次扑了空。

经过漫长的十三年以后，在1953年才真相大白：使盖世太保如此频繁地去追捕尤列克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弗里采克·赖青。1953年11月，他在布拉格最高法院的法庭上供认：“1939年4月我被布拉格的盖世太保逮捕。敌人在审问我时抓住了我贪生怕死的弱点。在经过一次严刑拷打之后，我答应了和他们直接合作的要求。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党和党的干部的情报全部出卖给了他们……关于《红色权利报》和《哈罗报》的编辑部工作问题，我向盖世太保泄露了这些报纸的组成情况、编辑名单、活动范围、它们的特点和其它细节。我向他们列举了下列人名：杨·史维尔马^②、爱德华·乌尔克斯^③、杨·克雷伊奇^④、尤利乌斯·伏契克、库尔特·康拉德^⑤、斯坦尼斯拉夫·布隆茨利克^⑥、弗拉季斯拉夫·尚特罗赫等等……根据埃尔伯斯警官的指示，为了掩人耳目，我必须和其他获释出狱的人一样定期到盖世太保司令部大楼去交待自己的活动情况。在交待问题时，我便向他们提供有关我自己和党的干部来往的情报……根据给我的进一步指示，我必须和《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们接上关系，具体说，我必须注意和斯坦尼斯拉夫·布隆茨利克取得联系。当时我还向盖世太保报告，我和尤利乌斯·伏契克继续保持着来往。我曾经供认，伏契克和

党的地下中央有联系。当时我已经知道，伏契克正在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

检察长问赖青：“这么说，是您带着盖世太保去跟踪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赖青回答：“是的，埃尔伯斯警官曾亲口命令我要和伏契克继续保持来往，并且要通过他力争与地下党的领导接上关系。这一点我也照办了。1939年12月初，经由伏契克介绍，我在布拉格近郊的莫克罗普瑟秘密会见了《红色权利报》的编辑、党的地下中央的干部瓦茨拉夫·克然^⑦。在我们接头时，克然向我转达了党组织关于我的工作安排的决定，决定说：鉴于我的身分已完全暴露，因此我必须放弃党的工作。克然又说，今后组织上如果有新的指示的话，将通过伏契克向我转达……

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到霍季姆涅日村搜捕尤列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我收到了《人民丛书》出版社（我们正在为该社翻译萨宾纳的著作）负责人巴维尔·普罗科普的妻子从布拉格寄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夫人！

我已经把您关于编写一本题为《我们祖先的幽默》的古代笑话集的建议纳入出版计划。您可以立即开始工作，并请您把手头现有的、1848年以前杂志上的所有笑话抄录下来。抄录时各期杂志望能分别进行，每则笑话后面请注明出处（原载哪一期杂志）。书写时不要用复写纸，请用您给我寄来的萨宾纳作品译稿那种规格的稿纸，这样便于将来能根据

需要进行剪贴。我想，它将是一本好书。

这里我请您把借去的书还给我，也许您已经不需要它们了。我现在首先缺少《十九世纪捷克文学》第三卷（其中收集了有关萨宾纳的一篇论文，校对时要用）和萨宾纳著《精神K.》（即《精神共产主义》——作者）。如果上述两本书没有售完的话，我是不会催您还书的。其它一些书我不着急，因为首先我无急用，其次如果需要，我可以借到它们。

谢谢，期待着能继续合作。

您的雅尔米拉·普罗科波娃

1940年8月22日，布拉格。”

我认出这封信是尤列克写来的。在盖世太保追捕他之前，他早就和我谈起过古代笑话的事。他需要《十九世纪捷克文学》第三卷和萨宾纳著《精神共产主义》一书。然而，他现在在哪里？他是怎样生活的？这些情况他的信却只字未提。不过，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即使是最细小的消息，对我说来也是莫大的安慰！

萨宾纳著《精神共产主义》一书我无法给他寄去，因为盖世太保抄家时已把它没收了。

尤列克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完成有关萨宾纳的论著的。在1940年8月20日左右他给普罗科波娃的信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该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夫人！

由于我的病情现在明显加重，因此我不能离家外出走动，尽管天气非常之好。我不得不把留有几处空白的萨宾纳

著作译稿给您寄去，不过，只要到博物院附属图书馆去查证一下，上述几处空白是不难补上的……

病魔寸步不离地驱赶着我，而我则拿出誓与它决一雌雄的劲头加倍努力地工作着，因为我担心，在我完成我的工作以前，至少在我把自己的诺言兑现之前，它完全有可能把我吞噬掉。现在作品已全部译出，同时还附有从1846年《捷克蜜蜂》杂志上编选来的几篇报告，这些报告可另立标题、自成一章。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把注释和前言写完。现在我还在编写注释，不过，我手边尚缺少编写前言的资料，因此我热切地请求您给予协助。我所需要的资料如下：

1、雅库贝茨著：《捷克文学史》第二卷（莱希特尔® 出版）；

2、《十九世纪捷克文学史》第三卷（莱希特尔出版）；现在我记不清了，有关萨宾纳的那篇论文是在第三卷中的第一册呢，还是在第二册里？

3、沃·克·布拉赫尼克® 著：《卡雷尔·萨宾纳》（是一本小册子，在阿·斯尔采处可以买到，书价约2—3克朗）；

4、萨宾纳著：《摩拉娜》；

5、萨宾纳著：《光明的儿子们》。

要弄到上述后三本书并把它们给我寄来，我想对您来说这不会有什么困难，不过，要弄到头两本书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头两本正好是我最急需的！务必借用一下，约十四天以后奉还。虽然我也有那两本书，可是我借出去了，而

现在又无法收回来。如蒙告知，您能把它们给我寄来的话，我将不胜感谢。当然，越快越好，因为这是关系到我的工作进度能否加快的問題。

如果医生允许我在最近的将来外出走动的话，我将把萨宾纳在《民族报》评论副刊上发表的几篇论文以及在《卢米尔》杂志上刊载的几篇报告，一并收入到这本萨宾纳的戏剧作品选中。这样，材料便齐全了。但是即使现在这样，它也是个完整的集子。万一它就是我一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我也不会为它感到羞耻的。我现在寄给您的译稿已约有七印张了，因此请您把商妥的稿酬交给送稿人。校对工作及一切事情均由我的女合作者负责处理。由于她目前正在休假，所以我和她暂时无法联系。

衷心问候您，再见！

您的季霍塔。”

上述一信是尤列克躲在布拉格弗尔肖维采区保加利亚大街3号的维滕格尔家里时写成的，它是由十六岁的男孩根尼亚·维滕格尔交给收信人的。

信中谈到了生病的事。其实，当时尤列克的身体非常健康。“病魔”是指盖世太保而言的。

大约在1940年8月21—22日之间，根尼亚又把另一封信送给了普罗科波娃同志。信封里共有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写给普罗科波娃的：

“尊敬的夫人！

衷心感谢您寄来的书。我感到十分惭愧的是，为了弄到

雅库贝茨的著作又给您增添了许多麻烦。我原以为您可以在某处替我借到。我自己有这本书，只是相隔太远，我个人是全然无法弄到它的。我的病比我自己原先认为的要严重得多——到您家去登门拜望目前实无法考虑。至于雅库贝茨的著作，我可以找到一位商人，因此一切将不成问题。

我非常倒霉，未能按期完成注释工作——但是这的确不能怪我，这是那‘上帝’的旨意。现在，当我弄到雅库贝茨的书以后，后天早上便能结束注释部分，因此迟两天时间您便能收到全部的注释了。我已经开始写前言。当然，我同意把我的名字写上；因为您也要求我这样做，因此我反而感到十分高兴。特殊的困难，我想，不会再有了，我正全力以赴地干，但是，由于资料缺乏，工作进展相当缓慢。我请您只采用这种联系方法，如果您能在外人面前替我保密，我也将表示十分感谢。此外，还有一件事要求您帮忙：请您把附上之信抄写一遍寄给古丝塔（可直接寄至：奥斯符拉青邮局，霍季姆涅日村，古丝塔·伏契科娃收）。”（该信我在上文已抄录。普罗科波娃同志在信上签了名，于1940年8月22日把它寄给了我。）

在给雅尔米拉·普罗科波娃一信的末尾，尤列克加写了：“雅尔米拉——那位尊敬的太太我们就不管她了吧！请您把东西寄来，因为1、书我还是需要的；2、我希望古丝塔目前有事干；还有，那本小册子奥尔比斯出版社愿意出版。好！你的尤。”

萨宾纳一书《十九世纪初年以前捷克地区的剧院和戏

剧》的注释一半以上是尤列克还在霍季姆涅日村时写成的，其余部分是他转入地下后写的。由于他不能自由行动，因此，他没有把萨宾纳发表在《民族报》评论副刊上的论文和发表在《卢米尔》杂志上的报告收进我们关于萨宾纳的著作中，而只是收进了萨宾纳1846年在《捷克蜜蜂》上发表的报告，这些报告还是由我在霍季姆涅日村时抄录下来的。

尤列克原来考虑把他关于萨宾纳的论著作为我们翻译萨宾纳作品一书的前言。但是，地下工作者的生活使他无法得到必要的研究资料。他不得在街道上、书店里、或其它任何公开场合露面，因为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在他应该把全篇文章交付印刷时，他仅仅完成了它的一个部分，即《论萨宾纳的叛变》那一章。因此他决定，这一章不放在前言中，而是附在萨宾纳文章的后面。尽管萨宾纳的作品《十九世纪初年以前捷克地区的剧院和戏剧》已经出版，尤列克还是继续写关于萨宾纳的文章，可惜他没有把它写完就被捕了。他没有写完的论萨宾纳的那篇论文文稿在他被捕以后由于别人的无知而被毁掉了。

1940年9月30日《论萨宾纳的叛变》一章和注释部分在印刷厂排印完毕，呈送驻布拉格的国家新闻管理部门听候检查。供检查用的样稿上注明收件时间为“17点45分”。负责检查的是一个叫阿·法伊格尔的人，他于1940年10月3日检查完毕。有趣的是，这位检查大员的蓝色铅笔勾掉的是下列这些句子：《复活了的坟墓》中萨宾纳的座右铭：“我是一位自由人，我根据另一种标准去评价人的品德，我走我自己

的路”；在“有几位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前来参加萨宾纳的葬礼”这一句子中，检查大员把“信仰社会主义”一词勾掉了；在机工约瑟夫·卡涅卡的证词中砍去了下面一句话：“作为宣传家和顾问的萨宾纳和他一起在一个秘密的工人组织中工作”。在约·瓦·弗里奇的证词中他又删掉了：“是的，他给我寄来了整本小册子为我们的事业辩护。他向我提供了证明他在国外所进行的新闻活动的一切重要资料。”检查大员还砍去了尤列克的下列句子：“如果说，萨宾纳说话不多是出于他自己的极易被摧毁的一片好意，倒不如说是由于奥地利警察的笨拙无能”；“……可见，萨宾纳甚至向警方（虽然是非常谨慎地）报告了自己朋友在外国的活动情况。”

我再列举一些尤列克论著中被新闻检查官法伊格尔删去的句子和段落，在这些句子和段落下面我用横线标出：

“人们称他为民族的叛徒。不，这个字眼不够确切。还是雅库布·阿尔贝茨说得对，尽管后来全部真象都被揭露出来了。雅库布说，萨宾纳告密行为的效果是微小的和毫无意义的，对于捷克民族在民族党元老派或少壮派^⑩的领导下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所蒙受的损失不能由萨宾纳负完全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所造成的危害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警方豢养的萨宾纳告密说，弗兰季舍克·帕拉茨基的面孔是长着连腮胡子的，这肯定既不会伤害我们的民族、也不会伤害帕拉茨基本人。但是萨宾纳因而给自己以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在为作为社会和民族压迫工具的部门效劳时、在为压迫人的政权机关（他曾经反对过这个政权，而且不只是为了个人的目的

去反对过这个政权) 效劳时他才会这样做。

萨宾纳背叛了自己——他背叛的不只是他这个人物、他这个个人，而且还背叛了作为为争取捷克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自由的思想和运动的代表的萨宾纳。他在捷克社会中的地位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捷克政界（甚至文学界）的许多立宪分子都迫使他保持沉默，他们憎恨他，但是他也受人爱戴。他受到这个国家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未来的分子，开拓新路的作家们、追求新知识的学生们，而首先是团结在第一批尚未定型的、大部分是秘密的组织里的、为了世界未来的新一代的工人们的爱戴……

‘我是一位自由人，我根据另一种标准去评价人的品德，’萨宾纳在《复活了的坟墓》中这样说。对极了。自由的战士必须根据另一种更加严格的标准去评价自己的品德。但是根据另一种更加严格的标准同时也评价了他的恶行。在别人只是滑一跤的地方，他却要摔断脖子。他身上的每一个污点都会变成深深的伤痕……

他使许多朋友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他把武器交到敌人手里，而敌人又调转枪口去对付整个运动……

他的错误就在于此。这个错误要比众人所谴责的那个错误更为严重。但是，当压迫人的机器的许多驯服的齿轮声嘶力竭地尖叫着：‘萨宾纳叛变了，因为他这是一贯的，因为他从来就不负责任，从来就是个软骨头’时，它们这样说对不对？……

这一次他感到了寂寞和孤独。经过八年监狱生活回家后

的第二年，他四出寻找职业，但是没有找到。他吃不饱饭，他眼看着一家人忍饥挨饿——他也看到了：曾经战胜过他的激进思想的人们把我们民族带进了政治上何等贫乏的境地。他感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应该有所作为，他应该出来说话，他被一种足以使虚脱昏睡的病人起死回生的力量所驱使——但是警方命令他必须保持沉默，没有他们的许可他不得发表任何东西，一个字也不许写。他要这样做是会被允许的……

在赫拉德恰尼监狱和奥洛莫乌茨监狱中度过的八年没有使萨宾纳精疲力尽，但是他却变得心灰意冷了。然而，在他获得‘自由’后的最初日子里，他又一变其消极的态度，起来反对那些自称为民族的政治代表的人们。他们中谁也不肯帮助他，而且他们似乎都害怕他，躲着他；对他们来说，正合他们心意的是：当启蒙运动的先驱们重新堕落成为麻醉人民的人时他是不会从中作梗的。

然而，萨宾纳没有充分估计到他效忠敌人机关的内在后果……”

从删节掉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为纳粹占领者效劳的捷克新闻检查大员是多么的胆小如鼠，同时，他又多么卖力地去维护上一世纪捷克反动政客和作家的思想，不允许公开谴责他们。

经过法伊格尔大加删节的尤列克的论著又交给了第二位新闻检查官，他的名字从删节后的校样上无法辨认出来。这位检查大员虽然放宽了捷克民族上个世纪生活历史的界线，

但是他确认了应该砍去的那些地方：我国人民和为了创建未来的新世界而团结起来的工人族的民族和社会自由，以及尤列克写到关于压迫人的机器的许多驯服的齿轮以及敌人机关等地方。

1940年10月4日14点，帕兰印刷厂老板从设在布拉格的国家新闻检查局那里收到了经过书报检查的论萨宾纳一章及注释部分的清样，因此他得以立即开机印刷。

第三节 与尤列克在布拉格重逢

1940年9月初的一天，邮差送来了一张明信片，收信人是尤列克的侄女儿莉布什卡·纳赫季加洛娃，明信片寄出的时间和地点是“布拉格，8月31日”。明信片上用充满稚气的字体写着：“谨致问候。玛妮亚，于布拉格。”

这是尤列克寄来的通知。他通知我到布拉格去找他。

我开始在众人面前念叨牙痛。一连两天，我用绷带包住大半个脸出出进进。第三天，我要到比尔森去找牙医。看样子我是非去不可的了！我从霍季姆涅日村出发，沿着蜿蜒的小路向前走去。在这条小路上，我和尤列克不知走过了多少回，不论我们是去比尔森，或者往相反的方向到南面的多马日利采去。铁路边上的这条小路只能供一人通行。尤列克总是在前面开路，我跟在后面离他两三步远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就连最窄的小路我们俩也能并排通过。我们彼此搂着腰，偎依着前进。此刻，尤列克常常唱起耶热克^①所写的歌

曲，或者用口哨吹着它们的曲调：

世界属于我们，大地多么辽阔。

快卷起袖子，努力工作！

世界属于我们，我们无比乐观，

齐心协力，建设新生活！

只有胆小鬼，才怕死贪生。

快和我们一起

去为工作、为和平而斗争……

有时他唱起另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歌曲：

我们不想也不愿意

躲在避风港里霉烂！

我们要迎着风浪

朝前冲！

我们不想也不愿意

顺流而下，随风飘动！

这样会同流合污，

被吹进垃圾堆中。

破烂儿才随风飞舞，

泥沙才顺流滚动，

老鼠才成天躲在洞里，

风浪却会激励我们。

我们齐心协力战恶浪，
我们团结一致朝前冲。
反动势力何足惧！
我们将斗志昂扬去迎接暴风！

走在那条小路上的时候，尤列克还不时地向我微微扭过头来，宛如唱歌一般呼叫我的名字：“古丝蒂娜！”而我也回答他说：“尤列克！”一路上我们多么地快活啊！

而现在我却是独自一人。田野上偶尔可以看到耕过的黑黝黝的土地。微风从麦茬地上掠过。祖布日纳河两岸刚经过收割的草地显得更加低矮，杨柳因而显得更加挺拔、高大起来。

当天我在比尔森住了一夜。几天前——8月28日——爸爸刚出院回家。他在医院里没能治好顽疾。大夫想给他的病腿作截肢手术，但是他断然拒绝了。他宁愿继续忍受病痛的折磨。他希望去布拉格的医院就诊，他深信，那里的大夫一定能治愈他的腿病。

清晨不到六点，我便从比尔森的家中出来，径直往火车站走去。我不时地回头张望，但没有发现有人跟踪。街道上空无一人。抵达布拉格后，我在斯米霍夫火车站下了车。离别此地已二月有余。在这期间，一切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我坐了几站有轨电车。然后又步行了一段路程，便来到艺术家俱乐部所在地。在俱乐部的房门（同时也用作衣帽间）里，身体魁梧的门警米蒂斯卡先生坐在长沙发上。每当

那些把俱乐部错认为是只相隔几步的马内斯咖啡馆的德国人撞进来时，米蒂斯卡先生善于彬彬有礼地把这些不速之客引开。此刻，虽然他好象是坐在沙发上埋头看报，但是，当我一迈进俱乐部的门槛，他便马上把头抬了起来。

他起身朝我走了过来，从西装背心的小口袋里取出一封拆得很小的信，把它塞到我的手中，然后和我握了握手说：

“我等您已有好几天了。”我对他仔细打量了一下：他是否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难道我就清楚其中的秘密吗？不。但是，在这封信里肯定有关于尤列克的消息。米蒂斯卡先生看出了我愿意单独留下来的心思。因此，他把我引进了空无一人的秘书办公室。

首先，我把信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外面的小信封和药房中包装药粉用的小口袋一模一样，密封情况良好。我把信拆开。是尤列克给我的信！他告诉我怎样找他。他开列了全部地址：安托宁·维滕格尔，弗尔肖维采区，保加利亚大街3号，一层右手的门。到达房门口时，我必须先按三下短铃，接着在门上连敲三下。

我告别了善良的米蒂斯卡先生来到街上。我先乘了一段路的有轨电车，然后步行一段，接着又乘几站电车，这样便于发现“尾巴”，如果有人盯梢的话。幸好我这个人从不惹人注意，这一点倒帮了我不小的忙。尤列克把路线标志得非常详尽，这样可省去我向旁人打听的麻烦。

我在保加利亚大街走进了一所大楼。我来到要找的房门旁边。因为光线昏暗，无法辨认出门牌上的字样。但是，这

里右边只有一个房间，因此我决不会搞错。我先按了三下短铃，然后又在门上敲了三下。接着是一片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不知是谁迅速地、轻轻地打开了房门。我一步跨了进去。我来到了黑糊糊的前厅。看不见的那只手又轻轻地把房门关好。此刻，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低声呼唤：“古丝蒂娜！”“尤列克！”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

现在我已经看清了他的脸。他用一只手捂住下巴。接着，他把那只手放开，轻轻地对我说：“你喜欢吗？”我不觉心里一怔，原来，他已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我不喜欢他蓄胡子，但又有什么办法！我把手一挥说：“随你的便！”接着我们便拥抱和亲吻起来。我闭起双眼，脑子里想起那蓄胡子以前的尤列克。主要的是：我们终于重逢了！我对他说，他现在的样子简直象个魔鬼。从那个时候起，不论我到那一个地下寓所去找他时，都对他使用“魔鬼”这个名字。这样，在他人面前我便不用称呼他的真名了。

尤列克将我引入卧室。他的第一句话是：“爸爸的身体怎么样了？”我告诉他，父亲已经出院。但是，他的病腿还老是痛，他很想进布拉格的医院就诊。不过，比尔森的医生关于给父亲做截肢手术的意见，我并没有告诉尤列克。他认为，我离开这里以后，最好去找一下米洛什·内德维耶德^⑫博士，请他帮忙把爸爸接到布拉格来去找伊拉塞克^⑬教授。

（1940年10月30日爸爸住进了医院。病腿拇指摘除。但是，伤口不能愈合，情况日益恶化。大夫每天动员他作手术，而他却坚持不干。1941年3月4日被接回比尔森家中。）

我和尤列克坐在维滕格尔家的房间里。尽管外面阳光灿烂，但是屋里却显得光线不足。窗子上挂着的窗帘虽然是透明的，但是它只能透过少量的光线。窗子两侧各有一张铁床。房门左边放着两个褐色的衣柜，一盆塑料棕榈树和一个书架，窗子下面放着一张写字台。房间朝北。从窗口望去，可以看见街道对面高大的公寓房子。维滕格尔的这所房子给我留下了阴森凄凉的感觉。热爱阳光、热爱自由的尤列克呆在这样的房间里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孤独，昏暗，终日不见阳光，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这些连我也难以忍受！尤列克一定是猜到了我的心思。他微笑着，如同要回答我心里的问题一样，他诚恳地对我说：“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我学习的时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裕。”我暗自怀疑这恐怕不是他的心里话，但是我不想点破这一点。

谁是尤列克的主人？他又是怎样找到他们的？这一次，自从尤列克离开霍季姆涅日村以后，他是比通常花了更多的时间、绕了更多的弯路才来到布拉格的。他说，我恐怕无法想像，他是从比尔森出发绕道普日布兰姆抵达布拉格的。沿途得到铁路员工们的保护。世上还是有许多好人！抵达布拉格后，尤列克先来到艺术家俱乐部，在那里他看到了雅尔米拉·霍拉留给他的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我们在德伊维采的寓所里有盖世太保。当时要想弄到一间秘密住所已十分困难，更何况正值夏季，许多熟人都离开布拉格到郊区去了。有一次，尤列克竟躲在干草垛里睡了一夜。幸好在第二天遇到了姨妈的一位朋友，结果便在奴斯列区他的家里过了一夜。

第三天，尤列克是在演员兹登涅克·史捷潘内克家度过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见到了女演员斯维耶特拉·阿莫尔托娃。斯维耶特拉先把尤列克留在她母亲家里住了一夜，然后把他介绍给一位同志，该同志在孔拉季采区教师史特尔茨兰同志的家里为尤列克安排了住处。事实上，尤列克早就认识史特尔茨兰同志。

后来，我跟斯维耶特拉·阿莫尔托娃同志和替尤列克在孔拉季采区安排住处的马特尔纳同志谈起这一时期的情况。马特尔纳同志叙述说：

“1939年我接受了建立三人小组的任务。在纳粹占领时期，这是党的基层组织。当时我们住在孔拉季采区。我发展了史特尔茨兰同志和斯特罗乌布纳同志入党。三人小组的每个成员又必须物色和发展另外三名新党员，但是，这一点三人小组中的其他两人不得知道。我们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这种规定。

这一时期我在弗尔肖维采区的霍乌什卡厂当安装工，在伊日国王大街的建筑工地上参加大楼的兴建工作。作为工人，我们意识到，抗击希特勒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对与我有来往的每个工人首先进行试探，摸一摸他们对希特勒和对苏联的政治态度如何。有时候我会碰钉子。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希特勒。

在新建的大楼里我认识了一位名叫阿莫尔托娃的妇女。她的女儿斯维耶特拉是一位演员。当我们彼此较为了解以后，斯维耶特拉对我说，她也要向我交纳党费。当时，我们

在兴建另一座大楼，1940年9月16日起我们也迁入该楼居住。1940年8月初的一天，斯维耶特拉跑来找我。她问我有没有空，要我到他们家去一趟。她悄悄地告诉我，有要事相商。我带上钳子和管子扳头装成前来修理设备似的，来到了阿莫尔托娃家里。他们将我引进一间房间，房间里有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正坐在书桌后面。斯维耶特拉问我是否认识那个男人。我说，我觉得很面熟，但不认识。当我听说他就是尤拉·伏契克后，不禁叫了起来：‘啊！他就是我所热爱的那位新闻记者！’因为我曾经卖过四年的《创造报》。伏契克微笑了一下说：‘听说你就是马特尔纳同志。’我回答‘是’。他对我说，他要请我帮个忙。我把满是油污的帽子拿在手里，问他‘要帮什么忙？’伏契克说：‘你瞧，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证件的〈黑人〉。我听说，你也是地下工作者。我想请你帮忙找一间房子。’我略略思索了一下说：‘房子总能找到。不过，可能你要睡在阁楼上。’伏契克笑容可掬地回答说：‘总比睡在盖世太保的班房里强吧！’他当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然后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房子。我让他第二天听我的回信。他对我说：‘好吧，雅尔达，明天告诉我吧。’这样，那天他便住在阿莫尔托娃的家里。

晚上下班以后我回到孔拉季采区的家中。到家后我立即找到史特尔茨兰，我对他说：‘奥尔达，我有要事和你商量。你一定认识尤拉·伏契克吧。’他说：‘认识。他怎么啦？’我说：‘他要找一个房间。’他回答说：‘行。我爱人正带着孩子们度假去了。就叫他住在我那里吧。不过有一

个问题：我们楼上住的是宪兵队长。’原来这是一座小别墅，共住着两户人家。楼上是那个宪兵队长，楼下是史特尔茨兰一家。史特尔茨兰对我说：‘可是，我大概要外出五天。’我说：‘这没关系。’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九时许我到了阿莫尔托娃家中。我对尤拉说：‘尤拉，房子找到了！很理想。你住在那边大部分时间是独自一人。不过，楼上却住着一位宪兵队长。’尤拉笑了笑说：‘没关系。这样我还有了武装警卫呢！’然后，我和尤拉商定了去孔拉季采的路线。公共汽车最晚行驶到晚上九点。我对他说：‘九点正将从卡切洛夫开出最后一辆14路公共汽车。你坐上这一辆末班车，便可以一直坐到孔拉季采。你要在终点站的前一站下车，我将在那里等你。’

那一班车的司机是弗兰塔·鲁季茨基。早上，当我从孔拉季采来到庞克拉茨时，我对鲁季茨基说：‘晚上有一位我们的同志要搭乘你的汽车。你必须等他上了车后再走。这位同志满脸胡子。’‘他是谁？’鲁季茨基问道。我告诉他是‘尤拉·伏契克’。他同意了。晚上他坐在公共汽车里等候尤拉，而尤拉却在九点零五分才到达车站。车上的乘客都生气了。他们责问鲁季茨基为什么不正点发车。他回答说：

‘请大家息怒！我必须以自己的手表为准。’当司机把尤拉拉到孔拉季采时，不巧，我是等在马路的这一侧，而尤拉是从另一边下车的；当他穿过马路以后，我还没有看到他哩。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他正向林子走去。我拔腿就追。但是，我却没有看见奥尔达·史特尔茨兰的踪影。我对尤拉说：‘你

先向林子的方向慢慢溜达。我把奥尔达找来见你。’后来，我在村子里找到奥尔达，叫他去找尤拉，而我自己则从旁掩护，看他们是否能接上头。他们终于接上头了。史特尔茨兰便把尤拉领回家中。

第二天，史特尔茨兰给我带来了尤拉的一封信，要我把它转交给斯维耶特拉·阿莫尔托娃。史特尔茨兰把信交给了我爱人博什卡。不言而喻，她把那封信拆开看了。结果，弄得我十分为难，因为第一，她本来对这些事全不知道；第二，万一我出了意外怎么办；第三，如果她要求和我好好地谈谈这些事情，这无形中又会增加我的负担。后来，我把这一切都向她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我对她说，我必须为党工作；这些人都是我们必须给予帮助的好人。

其它几个重要问题是：第一，史特尔茨兰要外出五天，尤拉将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的问题。史特尔茨兰虽然也有一书架藏书，但是，社会主义作品已从书架上取走。不过，尤拉总能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去消磨时光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膳食供应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尤拉在这所房子里一举一动都不得引起外人怀疑，说史特尔茨兰家来了个‘不三不四的人’。关于第二个问题——尤拉的膳食供应问题，则由我爱人一手包办了。我们每天前去探望尤拉。而他则每天留在房子里进行写作。

大约三星期后，布拉格的一位教师——哈奴斯同志把尤拉从这里带走了。傍晚时分，他们穿过林子步行到了庞克拉茨。尤拉在鲁季茨基家里睡了一夜，第二天跟着哈奴斯来到

弗尔肖维采的维滕格尔家中。”

上面是马特尔纳同志对许多年以前往事的回忆。

尤列克领我参观了维滕格尔的住宅。在房间对面，穿过狭窄的前厅是一间面积很小的厨房，厨房里有一扇几乎要碰到地板的低矮的小窗。从小窗向外眺望，可以看见放着许多垃圾箱的、不大的院子。厨房里摆着一个食品柜、一个碗橱、一张桌子、一台收音机、一张沙发、一把椅子和一个四面用隔热板挡好的炉子。在这个小小的厨房里我们几乎无法转身。碗橱上有一个用铁丝编成的大铁笼子，里面有一个木制圆轮，一只棕红色的松鼠正在圆轮上跳来跳去。我心里想，尤列克在这里总算不致于终日寂寞、孤单一人了。

这个住宅的主人是在1927年从苏联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维滕格尔同志的妻子是俄罗斯人。她现在教授俄语。维滕格尔的男孩根尼亚在技术专科学校学习。维滕格尔同志本人在鞋油厂工作。谈话间尤列克打开了铁笼子的小门，里面的松鼠飞快地径直蹿到了他的肩上。他们彼此宛如相处多年的好朋友一般。这只松鼠的名字叫做比比娜。

临近傍晚时分，维滕格洛娃太太回来了。她是一位惹人喜爱、活泼健谈的女人。一回到家里，她便洗呀扫呀地忙个不停，同时，整个屋里都可以听到她那滔滔不绝的谈话声。在寄居于他们家的那些日子里，尤列克和她只讲俄语。她能够和如此熟悉她祖国的人聊天，感到无比的喜悦。

维滕格洛娃同志回家后不久，他们的儿子根尼亚也回来了。他约莫十六、七岁，有点儿笨手笨脚，活象一只小狗

熊。他和尤列克经常形影不离。最后到家的是维滕格尔同志，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和说起话来喋喋不休的妻子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个狭小的厨房里，我和尤列克以及维滕格尔全家一共度过了十个夜晚。他们很想念苏联，因此常常谈起那里的情况。我们大家围坐在桌子旁边，尤列克、我和根尼亚坐在长沙发上，维滕格尔坐在桌子的一头，他的妻子坐在他的对面。谈得最多的是尤列克，因为在座的人当中，他对苏联的见闻最为广博。他最喜欢中亚细亚。在这样的时刻，狭小的厨房变成了莫斯科、克里米亚、列宁格勒，变成了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或者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难道还有谁能战胜苏联吗？决不会有！”老维滕格尔常常这样说。作为回答，尤列克则唱起了《游击队员之歌》、《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等苏联歌曲，其余的人也跟着唱了起来。

维滕格尔夫妇家中有一本苏联歌曲选。根尼亚常常用小提琴演奏它们，或者当他唱起这些歌曲时，尤列克、维滕格洛娃同志，我以及老维滕格尔便一齐跟着他唱起来。老维滕格尔唱歌常常走调，而我要想学会一首新歌又常常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当我第一次来到维滕格尔夫妇家中时，我们大家演唱了《女游击队员之歌》：

羽茅草沙沙作响，
青青的草儿象绿宝石晶莹闪光，
虽然风暴早已经停息，

英雄的往事却依旧在心中回荡。

人民齐奋起，要打倒反动派首领，

勇敢的哥萨克昂首上战场。

队伍前面有一位哥萨克姑娘，

她端着机枪猛烈扫射，

在她的掩护下游击队员们冲向前方。

她头发金黄，象收割时节的麦浪，

又象一顶金帽子戴在她头上。

她勇敢顽强，美名天下扬，

一次战斗中她倒在阵地上。

游击队员们用刺刀在广阔的草原上

为她挖好了墓穴，

再把青青的草儿铺上。

睡吧，亲爱的战友，在这清凉的小河旁，

安息吧，我们的同志，亲爱的姑娘！

羽茅草沙沙作响，

青青的草儿象绿宝石晶莹闪光，

虽然风暴早已经停息，

英雄的往事却依旧在心中回荡！

从一开始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因此，在纳粹占领时期，它成了我最爱唱的革命歌曲之一。傍晚，每当我与尤列克两个人在弗尔肖维采的花园和博季奇附近幽静的小道上漫步时，他使用口哨轻轻地吹起这首曲调。他能熟记歌本中的几乎全部苏联歌曲。他自己非常喜欢被沙皇政府流放的俄国革命者之歌《啊，命运呀，我的命运》。有一次，他对我说：“今天，我们在布拉格秘密地唱这首歌曲。当年在西伯利亚演唱这首歌曲的俄国革命者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啊！但是他们终于经受住了考验！”

尤列克和根尼亚同住一个房间。每当我到这里来找尤列克，根尼亚便主动搬了出去，和他的爸爸、妈妈三人一同挤在狭小的厨房里。尽管尤列克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两人可以住厨房，他们三人一定要住卧室，因为他们人多），但是他们却不予理睬。维滕格尔家中说话算数的是维滕格洛娃太太，最后还是由她决定，我和尤列克住到卧室中去。

第四节 论萨宾纳的变节行为 为反对叛徒而斗争

清晨，为了不妨碍维滕格尔全家忙于上班的准备工作，尤列克便独自一人留在房里开始学习了。起初，他手边可供阅读的书籍很有限，后来他逐渐弄到的好书越来越多。九月里，当我来到维滕格尔家找他时，他撰写的关于萨宾纳的著作正接近完成。在我和他共同度过的全部时间内，他依然十

分勤奋地学习和写作。为了谨慎起见，白天他深居简出，等到夜幕笼罩着街道和屋宇时，每隔一天我便陪同他（有时根尼亚也和我们一起）外出散步。大约在九月的下半月，我们三人——尤列克、我和根尼亚——一同去看望了普罗科波娃同志，尤列克把写好了的论萨宾纳变节行为一文的章节交给了她。正当我们民族受人凌辱和统治的时刻，尤列克的这篇文章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它讨论的是自由战士所应有的坚贞不屈和忠于他们自己所传播的理想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1940年10月，我们关于萨宾纳的著作问世。10月28日的《人民报》上便刊登了署名为“B”的作者的评论文章。该作者的真实姓名为爱德华·巴斯^④，他在评论中写道：

“德文珍本书《十九世纪初年以前捷克地区的剧院和戏剧》只是偶尔能在拍卖行或旧书店的图书目录上见到。通常认为，该书作者为列奥·布拉斯。某些图书目录透露，真正的作者是约瑟夫·斯瓦特克。旧本典籍中的这种谬误一直沿袭至今。最新的研究证明，列奥·布拉斯就是卡雷尔·萨宾纳，这是他在悲惨的晚年所使用的笔名。在《十九世纪初年以前捷克地区的剧院和戏剧》一书发表之日，许多读者也许无法相信，象萨宾纳这样的人还能写出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作品。然而，它确实成了捷克戏剧史上一部真正的经典著作，成了后人研究捷克戏剧发展史的重要依据……直到今天，由于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努力它才得以用捷文出版。萨宾纳在自己的著作里描写了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巴洛克时期至十九世纪初叶捷克戏剧的发展情况。在十九世

纪初期，布拉格戏剧舞台的统治权已从夸德拉索尼的手里转到利比希的手里。萨宾纳这部著作的价值还在于：他不仅仅满足于对戏剧艺术作学术上的研究，而且，他还从实践的角度十分注意演员和导演们的舞台生涯，因而为我们保存了有关他们各自特征的许多重要资料，这些演员和导演们昙花一现的艺术活动是萨宾纳从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从各种失散了的零星材料中收集和整理出来的，而我们中无论是谁今天是无法办到的！捷文译本除个别地方外，行文通顺流畅。当然，如果要保留巴洛克时期德语的特征的话，那么，女演员温克莱琳和诺伊贝琳的译名在捷语中不应该是温克莱琳诺娃和诺伊贝琳诺娃，而是温克莱尔卡和诺伊贝尔卡。出版者的下列做法还使捷文译本增添了不少光彩：一方面，译本中附有萨宾纳在《捷克蜜蜂》杂志上所发表的戏剧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证明，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的歌词作者萨宾纳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译本中还附有必要的注释，它可以作为原著的补充，同时对萨宾纳过时了的某些结论作了必要的修正。伏契克所写的关于萨宾纳变节行为的带结论性的评论文章虽然与原书主题没有直接连系，但是它是与原书作者萨宾纳的自我辩解密切相关的。伏契克认为，萨宾纳的变节行为是不能否定的，不过，它并没有给捷克民族造成损害；萨宾纳首先是背叛了他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思想，背叛了他所领导的运动。”

这是一篇大胆的评论文章，它客观地评价了尤列克的作品；尤列克自己也认为这一作品是好的，这一点从他给雅尔

米拉·普罗科波娃所写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来。尤列克在信中说：“即使现在这样，它也是个完整的集子。即便它就是我一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我也不会为它而感到羞耻。”

《评论月刊》Ⅳ第3期（1941年3月）还这样写道：

“……翻译出版萨宾纳历史著作的巨大意义首先在于把到目前为止分散的资料收集在一起。虽然补遗部分对许多史料作了修正，但是译文中还是存在着不少欠妥之处，这里暂且作两点小小的补充：比如，萨宾纳认为，1568年布拉格鼠疫流行，因此它成了没有剧院的城市；但是，门契克^⑤却指出，同年在布拉格曾上演了三场戏剧。又如在另一地方：萨宾纳认为，白山战役^⑥后早在‘1626年’布拉格便没有演过戏了；但是，根据门契克^⑤的资料是早在‘1621年’。捷文译文的标题也不够准确，会引起误解。萨宾纳写的是捷克地区的戏剧史，这与‘捷克戏剧的初创阶段’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捷克戏剧’应该包括摩拉维亚，而在积极开展戏剧活动方面，奥洛莫乌茨学院与布拉格学院相比是毫不逊色的。译文中在萨宾纳评论耶稣会会员的演出活动时，除了不时表现出情绪激动之处，还把德文‘*Krankhafte Geschmack-srichtung*’（病态嗜好）译为‘鉴赏力的畸形化’，我们认为这也是不恰当的。

本书编者由于对作品的偏爱而在某些地方言过其实。他在书后附上了萨宾纳在1846年《捷克蜜蜂》上所发表的报告选登。他认为，‘由于萨宾纳着重谈到了对表演技巧的评价问题而使这些报告引人注目。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些地方，

捷克戏剧评论界学习到的东西是最少的’。这种赞誉是与事实不符的。正好相反，对萨宾纳的报告我们只能重复一下萨宾纳自己无限感慨的话，这些话是他针对克拉麦里乌斯关于塔姆的爱国话剧‘布热季斯拉夫和伊特卡’（或称：‘修道院中发生的绑架事件’）的报告而说的。萨宾纳慨叹地说：

‘看吧，当时的捷克语言是个什么样子，报告人又是怎样看待历史剧的！除了对剧本情节和结构作了一些分析之外，看不见评价表演技巧的一点痕迹，一个字也没有说！’对于受到称赞的，萨宾纳在报告中对表演技巧进行了分析这一点，今天的读者将以同样惊异的心情发出这样的感叹：‘看吧，他们给后世留下的，对表演技巧的分析是何等的贫乏啊！’……诚然，他们无法把捷克评论文章寄给伏契克进行学习——而一个反面例子除外！当然，这样的例子他没有必要到1846年的《捷克蜜蜂》杂志中去找寻，这样的例子可惜在今天的戏剧专栏里完全可以找到。

最后，尤利乌斯·伏契克还把准备发表的、关于卡雷尔·萨宾纳的专论文章中的一小节附在书后。他没有替萨宾纳辩护，也没有替他恢复名誉；他认为，有关萨宾纳叛变的证据是无法推翻的。但是，他实事求是地——我们认为也是合乎情理地提出：萨宾纳不需要恢复名誉，而是需要对他重新评价。当然，如果伏契克断言：萨宾纳将自己的荣誉献给了社会革命运动的思想，因此他能够谈论萨宾纳在《我的申辩》中的话‘大部分是可信的’（比如：‘对我来说，最响亮的声音是我自己的良知和信仰的声音：我从来没有给民族的事

业和个人造成损害，从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灾难’），那么，我们奉劝读者略略翻阅一下巴斯^①的编年史《1848年大事记》，看一看有关萨宾纳案件的那一章吧。总的说来，萨宾纳论著的翻译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因为它又一次及时地指出了戏剧通史编写工作中的片面性问题。最近发表的埃·弗·布里安^②的某些论文和博加蒂雷夫关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戏剧一书也正在试图改变这样的片面性。”

尤列克就《评论月刊》上的批评文章给奥·吉尔加尔写了一信作为答复，现摘录如下：

“1.比如说，关于译文不确切的有力证据问题。据说，书名译得不好，会引起误解。又说，萨宾纳‘写的是捷克地区的戏剧史，这与捷克戏剧的初创阶段有本质上的不同’。我非常同意，是有所不同，不过，它是与客观现实不同罢了。在书中有关捷克戏剧的初创阶段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及。整本书的名字就叫作《捷克剧院的初创阶段》，这是与戏剧有所不同的；我们的译文之所以采用现在这样的书名，是因为它不只包括萨宾纳的那本书，而且还包括了他的一些报告。萨宾纳著作的书名现在翻译成《十九世纪初年以前捷克地区的剧院和戏剧》，它不会使任何见到过德文原文的人产生误解，因为它和原文的书名《Das Theater und Drama in Böhmen bis zum Anfange des XIX. Jahrhunderts》是完全吻合的。

2.据说，在修正萨宾纳作品错误的注释中有不少欠妥之处。是的，千虑一失是在所难免的。人多才能智广，所有

的人在一起才能弄清楚所有的问题。但是，作为不妥之处的佐证，有人说：‘白山战役以后，布拉格没有上演戏剧不是象萨宾纳所说的那样早在1626年，而是在1621年’。显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我们论萨宾纳的书中读到。他不但不承认那条注释，反而指责说没有这样的注释——我认为，这种做法是蛮不讲理的表现。这不是批评，而是诽谤。

3.批评文章的作者，在反对说萨宾纳并没有给任何一位捷克的著名人物造成损害这一点上，援引了巴斯编写的《1848年大事记》。巴斯的这一著作的确是一本好书，书中收集了许多杰出的肖像画作品。书的作者与其说是一位历史学家，倒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恰恰相反，我知道的是：正因为这样，该书才能如此引人入胜。然而，我从来不敢把它作为史料加以引证。在巴斯看来，恰恰是这个萨宾纳，虽然是十分有趣的人物，但却是极端的大逆不道。当然，我自己在塑造萨宾纳这个人物时也不认为他一切都好。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坚持作为判断的根据不应该是半文学性的编年史，而应该是我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如果对萨宾纳十分了解的弗里奇说，这个民族的叛徒没有给他造成损害，那么我总不能说，他给他造成的损害非常严重。这样的话，连弗里奇本人也会于心不安的。如此等等。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上次在《评论月刊》里他们就劝我读一读皮赫尔的著作，要我改变对雷蒂戈娃的看法。他们也许是一时疏忽。谁不知道：我不只拜读过皮赫尔

的作品，而且还读了雷蒂戈娃的作品，正是从这些作品中我获得了对雷蒂戈娃发表自己意见的勇气，如同我所说过的那样——我知道，现在没有时间进行这种无谓的争论，我也不想挑起任何论战。我也无意就批评是否公正、态度是否友善作出某种裁决，鬼才去管这些事呢！但是，我认为这一次的批评意见是不诚恳的——便中请将我的看法转告作者……”

我已经说过，萨宾纳一书发表后尤列克继续就萨宾纳问题进行研究和写作。1940年11月28日，我在民族博物院图书馆给他借来了萨宾纳的著作《塔博尔》。

我曾提到，当尤列克寄居于维滕格尔夫妇家中时，晚上锁门以后我才和他出外散步。父亲老维滕格尔借给他一根手杖，他则扮演起他常说的老气横秋的老夫子来。我们踮起脚尖、一声不响地走出门去，用无拘无束的步子横过马路，而当我们来到不远的、早已空无一人的波希米亚人运动场时，如果根尼亚跟着我们的话，尤列克便会用挑战的口吻冲着他说：

“来，看你追得上追不上！？”接着他就奔跑起来。果然，年轻许多、但跑步速度较慢的根尼亚从来都追不上尤列克。尤列克极善于奔跑。跑步是很好的锻炼，对整天被迫坐在屋里的尤列克来说尤其是这样。虽然每天早上他都坚持做早操和兴致勃勃地进行冷水浴（尽管当时已到了寒气袭人的深秋季节），但是，这一切又怎能代替在户外新鲜空气中的活动呢！

早上，当维滕格尔夫妇出门以后，我和尤列克把茶烧好，然后吃上一点儿甜面包或者面包片。我吃早饭比他要快

得多，因此，他常常是一个人一面看着根尼亚每天替他弄来的报纸，一边继续把早饭吃完。上午，有时候他把关着比比娜的铁笼子的小门儿打开。正在蹬动小轮子的比比娜立即停了下来，它那双敏锐的小眼睛发现了开着的小门儿，接着就是一跳，立即跳到尤列克的肩膀上，而他便把它带到房间里去。当尤列克在桌边坐定以后，比比娜便跳到书桌上，那里正放着尤列克为它准备的一小块糖。比比娜以优美的姿势用前爪捧起糖块，坐了下来，小尾巴高高地翘在空中，然后敏捷地啃了起来。当它吃完糖块以后，便在桌面上四处跑上一会儿，接着又跳到尤列克的肩上。当它还显得老实、听话时，尤列克便让它玩一会儿。但是，当它从肩膀上到桌子上，从书堆里到纸堆里欢蹦乱跳、来回乱窜时，尤列克便对它说：

“亲爱的比比娜，你不乖了，你必须蹲班房了！”接着，他便把它送回笼子里去，比比娜跳到小轮子上，从一个横杆跳到另一根横杆，直到使小轮子飞快地转动起来，也许比比娜生气了吧！

房间里已经很冷，腿上和手上已感到寒气袭人。尤列克常常放下工作站起身来，不时地象破冰工人那样甩动着两手。在那令人不快的房间里我开始体会到了他所说的话的真正含义，他常常对我说，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冷清和孤单。在他所到之处，他都能创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生活的环境，而我却只能屈从于环境的摆布。

1940年秋，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收买和诱骗捷克知识分子为第三帝国效劳的消息使尤列克十分气愤。这年九月，戈

培尔邀请了几十名捷克新闻工作者、艺术家和音乐家来到柏林，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声明，这个声明后来还登载在各主要报刊上。面对这个奇耻大辱，尤列克决不能保持沉默。他通过到维滕格尔夫妇家中来找他的联络员斯维耶特拉·阿莫尔托娃——她负责捷共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委员乌尔克斯同志和尤列克之间的联络工作——向组织表示，他要为保卫正直的捷克知识分子说几句话。当尤列克读完戈培尔的声明以后，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立即向戈培尔写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说：“我们——捷克音乐家、演员、作家、工程师们，被你们的书报检查机关封住了嘴的人们，被你们的白色恐怖捆住了双手的人们，我们——捷克的知识分子们，当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正在你们的监狱和集中营里遭受非人的迫害的时候，我们向您——戈培尔部长，作出我们的回答：您听着，我们决不背叛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决不会为你们效劳，我们决不会为黑暗势力和强权政治卖命！”

声明全文热情地捍卫了绝大多数正直的捷克知识分子，他们在抗击占领者的斗争中忠贞不渝地和人民站在一起。

在维滕格尔家中又开始重现了我多么留恋的时光：尤列克伏案写作，我则在看书。他不时地把头抬起来喊一声：

“古丝蒂娜！”同时以一种充满歉意的目光看着我，好象在说：他对于只能呆上很短时间的我的关心还比不上对工作的关心哩，而我则象回声一样地喊着他的名字：“尤列克！”有时候他对我说：“我真想再念一段给你听听。”我便专心

致志地听他念了起来。他从事记者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能够完全公开地写东西，用不着担心它们会受到检查和歪曲。他真想看一看盖世太保们读到这篇使第三帝国威信扫地的文章时的尴尬相。他全神贯注地写着：

“一年半以来，你们妄图以恐怖手段迫使我们跪倒在卐字旗下。但是，你们在疯狂叫嚣了一年半以后，今天连您——撒谎成性的纳粹宣传部长大人——也不得不承认：你们的法西斯手段已毫无用处，我们还在继续‘顽抗’。是的，承认事实是可以的，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但是，如果您这个下流的骗子手以为，我们——来自捷克人民的捷克知识分子——会不如我国人民那样刚直不阿、坚贞不屈；如果您以为，您能轻易地欺骗和吓倒我们，迫使我们脱离自己的人民，跟随您的盖世太保去反对人民——如果您是这么想的话，那么您再听一听我们的回答吧：不，不可能，决不可能！”

这篇声明后来以秘密传单的形式散发了。



我们分别的日子来到了。我记下了我应该送到吉尔加尔处去的书刊目录。这些书刊都可以在我们家里的书架上找到。根据我的回忆，它们主要是聂鲁达的诗集和散文集。尤列克准备写一篇有关聂鲁达的论文，他现在要开始收集素材。此外，我要把我们在德伊维采的寓所的情况告诉他，我要把他放在霍季姆涅日村家里的那件冬大衣给他送去；我还必须为维

滕格尔全家搞一些不要票证的猪肉和猪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下一次怎样见面。我们商定，尤列克还是先往霍季姆涅日村给我寄一张明信片，然后，我到布拉格去找吉尔加尔，他会告知我如何去找尤列克的。

我悄悄地离开了维滕格尔夫妇的家。我已经不能再进他们家的门了，虽然我在布拉格还要逗留几天。尤列克又成了孤身一人，只有书籍和那只小松鼠和他作伴了。

我向位于德伊维采区的我们的寓所走去。上午，弗尔肖维采区和维诺赫拉迪区交界处的小胡同里几乎是空无一人。半小时后，我来到了熙熙攘攘的瓦茨拉夫广场，从这里我可以放心大胆地乘有轨电车前往德伊维采了。

我从德伊维采公寓大楼第七层的电梯里走了出来。当我刚走了几步时，突然，我们家邻居的房门打开了。雅尔米拉·霍拉从门缝里伸出头来，向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一步迈进门去。她立即把门轻轻关好。过去许多合乎情理的事，在纳粹占领期间却变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往，当我来到他们家时，我可以毫无拘束地按响门铃，她也大大方方地把门打开，然后，我们彼此都大声地寒暄、说话。可是，现在却完全不同。心怀疑虑和审时度势会使你变得谨言慎行，然而这样一来反而会引起别人对你的怀疑。

当我们进入里屋，再没有人能听见我们的谈话声时，霍拉太太问道：“您知道吗，盖世太保在你们家住了两个星期呢！”我装成被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十分诧异的样子，我说：“他们没有钥匙，怎么能进我们家呢？我的一把钥匙是

放在你们这里给女清洁工预备的。”“正因为这样，”她回答道。“是看门人带着两个便衣盖世太保先来找我的，他要我把你们家的钥匙交给他们。我只好把钥匙交了出来。他还主动对盖世太保说，他可以把你们家的门锁撬开。他们走后，我立即到艺术家俱乐部去，给尤拉留了个条儿，叫他千万别回家。盖世太保在你们家住下了，由看门人替他们到饭馆去买饭。他们一直在等尤拉回来。他们还不断向我打听，他是干什么的，现在他在哪儿。我对他们说，我基本上不认识他。难道我能告诉他们，我曾经向他通风报信吗？您也别告诉看门人夫妇，说您已经知道盖世太保搜查过你们家了。尤拉现在在哪儿呢？”“我不知道，”我耸了耸肩膀回答了一句。

我告别了霍拉太太，蹑着脚来到走廊上。我开了我们家门上的锁，推门一看，只见两个房间的嵌木地板上被踩得污泥满地，好象有一队士兵在这里操演过一般。沙发床的罩单也脏极了，如同有人穿着皮鞋在它上面睡过觉似的。书架上的图书似乎依旧是那样井然有序，但是许多本书已经变换了位置。尤列克和我的大学记分册，以及我中学毕业的成绩单都不翼而飞了。

我来到看门人夫妇家里，向他们询问我们家出了什么事。看门人的妻子对我说：“唉呀，难道您不知道，盖世太保还在你们家住过呐！”“他们哪来的钥匙？”我问道。“从霍利家要来的，”她回答。“他们怎么会知道霍利家有我们家的钥匙呢？”“我丈夫知道嘛，是帮你们家打扫卫生的那

个妇女告诉我们的，她说她每次都是到霍利家去取钥匙的。”接着，看门人走了进来。我问他，为什么把我们家的钥匙泄露出去，他说：“难道为了你们要我去蹲班房不成？”我要他还我钥匙，但是他回答说：“盖世太保把它们拿走了。他们还给您留下口信，要您自己到盖世太保司令部去取呢。”我旁敲侧击地说，盖世太保司令部的先生们了解我这个人。“他们还传话给您说，”他补充了一句，“如果您胆敢替您丈夫去领取粮票，那可有您好瞧的！”

我来到德伊维采捷克警察分局。我报告说，我不知道盖世太保正在通缉的我的丈夫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希望了解一下，我是否应该注销他的户口。“您为什么要注销他的户口呢？”一个捷克警官这样劝我。“现在您还无法知道，他是否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是不可能失踪的。”因此，我只是注销了尤列克的购粮证，而他在布拉格我们寓所的户口一直保留到他被捕时为止。

我偷偷地把寓所门上的锁换掉，这一点就连看门人也不知道。我把尤列克需要的书刊交给了吉尔加尔。在斯米霍夫区的丁岑霍费尔果园里，我和根尼亚·维滕格尔接上了头，但是我们都没有说话。当我们迎面相遇时，我把给尤列克的写着有关我们寓所情况的一个小纸团偷偷扔在地上。我只是以目示意和根尼亚告了别。我走后，他才把那个小纸团从地上捡了起来。后来我便回到了霍季姆涅日村。我们家的房客、铁路工人季霍塔——他是得到我们充分信任的人——热情、主动地把尤列克的冬大衣和一只小皮箱带到布拉格的吉

尔加尔家里，在那只小皮箱中放有大约三公斤猪肉和两公斤猪油。

在霍季姆涅日村我开始为《行动》出版社翻译另一本书《农民贵族》，它是德国作家埃·布斯的作品。

第五节 尤列克在庞克拉茨定居

十月，我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来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这就是说，又到了我去布拉格的时候。几天后我出发了。妈妈事先宰好了一只母鸡，叫我随身带去。到达布拉格后，我在吉尔加尔家里看到了一封信，信中附有地址和去弗尔肖维采区马特尔纳夫妇家路线图的详细说明。当时我还不认识马特尔纳夫妇一家。

我问吉尔加尔，是否有人来过他家把铁路工人送来的东西取走了。他说，来过一位小青年，他取走了冬大衣，但是，那只皮箱仍然放在店里。“我求求您，”吉尔加尔说：“请您安排一下，叫他们赶快把它取走吧。现在它都已经臭不可闻了！”“您说的是那只皮箱吗？您没有把它交给那个来取冬大衣的小伙子吗？”我惊愕不解地说。“没有呀！因为没有人对我说过，那只箱子也要交给来人呀！”吉尔加尔回答说。“您知道，里面放着的是什么吗？”我大失所望地问。

“我不知道呀，”他尴尬地回答说。“是猪肉和猪油！”

尤列克吩咐我办的、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的这一箱食物竟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后来，这只皮箱还叫我

们费尽了心机，才让根尼亚从吉尔加尔店中把它取走；而当根尼亚坐在有轨电车里时，他又象形迹可疑的小偷一样遭人白眼；后来马特尔纳又不得不把全部食物扔到锅炉中去；为了至少能把空箱子保留下来，马特尔诺娃同志又洗呀、擦呀的奋战了一场，极力想把恶臭洗掉，但是，这一切都白费气力。最后这只皮箱也只好扔进锅炉中去付之一炬了。）

我乘车往弗尔肖维采区走去。我又穿过了布拉格的许多街区。赫拉德恰尼城堡^⑨雄伟壮丽地矗立着。尽管上面挂着一面希特勒的卐字旗，但是它却丝毫无损于这个古城堡的光辉。尤列克常常这样说：“我们迟早要把那面破旗拔掉，升起我们的红旗，它将永远在这历代帝王居住过的古城堡上空飘扬！”

马特尔纳一家居住在伊日国王大街19号。马特尔纳同志是一位安装工，同时兼当看门人。当我通报了自己的名字以后，马特尔纳全家热情地欢迎我，给我让座。我等待着尤列克的到来。但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的踪影。又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们是否有给我的便条或口信。他们要我到庞克拉茨区去问问德拉贝克夫妇。德拉贝克是尤列克过去的同学。我们叫他史克拉贝克。

在德拉贝克家中我只碰上了他的妻子和小孩。我和我的妻子从前并不认识。她是一位十分健谈的妇女。他们的四岁左右的小男孩十分伶俐聪明。当我摸清了这家的情况后，我无法理解尤列克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隐藏下来。我决定暂时先不去打听有关他的情况。我只询问了一下，德拉贝克在

什么地方。德拉布科娃太太说他还在上班，傍晚时分他就回家。我起身告辞，说还可能来打扰他。我又回到了马特尔纳夫妇家中。我请求马特尔诺娃同志，能让我暂时住在他们家里，因为我无意到布拉格街上去瞎逛。她回答说“非常欢迎”。我认识了他们的小孩和他的俄文教师、一位年轻女子。她就是克拉拉·卢吉茨卡同志。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这个名字。

我又来到庞克拉茨。德拉贝克把我领入房内。“尤拉近来好吧!?”他这样问道。听他的口气，他对尤列克毫无所知，虽然向我介绍有关尤列克最新情况的人本来应该是他。我也正是为此而来的。我还是再一次不谈尤列克为妙。我没有回答德拉贝克，却反问了一句：“有我的口信或便条吗?”“什么口信?谁给您的?”他迷惑不解地说。我重复了一句：“你们这里应该有给我的口信。”他摇了摇头说：“我是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可以问问我爱人。”当他和妻子说话时，我编造了一个情节：我有一位女友从比尔森到布拉格来，她应该在德拉贝克夫妇家里给我留个口信，约我在什么时候和她见面。但是，德拉贝克夫妇都不知道。临别时我对他们说，也许晚上我还要来麻烦他们。

怎么办?到哪儿去找尤列克?但是我必须把他找到!再到马特尔纳夫妇家去走一趟吧!我懊丧地对马特尔诺娃同志说：“真叫我莫名其妙了：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德拉贝克夫妇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你们中总应该有人知道消息的!”为了谨慎起见，我和马特尔诺娃同志彼此都没提尤列

克的名字。我们相对无言，面面相觑。她显得犹豫不决，我则执拗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突然，她对我说：“您在这里稍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说完她便走了出去。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她回来了。她转告我，要我再到德拉贝克夫妇家去一趟，然后在那里等候。

那天我第三次按响了德拉贝克夫妇家的门铃。我借口说是来等候到他们家来找我的那位女朋友的。我的心里却直打鼓，担心是否真有人到这里来找我。快到晚上九点钟时，门铃响了。德拉贝克出去开门。他领着一位我完全不认识的中年妇女来到厨房。我本能地猜到，她是来找我的。她向四周巡视了一番，然后把目光紧紧盯在我的身上。我装出正在等她的样子。她也不认识我，然而却丝毫不露声色。我们俩告别了德拉贝克全家，趁大楼上锁之前走出门去。

我们走到夜色深沉的街道上，彼此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我问那个陌生女人：“要走很远吗？”“不，一会儿就到。”她用亲切的声音安慰我说。我们沿车行道走着。一不小心，我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真够黑的！”我咕哝了一句。一路上我们两人没说上几句话。大约十分钟后，陌生女人在一座公寓大楼的正门边停了下来，她打开门上的锁，领着我走了进去。在二楼，她把钥匙插入一间房子的门锁里，打开房门，我们便走了进去。

在狭小的、明亮的前厅里我看见了尤列克。我高兴得大叫了一声。但是，当我看见他那胡子拉碴的脸时，不禁心里一怔。他的整个下巴都被浓密的胡须盖住了。他把食指放在

嘴边，示意我要小声说话。接着，他便将我一把拉到怀里，然后领着我来到卧室，那里有一个陌生男人正坐在凳子上。我觉得那位男人很面熟，但我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了。尤列克替我解开了心上的这个疙瘩。他说：“这位就是象棋选手卡雷尔·奥波琴斯基！1935年我从莫斯科给你的信就是托他带的！”而那位给我带路的妇女便是斯拉芙卡·吉捷托娃同志，她是卡雷尔·奥波琴斯基的爱人。他们住在庞克拉茨区纳维塞利街3号楼，2层，8号。

我向尤列克讲述了我所经历的“远征”。他微笑着对我说：“你瞧，传错话多害人啊。我本来是叫你到德拉贝克夫妇家去，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能否留我们俩人住几天。当然罗，德拉贝克不可能知道我的情况。这正是要你去告诉他嘛！”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今后传话——一个人事小，但是那些每个字都至关重要的话怎样才不至误传，这还是个大问题啊！”

斯拉芙卡·吉捷托娃和卡雷尔·奥波琴斯基两间一套的房子陈设得相当讲究。他们还有一个小厨房和各种卫生设备。主人把全套房间留给我们使用，自己则到布拉格郊区去住几天。他们居住的这所公寓是一座新楼，隔音设备极差，隔壁邻居或上层住家的一举一动我们在房子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当他们放水冲洗时，就如同在我们房子里冲洗一样。因此，我们干什么事都必须轻手轻脚、十分小心，生怕被人发现房子里有人居住。我们只穿布鞋走路，说话轻声细语，只在夜深人静时才开窗放放空气。尤列克收听广播时，我们

必须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才能听清消息。我们经常收听捷语、俄语、德语和法语的广播。当时，希特勒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他已经占领了欧洲的大部。纳粹大兵已开进巴黎。德国飞机还轰炸了伦敦。祖国的解放已变得更加遥远，但是我们依然坚信：希特勒总有一天要垮台。

我给尤列克带来了晨衣，就是圣诞节时他得到的那一件。天气已经很冷，但是房子里还没有生炉子。他立即穿上晨衣，连声称赞说，他身上可暖和多了。我们不能到房子外面去。我们也没有钥匙。住在斯拉芙卡家的全部时间内（10—14天左右），尤列克一次也没有出过房门。有时候，特别是越到后来，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许比蹲监狱还要糟糕。但是，不论在当时或者后来，尤列克都毫无怨言。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被迫留在房子里的时间还要长得多，他唯一的“散步”就是：他只能在夜阑人静之际把头伸到窗外去呼吸一下布拉格的“新鲜”空气。

斯拉芙卡家中再没有一点儿余粮了。幸好我带来了一只鸡，妈妈在打包时又放进了一些做汤用的挂面。我们把鸡煮了一大锅汤，每顿吃上一点儿，这样坚持了三天。以后我们便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第四天我们的肚子空了。为了忘掉饥饿，尤列克不时地开着玩笑。当我提到我多么想吃上一块面包时，尤列克便反驳说：“夫人，您这是怎么搞的，昨天您不是还吃过面包吗？您那一顿饭至少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呢？”

尤列克回想起放在我们布拉格寓所里的弗里奇的《回忆

录》。“你还记得我们在沃吉奇科瓦大街的旧书店里买到那本《回忆录》时的情况吗？三大本共四卷只花了50克朗，多便宜啊！”他抚摸着胡子拉碴的下巴，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夏天，他还在霍克尔旧书店里找到了多布罗夫斯基著《捷克语语法》的旧版本。当时他身边没有足够的钱，无法立即把它买下来，因此他在旧书店留下了50克朗的押金。“我们有钱时，你一定要把多布罗夫斯基的语法书取回来。”他这样嘱咐我。

斯拉芙卡·吉捷托娃和卡雷尔·奥波琴斯基有一个很大的藏书室。借阅图书我们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尤列克却很想弄到弗里奇的《回忆录》。可惜，奥波琴斯基也没有这一本书。否则，现在尤列克正好能安安静静地把那本书读完，因为他当时只是暂时居住在这里，谁也不会来打扰他。

饥饿终于迫使我走出门去。“如果你要走，”尤列克说，“那么你悄悄地到我们的寓所中去一趟，把弗里奇的《回忆录》给我带来。”我出了房门。大楼里鸦雀无声，到处都不见人影。如果一切顺利，我将在晚上七点赶回家来。但是我不能去按门铃。届时尤列克将在前厅里等候给我开门。我还有足足半天的时间出去办事。我步行下坡来到奴斯列区，在那里乘有轨电车到德伊维采区去。

我们寓所的情况与一个月前我们离开家时没有两样。我从书架上取下弗里奇的《回忆录》，又悄悄地走出门去。首先，我到了不远的斯特罗莫夫卡，我穿过这个公园，当我确信无人跟踪时，便来到街上，买到了凭票供应的香肠和面

包。我准时回到了尤列克的身边。（我给他带回来的弗里奇的《回忆录》一直留在奥波琴斯基处，解放后他把该书还给了我）五天后，房子的主人回到了布拉格，我们又开始商量起尤列克搬家的事。

1940年10月下半月的一天，尤列克离开了斯拉芙卡的家。当时，我们一起等候着前来带尤列克的同志。谁也不知道，他将到哪里去，他将到什么样的人家去。我心烦意乱，几乎是一言不发。尤列克却拿他的长胡子开着玩笑，他说，当新主人看见他这把胡子时，一定会把他当作山里的护林人！如果他们把他拒之门外的话，他只好再回到斯拉芙卡这里来。晚上七时左右，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尽管我早有准备，但还是把我吓了一跳。我和尤列克躲进隔壁房间，斯拉芙卡出去开门，一会儿后，她把尤列克叫了出去。

房里只留下我独自一人。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眼呆呆地望着尤列克随手关上的那扇房门。我在斯拉芙卡家里这件事，来客是不许知道的。不久，尤列克又走进来见我，此刻他已经是整装待发了：他身上穿着皮大衣，头上戴着礼帽，腋下夹着一个包着晨衣和拖鞋的小包。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眼睛里现出了对难以捉摸的未来感到好奇的神色。

他轻轻地说了一句：“我又要走了！”“到哪里去？”他只是耸了耸肩膀。“再见吧，古丝蒂娜！”“再见，我的尤列克！”

我还隐约地听见他那远去的脚步声。他的生命完全掌握

在他正向他们走去的人们的手中。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否欢迎他的到来？他们能收留他多长的时间？他们的食宿条件又怎么样？这一切尤列克全都无法知道。当时在我们国家里有着许许多多的革命战士，他们遭受着盖世太保的搜捕与迫害而不得不过着秘密的地下生活。

最后，我也告别了斯拉芙卡，来到德伊维采的寓所。我到看门人家里去领取粮票。看门人冲着我大发雷霆，责问我为什么把门锁换了，又不跟他说一声。“盖世太保又到你们家来了。他们打听您家先生的下落。你们家房门上换了新锁，他们对此非常生气。我可不愿意为你们去坐牢！”我回答说：“当溜门撬锁的小偷撞到你们家来时，您肯定不会张贴这样的告示：‘小偷先生，请注意，我家已换用新的门锁了！’”

我回到霍季姆涅日村，那里已经是漫天大雾、遍地泥泞的季节。白天越来越短，而且常常是天色阴沉、淫雨连绵。这种季节性气候的到来在山麓地区比之于布拉格要早得多。当时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村长打听一下，他能否替我弄一张已经死亡的中年男子的户口证，尤列克需要用它去冒名顶替。村长的回答躲躲闪闪、含糊其辞。他担心受到连累。村里的人都问我，尤列克现在什么地方。我耸耸肩膀，回答说“不知道”。他们说，他肯定在莫斯科。我对此也不置可否。只有那位老雇农（那位偷偷来祖布日纳河钓鱼，被村长没收了钓竿，而尤列克又把它归还给他的那位老爷爷）常说：“共产党人就有那么一股子倔强劲儿。不管别人怎样迫

害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或者枪毙，他们对这一切都毫不在乎。他们为之奋斗的那种思想使他们成了流芳百世的英雄！”

我继续为《行动》出版社翻译德国作家的作品《农民贵族》，照管我们家的狗、鸡、兔和山羊。四个星期以后，我又装成牙病发作，必须到比尔森去的样子。其实，我和尤列克早已商定，过四、五个星期后我将前去找他，晚上先到斯拉芙卡·吉捷托娃家去等候消息。

我又从霍季姆涅日村来到比尔森，甚至还真的去看了牙科医生。晚上在比尔森过了一夜。第二天从比尔森来到布拉格，又到了庞克拉茨区斯拉芙卡·吉捷托娃的家里。晚上八时以后，她领着我走了出去。我们沿着马路往上走去。十分钟后我们穿过了电车道，绕过一道围墙，然后在街道拐角处的一座大楼门口停了下来。四周空无一人。我们走进楼去，上了楼梯。我无法知道这座大楼的高度。我们两人都没有带手电筒，所以只好不时地划一根火柴，借着它那微弱的亮光摸索前进。我们浓黑的身影在墙壁上来回晃动。斯拉芙卡终于在四层楼上停住了脚步，在17号房门口按响了门铃。我们等了一会儿后，一位陌生的年轻妇女开了房门。我们蹑着脚走进一个狭小的前厅。那位妇女随即把门关上。我们微笑着，握了握手，然后把大衣脱去。青年妇女把我们领到一间窗帘紧闭的房间，那里正坐着一位青年男子。斯拉芙卡认识这两个青年人。我环顾四周，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尤列克是否在这里？或者我还要到别处去？陌生的青年人从一扇小小的房门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个

人——满脸胡须的尤列克！他现在的秘密寓所是：庞克拉茨区，车库后街（即今天的多乌德列普斯卡街）2号，巴克萨夫妇家。瓦茨拉夫·巴克萨是一位国家机关的技术工作人员，他的妻子约什卡·巴克索娃是克尔奇地方小学教员。约什卡·巴克索娃的堂妹利杜什卡·普拉哈也住在他们家里。

尤列克是怎样转移到瓦茨拉夫·巴克萨家去居住的呢？十月中旬，当我在斯拉芙卡·吉捷托娃家和他告别时，奴斯列区中学校长哈奴斯同志前来把他带到只有一街之隔的马沙同志夫妇家里。据说，当时尤列克他们如同行踪诡秘的窃贼一样离开了斯拉芙卡的家。哈奴斯同志不时警惕地四下张望，生怕他们被盖世太保发现。幸好斯拉芙卡居住的那座大楼向来不怎么热闹。你要找人的话，通常用不着左顾右盼，只管大胆地照直走去。但是，哈奴斯同志对尤列克的安全感到责任重大，因而变得格外谨慎小心，甚至要引起别人的怀疑了。尤列克说，幸好漆黑的夜幕和全城的灯火管制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转移。哈奴斯同志领着尤列克横穿过马路，来到对面马沙夫妇居住的大楼里。大城市的居民即使是住在同一条街区，甚至在同一座大楼里，他们彼此往往也互不相识。斯拉芙卡·吉捷托娃的确不认识马沙家的人。她也不知道，哈奴斯和尤列克从她家出来以后只是横穿了一条马路。当他们来到马沙夫妇居住的公寓大楼门口时，哈奴斯按了一下电铃。马沙同志立即跑下楼来，把他们俩带上电梯。上楼后，他轻轻地打开房门，然后摸黑把客人领入卧室。马沙同志的妻子马肖娃同志后来告诉我，当时他们都提心吊胆、十分害

怕，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尤列克是盖世太保正在追捕的逃犯。但是，尤列克却是所有人中神色最为镇定的一个。她当时是头一次见到尤列克。据说，他还因自己满脸胡子而向她表示了歉意。

在马沙夫妇家等候尤列克的还有一位陌生的男人，他的任务是把尤列克安全转移到秘密寓所去。经过介绍，尤列克才知道他就是约瑟夫·维苏希尔^⑩。接着，他们三人——尤列克、哈奴斯和维苏希尔立即离开了马沙的家。尽管来去匆匆，马沙丰富的藏书还是吸引了尤列克的注意。他说，以后他一定要再回来好好地看一看。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他们乘电梯来到一层，摸黑出了大楼。他们把尤列克领到了瓦茨拉夫·巴克萨夫妇家中。当时家里只有巴克萨同志的妻子约什卡一人。虽然维苏希尔同志曾预先打了招呼，说尤列克长着满脸胡须，但是约什卡还是被他吓了一跳。就连以后回到家里的利杜什卡在看见尤列克时也是“望而生畏”呢！巴克萨同志当时不在布拉格，他到外地出差去了。他也没有料到，回家后他竟会看到一个模样如此古怪的房客。虽然事前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意，约什卡还是把尤列克领到了家里，因为他当时必须立即从斯拉芙卡·吉捷托娃家中转移出去。瓦茨拉夫·巴克萨同志回家以后，很快便和尤列克成了好朋友。他们夫妇都说，尤列克可以在他们家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即使呆上两年他们也绝无怨言。当时我相信，希特勒离垮台的日子还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哩！

巴克萨夫妇家一共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厨房。他们和利

杜什卡挤在一个房间里，而把另一个房间腾出来供尤列克使用。尤列克是在冬天来到他们家的。白天，他独自留在巴克萨夫妇的卧室里工作，因为那里生有取暖用的炉子。在纳粹占领时期供煤不足那是常事。直到下午或黄昏到来之际，巴克萨他们才陆续回到家中。巴克萨的房子居高临下。每逢天气晴朗，我们便可以透过窗户把庞克拉茨、布拉格市中心、古老的赫拉德恰尼尽收眼底。在能见度最佳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望见令人永志不忘的日普山。

在巴克萨夫妇的房间里，尤列克甚至能用打字机写作了，打字机是同志们后来给他弄到的。但是，在“他的”房间里可不能使用打字机，因为在它的隔壁住着一对夫妇，他们常常爆发激烈的争吵。他们的吵骂声如此之响，以致我们不只能听清每一句话，而且我们不由得会用手指把耳朵堵起来。因此，在“他的”房间里只能低声细语地说话。我们听惯了她声音的那位邻居主妇，当她外出时，还常常把她的小儿子托巴克萨夫妇临时照看。尤列克对那个呀呀学语的小东西开玩笑说：“你是不会把秘密说出去的，因为你连说话都还没有学会哩，对吗？”

巴克萨的房间阳光充足、色调明快。室内陈设着浅绿色的、用软杂木制成的家具。在墙角靠近窗台的地方放着一架收音机，离收音机不远的墙上尤列克挂了一张欧洲地图。当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他用大头针在那张地图上标出了纳粹军队调动的情况。房间里不许吸烟——这是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因为约什卡正患着支气管炎。尤列克抽烟时必

须到房间后面的小厨房里去。另外，当某一位不速之客撞了进来而尤列克又来不及退到“他的”房间中去时，他也常常暂时躲进厨房里去。在尤列克住宿的房间里则摆着深褐色的家具：一张沙发床、一个茶几、几把椅子、一张写字台、两个沙发、一个大衣柜和一个餐具柜。在这个餐具柜里，厨房用具日益减少了，而书报杂志却越来越多。有些书报杂志原来是放在写字台上的，或者放在抽屉里，或者堆在写字台的旁边，最后尤列克只好把它们塞到餐具柜里去了。直到现在，他仍然不停地收集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尽管他自己终日足不出户。每一次都由我到霍克尔旧书店去把出售的新书目录抄好寄给尤列克，然后，我根据他圈定的书单和我们的经济情况前往选购。

他的连腮胡子已经是又密又长，但是当时却无法找到一位可靠的理发师。他想，至少得先把胡子染成别的颜色。然而，后来发现：即使是很浓的氧化物溶液也不能使他那卷曲、乌亮的胡子的颜色有任何改变。他周围的同志们早已经是“须发皆白”，而只有他依然留着一头乌黑的须发。仅仅在他的嘴角四周，有些胡须才微微发黄，但这也不是氧化物溶液起了作用，而是他抽烟的结果。他习惯于抚摸自己的胡须，特别是当他写作时，或者当他听到讽刺希特勒纳粹分子们的精彩的政治笑话时尤其这样。

在巴克萨同志家中，尤列克撰写了秘密小册子《敌人宣传工作的两条阵线》去反对为希特勒效劳的捷克法西斯分子（宣传部长莫拉维茨和捷克法西斯刊物的编辑拉日诺夫斯基

和瓦伊陶埃尔)和侨居伦敦的、反动的原农民党头目们。可惜该小册子并没有写完,虽然手稿还是保留下来了。

第六节 《罗伊》青年杂志^②与 《回忆世界之窗》

1940年10月,奴斯列区中学校长和《罗伊》青年杂志编辑哈奴斯同志来找尤列克,希望与他合作,共同把那份青年杂志办好。对尤列克来说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他从来没有为青年杂志撰写过稿件;但是,出版杂志这件事对他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他也十分愿意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以期能和广大读者交换看法、沟通思想,因为青年杂志的读者也不仅仅是青年群众,还有他们的父母。哈奴斯建议,尤列克可以为《罗伊》杂志撰写文艺方面的文章。后来他们还长时间地谈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尤列克撰写有关民族复兴时期的文章,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周围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哈奴斯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他担心杂志会遭到被查封的厄运。尤列克对哈奴斯的意见考虑了很久。他多么希望能使青年一代更加热爱伟大的捷克作家、更加热爱捷克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激起他们对统治者——不管是捷克的或德国的统治者——的仇恨。但是,决不能让《罗伊》杂志被敌人查封,要知道,法西斯的书报检查是非常严格的。因此,他的文章一方面必须能巧妙地躲过法西斯文化鹰犬的眼睛,另一方面又必

须使读者明白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主要含义，如果青年读者不能理解的话，那么必须使他们的父母能揣摩透它的意思。在纳粹占领的艰苦岁月里，人们已习惯于仔细揣摩、反复推敲他们所读到的东西，他们总是希望能从每一篇文章、甚至从每一句话中去吸取力量。

最后，尤列克决定为《罗伊》杂志写稿。当时正值要为十一月份出版的一期作准备。象过去当《红色权利报》、《哈罗报》或《创造报》编辑时那样，尤列克积极收集资料，热情地为纪念十一月七日伟大的十月革命而出版的这期杂志作准备。现在，他唯一可以利用的宣传阵地就是《罗伊》青年杂志，但是有关十月革命的事，他是半个字也不能说的。经过再三考虑，尤列克写了一篇论捷克古典作家卡·希·马哈、卡·雅·埃尔本^②和约·瓦·弗里奇的文章，名字叫做《日历上的三天》。诚然，这三位作家的名字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毫无联系，但是，尤列克想方设法用隐晦的方式唤起人们对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日子的回忆。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当你撕掉那一页一页的日历时，也许你并没有意识到，日历上的每一天都不同程度地值得人们纪念，不管它是星期一还是星期四，七日或者是九日……”1940年是十月革命23周年，该年的11月7日正好是星期四。尤列克继续写道：

“人类的历史还很短，它依然处在自己的襁褓阶段，它那最美好和最光辉的一页尚未到来。尽管如此，一年中每一个日子却已经向人们展示：在几年或者许多年前的同一天，

某种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某位伟人诞生或逝世了，这个伟人曾以自己的劳动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而作出了贡献。只有对人类进步起促进作用并为之奋斗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只有这样的伟大人物才值得我们爱戴和尊敬。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却尚未成熟到这种地步，人们还没有一贯地遵守这样的原则。有时候他们忘记了那些有功之臣，反而去美化另一种人，这种人之所以能够显赫一时，只是由于他们妄图去阻碍社会进步和给千百万其他的人带来苦难。但是，历史是公正的筛子。只有那些真正善良和伟大的人物才能最后经过历史的筛选而流芳百世！”

当时，捷克人民正怀着爱戴和信赖的心情注视着东方，期望着苏联能给他们带来解放。成年读者一看便知，尤列克在文章里正是暗指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和这一革命的组织者列宁！至于谈到那些“妄图阻碍社会进步和给千百万其他的人带来苦难”而“显赫一时”的人物，读者的心里也非常明白，这些话就是影射希特勒！幸亏法西斯的书报检查官没有识破文章的真正含义，因此才没有判处该文“死刑”。

尤列克永远是那样乐观，即使他象囚徒一样生活在月复一月不得外出一歩的秘密寓所里时也仍然是这样。这一点也在署名为P·切尔尼的《日历上的三天》一文中得到了反映。尤列克在该文中写道：“现在是十一月，日历上的页片也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飘落下来。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的心里是悲喜参半。我们感到悲哀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也一天天衰老起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正

一天天地更加接近我们幸福的时代。”

尤列克在《罗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紧密相连的。比如，当谈到埃尔本的童话故事时，尤列克立刻指出他创造这些童话故事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本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占领我国的政治形势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列克在文章中写道：“当维也纳政府残酷剥削捷克民族许多年后，埃尔本开始写作童话故事。反映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的这些童话故事是为小孩、同时也是为成年人创作的，而它们又都通俗易懂、老幼共赏。只要我们重读一下埃尔本的童话，我们便可以发现：尽管是含冤受屈、历尽艰辛，但是到头来善良必将战胜邪恶；真理和正义是无敌的；而使正义战胜邪恶的最伟大的力量则来自贫穷的劳苦大众。这样，诗人埃尔本也采用了童话这种形式去唤起人们的希望，使他们树立起信心。”

尤列克在描述泽耶尔^②的成长过程时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写道：“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他（泽耶尔）与其跟父亲的朋友——富商大贾们鬼混，倒不如到仆人居室中去，因为在那里他找到了质朴、真诚、与他情投意合的人们。后来，当他按照父亲的意愿来到世界上试图碰碰机会时，他更经常地接触到了这些劳动人民，从而他也便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那些从事最繁重劳动、创造着世界上一切财富的人们却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唯利是图的结果必然是祸国殃民。因此，他真心实意地站在受欺压的人们一边。”

尤列克把青年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样一点上：“每一个伟大的诗人、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希望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更加幸福和诚实。缺乏这种感情的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尤列克是在这样的时刻发表这样的文章的：当时，某些为纳粹分子效劳的捷克新闻工作者在报刊杂志上向我国人民宣传说，纳粹对我国的占领是永恒的，因为“显而易见，历史正迅速进入弱小民族消亡的阶段”——意指我们的民族必然被消灭——，“今天，当大家公认弱小民族的政治独立已经是毫无意义的时候，坚持进行荒谬的斗争又有什么作用呢？”

尤列克以巨大的热情为青年杂志撰稿，就象他以巨大的热情去对待每一项工作那样。了解读者的意见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经常向哈奴斯同志打听孩子们对他的文章的反应，我也是《罗伊》杂志的读者和评论家，我还经常参加尤列克论说文的撰写工作。巴克萨同志全家也是《罗伊》杂志的热情读者。此外，我还把每一期的《罗伊》给居住在比尔森的莉巴送去。我们并不奢望尤列克文章的每一句话都能博得大家的喝彩。他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倒是非常希望能听到批评意见，而且总是虚心地加以考虑。如果他的文章受到了表扬，他也总是显得羞惭、腼腆，如同平生第一次听到表扬时那样。但这并不是说，尤列克不了解自己精于文墨，而是因为他知道，要求他写的所有文章都完美无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希望他的每篇文章能做到言简意

赅，通俗易懂，但是，不少文章却使哈奴斯同志伤透脑筋，生怕无法躲过法西斯书报检查官的眼睛。

自然，他在文章上都不得签署自己的名字。起初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杂志总编辑哈奴斯，谁是文艺评论文章的作者时，他该说些什么呢？教员们都清楚，他自己是不写这种文章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最后他们找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解决办法：哈奴斯可以搪塞对方说，上述文章的作者是他认识的一个教员，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因此尤列克在自己的文章上或者从不署名，或者签上缩写符号K.V.，P.V.或者编造出来的假名字——巴维尔·切尔尼，彼得·瓦哈；如果按照捷语发音而用俄文字母去拼写的话，那么“瓦哈”（Vácha）便变成“巴克萨”（Baxa）了。在为《罗伊》杂志撰写稿件的那些日子里，尤列克正躲藏在巴克萨夫妇家中。我问他是怎样想出这样的点子来的，他只是摸了几下满是胡子的下巴微笑起来。他喜欢的人名有卡雷尔、巴维尔、杨，而彼得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深秋和寒冬，尤列克就这样坐在巴克萨夫妇的房间里进行写作或者学习。他常常坐在长方形饭桌的一头。只要他把脸稍稍偏向右边，布拉格的景色便能透过窗户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常常眺望布拉格——可爱的，在明朗的日子里笑逐颜开的，在蒙蒙的雾气中双眉紧锁的，在雨天中泪流满面的，然而却永远是迷人的布拉格！长桌的这个座位成了他的专用座位，不只当主人不在家时他坐在这里工作，就是当主人晚上回来以后，他虽然要把工作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但

是晚饭时他还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总之，那是他的专座。

当我到巴克萨夫妇家去找尤列克时，我们俩常常整天独自留在屋子里。如果尤列克准备写一篇文章而进行构思时，有时他会躺在他们房间的长沙发上，如同在我们自己家里一样。我则坐在他身旁看着书，同时抚摸着他的头。也许这样会有利于他思考问题。此刻，巴克萨夫妇的房间里异常宁静，只有碗橱上的时钟发出响亮的嘀嘀嗒嗒的声音。不管谁按门铃我们概不开门。有时候门铃响了，尤列克便开玩笑地说：“这不会是邮差吧！”他这句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因为我们没有、也不可能等什么邮差。总之，它成了我们之间的一句口头禅。其他时候他又会说：“可能是乞丐吧！”这又使我回忆起尤列克还能够在布拉格街头自由走动的那些日子。当他从乞丐身旁走过时，他决不会无动于衷、扬长而去。他总要摸遍口袋——我从不记得他身上带过钱包——要找出一些钱来送给那个乞丐。当星期天我们在家时，敲我们家门的乞丐便会络绎不绝。一位朋友对我们说，他原则上从来不给乞丐任何东西，因为几个铜板不能根除行乞的现象，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消灭乞丐。虽然尤列克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如果他给乞丐50个哈莱士，那么乞丐便能买上一点儿面包，暂时饱一饱肚子，他这样做也绝对不是帮资本主义的忙。

尤列克为十二月份出版的《罗伊》杂志撰写了关于金属活版印刷术发明家杨·谷登堡事迹的文章。我去找他的时候，文章刚刚开了个头。为了更能吸引青年读者，尤列克选

用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小说名称叫做《杨·谷登堡的故事》（关于参与变革世界的一个男人的故事）。小说中写道：“甚至最伟大的行动也不会取得成功，如果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刻不是在关键时刻的话。英雄行为、发明创造、艺术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行动——一切都各有其关键时刻。只有不停地宣扬真理，才能使它在关键时刻获得胜利。”

在篇幅只有16页、每月只出版一次的《罗伊》杂志上每期只发表一篇文章，这对尤列克说来实在是太少了。只要他一接触到报纸，哪怕是给青年看的报纸，他便要考虑如何去改进它，如何使它办得丰富多采、妙趣横生，考虑应该写些什么，我常常看见他和哈奴斯同志进行热烈的讨论。比如，尤列克曾向他建议，《罗伊》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智力世界专栏》。哈奴斯十分同意，但是要求由尤列克负责。这样，在1941年1月份的第一期的这个专栏上，尤列克这样写道：

“开辟本专栏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思考。如果人们都能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话，那么早应该是世界大同了。人们就不再会受骗上当，就能按照自己的正确思想行事了。”当我们读完了这些话之后，我们会对自己说：假如我们果真能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话，希特勒就不会统治我们国家了，捷克的工厂主、地主和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就不能欺骗我们了，我们早就能象苏联兄弟那样生活了。尤列克说，既然我们能作这样的理解，那么一定还有许多其他读者也会作这样的理解的。

在每一期《罗伊》杂志上或者在它的副刊上都出现了尤列克的文章，这些文章谈到了下列一些捷克作家和艺术家，

如：泽耶尔，聂鲁达、博热娜·聂姆措娃、安托宁·德沃夏克、克利茨佩拉、蒂尔、伊日·科拉尔、木偶艺术家马捷伊·科佩茨基，还有关于布拉格民族剧院的文章。他还在杂志上发表了约·瓦·弗里奇的《回忆录》摘选，建议刊登各种各样的诗作。在《智力世界专栏》里他还为读者设计了算术、物理、文学谜语游戏，他充分利用了他在为我修改尼克利奇著《到处充满奇迹》一书的译文时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在《罗伊》杂志上他给孩子们讲述了“会开枪射击的”植物的故事，它们“开枪射击不是为了屠杀生灵，而是为了繁殖后代。”

《罗伊》杂志的工作越来越多，但是收入却寥寥无几，因为哈奴斯同志能够付给尤列克的稿酬实在太少了。然而尤列克工作起来却始终非常愉快。

晚上，我们常常和巴克萨全家欢聚在他们的房间里，收听莫斯科广播，一起聊天，尤列克听瓦舍克、约什卡和莉杜什卡讲述他们干了哪些活儿，说了哪些话，还听到了些什么消息。接着他便讲述自己的访苏见闻。当时的局势正一天天严重起来，尤列克仍经常谈论起内兹瓦尔有关苏联的诗句：

“我认识极地附近的国家，我认识奇妙美丽的国家，让我们手携手向那个国家走去。”有时，当我们谈兴正浓之际，突然响起了门铃。尤列克和我便赶忙躲到厨房里去，一直等巴克萨家的人通报以后才再出来。如果客人停留的时间较长，我们在厨房里必须保持绝对安静，甚至不能咳嗽一声，免得被客人听见。有时候尤列克在匆忙中甚至来不及把香烟带到

厨房中来。最糟糕的是，有时他必须独自一人藏在厨房里，既没有香烟、又没有书，而且一呆就是一个钟头！当巴克萨家的人把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他总要说上几句风趣的话聊以自慰。

尤列克住在巴克萨夫妇家的最初几个月里是不得外出走动的。我不知道巴克萨夫妇采用了什么方法才说服了人数众多的乡下亲戚不来探望他们。他们极力把理由编造得无懈可击。稍后，当尤列克有了另外的秘密寓所后，事情便好办多了。如果某个亲戚要来，巴克萨夫妇便先和他（她）商定到达的确切日期，这样，尤列克便能及时离开。然而，不论你多么细心，有时还会出现意外。尤列克就碰上了那么一次：当时他的胡子和头发已长得老长，很久都没有用剃刀和剪刀修整了。莉杜什卡·普拉哈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便谈到了那次发生的意外事件：

“但是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次，有人按响了门铃。尤拉躲进‘小吸烟室’，我出去开门。门口站着我们的奶奶。她是来看望我们的。怎么办？我们总不能不让奶奶参观一下整个房子吧！？因此，我把尤拉领来，向奶奶介绍说他是瓦舍克的朋友。为了使奶奶不会对他的外貌产生疑心，我编造了如下的理由：他是来布拉格治疗糖尿病的，他不能刮脸，以防刮破了皮，因为他的伤口可难愈合了。奶奶连连点头，不时地问这问那，很快她便和瓦舍克的朋友混熟了。后来她走了，我们才喘了一口气，因为没有出任何差错。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后我去看望双亲。第二天我动身回布拉格。我

在火车上坐定后，突然看见奶奶站在车站上。她向我走了过来，从车窗口递进来一个小包。我问她：‘奶奶，这是捎给叔叔的吧？’奶奶小心翼翼地四周看了一下，又向我走近几步，几乎是咬着我的耳朵说：‘不，这是送给躲起来的那些人的。’”

秋天里有一次，当我又准备去找尤列克时，我想让他好好高兴一番。在多马日利采图书馆我借到了弗里奇的选集《拉达·尼奥拉》，在霍克尔旧书店我还偶然买到了《鲁赫》杂志，上面刊登了弗里奇的一篇短篇小说《我们的先辈们》。这两种读物的确使尤列克喜出望外。这一点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了，那封信得以保存下来还有过一段浪漫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为了能向他报告我完成他交给我的各种任务的情况，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可靠的联络地点，我先把给他的信送到那里，然后他再派人把信取走。尤列克想起了他的一位经营帽子生意的姑妈，她在布拉格维诺赫拉迪区开了一间小铺，专门制作和修理礼帽。我找到了她，向他转达了尤列克请求。她痛快地、以一种义不容辞的神情宣布说，尤列克需要的一切东西我都可以放在她的小店铺里。后来，尤列克常常轮流派莉杜什卡和约什卡、稍后还派维苏希洛娃太太到姑妈那里去。她们把尤列克给我的信放在那里，或者把我给尤列克的信取走。每一次她们总是拿着一顶帽子假装来店修理。那年秋天，巴克萨家的人又把尤列克给我的信送到姑妈店里，信中谈到了他对弗里奇《我们的先辈们》的看法。我

不忍心把信毁掉，因此我把它带回霍季姆涅日村，藏在厨房地板上的塑料贴面下面。后来我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直到解放以后又过了好几年，尤列克的爸爸也早已把霍季姆涅日村的那所楼房卖掉了，那封信才被人发现。发现该信的是楼房的第三批主人，当时他正准备把被踩坏了的、破旧的塑料贴面换掉。尤列克在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如果不是今宵夜长，东方也许已渐渐发白了。但是在我看完弗里奇的短篇小说以前，我是无法入睡的。实在写得太好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样的好书还从来没有出版过——他们封锁可爱的约·瓦·弗里奇的手段实在高明！虽然在文体上它显示了弗里奇特有的那种‘华美’，不过，它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它比有趣更重要得多。的确，它就是‘我们的先辈们’。只有最后两章可能会给今天的出版者带来麻烦。某些地方必须删去，因为在谈论自由时它过于直言不讳，但是略作修改是可以的。这本书怎么办，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要是能出版的话一定会是一本好书，大约有十印张（我们翻译的萨宾纳一书的那种规格），当然不包括前言。你可以把这一设想告诉G。（即出版家吉尔加尔——作者注）。在我的头脑里一个强烈的念头又在翻腾：我们要出版受压制的作家们的作品。可以出版的书计有：1、弗里奇著《我们的先辈们》（短篇小说——回忆录）；2、萨宾纳著《文艺评论》（其中最重要的文章）；3、奥黑拉尔著《牧歌书信》；4、索伊卡著《“我们的男子”选集》……等等。有朝一日，我们总要出版这些作品

的。也许现在谁也不敢问津吧（‘不敢问津’一词用了多马日科采的方言——作者注）。

G对选集有兴趣，这使我很高兴。我急切地期待着进一步的消息。‘中国人’也有兴趣吗？哈哈！他们对此又将指手划脚，他们又要搞什么生产委员会、编辑小组和大组——此外，他们还有那位对‘上帝’一词的写法作过专门研究的语言专家（他们曾向尤列克指出，‘上帝’一词在什么时候应该大写，因为尤列克原则上只用小写；这句话就是针对此事讲的——作者注），对吗？随便他们怎样说好了——是不是？我并非不愿意跟他们合作，我是害怕他们的那一套机构。如果我们能和G合作，那是最理想的。

《评论》（即萨宾纳的《文艺评论》——作者注）怎么样？不受欢迎吗？你要好好地推荐一番，它是一批‘高档商品’。否则我们只好是为自己整理材料了。

我的手已经发麻，眼睛已经打瞌睡了。就此搁笔吧。不过，还有几点：

1、你忘记了的那个骨头包裹（给霍季姆涅日村几只狗吃的狗食——作者注）我已经寄出；

2、外面有关弗里奇的或者他写的作品便中请随时寄来；

3、弗兰塔（即哈拉斯——作者注）写的《荷拉切克》我已经不需要了，如果你已经寄出，我也可以留作参考；

4、我已经把最后两篇广告文章和Č.（即《行动》出版社——作者注）寄来的一封信给你送去了；那封信留在这里

碍事，把它扔掉嘛又舍不得……”

1940年11月底左右，我离开尤列克的秘密寓所，来到《奥尔比斯》出版社找弗兰季舍克·聂麦茨^②，我向他转达了尤列克的五点要求：第一、在任何场合只字不提与尤列克的关系问题。第二、尤列克希望借阅过期的《世界之窗》，每次会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前来弗兰季舍克处领取。第三、尤列克将开始撰写《回忆世界之窗》的连载文章。此事他们两人已于夏天洽商妥当。尤列克希望，该连载文章能于明年一月起开始发表。第四、尤列克希望在文章中还能刊登一些有关《世界之窗》的图片资料。《世界之窗》旧杂志的图画与文字说明将由尤列克亲自选定。第五、连载文章的手稿将由我或由一位姑娘送交编辑部。弗兰季舍克·聂麦茨对全部要求都表示同意，不过他向尤列克交代了两点：首先，尤列克应该把几篇连载文章一次送来；其次，文章不可锋芒太露，以免被纳粹分子没收。

在《奥尔比斯》出版社我还找到了诗人弗兰季舍克·哈拉斯^③，并以尤列克的名义要求他把他在《奥尔比斯》出版的书给尤列克寄去。我带着一书包诗人的书离开了他的家。此后，每当我前去《世界之窗》编辑部时，我也总要到《奥尔比斯》出版社去找弗兰季舍克·哈拉斯，而且没有一次是空着手回家的。稍后，尤列克向哈拉斯提出一个新要求：要他为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投稿。1942年他给尤列克寄去了庆祝“五·一”的诗作。该诗发表在《红色权利报》五月号上，诗的名字叫做《1942年5月1日》。

尤列克继续撰写《回忆世界之窗》连载文章。该文章前后共发表了25篇，第一篇刊登在当时的《世界之窗》杂志1941年1月17日出版的第3期上，最后一篇刊登在1941年9月19日的第38期上。莉杜什卡负责去《奥尔比斯》出版社为尤列克借阅过期的杂志。1941年1月15日我在民族博物院图书馆还为他借到了1855—1861年的《世界之窗》。

1941年9月，在发表了尤列克所写的第25篇《回忆世界之窗》的连载文章以后，繁重的党内工作已使他无暇从事写作活动，因此，《回忆世界之窗》连载文章只得中途搁笔了。

巴克萨夫妇和莉杜什卡都到父母家过1940年的圣诞节去了。尤列克只身一人留在屋里。我不能去找他，到他那儿去是不明智的。我住在霍季姆涅日村，妈妈也来了，她不愿意一个人留在比尔森，因为爸爸还住在布拉格的医院里。不久前刚出嫁的薇拉和她的丈夫在一起欢度圣诞节，莉巴则和她的全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老伏契克家欢乐的圣诞之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主人们担心，如果尤列克只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呆上两三天，那他将太寂寞了。因此他们特请维苏希尔同志前来陪伴尤列克。他们商定，维苏希尔将在圣诞节那天晚饭以后来找尤列克，然后再陪他吃上一顿节日的晚餐。谈妥了，也照办了。在吃完第二顿晚餐以后，维苏希尔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和尤列克促膝谈心。房子里暖洋洋的。后来，尤列克向收音机转过身去，打开开关，听听各地的消息。过了一会

儿，他看见维苏希尔坐在椅子上，歪斜着脑袋睡着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尤列克想，时间有的是，反正维苏希洛娃太太知道，他要很晚才能回去。收音机轻声地播送着乐曲，尤列克看起书来。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但是佩皮克（即维苏希尔，佩皮切克为他的爱称。——译者）却轻轻地打着呼噜。快到午夜时分，尤列克推了推他的肩膀说：“佩皮切克，醒一醒吧！”维苏希尔这才睁开了眼睛。当他往四周张望了一下、完全醒来之后，他这才想到他是来陪伴尤列克欢度节日的。“我真该死！”维苏希尔十分内疚地看了看尤列克。后来，每当谈起佩皮克陪他欢度圣诞的事时，尤列克便哈哈大笑起来。

1941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诗人和作家尤利乌斯·泽耶尔逝世40周年纪念（他是1901年1月29日逝世的），同年4月26日是他诞辰100周年。在周年纪念到来之前，尤列克很早便认真阅读了泽耶尔选集和有关他的文章，这些书是我们从秋天起便陆续给尤列克捎去的，如同从前给他送聂鲁达的作品那样。他要写一篇论泽耶尔的文章，通过他向读者指出，人民是怎样养育了诗人的。人民是培育诗人的保姆！尤列克引用了诗人关于老保姆的这些话：“那位妇女无意中成了一位诗人，对他的纪念不只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也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想，不管这是福是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我才成了一位诗人，成了一位捷克诗人。”

尤列克还援引了N·M·雅齐科夫为悼念普希金的保姆而写的诗句：

“你不会从记忆中消失，
甚至在毁灭的日子里你也将永生，
人们将在诗人们的传记里
永远赞颂你的美名。”

如果你能找到泽耶尔的保姆的名字的话，尤列克一定会以最丰厚的礼品来酬谢你的！我曾协助他查找对泽耶尔的文学创作起过如此重要影响的那位妇女。在尤列克和我之前，已经有许多人考证过她的名字了，但是都毫无结果。泽耶尔称她为碧耶塔，我们不知道，大概永远也将无法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叫这个名字。我曾在布拉格城市档案局查阅过布拉格居民的老户籍册，结果发现：在泽耶尔青少年时期的上一世纪，户籍册中只登记财主的名字，而仆人是册上无名的，他们不属于布拉格的城市居民。后来，当尤列克撰写关于泽耶尔的文章时，他感慨万分地说：“……也许连最勤奋的历史学家也无法找到更多的材料了。他无法发现有关她的传说的原始资料……他无法编写她的家史族谱……他甚至找不到她的姓名。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

尤列克是在巴克萨夫妇家中开始撰写关于泽耶尔的专论文章的，三月份在维苏希尔夫妇家中脱稿。维苏希尔一家也住在庞克拉茨区，住在当时的希图西大街（今天的理想合作社大街）23号。1941年3月一个昏暗的夜晚，尤列克转移到了他们家中。当时，他是经过了五个月以后头一次来到街上。他告诉我，他真有点儿头晕目眩哩！

在我快要出发去找尤列克的时候，三月初的一个清晨，霍季姆涅日村的厨房门被敲得咚咚直响。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起初我还以为是做梦。但是，敲门声又响了，而且一阵紧过一阵。我心里想，敲门的也许是到村子里来打扫烟囱的工人，他是来取阁楼门的钥匙的吧。我透过门缝安详地喊了一声：“谁呀？”

没有任何回答。敲门声变成了砸门声。我迅速披上衣服前去开门。门口站着四个壮年男人，他们都穿着外套和白色长统袜。门一开，他们立刻冲了进来，朝收音机直奔过去。我的心怦怦直跳。“你们是什么人？”我这样问道，虽然我马上已经意识到他们是干什么的了。“克拉托维的盖世太保！”一个家伙冲着我嚷了一句。他们在屋子里四处搜查，还仔细检查着收音机。过去我每次收听外台广播以后总是把指针拨到布拉格电台的位置上，但是现在我记不清楚，昨天我是否也这样做了。

“您丈夫在什么地方？”一个盖世太保冲我叫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

“盖世太保把长沙发下面的大抽屉拉了出来，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突然他们发现了我非常心爱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前来搜查之后藏在这里的。它就是尤列克写的访苏报告文集《在明天已变成了昨天的国家里》。该书出版时，尤列克把第一本送给了我，并亲手下写了：“坚持抄写完此书的古丝蒂娜惠存，她的尤拉赠。”盖世太保把书塞进皮包里，从敞开着的抽屉旁走开了。另一

个盖世太保奔向餐具柜，其余的走进客厅。餐具柜上放着一封信，其内容不过是些寒暄、问候而已。信是尤列克寄来的，但不是他亲笔写的，他在信中约我去布拉格。一个盖世太保冲着我嚷道：“这是您丈夫写的！”“不，是妈妈写的。难道您看不出来，它完全是老人的手迹嘛！”我十分肯定地回答。“您别胡扯！您每三周到布拉格去一次找您的男人！”“我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怎么可能去找他呢？我是去布拉格交我翻译的东西的，”我这样回答。我心里惶惑不安。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底细的？可能是本地的那个磨坊老板（他是德国人）向他们告密了。当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前来逮捕尤列克时，他们也到那个磨坊老板处停留过。

“您丈夫在保护国吗？”一个盖世太保问道。我发现，他们没有掌握任何具体的东西，因此我反问他们：“你们想他是在保护国吗？”

“那么说他在莫斯科了？”

“我几乎一年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了，我怎么能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到底在哪儿？快回答！我们把您送到集中营去，您就会老实了！”

“随便你们怎样想好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无法回答。”

这些盖世太保与布拉格的盖世太保相比要幼稚得多，远没有后者那样油滑和饱经世故，但他们却同样是十分粗暴的。他们在客厅里搜查了藏书。一个盖世太保看见了一本红

色封面的书。那是克拉托赫维尔的作品《源泉》。他取下一册放进皮包里。此外，他们还没收了其它一些书。我感到，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不知道往下该再问些什么，他们手里再没有任何把柄。后来，一个盖世太保以警告的口吻对我说：“您只要敢告诉村里的人说盖世太保来找过您，我们就对您不客气！”

“还要我去告诉他们吗？他们早就看见你们了。他们只要往窗口一站，就马上能看到你们呢！”

“您就对他们说，朋友们来过！”临走时他们与布拉格的盖世太保一样命令我说：“如果您丈夫来了信，您必须立即向我们报告！”

他们走了。整个上午我都呆在家里。一楼的季霍托娃太太上楼来看我，她说：“您知道吗？他们原来想跳霍乌舍克家的篱笆进到咱们这儿来找您的。人家看见他们绕着篱笆走来走去，但是大概因为篱笆太高，最后他们还是叫开了大门。全村的人都知道，盖世太保到您家来了，而且先在党卫军成员、磨坊老板那里停留过。根据他们穿着的白色长统袜子，谁都能一眼认出他们这帮家伙！他们还长时间地盘问我，问我从邮差那里取来的您的信件都是些什么样的信件。我告诉他们说，您收到的信件只是些某个出版社寄来的、信封口袋有这么大的稿件。”

我着急异常，因为最晚两天以后我便必须到布拉格去。他们跟踪我怎么办？我还必须先到达奥斯符拉青的肉店老板那里去买些不要肉票的猪肉和猪油来，以便能一并带着上路。

下午，为了避开霍季姆涅日村的磨坊，我沿铁路线向前走。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好像有许多无形的眼睛老在监视着我一样。

我乘季霍塔上班乘的头班火车去比尔森。在比尔森小站我没有下车，到了总站后我才走下车来。我把皮箱存放在衣帽间里，然后步行到老伏契克家去。说不定盖世太保也到妈妈处搜查过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到那边去抓尤列克。妈妈虽然知道我要到布拉格去，但是她已经不再要求说她也去找他了。只要他知道尤列克很安全，她便心满意足了。

我怀着惊恐的心情在布拉格下了火车，生怕有人跟踪。晚九时正，莉杜什卡在耶泽尔卡车站23路有轨电车旁边等待着我。她看见了我，然而却装成不认识我似的。我也摆出一副不认识她的样子。她迈着从容不迫的、而且是慢慢吞吞的步子离开了车站。我在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跟在她后面走着。不久我们俩来到了米赫列大坡。晚间这里到处是空荡荡的，漆黑的夜幕更使台阶笼罩上一种恐怖的气氛。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却十分有利。当我们在前后两头再也听不见任何行人的动静时，莉杜什卡停住了脚步，我向她奔了过去。我们握了握手，只是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当她领着我打从这条路上走过的时候，我多次对她说：“莉杜什卡，您真是太好了！”而她却总是这样回答：“没有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她领着我来到米赫列大坡上面庞克拉茨区一条陌生的街上，接着我们走进一座陌生的大楼内，她在一楼一扇陌生的房门旁按了门铃。一位矮小、丰满的中年妇人给我们开了门。不论我

来到什么地方，在前厅是从不开口说话的——这一点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我们脱下大衣，那位小个子妇女领我们来到一个房间内，一位瘦高个子、黑头发的男人——他的头都快要碰到天花板了——和我们握了握手，然后立刻走出门去。我发现，他的右腿膝盖关节无法弯曲，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

我来到了维苏希尔夫妇家中。

几秒钟以后房门又打开了，高个子男人——他就是维苏希尔——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尤列克。尤列克满头长发，胡子也是又长又多。他在耐心等待着能找到一位可靠的理发师来替他理发呢。我们俩拥抱在一起了。

我们大家围着房子中央的一张大桌子坐了下来。一切都很顺利，我真是幸福极了。当我发现我关于盖世太保去霍季姆涅日村搜查的消息并没有使尤列克显得特别紧张时，我才稍为平静下来。而尤列克看见我现在仍心有余悸，便劝我放宽心，至少暂时他们不会来打扰我们了。然而我却为他捏着一把冷汗。

维苏希尔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小职员，他能买到内部分配的煤，现在它正在厨房的炉灶里熊熊燃烧。我们坐着的这间房子原来就是一间厨房，后来维苏希尔夫妇把它们布置成了既可以烧饭、又可供起居之用的房间。在和他们卧室相邻的墙根处放着一张长沙发，对面靠墙放着一个书柜。书柜上半部装有玻璃，玻璃后面排列着各种书籍；书柜下半部是门，里面有木板隔子，上面放着各种炊具。左边墙角靠窗处

放着一台收音机，它的对面墙角处斜放着一张写字台，尤列克就在这张写字台上研究泽耶尔的作品，它们现在都放在维苏希尔书柜中最显眼的地方。窗户上挂着薄纱窗帘，尤列克透过它可以看到街上的一切情况，而他自己却不致被人发现。窗外的景致极其一般。窗子对面是一排木栅栏，栅栏周围有一群孩子正在嬉戏：他们在一起玩耍，互相追逐，还有几只狗夹杂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

佩皮克·维苏希尔待人诚恳，说起话来妙趣横生，他喜欢唱各种流行歌曲，尤列克也向他学会了许多这类歌曲，他们经常在一起分二部合唱。佩皮克和尤列克很快便成了莫逆之交。他教尤列克象他一样瘸着腿走路。这样，尤列克便慢慢学会了装扮成一个瘸子到外面去参加秘密会议。

维苏希尔一楼的窗子下面常常有一些妇女推着儿童车从这里经过。这些孩子们，尤列克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将来再不会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叫做占领。他们只能在学校里或者在书本上读到它们了。

1941年3月的那一次，我在维苏希尔家中住了几乎两个星期。尤列克要我当他的第一个读者，同时替他寻找其它的参考资料。早上，当佩皮克出去上班、维苏希尔太太上街采购、而我们俩则独自留在房间里时，或者在晚上，当他们就寝以后，尤列克便把他写的东西念给我听。他还派我到出版家吉尔加尔处去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版尤列克的论著。吉尔加尔回答说：那是当然的事。但是，这一回尤列克已不得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了，而在以前出版《战斗的博热娜·聂姆

措娃》时，或者当他转入地下以后出版《论萨宾纳的叛变》一文时，他都是签署了自己的真名实姓的。他选用了—个假名叫彼得·本达。等他一脱稿，我便替他手抄，这样不会因他的笔迹而把他暴露出来。当时他手头没有打字机，而我们的那一台又留在霍季姆涅日村了。但是，法西斯占领者却不只要求作者签署自己的真实姓名或笔名。他们还要求写上详细住址，除笔名外还必须把真实姓名附上。当我们思考着如何在文章中署名的问题时，吉尔加尔便把该文付排了。尤列克还派我去找吉尔加尔，请他询问—下当时在梅兰特里赫出版社工作的费多尔·索尔丹，是否可以在尤列克的论著中签署他的名字。索尔丹拒绝了。

稍后，尤列克还校对了论泽耶尔—文的毛样，可是，该文在占领时期未能出版。全国解放后才得以问世，书的作者当然用了尤列克的名字，可惜他自己却未能活到它出版的那一天。

尤列克在维苏希尔家中写作是有一定困难的。早上我要到各地去替尤列克处理各种事务，晚上才能回来，而维苏希尔太太——如果她在上午烧饭时忙不过来——会不时地要求埋头写作的尤列克，替她往炉子里加煤，和一和芡粉。虽然这样会妨碍他专心致志的工作，但是他总是十分乐意地照办，同时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象列兵那样地回答说：“尊命！”到了晚上，维苏希尔太太便会得意洋洋地夸奖说，那天烧饭她找到了一位好司炉和一位好帮厨。

有时候门铃响了。家里的某一个人出去开门，此时尤列

克便迅速收好文章手稿躲起来，大多数情况下是躲在卫生间里。如果来了客人，他们就把客人领到原来的厨房里，再把尤列克从卫生间藏到卧室中去，直等到客人离去。访问维苏希尔夫妇的有时是巴克萨夫妇，有时是维苏希尔太太的姐姐安尼奇卡·布罗日科娃，在后者面前尤列克是不用回避的。布罗日克夫妇后来还把杨·切尔尼同志藏在自己家中。

1941年3月13日，爸爸转到了比尔森医院。复活节前他进行了膝盖以下的小腿截肢手术。手术前他打发妈妈到霍季姆涅日村去，不让她知道任何有关手术的消息，否则据他说她又要自寻烦恼了。3月29日爸爸从医院回到家中。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也瞒着尤列克，直到爸爸学会了走路为止。我、妈妈和妹妹们——我们大家都不希望我们所经受的种种苦难再去折磨尤列克了。

1941年4月里的一天，当我第二次来到维苏希尔家中时，我发现尤列克终于理了发。当时，为了找到一位可靠的理发师花去了多长的时间啊！从1940年10月起至1941年3月止，尤列克一次也没有出过房门到外面去！在他理发之前，叶林内克同志还替他拍照留念。叶林内克夫妇是维苏希尔夫妇的好朋友。他们就住在维苏希尔家的隔壁。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尤列克留得长长的头发梳向后方，一直披到肩上；他浓密的落腮胡子几乎快齐到胸前。他坐在叶林内克家厨房里的一张椅子上，手中拿着报纸，脸上堆满了笑容。我把他的这张照片带到了比尔森家中。妈妈看着照片痛哭了一场。经我好生劝慰，她才平静了下来。盖世

太保没能抓到他——这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我们考虑了很久，希望能找到一个存放照片最为保险的地方。最后，爸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尤列克的这张照片夹放在挂在墙上的一个画框里去。谁也不会想到它会藏在那里！爸爸立即就这样办了。他把珍藏着尤列克照片的那个风景画镜框挂在客厅的原来位置上。后来，挂在那里的这个镜框一直安全地保存到解放。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叶林内克夫妇的。有一次，当我正好在维苏希尔夫妇家时，突然响起了门铃。我和尤列克立即躲进卧室，维苏希洛娃太太慢慢地前去开门，来客并非串串门便一走了事。他要留在维苏希尔家过夜。现在怎么办？幸亏维苏希尔夫妇能随机应变。当佩皮克和客人正在聊天的时候，维苏希洛娃偷偷地溜了出去。一会儿后她领着一位妇女进来，那位妇女把尤列克和我带到她的家中。她的家也在一层，就在隔壁，穿过走廊便到。这一切都办得干净利索、十分妥贴。这样，我们便来到了叶林内克夫妇家中。后来，尤列克也常到他们家过夜，常常在夜间到那里去工作。叶林内克同志酷爱摄影。有一次他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长头发、长胡子的尤列克，叶林科娃同志，她年轻的弟弟帕夫利克，维苏希尔夫妇和我。可惜这张照片没有保存下来。

经过理发师的一番梳理打扮，尤列克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他那浓密的落腮胡子剪成了山羊胡，上嘴唇处留起了八字胡。他那剪短了的头发分向一边，头上露出了清晰的

发道。为了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尤列克还派我为他买来了一副平光黑边眼镜。现在，尤列克完全变成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虽然当时他只有38岁。

常常访问维苏希尔夫妇的还有一位他们的老朋友，一位沉默寡言、忠实可靠的同志。起初尤列克回避着他，但是后来他们俩认识了。他就是科扎克同志。他以为尤列克真的是一位喜欢下棋的教授。因为科扎克同志也非常喜欢这种高尚的游戏，所以他们常常在晚上坐在维苏希尔家的大桌子旁边，摊开棋盘，摆好棋子，聚精会神地对弈起来。尤列克还裁开八开纸，用订书机订成一个小本本，再用一张黄褐色的厚纸当封面，他在本子里打上横格并注明页码，自1941年3月19日起记录了各盘比赛的情况。至1942年3月21日止（这一天记录了最后一盘比赛）他们两人一共下完了150盘棋。从比分看，尤列克比他的对手要略逊一筹。从比赛的次数看，他们下棋最多的时间是在1941年夏天，当时尤列克正住在维苏希尔夫妇家中。

第七节 尤列克任捷共第二届 地下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1年春天，我从尤列克处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盖世太保逮捕了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其中有我们的好朋友爱多·乌尔克斯^{②⑥}、奥托·辛内克^{②⑦}、瓦舍克·辛库列^{②⑧}等人，而且，据说逮捕仍在继续进行。

当我见到尤列克时，我发现他突然变得闷闷不乐起来。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知道，被捕的同志们已无法从盖世太保的魔爪中挣脱出来了。他在思索着如何去继承那些被占领者剥夺了发言权的同志们的斗争事业。

1941年5月上半月的一天，居住在维诺赫拉迪区的姑妈转给我一封信，信上说：莉杜什卡将在晚上九点于原地跟我会面。后来，她把我领到了巴克萨夫妇家中。尤列克十分高兴，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又重逢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可以把自已庆祝1941年五一节的文章念给我听。据我所知，那是几个月以来他在地下党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说，当他再不用提防站在背后的法西斯书报检查官时，当他用不着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加以伪装时，当他能毫无顾虑地进行写作时，他才体会到能自由写作是多么的痛快！尤列克在庆祝五一节一文的末尾写道：

“是的，我们现在已转入地下。但是，我们不是埋葬在墓穴中的死尸，而是萌动于沃土中的社会主义种子。当春回大地时，这些种子必然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而五一节正预示着春天的来临——这个春天是自由人的春天，各民族及其兄弟情谊的春天，是全人类的春天……”

这篇文章发表在秘密出版的《五一节专刊》上。

尤列克重新找到了与党的联系，在领导同志被捕之后，这种联系曾一度中断。他是怎样重新和党接上关系的呢？具体情况我已无法知道。他常常谈起一位名叫伊万的人，后来我见到了这个人。但是，一年多以后我在盖世太保司令部里

才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他就是杨·维斯科奇尔同志。

长时期的闭门不出，只是在夜间从巴克萨家到维苏希尔家去或者回来的路上才能吸一点儿新鲜空气；终日不见阳光的生活。名符其实的地下工作，这一切必然会影响尤列克的健康。他脸色苍白，体重下降，睡眠状况很糟。有时候他还感到四肢无力。我每次见到他时都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但是，他从来不发牢骚，从来不悲伤叹息。有一次我劝他最好请大夫检查一下身体。尤列克连听都不想听。他说他根本就没有病，他身体疲乏是由于睡眠不足引起的，很快就会过去。就在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尤列克真的病倒了。他得了重感冒。现在他再也没有不需要去看医生的借口了。我坚持要去找米拉·内德维耶德^{②⑨}大夫。尤列克说：“你去找他，找到了又有什么用？他一个人怎样到这儿来呢？他和巴克萨夫妇都不认识，而你又不许带着他到这里来！”不过，最后尤列克还是同意了。我们商定，我先一个人去找内德维耶德同志。尤列克预先在一小块纸片上写几行字，然后把这封信斜向剪成两半。一半由我带给米拉，并由我通知他，信的另一半将由一位年轻姑娘给他送来。当他确信这两张纸片上的字迹同出于尤列克的手笔而且能完全重合时，他便可以跟着那位姑娘去找尤列克。

米拉·内德维耶德按计划来到了巴克萨家。当我告诉他说，尤列克已经有好几个月足不出户、而现在也只能在夜深人静之际短时间地到街上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时，他喟然长叹一声：“这比蹲班房还要糟糕！”

在内德维耶德博士的帮助下，尤列克不只恢复了健康，而且还与党的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委员接上了关系。关于这一点，他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这样写道：

“1942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在委员会万一遭受破坏而准备接替他们的应急班子的全部领导都被捕了……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候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是他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它不允许我继续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这样做。

我首先找到了杭扎·维斯科奇尔——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富于创造精神。他搜集到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但是后来我们两人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见到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专刊》，而不作为《红色权利报》的文章发表，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它印得相当粗糙简陋。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沉重的打击落到了党的身上，但是党并没有被致于死地。几百名新同志挑起了已牺牲的领导人遗留下来的工作重担，毅然决然地接替了他们的岗位，他们决心使党组织的基础不致遭受瓦解或者陷于瘫痪。但是依然没有党中央的领导……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

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非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专刊》上，看出了某些可以信赖的人仍在活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对方。

好象在大森林中捉迷藏一样……惨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起来。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位同志要碰头，就必须通过他们自己以及其他负责联络工作的人所设置的试探或核对暗号的重重障碍……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他就是优秀的青年医生米洛什·内德维耶德，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说来事情真有些凑巧。1941年6月中旬我病倒了，我打发莉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病……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寻找‘对方’的人，但是他没有想到要找的‘对象’就是我……6月30日，我第一次会见了我寻找了如此之久的那个人。他来到了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时还不知道来者是谁……我们拉上窗帘，打开灯，接着——我们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杭扎·齐卡^③……

只用了几分钟我们便把工作商量妥当。过了几天我又认识了第三位新的领导成员，他就是杭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群众关系非常之好的小伙子。他曾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德国回到祖国。他依然保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创精神的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我是在霍季姆涅日村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我们都相信，苏联一定能战胜希特勒。大家的分歧点仅仅在于时间问题。有些人说至迟不超过两个月，另一些人说要到冬天才行。当时我们不了解希特勒所掌握的巨大军事力量，这个力量是由于他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所有的兵工厂都为他工作而积聚起来的。

七月里我在布拉格维苏希尔夫妇家中和尤列克会面了。当时他并没有告诉我他已成了党的地下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把与伊万合作写成的关于希特勒侵略苏联的声明念给我听，该声明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在地下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声明中说：

“捷克人民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一致地、深刻地和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民族和苏联各民族的那种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那种性命攸关的联系。每一位正直的人都清楚，红军和野蛮的法西斯强盗在东方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决战也是为争取我们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命运和自由而进行的一场决战。我们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被出卖和被抛弃的慕尼黑时期，只有苏联动员了全世界的人民为拯救我们而斗争。今天，爱好和平的苏联各兄弟民族的儿子们正在为我们的自由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尊敬、钦佩和热爱他们——我们敬爱的兄弟、忠实的朋友和伙

伴，我们全民族的心都和他们一起跳动……”

声明最后说：“全捷克民族反抗法西斯主义的钢铁般的团结万岁！我们的盟友——苏联和她光荣的军队万岁！”

此外，尤列克还给我念了另一篇文章，这是他为地下出版的《红色权利报》（出版日期为1941年7月11日）撰写的，文章的题目叫做“以捷克民族自由的名义投入战斗吧！”

尤列克还建议我从霍季姆涅日村搬到布拉格来长期居住，他的工作需要我这样做。如果我继续留在乡下，那么，我们之间的联系太费时间。最好我能在布拉格找到一个职业，而每天上班时间只需四、五个小时。没过多久，我在一个小工厂里真的找到了工作，担任来信组的德文翻译和工厂会计。这个小厂只有三个车间，以原始方式生产化妆品，办公室也设在车间里。小厂的名称叫做“斯尔贝克股份公司”，它原是犹太人的企业。纳粹占领我国后，这个企业由排犹主义者、德国化了的捷克人斯尔贝克接管。他的合作者、另一位股东也是捷克人，他曾当过理发师。该厂只有五名工作人员，其中两人是该公司原来的犹太老板。斯尔贝克和另一名股东彼此互不信任，因此他们把钱柜交由我一人保管，并宣称：如果他们两人不同时在场的话，我连一分钱也不许支付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此外，他们两人每次分得的钱数必须是绝对相等。他们既不相信银行也不相信用户，因此，他们采用由用户邮购的办法出售商品，邮局把款子汇给公司。我负责接收汇款，并把它们存放在钱柜里。工厂老板赚了许多钱。但他们却互相监视着，因为他们之间的尔虞我诈已发展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开始去该公司上班。我提出我的上班时间为上午八点至下午两点，星期六休息。老板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只付给我极其微薄的薪金。为了从我身上再节省一些开销，公司老板竟不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医疗互助会的名册上。解放后我才知道，当我被捕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急于砸开钱柜，看一看他们的钱钞是否平安无事。过去，他们总是在月末才付给我薪金，因此，当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他们还欠我24天的工钱，这笔工钱一直没有补发给我。

现在，由于我住在布拉格了，我和尤列克会面的机会因此也多了起来。每个星期我都要到维诺赫拉迪区的姑妈家去，尤列克总是把要我何时前去会面的通知预先寄到那里。当我居住在霍季姆涅日村时，我每次和他会面的时间虽然较长——一星期至十四天——，但是会面的次数比现在要少得多。

1941年夏天尤列克住在维苏希尔夫妇家中。有一次（当时我正好也在他们家里），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同志前来访问他们。过去我从来没见过他。尤列克对他就像对知心朋友那样可以无话不谈。尤列克向我介绍说 he 叫卡雷尔，但是从来不说他姓什么。每次在维苏希尔夫妇家中见到他时，他总是满面笑容，胡子刮得精光，深色的头发梳得锃亮，衣服烫的笔挺。当他来到他们家时，每回都先到厨房里呆上一会儿，然后立即跟尤列克到卧室去讨论军事、政治形势，讨论尤列克为《红色权利报》撰写的文章，他们一谈就是整整几

个小时。

1941年夏，天气酷热。房子里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尤列克和卡雷尔只好脱去外套，把卧室里的窗帘稍稍拉开一点儿，轻轻地打开窗子，然后在窗下席地而坐，这样，街上的行人就不会看到他们。他们在那里促膝谈心，常常可以谈一个下午。此刻，只有尤列克不时地跑进厨房间来取一些茶水。窗外一群孩子正在欢叫嬉戏。他们没有想到，与他们仅一墙之隔的那两个人，正以自己的劳动积极参与为他们创建一个新世界的伟大工作。孩子们的欢笑声正合那两个人的心意，因为它至少可以避免使他俩的谈话声传到街上去。

傍晚时分，他们两人来到厨房间和我们一起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白天，厨房间的窗子通常也是敞开着。到了晚上六、七点钟——当时屋前街道上依然是人来人往，维苏希尔便开始关窗了。为了不致引起他人注意，说他正好在英国电台播音时把窗子关上，这时他总是大声地咒骂起来：“妈的，这么大的穿堂风！”事实上，房子内外闷热、凝滞的空气中此刻连一丝儿微风也没有。

1941年夏天，我常和卡雷尔一起聊天。他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男子，脸上常常堆满笑容。在评价东方战线的时局时他也非常乐观。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预言：希特勒在东线到来年春天必然垮台，但是我则认为还要等上一年。事实证明，我们两人的看法都不对。卡雷尔看上去很年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我从来没有向尤列克打听过他到底是谁，而尤列克在我面前关于他也总是只字不提。我得知他的

底细那还是一年以后的事。当时也是在七月末，我坐在佩切克宫里正等候审讯，突然，他们押来了一位新抓到的犯人，盖世太保弗里德里希正在传讯他。弗里德里希喊到：“带杭扎·切尔尼！”他——正是我所认识的卡雷尔。他偷偷地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暗示我们互不相识。我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明白。我就是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稍后，他被押送至特雷津，1944年在柏林被处决。但是，在1941年7月里，我和卡雷尔都没有想到，我竟会在盖世太保的审讯室里才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

当时尤列克告知我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他会见了一位同志，据说我认识他，但是由于保密原因他最好不说出他的名字来。尤列克在我面前谈到他时只称他为“大叔”。这位同志就是杨·齐卡。直至他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

1941年深秋，尤列克在里巴日夫妇家的秘密寓所中严肃地告诉我，他已经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地下刊物的出版工作。我从来不愿意向他打听谁是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虽然我能猜到他们就是那位“大叔”和卡雷尔。

有一次，尤列克对我说，由于工作关系，他必须让我和我的助手认识。他还说，他对自己助手的印象不能算最好，因为他觉得他干事冒失，但是他信任他，因为他是党中央派来的、经过考验的同志。尤列克叫他为米雷克。米雷克是尤列克的联络员，特别是在筹建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中，米雷克担负着更多的联络任务。尤列克自己外出

的次数极少。不过，我和米雷克见面的事后来一拖再拖，不久便被搁置起来了。事态发展表明，我在被捕之前没有认识米雷克，这对我来说是一大幸事！

上面我已经提到，尤列克已经成了共产党秘密报刊的总编辑。他的工作很多，但他总是顽强地、勤奋地、怀着一片赤诚的心去完成这些工作。对于党中央机关报，他更是这样。每当我看见当年尤列克编写的秘密传单或杂志时，我的心里便充满无限崇敬、悲伤、但同时又是自豪的感情。这些传单和杂志凝结着我们多少同志的巨大努力，对我们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念，对人民、对新世界——社会主义世界深厚的爱，以及对共产党的无比忠诚！在这些人中不仅仅有尤列克，而且还有许多男女同志，他们参与了秘密传单和杂志的印刷、打字、刻腊板、油印以及秘密散发等工作，许多人还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经过多少人的手才使得一张张的传单在读者中辗转流传，使它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我们民族在纳粹占领时期广泛地、坚强地团结起来，并加深对苏联的热爱和信任。在祖国沦陷时期，我国人民把这些秘密传单偷偷地保存下来直到解放。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是多么珍视这些秘密传单啊！

在那个时期，尤列克所从事的新闻工作是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他进行反抗纳粹斗争的唯一方式。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他曾非常简略地谈到这一点：“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在性格上和能力上都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齐卡是一位干练的组织家……切尔尼是怠工和武装斗争筹备工作的领导人……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作，哪儿需要我们便分头上哪儿去。”但是，我个人除了知道尤列克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以外，对他的其他工作情况毫无所知。我们这些与党的领导同志一道工作的人，除了知道自己工作分内必须知道的事情之外，其余情况我们是从不打听的。

尤列克在把每一期编好的《红色权利报》付印之前，总是把它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批准。1941年夏天，尤列克、卡雷尔和那位“大叔”经常在维苏希尔夫妇家的卧室中进行长时间的讨论，然而我个人却从来没有在那里见到过那位“大叔”。每一次，他们都要花许多时间对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进行研究。从1941年的7月至9月，这种会议一直是在维苏希尔夫妇家中举行的。后来，中央委员会转移到住在维诺赫拉迪区的一个名叫弗拉尼切克的人家中举行会议。尤列克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家人的真实姓名。他只向我透露说，我认识弗拉尼奇科娃太太，当然，这不是她的真名实姓。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就是弗拉纳同志夫妇。

尤列克为了进行工作必须了解群众的情绪。因此，维苏希尔、巴克萨和他的妻子、莉杜什卡、我、叶林内克夫妇、哈奴斯、后来还有里巴日夫妇以及其他的人，他们都从自己的工作单位——从工厂、机关、火车站、商店、车场给尤列克收集情报。他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维苏希尔家有

一位在雅内切克工厂工作的熟人常常来他们家访问。他们向他介绍说，尤列克是一位“教授”。那位男子（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向尤列克介绍了雅内切克工厂的情况和职工的思想状况。尤列克必须了解人民群众是怎样生活的。他通过我们经常保持与他们的联系，他变得更加耳聪目明起来。当然，给他帮助最多的是卡雷尔和那位“大叔”。

1941年7月初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整版都出自尤列克的手笔。在题为《以捷克民族自由的名义投入战斗吧！》的社论中，他是这样解释希特勒侵犯苏联的原因的：

“6月22日凌晨3时零5分，纳粹政策的最后一幕揭开了，纳粹主义的最后日子到来了。这一回，希特勒最后一次表现出他的‘首创精神’：他为自己选定了末日开始的时辰……这是赌棍的行径，这个赌棍正面临着把赌本输得精光的危险，而他却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妄想会出现奇迹，使他的这张牌无人能‘毙’。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奇迹是不存在的。希特勒的这张牌是输定了……”

希特勒为什么要侵犯苏联？因为他知道，不打败苏联，他就无法永久地奴役各个民族，他就不能在欧洲取胜，他就永远不能实现霸占整个世界的计划……”

在进攻苏联以前，希特勒先占领了波兰、挪威、比利时、荷兰、法国、南斯拉夫，他对这些国家采用了闪电战，那就是：不管兵员损失多么惨重，他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首先击溃对方的主力部队，闪电般地包围他们，切断他们与后方的联系，孤立他们，同时迅速插入敌人的后方，在他们醒悟过

来之前和还来不及动员全民的抵抗力量的时候瓦解他们。希特勒也采用了闪电战术去进攻苏联，但是这一次他完全打错了算盘。

尤列克在文章中讥笑希特勒和戈培尔口出狂言。有一次，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一次会议上宣称：拿破仑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建立宣传部，假如他有了宣传部的话，法国人就不会知道他在俄国吃败仗的消息了。当时，尤列克在《红色权利报》上把戈培尔称之为纳粹宣传部里的大骗子佩普卡，按照戈培尔的说法，那么，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后的五个星期中，红军早已经是“被俘两次”，“被彻底击溃三次”，而且他还掌握了“俄国军队彻底瓦解的证据”。

1941年7月18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签订了抗击纳粹德国的互助条约。在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尤列克报告了这一消息，并且写道：

“苏联用自己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条约的行动表明，她现在和过去都没有承认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的现实，她现在和过去都不承认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众所周知，她对慕尼黑会议上的‘公正人的裁决’是从来没有同意过的……这就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人们依然公认，捷克四周的群山依然是它的疆界，正如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和心坎上的它原来的地理位置那样……”

捷苏互助条约还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对希特勒作战的战时状态之中……”

尤列克还向读者介绍说，经苏联政府同意，我们将在苏联国土上建立起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这些部队将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和苏联红军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当然，捷苏互助条约不仅动员了居住在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而且，我们大家现在都处在对希特勒作战的战争状态之中。

尤列克在1941年7月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让我们以胡斯民族^⑩所固有的机智、勇敢和决心去战斗吧！敌人何足惧！敌众我寡又何妨！在敌人面前我们决不后退！”

尤列克为《红色权利报》撰写文章的材料主要来源于收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捷共书记哥特瓦尔德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什维尔马、科别茨基等同志正是通过莫斯科电台的广播把指示发送回国内的。广播中是从来不提他们的名字的，但是尤列克深知，他们在苏联正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工作着。每天，尤列克都要在收音机旁坐上好几个钟头，收听苏联的各个电台，收听捷克语、俄语、德语和法语的节目。占领者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对收听外国“敌”台者严加惩处。每一个收音机使用执照持有者都接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记住——记住，禁止收听外台，违者入狱或处以极刑！”收音机所有者必须把这张卡片挂在收音机最显眼的地方。但是，当时在捷克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遵守了这一命令。

从1941年夏天起，地下《红色权利报》每月出版一次。此外，尤列克还编写出版“号外”。每当《红色权利报》得

以印刷出版，我们都格外感到自豪。它的版面通常是印着密密麻麻小字的四开纸的六页，报头与战前出版的、合法的党中央机关报一模一样。《红色权利报》还常常复写油印出版，报头有时采用了美术字和装饰图案，有时则只用打字机上的大写字母组成。有时候尤列克还把报纸的第一版创造性地设计成“中性读物”的样子。我现在还保存着两份这样的《红色权利报》。第一份首页上的标题是：《业余剧团专用民间戏曲选——J.V.克里萨著：圆锥形纸袋，三幕喜剧。比尔森业余剧团出版》。第二份首页上的标题是：《约·兹纳麦纳切克工程师著：家兔的饲养，1941年，姆拉达·博列斯拉夫纯种家兔饲养协会出版》。

有时候尤列克还希望出版苏联电台播送的广播讲话全文。虽然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收听广播时又作了笔记，但是，他还是不能一字不漏地把整篇讲话记录下来。比如，他从苏联方面得知：1941年8月10日至11日将在莫斯科隆重举行世界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对我们民族来说是如此重要的这种历史事件，尤列克必须在地下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加以报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很自然的。不仅如此，他还计划转载莫斯科电台必将播送的兹登涅克·内耶德利同志的讲话全文。

维苏希洛娃太太把尤列克给我的一封信送到维诺赫拉迪的姑妈店里，尤列克在信中要我把兹登涅克·内耶德利的讲话速记下来，可能的话，还希望我把电台将播送的有关斯拉

夫民族代表大会的一切报导都速记下来，并于星期六晚上约定的时间内送到他那里去。这就是说，星期六晚上莉杜什卡将在耶泽尔卡23路电车站那里等我。

同志们给尤列克找来了一台瑞士造的小型打字机。他试了试，看看这台外表非常娇气的小打字机能打多少份复写纸。当他发现它能打十份复写纸时，他满意极了。起初他不信任它，而现在他变得十分珍爱它。1941年夏天他常在维苏希尔夫妇家中用它打字，不过因为街上能清楚地听到他打字的声音，所以后来他只得停止使用它了。当他带着它转移到巴克萨夫妇家中以后，他只在他们那里才使用这台打字机。

作为新闻记者的尤列克认为，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是《红色权利报》必须用整个“号外”予以报导的一次历史性事件。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完全同意了他的建议。在“号外”的头版上尤列克选登了杨·聂鲁达的诗歌《奋勇向前！》，在社论中他谈论了莫斯科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的特殊意义，这个代表大会与泛日尔曼主义一样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尤列克写道：不论是泛斯拉夫主义还是泛日尔曼主义，都把一个种族凌驾于另一个种族之上，因此它们都反对享有平等权利的各民族的和平共处。正当希特勒威胁着各斯拉夫民族的生存的时候所召开的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是建立在各斯拉夫民族共同的切身利益基础之上的，这些斯拉夫民族不只希望他们彼此能共同生活在和平、自由和友谊之中，而且还希望和所有的其他民族平等相处。

尤列克还把兹登涅克·内耶德利在莫斯科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收进“号外”。这篇发言充满了对我们祖国和民族的炽热感情。兹登涅克·内耶德利在发言中这样说：“现在不是和平时期，现在是进行战斗的时候，为了赢得和平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不是个别的人、而是要全民奋起，同心协力消灭希特勒——这就是我们今天伟大的历史任务……德国法西斯是凶恶的，抗击他们的最坚强、最锐利和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象塔博尔人^②那样坚定不移地宣布说：现在不是奢谈宽大的时候，现在是严加惩处和报仇雪恨的时候。”

尤列克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内耶德利教授充满战斗精神的讲话终于在地下出版的《红色权利报》的“号外”上发表了。我们知道，许多人都收听了莫斯科电台播送的他的这篇讲话。“但是这样还不够，”尤列克说。他相信，最好是把这样的东西印出来，让听众再读上一读，让他们再好好地研究研究。在我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兹登涅克·内耶德利教授的。老百姓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他都怀着崇敬和信任的感情。

尤列克还在“号外”上转载了莫斯科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的宣言，在宣言上签字的有许多杰出的斯拉夫民族的作家和学者，比如：阿历克塞·托尔斯泰，亚力山大·科尔内丘克，杨科·库帕拉，万达·瓦西列芙斯卡，兹登涅克·内耶德利，阿历克塞·斯托杨诺夫等等。

我现在仍保存着三份《红色权利报》的这一“号外”，

它们的印刷方法是各不相同的：一份是在印刷厂排印的，第二份是用蜡纸刻写好以后用油印机印刷的，第三份也是油印的，不过上面只收录了聂鲁达的诗歌《奋勇向前！》和尤列克写的社论《民族抵抗运动》。

地下《红色权利报》的“号外”全是由尤列克一人撰写、编辑、出版的，只有莫斯科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文章才是由我速记下来的。

在八月份出版的党报上尤列克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说：红军的退却和希特勒的胜利只不过是暂时的；从向苏联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起，希特勒便宣判了自己的死刑。“6月22日^③以后的每一天都残酷无情地正告希特勒：我是你那些末日中的一天。”在尤列克的所有文章里都洋溢着苏联必将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坚定信念。在同一期的《红色权利报》上，尤列克还发表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号召书《听吧，布拉格，莫斯科和你在一起！》他这样介绍说：“非常熟悉和热爱我们国家的、著名的俄罗斯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莫斯科电台向捷克民族发表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号召……”

尤列克就这样一期一期地编辑出版着地下《红色权利报》。九月份刊登了他的社论《需要的是行动》。社论中说：

“有什么新闻？这是我们这里许多人在见面时首先说出来的、几乎是取代了问好的头一句话。国际上有什么大事？前线战况如何？希特勒何时垮台？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将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大多数捷克人都提出了这样的或者类似

的问题，这说明他们怀有巨大的政治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离不开政治——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更热衷于知道国际上所发生的大事，而并不那么关心我们国内所发生的大事，并不那么关心我们国内的情况。这样就不好了。了解国际大事和前线战况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当我们把从中引出的结论直接服务于我们国内的本职工作时，这样做才有意义。是的，我们的战线遍及全世界，我们的战线也在东方、西方、地中海和非洲，但是我们的战斗岗位却在这里，在我们国内。

今天的问题不是要看谁如何如何憎恨纳粹主义，如何如何同情苏联。这已不是当前的首要问题了。反对纳粹主义，和苏联及其盟友站在一起——这已经是全民族的共同口号。但是，仅仅停留在仇恨敌人和同情苏联这一点上，任何人也不能使我们的民族获得解放。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第八节 在德军统帅部内为《红色权利报》收集情报

我每次去找尤列克时，都必须向他讲述我和哪些人有过来往。他听到每一个人的名字，总是停下来仔细考虑一番，是否有可能把其中的某些人争取到抗击占领者的斗争中来。

夏天的时候我曾经有几次去看牙痛病。有一次，我在牙医处遇到了库尔特·格拉塞尔同志。他在上衣左胸口上别着

一个犹太人佩带的黄色六芒星。自从纳粹入侵以来，这一回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和他诚恳地握了握手。当时他正要离去。我送他来到前厅，问他现在在干些什么。他说他在革命大街——纳粹占领时期称为柏林大街——参加拆桥工作。后来他便悄悄地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卡洛维发利上学时的同学——现在纳粹国防军统帅部的新闻处工作，他们还时常见面。在晚上，库尔特·格拉塞尔便把六芒黄星摘下来去和朋友会见，而那位朋友则向他讲述许多非常有趣的事。

“他提供的材料可用吗？”我打断他的话说。“那当然，”库尔特毫不犹豫地说。我和他约好再在牙科医生那里见面。关于尤列克的事我闭口不谈。我们是在第一共和国时期长期与库尔特·格拉塞尔共事而认识的。当我一见到尤列克时，便向他讲述了和库尔特相遇的情况。尤列克的眼睛里立刻放射出快乐的光芒。“这样可太好了！”他抚摸着自己的胡子说。“那就让他带点儿东西来，主要的问题是：要看弄到的消息是否可靠。”尤列克心里痛快极了，因为纳粹分子们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雇用着“如此可靠的”雅利安人，这些雅利安人又把绝密的消息泄露给了非雅利安人。

我告诉库尔特，那些材料有人想要。几天后，在牙科诊疗所的前厅，他给了我一个信封口袋，里面藏着他那位朋友提供的情报。我把那个信封带回家中，夹在一本书里藏好，当我去找尤列克时，再把它取出带去。现在，每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我定期去找尤列克，然后在他那里一直呆到星期天的

晚上。库尔特每个星期都给我送一次情报。尤列克不希望我先把情报带回家而后再给他送去。他说，最好能找到一个“中转站”，我可以把情报放在那里，然后再让其他的人去把它取来。我们考虑了很久，到哪里去设立这样一个“中转站”——当时我们称它为“出纳台”。尤列克想起了杜舍克夫妇，他们在革命大街上开设了一间洗衣店，在大战前，我们曾多次到他们家去过。杜舍克同志本来在财政部工作。但是，当部里知道了他是共产党员以后，便下令把他开除了。此后，他和妻子便开设了洗衣店。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他们曾在自己家里掩护过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德国侨民。尤列克想，如果杜舍克夫妇同意我们把库尔特送来的信封口袋先存放在他们那里，那就太好了！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因为洗衣店是一间店铺，在营业时间进出的顾客多得很。

我来到杜舍克夫妇店中。他们稍加考虑以后便同意了我的请求。无须多问，他们便猜出了我是来替尤列克安排的。我没有列举任何人的姓名，我只是对他们说，每个星期我将把一个信封寄放在他们那里，然后有一个青年女子或者青年男子来取，届时他们会问，古斯塔是否给她（他）带来了什么东西。此后，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总是把库尔特送来的信封口袋带到“奇斯蒂”洗衣店中。尤列克把杜舍克的名字改称为“奇斯蒂”，因此，后来轮流去取信封口袋的约什卡、莉杜什卡、或者根尼亚都不知道杜舍克夫妇的真名实姓。

1942年春天有一次我又来到杜舍克夫妇的店铺门口。当我走进他们的洗衣店时，已经是过了十一点了。我看见杜舍克同志正两手抱头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他听到我的招呼后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十分焦急地说：“他们刚刚把她抓走了！”他的话把我吓了一跳。“你说什么？”我惊奇地问道。“他们刚刚把她抓走了！”他着急地重复着。“谁抓人了？”我问他。“盖世太保！”说完，他继续焦急不安地来回踱起步来。“他们把谁抓走了？”我好似看到，盖世太保正把到洗衣店来取情报的莉杜什卡或者约什卡带走；我似乎看见，盖世太保正冲入巴克萨夫妇的住宅，显然，尤列克此刻也在他们家中，因此他也不能幸免……但是，现在杜舍克焦急不安的、痛苦的声音不停地在洗衣店里回荡：“他们刚刚把她抓走了！他们刚刚把她抓走了！”“他们把谁抓走了？”我已经这样问了好几遍。“他们抓走了我的妻子！”他终于说出了被抓的是谁。“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刚刚把她抓走了！”

一年多以后，当我在集中营中见到了杜什科娃同志本人时，我才从她那里知道1942年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我们找到杜舍克夫妇之前，他们店里已经设立了一个地下联络站，但是他们在我面前闭口不谈此事。一天，给他们送信的妇女被捕了。盖世太保暂时没有去惊动洗衣店。又过了一些时候，杜舍克夫妇以为一切都已平安无事，以为他们并没有被人出卖，因此同意我们在他们店里设立了第二个地下联络站。数月后，盖世太保想起了杜什科娃同志，因而逮

捕了她。他们抓她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地下联络站暴露了，而是因为第一个地下联络站的缘故。直到最后盖世太保也没有发现我们的这个地下联络站。

我急忙从洗衣店走了出去。我替杜什科娃同志十分惋惜，我心里也感到十分难过。盖世太保几乎就要把尤列克装入网中了！我必须立即行动。下午，尤列克派来的人要到洗衣店去。但是现在，洗衣店肯定已被盖世太保包围了。必须向尤列克发出警报，千万别再派人去找“奇斯蒂”夫妇了。但是，如果有人跟踪我又怎么办？时间飞快地过去，因此我必须当机立断。我跑步来到最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中，给小里巴日挂了一个电话。他是乌黑尔尼市场一间商店中的售货员，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尤列克有时便藏在他父母家中。里巴若娃太太知道叶林内克夫妇家的地址，而叶林内克夫妇又知道巴克萨夫妇家在什么地方。尤列克现在肯定会在上述三户中的某个家里。我在电话里告诉小里巴日说，要他立即转告他妈妈，就说：“奇斯蒂”太太得了重病，已住疗养院，必须改天再去找她。在陌生人面前说生病和住疗养院不致引人注意，因为只有了解内情的自己人才知道：“得病”意指“被盖世太保追捕”，“住疗养院”意指“进监狱了”。此外，小里巴日并不知道，谁是“奇斯蒂”太太；这一点，就连他的妈妈、里巴若娃同志也不知道。机器运转起来了。小里巴日把口信告诉了他的妈妈，里巴若娃同志又立即跑到叶林内克夫妇家中，叶林科娃太太又马上找到了巴克萨夫妇。消息及时传到了尤列克那里，但是，当时去“奇斯蒂”洗衣

店领取情报的人不是约什卡，而是居住在弗尔肖维采区的根尼亚。尤列克马上派约什卡去追根尼亚，但是当她赶到他家时，他已经出发了。他正在去“奇斯蒂”洗衣店的路上。她从根尼亚家飞也似地跑了出去，在街上她要了一辆出租汽车，然后她乘车赶到了革命大街。当时的情况真是一发千钧！根尼亚正向洗衣店越走越近。约什卡飞快地向他迎了上去，一把拉住他，把他抱住。后来，约什卡告诉我们：当时，不少行人对他们这对青年的“疯狂举动”直摇头。此后，盖世太保也从未发觉根尼亚的父母——维滕格尔夫妇全家反抗纳粹占领者的斗争活动。

我们失去了一个地下联络站。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也放弃了从库尔特那里得到的情报。尤列克知道，我有时也去访问哈沙全家。约瑟夫·哈沙同志，原解放戏院的经理，在1939年春天曾用饭票支援过我们。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当时才能凑合着吃上几顿饱饭，对此我们要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后来，他还以其他方式帮助过我们。当尤列克成了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的总编以后，他需要有一台工作用的、性能良好的收音机。巴克萨夫妇有一台，虽然还能使用，但是常常需要修理。尤列克要我和哈沙谈谈，看看他是否能给我们弄到一台好的收音机。哈沙在哈维日街自己开设了一间留声机唱片店，但是他不出售广播器材。不过，他还是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告诉他，机器弄到后，会有一个男人来取，他会说是我派他来的。当然，我没有说这是给尤列克弄的。后来，当巴克萨同志来取货时，哈沙让他到另一家

店铺——哈沙的朋友开设的店铺——去领取收音机。但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原来，纳粹当局曾颁发过一道命令，命令说：凡购买无线电器材者必须出示本人的公民证，同时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登入特别卡片档案。哈沙同志忘了向我提及此事。结果，巴克萨同志不得不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留在店里。我又立即赶去找到哈沙，生怕巴克萨的名字落到外人手中。哈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他认识的那个商人那里看到了特别卡片档案，同时偷偷地把登记着巴克萨姓名、住址的卡片从档案中抽走。

维苏希尔夫妇家里也没有性能优良的收音机。后来，哈沙也替他们弄到了一台。一个时期以来，我经常把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给哈沙送到店里，稍后，我还给他送去其他的地下刊物和传单，而他又把这些地下报刊和传单传给另一个同志，那位同志在伊诺尼采区的瓦尔特洛夫卡工厂——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

当“奇斯蒂”洗衣店这个地下联络站停止工作后，尤列克派我去找哈沙，问他能否让一位男人把一个信封口袋留在他的店里，然后会有一个小伙子或者一位青年妇女把信封口袋取走。哈沙满口答应愿把自己的店铺为此目的而提供方便，同时幽默地说：“没问题！有一个党卫军常到这里来和我的女售货员纠缠，因此，信封口袋会更加安全，因为俗话说‘丈八蜡台跟前黑’嘛。”这样，我们又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地下联络站。

有一次，我给库尔特·格拉塞尔带来了口信：党中央委

员会已吸收他参加党的工作，他必须想方设法避免被驱逐出境。但是，当时他回答说：“如果我接到传票怎么办？我有妻子、岳父和岳母，他们的生活都靠我一人维持呢！”1942年夏天，海德里希白色恐怖^④发生后，库尔特·格拉塞尔全家果然被列入驱逐出境的名单，后来便全部被抓走了。这一点，尤列克已经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而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已是全国解放以后的事。他们全家人一个也没有回来。



1941年8月底，当我在维苏希尔夫妇家中告别尤列克时，他告诉我，让我8月28日下午1点到维诺赫拉迪区的姑妈处去，然后从姑妈小铺子的门口好好地看一看对面小花园里的人行道。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和姑妈站在敞开的大门旁边，全神贯注地望着马路那边的小花园。突然，我看见一位壮年男子，蓄着胡子，身穿深色衣服，头戴黑色礼帽，手里轻轻地拄着拐杖，从卢德米拉方向向我们走了过来。在强烈的阳光下面，他脸上的眼镜不时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那位男子看见了我和姑妈。当他走到我们正对面的马路边上时，他取下礼帽，向我们微笑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开了。我们俩默默地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姑妈问我：“他是谁？不会是尤列切克吧！？”我没有回答。她说：“那孩子我恐怕都认不出来了。多么可怜啊！”

纳粹占领时期香烟是凭票供应的，只有男人才能领到

“香烟票”。尤列克虽然烟瘾很大，可是他却能坚持不吸香烟。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看书时可以不吸烟。但是当他写东西时，他却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多。我们想方设法去收集香烟。在德伊维采区我们居住的那条街上，诗人罗汉开设了一个纸烟店，他从前是一位有天才的、科班出身的画家。我个人不认识他，因为他本人不卖香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负重伤，后来便完全瘫痪了。整整十年直到现在他依旧缠绵病榻，完全不能活动。他的家人至多是把抬到轮椅上，推着他在德伊维采区的街道上散步；或者把他抬到一张椅子上，让他坐在纸烟店里，他的朋友们常常到那边去看望他。虽然他身患重病，但是，直到现在他还是富于创造精神和十分关心世界大事的人。他曾出版了几本诗集。其中一本是在人民书局出版的。

在和尤列克商量后，我访问了纸烟店老板、诗人约瑟夫·罗汉。我问他能否卖些香烟给没有“香烟票”的人。他说可以，但是他希望知道是给谁的。我不能向他泄露这个秘密，因此我说我再去打听打听。

尤列克授权给我说，如果我认为可以，不妨把他的名字告诉他，因为尤列克本人无法判断这位纸烟店老板、诗人的可靠程度。我从非常了解他的、与他来往密切的同志和朋友们那里收集到了有关他的情况。结果发现，他是一位正直的进步人士，是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人。以后我才来到罗汉那里，告诉他说：香烟是给尤列克的。这样，罗汉夫妇也属于少数几个知道尤列克还住在布拉格的人们。

我从他那里立即收到了五盒香烟，他还说，今后每个星期我还可以到他那里去购买同样数量的香烟，有时还可以增加一些。我和罗汉夫妇渐渐地交上了朋友。后来我常常给他们送去地下出版的《红色权利报》和其它秘密刊物，他们读完以后便传给别人。罗汉还为地下刊物写了一首诗，是他口授、他妻子抄录的，因为他瘫痪的手已无法握笔。尤列克把该诗发表在青年杂志《前进》上。1942年春，我受尤列克的委托，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罗汉积极帮助反抗占领者的斗争向他表示感谢，同时把一本为数不多的、珍贵的出版物《苏联宪法》转交给他，《苏联宪法》是当时（1942年春天）在尤列克主持之下秘密出版的。在整个纳粹占领时期，罗汉夫妇把这本书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

1942年4月尤列克和我被捕以后，罗汉夫妇还经常把一些替换的衣服给我们寄到监狱中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不知道，寄衣服的就是他们。当时尤列克和我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不能往家里写信。尤列克被捕时穿着的那件衬衣，到第一次审讯时已经破烂不堪。幸亏同狱难友佩舍克老爹无私地支援了他一件。后来，突然间有人把全新的衬衣给他寄到监狱中来。当我在盖世太保司令部见到尤列克时，我发现他身上穿着全新的、一次也没洗过的、用他从未穿过的一种布料做成的衬衣。我回想起尤列克还是一位自由人时的一段往事：每当他穿上一件新衬衣时，他总会遭到警察的逮捕或者搜查。他从来都不迷信，因此对穿新衬衣从来不认为是犯了什么禁忌。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而已，他这样说。由于我老

担心他会出事，由于我为了求得一时的自我安慰，我常常把他的新衬衣带到比尔森给爸爸送去，让他在衬衣下水之前先穿。不管尤列克怎样嘲笑我，我还是坚持这样做。而现在他又收到全新的衬衫了。这件新衬衫决不是爸爸、妈妈或者莉巴寄来的。他们知道我们忌讳穿新衬衣的底细，因此他们肯定是不大会这样做的。一次，我终于见到了尤列克，问他衬衣是打哪儿来的，谁送给他的。“一位陌生人呗，”他耸了一下肩膀。我们就是绞尽脑汁，也无法猜到寄赠衬衣的人究竟是谁。当我被押解到查理广场监狱以后，我才得知：在尤列克父母听到他被捕的消息之前，是罗汉夫妇一直关心着我们的生活，他们还特地给尤列克定做了衬衣，因为罗汉穿的衬衣太大了。

1941年9月末，希特勒任命刽子手海德里希为掌管捷克和摩拉维亚事务的“帝国护国公”。海德里希一上任便宣布全国戒严。无数捷克爱国者被处死，其中许多是我们熟悉的同志，他们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便在《红色权利报》编辑部工作，如杨·克雷奇、瓦茨拉夫·克然、弗兰季舍克·克日热克、弗拉季斯拉夫·尚特罗赫。他们的牺牲使我们悲痛万分，每当我们一想起再也不能和他们相见时，我们的心里便十分难过。一批又一批我们亲密的战友牺牲的消息不断地传进我们的耳朵。他们中有布拉格州的司库弗拉斯塔·哈肯同志，稍后，我们又听到了我们的另一位好友、《创造报》编辑库尔特·康拉德同志也惨遭杀害。本来，一位老同志因病逝世的消息——尽管尤列克和他的交往不深——就会使尤列

克十分难过，而现在，当许多与他多年共事的青年同志在纳粹刑场上纷纷倒下的时候，他的心里会是一股什么样的滋味！但是，这些可怕的消息并没有使他感到绝望。相反，更坚定了他斗争的决心。一个人只有懂得伟大的爱他才能懂得伟大的恨。尤列克以革命家的笔杆证明，他对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怀着多么深厚的爱啊！

他在十月里秘密出版的题为“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永远坚强”的《红色权利报》社论中写道：“戒严令颁布后，希特勒的刽子手们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疯狂镇压丝毫不能改变我们全民族的坚定不移的决心，那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团结起来，把反抗妄图从肉体上消灭我们民族的禽兽行为的正义斗争进行到底。”

从1941年9月上半月起，在捷克和摩拉维亚，人们开展了抵制保护国报纸的运动，后来它变成了全民族的一致行动。几乎所有的人都拒绝购买这些报纸。捷克新闻记者中勾结纳粹分子的败类们哀叹什么：我们的民族正走向“毁灭”，据说，没有报纸的民族必然要灭亡。当英雄的、勇敢的、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在纳粹占领者的魔掌中死去的时候，他们却恬不知耻地大放厥词。在十月里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中，尤列克向那些卑鄙的、卖身投靠纳粹的新闻工作者严正指出：“的确，那些卑鄙的家伙正千方百计地要把捷克民族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力图使我们民族失去报纸，因此，他们把《捷克语言报》变成了戈培尔的传声筒，把《民族政策报》变成了推行戈培尔政策的吹鼓手，把《民族工作

报》变成了为戈培尔效劳的走卒。但是，捷克民族决不会灭亡，因为她有自己的报纸。这些报纸在地下出版，它们是在极其险恶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编印出版的。它们的版面也许是貌不出众，但是在传播真理方面它们却是出类拔萃的。因此，我们的民族喜欢阅读它们，辗转传递它们，热爱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民族自己的报纸。”

在十月里，我们的党准备起草中央委员会宣言。尤列克在维苏希尔家里常常和卡雷尔和“大叔”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此后，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进行宣言的起草工作。当我去找他时，他把写好的宣言念给我听。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宣言的每一句话应该是尽可能的明确易懂，而它的精神实质应该具有最强的战斗性。当他完成了草稿以后，他又跟卡雷尔和“大叔”进行新的磋商和讨论，提出意见并重新修改。我至今还保存着两份尤列克起草的宣言草案。

后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宣言以后，它不只是党中央的宣言，而且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民族抵抗运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们，”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命运现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现在的行动怎样，我们国家未来的前途就会怎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也就会怎样……英勇无敌、装备精良的红军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打破了他的战争机器不可战胜的神话……希特勒这个坏蛋多存在一天，我们大家便要多流一天的血，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千方百计地加速他的灭亡。是的，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做！……因为面对希特勒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死亡，任何东西

都不能分裂我们。纳粹主义妄图消灭捷克民族的灵与肉，捷克民族必须起来打倒纳粹主义！……我们大家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希特勒。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我们民族的生存和自由奋斗到底！”

宣言中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民族抵抗运动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革命委员会，并且号召全体公民，在全国各地立即成立统一的民族革命委员会，它们将成为为争取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与独立的政治斗争的领导机关。“只有战斗，只有共同的战斗”——宣言最后写道——“才能使我们赢得胜利！因此，让我们投入战斗吧！……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

根据1941年10月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的文章“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可知，这一时期捷克地区的矿工罢工、纺织工人的罢工和五金工人的罢工开始蔓延。在纳霍德、赫拉德茨·克拉洛维、比尔森和布拉格，工人们通过罢工斗争赢得了提高工资和增加配给的胜利，特别是油脂、面包、面粉、肉类、土豆和牛奶的配给量增加了。

尤列克在《红色权利报》上开辟了两个专栏，一个专栏为“来自我们反抗希特勒战场的消息”，另一个专栏为“进攻和看法”，这两个专栏在战前合法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以及在纳粹占领时期捷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秘密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原来都是有的。尤列克还经常在《红色权利报》上公布我国各阶层人士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革命

战争基金”捐款的情况，正是在纳粹分子首次颁布戒严令期间，我们收到了数额最多的捐款。

尤列克曾多次在《红色权利报》上刊登了杨·聂鲁达的这样的战斗诗句：

“我们诞生在暴风雨的年代，
在漫天的阴霾中奋勇向前，
迎着崇高、神圣的目标昂首阔步，
我们只俯首于自己民族面前。
我们知道征途上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任凭它雷鸣电掣、寒风凛冽，
那不过是固有的捷克乐章，
我们踏着它的旋律向前、向前、永向前！”

第九节 纳粹黑暗统治下的盛大节日

1941年11月7日举行了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庆祝活动。尤列克常说，一年中有两个伟大的日子对他说来是最有意义的，那就是：“五一”和“十一月七日”。五月一日之所以是最有意义的日子之一，是因为在这一天，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举行战斗检阅，而国际工人阶级是唯一能从根本上变革世界的阶级。尤列克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为新世界奋斗的千百万战士中的一员。

早在1918年，当尤列克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时，他便第一次参加了比尔森工人的五一节游行。二十年后，他在《创造报》上发表了回忆那次游行的文章。当时我们共和国的独立正处在危险之中，共产党正竭尽全力为成立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统一阵线，保卫我们的祖国而斗争。尤列克在1938年的那篇文章中写道：1918年，在比尔森广场上他站在巨大的工人队伍中间，他——一位年轻的中学生，为了能去参加这一次示威游行，当时还怀着几分惶惑的心情开始了罢课，他对示威游行的这种崇敬和仰慕之情是从爸爸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当我和劳动人民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团结的这股巨大力量汇集在一起时，我惶惑不安的心情便烟消云散了。”

据我所知，从那个时候起，尤列克在一生中只有两次没有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一次是在1932年，在捷克北部地区矿工大罢工以后。当时，他在宪兵和龙骑兵向罢工工人发起进攻时被马踩伤了腿，紧接着还生了一场病；另一次是在1933年，那年他在服兵役，五一节那天士兵们都呆在兵营中待命。除此之外，他每年都参加五一节的示威游行，不管是在比尔森、布拉格、柏林、莫斯科或者甚至在纳粹的监狱里。在《红色权利报》上，在《创造报》和《红色晚报》上，他曾多次发表文章谈到许多次这样的示威游行。最后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他记录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

尤列克一年中第二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日子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周年纪念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

活动他没有一次不是积极参加的，他或者是发表热情的文章、做精彩的报告和令人信服的讲演，或者亲自参加庆祝大会，不论是在布拉格、在州城或县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穷乡僻壤，或者是在苏联，在莫斯科、在中亚细亚的塔什干，或者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地下、甚至在纳粹的监牢里。

1941年11月6日晚上，我应约和莉杜什卡见了面，她把我领到叶林内克夫妇家中，尤列克当时也在那里。在厨房里，在铺着洁白台布的餐桌上，主人用节日的茶点招待我们。桌子旁就坐的除我们俩外还有：房屋的主人——叶林科娃太太（她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妇女，黑油油的头发，白皙的皮肤，粉红色的脸蛋儿，快活而富有朝气），他的爱人（一位电工，比她稍大几岁，不爱说笑，但是心地善良）和她的弟弟帕夫利克（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勇敢刚强，如同在数月后所证明的那样，当时也在这间房子里，他和姐姐、姐夫、弗里德夫妇、米雷克和尤列克一同被捕了）。

叶林科娃太太只称尤列克为“首长先生”。听起来好像是郊区口语中的一种习惯用法，但是她这是为了说明，她把他视为地下斗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当时，尤列克的名字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称他为“教授先生”，有的人不加任何称谓只称他为“你”或者“您”，只有巴克萨夫妇——当尤列克住在他们家时——才称他为“尤拉”。

当时，尤列克在叶林内克夫妇家里对我说：“一会儿要广播斯大林的讲话。我请你把它速记下来。”他计划把斯大林的讲话印成《红色权利报》的号外，以后也确实作为号外

散发了。我们紧挨着收音机坐了下来，尤列克调整着波长在找电台，我们则紧张地等待着莫斯科电台的播音时间。广播开始了，大家都屏息静听，当听到下面这段话时，大家都满脸绯红，眼睛里闪耀着光芒，这一切说明我们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

“我们并不追求、也不可能追求这样的战争目的：把自己的意志和社会制度强加给那些等待我们援助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被奴役的民族。我们的目的是支援这些民族和它们的反抗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斗争……

但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必须粉碎德国入侵者的军事力量……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属于我们！”

这是一篇强有力的演说，它使人树立起坚定的信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红军必定能打败希特勒；这篇演说同时又鼓舞着我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加速希特勒的垮台。

深夜时分，我把斯大林讲话的速记稿整理出来，尤列克又校阅了一遍，同时加上他自己的注释。

那天夜里我回到德伊维采区的寓所。尤列克叮嘱我把第二天（11月7日）晚上苏联电台的广播也速记下来，11月8日再把整理好的记录给他送去。那天晚上，莉杜什卡又把我领到叶林内克夫妇家中，然后我和尤列克从他们家中出来，动身到弗尔肖维采区去找维滕格尔夫妇。我们踏着数不清的米赫列大坡的石级来到下面的谷地，沿着白天河水浑浊发

绿、而现在黑黝黝一片的、流经米赫列区和弗尔肖维采区边缘的博季奇河向前走去。然后我们向右拐，绕过运动场，穿过昏暗的弗尔肖维采区的街道，往上来到了保加利亚街。在博季奇河沿岸空无一人的小道上，尤列克用口哨向我轻轻地吹起了“女游击队员之歌”的曲调。当我第一次听见这首歌曲时，苏联还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当时，“啊，虽然风暴早已经停息，英雄的往事却依旧在心中回荡。”这样的歌词如同赞颂着一个久远的、人们将永世不忘的英雄时代。但是现在，希特勒煽起的战火又在苏联的国土上燃烧。多少女游击队员又手握机枪和男游击队员一道并肩战斗，又有多少女游击队员在乌克兰广阔的原野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来到维滕格尔夫妇家时，老维滕格尔、根尼亚和客人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和哈奴什同志已经在狭小的厨房间里等候我们。维滕格洛娃同志则围着锅台忙个不停，她在准备茶水。这次在维滕格尔夫妇家中举行的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活动规模很小，但是充满激情。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红场上的讲话使大家心情激动、精神振奋。“用不了多久，”尤列克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在瓦茨拉夫广场上，千千万万的人将举行十月革命的周年庆祝活动。斯大林同志说：‘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可能还要一年，恶贯满盈的希特勒德国必定要垮台！’”

这些话鼓舞着党的第二届地下中央委员会，成了它此后在国内开展抗击占领者的斗争的指导方针。

当时，我们的心里乐开了花，似乎解放的日子就在眼

前。我们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红旗歌、游击队员之歌、哥萨克姑娘之歌，我们唱了许多捷克歌曲，有忧伤的、革命的和快乐的。直到深夜我们才各自离去。

转入地下的同志们没有配给票，他们买不到面包、面粉、肉食和黄油。假如得不到人们的关心和帮助，他们肯定会被饿死的。

建筑师特鲁克萨常到德伊维采区来访问我。稍后，我也常常替尤列克把地下出版的《红色权利报》给他送去。读完以后，他还把报纸传给他的熟人，有时候甚至把它散发到外面去。一次，他带着一位青年人来看我，这位青年人叫莫尔库普，是捷克斯洛伐克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人员。他对苏联书籍表现出极大兴趣。我把我们家中大书柜里的一本书——波兰作家布鲁诺·雅塞涅斯基描写苏联塔吉克斯坦建设情况的小说《脱胎换骨》——借给他。在纳粹占领时期，那本书辗转流传，使许多读者成了苏联的忠实朋友。过了不久，莫尔库普把读完的书还给了我。我又把一本新书借给他。最后借给他的书是内耶德利的著作《列宁》，该书于1938年由杨·弗罗麦克^⑤出版。我和莫尔库普经常谈论书籍、谈论苏联和纳粹主义。当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憎恨德国占领者。我常常感觉到，他来找我是为了能找到鼓舞力量，为了能听到苏联击败希特勒的好消息，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希特勒却不停地在向东推进。

有一次，他在我家问我是否需要什么东西。我反问他我

能要些什么。他回答说，比如香烟，因为他不吸烟，或者肉票。我说确实需要，但不是我自己用。他也没有多问。他从特鲁克萨那里知道我和我丈夫的详细情况。

第二天，他送给我好几盒香烟和一些肉票。此后，他还定期把肉票给我送来。如果我不在家，他便把肉票用信封装好投进我家的信箱。有时候肉票的数量很大，足可以买到20公斤猪肉。我把这些肉票给尤列克送去或者托索娜·科热尔科娃送给乌黑尔尼市场店里的小里巴日。小里巴日的妈妈再负责把这些肉票分发给转入地下的同志们。最有趣的是，如同莫尔库普后来告诉我的那样，他给我送来的肉票已经用过一次了，现在是第二次用它们去买肉。这样一来，便给占领者的市场制造了混乱。

莫尔库普是帮助过我们同志的许多人中的一个。除了巴克萨夫妇以外——他们是从农村的亲戚那里弄到食物，去供应转入地下的同志们的——我还要提一下兄弟会的仓库保管员帕维尔·弗里德同志。在兄弟会中央理事会的支持下，弗里德为了解决地下工作者的膳食问题忘我地工作。尽管这样，有时候也还闹出了笑话。莉杜什卡·普拉哈谈过一件事：有一次，她把几个鸡蛋包好给尤列克送去。而每当尤列克收到食物时，他总是要认认真真地把它平均分配给其他的同志。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又把一半鸡蛋包好，托人给“大叔”送去。“大叔”收到后大为惊讶。因为这些鸡蛋正是他送给尤列克的。

1941年夏天左右，尤列克弄到了一张假身份证。在这张用

德文和捷文写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公民”的空白身份证上——它是我们的同志通过我所不知道的途径，从某警察局搞来的——尤列克贴上了一张他自己戴着眼镜、蓄着八字胡和连腮胡子的照片。该身份证的号码为19719号，签发日期为1941年2月26日，上面盖有仿造的布拉格警察局印章，此外还有警察局长模糊不清的签名，以及尤列克亲手书写的名字雅罗斯拉夫·荷拉克。这张身份证正是发给叫这一名字的公民的。身份证上所记载的尤列克——雅罗斯拉夫·荷拉克——的履历是这样的：教授，已婚，1893年7月25日出生于姆涅尔尼克，布拉格人；住址为：布拉格XIV，山谷街25号；中等身材，深栗色头发，褐色眼睛，中等鼻子，连腮胡须，匀称的嘴，以及修补过的牙齿。身份证上的尤列克要比实际生活中的尤列克老十岁，履历表上的其它项目统统都是编造出来的，但是乍一看去，这张身份证似乎还是无懈可击的。

第十节 红色报刊的海洋

党加强了抗击占领者的斗争。纳粹分子逮捕了党的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和许多其他同志，使她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党逐渐恢复了活力。

为了使巴克萨的寓所不引起他人怀疑，外人必须尽可能地少去。莉杜什卡跟米雷克搬到了住在荷兰大街的一个叫史米多娃太太的家中。尤列克在一个星期中总有几天要从巴克

萨家搬出去居住，他或者去找叶林内克夫妇，或者去找里巴日夫妇。里巴日夫妇一家住在庞克拉茨区维赫洛瓦街1216号。里巴日同志是一位面包厂的工人。他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喜欢参加业余剧团的演出。他们的儿子在老城区一间漆布店中当店员。他们住在二楼，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小厨房。老里巴日夜班工作，白天睡觉。当尤列克来到他们家后——这是通过叶林科娃同志介绍的，她和里巴若娃太太交往甚密——老里巴日就搬到厨房间去睡觉，而让尤列克和他们的儿子住在卧室里。盖世太保竟全然不知，尤列克便藏在他们家中。当我到他们家去找尤列克时，连他们的儿子也搬到厨房间去。他们对尤列克和我的热情好客使我们十分感动，而这对他们来说却是多么的危险。

在里巴日夫妇家中，尤列克工作的房间里有一张低矮的茶几，尤列克常常弓着腰趴在这张茶几上草拟文稿（这是由于茶几很低，而凳子又很高的缘故）。他工作时总是穿着皮大衣，因为房间里没有生火；他翻动每一页稿纸时都必须轻手轻脚、倍加小心，以防被隔壁邻居听见。双手冻僵了，他便到厨房里去烤上一会儿。里巴若娃同志给他递过茶去让他暖一暖身子——他们家没有他喜欢喝的咖啡——他则往炉子里加着木柴，帮助里巴若娃同志烤制点心，同时向她讲述关于希特勒的许多笑话；而她和她的丈夫老里巴日又向尤列克介绍人们在上班和在商店里时都谈论些什么。当时是喜讯频传，因为从1941年冬至1942年，红军不只顶住了德军的进攻，而且开始转入反攻。红军每收复一公里失地的消息都大

大地鼓舞着我国人民的斗志。我们中大多数人相信，那年冬天，红军必定能把希特勒匪军最后从苏联国土上赶出去。等到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希特勒很快就要完蛋了！如果当时有人对我们说，开辟第二战场要两年以后才能办到，那么我们是不相信他的。在里巴日夫妇家的厨房里，我们虽然只能轻声说话，而且要把收音机打开以后，但是，尤列克却能够用紧紧贴靠在收音机上的一只耳朵听清莫斯科和伦敦的广播，而此时离他仅两步远的任何人都听不见广播的声音。

晚上，当我从叶林内克夫妇家中或者从里巴日夫妇家中走出来的时候，尤列克常常要送我一程。我把他那里的地下刊物带出去。我们穿过漆黑偏僻的小巷，有时还从盖世太保庞克拉茨监狱的高大围墙下面走过去，这时，他只是轻蔑地一笑，俗话说：“丈八蜡台跟前黑”。他不再装扮成瘸腿的样子，因为布拉格被漆黑的夜幕笼罩着，晚上十点左右街道上已空无一人。有时候，我们又手拉着手从耶泽尔卡区的山顶上走过，在左面的山坡上一排排的楼房矗立着，而在右面的山脚下，耶泽尔卡河正从这里徐徐流过。有时候圆圆的月亮伴随着我们。“月亮宛如天堂里的宠儿撅着小嘴、淘气地微笑着，”尤列克即兴念起了哈夫利切克的诗句。我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尤列克则有一份伪造的身份证。我从他那里带出来的地下报纸和刊物包成一捆放在我的网兜里面。如果敌人截住我们，我就要把网兜扔掉。但是，这种事情我连想也没想，只要和尤列克在一起，我心里便感到踏实和安全。

每个星期总有一两天的晚上，尤列克要从里巴日夫妇家

到巴克萨夫妇家去用打字机把手稿打成清样。他有他们家大门和房门的钥匙。无论他何时前去，他们都表示欢迎。每一期地下杂志出版以前，尤列克总是先把校订好了的清样复写十份，然后由联络员把它们分送至各个“印刷厂”。所谓“印刷厂”只不过是同志们办公室中或寓所里的打字机而已，他们用这些打字机把各期杂志的文章打在腊纸上，然后用藏在各个房子里或地下室的油印机把它们油印出来。当然，参加工作的也有真正的印刷厂，如舒姆贝拉同志的规模相当大的印刷所和伊万（即杨·维斯科奇尔同志）的印刷所。在梅兰特利赫出版社也有好几位工人秘密地印刷地下《红色权利报》。医生们也有自己的印刷厂。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我所不知道的印刷厂。就连上面我提到的那些印刷厂，也是在我被关在佩切克宫以后才从同志们那里听来的。

印刷地下《红色权利报》必须弄到大批的纸张和腊纸。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被破坏以后，为了使《红色权利报》能顺利地继续出版，从一开始我们便想方设法收购纸张和腊纸。很难从不认识的纸商那里买到大批的纸张，同时这样做也太引人注意。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各种买纸的渠道。尤列克派我去找在捷克民族议会中工作的杜哈切克同志。我多次从他那里买到了整袋的腊纸，后来还弄到许多纸张。这些东西他是从那里弄来的，我自己也无从知道。

1941年11月6日和7日斯大林讲话发表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抗占领者斗争运动的灵魂——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斗争。在国内，她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政党：尽管她遭

到了官方的解散和禁止，但是她作为一个党在继续活动，并指导着反抗占领者的斗争。其他的政党或者宣布自行解散，或者彻底瓦解、以至无法开展任何积极的活动。它们的某些党员只作为个人在继续进行着斗争。即使他们还保存了一些小组，但是他们缺乏坚定的路线和具体的纲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地下的民族革命委员会开始建立起来。领导鼓动宣传部工作的尤列克，在得到党中央的同意以后，准备出版另外一些杂志。他希望能找到在大逮捕中幸免于难的、原共产党报刊的编辑们，吸收他们一道工作。他派我去找艺术家俱乐部书记鲁博什·林哈尔特同志，向他打听有关布隆茨利克同志的消息。鲁博什·林哈尔特同志不仅知道，而且还和他保持着联系。在他的帮助下，尤列克和布隆茨利克于1941年冬在叶林内克夫妇家中会见了。此后他们接头的时间与地点全由他们自己安排。接头的方法是这样的：我先从奥尔比斯出版社的哈拉斯那里给尤列克送去一张支票，尤列克在支票上填上一定的金额，放在信封里封好后，再把它寄到指定的地点，布隆茨利克便可以收到它了。支票上的数字便是接头的日期和时间。

党中央委员会力求把地下报刊传播到我国人民的各个阶层中去。我们为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出版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它宣传共产党员们所执行的、并把它们贯彻到生活中去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谁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便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积极地为反抗希特勒占领军而斗

争。

在我们这个被奴役的国土上，和共产党员们站在一起的还有许多爱国人士，他们憎恨纳粹党人，信任并衷心地同情苏联。许多爱国人士已经积极开展了反抗占领者的、然而是无计划、无组织的斗争。加之以伦敦电台号召“等待”，这样便进一步使我国人民的斗争削弱了。共产党争取所有的捷克人参加共同的斗争，以便扩大和巩固全民族的统一阵线。因此必须出版新的杂志，这种杂志应有助于争取爱国者，应能鼓舞和激励他们。这样的杂志应该由以共产党为首的中央民族革命委员会出版。尤列克被授权筹备它的出版工作。他翻来覆去地考虑了很久，希望给新杂志起一个简明而有力的名字，这个名字不只能吸引读者，使读者听起来亲切、悦耳，而且还应该能鼓舞他们的斗志。

有一次尤列克问我：“杂志的名称叫‘塔博尔’，再加一个小标题‘是我们的纲领’，你觉得怎么样？”当党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批准了这个建议后，尤列克的工作又增加了。他自始至终为该杂志亲自撰稿，因为当时人手不足。1942年1月杂志创刊号出版。塔博尔——胡斯运动传统的象征——召唤着读者去参加反抗占领者的斗争。在创刊号的刊头上，尤列克摘录了塔博尔人当年的战歌；在第二期的第一页上他引用了杨·日什卡^③1922年给兄弟的多马日利采村居民的一封信：“我们招募普天下之仁人志士为反对捷克民族的死敌而战。为此，你们亦应揭竿而起，人不分老幼，愿万众一心随时准备战斗！”

党中央委员会的出版工作并没有因为有了《红色权利报》和《塔博尔》杂志而就此止步。在我国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从不参与任何党派活动，他们对政治“从不关心”。他们是所谓的逍遥派，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他们说：“德国出了个希特勒，这跟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跟它又有什么关系？”大选时他们选举执政的农民党，或者捷克社会党，或者其它许多资产阶级政党中的某一个党，或者索性不参加选举。这些逍遥派中的某些人并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他们这样做便不自觉地成了反动政党在推行其反人民政策时的帮手，他们的“逍遥”正好为慕尼黑阴谋鸣锣开道。现在他们也反对占领者，当然仅仅是有这样的思想。他们不参加积极的反抗斗争。他们最多不过是听听伦敦的广播。他们的眼睛有时朝向东方，但更多地是朝向西方。地下《红色权利报》他们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它的革命性太强了。

但是，共产党也并不认为这些人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党仍然努力争取他们参加斗争。党组织认为，地下刊物是做好争取工作的积极助手，因此决定为这些逍遥派出版杂志《捷克报》。尤列克又负责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在1942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上，他撰写了题为《祝新年幸福和愉快！》的社论，社论的结尾是这样的：“自由的春风已经从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原野吹向我们。它也吹拂着周围的大地。英军正在把法西斯分子赶出非洲。在意大利，法西斯已开始崩溃，盟军在西线的登陆尝试已经成功，总工斗争日益发展，欧洲各

民族正在酝酿起义……是的，我们幸福的1942年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它的结局必然会更加美好。”

今天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一番话说得过于乐观。但是，这些结论是分析了1941年11月的斯大林讲话以后得出的，当时他说，德国法西斯已恶贯满盈，一年内必定垮台，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列强必须开辟已经许诺的第二战场。

我只保存着两期《捷克报》（它们是每月出版一次）。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还能找到？

经验丰富的记者和宣传工作者尤列克清楚地知道，不可以通过严肃的报刊去向群众做争取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而且，讽刺作品也是个得力助手。很久以前他便这样想过：如果能出版一份幽默杂志，通过其中刊登的笑话、幽默和讽刺作品去嘲弄我们的法西斯死敌，那该多好啊！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曾出版过一份进步的幽默杂志，它的名字叫做《芒刺》。现在准备在地下出版的幽默杂志，其规模当然要小得多，因此可以起名为《小芒刺》。当其他中央委员批准了这个建议后，尤列克便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一幽默杂志的出版工作（每月一期）。他大量收集反纳粹的政治笑话，把最精彩的笑话编入《小芒刺》发表。他还亲自撰写讽刺文章和绘制漫画。在1942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的第一页上，便发表了他创作的讽刺德国大兵的漫画。1941年12月希特勒宣布发起捐献运动。画面上的那个德国大兵头戴钢盔，钢盔外面扎着乞讨来的头巾，脖子上裹着乞讨来的狐皮披肩，衣衫褴褛，一只手戴着破旧的棉手套，另一只手戴着女式手套，下

身穿着破旧的女式绣花内裤，脚登两只不成对的皮靴。这个冻得发僵的、可怜的、令人厌恶的德国大兵呆呆地站立在一望无垠的俄罗斯原野上。漫画下面用德文写着：“守卫在第聂伯河边”。这幅漫画不只嘲弄了纳粹主义的德国国歌《守卫在莱茵河旁》，而且还讽刺了纳粹分子们妄图长期占领第聂伯河的狂妄野心。尤列克在《小芒刺》杂志上还选登了一组笑话，名字叫《元月份捷克笑话选登》。其中一则笑话是这样的：“海德里希想取消戒严令，但是哈哈劝他别这样做，原因是：据说，戒严令是捷克人所拥有的唯一法令”。

在《小芒刺》第三页的“伟人意见征询栏”中，尤列克发表了题为《他们的歌》的讽刺文章，文章写道：

“我们曾采访了几位豪绅、权贵、元首以及其他的大人物们，询问他们最喜欢哪一首歌曲。承蒙他们欣然赐教，现将这些歌曲公布如下：

东条英机大臣：东奔西跑，我们的战事准保输定了……

元首：荆棘丛生，我干嘛要出兵苏联？

戈培尔：圣诞颂歌，圣诞颂歌，诸位，下身要穿得暖和。宣传工作已冰消瓦解，我现在只能高唱圣诞颂歌！

布劳希契^⑩：我比谁都更有体会，从俄国撤退时是一种什么滋味！

海德里希：太阳升起在树梢，我在布拉格心急火燎。布拉格的情况实在糟，我们的人儿卷起铺盖要逃跑。

哈哈：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现在为希特勒效劳……但是将来嘛——恐怕是劫数难逃！

摩拉维茨^③：我是一个兵油子，我是一个大滑头，我钻进钱眼里面翻跟头。跟头大——赚大钱。谁肯出个大价钱？

盖世太保总监：我的左脚扎了一根刺、一根刺、还有一根小芒刺！”

在第二期《小芒刺》杂志上，尤列克发表了关于捷克民族的始祖在捷克这块土地上定居的讽刺文章，其中有如下四行诗：

他们也是英雄汉

离群索居的公民们发出怒吼，
我们和民族同样是敌忾同仇，
如果她必须进行殊死的战斗，
那么我们也——在口袋中紧握拳头。

在第三期的封面上，尤列克又画了一幅漫画：纳粹国防军的坟地上插着成千上万个十字架，悲痛欲绝的希特勒正斜靠在其中一个十字架上。

在《小芒刺》杂志上，尤列克除了撰写文章，发表政治笑话以外，他还写过一首讽刺诗“灭鼠日即将开始”：

“为了你们的切身利益，望全体公民届时务必使用‘德利西亚’（美味牌）特种灭鼠药灭鼠。违者将严加惩处……
（摘自1942年4月‘政府公告’）

听着，良民百姓！
灭鼠日即将开始。
谁不消灭耗子，
就把他活活吊死！

不必过虑，帝国的老爷们，
我们将惟命是从。
我们乐于消灭耗子，
我们对此一致赞同。

那些德国老鼠，
纯属地痞流氓。
对它们决不能手软，
对它们就是要痛打一场！

它们把我们的一切——
鱼肉、粮食吞噬干净，
它们还肆意杀戮——
捷克的父老乡亲。

围歼的伟大时刻
已经来临，
快把这些灰老鼠
轰向多马日利采、乌斯季、塔霍夫^③。

快准备好“美味牌”灭鼠药，
还有那连枷、棍棒和大镰刀；
快准备好长矛和榴弹炮，
再把自己的帽子戴好。

你们的枪口
要瞄准所有老鼠，
快准备好武器，
决不能空着两手。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要把老鼠杀绝斩尽，
哈哈、摩拉维茨和里斯，
他们早已经恶贯满盈。

每个正直的捷克公民，
快把挠钩准备，
再用麻绳做个绞索，
因为“Rattentag”（德文，意为“灭鼠日”）已
经来临。

老鼠吱吱叫，
叫声悲凄凄，

快奏起斯科奇纳舞曲^⑩，
欢送德国耗子归西！

待灭鼠日过去，
再把家园重建，
掠夺、饥饿和枪杀，
从此告别人间。”

不久，《小芒刺》便成了读者十分喜欢的幽默杂志。他们不只自己阅读它，而且辗转传抄，流传极广。我一共只收集了三期《小芒刺》，第四期即四月份出版的最后一期已经失散了。

还曾经准备出版一种妇女杂志。尤列克受权寻找合作者。但是要想找到合适的人太困难了。而时间却一天天地过去。国际妇女节即将来临。三月八日那天妇女杂志必须出版，如同尤列克说的那样，豁出去也得干，因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最后他坐了下来，亲自撰写文章。他给杂志起名叫《捷克妇女》。他采用的社论题目为《妇女们，起来！》，这是博热娜·聂姆措娃一首诗的标题，尤列克还引用了其中四句：

“不仅男子汉能为此而自豪：
他将为祖国献出一切
妇女们，起来！

我们也要做为国捐躯的女中豪杰。”

尤列克在社论中号召妇女为反对希特勒而战，为促使他早日垮台而努力奋斗。

党面向全体人民，依靠每一位决心为自由而战的勇士，唤起民众，争取男人、妇女和青年。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青年杂志。1942年4月它的创刊号出版了。名字叫做《前进》，出版单位为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民族委员会。该杂志由尤列克和布隆茨利克同志共同编辑出版。由尤列克起草的号召书这样写道：

“我国各民族历史中最可怕的时期已经来临。我国人民见所未见、如此疯狂的敌人正把我们驱赶到深渊的边缘。再前进一步，我们民族的前途将被断送。但是，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

我们号召你们开展坚决的斗争！这关系到整个事业，关系到最后的胜利，而最后胜利已近在眼前。我们必须勇敢和坚定，要天不怕、地不怕，不怕作出任何牺牲。‘敢于牺牲才能赢得未来’——这是青年革命家约·瓦·弗里奇在一百年前所说的话，这就是他毕生的行动指南。愿这些话也成为你们的行动指南吧！我们为之战斗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纳粹主义妄图从你们手里把它夺走，把你们推向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因此，快起来为反对纳粹主义而斗争！你们的岗位就是和苏联的、南斯拉夫的、波兰的、法国的、挪威的年轻的游击队员们并肩战斗，就在强大的世界各民族的统一阵线

之中，这些民族正在为反抗希特勒、争取自己的和我们的自由而斗争。前进吧！

各民族和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虽然尤列克的工作日益繁重，虽然他连固定的住所都没有（他在巴克萨夫妇、维苏希尔夫妇、叶林内克夫妇和里巴日夫妇家中轮流居住），但是他总是能挤出时间来进行他心爱的捷克文学研究工作。只要他有一丁点儿空闲时间，他就要“重操旧业”。当他从他自己的“基地”巴克萨夫妇家出来时，他也总是要找一本文学书随身带上。这已经是他多年来的一种习惯。1923年，当我认识他时，他正住在斯特拉什尼采区。每次外出上班，他一定要把书带在身上。朋友们问他为什么住得那么远——他一面学习，一面在国家统计局工作，当时的统计局位于布拉格的另一端，在斯米霍夫区——尤列克向他们解释说：一则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租赁位于市中心租金昂贵的房子，再则住得远也并不坏，因为他在路上反而有充分的看书时间。尤列克还对我谈起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是怎样带着书本去排队买面包的。而在当时他几乎还只是个孩子呢！

书本是使他长期睡眠不足的原因。他曾牺牲了许多睡眠时间去学习。在学习时，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支铅笔，或者把铅笔夹在耳朵上。其实，它已经算不上是铅笔了，它只不过是一小节铅笔头而已，尤列克全身的各个口袋里常常放着这样的铅笔头。当他坐在书桌旁学习或研究问题时，他则常常

使用的则是彩色铅笔。他手边还常常备有许多小纸条，用以随时记录书刊中的精彩段落。同时，他还把他认为重要的、或者有意义的句子——不论是正面的或者反面的句子——逐一标出。书本知识对他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起到了补充的作用。通过学习，他丰富了自己的经验，了解了许多国家和人们，深化了自己的知识。书本知识还对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的知识水平的提高是与了解现实生活、了解活生生的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

不论他走到那里，不论他来到什么地方，也不论他停留的时间何等短促，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书。尽管他已转入地下，外出也只是去接头而已，但是，除了他必须带上拐棍作为掩护以外，他也总是在左腋下夹着（或者在口袋里放着）一本书。我们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住过的那栋大楼里，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起他。他们回忆说：“他到我们店来取奶时”——牛奶店老板娘这样说——“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是的，对尤列克来说，书是太重要了。即使他必须只身一人留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书和他作伴，他就从不会有孤独的感觉。

1941年到1942年春，尤列克从事扬·聂鲁达作品的研究。在许多小纸片上，他用独具一格的蝇头小字记录了他对聂鲁达的看法和观点。除巴克萨夫妇一家以外，其余各家的房子都只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掩护过尤列克的每个家庭，尽管尤列克坚决反对，他们全家人都搬到厨房中去住，而把自己原来的卧室留给尤列克。正因为这样，尤列克才有

条件挑灯夜读，甚至通宵达旦。如果是隆冬天气——在上述各家的卧室里都没有取暖设备——他便钻进被窝里继续学习。多少次我惊异地问自己：他怎么就不知道发困。然而，书本是从来不会使他感到困倦的。

第十一节 在共产主义旗帜下

1942年，尤列克受党中央委托，除秘密出版了《红色权利报》（篇幅为打字纸十页左右，上面用打字机打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和《红色权利报号外》（篇幅为二页、四页或更多，视当时需要而定）外，还出版了下列各种杂志：

- 1、《塔博尔》；
- 2、《捷克报》；
- 3、《工人报》（与布隆茨利克同志合编）；
- 4、《小芒刺》；
- 5、《捷克妇女》（只出版了一期）；
- 6、《前进》（与布隆茨利克同志合编）。

上述六种杂志均为月刊。

在尤列克主持下，1942年初还秘密出版了《苏联宪法》和《联共（布）党史》（第二版）。在这个时期他还撰写和出版了地下小册子《“苏联乐园”展览会和苏联实况指南》。

尤列克必须撰写和编辑这么多的杂志，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固定的编辑室。有的文章他是在巴克萨夫妇家开个头，在叶林内克夫妇家接着写，而到了里巴日夫妇家后才把它写完

的。巴克萨夫妇家写作条件最好。比如，在他们家，尤列克完成了精彩的文章《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论列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那篇文章曾于1942年1月在《红色权利报》号外上发表。在撰写该文时，尤列克需要找到在列宁同志灵柩旁的誓词记录。他回想起我们曾把它保存在布拉格寓所里。他甚至还记得放在抽屉里的什么地方，虽然誓词只不过印在一张小小的长条纸片上。后来我把这张誓词给他送到巴克萨夫妇家中。这篇文章写了相当久。我记得很清楚，1942年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莉杜什卡把我带到巴克萨夫妇家中去找尤列克。当我把印有誓词的小纸条递给他时，他高兴极了。当天晚上，他向我长时间地讲述了为纪念这三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准备写一篇文章的打算。

“列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逝世了，千千万万为争取新世界而奋斗的崇高战士倒下去了，他们过早地积劳成疾，或者惨遭杀害，或者被折磨至死……但是他们为之献身、并在其中起过领导作用的历史力量是永生的。他们在战斗中给自己的接班人留下的光辉榜样是永世长存的，他们开创的业绩将万古流芳，因为它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整个集体。千百万新战士依然活着，他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高举列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旗帜，昂首阔步，勇往直前，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在一月份的那个星期日，清晨，尤列克躺在床上，两眼呆呆地盯着天花板。他在沉思着。我在床上动了一下，他立即扭过头来，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声“早上好”，接着，他向

我谈到他正在考虑的文章内容：共产党人是热爱人、热爱自由、热爱劳动、热爱和平、热爱自己民族的人。这一切向他们提出了非常艰巨的任务。作为无产阶级伟大战略家列宁同志的世界大军中的光荣成员，他们必须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共产党员同志，这是向你提出的要求，不管你在哪个部门工作，不管你在哪条革命的战壕里为人类的自由战斗，也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是只身一人在前线站岗，或者被捆绑在暴君们的监狱里——每天都给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做一个总结吧，看一看你是否无愧于作为伟大列宁的战士的光荣称号……”

巴克萨夫妇午饭后出外散步，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就剩下我和尤列克两人。我透过窗户眺望着银装素裹的布拉格和赫拉德恰尼城堡。在阳光照射下，屋顶上晶莹的积雪反射出五彩缤纷的道道霞光，真叫人眼花缭乱。尤列克坐在桌旁，在一张长方形的小纸片上，低着头在写些什么。他不时地用左手（左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捋一下胡子。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朝窗子方向看上一眼，接着便振笔疾书起来。有时他的钢笔会戛然而止，有时纸张会发出窸窣的响声。当他写完一段后，他对我说：“古丝蒂娜，我再念一段，你想听吗？”他写得很出色，写得很真实，一切都如同他的亲身经历一般。

大约在1942年1月，库尔特·格拉塞尔把从德军统帅部新闻处弄到的情报送给了尤列克，情报说：“根据希特勒占领军的指示，保护国政府将在捷克地区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其办法如下：第一，1942年2月上半月，全体保护国政

府军将派往挪威前线，抵达后立即编入德军部队，以防发生暴乱和企图逃跑。第二，如果第一项措施达到了预期目的，那么应该动员曾在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中受过军事训练的三期新兵。这三期新兵将被派往芬兰或者作为警察部队派往另一个占领国，投入战斗。第三，如果第二项措施也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捷克人表现顺从的话，那么，应立即在短期内把十七岁至五十岁的全部适龄男子征召入伍。”

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立即揭露纳粹占领者和他们的捷克走狗们的罪恶计划，把它们公之于世。尤列克受权起草揭露拟议中的军事动员传单。他立即开始了工作。两三天后传单的草拟工作完成了。经中央委员会审查后，传单印发了。传单上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民族革命委员会签字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内抵抗运动中央委员会及其附属组织等。

传单上写有这样的话：“如果希特勒想要搜罗捷克士兵充当他的炮灰，那完全是枉费心机，因为捷克士兵都将在反对他的、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必然要把他和他的一小撮刽子手和卖国贼彻底消灭的阵线中进行战斗！”

油印机和印刷机迅速地把传单印发出去。结果，真相大白，人们议论纷纷，群情激愤，反抗运动日益高涨。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的感情进一步增强了。

1941年冬至1942年，红军在和法西斯侵略者的战斗中开始从防御转入反攻。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公开反对占领者的浪潮席卷捷克各地。党又公开揭露了纳粹占领者妄图动员

捷克男人的罪恶计划，因此纳粹分子们不论在当时或者在以后再也没有胆量宣布军事动员了。

纳粹党徒们知道，捷克人一向憎恨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在1942年初举办的所谓“苏联乐园”的展览会上又一次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原来以为，那个展览会可以促使捷克人民对苏联失去信心。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几乎所有的捷克人都是在受到威逼以后才前去参观的。纳粹分子事先并没有估计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好下了一道命令，说什么“参观展览会是一项任务”。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不论是工厂中的工人或者是机关中的职员，所有被驱赶前去参观的人，他们在离开展览会时却更加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念：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苏联必定能打垮希特勒。

当然，尤列克没有去参观这个反苏的展览会，但是，他不能放弃观赏苏联坦克的好机会（纳粹分子在10月28日大街百货公司的橱窗里得意洋洋地展出了一辆苏联坦克）。尤列克看见，在坦克四周观众摩肩接踵，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满意和喜悦，他们彼此在会心地交换着眼色。后来，尤列克就展览会的情况详细询问了叶林内克同志、维苏希尔同志和巴克萨同志（他们是各自从自己的工作单位被集体组织去参观展览会的），并根据他们讲述的情况给《工人报》写了题为《展览会见闻》的文章，文章中说：“象许多其他的人一样，我奉命参观了展览会，这里我谈谈自己的印象：展览会的第一部分无非是为纳粹党徒们在我国犯下的罪行开脱……展览会的第二部分（我所指的是军事部分）应该说十分成

功。在今天这个时代，它是唯一宣传苏联和红军的地方。它使观众精神振奋，并树立起这样一个信念：红军的武器必定能消灭纳粹党徒……我无法形容，当一个人抚摸着苏联朋友生产的坦克时，他心里充满着什么样的感情。他多么希望能立即钻进坦克去驾驶着它投入战斗，用行动来替自己说话。我微笑着这样想：目前我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展斗争。我看了看站在旁边的观众。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发现：他们也正是这样想的，我没有看错。我的心飞向英勇的红军部队，飞到了苏联工厂。我在想：谁发明了威力如此强大、设计如此巧妙的武器？是苏联公民们、苏联工程师们用智慧和匠心，是苏联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是苏联士兵用英雄的胆略，是红军用战斗的集体把它创造出来的。这些武器掌握在经过战斗洗礼的苏联公民手中，它们是他们和我们的胜利保证。”

1942年4月4日至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尤列克要我到他那里去，把莫斯科电台播送的大会发言速记下来。4日和5日正好是星期六和星期日。莉杜什卡象往常那样又在星期五晚上把我带到了叶林内克夫妇家中。尤列克在准备《红色权利报》号外的编辑工作。我把贡多罗夫红军中將的发言、兹登涅克·内耶德利和马列克·楚伦的发言、女作家万达·瓦西列夫斯卡的发言、以及大会给各斯拉夫民族的号召书用速记符号记录了下来。我还利用播音间隙把大会发言的速记稿整理成文，尤列克又按照他自己的记录稿把它们进行了比较和修正，准备在报上发表。后来，他发表了其中一些讲话的全文，另一些讲话则

摘要发表了。在报导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的《红色权利报》“号外”的头版上，尤列克选登了约·瓦·斯拉德克的诗歌“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他就是反对我们！”：

“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
他就是反对我们。
哪怕是区区小事，
为敌人张目的人，
他决不是我们的亲弟兄。

我们需要敢于斗争的硬骨头，
我们需要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们需要勇敢者头颅里的思想，
我们鄙夷寄人篱下的可怜虫！

我们需要伟大的人们——
他们不畏风暴和艰辛，
他们义愤填膺战顽敌，
他们全心全意爱人民！”

尤列克还为大会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发出号召：斯拉夫民族，进攻的时刻来到了！》这份“号外”包括了用打字机

打出来的密密麻麻的九页的内容。

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成了我国人民巨大的鼓舞力量，因为它给我们作如下的形势分析提供了充分的依据：1942年无疑将成为希特勒野蛮统治的最后一年，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了。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苏联领导人如此自信地发表了讲话（要知道，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我国，我们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反占领者的斗争。

1942年4月6日莫斯科电台捷语广播说：“如果说，八个月前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是对希特勒主义猖狂进攻的一种防御措施的话，那么，现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则提出了伟大的战斗口号，那就是：‘进攻’……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从舒马瓦山至塔特拉山的全体男女同胞们，为了洗雪1938年9月30日和1939年3月15日的国耻，为了使我国各民族重新获得自由，奋起战斗吧！”

1942年的复活节已较前几年更显得隆重、欢乐和愉快。叶林科娃太太和我好似已经看到了把我们的布拉格从希特勒党徒的手中解放出来的红军战士。虽然尤列克要我们保持冷静，他说事情并不那么容易，许多方面还要取决于我们捷克人将怎样去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但是，当时他也相信：1942年将是打败希特勒的一年。那时谁能想到：当红军真正把布拉格从德国占领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中已没有一人能留在布拉格去欢迎他们了。

那是在1942年4月7日星期一的晚上，尤列克陪伴着我从叶林内克夫妇家中出来，沿着长长的、迂回曲折的路线，最后把我送到了离有轨电车站很近的地方。时值早春天气。过去，每当春风拂面的日子来临，尤列克是不能呆在布拉格市内的。他必然要到郊外去呆上几个钟头，眺望一下天上的悠悠白云和地上湿润褐色的土地，在经过一冬的蛰居生活以后到这里来舒展一下筋骨，在田间小道上溜达一番。现在我们正绕着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墙走过去，尤列克搂着我的腰，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灾难正向我们袭来。1942年是充满美好希望的一个年头！

他正忙于《红色权利报》五月版的准备工作，在报纸的头版上他画了一只紧紧掐住卅标记的手，手掌代表苏联，拇指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食指代表挪威，中指是法国，无名指是南斯拉夫，小指是希腊。画的下面，他安排了弗兰季舍克·哈拉斯给他寄来的诗歌“1942年五一节”。五月版的《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由尤列克起草的党中央宣言，宣言的题目是“象征生活和创造性劳动战胜破坏、毁灭和死亡力量的五一节万岁！”宣言说：

“1942年‘五一’节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五月……自由的、平等的各民族的伟大联盟，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强大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奋勇行进在生与死的大搏斗的最前列，行进在一切自由和进步力量的最前列。今天，苏联的光辉榜样正引导着整个世界向法西斯主义发动进攻。她为人类以及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幸福所作出的

巨大牺牲使我们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我国各民族的一切劳动者，爱好自由的所有公民们！今天，在‘五一’节，检阅一下自己的队伍吧！你们要意识到，你们，劳动者，一切人类价值的创造者，在反对一切人类价值的毁灭者、无耻的法西斯寄生虫的斗争中，你们是非常强大的！你们要意识到，你们富于创造精神的双手具有决定一切的力量，甚至决定你们自己和希特勒命运的力量！你们的这种力量要拒绝为希特勒服务，要把它用于为你们自己服务，把它投入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去——这样，希特勒便注定要失败！现在，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因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我们把自己的一切仇恨倾泻在穿灰色制服的剑子手们身上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我们把对自由和更美好生活的一切渴望都变成战斗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我们参加世界上开展民族解放战争的诸民族的行列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进攻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和工场作坊中的工人们！脑力劳动者们！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们！拿起武器发起进攻吧！

我们争取自由的神圣战争万岁！

为争取创造性劳动、进步和自由的胜利前进吧！

为了幸福的明天，为了我们各民族人民的春天，为了全人类的五月前进吧！”

这篇宣言是尤列克起草的所有宣言中最漂亮、最深刻、最感人的宣言之一。

1942年《红色权利报》五月号是尤列克在被捕前编辑出版的最后一期。在4月24日以前该报已部分地排印好，所以他还是读到它了。该期《红色权利报》上还刊登了他写的文章“1942年的春天开始了”：

“1942年的春天开始了。它是追求佳偶的季节吧？是的。它是积极追求自由的大好时光。血红色的鲜花遍地开放。播种的大忙时节降临在亿万人的心上。多年来，法西斯分子们在欧洲和全世界播种了死亡。今年将是他们收获死亡的时刻。而我们今年所收获的将是自由、和平与幸福的生活……”

在1942年的春天，人们的印象的确似乎是：最后清算希特勒的日子来到了。在冰雪消融、道路泥泞、俄罗斯的河流春水泛滥之际，红军发动了对希特勒军队的进攻，并把数千平方公里的苏联土地从纳粹占领者手里解放出来。然而西方列强一再答应过的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却迟迟未能兑现，因此希特勒能够把一批批新的兵力不断派到东方战场上去。

1942年4月18日星期六晚，莉杜什卡带我到里巴日夫妇家中去找尤列克。当时他的心情极佳。他告诉我，几天前他一手拿着一包《红色权利报》和关于布拉格五金工厂工人代表大会的传单，另一只手拿着手杖，从奴斯列区沿米赫列大坡的石级一级一级往上走。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因为他发现：石级两旁站着两排身穿便服的人，他们引人注目地彼此相隔一定的距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来往行人。他们既非毛头小伙子，也不是风烛残年的老者，从外表看，他们与一般的人毫无区别。但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比行动自由的人有

着更加敏锐的眼睛。尤列克立即意识到，这些人是秘密警察。怎么办？现在他已经从好几个秘密警察身边走过来了。与其掉头往回跑，从而引起更大的注意，还不如从容不迫地继续往前走去。他沉着镇静地停了下来，如同需要稍事休息那样。他把包裹放在地上，用手帕擦了擦脸。一会儿后，他装成泰然自若的样子把手杖的一端穿进包裹外面的绳结中去，然后把包裹背在肩上，又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沿台阶往上走去。他能否甩掉这些便衣，当时他实在也没有把握，因为站在望不到头的台阶两旁的便衣特务，随时都可以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冲出来截住他，要求检查他的身分证和他背着的那个包裹。然而他却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尤列克眉开眼笑地说，他带着地下传单接受了盖世太保们的夹道欢迎。我对他说，这种事他不应该自己去办。但是他回答说，他不想因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再去麻烦其他的同志到奴斯列区去。

另外几件事也获得了成功。比如，四月上半月秘密举行了布拉格各五金工厂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中央民族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第二届各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介绍了布拉格各五金工厂中的情况。尤列克并没有向我透露，党中央委员中谁出席了代表大会，会上共有多少位代表。他给我的秘密传单上这样写道：大会认为，“正当在国际范围内对万恶的法西斯占领者展开了决定性进攻的时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里却正在大量生产第一流的武器，这些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是纳粹分子为延长他们的残酷统治所必需的。”

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布拉格五金工厂全体工人的号召书，

号召书上列举了布拉格各工厂所生产的武器数量和种类。

“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请求你们，我们号召你们：停止武器的生产吧！

如果我们置身于斗争之外，那就意味着我们对自己、对子孙后代、对民族的背叛……起来斗争吧！如果你们步调一致、全线出击，纳粹分子便将一事无成。他们能够威胁个人的自由，但他们无法熄灭你们熊熊燃烧着的斗争烈火。随时随地地打击他们吧！和其它工厂联合起来！在一切工厂中选举你们自己的民族革命委员会！把你们最优秀的伙伴选进民族革命委员会去！建立民族革命卫队！准备发动作为开展全民解放战争信号的总罢工吧！我们也号召你们，其它工厂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工人们！贸易部门和国家机关的职员们，你们也参加斗争吧！农村的工人们，你们也组织起义吧！不能再继续沉默了！听一听为自由而战的各民族的战斗号角吧！你们要用行动证明，你们不愧为杨·日什卡——打败德国十字军的胜利者——的后代！履行本民族、各斯拉夫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交付给你们的义务吧！你们要向全世界证明，1938年秋以来我们为保卫共和国而战的决心，今天在争取她的解放的斗争中倍加坚定了！”

那年春天，党中央关于出版《创造报》——我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战斗报纸——的九月决议应该付诸实施了。受党委托、负责组织工作的尤列克开始物色合作者。大概在1942年2月左右，他派我到艺术家俱乐部去找卢博什·林哈尔特，请他协助安排一下尤列克和拉季斯拉夫·什托尔的会面。尤

列克吩咐让拉·什托尔到庞克拉茨他兄弟居住的楼前围墙处去假装散步，（凑巧，维苏希尔夫妇和叶林内克夫妇也住在那栋楼里，但什托尔兄弟俩都不认识他们，）届时会有一位男子前来找他。这个男子也不问好，劈头第一句就说：“今天天气可真好啊！”此时，什托尔应该回答：“老天保佑！”说完便跟这个男子走。那一天，从叶林内克家的窗口（那里能清楚地看到楼前的围墙），尤列克先亲自侦察，看一看什托尔是否来接头了，同时他后面是否有人跟踪。然后，尤列克再派佩皮克·维苏希尔到围墙边去，让他把什托尔带到叶林内克夫妇家来。什托尔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尤列克了，因此尤列克问他：“拉扎，你还能认得出我来吗？”他斩钉截铁地说：“是的，认得出来。”“根据什么呢？”尤列克兴致勃勃地问。“根据你的眼睛。”什托尔的回答使尤列克大失所望。本来他满心以为，他现在的一头长发、连腮胡须、八字胡和眼镜能使他躲过所有熟人的眼睛。由于什托尔和他曾长期朝夕相处，因此他非常熟悉他的面容，不论尤列克怎样地乔装改扮，要想瞒过他自然是困难的。

接着，尤列克把筹备出版《创造报》的消息告诉了什托尔同志。他们商定，什托尔将为第一期创刊号撰写题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也是在1942年春天，尤列克得知，当时住在瓦彭尼·波多尔的诗人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伊曼生活拮据，因此他建议并征得党中央其他委员的同意，给诗人经济上补助。批准手续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其他同志对他的建议完

全同意，用不着进行任何讨论。然而执行这项决议倒是困难得多。为了使诗人斯·科·诺伊曼不致引起任何怀疑，对他的安全不致带来丝毫危险，应该派谁去找他呢？当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正受到敌人的秘密监视？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尤列克十分了解诗人的自尊心，生怕他拒绝把钱收下。尤列克知道，我和捷克民族议会的工作人员杜哈切克同志有联系，而他又认识诗人斯·科·诺伊曼。因此，尤列克选择了杜哈切克作为联络人。根据尤列克的指示，我在我工作的公司里用打字机打了几行字 内容是：我受党中央的委托，诚恳地请求诗人收下来人带上的钱。不过，这封便函我不能署名。我记得，赠给诗人的钱大约是5,000克朗。杜哈切克不得透露是谁派他来的，他首先要把便函交给诗人斯·科·诺伊曼看，然后再把装着钱的口袋交给他。不久，杜哈切克通知我说，他已完成了任务，诗人斯·科·诺伊曼已经把钱收下了。

1942年4月18日，当我去看尤列克时，他告诉我说，几天前，他和他的朋友、诗人维捷斯拉夫·内兹瓦尔见了面，会见是由弗拉尼奇科娃太太（她的真名叫博热娜·弗拉诺娃）安排的。他是在约什卡·巴克索娃的陪同下走进内兹瓦尔在维诺赫拉迪区的寓所的。尤列克到这里来的目的也是要把秘密出版《创造报》的消息告诉内兹瓦尔，并请求他一起合作。维捷斯拉夫·内兹瓦尔曾写了一首诗《夜晚的来客》，用以描述那一次会见的情况：

“……他走进我的工作室，取下眼镜，
他目光炯炯，
他不让我把他的大氅挂到前厅，
他把它搭在我写字台旁的椅子上，
我们挨着小圆桌坐了下来，外面夜幕正徐徐降临。

布拉格人忙着关上窗户，放下窗帘，
所有的人都侧耳倾听着门外的动静，
他们怀着秘而不宣的目的坐了下来，
在桌子后面，收音机旁和厨房里的凳子上，
围着通红的炉火回忆起狱中和死去的人们。

我们坐到小圆桌旁，
黑夜象一只嗥叫着的无形的豺狼，
那是党卫军虎视眈眈之夜，
那是充满民族血海深仇之夜，
那是布满泥潭之夜，
那是闪烁着母亲和忠实的儿子们的希望之夜，
那是吞噬着无数尸体的肉蝇之夜。

他知道一切线索的会合点，
他是解决难题的能手，
他赠给我一本论博热娜·聂姆措娃的书，
还有几份《红色权利报》，

据说他在追捕者面前越窗逃走，
所以一只腿有点瘸，
一生中他善于把责任心和冒险精神结合起来，
我想，这也是他对诗歌和艺术的要求。

据说他要写一本书，
等他有了闲空的时候。
不是写文章、专论，也不是进行论战，
而是写一本书，
在低矮的灯光下面他眼里燃起了蓝色的火焰。

他来找我是要我写一首诗，
他对我的挚友罗伯特·戴维的被揭露深为惋惜，
据说我可以模仿他的文体把自己隐蔽起来；
必须投入最后的决战，
全民族必须奋起斗争！否则，
面对给世界带来胜利和欢乐的战士他将羞愧难言！

我们喝着茶，我又打开一瓶葡萄酒，
房间里烟雾腾腾，如同快要爆炸一般，
钟摆在来回摆动，
黑夜在远处嚎叫，犹如单簧管发出的悲鸣，
我们筹划着决定命运的大事，思索着日常琐事，
他最心爱的一本书，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

就是他参加共产党的那一天。

他清楚地意识到，
那是生死攸关的日子，
在那一天他决心去经受一切考验，
时间在流逝，历史在不停地向前。

这不能不唤起人们的幻想和激情，
在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看到了锦绣前程，
在它的扩音器下他们载歌载舞，
如同现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翩翩起舞的人们，
他们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空点亮彩虹，
他们看到了更幸福的一代在地球上行进。

为了男人和女人们能相亲相爱的一代，
为了那样的锦绣前程流血牺牲，
这样的牺牲算得了什么！
为了那样的未来献出生命，
这样的献身虽死犹生。
房间里到处是无形的扩音器，
碰杯的声音和庄严的乐曲交织在一起，
而黑夜却象饿狼那样张开血盆大口。

准备着去完成伟大的使命，

它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懂得欢乐的含义，
为了所有的人终能在快乐中生活，
为了使一切考验都难不倒我们，
为了刑具上滴淌的鲜血能奏出希望之歌，
为了让勇敢者的清泉永世不致枯竭，
为了你能和凯旋的大军一起幸福地进入布拉格，
为了使无限的激情能战胜人们身上的疑虑和惰性，
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比钢铁还坚硬的
纪念碑，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这就是最好的书，你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

天亮了，
在窗纸的缝隙中两种光亮在斗争，
1942年4月，
推心置腹的畅谈象无法名状的魔力抓住了我们的心。
他必须戴上黑色眼镜，穿上宽大的大氅，再佩带好
两支手枪，
如同过去那样，
当敌人逮捕他而又来不及销毁一切的时候，
当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时，他只有去迎接考验，
他只能在绞刑架上挤出一点闲空，
去做他唯一能做的事——写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命运。

在那个夜里有多少东西我们尚一无所知，
在那个夜里情况是多么危急，
在那个终生难忘的夜里，
葡萄酒早已喝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
而窗户紧紧关闭，
人们已经入睡，客人把礼帽拉向前额，
女向导正准备起程，
他的手里握着盲人用的拐棍，
它把他领进了豺狼般凶恶的黑夜。
再一次短暂的拥抱，
再见，永别了。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再见，今天或者明天，
或者在这个豺狼之夜的彼岸，
在未来已变成了现实的彼岸，
在我们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彼岸，
旗手，那是你的旗帜，
充满希望的旗帜。
人们已经入睡，客人把大氅的领子拉起。

尽管情况万分危急，
今天，明天或者在行刑队面前，
世界上将有千万个扬声器不顾一切地辗转传诵，

在那象黑死病一样可怕的黑夜里，
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瘦小的女向导引领之下走遍了
布拉格。
他不是走向死亡，
他是以胜利者和必将赢得胜利的人们的名义，
行进在田埂上的花丛之中。”

1942年4月19日晚，当我从里巴日夫妇家中出来时，尤列克把好几份四月出版的《红色权利报》、《布拉格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号召书》和十本秘密出版的《联共（布）党史》油印本交给了我。因为他正在准备《红色权利报》“五一专刊”，工作很忙，所以他没有出来送我。告别时我们商定，他将把下次见面的安排写在便条里寄到维诺赫拉迪区去。

我把所有地下出版的杂志定期地送给了下列订户：库尔特·格拉塞尔，霍季姆涅日村的季霍塔，布拉格的兹登涅克·诺瓦克，约瑟夫·哈沙，约瑟夫·罗汉和建筑师特鲁克萨，他们在布拉格和其他地方又各有自己的订户和读者。1942年4月24日晚上，我在牙医诊疗所把最后几份《红色权利报》和宣言以及最后几本《联共（布）党史》交给了库尔特·格拉塞尔和兹登涅克·诺瓦克。我自己只剩下了一本《联共（布）党史》和一份《红色权利报》，它们一直存放在我家的书柜里。

我万万没有想到，1942年4月19日是我们俩被捕前的最后一次会面！

注 释

- ① 佩切克宫原是捷克百万富翁佩切克的私人住宅。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德国盖世太保驻布拉格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 ② 杨·史维尔马（1901—1944）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1921年参加捷共，1929年起任捷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5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局候补委员，1936—1938年任《红色权利报》总编，后去莫斯科，1944年9月飞往班斯卡·比斯特利采领导起义，11月10日在艰苦的行军途中光荣牺牲。
- ③ 爱德华·乌尔克斯（1903—1942）捷克记者、文学评论家、作家。1930—1938年任《红色权利报》编辑。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任捷共第一届地下中委委员，后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英勇就义。
- ④ 杨·克雷伊奇（1903—1941）《红色晚报》和《红色权利报》编辑，积极参与地下抵抗运动，后被盖世太保杀害。
- ⑤ 库尔特·康拉德（1908—1941）原名贝尔，捷共党员，记者，后被盖世太保杀害。
- ⑥ 斯坦尼斯拉夫·布隆茨利克（1910—1944）新闻记者，曾任《哈罗报》、《红色权利报》和《创造报》的编辑，地下工作者，1944年于德累斯顿被盖世太保杀害。
- ⑦ 瓦茨拉夫·克然（1898—1941）1921年起参加革命工作，1936—1939年任《红色权利报》编辑，1940年被捕，1941年被盖世太保杀害。
- ⑧ 杨·莱希特尔（1858—1946）捷克出版商。
- ⑨ 沃·克·布拉赫尼克（1888—1934）捷戏剧评论家、历史学家和理论家。
- ⑩ 民族党元老派即原来的民族党老捷克人派。民族党原是温和派自由主义者（弗兰季舍克·帕拉茨基和弗兰季舍克·拉吉

斯拉夫·里格尔)所领导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1874年这个党因策略问题上的争论而发生分裂,原来的一派称为民族党老捷克人派(即元老派),新的一派称为自由思想民族党年轻捷克人派(即少壮派)。

- ⑪ 雅罗斯拉夫·耶热克(1906—1942)捷克作曲家,布拉格解放大戏院乐队指挥,后旅居并病逝于美国。
- ⑫ 米洛什·内德维耶德博士(1908—1943)捷克进步医生,1942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后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英勇就义。
- ⑬ 阿尔诺尔德·伊拉塞克(1887—1960)捷克著名外科医生、教授、科学院院士。
- ⑭ 爱德华·巴斯(1888—1946)捷克作家、新闻记者。
- ⑮ 费迪南德·门契克(1853—1916)捷克文学、戏剧史专家。
- ⑯ 白山原为布拉格西郊地名。1620年11月8日,经过两小时激战以后,捷军被天主教联军和费迪南德二世的军队所击败,开始了异族统治时期,历史上称之为白山战役。
- ⑰ 巴斯即爱德华·巴斯。参看本章注⑭。
- ⑱ 埃·弗·布里安(1904—1959)捷克著名导演、戏剧家、作曲家、作家、民族艺术家。
- ⑲ 赫拉德恰尼城堡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著名的古代城堡,历代王宫的所在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府就设在这里。
- ⑳ 约瑟夫·维苏希尔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
- ㉑ 《罗伊》青年杂志又译为《蜂群》儿童杂志。
- ㉒ 卡列尔·雅·埃尔本(1811—1870) 捷克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
- ㉓ 尤利乌斯·泽耶尔(1841—1901)捷克著名诗人、散文家。
- ㉔ 弗兰季舍克·聂麦茨(1902—1963)捷克著名记者、诗人、幽默作家。
- ㉕ 弗兰季舍克·哈拉斯(1901—1949)捷克著名诗人和翻译家。

- ②⑥ 爱多·乌尔克斯为爱德华·乌尔克斯的爱称。参看本章注③。
- ②⑦ 奥托·辛内克(1900—1941) 政治活动家,捷克斯洛伐克共青团领导人,捷共第一届秘密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年被纳粹分子杀害。
- ②⑧ 瓦舍克·辛库列(1905—1942)捷克斯洛伐克共青团及左翼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红色权利报》编辑,捷共第一届秘密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1942年在毛特豪森被纳粹分子杀害。
- ②⑨ 米拉·内德维耶德 即米洛什·内德维耶德。参看本章注⑫。
- ③⑩ 杭扎·齐卡即杨·齐卡(1902—1942)共青团和红色工会领导人,捷共第一届地下中委委员,第二届地下中委书记,1942年被盖世太保杀害。
- ③⑪ 胡斯民族指捷克民族。
- ③⑫ 塔博尔人 指胡斯革命运动时期以塔博尔为根据地的激进派成员。
- ③⑬ 1941年6月22日是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日子。
- ③⑭ 海德里希白色恐怖 即希特勒派驻捷克和摩拉维亚的纳粹头目海德里希·兰哈尔德(1904—1942)所实行的法西斯恐怖。
- ③⑮ 杨·弗罗麦克(1901—1966)捷克进步文化工作者,出版家。
- ③⑯ 杨·日什卡(1360—1424)捷克胡斯运动的著名军事领袖、政治家。
- ③⑰ 瓦尔特·冯·布劳希契(1881—1948)德国陆军元帅,1939年任德国最高统帅。1941年12月因与希特勒在战略计划方面发生分歧而被解职。1948年死于英国监狱。
- ③⑱ 埃马奴埃尔·摩拉维茨(1893—1945)捷奸头目之一,资产阶级共和国总参谋部高级将领,1942—1945年任教育文化部长,1945年5月5日自杀身亡。
- ③⑲ 多马日利采、乌斯季、塔霍夫均为与德国接壤的捷克边境城市。
- ④⑩ 斯科奇纳舞曲为节奏欢快的一种捷克民间舞曲。

第三章 在 狱 中

第一节 被 捕

党的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于1941年2月被捕后，新的第二届（地下）中央于同年7月成功地建立了起来，而且立即开展了工作。尤列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这样写道：

“1941年9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我们还没有把受到严重破坏的组织完全恢复起来——呵，我们离这个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们却又有了一个坚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也立即明显地表现出来。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工斗争日益发展。9月底，他们把海德里希派来对付我们。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把正在增长的积极抵抗运动完全摧毁，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

但是，党每次遭遇到打击之后，我们却可以看到：她是何等的坚不可摧。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无法代替他的话，就会有两个、三个人奔赴他的岗位。到1942年初，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

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1941年2月的那个规模，但是，它已经具备了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的能力……”

1942年4月24日，党的第二届地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遭到了打击：尤列克被捕了。

今天，当我写到这里时，盖世太保伯姆和密探瓦茨拉夫·德沃夏克在审讯过程中的下列供词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1941年秋，在维索昌尼的容克工厂工作的密探给负责治安保卫工作的纳粹组长送来了一份地下共产党传单，这张传单是他在一个大车间里找到的。治安小组组长立即把传单送到盖世太保反共科（Ⅰ—A—1）。反共科开始怀疑到，秘密的共产党组织正在容克工厂进行活动，因此把代号为26号的密探安插到工厂里。那个密探不是别人，就是瓦茨拉夫·德沃夏克（捷克人，1917年2月19日出生于塔博尔附近的赫尔博宁，职业钳工，住址为：布拉格庞克拉茨区，维克多丽诺瓦街1184号）。盖世太保把德沃夏克打扮成机械师安插到发现了地下传单的那个装备车间去劳动，同时允许他甚至可以采用怠工手段，因为这将有助于他们去侦破秘密的党组织。

1941年圣诞节前，德沃夏克成功地与装备车间的巴尔托尼同志建立了联系，巴尔托尼同志和德沃夏克一样都住在庞克拉茨区。此后，在上下班的路上他们常常一起谈论政治形势。德沃夏克伪装积极，表示他强烈反对占领者和衷心同情苏联。老实忠厚、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巴尔托尼同志未能识破德沃夏克的卑鄙伎俩，他甚至严重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向

德沃夏克透露了，他自己就是容克工厂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伪装成与占领者誓不两立、为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而甘愿赴汤蹈火的德沃夏克骗得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

1942年1月中旬，巴尔托尼第一次给德沃夏克带来了秘密的共产党杂志，并且告诉他，看完后要立即归还，因为巴尔托尼同志还要把杂志送给其他工人阅看。

当天夜里，德沃夏克把地下杂志偷偷地送给了盖世太保伯姆，伯姆把它拍了照，然后把原稿还给德沃夏克，而德沃夏克则在第二天清晨又把它及时地交还巴尔托尼同志。此后，巴尔托尼同志定期地给德沃夏克送来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杂志，德沃夏克则立即乘天黑之际跑步到盖世太保办公室，把材料送去拍照，第二天再把这些“读完了的”杂志还给巴尔托尼。巴尔托尼做梦也没有想到，德沃夏克正跟他玩弄着卑鄙的花招。

不久，德沃夏克被吸收为共产党在容克工厂的支部成员（当然，他是事先得到盖世太保批准的），开始每月交纳20克朗的党费。他逐渐认识了工厂支部的其它同志。盖世太保伯姆希望亲自认识一下全支部的所有成员，因此，让德沃夏克和支部的同志们逐个地在工厂门前或者在偏僻的小巷见面，而伯姆每一次都预先躲在一旁偷看。根据密探德沃夏克问伯姆提供的情报，容克工厂地下党支部成员共计有十六名。

德沃夏克“工作”得如此出色，致使他博得了巴尔托尼同志的充分信任：巴尔托尼甚至向他建议，让他和他们俩所

居住的庞克拉茨区的党组织接上关系。这一点，德沃夏克真可谓求之不得！这样，大约在1942年的2月底或者3月初，巴尔托尼同志告诉德沃夏克，要他到庞克拉茨的叶林内克同志家去，叶林内克将为他作进一步的安排。叶林内克同志不认识德沃夏克，因此，巴尔托尼安排了他们的会见。

尤列克被捕的全部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诚然，叛徒赖青早已经领着盖世太保在跟踪尤列克，但是，他们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跟踪并没有取得成功。尤列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曾经提到，容克工厂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是他被捕的间接原因：“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同志中有谁叛变或贪生怕死，而仅仅是因为不慎和倒霉。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上级领导。他的朋友叶林内克同志对秘密工作规定有点粗心大意，告诉了他应当同谁取得联系，本来叶林内克同志应当事先和我商量，这样，接头的事不通过他就行了。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更为严重的、关键性的错误就是：有一个姓德沃夏克的奸细骗取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巴尔托尼同志还把叶林内克的名字告诉给他——这样，盖世太保就开始注意叶林内克一家了……”

叶林内克同志托巴尔托尼给德沃夏克带去了来他家接头的暗号，接上关系后叶林内克将向德沃夏克进一步介绍与庞克拉茨区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会面的具体安排。

大约在1942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8时，德沃夏克按响了叶林内克家的门铃。叶林内克给他开了门。当叶林内克听到了暗号以后，他把德沃夏克让进屋里，告诉他，要他在

下星期一晚九时，到弗尔肖维采区俄罗斯大街街口上的一路有轨电车站去；他的右手要拿一本《捷克语言》杂志作为接头标志，同时也要把巴尔托尼带来会面。全部谈话都是在前厅进行的，这一点引起了德沃夏克的怀疑。显然，在叶林内克夫妇家里一定还暗藏着党的高级干部。

接头那天，德沃夏克领着巴尔托尼同志来到了约定地点。德沃夏克站到一路有轨电车旁边，巴尔托尼同志等候在他的对面。他们等了大约十分钟，但是，接头的人并没有出现。当天晚上，德沃夏克还向盖世太保伯姆报告了全部情况。

几天后，巴尔托尼派德沃夏克给叶林内克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埋怨叶林内克，为什么没有人前来接头。他还向叶林内克保证说，瓦舍克（即德沃夏克）是可靠的，因此，他再次要求让德沃夏克和庞克拉茨区的“杭扎”接上关系。德沃夏克又事先把这封信交给了盖世太保，他们把它录了音并拍了照，然后，盖世太保伯姆便如同影子一样跟踪着德沃夏克，后者再把信送给了叶林内克。叶林内克同志又只让德沃夏克来到前厅，当他看完了巴尔托尼的信后，他告诉德沃夏克，星期一再到弗尔肖维采区上次约定的地点去，这一次接头的人肯定会来。

德沃夏克和巴尔托尼又来到接头的地方。他们等候了大约二十分钟，忽然有一个瘦高个男子向德沃夏克走了过来（事后知道，他就是维斯科奇尔同志）。在和德沃夏克交谈的整个过程中，他的右手一直插在裤兜里，这就是说，他对德沃

夏克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握着裤兜里的手枪。一会儿后，他们两人朝俄罗斯大街的方向走去，后面跟着巴尔托尼同志以及盖世太保伯姆。伯姆偷看了接头的全过程，大概在午夜时分他又和密探德沃夏克见了面。德沃夏克向他报告说，他已经取得了杭扎（即维斯科奇尔同志）的信任，但是，后者同时还提请他注意，所有的叛徒都不会有好下场，当时他还向他出示了手枪。据说杭扎还补充了一句，他说：这一次仅仅是初次会见，将来还计划与德沃夏克进行合作。此外，德沃夏克还向伯姆报告，他从杭扎那里收到了一本最后一期的地下杂志《真理》。当天晚上，盖世太保又把该杂志拍了照，以后再把它归还给德沃夏克。

维斯科奇尔同志把下一次接头安排在1942年4月15日晚10时于布拉格XⅢ区米昌基大街的一家电影院门口，等候期限为十五分钟（这次接头将安排德沃夏克与党的负责同志见面，党的负责同志还将分配德沃夏克到布拉格以外的地方去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维斯科奇尔同志还要求德沃夏克独自一人前来接头，组织上对巴尔托尼同志将另有安排。

接头那天，维斯科奇尔和德沃夏克又见了面。然而，他们只是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并约定下次接头将于1942年4月24日晚10时在原地进行。这次会面以后，密探德沃夏克立即在维诺赫拉迪区的奥里翁工厂附近见到了伯姆，并向他报告了他自己与维斯科奇尔同志的谈话内容。当时盖世太保已经知道了容克工厂中的全部十六名地下党员的名字，这些秘密支部的成员全是德沃夏克向盖世太保告发的。德沃夏克同时

还提出假设：支部书记巴尔托尼肯定和上面有联系。

盖世太保伯姆与反共科科长磋商后决定：4月24日接头时逮捕维斯科奇尔同志，可能的话还要把巴尔托尼同志和容克工厂中的其他地下党员一网打尽。盖世太保们深信，维斯科奇尔同志必定会开枪拒捕，因此，他们决定把接头地点包围起来。

在审讯过程中，伯姆对下列事实供认不讳：

“在莱梅尔的指挥下，我和另外六名公务人员（即盖世太保）分乘两辆轿车开赴接头地点。公务人员中有刑警干事赞德尔和迪米欣，刑警队员弗里德里希，甘斯博士和捷克警察内尔格尔。晚上9时15分我们离开盖世太保办公大楼。我对莱梅尔说，我们最好把汽车停在奥里翁工厂的大门口，然后步行到接头地点。莱梅尔持另一种意见，他命令把汽车停在位于布拉格XⅡ区贝奈什大街的库比克建筑师的别墅门前，然后，我们才步行前往米昌基街上的电影院。由于天黑，能见度极差，我们只能看清电影院入口处的情况。晚9时55分德沃夏克践约来到了接头地点。他走进电影院的休息室，因为当时演出尚未结束，入口处依然是灯火辉煌。大概在晚上10时15分电影结束。但是，此后也没有一个人（维斯科奇尔也没有）来和德沃夏克接头，晚上10时40分左右我们撤离了接头地点，回到了佩切克宫。根据约定，德沃夏克于晚上11时也来到了佩切克宫。我问他，为什么接头失败了，他说，他认为：可能是某个环节露出了破绽，因此，不再信任他了。我指出，德沃夏克可能有意从中破坏，因此，他向我们提供

的接头时间是假的。此时，德沃夏克竭力为自己辩护，他说，最好是立即到叶林内克家去把他抓来，这样便能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经过一番争论以后，我们便作出了立即逮捕叶林内克的决定。

午夜时分，上述几位公务人员在庞克拉茨区的住宅内把叶林内克逮捕了。

在此以前，当德沃夏克向我报告了叶林内克在布拉格庞克拉茨区的住址时，我和德沃夏克、莱梅尔便对叶林内克的房子及其周围的地形进行了侦察。那次是在星期六的下午。叶林内克住在一幢现代化的新楼里，地址是：布拉格XIV区希图西大街1133号。大楼有两个大门，楼内居住着约60户人家。叶林内克住在一层。当时我们已经决定，进行逮捕时楼外也必须布置警戒。

维斯科奇尔没有前去和德沃夏克接头是由于下述意外情况造成的：

前面我已经提到，本来我们想把两辆汽车停放在布拉格XII区的奥里翁工厂门口。但是，后来按照莱梅尔的命令，我们把汽车停在贝奈什大街的库比克建筑师的别墅门前。库比克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大约65岁。大部分时间他不在布拉格，主要是呆在南捷克地区。他的妻子比他年轻许多。布拉格斯特拉什尼采区的某位名字叫作帕奴什科娃的妇女在她家当佣人。帕奴什科娃把维斯科奇尔领进库比克的别墅，后来他便和少东家同住在别墅的顶楼房间里。大约从1941年秋天以来，这里便成了维斯科奇尔的秘密住所……

我们把汽车停在在别墅前面，然后步行至别墅对面的接头地点。在逮捕了库比科娃以后我们才知道，维斯科奇尔当时发现了我们的汽车，他并且注意到：大约有八个男子包围了米昌基街的电影院。虽然他无法断定我们就是盖世太保，但他还是闭门不出，并和库比科娃和她的孩子对盖世太保的活动进行观察。在库比科娃的劝告下，他一直留在家中。他还亲眼观看了汽车撤离时的全部情况。后来在审讯时他说，当时他认为我们是盖世太保是确凿无疑的了。

库比科娃太太和她的儿子于1942年6月在另一案件中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上面提到的帕奴什科娃也于同年6月或7月被她自己的丈夫、屠夫帕奴什卡亲自押送至盖世太保司令部。她也在另一案件中被判处死刑。”

伯姆在供词中继续写道：

“1942年4月28日午夜12点30分左右我们按响了叶林内克家的门铃。（日期有误。叶林内克夫妇和尤列克是在1942年4月24日晚上10时左右被捕的——作者注）事先我们命令看门人当晚不要把大门上锁，同时，在接到新的命令以前，她必须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两位公务人员先从外面对房子进行监视。我们了解到：房子里除叶林内克夫妇以外还有其他的人。当时房门紧闭，我们就强行把它砸开了。当我们冲到厨房里时，发现那边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位妇女。除叶林内克外还有三个男人。我们断定，当时的场面一定十分热闹，因为桌子上还放着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和满满的一大盘点心。我们的出现引起了一阵慌乱。我们注意到，

其中一个男人试图开枪拒捕。后来的调查证明，那个男人就是来自西班牙前线的老战士、化名为米雷克的米罗斯拉夫·克列仓。当时我们命令所有的人举起手来，我们要进行严格的全身搜查，看一看他们是否携带着武器。除了在克列仓身上找到的手枪外，在其他人身上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此刻我正背对着没有开灯的卧室站着。突然，从那间卧室里走出来一位满脸胡须的人。我看见他把两支打开保险机的手枪扔在床上。我们也命令他举起手来，我们也要对他进行严格的搜身，看他身上是否还有武器。我们还检查了他的连腮胡子和所有这些人的身份证。在大胡子身上我们找到了名字叫作荷拉或者荷拉克的证件。在克列仓身上我们找到了名字相符的证件。我们逮捕了在场的所有人，并用汽车把他们押送到盖世太保办公大楼。我是亲自乘车把克列仓和那个大胡子押送去盖世太保办公大楼的。路上我问克列仓和大胡子，他们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但是，他们都没有如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当他们两个人被带到莱梅尔的办公室时，克列仓声称他愿意招供，他也果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接着，他立刻被带到隔壁的428号办公室，我亲自在那间房间里守着克列仓。大胡子则拒绝招供。后来，他被带到莱梅尔的审问室，由莱梅尔、弗里德里希、赞德尔、迪米欣、甘斯博士和刑警干事卡卢斯进行审讯。大胡子拒不交代自己的名字。在审讯过程中他遭到了拷打，其间严刑拷打最凶的要算弗里德里希和赞德尔两人。我还知道，弗里德里希在笔记中还写下了这样的话：他（弗里德里希）亲手打死的就已有八人，何愁制服不了

一个伏契克！我个人则和克列仓呆在一起，因为他坦白交代了全部问题。他除了交代说他姓克列仓以外，他还出乎意外地说：那个大胡子就是伏契克，他是捷共地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克列仓的一切活动完全听从他的指挥。接着，我又来到莱梅尔的审问室，我告诉他说，那个大胡子是伏契克，同时我向莱梅尔表示，我愿意审理这个案件。我还要求弗里德里希停止拷打伏契克。当伏契克听说克列仓已经供出了他的名字，他沮丧地、但同时又轻蔑地看了一下正从隔壁房间带进来对质的克列仓，然后他逐字逐句地说：‘既然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我就是伏契克，那么就请便吧！’说完，他昂首挺胸、傲然直立。

从那一刻以后他便一言不发。后来按照莱梅尔的命令他再次遭到毒打。大约在凌晨5时左右我再一次提请弗里德里希和赞德尔注意，把人活活打死无济于事。弗里德里希却对我说，我还应当好好地向他学习。快到六点时，克列仓的交代已相当彻底。伏契克拒不交代，于六时左右被押送到庞克拉茨监狱……”

米雷克在伯姆口供记录称之为“彻底的”交代材料中出卖了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首先是出卖了弗拉季斯拉夫·万楚拉^①。米雷克还带着伯姆搜查了雕塑家兹登涅克·德沃夏克的住宅，当时正在他家里的有贝德日赫·瓦茨拉维克、巴维尔·克罗帕切克、费尔伯教授和他的儿子。盖世太保逮捕了所有的人，这些人后来都被他们处死或者折磨致死。米雷克在他的“彻底的”交代材料中还出卖

了其它许多革命同志。

“至上午八时，大约已有14至16人被捕，他们的名字是由德沃夏克提供的，据称他们都是工厂支部的成员，这些被捕的人全部被押送到佩切克宫。我也不得不来到那个地方，因为密探德沃夏克形式上也被盖世太保逮捕、并作为囚犯被带来和巴尔托尼及其支部成员对质……”

关于尤列克被捕的情况，盖世太保伯姆的供词就是这样。伯姆对当时情况的描述极其小心谨慎，从全部供词可以看出，他把对尤列克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的责任一古脑儿地推到其他盖世太保身上，而且把在盖世太保办公大楼对尤列克的审讯缩短了整整十六个小时。

4月24日晚，当尤列克已经被捕，并且被押送到盖世太保办公大楼时，我还懵然无知地坐在牙医门诊室里，等候着和库尔特·格拉塞尔和兹登涅克·诺瓦克接头。我经常给他们送地下刊物，还给库尔特传递党中央给他的书信。我多次在前厅或者在无人的房间里，把带来的书报杂志神不知鬼不觉地交给了他们。就连诊疗所的主人对此也毫无觉察。我们常在晚上到牙医门诊室来——这一点也不会引起外人的怀疑，因为许多其他的病人也常常在这个时候来找大夫看病，而且大夫就住在诊疗所。

当时我在那里偶然碰到了博什卡·波罗娃同志。自1938年以来这是我们首次见面，而且，过去我们俩还是莫逆之交，特别是她在我所居住的列特纳学生区当电话员的时候。我们曾在同一个支部中长期共事。现在她已转入地下，那天

晚上她连住宿的地方也没有。当同志们要我把她领回家去，但却遭到我的拒绝时，我在她的眼睛里看见了与其说是责备倒不如说是沮丧的神情。

我很晚才回到家里。午夜后很久很久我才入睡。忽然，我梦见有人在按我家的门铃。我的心急得咚咚直跳。我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梦，极力想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但是，当我睁开眼睛，门铃声却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那是德寇占领时期每一个从事反纳粹工作的人习以为常的那种铃声。我首先想到的是：盖世太保要抓尤列克。我从床上爬起来，在漆黑的房间里走了几步。我不能开门！我又躺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为了听不见那刺耳的铃声。尤列克不在这里——真是天大的幸运！好在我也没有把博什卡·波罗娃领回家来！我仔细想了想，房子里有那些东西是反纳粹的、会招惹麻烦的。我想到了放在书架上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其中还有一份四月出版的《红色权利报》和一本地下发行的《联共(布)党史》，不过这些书报盖世太保不会立即找到。

门铃响个不停。我又翻身起床，拉紧窗帘，打开灯，把《红色权利报》找了出来。我把它拿在手上，心里想着把它往那儿放才好。用抽水马桶的水把它冲掉吧？我必须从卧室中跑出去，这样，他们就能听见我的声音。用火把它烧掉吧？这里都是水暖设备，那儿去找火呢？我又把灯关上，拉开窗帘，打开我们这间顶楼房间的窗户。我爬到屋檐边，把《红色权利报》扔了下去。报纸飘然而下，但是没有落到地上。它挂在水槽上，发出窸窣的响声。我伸手去摸，但是够

不着它。我向四周环视了一下。漆黑的夜幕笼罩着大地。我忽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我从七层楼上向下纵身一跳，那么便会完事大吉。这只是一闪念而已，它只存在一秒钟左右。假如他们发现我脑浆迸裂地摔倒在人行道上，他们当然会幸灾乐祸的。我决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我从屋檐旁下来回到房间。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然而，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抓到尤列克。

突然，我好象听到了两只电铃同时在响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是心理作用，不过我还是屏息静听。我终于听清了：那是家用电话机发出的低沉的嘟嘟声和门铃刺耳的响声，其中还掺杂着咚咚咚的砸门声。

我在黑糊糊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脚下的镶木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这声音似乎在安慰着我万分焦急的心。我对自己说：我不开门！也许铃声会沉寂下来。也许他们一会儿便会走开。我又拉上窗帘，打开开关。我环视着我们精致的房间，靠墙的书架，尤列克工作的写字台，我们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收音机。他们必然要想知道，尤列克藏在什么地方。我将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40年的春天。是的，我们去报过户口，说他住在这里。我既然相信他总会回来的，那么为什么要把他的户口注销呢？但是，如果他们闯进来一看，他们又会发现尤列克却住在另外的地方。这倒使我有点儿为难了。

我似乎看到，门锁中钥匙在开始转动，房门就要打开。我的两腿机械地向房门走去。我打开房门。两个盖世太保气

呼呼地冲了进来，从电梯中又走出来第三个。

“臭娘们，干嘛不开门？”其中一个盖世太保用捷克话高声嚷道。

“我没有听见。”

“胡说！我们已叫了一个钟头了！”

“我睡着了。你们是谁？”

“这您管不着！”

谈话间，他们已经打开了放在前厅的大衣柜。他们把衣物乱翻一通，把挂在衣架上的衣衫全拽了下来；他们推开储藏室的门，当他们发现里面只是些藏书时，他们又把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他们冲进里屋，扑向书架。他们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一本的书，胡乱翻动着，然后扔在地上。这些书是我们节衣缩食购置得来的。这些书是尤列克悉心编排，珍藏在书架上的。尤列克是多么珍惜这些书啊！在1939年的春天，当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开进我国时，他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它们的。

“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我慢条斯理地、好似漠不关心地回答着，同时耸了一下肩膀。随便他们怎样理解都行。也许他们会以为我早已经把他忘了。然而，我的心却怦怦直跳。

他们把写字台的抽屉全都抽了出来，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写字台上。突然，一个盖世太保发现了一块写着字的纸片，他全神贯注地查看起来。

“这是什么？”他大叫了一声。他把那张纸片在我的面前使劲摇晃了几下，然后把它摊在我的眼前。我向它瞟了一眼。上面写的是阿拉伯字母。好多年以前，记不清是谁在这张纸片上随便写了这些阿拉伯字母，而我无意中把纸片放在抽屉里，一晃就是这么多年了。

“这是阿拉伯字母。”

“撒谎！这是密码！这是什么密码？您丈夫在哪儿？”

“这是阿拉伯字母。你们可以让专家去鉴定好了。”

“胡说八道！您说，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

（后来，在佩切克宫的“400号”候审室里，尤列克曾悄悄地对我说，因为写在纸片上的那几个倒霉的破字，他们曾多次审问过他。据说那些纸片是他们在我们家里找到的，他们认定那是一份密码。当我告诉尤列克，那的确是一些阿拉伯字母，他们也曾向我追查过那张纸片时，盖世太保的高明之处实在叫我们俩哭笑不得啊。）

一个盖世太保查看了一下收音机。他背向着我大声嚷道：“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因为他们没有抓到尤列克。当时我并不知道，尤列克已经被他们折磨了好几个钟头。

“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我象机器一样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快，跟我们走一趟！”

我从乱七八糟的衣服堆里拣出一条蓝色的百褶裙（它是尤列克为我买的），一件蓝色的敞身毛衣和一件带衬里的风雨衣。一个盖世太保看见了我准备穿这么多的衣服，便对我说：“不用带这么多，过一会儿您就可以回来。”（然而，这次一别，足足过了三年以后我才重新回到家中！）

我走进浴室，正要关上门去穿衣服。两个盖世太保马上跟了进来。一个站在浴室中央，一个把着浴室门站着。我只好背对着他们把衣服穿上。他们厚颜无耻地笑了起来。

“您真的不知道，您丈夫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现在尤列克在干什么呢？也许他已经睡了。现在是清晨两点。如果他知道了他们又搜查了我们的家，他又该是多么地着急啊！

盖世太保们搜到了几包香烟。

“这些香烟您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收到的。”

一个盖世太保恬不知耻地当着我的面便把那些香烟一一塞进口袋。这些香烟我是从罗汉同志那里为尤列克弄来的。我现在已不能把它们给尤列克送去了。但愿他平安无事！

他们把我带了出去。他们自己把房间里、浴室里以及前厅里的全部电灯关掉。我锁好大门，把钥匙放在手提包中。一个盖世太保在门上贴了一张封条。我探过头去想看一看上面写些什么。那个盖世太保把我推在一旁，命令我说：“滚！”

我们四人沿着楼梯往下走。整个大楼正进入梦乡。大楼前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停着一辆汽车。远处露出了黑压压一片

楼房的轮廓。四周死一般寂静，盖世太保默不作声地把我推进汽车。他们中两人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一个开车），第三个坐在我的身旁。开车的那个盖世太保发动了马达，汽车开动了。我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似乎它们与我全然无关。后来我觉得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好象穿过了整个布拉格城，而且还在往前行驶。路上他们不停地盘问我说，我的丈夫在什么地方。我只是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然而，他现在大概在哪儿呢？他是在里巴日夫妇家里呢、或者在叶林内克夫妇家里，还是在巴克萨夫妇家里呢？他千万不能出事！关于他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

突然，汽车刹住，停了下来。有人打开车门，我们全都下了车。我站在一幢用大石块砌成的高楼面前，捷克人路过这所大楼时总是低着头、紧闭着双唇，因为正是在这所大楼里捷克民族被宣判了死刑。这所大楼就是佩切克宫——从前的银行，现在是盖世太保司令部的所在地。

盖世太保把我包围起来，他们揪着我的大衣袖子把我拉进楼去。在阴森可怕的走廊上，党卫军出出进进。另外一些党卫军则站在那里，凶猛高大的警犬偎依在他们的腿边。来往行人在地毯上发出低沉的脚步声。他们是把我从正门带进去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押解犯人一般是从过道进去。走廊上显出一种不自然的、紧张的和令人窒息的静寂。我感到，每一个党卫军和他脚边的每一条狼狗都有一双红褐色的眼睛，它们凶神恶煞似的，如同放射出一支支毒箭，刺痛着

我的全身。

他们用电梯把我押解到高层楼上，然后带着我来到一间烟雾腾腾的房间里。他们指了指第二条长凳叫我坐下，这个房间同样沉浸在紧张的、令人窒息的寂静之中。只有党卫军或者身穿便服的盖世太保粗鲁、刺耳的说话声才不时地划破沉闷的空气。这里的人们步履艰难，犹如在云天雾海中岌岌可危的礁石上行走一般。我感到一切都如梦幻，就象我在戏院里观看着舞台上正在上演可怕的戏剧一样。我前排的长凳上坐满了人，我的旁边也坐着人。我略略朝后一看，我看见后边也坐着许多人。在窗帘紧闭的玻璃窗下面靠墙有几张桌子，桌旁也坐着许多人。在对面墙根下，有些人却站在那里。房间的正前方，在烟雾弥漫中露出一个黄色的公文柜，公文柜上木质的百叶窗式的盖紧闭着。地板用浅色方砖砌成。我觉得，这里尽是一些陌生的、奇形怪状的脸：有些脸苍白，有些脸蜡黄，有些脸红似胭脂，有些脸上的眼圈发黑。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所在的房间正是难友们称之为“400号”的那个房间，它是一个候审室，盖世太保们来到这里，把一个个犯人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审讯，去严刑拷打，然后，再把被打得死去活来的犯人送回到这里来，让另一些盖世太保再把他们带出去拷打和审问。他们对犯人严密监视。不许他们自由行动，不许他们左顾右盼，也不许他们开口说话。

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认为在“400号”房间没有一位熟人。我稍稍松了口气，但是心里并不完全踏实。为了不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我又小心谨慎地、头一动不动地只用

眼睛偷偷打量着我所能看见的前后左右的人们。我还是没有发现一个熟人。突然，当我的右眼往后一瞥时，我看见了一张男人的脸。我感到这个人好生面熟，虽然眼眶下方紫红色淤血块已弄得他面目全非。他象是叶林内克同志。“完全是胡思乱想！”我暗自安慰着自己。他根本就不是叶林内克同志！过一会儿也许我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熟人看待。我闭上眼呆了一会儿（因为我不能伸手去揉眼睛，以驱散眼前的幻影），然后又把两眼睁开，又向右边瞟了一下。但是幻影并没有消失。我惊讶地发现，他正是叶林内克同志。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把他抓来的？又是为了什么？也许和尤列克无关！？叶林内克的目光碰到了我右眼的目光。他看不见我的左眼，因为他从旁边只能看到我的侧面。他轻轻地把头摇了一下，表示我们要装作互不相识！他的这个动作是如此之细微，如同从花瓣上轻轻掠过的一丝清风，只有难友的眼睛才能捕捉到它。我同样轻轻地摇了一下头，用几乎是无法觉察出来的这个动作向他表示“我们互不相识”！他在这里一定与尤列克无关——我极力用这样的解释来安慰自己万分焦急的心。

在我右侧有一条通向房门的狭小的过道。突然，意外的事件打破了房子里令人窒息的静寂。不知是谁用一种猛烈、鲁莽的动作转动了一下门上的把手，接着房门大开。我不由自主地把头转了过去。一个身穿便衣的盖世太保把一个女人粗鲁地推了进来。我定睛一看，她正是叶林科娃太太！她眼眶发黑，脸色通红，头上往日梳得整洁漂亮的黑发象草堆一样蓬松，她拖着沉重的两腿蹒跚地走着。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在她的眼里没有恐惧和悔恨，而只是放射出奇异的、火一般的光芒。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把头轻轻摇了一下，表示“我们互不认识”。她象生怕弄皱自己裙子的女人那样慢慢地在长凳上坐了下来。其实，这是由于盖世太保们把她打得皮开肉绽的结果。面对这惨不忍睹的景象，我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了。现在我用另一种能够仔细观察世界的目光看着对面。我猛然看见了一个熟人：叶林科娃同志的弟弟帕夫利克，年方十八的小伙子。我向他递了个眼色，他也以目光向我示意：“我们互不认识”！孩子啊，为什么你也到了这里？我真是无法理解。帕夫利克原来住在叶林内克夫妇家中，当我去找尤列克时，有时候我曾看见过他。他象一只轻轻落下的小鸟一样，经常是来去无踪。当我和尤列克一起留在叶林内克夫妇家中时，我甚至不知道，夜里他究竟睡在什么地方。

我妄图找到叶林内克夫妇和我之间的联系。他们从来就不知道我居住的地方。他们在我面前从来也不让人知道；他们原来就认识我或者尤列克。

房门又砰的一声打开了：盖世太保又押来了我的两位熟人——里娃·弗里多娃同志和她的丈夫。他们俩慢慢吞吞地走着。一个盖世太保把里娃推到我旁边的长凳上。当她小心翼翼地往下坐时，她低头凑到我跟前。我们俩咬着耳朵一口气儿说完了同一句话：“我们互不认识”！当她刚一坐下，另一个盖世太保又走了过来把她带出去了。

靠墙站着的被捕者必须面壁而立。但是，那不是真正的墙壁，而是安装在墙内的壁橱，外面涂上跟墙壁一样的颜

色，叫你无法辨认。只有壁橱上部纵向缝隙的切口才暴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当这座多层大楼的正门上还挂着“佩切克银行大楼”的招牌时，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大概是一个衣帽间。地上的方砖，安装在后面墙壁上的洗脸池、以及镶在整扇墙壁上的巨大镜子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被捕者们不能用嘴说话时，他们只得借助眼睛去交换思想。房门不时地象被猛烈的暴风冲开一样，接着，盖世太保又把另一个被捕者扔进房间。鲜血渗透了他的衣衫，染红了长凳、地板和墙壁。有一次，盖世太保又押来了一位身穿工作服的同志，他们罚他站在那里。一个盖世太保打得他一头栽倒在黄色的文件柜上。那位同志象一只身负重伤的小鸟不停地用嘴巴喘着气。严刑拷打后的高烧已使他双唇干裂。但是，他们连一滴水也不让他喝。他的两腿再也无法支撑他的身躯，结果他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了。另一个盖世太保（后来我得知他叫波希克）跑到洗脸池前，盛满了一桶水，又走了回来，然后，把水浇在昏死者的脸上，同时，一边骂着一边还向昏死者踢了一脚。但是，给他水喝那是不行的！我已经记不清楚，整个夜里盖世太保们就这样翻来复去折腾了多少次。那位备受折磨的同志名叫巴尔托尼，是容克工厂的工人。在被捕前我不认识他。就在那天夜里我对他也毫不了解。他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是，当他得知：他就是那次大规模逮捕的祸根时，他更是痛苦到了极点（那次大逮捕是由于骗取了他充分信任的叛徒瓦茨拉夫·德沃夏克的出卖造成的）。当时在“400号”候审室里，我也见到了密探德沃夏

克。在被捕的同志们中间，他处处显得与众不同。他象最最蹩脚的江湖艺人那样卑劣地扮演着“被捕者”的角色。当盖世太保们把他从“审问室”押解回来后，在他的脸上你看不到经过内心斗争之后残留下来的任何痕迹；他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满足的神色；他不时地用手背擦拭一下他那叛徒的嘴，如同刚刚喝完半公升啤酒那样。所有的盖世太保对他都表现出异样的关怀：他们对他不推推搡搡；他们“传讯”他的声音里充满友善；他们的眼睛对他毫无敌意。然而他们的这些举止无意中却不由自主地泄露了天机：他们和这个人的关系非常友好。不用你多说，每一个囚犯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在这个败类的头顶上浮现出了令人可憎的字眼：叛徒！然而，他那可卑的良知还是使他感到羞愧和无脸见人。假如他试图看一下任何一位囚犯的眼睛，那么他立即会感觉到，这些眼睛在说：真可惜，我们没能及早看出你这个败类的嘴脸！

全国解放以后，从我所作的调查中得知：这个败类因其卑鄙的告密活动而从盖世太保那里领得了1,500克朗的月薪，以后增加到2,000克朗，此外，还得到一笔“特殊功勋奖”。

当巴尔托尼同志了解到，由于他轻信叛徒而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时，他悔恨交加。几天后，他乘看守一时疏忽之际，从“400号”候审室的窗台上跳楼自杀了。

我坐在长凳上冥思苦想，以致我的脑袋好象快要爆炸似的。我苦苦思索着：为什么叶林内克夫妇，弗里德夫妇都在这里？而我到这儿来和他们又有什么联系？突然，房门又猛地打开了，我看见了尤列克！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高个子的

盖世太保，他脸色苍白，两颊深陷，活象一个骷髅。他手持棍棒驱赶着尤列克，而尤列克却光着两只脚，他的脚掌在方砖上留下了血淋淋的脚印；他的鼻子、嘴角和面颊到处淌着鲜血。盖世太保逼着他远远地离开了其他被捕者，走近墙角去面壁站着。但是，尤列克却忘记了身上的伤疼，视武装的盖世太保如粪土，他昂首挺胸、从容不迫地走了过去。在墙角边他站住了，但是他面对着我们，两眼瞧着我们。我们惊奇地看着他，我们的头也一起抬了起来。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盖世太保们被吓呆了，因为尤列克竟敢违抗他们的意志，竟敢不唯他们的命令是从。他的眼睛里没有丝毫卑躬屈膝的影子。对盖世太保来说，他的目光是倔强的和轻蔑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囚犯说来，它又充满爱抚和力量。他站在墙角那边，武装的盖世太保们包围着他，然而，他不是一个战败者和弱者，相反他是一个胜利者和强者！他的眼睛告诉我：他们可以杀害他，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杀害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准备为之献身的理想；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属于伟大的、不朽的社会主义思想，属于苏联和那些跟她并肩战斗的人们。这一信念在他疲惫不堪的眼睛里放射着光芒。这就是那天夜里我所看见的、终生无法忘记的尤列克。

盖世太保把我从长凳上拉了出去，带到尤列克的面前。我们俩几乎是紧挨着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彼此看着对方。尽管严刑拷打已使他面目全非，但是，我依旧看到了他那清秀的面影——他那如此熟悉和令人爱恋的脸庞。

“你认识他吗？”一个盖世太保冲着我大嚷起来。

我的尤列克！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认识！”

尤列克英气勃勃地看着我，他好象在对我说：“坚强些！”

盖世太保猛地把手挥了一下。

天哪，我的尤列克！

他们把我带了出去，那天夜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和其他许多被捕者一起来到摄影师的房间里。盖世太保在那里手忙脚乱起来。他们把我们按先后次序带到一张高凳旁边。当一个被捕者在高凳上坐定后，他们便把他的头塞进一个夹紧装置中，并命令他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然后一道强烈的灯光闪过，摄影师便喀嚓一声按了一下照相机。盖世太保给每个人拍了正面和侧面相。当时我头上带着一顶帽子。一个盖世太保把它从我头上拽了下来，扔在地上，再用脚踏了一下。我拾起帽子，把它放在膝部。另一个盖世太保一个箭步蹿了过来，拿起帽子，把它扣在我的头上。当我还在莫名其妙之际，他们便替我拍了一张歪戴着皱帽子的照片。

此后，盖世太保们又把我们排成队，带到我从未去过的一个房间里。那里我看不到一个熟人。他们为我填好了拘留证，然后也没有进行新的审讯，便押着我和其他许多的人下楼来到一层，来到靠墙放着许多板凳的狭小的走廊上。党卫军们则在用那些板凳组成的过道上来往穿梭。我们坐了下来。我无意中跷起了二郎腿。一个党卫军看见了，向我跑了过

来，用枪托往我那条搁在上面的腿砸了一下。和我同坐在走廊上的大部分被捕者在他们的左胸上都别着一个黄色的六芒星。他们是犹太人。一位陌生的犹太妇女小声地告诉我，在一个姓弗里德的人所居住的大楼里，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捕了。盖世太保为什么要逮捕他们呢？他们可全不认识那位姓弗里德的人啊！

又进来了许多党卫军。每一个党卫军都抓住一个胸前别着六芒黄星的男人，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当党卫军问“你是谁？”时，那个男人必须用德语回答：“我是个臭犹太人！”

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午后时分。两小时后，一个党卫军开始念被捕者的名字。每一个被叫到名字的人必须迅速出列、立正、并用德语说“到！”当党卫军问：“你叫什么名字？”时，被捕者必须如实回答。起初，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便用拳头来教训我们。党卫军的捷克话发音不准，对捷克人姓名说不利索。有时候，一个囚犯以为在叫自己的名字，便会刷拉一声站到党卫军的面前。当发现与名单不符时，他的牙齿或者鼻子就要吃上几拳，直到被打得血流满面为止。有时候两个囚犯同时站了出来，那么，两人都少不了挨一顿毒打。

被捕者都沉默不语，没有怨言，也没有眼泪。只是在我们的眼睛里浮现出这样的问题：“下一步他们要干什么？”一个老头儿轻轻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一个党卫军发现了，他——论年龄，完全可以当那个

老头儿的孙子——一个箭步向老头儿蹿了过去，大喝一声：

“你说些什么？”老头儿不懂他说的话，党卫军便开始打他耳光。他每打一记耳光便大骂一句：“你说些什么！你说些什么！”许多被捕者的鼻子或者嘴角都淌着鲜血，有些人则由于鼓膜被打破而痛得用手捂着耳朵。

最后，他们终于点完了名，把我们排成两行，数了数，共约二十人。接着响起了命令：“开步走！”他们领我们来到过道上，一辆准备好的汽车正停在那里。每一个人必须尽快爬上车去。假如有一人（特别是那些老人们）行动迟缓一些，他又会遭到党卫军们的一顿毒打。在这里，人们的悲惨遭遇连猪狗都不如！汽车终于开动了，它从过道开到了街上。星期六午后，和煦的春光透过毛玻璃窗射进车来。佩切克宫在街道的正面一动不动地矗立着。它为什么不敞开自己的院墙，让全世界看一看纳粹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骄阳怎么能愉快地遨游太空而脸上不布满阴云？整个世界为什么不感到触目惊心？人们啊，你们怎么能无忧无虑地在街上漫步，你们怎么能欢笑和嬉戏？你们怎么能出售鲜花？你们在经过押解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囚犯的囚车时又怎么能无动于衷？我以紧张的心情期待着这样一种奇迹出现，它将彻底清算盖世太保骇人听闻的暴行。

但是，来往行人谁也没有注意满载着苦痛的囚车，他们的眼睛连看也不看一下，他们以为这是一辆普普通通、安全完好的汽车。汽车载着我们行驶在熟悉的街道上，一星期前，我乘有轨电车到庞克拉茨去找尤列克时正是从这里经过

的。忽然间我似乎又感觉到：眼前我所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梦幻而已。尤列克现在在巴克萨夫妇家里，今天是星期六，晚上我便要去找他。我必须提醒他多加小心。然而，尤列克早已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之中了！万一挂在水槽上的那张地下《红色权利报》被他们找到了，又该怎么办？但愿莫尔库普没有把肉票扔进邮筒中去，以免被盖世太保发现！尤列克现在怎样了？后悔他昨天没有回到家中，否则在他动身去叶林内克夫妇家以前，我至少还有一点儿时间可以提醒他当心一些事情！然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难道我能在昨天未卜先知吗？现在，盖世太保的汽车里坐着的囚犯，看上去都显得平静和满意，如同乘车出游的旅客一般。唯有那车中的静寂使你惊愕不已，仿佛乘车人全都是哑巴似的。

第二节 在庞克拉茨监狱 戒严令

他们的汽车把我们拉到了庞克拉茨监狱门前的院子里。有人打开了车门。和我们一同坐在车里监视我们的两个党卫军用德语高声喊叫起来：“走！走！快！”大家下车！他们轰我们两人一排，碎步跑进监狱中去。走廊上挤满了身穿灰绿色制服、头戴军帽的党卫军，黑色帽檐上的骷髅标志泛出寒光，它下面是两根交叉着的死人骨头。“我们就要把你变成这样的骷髅，”党卫军们凶恶的眼睛对每一个囚犯在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而囚犯们的眼睛却回答说：“这是可能的，但是你们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你们想把这个国家的人们斩尽

杀绝——这一点你们永远办不到！我们憎恨你们！”为了不致于看见囚犯们那些仇恨的目光，党卫军们强迫所有的犯人都面壁而立。他们站在我们背后嚎叫着，同时，把手中的牢房钥匙弄得铮铮作响。谁也不知道走廊上的党卫军总共有多少。他们在被捕者的周围巡视着。突然，一名党卫军揪住一位年老的囚犯。“你叫什么名字？”党卫军冲着那位老人大叫了一声。“克劳斯，”老人回答道。党卫军接着又嚎叫起来：“你是一个臭犹太人！”说完照他的脸上就是一拳。

“你是谁？”“我是臭犹太人克劳斯，”老人这样回答。这个男人就是大学教授克劳斯。

我戴的帽子似乎老要惹他们生气，他们又把它从我的头上抓了下来，扔在地上。现在它只好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了。

被捕的男人必须把口袋里的全部东西拿出来，放在礼帽或便帽里，然后，按党卫军们的命令把它们挨着自己的脚放在地上。囚犯们往帽子里放手巾、手表、钞票、梳子、香烟、火柴、皮夹子和钱包。他们必须把戒指取下，订婚戒指除外。他们还必须解下系裤子用的皮带或者背带。党卫军围着他们转来转去，打他们耳光，用脚踢他们，用大铁环上的大钥匙敲他们的脑袋，问他们“为什么被抓来的”。大部分被问者都回答说“不知道”。“布尔什维克！”这是最可怕的罪名，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党卫军不共戴天的死敌。

他们喊了声我的名字，把我推到收容审问室里。在那里我必须把手提包内的东西全部倒出来，并取下手表。时针正指着下午四点。提包里我还留着十根香烟。一个党卫军分子

看见香烟，便一把将它掏了出去。他打开烟盒，从中抽出一支，点上火抽了起来。其余的香烟他当着我的面便一把塞进上衣口袋，就连他的同事也不给一支。然后，他们把手提包、钥匙和手表归还给我，并把我领到走廊上，一个德国女看守已经等在那里。她揪着我的外套袖子，命令我走在她的前面。我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扇紧闭着的门前，上面用德文写着：“警察局监狱女牢”。女看守打开房门。一条长长的走廊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接着，她又把走廊口上一间小牢房的门打开，我们一起走了进去。在架子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女式手提包、褐色陶罐、小锅，如同市场上的杂货铺一般；此外，还有一大堆女式帽子，有黑色的、褐色的、蓝色的和红褐色的。有些帽子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它说明帽子的女主人已经度过了漫长的一段铁窗岁月。那个女看守——胖乎乎的金发女郎，她的眼睛带有褪了色的毋忘我花的那种颜色——微笑着。在纳粹分子中间，我终于看到了一张人脸。我看了看她的眼睛，在那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骷髅和交叉着的两根死人骨头。此刻，我的脸上立即挨了一记耳光，紧接着又是一记！“马上把全身衣服脱掉！快脱！快！您以为我有那么多时间吗？您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被抓到这里来？”她说起话来就象母狗汪汪乱叫一般。“我不知道，”我回答说。她又往我脸上打了一巴掌。她仔细查看着我脱下来的外衣和内衣裤。她检查得非常仔细，手拿衣服对着太阳光看，在衣服的卷边和接头处摸来摸去，生怕藏有铅笔芯或者刮脸刀片之类的东西。检查完毕后她把一件件内衣裤扔在地上。我捡

起它们重新穿上。“走！快！快！”她把我的帽子，手提包、钥匙和手表扣下了。它们在这里要沤多长时间的灰尘呢？我刚穿上一半衣服，就又听见了“快走！”的命令。她把一个褐色的陶瓷小锅、一只缸子和一把铁汤匙塞到我的一只手里，我用另一只手提着没有系好的裙子，外套披在肩上，在她的押解下，我跌跌撞撞向牢房走去。在236号牢房门口她停了下来，打开锁，推开牢门。牢房里立正姿势站着两个女人，其中一位说了几句德语。我没听懂她说的话。女看守大声说了一句：“新来的！”然后猛地从背后推了我一把，我的脚在门坎上绊了一下，接着便一头撞了进去，差点儿栽倒在地上。

我背靠着墙坐在窗子下面的草褥子上。不久，女看守为此还打了我几记耳光。尤列克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他昂首挺胸，把纳粹分子们统统踩在脚下。纳粹分子在他们占领的国家里到处设下了刑场，野蛮地屠杀各民族人民。我想起了在美国被电刑折磨至死的社会主义者萨卡和范泽蒂，我想起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现在已经在纳粹监牢中被囚禁了九年的恩斯特·台尔曼。尤列克任《红色权利报》编辑时最亲密的朋友、今天已被纳粹分子杀害了的那些同志们：杨·克雷奇、弗兰季舍克·克日热克、瓦茨拉夫·克然、库尔特·康拉德也一一在我的眼前闪过。我的脑子就象一个万花筒。我又看见了尤列克，又看到了他那备受折磨、但是对盖世太保无限蔑视的眼睛。多么奇怪，在佩切克宫里没有一个被捕者唉声叹气，也没有一

个女人哭哭啼啼。正因为这样，楼上的那个捷克籍盖世太保才把我们斥之为“死顽固”。

一位女难友站到铁床跟前，她靠在床架上，两眼望着天花板下面装着铁栅栏的小窗，透过小窗可望见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她搓手顿脚地悲叹起来：“天呀，倒透了霉呀！”我安慰了她一阵。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哪儿来这股子劲儿。那位女难友告诉我，盖世太保逮捕了她、她的丈夫和一个十四岁的儿子。她最想念她的儿子，为了儿子她曾痛哭了一场。

几小时后，我也陷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我把压抑在喉咙里的声音全部爆发了出来，如同狼嚎虎啸一般。呀！我的尤列克啊！

我和牢房里的两位女难友开始交上了朋友。那位向我讲述起她全家被捕经过的女难友，是一位从事反占领者斗争的军官的太太。另一位女难友是个小偷。两天后，德国人把她交给了捷克刑事警察。牢房里只留下我们两人。我们相互许下诺言：我们中先被释放出狱的人一定给留在牢房里的难友寄送内衣等贴身用品。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把尤列克双亲在比尔森的地址告诉她，只把那位替我收拾房间的女人的地址告诉了她。不久，我的这位难友果然获释出狱了。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包内衣等用品。这些内衣既不是我的，也不是莉巴的。它们到底是谁的？我苦思良久，但始终未能找到答案。

五月初的一天早上，如同每天早上那样，我们按照命令走出牢房，在走廊的一边排成一行横队立正站着。我也象往

常那样，向右看齐、向左看齐。突然我大吃一惊，在我右侧站着我和尤列克的好朋友安尼奇卡·伊拉斯科娃。她怎么会在这里？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因为德国女看守们正虎视眈眈地注意着我们。她们还是没有看出破绽。当一个女看守喊了一声“向左转”的口令时，我乘难友们鞋跟碰地发出的喀嚓声轻轻地对安尼奇卡说了一句：“我们互不认识！”我不知道她是否听见了我的话。我们向左转身以后，她便站在我的背后。我清楚地听到了她轻轻说话的声音：“尤列克被他们打死了！”接着，女看守一个箭步跑到我的跟前：“您说些什么？”我没有回答。“您说些什么？”她又大嚷了一声，同时给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有说什么。”“谁说话啦？”“我不知道。”她那沉重的巴掌又一次打在我的脸上。

我象一架机器那样站在队列里，跟着其他的人来到女牢的院子当中。我心不在焉地小步跑着圈儿。每当我跑到那个以为是我说话的女看守面前时，她便抓住我的上衣翻领，象摇树一样使劲地摇晃我。这一切我全然没放在心上。我的太阳穴咚咚直跳，心揪得紧紧的。尤列克被他们打死了！啊，不，这不可能！一定是我听错了。但是，她说的话万一是真的呢？

他们又把我们押回牢房。我来回走动，心里万分焦急。从走廊传来的每一种声响，我都把它和尤列克联系起来。我把一只耳朵贴在厚重的铁门上，我听到了党卫军的叫喊声，他们长筒皮靴的咯噔声，他们手里钥匙的铿锵声。也许现在他们正把他从二楼或者三楼的男牢房中拖出来，沿着

楼梯拖下楼去。（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他到底被关押在哪一层？）我的眼睛漫无目的地望了一下牢房。在木板床的铁架子上，在牢房门上，在暖气片和地板上，在每一道裂缝中，在每一条缝隙里，我仿佛都看见了一个骷髅。整个牢房里似乎堆满了被他们杀害的人们的骷髅。现在他们把尤列克杀害了。不，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尤列克必须活下去！我望着窗上的铁栅栏开始数起来：他活着，他已经不在人世；他活着，他已经不在人世；他活着。从前的、不知名的女囚犯在墙上留下的刻痕也许是代表她们在这里所度过的日子、星期或者月份。尤列克活着，或者已经不在人世，或者仍然活着……

第二天，安尼奇卡又在走廊上轻轻地告诉我说，尤列克是在牢房里上吊死的。我连忙追问她这是从那儿听来的。但是，当时她已经来不及回答，因为女看守又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以后，安尼奇卡再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在纳粹分子面前，我们决不能伤心落泪，决不能叫他们看出我们的痛苦和悲伤！他们就希望看见我们屈膝求饶，但他们这是白日做梦！我从牢房门口走到铁窗下，又从铁窗下走到牢房门口，接着我又在牢房中央绕着圈子，我好象只身一人在无数的骷髅之间穿行，我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它们，我的心里惦念着尤列克。此情此景简直要令人发疯！日子变得何其漫长！跟任何人不得说一句话，终日无所事事，连太阳也看不见，只是围着骷髅绕圈圈。仅仅是到了晚上，牢房外面才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有一次我听到了伏契克

叔叔的作品《船歌》，这也许是个好兆头，它预示着尤列克仍旧活在人间。十三年来他和我朝夕相处的生活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际。焦急、希望和疑虑交织在一起，折磨着我的心。

纳粹分子不给囚犯们报纸书籍，也不给任何工作。只是每周有两次，由女看守把一个板刷和一块破布扔进牢里，女杂役们在牢门口放上只水桶，囚犯必须迅速地把它提入牢内。一切都必须迅速行事，这样囚犯才能为自己赢得时间。痛苦、懊悔、愤怒和仇恨驱使我拼命地擦地板。这块只有几平方米宽的地板我可以擦上整整一天，如果不是那些死命踢着牢房门的女看守连连催我赶快完工的话。

在我被捕后一个月左右，女看守把另一个女人关进我的牢房。我终于有了一位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了！我焦急地期待着，但愿女看守赶快把牢门锁上，我便可以向新来的难友打听外面的情况，问一问关于苏联和前线的新消息。但是结果使我大失所望。新来的不是捷克人，而是个德国人，她甚至还是一个纳粹党的党徒。据说他们逮捕她的原因是因为她接受礼品（即受人贿赂）。据她说她很快便能获释。她告诉我，她曾在某个律师处任职，人们纷纷给她送钱，因为她答应过他们，那位律师博士先生一定会向盖世太保交涉，把他们关押在狱中的亲人放出来。后来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了。有一个捷克人（的确他给了她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到她的上司那里告发了她，说他化费了这么多钱，但是，连他在押亲友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到。律师被迫把自己的女秘书关进班

房。但是，她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只要她一出去（据说她很快就能获释），她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个捷克人！

她开始询问我为什么被捕。“我不知道，”我耸了耸肩膀。我觉得，她是安插在我身边的一个密探。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这个女纳粹分子带去审问，但是，不一会儿女看守又打开了牢房门。她又押来了一位中年妇女，那妇女脸色苍白，但两眼放射出炯炯的光芒。被捕的妇女是捷克人，名字叫做布拉扎，完全不懂德国话。我和她握了握手，她嚎啕大哭起来。我搂着她，好言劝慰了一番。她向我讲述了被捕的经过（尽管她并不了解我的底细）：她是因为收听外国电台而被人告发的。我劝导她说：在监狱里千万不要把她被捕的原因告诉任何人，在审讯时对任何问题都要矢口否认，只有这样她才能有获释的希望。我还提醒她注意：在牢房中不得谈论她的案情，因为这里还有一名犯人，她是一个纳粹党徒，现在正在受审。

当他们把女纳粹党徒押送回牢房后，她津津有味地询问新来的女犯人被捕的原因。我充当了她们俩的翻译（因为德国女人说她不懂捷语），我替那位捷克女人回答说，她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她倒卖鸡蛋。两天后女纳粹党又被叫出去审问。回来时她大发雷霆，据说捷克人暗杀了海德里希，现在已经戒严。她用粗野的语言连珠炮似地骂起捷克人来。我打断她的话问她，这一切她是从哪儿听来的？她说是从警官那儿听来的。捷克女难友听到了“Standrecht(戒严命)”这个词，她说它大概就是指“戒严”，当海德里希在秋天来到捷克时，

她已经听说过这个词了。她浑身发抖、抱头痛哭，她伤心地说：她一定会被枪毙。我对她好言相劝，并骗她说：“Stand-recht”这个词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相当于捷克词“等级豁免令”，要她不用害怕，她一定能获得释放，因为她什么也没有干。果然，在我劝说之下她恢复了平静，我在她面前也把“戒严”一事隐瞒了一段时期，特别是那个德国女人被释放以后。

由于我一直未被提审，所以我无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消息。然而，根据从监狱走廊传到牢房的日益增多的嘈杂声和吆喝声可以断定：正在进行大规模逮捕。党卫军们的铁蹄在楼梯和走廊上咯噔咯噔响个不停。我把头凑到牢房门上，希望能看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象听见有许多人排着队跑步行进在木板楼梯和走廊上，似乎有许多双脚在快速跑动中重重地踏在走廊里的方砖上。楼下和二、三层楼上钥匙发出铛铛的响声，大概他们正在押解新的被捕者。白天和黑夜都闹得一刻也不安静。早上，当他们把我们带到院子里去进行几分钟的放风时，一层靠墙处站着被抓来的女人，在二楼上男犯人则面壁而立。下午走廊上更是人来人往。我们听见开牢门的响声、人们沉重的脚步声、党卫军们粗野的吆喝声和落在囚犯脸上的接连不断的耳光声，接着，人们好象排着队从楼上往一层走去。我们没有想到，当时下楼去的那些捷克人不久便在科比利西刑场，在法西斯行刑队的排枪下停止了呼吸。

1942年6月，在实行戒严令的最初日子里，一天午夜，我们的牢房门突然开了，女看守站在门坎上大声吆喝道：“进

去！”借着—丝昏暗的灯光，我们好不容易才看清了牢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姑娘，她大约才十六岁，长着一双大眼睛。女看守把牢房门“乓”的一声关上——吵醒所有的囚犯那又有什么关系——然后她锁上门，再把用铁链挂在门上的铁门闩插好。走廊上的电灯开关又喀嚓一声关上了。牢房又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我们猛地都站起身来。那位新来的第三个女难友站在牢门边的某个地方，从牢门边传来了她哀伤的叹息声：“我要挨枪毙了！”

不满半年实行了第二次戒严令。不满半年许多捷克爱国者又一次在法西斯分子的排枪面前倒下了。也许他们不会处决孩子！而这个年轻姑娘还是个孩子呢！法西斯分子也不能这么干啊！我们两人开始安慰起她来，我们对她说，这不过是要吓唬吓唬她而已，她尽可以安心躺下睡觉。她倒在我们给她让出来的木板床上，哀求着说：“我饿！”

每天早上我们可以分到一只用黑面粉做成的小圆面包。囚犯们在忍饥挨饿。到了下午小圆面包早已被吃得精光。我初进监狱时不思饮食的日子早已过去。因此，在牢房里我们拿不出能给那位姑娘充饥的任何食品，而这个年轻姑娘正处于食欲最佳的发育阶段，离开早饭时间至少还有五个小时。她痛哭起来：“我要挨枪毙了！”“我饿呀！”“我要挨枪毙了！”“我饿呀！”即使死亡近在咫尺，但是年轻、健康的机体也会发出要求生存的呼声。饥饿战胜了死亡的恐惧。

现在我同牢房的女难友已得知了有关戒严的消息，她也变得万分紧张，她认为：她将遭遇到和那位年轻姑娘同样的

命运。我们全都无法入睡。

那位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姑娘名叫埃娃·基尔申贝尔格罗娃。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西服，赤着双脚，牙齿冻得格格作响。她说，收音机里每天都广播着、街角处的红色布告上也用黑体字写着被纳粹分子处决了的捷克人名单，据说他们对暗杀海德里希曾表示赞同。她记不清死难者的名字，她只说其中有一位是作家万楚拉。我不敢相信她说的话。她一定是记错了人名。听起来这简直荒诞得令人无法相信！据说盖世太保正在搜寻刺客，目前尚无结果。盖世太保的突然搜捕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生命没有保障。谁也无法知道早上去上班的人们晚上是否能活着回来。

她的话可信吗？她是否言过其实？我感到她把事情过分地夸大成漆黑一团。据说她被捕的原因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位叫某某的男人常来他们家串门。现在发现他原来叫别的名字。盖世太保首先逮捕了那位男人的未婚妻。他们对她说，如果她说出了她的未婚夫躲藏的地方，他们便放她出去。起初她矢口否认说不知道。后来，当他们的左轮手枪顶住她的胸口时，她便告诉他们：她的未婚夫到埃娃的妈妈家串门去了。他们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结果，盖世太保又把那位男人和埃娃的妈妈逮捕了，接着他们又赶到埃娃工作的补袜厂逮捕了埃娃。

天渐渐亮了。首先传来了黑山鸟报晓的啼叫声。日复一日，它总是在不远的地方无忧无虑地、愉快地啼叫着，宛如有意去安慰挤满监狱的那些囚犯。五点半钟，牢狱的日常生

活开始了：从走廊上传来了哗哗的自来水声，女杂役们接水的提桶和方砖地板的碰撞声，女看守们在一层女牢的开门声，党卫军们在二楼和三楼男牢的开门声，还有囚犯们的报告声。每间牢房都有一个洗脸用的椭圆形的大铁盆和一个褐色陶瓷水壶。女看守打开牢门后，女杂役便把提桶中的水分别倒在大铁盆和陶瓷水壶里。为了弄到足够的洗脸水，女犯们还把陶瓷小锅伸到外面去接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女看守都允许她们这样做。缺水时囚犯们还不得不用便盆中的水洗脸呢。

这一切都必须默默地、一声不响地进行，任何人也不许开口说话。

我们向小埃娃详细介绍了囚犯守则，免得她挨打受骂。只要你一不小心、做了那怕是最小的一件错事，那些女看守和党卫军们便会把你毒打一顿。

当天，他们又把一位刚抓来的妇女关押进我们的牢房。她名叫阿玛尔卡，家住斯特拉什尼采区黑色教堂街。现在我们一共四人，虽然这仅仅是关押两个犯人用的小牢房。阿玛尔卡进来时精神也十分紧张。盖世太保们曾扬言要枪毙她。据说有一个女人告发了她，说她赞同暗杀海德里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精神高度紧张之中。对尤列克的悬念时刻在折磨着我，然而这件事我守口如瓶，我没有把它告诉任何人。

几天后，女看守通知我前去受审。她把表明一名女囚犯缺席的一个牌子挂到我们牢房的门上。我的心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也许我可以打听到有关尤列克的消息了。他们想

从我的嘴里探听到什么呢？他们了解我哪些情况呢？他们对我又将耍些什么样的花招？我紧张的心情决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大约一小时后，女看守把我带了出去。“走！”她押着我穿过长长的、阴森可怕的走廊，来到正门旁边。那里已有许多囚犯排成一行横队面壁而立。他们也把我推了过去。任何人都不许动，脚也不得倒换，也不许张嘴说话。我偷偷地用眼睛瞟了一下站在左右两侧的囚犯们的侧影。我所看到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在右侧走廊的尽头空着一个位置。靠墙处也没有人。我的眼睛往地上扫了一下。在墙角的地板上坐着尤列克！他的健康情况一定很糟，否则他们是不会允许他坐在地上的。这的确是他，他还活着！我心如刀绞地看着他那漂亮而又文雅的脸。在浓黑的胡须和褐色的头发衬托下，这张脸显得更加苍白了。他的眼睛尽管凹陷了进去，但是看上去还是那样炯炯有神。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我感觉到，他迅速地、十分愉快地眨了眨眼，眼角处现出了纤细的鱼尾纹，他如同在微笑一般。他真叫我百看不厌！他慢慢地——为了不引起看守对他的注意——把手握成了拳头。他的这个动作告诉我说：“你要勇敢些！”几分钟以前我还感觉到的那种恐惧心理现在烟消云散了。

稍后我才得知，不管纳粹分子多么的惨无人道，他们妄图制服大部分囚犯的阴谋全都破了产。当他们叫到这些囚犯的名字、要把他们带去审问、甚至要把他们拉出去枪毙时，囚犯们都从容自若、热血沸腾。有的囚犯胃不舒服，有的五

脏疼痛，有的显得神经质、浑身发抖，但是，只要纳粹分子把他们带到走廊上、参加到集体中去、排成队准备出发时，所有恐惧的心理便如同秋风扫落叶那样被一扫而光。当囚犯们每天在走廊上排成长队出发到佩切克宫去、到集中营去、到法庭上去或者走向刑场时，他们坚信：在把占领者赶出去的斗争中他们不是孤立的，全国各阶层的人们都在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着斗争。在牢狱的走廊上，纳粹分子也认识到，人们是多么地憎恨他们。虽然他们掌握着政权、监狱、刑讯室、断头台和打靶场，但是，与表面上手无寸铁的捷克民族、与它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比较起来，他们却显得多么的软弱无力。对纳粹分子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是可怕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暴跳如雷的一个原因。

不久，一个党卫军结结巴巴地念起了捷克人的名字。尤列克的名字也在其中。我看到他还无法独自行走。要知道，从他被捕之日起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这就是他经过审讯之后的健康状况。两位难友向他跑了过去，半扶半拖地把他送到了汽车旁边。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这使我无比高兴；当我看到他象一位重伤员一样坐在地上时，我又感到无比痛苦；不过，痛苦之中渗杂着更多的高兴罢了。我坚信尤列克会恢复健康，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太好了！

以后——也许是第二批——他们用车把我拉到了佩切克宫，然后，和其他囚犯一起把我们送进候审室——难友们称之为“电影院”的地方。那是一间宽大的房间，有三个带铁栅栏的大铁窗，铁窗上装着半透明的毛玻璃。男女犯人必须

在门口站好，房门对面靠窗放着一张写字台，它后面坐着一个盖世太保。他的名字叫门茨尔。他一边结结巴巴地叫着囚犯的名字，一边把一块布条扔给他叫到的每一个男犯。布条的颜色按囚犯的政治信仰而定。共产党员领到的是红色布条。每个囚犯必须在空中接住它，把它戴在左臂上，然后在“电影院”的长凳上坐好。一张张排列成行的长凳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当囚犯在它上面坐定后，他总是背对着门茨尔的写字台、背对着房门，这样他就无法知道背后所发生的事情了。然而事情却层出不穷。他们不断地把新抓来的犯人带进来，门茨尔和他的狐群狗党在楼下的牢房里便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至使坐在长凳上的所有囚犯都能听到盖世太保的斥骂声、棍棒声和拳打脚踢声，而他们又无法知道，这种残酷的刑讯何时便要落到自己头上。

盖世太保们从不让共产党员们在“电影院”里呆很长的时间。他们亲自来提审，把他们编成队，押解到五楼去。1942年，女囚犯们通常被押送到“电影院”旁边的单间里。当他们的车把我从庞克拉茨拉到这里来时，他们也把我关进夜里生炉子的单间里来。但是，一个盖世太保不久便把我带了出去，乘电梯来到五楼，把我送到4月25日夜我第一次呆过的房间里，它的门框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写着“400”几个字。这就是尤列克在他所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精彩地描述过的、充满神奇色彩的“400号”：

“……一开始我只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我在那里最初几个钟头的印象是令人不快的。但它不是一个房间，它是一个

集体，一个愉快的、战斗的集体。

‘400号’产生于1940年，当时反共科正在加紧活动。它是候审室——‘电影院’的分院，也就是一间犯人候审室，是专门为共产党人设立的，免得为了每一个问题都要把犯人从一楼拖到五楼来。犯人应当经常留在审讯官旁边，这样审问起来才感到方便。这就是他们设立‘400号’时的一些想法。

只要有两个人犯人——尤其是两个共产党员聚在一起，用不了五分钟便会形成一个能粉碎盖世太保的一切计划的集体。1942年，‘400号’简直可以称之为‘共产党中央’了。它经历了许多变迁：在这里的长凳上曾轮流坐过成千上万的男女同志。但是，这里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对斗争的忠诚和对胜利的信心。

‘400号’——这是一个远远突出在前沿阵地的战壕，它被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并遭受着他们密集炮火的攻击。但是，它从来没有过投降的念头。红旗在它上面飘扬。这里表现出了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全民族的团结一致……

‘400号’——这是最能深刻认识被称之为‘人’的动物的地方。在这里日益迫近的死神使每一个人都赤裸裸地暴露出自己的整个灵魂：不论是左臂上缠着红布条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嫌疑犯，还是这里的看守和在附近房间里参加审讯的人。在审讯时语言可以成为一种盾牌或者一种武器。但是，在‘400号’里你却无法用言语来掩饰自己。在这里你说的话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内心的一切。而在你的心灵深

处保存下来的仅仅是那最本质的东西。一切次要的东西，一切能掩盖、贬低或者粉饰你性格特征的那些东西，早已消失殆尽，早已被临死前的旋风吞没了。剩下的只是最简单的主语和谓语：忠实者坚定，叛变者出卖，庸俗者绝望，英勇者斗争。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刚强和软弱、勇敢和胆怯、坚定和动摇、纯洁和肮脏。但是在这里，前者和后者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有人试图不露声色地在它们之间滑来滑去，那他就会比一个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手里拿着铙钹、在出殡的行列里跳着滑稽舞蹈的小丑更惹人注目。

在囚犯中间有这样的人，在捷克警官和密探中也有这样的人。审讯时他为帝国这个‘上帝’烧香，而在‘400号’里他又为布尔什维克‘魔鬼’烧香。在德国警官面前，他为了逼你供出联络员的名字而不惜打掉你的牙齿；而在‘400号’里他又塞给你半支抢来的烟卷，以表示对你的同情……

还有另一种人，他们对这个集体毫无所知，我想把这种人称之为刽子手，但是刽子手也是人的同类。那些口操捷语、手持木棍或铁棒的野兽，他们对捷克犯人的非刑拷打使许多德国警官都为之瞠目结舌。他们甚至不用伪善地宣称这是为了本民族或者帝国的利益，他们拷打和屠杀囚犯完全是一种乐趣：他们打掉你的牙齿、打聋你的耳朵、挖掉你的眼睛、踢伤你的生殖器，打得你脑浆迸裂，直到把你残酷地折磨致死。他们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完全是一种兽性发作罢了。每天你都见到他们，每天你都不

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你所以能忍受他们的残酷折磨——他们的出现总是使空气中充满血腥味和惨叫声——完全依赖于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即使他们罪行的见证人全都被杀绝了，他们也还是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

但是，就在他们旁边，在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另一些人，看上去他们仿佛也是职务相同的人，这些人用大写的‘人’字来称呼倒是极其公正的。他们把关押犯人的机构变成了犯人自己的机构，他们帮助建立了‘400号’这个集体，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勇气贡献给了它的事业。他们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恰恰相反，从前他们还在捷克警察部门干过反共的勾当。但是，他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在跟德国占领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后，便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力量，明白了共产党人对整个民族的意义，从此，便忠实地为这一共同事业服务，帮助所有坐在监狱长凳上、但依然忠贞不贰的人。”

这里较详尽地引用了尤列克所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有关段落。我的秃笔远不能如此准确地、同时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描述“400号”——在自己存在的日子里曾起过巨大作用的候审室。

一个捷克盖世太保把我带到“400号”房间，他指了指前排长凳上的位置，然后便走了出去。我发现，这里坐着的犯人由另一名看守看管，有一个犯人正在用捷语和那位看守说话。那位看守是一个捷克人，名字叫扎卢斯基。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他曾在布拉格警察局的反共科工作，德国占领

时期被调到盖世太保工作。房间里人声嘈杂。囚犯们交头接耳，甚至转过身去，但是，这个捷克看守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我来说，这是空前的怪事。我也四下张望了一下。我要找尤列克。他孤零零地坐在后面墙角里的一张靠背椅上。后排长凳上的一位囚犯正转过身去向他耳语着什么。而尤列克也向那位犯人微微探过身去，低声地和他说着话。与此同时，他机敏地环视着房间，因为许多犯人都向他转过头去，都希望和他谈谈。尤列克向他们眨了眨眼，点头示意：请稍候一会儿，让他和第一个谈完后再来找他。

我脸朝后坐在那里，突然我听见一个人低声说：“古丝塔，给你！”我迅速地转过脸去。我的老朋友雷内克·特林格尔同志站在我的面前，他把一块巧克力糖向我递了过来。我低声对雷内克说：“你把它送给尤列克吧。他比我更需要它。”他意味深长地、然而和善地对我说：“你这个傻瓜，他当然会有的！”我接过巧克力糖，但是并没有吃。我相信，只有它能够使尤列克恢复健康，如同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一样。我站起身来，快步来到坐在后面墙角处一张桌旁的捷克看守那里，对他说：“请问一下，我把这块糖送到那边去行吗？”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对面尤列克坐着的墙角。当时我还以为，他们还不知道尤列克的真实姓名。看守默默地点了点头。我迅速跑到尤列克面前，低声说了一句：

“我的尤列克！”我握了握他的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脸。如同在被捕前我们相会那样，他向我微微一笑，低声说：“古丝蒂娜啊！”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轻轻地重复着：“古丝蒂

娜！”接着，他立即咬着我的耳朵说：“你要说：你什么也不知道，我一直住在家里。”此刻，有人咝的一声发出了警报：“注意！”坐在前面的一位囚犯看见房门玻璃后面一个人影闪动了一下。在房门打开以前，我迅速地回到了第一排长凳自己的座位上。

房间里一片寂静，就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也能听得清楚。一个长着骷髅脑袋的盖世太保突然闯了进来。他就是那天夜里我亲眼看见的押解尤列克的那个人。不久我便得知他名叫伯姆。当时他用凶恶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囚犯。他从后排看到前排的第一条长凳。他用低音厉声喊道：“伏契科娃！”我站了起来。“走！”他把我带了出去。我轻松地走着，内心充满喜悦，因为在审讯之前我能和尤列克商量好了口供：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一直住在家里。伯姆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那里有两个身穿便服的盖世太保正在大声说笑。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他参与了对我的逮捕。他的名字叫绍埃尔万。当我们一走进办公室时，他们立即收住话头。伯姆带我来到写字台旁，他坐了下来，让我站在那里。他的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希特勒的肖像。

“您丈夫住在什么地方？”他开始用德语问我，虽然——后来我知道——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话。

“住在家里，”我镇静地回答。绍埃尔万突然嚷道：“住在家里，但是您却不认识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理睬他。我只是慢条斯理地、字斟句酌地回答伯姆的问题，以防被对方抓住话柄：

“警官先生，你们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叫我怎么能认出他来呢？”

绍埃尔万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对着我的脸一边一个耳光，我的一个瓷牙套竟被他打落在地上。

坐在桌旁的伯姆跷着二郎腿，不停地点着头，好似在说：是的，我们把他打得够呛，甚至连他的老婆都认不出他来了。不一会儿，他打开抽屉，从中掏出两支左轮手枪，把它们放在桌上：

“好，他住在家里！那么，这个您一定认得出来的吧！”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尤列克经常带在身上的两把手枪：在巴克萨夫妇家时，他把它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当他住在叶林内克夫妇或里巴日夫妇家中时，他总是把它们放在床头柜上。

“我不认识，我丈夫从来没有这种玩意儿，”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伯姆沉默起来。他又拉开抽屉，从中取出一份身份证。

“这个您一定认得了吧！”说完，他把身份证扔在桌上。

我探过身去一看，是的，我知道它。那是尤列克化名为雅罗斯拉夫·荷拉克教授的假身份证。回答必须谨慎小心！

“这张照片我认识，但是这个身份证我不知道。”

“既然他是住在家里的，那么您一定知道这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他总是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的！”

“警官先生，我从来不去过问自己丈夫口袋里的东西。这样做会有失我的体面！”

“他在什么地方留的胡子？”第二个盖世太保这样问道。

“在家里，”我撒谎说。自从1940年的夏天以来，尤列克不仅没有住在家里，而且连一次也没有进过家门。我一口咬定说他住在家里，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一直报着户口，另一方面还必须保护曾经掩护过他的那些同志们。

“他为什么要留胡子呢？他为什么要躲起来呢？我们是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伯姆假惺惺地说道。

“警官先生，您知道人们对你们这个组织是怎样议论的吧！”我对他直言不讳，同时我不由自主地微微躬了一下身子，因为我似乎感到他的木棍马上就要向我的背上打来。然而他并没有打我。

突然，他脱口而出地问：“那么您是知道这两支手枪了！他是从那儿弄来的？”

“他从来就没有手枪，”我坚定地回答。

他抄起一支手枪，走到窗台旁边。我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突然转过身来，用手枪瞄准我说：“您知道这些手枪！”

不知为什么，我不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放声大笑起来。他的枪口对着我，而我却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我又坚定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丈夫从来就没有这种东西！”

他手中的手枪仍然对准我的脑袋。说来奇怪，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后来他的手垂了下去，他又从窗台旁边走回到

写字台前，把左轮手枪放在桌子上。这时我的两手才开始颤抖起来。为了躲过盖世太保的眼睛，我把两手贴靠在身上。伯姆又企图要我相信，这两支手枪的确是尤列克的，他们是在他身上找到的，而我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他从来就没有这种东西。

他们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陈设着盆花和地毯。他们喜欢花草、狗和音乐，就象他们喜欢折磨人一样。我来到反共科科长莱梅尔的办公室。这里有一台大型收音机，它上面还放着一个小收音机。我仔细瞧了瞧它，原来它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一台！他们是偷我们家收音机的窃贼！我指着小收音机对莱梅尔——穿着黑色马靴的高个子黄头发男人说：“这是我们家的收音机！”

他没有回答，但是反问我：“您是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的？”

我不能承认。尤列克对我说过：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从来就不是共产党。”

莱梅尔和伯姆哈哈大笑起来。

“先生们，没什么好笑的，我说的全是真话！”

伯姆说：“但是您去过俄国！”

他们大概找到了捷克警察局送来的档案材料，众所周知，捷克警察局把共产党的全部档案都移交给了盖世太保。

“是的，我去过。”

“您干什么去的？”

“我去休假。”

莱梅尔问：“您去过几次？”

从前我曾在苏联驻布拉格的商务代办处工作过。由于我工作出色，苏联同志曾派我去苏联休假以示奖励。我去过两次。第一次1931年是秘密出国，第二次在1935年，那次持有合法护照。因此我回答说：“我去过一次。”

莱梅尔问：“您到过那些地方？”

我到过列宁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但是我回答说：“我到过莫斯科。”

伯姆问：“只到过莫斯科吗？您在那儿干了些什么？”

“我进了疗养院，因为我病了一场。”这是实话。1931年我在莫斯科时的确病倒了。

莱梅尔说：“您常常进出苏联公使馆！”

“没那么回事！”

“您丈夫这样说的。”

“他不可能这样说，因为没那么回事。”

我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到苏联公使馆去。最后一次是在1939年3月14日，即纳粹分子占领我们国家的前一天晚上。但是尤列克对我说过，我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我必须照他所说的办。

伯姆问：“您认识叶林内克夫妇吗？”

“我不认识。”（说不定叶林内克夫妇已经招认我们彼此认识了！）

伯姆说：“他们已经死了。您认识巴克萨夫妇吗？”

“我不认识！”

但愿他们没有看出我焦急、紧张的心情。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一会儿我改口说：“不，对不起，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布拉格市市长名叫巴克萨，不过他已经死了。”

伯姆说：“巴克萨夫妇也已经死了。”

他说到“死了”这两个字时，如同在谈论最普通的家常琐事一般。对盖世太保来说它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丈夫的情况怎么样？”我问伯姆。

伯姆说：“糟糕得很！他如果再不说话，马上就要被处决了！”

他走到门口打开房门。一会儿后一个盖世太保把尤列克押了进来。他步履艰难，然而依旧微笑着看着我。

莱梅尔对我厉声说道：“劝劝他，叫他放明白些。他如果不为自己着想，起码也得为您着想呀！你们可以考虑一个小时。如果他再不开口说话，今天晚上你们两人统统枪毙。”

我看着尤列克的眼睛。刹那间，他生活中的一幅幅画面一齐掠过我的脑海：他的一生是充满战斗、充满苦难和欢乐、充满对我们事业必胜信念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我从未见到过向命运低头、听从命运摆布的尤列克。即使现在，他的肉体已受尽了折磨，但是他依然坚定不移地、无限自信地屹立在盖世太保的面前。

“警官先生，”我坚定地向莱梅尔回答说，“这吓唬不了我，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你们如果要处死他，也把我一起处死好了！”

“出去！滚！”莱梅尔怒气冲冲地大吼了一声。我挣扎着再看了尤列克一眼。他们把我押到一楼，几小时后用车把我送到庞克拉茨监狱。在如同流动地牢的囚车里我听人说，每天都有许多囚犯被押赴科比利西刑场去处决。

回到牢房后我只字不提受审的事，我不愿给生活在极度紧张状态中的难友们加重他们精神上的负担。又过了几天——在这些天里，我无时不在想念着尤列克和莱梅尔的“最后通牒”——女犯中谁也没被提审，因此，我们无法知道外面发生的情况。阿玛尔卡常常向我们谈起她日夜思念的小女儿。她不时又显得乐观起来，满心希望能合家团聚。我们劝慰她说，只要她什么都不承认，她是能活着出去的。这些话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她又逐渐树立起了信心。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特别是埃娃简直把她看成了自己的母亲。阿玛尔卡极善于烹调，成天饥肠辘辘的小埃娃——虽然我们常常把自己得到的、令人恶心的那份干菜汤送给她充饥——总是非常乐意聆听阿玛尔卡讲述果酱卷、圆蛋糕和烤猪肉的制作方法。小埃娃常常听得入了神，一边不停地咽着口水，仿佛她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吃着阿玛尔卡坐在监牢里所描绘的各色美味食品。

然而，一天之中我们大家也有伤心落泪的时候。当通向未来的帷幕稍稍揭起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看到了等待着我们的极其可怕的结局。但是，此刻，其他的人会立即搀扶住自己的难友，安慰她，驱散她心头的悲哀，鼓励她，促使她去思考别的问题，去回忆那些令人愉快的往事。当我们的努力

获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到无比幸福，而且可以说，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死亡的门坎上，我们每一次都能如愿以偿，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活下去，我们大家都在思念着万古长青的生命之树。这样，在我们的牢房里又会重新出现欢乐。

布拉札被释放出狱了。她否认了曾收听过外国电台。出狱前，她答应给埃娃送些内衣、给我送一件绣有民族图案的短上衣来，我们收到东西以后，便能知道她真正是自由了。后来我果然收到了绣花上衣，足足穿了好几个月，我还常常穿着它去受审。我经常在晚上用便池里的水把它洗干净，第二天早上晾干后又把它穿在身上。然而，埃娃·基尔欣贝尔格罗娃却再也不需要她寄来的内衣了。

一次，他们又来提审我。我能看到尤列克吗？他现在身体怎样？我的情况又会怎么样？他们想要干什么？戒严令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我们都无法入睡。昨天夜里从隔壁牢房传来了一阵慌乱声，接着在走廊上响起了奔跑的脚步声，党卫军和女看守们嘈杂的谈话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隔壁牢房里有一位女犯人，用手巾拴在门把儿上吊死了。

在囚车里——党卫军有时用囚车押送我们去受审，透过囚车的毛玻璃窗，布拉格的街道和路上的行人隐约可见。但是，这里是严禁交谈的——我坐在安卡·维科娃同志对面。我们彼此紧张地交换着眼色。在佩切克宫，他们吆喝着把我们妇女赶进一间黑洞洞的房间，它通向名叫“电影院”的候审室，戒严期间那里经常挤满男人。起初房间里一团漆

黑。一会儿后一个妇女悄悄地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儿。阳光穿过铁窗从缝隙中射了进来，此刻我们才看清了周围有许多只脚在地上蠕动。

我坐到安卡·维科娃身边。我心里想，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好好谈谈了，因为在黑房间里一个看守也没有。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低声问安卡。

“二月份。”

“住在那个牢房？”

安卡低声对我说，她现在被关押在临时监牢里，她将被送到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去。她巴不得早点离开这里。不管她要去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至少她再也看不见在佩切克宫面壁而立、被拉去处决的那些人了。“这真叫人受不了，但是，在盖世太保面前我还要装英雄呢！”她叹了口气。突然，黑洞洞的房间被耀眼的灯光照得通明。我们所有的人都呆若木鸡。在灯光下，我看见墙角处的窗台旁边出现了一个党卫军的脑袋。他凶恶的眼睛在监视着每一个妇女。那个党卫军的正对面，在房门旁边我又发现了第二个党卫军。他从隔壁房间的一个小木窗口凶狠地盯着我们看。他轻轻打开小木窗的声音我们全然没有听见。原来，监视我们的只有一个站在小木窗口的党卫军，而黑房间墙角里的那个党卫军只不过是他在镜子里的影子。这样，整个房间他便能一览无余，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幸好他没有抓住当时说话的女犯人。

我在黑房间呆了整整一天，他们并没有押我去审讯。

不久，他们又用带篷卡车把我拉到佩切克宫。在黑房间里我又碰到了安卡·维科娃。她跑过来低声告诉我：“尤列克带话给你：审问时你就说，有一位太太找过你们……”突然房门打开了，一个盖世太保把安卡带了出去，结果，她没有把尤列克的口信说完，而且以后也永远无法告诉我了。

后来他们把我带到了五层楼上。我苦苦思考着尤列克给我的口信：他是指哪一位太太？她为什么来找我们？我记得谁也没有来过！在“400号”房间里，在后面一张椅子上坐着尤列克。他独自坐在那里，谁也不许靠近他。我焦急地等待着时机，想跑过去向他问个明白。但是，监视囚犯的除扎卢斯基外还有两个男看守，因此要接近尤列克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还是看见有几位犯人故意低垂着头，为了使低声说话的嘴唇躲过看守的眼睛。

“把头抬起来，你们这些死顽固！”一个捷克盖世太保突然吼了一声。他名叫波希克。后来我还多次听见过他的这种谩骂声。

“在你们看来我们现在是顽固分子。但是，当这一切成为过去以后，街道将用我们的名字命名，而你们只配吊在路灯下示众！”响起了尤列克爽朗的说话声。波希克被这突如其来的、大胆的回答弄得不知所措，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

“伏契克，你好大的胆子！”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尤列克。他用一只手托着长满胡须的下巴，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波希克。而波希克——他盯着尤列克看了一会儿后，便怒冲冲地扭过身去溜走了

突然，伯姆猛地冲了进来。“伊拉斯科娃在哪儿？伊拉斯科娃在哪儿？”他急巴巴地喊叫着，同时恶狠狠地打量着我们。安尼奇卡·伊拉斯科娃当时不在那边。伯姆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住了。“伏契科娃，您出来！”

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里。“您常常到牙科医生那儿去吧！？”他说。我心里一怔。他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他掌握了哪些情况？我考虑一会儿后回答说：“是的。”

“他是个犹太人，不许您去找他，知道吗？”

我立即给予反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那股子劲儿是从哪儿来的。

“我不是去找他，我是去找他的妻子的。他妻子是一个雅利安人，是一名牙科技师。”

“谁还去过？”他企图打听出其他人的名字。

难道我能说出其他人的名字来吗？难道我能说：库尔特·格拉塞尔、博热娜·波罗娃、兹登涅克·诺瓦克等同志曾经去过吗？

“许多病人都去过，”我回答说。

伯姆讥讽地笑了一下说：“许多病人！什么病人？谁？我带他们来给您瞧瞧吧！”我的心怦怦直跳，两手哆嗦起来，但是我默不作声。他大步离开办公室带人去了。我紧张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独自一人走了回来，只是手里拿着一根藤条。

“我再问您一次，到那边去过的还有谁？”他大吼一声，藤条在空中呼啸着。

“警官先生，牙痛的人到那边去是看医生，而不是去瞧病人的。”

“那么常到您家去的是谁？”他冲着我大嚷起来。

“没人来。”

“撒谎！”

“警官先生，是没人来。”当时，我不想把安卡·维科娃告诉我的那位太太说出去，因为我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伯姆追问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对才好。但是，面对着他不停地追问，我突然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我想起来了，有一位太太来找过我们。”

伯姆立即变得十分振奋。他一定在想：现在，共产党组织的又一个联络员马上又要落网了。

“是哪一位太太？”

“我不认识她。”

“她是来找谁的？”

“她是来找我丈夫的。”

“她要他干什么？”

“我不知道。”

“怎么回事，您不知道！”

“我没有问过她。”

“她在您们家呆了多久？”

“只呆了一会儿。”（但愿我能知道，我回答得是否正确，我是否照尤列克所说的那样回答了！）

“她到你们家去过几次？”

“来过一次。”

“她的样子怎么样？”

“我没有注意。”

“您一定知道，她的样子象个职员呢还是象一个家庭妇女！”

“大概是一名职员，但也可能是一位家庭妇女。”

“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是淡黄色还是栗色？”

“我没有看。也许是淡黄色，也许是栗色。”

“她穿什么衣服？”

“她穿一件风雨衣。”

“她多大年纪？”

“我不知道。”

“您既然和她谈过话，那么您一定知道她是个年轻妇女还是一位老太太，她是三十岁呢还是四十岁。”

“我不知道。我没仔细看她。她可能是三十岁，也可能有四十岁了。”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女人！”他吼叫着，不停地甩着藤条，象疯子一样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他大叫一声：

“滚！”

一个盖世太保把我押送到“400号”房间。伯姆也跑来了，他又大声地喊叫：“伊拉斯科娃在哪儿？伊拉斯科娃在哪儿？”然而安尼奇卡·伊拉斯科娃这一次也不在，党卫军大约是在下午才把她从庞克拉茨监狱押解到这儿来的。后来我从洛伦茨同志处听说，伯姆那次找安尼奇卡是要把枪毙她的

决定通知她，6月24日晚上行刑队便把她带到科比利西处决了。

我热切地盼望着能和尤列克好好谈谈，把我在第一次和今天的审讯中说的话告诉他。中午时分，机会来了，当时他们把我们排成单行，带我们到一层去吃用霉烂了的干菜烧成的午饭。难友们必须搀扶着尤列克走路，因为他行动十分困难。我故意站在女犯队伍的最后面，而尤列克正好走在男犯队伍的最前面。这样我们俩终于走在一起了。当我把一切低声地、迅速地告知他后，他轻轻地用俄语说了一句“好样的！”这真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不过，有关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那位太太”的问题，我的交待与尤列克的想法略有出入。审讯时我应该回答说：她找过我们两次，每一次她都探问教授先生的事。尤列克曾哄骗伯姆说，“那位太太”大概是党中央委员会某个委员的联络员。尤列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推倒叛徒米雷克（克列仓）的交待，米雷克已经告发说：尤列克本人就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提审我两天以后，阿玛尔卡也前去受审。回到牢房时她显得沮丧和绝望。盖世太保允许她的丈夫和小女儿前来探监。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阿玛尔卡最后亲吻了一下自己的小女儿，而小女儿却无法理解，妈妈为什么不愿意和她一起回家去。盖世太保们强行把嚎啕大哭的小姑娘从母亲怀里夺走了。阿玛尔卡竭尽全力克制着自己的眼泪。探监结束时她要求丈夫给她送些内衣裤来。一个盖世太保旁敲侧击地讥讽

说：“您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阿玛尔卡还说，据说那位头发斑白的、漂亮的女杂役已被处决。“她叫什么名字？”我急切地问道。在女杂役中，头发斑白的只有安卡·维科娃一人。“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的一位女作家也叫这个名字，”阿玛尔卡回答说。“你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我是从一位和我一同去受审的女人那里听来的，那位女人和女杂役住在同一个牢房里。”

这肯定是指维科娃同志了。“她姓什么？是不是姓维科娃？”我追问她说。“对，是姓什么维科娃，”阿玛尔卡这样猜度着。接着我便和她争论起来。我说这不可能，两天前我还在佩切克宫和她谈过话，她告诉我，他们要送她去集中营去。（后来，我在“400号”从同志们那里听说维科娃同志没有去集中营，她于1942年6月24日被押赴科比利西刑场，第二天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所公布的被处决者的名单上。）

阿玛尔卡带来的消息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都低头不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当时真是人人自危。死神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只要在走廊上发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响声，我们便竖起耳朵、屏息静听，注视着门锁上是否有钥匙在转动，党卫军是否在喊叫同监难友的名字，而这个被喊到名字的人从此将永远不再回到牢房、永远也不会被释放出狱了。

小埃娃和我们共同生活已有一个月了。有一次，他们传她前去受审。回来时她已经是鼻青脸肿了。盖世太保企图用严刑拷打逼她说出去她们家串门的那个男人的真实姓名。她说她不知道。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吃过少得可怜的午饭以后（我们每天十点钟吃午饭），我们和埃娃坐在地上，阿玛尔卡坐在一把椅子上，埃米尔卡·贝兰诺娃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埃米尔卡·贝兰诺娃是盖世太保搜捕她的丈夫（共产党员）扑空后把她逮捕的。她知道丈夫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她没有出卖他。盖世太保逮捕她时，她正患扁桃腺炎，发着高烧，然而她并未因此而免遭残酷的刑罚。盖世太保弗里德里希命令她做300次下蹲动作，野蛮的捷克盖世太保斯莫拉铁面无私地在一旁数着数。第二天她的两腿几乎无法动弹，但是，盖世太保还把她赶到院子里去做早操。她不愧为一位巾帼英雄，不论在当时或者后来在特雷津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在她牺牲的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里，她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同阿玛尔卡一样，埃米尔卡也有一个女儿，她怀着炽热的母爱无时不在想念着她。

当时正值夏季，铁窗外碧空万里，然而牢房里依旧是寒气逼人。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我把自己的上衣借给埃娃，因为她和被捕时一样，还只穿着那身单薄的小西服，光着两只脚，冻得上牙打下牙。我们回忆起被捕前的自由日子。此刻，通常又到了休假的季节了。我们谈论着无足轻重的琐事，但是，我们的眼睛却不时地盯着牢门上的观察孔，看看是否有人偷听或偷看。突然，我感觉到：观察孔上的挂钩动了一下，紧接着便响起了钥匙的开门声。牢门打开了，当我们还来不及从地上站起来时，两位女看守猛地冲了进来，向埃娃直扑过去。由于我们背靠着草褥子坐在地上，因此，我

们每人都挨了一记耳光。女看守施勒德罗娃问埃娃叫什么名字。我一步跨了过去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以为，她们根据埃娃穿着我借给她的上衣正在找我呢。女看守粗鲁地把我推在一旁，又问埃娃叫什么。当埃娃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后，第二个女看守（亨尔特洛娃）又问她身边是否有贵重首饰或者订婚戒指，是否有外套或钱钞。埃娃对这一切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她说什么也没有。此后，两个女看守便走了出去。

埃娃吓得浑身发抖，忧心忡忡地说：“他们要处决我了！”我搂住她，极力安慰她说：“别胡思乱想了！你什么也没有做，怕什么呢？”起初，我的确相信，盖世太保不会下毒手的。但是，跟阿玛尔卡和埃米尔卡一样，我的心里立即又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竭尽所能去安慰小埃娃。我向她建议玩“打狼棋”游戏——我们在桌子的抽屉底儿上划上带小方格子的棋盘，再用面包渣捏成小棋子儿——这是埃娃非常喜爱的棋艺游戏，但是她从来没有赢过一盘。她同意了。我故意让她胜了一局。她愉快地笑了。现在她也开始相信，那两位女看守只不过随便问问而已。突然，她的脸上掠过了一阵阴影。“埃娃，你怎么了？”“我身上有五个克朗，我没有告诉她们。”“这不算什么，五克朗根本不算什么钱！来吧，我们再玩一盘棋吧。”门锁中又响起了钥匙的开门声。接着，两个女看守又走了进来，又一直向埃娃走去。埃娃涨红着脸说：“我刚才忘了说我身上还有五个克朗。”一个女看守把她手中拿着的五克朗硬币抢了过去，然后又扔到了她的脸上。当埃娃面对着“老实人挨打”的怪事而

惊魂未定时，第二个女看守（施勒德罗娃）把一支铅笔塞在她的手里，令命她在一张纸上签字，而这个女看守却把纸上的文字用手捂起来。“快签！快签！”埃娃把名字写上了。（稍后我才从女杂役那里听说，埃娃当时签字的东西正是她的死刑判决书。）

女看守把桌上签过字的判决书收好，便一齐走了出去。

埃娃用两只手抱着脑袋。她又全身发抖、绝望地悲叹起来：“他们要处决我了！我知道！他们要处决我了！”她用哀求的目光看着同牢的难友们。接着，她泣不成声地说：“我出世以来还没享过一天福啊！”

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脖子上，抚摸着她的头发，同时以最肯定的口气安慰她说：“埃娃，他们不会处决你的！你签字的那张纸是释放你回家的出狱通知书！”

“她们为什么不让我看呢？为什么要搜我身上的钱呢？”她迷惘的目光从一个难友身上移到另一个难友身上。对她们的问题我们谁也无法解释。我们大家都毛骨悚然，一种可怕的预感占据了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还是竭力保持镇静。走廊上又开始沸腾起来；牢房门乒乓响个不停；许多双皮靴在走廊上、楼梯上和砖地上又发出了咯噔咯噔的响声；还可以听到党卫军们粗鲁的叫骂声。

“我要见妈妈，”埃娃痛苦地叫了起来。她象失掉了母亲、而死神正向她扑来的孤儿那样惨叫着。我们这样做也许是不明智的，但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样的话：她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她妈妈也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她们母女又

可以团聚、可以一同去休假了等等。埃娃认真地听着，最后她甚至笑了。然而我们已经再也找不出其他安慰的话，我们已口干舌燥，无计可施；我们都难受极了，极力抑制住自己的眼泪。埃娃还是个孩子，我们没有勇气象对待成年人那样去对她说：如果她被枪毙了，自有后来人为她报仇的。她还想玩“打狼棋”游戏呢！然而，这那里是一种游戏！她的手颤抖着，她不时地抬起头来，象在念可怕的咒语一样不时喃喃地说：“他们要处决我了！他们要处决我了！”“埃娃！”我让她安静下来。“你会看到，你和你妈妈早都自由了，而我们却还要在这里蹲班房哩！对你来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恶梦罢了。将来你出去以后，你一定要去找阿玛尔卡的丈夫，把绣着你名字的手帕交给他。你要用红色的棉线绣它！让阿玛尔卡的丈夫在给阿玛尔卡送内衣时一同捎来吧。我们看到你的手帕，就知道你到家了。”

“我要去看妈妈，我想妈妈！”

阿玛尔卡已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几乎要放声痛哭了。埃米尔卡也和她一样。只有我极力压制住内心的悲哀，不停地跟埃娃说着话，为了使她能暂时忘却即将到来的杀身大祸。

“我要去看妈妈！”

突然，牢门第三次又打开了。女看守叫埃娃到外面去。当她刚走到走廊上时，几个女囚犯正从旁经过。现在走过去的是在基尔欣伯格家中被捕的那位男子的未婚妻，埃娃的妈妈

正好跟在她的后面。“妈妈！”埃娃轻轻地叫了一声。埃娃的母亲似乎听到了她的叫声，向我们的牢房回过头来。埃娃微笑着和我们告别。女看守“乒”的一声把门关上、锁好。走廊上响起了党卫军们粗鲁的叫骂声，但是，我们却没有听到死囚们在走向刑场时的悲哭和哀叹。

此后我们从未收到过埃娃寄来的绣有她名字的手绢。

他们又一次提审了我。他们把我和许多其他犯人一起用带篷卡车拉到佩切克宫，然后又把我们押送到五楼。“400号”候审室已经迁至旁边的走廊上。象原来的“400号”候审室里那样，囚犯们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靠墙站着。在那里我没有看到尤列克。我的心情紧张得无法形容。在靠窗处有一张桌子，桌旁的椅子上，一位囚犯正背对着我们坐在那里作画。画面上是一位正在舞台上演出的芭蕾舞女演员，她用一只脚尖跳着舞，另一只高抬的腿在空中划着圆弧，轻柔的舞裙在飘忽摆动；在画面的下方，乐队指挥正用指挥棒打着节拍。整个画面洋溢着恬静、欢乐的气氛，与充满恐怖、沾满鲜血的魔窟佩切克宫的气氛形成了可怕的对照。

我们背后响起了脚步声。盖世太保内尔格尔把一位刚提审完毕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拖了回来。他把他拉到靠窗的墙壁旁边，命令他站在那里。囚犯满脸伤痕，眼睛里布满了紫红色的血丝；他那原来是浅灰色的长裤上到处是大片大片暗红色的血迹。监视我们的一个党卫军（约二十五岁）向他走了过去。“赤色魔鬼，你能做多少次下蹲动作？”他厉声问道，同时用步枪枪托猛击囚犯的背部，打得他晃动了几

下。显而易见，囚犯是用尽了最后的气力才勉强站稳了脚跟。“我能下蹲50次，”他回答说。即使他说能下蹲1000次也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就连一次下蹲动作也无法完成了。“好，开始下蹲！”党卫军命令着。我看见，当囚犯下蹲时，他的两只脚瘫软了下来；他全身无力，再也不能从地上站立起来，终于一头栽倒在地上。党卫军跑了过去，对着他又是用枪托猛击、又是用皮靴乱踢，喝令他站起来。面对着这种禽兽般的行为，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大喝一声。这一声是对他们野蛮行为的坚决抗议，是对他们兽性发作的有力批判。他们正是如此野蛮地、如此惨无人道地去折磨这个男人，去折磨尤列克、埃娃、安尼奇卡·伊拉斯科娃和安卡·维科娃的。那个党卫军不再打那个男人了，出人意外的是：他也不调查是谁大喝一声的。也许在那一刹那间，他天良发现了吧！？正在作画的画家向我们转过脸来，举了一下拳头。党卫军并没有发现他的举动。而我更是勇气倍增。那位英雄的画家就是兹登涅克·德沃夏克同志。他的事迹后面还将提到。

不久，盖世太保内尔格尔又走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那个男人身边，往他身上踢了一脚，对他说道：“伙计，你就交代吧，你住在什么地方？”但是，那位男人却象哑巴一样闭口不答。

此刻，党卫军发现，坐在长凳上的一个囚犯的嘴唇在动个不停。他马上跑了过去，命令囚犯和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犯人站到长凳上去，每个人罚做50次下蹲动作。而且，动作

要快！他们自己还必须大声数数。“多少次了？”党卫军故意问道，虽然大声数数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20次？从头做：一，二，三！”他让他们站起又蹲下，直至他们精疲力尽、几乎就要倒在地上时为止。一位囚犯在做下蹲动作时总是微笑着，如同在进行体育锻炼那样，结果，他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数起，没完没了地曲膝下蹲。其他囚犯象塑像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或站着，听不见哭泣，也看不到眼泪。而画家却继续在画着芭蕾舞女演员正在演出的画……

尤列克在哪儿？他是否仍旧活着？

党卫军把莉杜什卡·普拉哈从审问室押了回来，让她坐在我面前的长凳上。这是我们在监狱中的第一次会面。她是在我被捕后约一个月被捕的。我微向前倾，低声告诉她说：“我们不认识！”她只是抽动了一下肩膀。也许她已经承认我们是认识的。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失望。

伯姆走了进来。他站在长凳前，向四面环视了一周，然后向我点了点头。我站起身来，跟着他走了出去。当我们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时，他突然对我说：“伏契克太太，明天上午九时您就要被处决了！”我看了看他那骷髅般干瘦的脸，霎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沉思片刻后我对他说：“请便吧！”虽然我的说话声显得十分镇静，但是我感觉到，我的两手开始颤抖起来。

尤列克正在伯姆的办公室里。当我走进大门时，他微笑着叫了我一声“古丝蒂娜！”我回答说：“尤列克！”

我们俩面对面站在那里。伯姆从我们两人中间穿了过

去。当他走到办公室正中的位置时，他猛地转过身吼叫起来：“我们已经把一个村子夷为平地，如果捷克人还想顽抗，我们可以把整个保护国从地球上抹掉！我们要怎样干就怎样干！我们是所向无敌的！我们已经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还占领了托布鲁克！谁想顽抗谁就会粉身碎骨！”

尤列克慢条斯理地、沉着镇静地向伯姆作了回答。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他讲话的全部内容了，不过我记得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你们可以把整个保护国从地球上抹掉。可能，你们目前还具备这种能力。红军也许正在后撤。我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红军果真后撤的话，那么请您注意，他们这只是暂时的，他们可以退到很远的后方，他们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请您记住，从来没有一个进攻俄国的军事领袖取得过胜利。看一看拿破仑吧。他一直打到了莫斯科，不过他的可悲下场是众所周知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没有红军——除了战争武器以外，红军还掌握着一种远为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不可战胜的共产主义思想！”

听完这些话后，伯姆叉开两腿，讥讽地笑了一下说：“伏契克，你这个不可救药的顽固分子！”他笑着，笑得那样傲慢，摆出压迫者对被压迫者不屑一顾的神态，而且幻想着这种关系将永世长存。尤列克也微笑着，他笑得那样亲切可爱，然而又是那么自信。我明白了，他在不共戴天的死敌面前——这些敌人已经逮捕了他，而且随时可以打死他——从来没有屈服和沉默。

伯姆慢慢收敛起了笑容。显然，尤列克的言谈举止激怒

了他，但是他没有发作。接着他突然开始审问尤列克，要他交代到德伊维采寓所来找我们的那位太太是什么人。尤列克对他说：“警官先生，那位太太我的确不认识。”尤列克说话时的那种一本正经的神色使我暗自发笑。当伯姆转过身来问我时，我向他保证说：假如我认识那位太太，那么我一定会叫出她的名字来的。由于“那位太太”是虚构的，所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编造。伯姆象一只东闻西探的猎狗，气急败坏地派人带来了莉杜什卡，希望能从她的嘴里探听出秘密。然而，莉杜什卡也一口咬定说她不认识那位女人。莉杜什卡对我视若路人。我怀疑她是多余的。伯姆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我们两人原来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哩。

伯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妄图侦查出那位陌生的“太太”，他提审了早在我们之前被捕的许多同志，但是仍旧一无所得。对他说来，那位“太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他抓到了她，他便把通向党的地下中央的线头抓到了手里。这正是他的黄粱美梦。

那天傍晚，当他们把我押回庞克拉茨监狱时，我遇到了阿玛尔卡。她身穿西服上衣，手里拿着睡衣，脸色红润，两眼闪耀着一种异样的光芒，正准备离去。我匆忙地问了一句：“阿玛尔卡，你到哪儿去？”“到查理广场监狱去，”她郑重其事地回答说。当时在囚犯中间莫名其妙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凡是能转移到查理广场监狱去的囚犯，不久必能获得释放。这正是使阿玛尔卡感到高兴和激动的原因。

说话间，女看守已把她带了出去。我们已来不及拥抱告

别，只是手跟手轻轻地碰了一下。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虽然我曾想方设法打听她的下落。后来当党卫军也把我押解到查理广场监狱时，我从女杂役那里听说，那里从来就没有关押过叫阿玛尔卡的犯人。几个月以后，斯特拉什尼采的里赫同志在“400号”告诉我，阿玛尔卡早已被处决了。

大约两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女看守来到牢房，命令我收拾好自己的衣物跟她走。我心里不安起来。我们来到走廊上。在大门旁靠墙的地方（几个女囚犯已经站在那里），女看守要我面朝墙壁站好。然后，盖世太保们便把我们装上囚车——活动地牢中去。我们茫然地向前走着。当囚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以后，才听说，我们已经来到查理广场监狱的院子里。

第三节 插入盖世太保司令部的反法西斯战壕

1942年7月3日，德国纳粹分子形式上取消了戒严令，但是，他们的军事法庭却依然存在。

盖世太保每天用囚车把我拉到佩切克宫去。他们命令我把所知道的苏联驻布拉格商务代办处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因为1936年以前我一直在该机关的通讯组任职。他们是从捷克警察局移交给他们的档案材料中得知这一点的，而且，反共科科长莱梅尔亲自向我下达了书写交代材料的命令。不久，莱梅尔由新任命的科长杨图尔接替。显然，杨图尔并不了解

莱梅尔的上述命令，因此，谁也没有过问要我写书面材料的事，党卫军只是月复一月地把我押送到“400号”候审室去。在最初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我都呆呆地坐在那里只字不写。后来，当我和尤列克商定了交代材料的内容后，我便把在捷克斯洛伐克上映过的苏联电影的内容记录下来。晚上，当党卫军要带我回庞克拉茨监狱时，我便把一天所写的“材料”藏在扎鲁斯基看守的抽屉里。所有的盖世太保从来都不向我索取交代材料，因为，一方面他们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误认为是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布置我这样干的。直到最后，我所写的苏联电影故事梗概也从未落到他们手中。

在“400号”候审室里，坐在我右边的是杭兹尔同志——修理打字机的机工，他旁边是瓦舍克·雷泽克，再旁边是兹登涅克·德沃夏克、贝尔维达、埃尔布尔和维苏希尔同志。盖世太保从不知道，尤列克和我是维苏希尔的好朋友。不仅如此，尤列克还在他家躲藏过一段时间呢。维苏希尔是因国内抵抗运动中央委员会所散发的秘密传单《投入战斗》而被捕的，那是盖世太保搜查了叶林内克夫妇寓所后第三天发生的事。和维苏希尔同时被捕的还有住在同一幢大楼内的苏汉内克夫妇。他们都是在散发上述传单的过程中开始接触斯沃博达一家的。全国解放后真相大白：西巴公司——瑞士制药股份公司布拉格分公司经理斯沃博达原来是德国保安机关的警探。他在特别人民法庭上供认：他曾告发了78个人，其中包括苏汉内克全家和维苏希尔同志。

我的右面桌子旁边还坐着阿尔诺什特·洛伦茨，他旁边是雷内克·特林格尔和米拉·内德维耶德医学博士。离内德维耶德博士不远坐着尤列克，他再也不是独自地、孤零零地坐在墙角里了。他慢慢地、坚持不懈地每天把自己的椅子挪动一、二厘米，现在已经坐在扎卢斯基看守的桌子和囚犯的长凳中间了。在尤列克背后的整块墙壁上，镶着宽大的穿衣镜，下面装有四个洗脸池。杂役们常常（有时是大摇大摆地）拿着盛啤酒用的半公升大的玻璃杯到这里来打水，或者是自己饮用，或者是把水递给某一个囚犯。在这个时候，来打水的杂役就可以乘机传递囚犯们的口信，告诉某个囚犯在受审时应如何编造口供，或者带来外国电台广播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他从新被捕的囚犯那里或者从某个捷克看守那里听来的。这种传递消息和口信的工作大部分是通过尤列克来进行的。

盖世太保每天都用囚车把所谓案情重大的犯人拉到“400号”来（比如1942年的尤列克和米拉·内德维耶德，当时对他们的审讯还是公开的），这样在重新提审时，这些犯人便可以随叫随到，用不着派人到庞克拉茨监狱或者从五楼跑到一楼的候审室去带他们。此外，盖世太保每天还把奉命在佩切克宫从事服务性劳动的所谓“杂役”也带到“400号”。杂役们负责给犯人送水送饭，修理打字机，协助进行清洁卫生工作，在大逮捕时填写逮捕证，在党卫军的小卖部、图书馆里服务，把没收的地下刊物和捷克警察局移交过来的档案材料翻译成德文。我还记得，雷内克·特林格尔、瓦舍克·雷

泽克和阿尔诺什特·洛伦茨曾经乘机销毁了许多捷克文的档案材料。

在“400号”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精诚团结的集体，这个集体把狱吏们所布置的工作转化为对囚犯们有利。

如果只由捷克看守扎卢斯基独自一人监视犯人，或者在场的还有另一位捷克看守拉什托维奇卡（或者是莱布内尔）时，那么，囚犯们可以左顾右盼，交头接耳，甚至可以通过其他犯人给自己的同案犯、被捕的同志传递口信。捷克看守提供这种机会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在进行审讯时囚犯们便能口径一致，从而免受皮肉之苦；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不涉及监狱外面的同志们。

拉什托维奇卡由于每天给囚犯们提供这种帮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43年的年底，他在佩切克宫目睹了叛徒、告密者雅罗斯拉夫·菲亚拉出卖党的地下中央的同志们的可耻行为。菲亚拉在党内工作了很长一个时期，深受同志们的信任。现在他和领导干部们又保持着直接联系。而领导干部对他已经成了一个叛徒和密探却毫无觉察。拉什托维奇卡用印刷体写了一张揭发条子，并把它交给了监狱外面与他有来往的、《蜜蜂—友爱》消费生产合作社的同志们，希望他们能把它转给党中央委员会。然而，这张条子却落到了菲亚拉的手里，接着他又把条子交给了盖世太保。于是，盖世太保便对一部分捷克看守开展了普遍的审查。根据笔迹盖世太保断定：写条子的人是拉什托维奇卡。1943年12月里，拉什托维奇卡被捕，不久便被吊死在庞克拉茨监狱。

有时候，虽然也是扎鲁斯基看守一人值班，但是此刻犯人是不能随便交谈的，这是因为：此刻在他们中间混有密探。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密探很快便会自我暴露。原来，每当这样的密探被带出去进行“审问”之后不多久，一个盖世太保便会匆匆闯进“400号”来，他不用进行任何事前的调查研究就能知道，哪些同志进行了“串联”。这个盖世太保不仅要把他们就地毒打一顿，而且还命令他们回到庞克拉茨监狱以后，连续三天三夜在走廊上面对墙壁罚站，而且不准吃一口东西。这样的叛徒从此便永远遭人唾骂！只要他在“400号”一出现，囚犯们便正襟危坐、闭口不语了。起初，米雷克（克列仓）也混在这帮密探中间。当押送他去受审的扎卢斯基回到“400号”时，他把食指贴近嘴唇低声对大家说：“注意，克列仓告发你们在这里搞串联呢！”

戒严期间，在“400号”负责监视囚犯工作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党卫军分子，他是罗兹人，这个地方后来被纳粹分子改名为利茨曼施塔特。起初，这个党卫军分子对待犯人真是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为了把他的注意力从囚犯们身上引开，尤列克、雷内克、雷泽克和米拉·内德维耶德都曾试图和他攀谈，结果全都遭到他的一顿臭骂。但是，同志们没有灰心。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个年轻的党卫军分子慢慢地也跟同志们高谈阔论起来，甚至向他们宣讲自己的纳粹主义观点。据他说，德国人在东线正大获全胜，不久他便可以衣锦还乡，在乌克兰分到大庄园，乌克兰人都要听从他的使唤。德国法西斯就是这样哄骗他们的“同种兄弟”的，而许许多多的

人却听信了他们的这些谎言。同志们驳斥了他的这些无稽之谈和愚蠢想法，向他宣传苏联和红军。虽然，当时红军正在退却，但是红军决不会投降，它将继续战斗，一直到把德国法西斯碾成齑粉为止。同志们谈话时的那股热情和对苏联必胜的信心，影响了这个年轻的党卫军分子。他终于停止了对犯人的严刑拷打，甚至还学会了一首德国革命歌曲，常常和“400号”的同志们同声歌唱。当然，他们不能高声歌唱，以防被走廊上的盖世太保听见。后来，我们的这位罗兹出生的党卫军被派往东线作战，在那里他有幸亲身感受到了红军的强大威力。

戒严令取消后，在“400号”负责看守工作的除扎卢斯基以外，就全是捷克巡警了。如果值班的是贝尔卡或者是波希克（甚至是多列伊希），囚犯们要进行交谈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当他们三人聚集在一起时，通常有一个人会从口袋里掏出扑克牌，大家便围坐在桌子旁边玩起来。波希克还不时地抬起头，大声吆喝一句：“顽固分子们，把头抬起来！”

（或者：“安静！”）但是，当发牌声越来越响、出牌声越来越激烈时，这些巡警的眼睛便更加专注地盯着自己面前的纸牌。有时候，他们甚至还请求囚犯们说：“多注意点，有人来先打个招呼！”虽然，当时发出“注意”的警报首先对我们起到了掩护作用，但是，当这些捷克巡警——哪怕是赌兴正浓之际——一听到“注意”两字时，他们便象学生娃娃那样立即把纸牌藏到口袋中去。即使在捷克盖世太保面前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当囚犯们窃窃私语的谈话声高涨起来时，一位

巡警便吆喝一声：“安静！”——接着便继续玩他们的纸牌。不过，这样一种舒心的时刻是非常之少的，尽管如此，同志们却善于抓住时机，充分地加以利用。

“400号”的候审犯人不许离开自己的座位的。然而，这里的杂役却不同，他们可以在室内自由活动。特别是雷内克·特林格尔和瓦舍克·雷泽克，他们装成勤于职守的样子，东跑西颠地打扫着房间，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传递口信和分发午饭，这些午饭是批准接待探监亲友的犯人留下来的，而亲友们带来的食品是不得带进牢房中去的。虽然囚犯们只能分到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东西，这些东西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温饱，但是却使他们相信：每个犯人都被看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这个集体决不会忘记他们！因此，所有的囚犯都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在“400号”，犯人是禁止抽烟的。如果盖世太保批准某个囚犯会见前来探监的亲友，那么，在会见时囚犯抽烟是个例外，不过，他也不得把香烟带进牢房来。囚犯常常把多余的香烟留给杂役，而杂役则设法让每个抽烟的犯人至少能偷偷地吸上几口。当一支香烟在犯人中间辗转传递时，扎卢斯基总装作全然没有看见一般。如果某个盖世太保突然走了进来，那么，在“哨兵”的协助下，香烟早已被掐灭了。难道盖世太保闻不到烟味吗？原来，到“400号”来的许多盖世太保常常是嘴里叼着烟卷，其中不少人还故意用它来逗引囚犯借以取乐呢。

有时候也许有人觉得：“400号”是充满牧歌式诗情画意的地方，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德国和捷克的盖世太保常常

在这里进进出出，将囚犯带去审问。几小时后，被提审的犯人又回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被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然而，这些惨遭严刑拷打的男女同志们会立即感受到难友们热情关怀（当然这要看值班看守是谁而定）：在他附近靠墙的长凳上，难友们给他腾出了空位子，一定要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下；雷内克、雷泽克或者米拉·内德维耶德立即给他送来一小块面包，偷偷地塞给他一支香烟，米拉·内德维耶德手头还有镇静剂、止痛药。同时他们还会告诉那位难友，他应该找谁联系，应该跟谁统一口径。这样，每一个囚犯都感到了集体给予的支持，这种支持给他增添新的力量和勇气，也使他对这个集体充满感情并忠贞不渝。

我常常看到，尤列克在“400号”整天忙个不停。坐在他前面长凳上的难友们——不管他认识或不认识——都要来找他谈心。尤列克一面侧耳细听，一面则环顾着四周，以防和他交谈的囚犯被盖世太保当场抓住。在倾听别人的意见时，尤列克从不显出情绪激动或者烦躁不安。许多囚犯都想方设法要凑到他跟前来向他请教，在提审自己时应该怎样去对付盖世太保；同时，希望能从他这里了解世界大事，吸取勇气和力量。“400号”的全体囚犯都知道，尤列克是共产党的一位编辑，他曾在报刊杂志和各种会议上向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进行过公开的、勇敢的斗争，因此他面临着最险恶的处境。尤列克得到全体囚犯的充分信任。有些囚犯早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便认识尤列克，另一些则是在法西斯的监狱里才认识他的。但是，所有的人都与他推心置腹，开诚相见，而他则

鼓舞他们，激励他们，替他们想办法、出主意。他不只对共产党员或同情分子才这样做，他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一视同仁。当盖世太保用囚车——黑洞洞的活动地牢——押解我们时，那是我们进行秘密串联的理想时机，因为此刻，随车负责守卫的党卫军无法看清囚车内的真相，他也无法听清谁在说话，因为囚车发动机的隆隆声早把囚犯们的窃窃私语声淹没了。而盖世太保抓来的囚犯（特别是共产党囚犯）又如此之多，他们根本不可能用小车逐个地去押解犯人。盖世太保甚至也弄不清，他们每天关进同一辆囚车内的到底有多少人是同案犯。

在半年的时间里，盖世太保每天都用囚车把我从查理广场监狱经过庞克拉茨监狱押送到佩切克宫去，然后再从佩切克宫送回查理广场监狱，因此，每天我都能看见尤列克。有时候，当盖世太保把我们排好队、带领我们到一楼去吃午饭时，尤列克甚至能凑到我的身边匆匆地吻我一下。通常要等到扎鲁斯基独自一人值班时我们才能这样做。我几乎每天都能和尤列克谈话。谈话的时间有长有短，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无法接触。尤列克曾经告诉我：他骗伯姆说，他每月两次要到布拉尼克^③的一家小饭馆去接头。有几次，伯姆把他带到那间小饭馆里，期待着能抓到前来接头的人，但是结果都失败了。

有一次尤列克对我说：“古丝蒂娜，我知道，我是活不成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我是无法从死神的魔爪中挣脱出来的。但是奇迹是没有的啊。不过你可以相信，我根本就没

有把死放在心上。”正因为尤列克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才能打不垮、压不倒也不悲观失望。我无法反驳他，因为他说的可惜句句都是真话。有一次我问他：“尤列克，你不能逃走吗？”一向富于冒险精神的他却摇了摇头说：“古丝蒂娜，即使有越狱的可能，我也不想这么干。要知道，又有多少人要为我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呵！纳粹分子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够惨痛的了！”

尤列克在“400号”的辛勤劳动终于培育出了胜利的硕果。他那大无畏的精神甚至感动了一些捷克看守。瓦茨拉维克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佩切克宫五楼反空降科的职员，“400号”跟他的工作无关。起初，他每两三天才到这里来转一转，稍后是每天必到，后来甚至是一天数次。在“400号”房间里，瓦茨拉维克有时呆半个小时，有时甚至要呆上一个钟头！他身材修长，穿着入时，黄发碧眼，微微弯曲的头发总是梳得油光锃亮。陌生人都不会相信，他干的竟是盖世太保这个行业。最早他是在捷克警察局某边防分局干反共差事，后来调到布拉格，德国纳粹占领时期他又被调到盖世太保工作。他总是踏着轻盈的步子（几乎是和舞步一样）来到“400号”房间，然后立即朝扎卢斯基坐着的那张桌子走去。只有他这个人，当他一跨进“400号”的门坎时，才大声地、毫无顾忌地用捷语问候大家，说一声：“你们好！”他总是面带笑容，似乎这里不是监狱，而是他和朋友们聚会的地方。通常他总是漫不经心地把左腿架在扎鲁斯基桌子的一个角上，半站半坐在那里，用机敏的眼睛环视着囚犯，看看是否有新来

的陌生人。他从扎鲁斯基的座位上能一览无余地看到所有的犯人，但是，并非所有的犯人都能看得见他，因为扎卢斯基的桌子正好斜放在他们背后。他先和扎卢斯基交谈几句，然后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和尤列克以及米拉·内德维耶德聊天。他坐在他们两人中间，没有一点儿官架子。他给“400号”带来了文明、礼让的气氛。当我们和他在一起时，我们会暂时忘记自己是一个囚犯。他生性好动，喜欢冒险。他不停地追求着冒险行为，因为在危险面前他如同水中之鱼一样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瓦茨拉维克曾主动向尤列克提出，监狱外是否有事要他帮忙。当米拉·内德维耶德太太（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博士）被捕以后，他也曾向米拉同样地毛遂自荐。起初，尤列克并不相信他，但是，他还是想考验考验他。因此，他托瓦茨拉维克给自己的妹妹薇拉捎去一张条子，告诉她说：他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但是，这一消息千万不能告诉妈妈、爸爸或者莉巴。尤列克想，他们中最勇敢的要数薇拉，她尚能忍受这种噩耗的打击。1943年8月8日他从鲍岑监狱发出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也许你们会这样想，一个被判处了死刑的人心里会老惦记着死，并为此而感到痛苦。这是一种误解。打从被捕的第一天起我便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一点，我想，薇尔卡④是知道的——同时，你们也许从来没有看见我痛苦过。”

尤列克还把瓦茨拉维克派到斯米霍夫区去找书店经理吉尔加尔，问候他并请他把几本《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

小册子交给瓦茨拉维克。后来瓦茨拉维克告诉我们，当他一走进书店并说明他是一名盖世太保时，可把吉尔加尔吓坏了！不过，他当时立即补充了一句：他不是来抓人的。

尤列克把《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小册子分送给瓦茨拉维克、扎卢斯基、莱布内尔每人一本，另一本留下来供杂役们暗中传阅。这样，战斗的博热娜·聂姆措娃的光辉形象甚至在法西斯监狱中也一直伴随着我们，鼓舞我们去进行斗争。

还有一次，尤列克派瓦茨拉维克到吉尔加尔那里去取《苏联宪法》。瓦茨拉维克把《宪法》取回后，尤列克把它藏在扎卢斯基书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然后把抽屉拉开一点，偷偷地阅读起来。他向瓦茨拉维克详细介绍了有关苏联宪法和苏联的情况。瓦茨拉维克大声地提着问题，尤列克也大声地回答。这样，不只是瓦茨拉维克，而且全体囚犯都能听到尤列克的讲解。这是一堂真正的政治课。不过，只有当扎卢斯基一个人值班时，或者当瓦茨拉维克作为看守和我们呆在一起时，尤列克才有可能给我们上这样的政治课。瓦茨拉维克对尤列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它深深地鼓舞着其他囚犯——公开表示敬佩。他也充分信任尤列克。他认为（用囚犯们的行话说）：万一出了“婊子”，尤列克这种人才不会出卖他。另一个盖世太保的职员弗兰季舍克·莱布内尔对尤列克有着和瓦茨拉维克类似的看法。莱布内尔来到“400号”时也总是面带笑容。当杂役们把香烟送给囚犯时，莱布内尔从不出面阻止。当抽烟的囚犯们一人一口、分享着吞云吐雾

的快乐时，莱布内尔也装做没有看见一样。当囚犯们交头接耳、传递消息时，莱布内尔又装成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也从来不斥骂犯人。

大约在1942年夏天，有一次，莱布内尔把一份报纸带进“400号”送给尤列克看。此后，他每天都给尤列克送报。在这以前，扎卢斯基有时故意把报纸留在桌上，尤列克便伸着脖子探过头去（因为他是不得用手去拿报的），至少看一看报上的标题也好。当莱布内尔每天送来报纸以后，尤列克又把它放到扎卢斯基书桌的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然后把抽屉稍稍拉开，弯下腰看起报来。如果某一个盖世太保走了进来，尤列克便把抽屉往里一推，若无其事地端坐在椅子上，还不时用手捋捋下巴上浓密的胡须。后来他甚至弄到了一份欧洲地图。他把这份地图也藏在那个抽屉里，放在报纸下面。他常常看着地图计算着红军和纳粹国防军当时的阵地位置。

1942年夏季是红军在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斗争中最艰苦的时期。而能向我们提供援助的只有红军，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仍遥遥无期，英美军队只在迪埃普进行了登陆试验。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每天都要大吹大擂地播送好几次战报，宣布纳粹军队新近占领的苏联城市与乡村以及被纳粹舰队击沉的船只吨位数字。在佩切克宫、庞克拉茨监狱和查理广场监狱里，盖世太保故意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限度，以便让囚犯们也能听见德国法西斯大获全胜的消息，妄图在精神上瓦解这些犯人，使他们感到反抗德国法西斯不过是无谓的牺牲而已。盖世太保妄图使整个捷克民族都处于这样一种绝望

的精神状态之中。当囚犯们听到这些坏消息时，虽然他们也焦急万分，但他们很快便恢复了平静，因为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绝大多数囚犯依旧坚定不移地相信：最后胜利必定属于红军。如果某个囚犯开始动摇起来，其他的囚犯会立即帮助他重新树立起必胜的信念。

在“400号”房间负责看守囚犯的也有死心塌地为纳粹分子效劳的捷克盖世太保。轮到他们值班时，囚犯们对自己的言谈举止必须十分检点，如同在德国盖世太保面前一模一样。捷克盖世太保斯莫拉就属于这种类型。1942年夏秋两季，他陶醉在德国人的胜利之中，深信这种胜利是永恒的。他常常面带奸笑，以讥讽的口吻称囚犯为“先生们”。有一次他说：“瞧，先生们，莫斯科完了！你们的红军已经被打得稀巴烂！”又有一次，他带来这样的消息：“瞧，先生们，德国人已经拿下了列宁格勒！”还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瞧，先生们，斯大林格勒已经不是俄国人的，而是德国人的了！”他妄图用这些话去瓦解囚犯们的斗志，但是，每一次都遭到了严词驳斥。这时候尤列克就站出来讲话了。他批驳了盖世太保们的“论点”，说明苏联的不可战胜性就在于它有着崭新的社会制度。后来在尤列克和捷克盖世太保之间常常开展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站在斯莫拉一边的还有波希克和贝尔卡，这两个盖世太保常常用最下流的语言去贬低苏联人民和军队的力量。非常了解苏联和苏联人民生活的尤列克机敏而巧妙地证明：即使第三帝国目前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是，希特勒德国的垮台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争论异

常激烈，盖世太保们远不是尤列克的对手，因为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战士，尽管纳粹分子把他投进了监狱。他正是怀着革命战士特有的坚定信念和对苏维埃国家的深厚感情去谈论苏联和苏联人民的。

除了捷克盖世太保以外，囚犯们也专心致志地倾听这场争论。尤列克的话首先就是说给他们听的。比如，尤列克的一位难友布拉拉克同志这样写道：“……我们全体在场的囚犯都屏息凝神地倾听着他们的争论。他（尤列克）的话深深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感到力量倍增。我们大家对强盗们的可怜像暗自好笑：虽然他们手里掌握着一切残酷的刑具和可怕的杀人武器，但是他们却找不到任何一种武器去摧毁象尤拉这样的人的力量和信念。”

在争论中，尤列克谈吐诙谐、妙趣横生。拿囚犯们的话来说，所有的盖世太保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比捷克和德国盖世太保都要高明得多。他是囚犯们的鼓舞力量。同样，囚犯们也给他以力量，有幸长期见到尤列克的“400号”杂役、瓦茨拉夫·雷泽克同志在谈到尤列克时说道：“他并不是孤身一人。他和难友们生活在一起，和那里的生活融为一体了。他所关心的是那些难友们的命运。”

也许有人会问，尤列克等少数人怎么可能那样随便说话？但是尤列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盖世太保那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原布拉格捷克警察总署移交给盖世太保的共产党档案材料里，有关尤列克的书面材料便有足足三十三页之多，并附有详尽的说明和图片。在雷内克同志

的帮助下，尤列克曾偷看了这些档案材料。盖世太保从材料中得知：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尤列克任《红色权利报》和《创造报》编辑，曾两次秘密前往苏联，多次参加与苏联问题有关的会议并作报告，因此曾被判处监禁数月。档案材料中还包括了他参加过的各次会议情况，他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言论。

尤列克充分意识到，他是不可能从纳粹监狱里活着出去的了。但是，盖世太保并没能使他屈服，尽管他们在他身上用尽了野蛮的刑罚。

在“400号”，尤列克曾对我说过多次：他和盖世太保正在玩一种高级游戏。伯姆经常叫他去写交代材料。他便把被盖世太保杀害了的人们牵扯在一起，“交代”有关他们的活动。这样可以使监狱外面的同志和朋友们免遭不测。在每次提审以前，尤列克总是预先编造好无懈可击的假交代。

盖世太保为什么无法使尤列克屈服呢？这是因为他具有英勇不屈的品格和产生与锤炼这种品格的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信仰。因此，当盖世太保反共科的科长向受尽折磨、生命垂危的尤列克提出“你还相信共产主义能够胜利吗？”的问题时，他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毫无疑问，结果只能是这样！”

这里我回想起另一件事情，它与佩切克宫所发生的一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它却颇能说明问题。尤列克直到27岁才服兵役。当时的兵役条例规定：各级军官在对列兵谈话时应尊称对方为“您”。但是这些军官却违背这一规定而只

称列兵为“你”。只要有一位军官称尤列克为“你”时，他也用“你”去称呼对方。他们又不能因此罚他禁闭，结果不得不以“您”去称呼他了。

伯姆残暴的帮凶、捷克盖世太保波希克很喜欢唱歌。他具有优美的、独特的男高音音色。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啊！一方面。他在审讯囚犯时竟对女犯人大打出手，更不用说对男犯人的严刑拷打了（在拷打囚犯之前，他总是先喝些酒壮壮胆儿）。但是，当他结束了在“400号”的公务后，他便立即开始唱歌。他不只会唱优美的民歌，而且喜欢唱保护国时期电台经常放送的伤感的流行小调。尤列克也会唱这些歌曲。有时候，当波希克放声歌唱时，尤列克便唱起低音部为他伴唱。因此，在“400号”常常响起了捷克民歌优美动听的旋律。此刻，波希克却吓坏了。万一给德国警官听见了，这可无法交代！他马上停了下来，对尤列克厉声喝道：“伏契克，你太放肆了！”尤列克也沉默下来，耸耸肩膀，摸摸胡子，两眼透过铁窗望着监狱对面的山坡，如同没有看见这个盖世太保一般。不久，当波希克又唱起来时，尤列克又会轻轻地用口哨吹起低音部来。总之，他们根本无法迫使他沉默下来。

早上，当瓦茨拉维克来到“400号”房间时，米拉·内德维耶德便把桌子抽屉打开，瓦茨拉维克把一个装有药片、各种维生素补品和一小块黄油面包的小包放进抽屉里去。这些东西是奥尔加·沃尔德日霍娃托他带来的，奥尔加·沃尔德日霍娃是医学院的女学生，捷克高等学校被封后她便到维诺

赫拉迪医院去工作。而米拉·内德维耶德博士在被捕前也一直在该医院任职。在纳粹占领时期，兹登涅克·内耶德利教授赴苏以前便隐藏在沃尔德日霍娃家中。奥尔加和她的妹妹伊莲娜曾经参加过地下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的印刷工作。当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博士同志被捕后，奥尔加便替她托瓦茨拉维克偷偷地给她的丈夫米拉·内德维耶德带东西。食物不许多带，以能放入西装上衣口袋为限——虽然瓦茨拉维克能够捎带的食物要多得多——不过，米拉和尤列克已使他变得百依百顺。每一次，米拉总是先托瓦茨拉维克捎信给奥尔加，告诉她可以带什么东西和可以带多少。

“400号”房间能弄到的一切食物都由雷内克·特林格尔、瓦舍克·雷泽克和米拉·内德维耶德负责。他们把这些食物公平合理地分发给被押解到“400号”房间来的每一个囚犯。虽然每个囚犯仅能分到一口食物，每个吸烟者仅能分吸一口香烟，但是在这些细微的日常事务之中却体现了伟大的同志情谊和团结一致。

秋天里有一次，瓦茨拉维克把奥尔加·沃尔德日霍娃带进盖世太保司令部所在地佩切克宫。奥尔加·沃尔德日霍娃坐在走廊里的一张长凳上。当我们上厕所时，她转身跟在我的后面。当时看守我们的只有扎卢斯基一人，因此我们彼此能低声交谈几句。她主动提出：如果我想往监狱外面传送口信，她能替我办到。我以为她也是一位难友，因此我问她是否快获释出狱了。她说她没有被捕，她姓沃尔德日霍娃，米拉·内德维耶德博士夫妇非常了解她。我当时对她不敢轻

信，所以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后来米拉告诉我，她是一位十分可靠的同志。

此后不久，瓦茨拉维克甚至把奥尔加直接带入“400号”房间。他让她坐在长凳边上，坐在桌旁的米拉·内德维耶德正好背对着她。当我看见她时，我确信她已经被捕。但是，瓦茨拉维克领她来的目的，是要让米拉能亲自对她说他需要什么东西。他把她领入“400号”，而自己却走了出去。瓦茨拉维克的这一举动实在是过于轻率和鲁莽。幸好那天上午的值班看守只有扎鲁斯基一人。坐在靠门的囚犯象往日一样担任着放哨的任务。偶尔有个别的德国盖世太保跑进屋来提审囚犯，或者把审问时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囚犯押回原位。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奥尔加并非犯人。当她在“400号”呆了相当长的时间，米拉早已把想要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她以后——在维诺赫拉迪医院里，有一个进步的医生团体继续在那里活动——他便四下张望找瓦茨拉维克，要他把奥尔加带出佩切克宫去。但是，瓦茨拉维克却渺无踪影。直到下午他还是没有回来。我们都知道，他喜欢胡闹，所以都感到异常焦急不安。当他们押送我们去吃午饭时，扎卢斯基不得不陪着奥尔加留在“400号”。他们常常押着我们从旁边的楼梯上一个接一个地走下去，形成一队长龙。杀人成性的弗里德里希看到我们时，总是要恶狠狠地说上一句挖苦话：“啊，一群行尸走肉！”在这个与共产党人誓不两立的反动分子看来，这里的囚犯早就该统统枪毙了。囚犯们下楼梯时必须紧靠着墙、远远地离开栏杆，以免有人蓄意跳楼自杀。此刻，押送我们的

盖世太保们便沿着栏杆站成一排守卫。然而他们还是未能阻止某些囚犯这样做。我曾看见，被打得死去活来的马蒂阿什同志就从栏杆上跳了下去，希望一死了事。但是，他只从四楼栏杆落到了三楼的地板上，身上凭空增加了几处轻伤而已。那是他第二次寻死。前此不久，他曾在监牢里用破灯泡的玻璃片割断了自己的血管，不过看守们及时发现了。一年后，马蒂阿什同志在柏林被处决了。

午饭后盖世太保又将我们押回“400号”房间。奥尔加却依旧坐在那里。扎卢斯基已数次到反空降科去找瓦茨拉维克，但是每一次扎卢斯基都是只身回到“400号”。我们如坐针毡，焦急万分。

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盖世太保（凡是对他稍有了解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他名叫多列伊希，黑头发，矮个子，身子敦实。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进来，一声不吭，只用冷冰冰的淡蓝色的眼睛盯着每一位囚犯。他多么希望能看出囚犯心中的一切秘密，以便能向法西斯主子邀功请赏。如果他碰上了某个囚犯正在跟别人说话，他既不斥骂，也不警告，而是悄悄溜了出去，然后把德国警官带进来。

多列伊希走进“400号”房间，用他那冷酷的眼睛扫视着囚犯们。突然，他把目光盯在奥尔加身上。他向她走了过去，压低嗓门问道：“您在这里干什么？”他知道，她是维诺赫拉迪医院的工作人员。奥尔加回答说：“我坐一坐。”说完，她若无其事地微微一笑。多列伊希也不多问便走了出去。全“400号”房间的囚犯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家都不寒

而栗。空气顿觉紧张起来。我们都为奥尔加捏着一把冷汗。

傍晚时分，盖世太保准备把我们领到一楼，然后押送回庞克拉茨和查理广场监狱。正当我们心慌意乱、焦急万分之际，瓦茨拉维克踏着轻松的舞步、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他向四周扫了一眼。忽然，他看到了奥尔加，便喋喋不休地说起话来：“您还在这儿？他妈的，我都把您忘得一千二净了！快，跟我出去吧！”说完，他便带着她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回来告诉我们说，奥尔加已经平安地出了佩切克宫。她一定已经把和多列伊希意外相遇的始末告诉了他。我们也开诚布公地向他谈到了我们的担心，希望奥尔加和他不致发生意外。瓦茨拉维克虽然对我们的意见也考虑了一会儿，但是过后他立即又把它抛在脑后了。

多列伊希当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后来却把此事向德国盖世太保告发了。

在“400号”房间，令人紧张和焦虑的日子依旧一天一天地过去。在这些日子里，男女同志们都受尽了肉体上的痛苦，然而却表现出了惊人的、英雄所特有的精神力量。从表面上看，他们都平静地坐在长凳上等候着残酷的审讯，或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之后还要默默地面壁而立，但是，在心灵深处，他们又都经历着戏剧性的内心变化！

每当新被捕的同志走进来时，我们都惊诧不已、忧心如焚，尤列克尤其这样。在被捕前，尤列克常说：善良的人是不应该死的。而现在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多少善良的人们都惨死在盖世太保的魔窟里。我们为此而感到悲伤，但是我

们能化悲痛为力量。每当新囚犯被押进来时，同志情谊和战斗团结的集体便会立即行动起来。

1942年夏天，一天早晨，盖世太保把新抓来的两男一女押解至“400号”。他们都十分年轻，没有一个在三十岁以外，那个女人和其中的一位男人我是第一次看见，而第二个男人我却认识。他是卡雷尔！我常常在维苏希尔夫妇家中遇到他。我清楚地知道，尤列克被捕后，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他要求我们认识卡雷尔的人，不得在盖世太保面前说出他的名字。此刻，尤列克木然呆坐在后面靠洗脸池的椅子上，一只手以明显地加快了的速度不停地捋着灰黑色的胡子，他那长期不见阳光和新鲜空气的苍白的脸，现在变得更加苍白了。我屏着呼吸，心咚咚直跳。这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卡雷尔承认他认识尤列克，那该怎么办？可能，尤列克所隐瞒的一切现在全都被人泄露了！很久以前，尤列克曾告诉我说，他已经否认了米雷克（克列仓）说他是党中央委员的口供。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名委员又落入了盖世太保之手！我又向尤列克看了一眼。他正在向米拉·内德维耶德说些什么，后者正站在洗脸池旁，往玻璃杯中放水。杯子里的水越来越多，最后溢了出来，但是米拉却根本没有发觉。后来他拿着杯子走了。当米拉在与卡雷尔同时押解进来的年轻男人身旁走过的时候，这个男人向他耳语了几句。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年轻男人就是普罗哈斯卡同志，卡雷尔便住在他的家里。米拉点了点头，立即向卡雷尔走了过去。他把那杯水递给了他，同时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

突然房门打开了。米拉及时地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大多数盖世太保都是突如其来地、迅速地闯进“400号”房间里来的，他们希望给囚犯来一个突然袭击。此刻进来的是弗里德里希。他用恶狠狠的、充满仇恨的目光打量着我们。他只相信他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杭扎·切尔尼，出来！”他用尖利的喊叫声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卡雷尔站了起来。他的真名不叫卡雷尔，而是杨·切尔尼。又过了一会儿，弗里德里希的狗腿子内尔格尔走了进来，他把尤列克也带出去了。当尤列克从我身旁走过时，他匆匆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每当盖世太保自以为抓到了党的高级领导人时，他们总要把尤列克带去对质。这一次，没过多久尤列克便回来了，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又过了很长的时间，盖世太保才把杨·切尔尼押送回来。这血的洗礼该使他多么的痛苦啊！我向他微微转过头去。他看到了我的脸，慢慢地眯缝起两眼，眼角上露出了纤细的皱纹，如同在向我微笑一般。我发现，他有话要告诉我。过了一会儿我向他探过身去，他低声说了一句：“我们素不相识！”我点头表示明白。

中午，当盖世太保把我们集合起来准备去吃午饭时，尤列克低声告诉我说，他们曾把他带去和杨·切尔尼对质。他们俩彼此看了看对方，如同生平第一次相遇那样。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互不认识。盖世太保根本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两个人竟是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不过，他们已经知道，杨·切尔尼到过西班牙，作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名国际纵队战士曾经在那里战斗过。

1942年炎热的夏天，盖世太保把博热娜·波罗娃同志也押送到“400号”房间。这个博热娜上一次几乎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魔掌，当时我拒绝她在我的寓所中过夜，而几小时后，我自己便被捕了。这一次她是怎样落到他们手中的呢？我注意到，当雷内克和阿尔诺什特看见她时，他们也惊呆了。雷内克利用只有扎卢斯基一人看守我们的机会，给博热娜·波罗娃同志送去一块面包，以便能和她偷偷地说上两句话。直到傍晚，当我们坐在囚车里时，她才告诉我一些情况。她是被捷克警察逮捕的。雷内克曾经把一张秘密便条托驾驶囚车的捷克司机交给她，要她请鲁热娜·罗洛娃同志马上通知辛库洛娃同志转移。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尤其是考虑到：在通知到达之前，盖世太保很可能已经包围了辛库列夫妇的寓所了。因此，波罗娃同志不愿让别人去执行通知任务，而决定亲自到那所危机四伏的寓所去走一趟。

为了防备不测，她事先编好了一套应付敌人的话。当她在寓所门口按响门铃以后，出来开门的是辛库洛娃同志的母亲，在她后面跟着捷克警察。博热娜说，她是一位家庭裁缝，辛库洛娃太太请她来的，地址是白天鹅百货公司的一位女售货员交给她的。而捷克警察则奉命必须把每一个进入辛库列夫妇家门的人加以逮捕，并转交给盖世太保。在盖世太保面前，波罗娃同志一再重复了她所虚构的假口供，说她自己不过是一位家庭裁缝而已。盖世太保并没有从她的嘴里得知：她就是地下杂志《妇女》的负责人，她还是捷共地下组织布拉格州的出纳员。不过，盖世太保——尽管无法向她证

明——从捷克警察移交过来的档案中获悉：她曾在红色工会中任职，一直到1938年它被解散为止。盖世太保起初把她关押在庞克拉茨监狱，后来转移到特雷津的一个小军事监狱里，到了冬天又把她押送至布拉格的查理广场监狱，我们就是在这个监狱里重逢的。

1943年1月29日，盖世太保准备把男女囚犯大批流放。囚犯中盛传：德国人将把他们送到波兰去服苦役。当时（1943年1月）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我们还不知道，最可怕的集中营之一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建立起来。勇敢的博什卡^⑤坚信，如果盖世太保押解她到波兰去服苦役，她一定能成功地投奔苏联。我们都抱着天真的想法，以为法西斯分子仅仅是把犯人送去服苦役而已。然而，他们却把博热娜·波罗娃连同大批囚犯一起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此后她再也没有回来。

德国盖世太保还经常把我们共产党出版的地下刊物拿到“400号”房间叫犯人翻译。盖世太保是在偶然情况下截获到这些刊物的。比如：他们从被逮捕的同志身上或者在搜查该同志的住宅时查抄到的秘密报刊，或者通过象德沃夏克之流的他们所派遣的密探骗取到的地下杂志。当一个盖世太保把共产党的宣传品——大多数是《红色权利报》——拿到“400号”房间来时，他和被关押的同志们常常会共同演出一幕“好戏”：盖世太保早已宣称，共产党已不复存在，她已经被粉碎、被消灭了；然而，现在他们又拿来了共产党的地下刊物，这就证明了她依然存在着，而且在继续活动。盖世太保伯姆、赞德尔和弗里德里希象害怕碰上传染病菌那样拿着共

产党的报刊杂志。他们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而囚犯们则用快活的目光彼此相望，偶尔还把一只眼睛轻轻地、迅速地眯缝一下，表示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是的，看到了地下出版的《红色权利报》，我们便知道了监狱外面的同志们在继续工作着，盖世太保才如此地气急败坏，火冒三丈，而我们则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不言而喻，看到这些地下刊物的同志们很快便把其中的内容传播出去：党怎样在进行活动，外面的同志们又怎样未被法西斯恐怖和迫害所吓倒。这一切使尤列克感到格外高兴。他带着无限的深情阅读了被带入“40⁰号”房间的每一期《红色权利报》。为了使尤列克能读到《红色权利报》，雷内克·特林格尔同志每一次都故意把它们放在扎卢斯基的桌上。



严戒令取消后，“400号”房间很快便从走廊上迁回到门上写着“400”字样的原来的房间里。一天，我坐在那里听候提审。突然，弗里德里希领着一个女纳粹分子走了进来。显然，她是一个打字员。她要杭兹尔同志去给她修理打字机。这个女纳粹分子穿着一件灰色毛料西服上衣和一件白色生丝衬衫，我回忆起我家里也有一件这样的衣服。这个德国女人所穿的裙子上腰里扎着一条藏青色的鹿皮腰带，我家里也有一条这样的腰带。裙子的右边残留着一块不大的污点，我的裙子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污点。啊，那是我的西服上衣，我的衬衫，我的腰带！我气愤地向尤列克转过脸去。他也正

在打量着那个穿着我的西服上衣的女纳粹分子，然后他又看了我一眼，但是我们无法交谈。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早已听说了我们寓所已被查封的事。当弗里德里希带着女打字员走了出去、这里的一切重新恢复了平静以后，我又向尤列克转过身去，并大声地（因此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说道：“她身上穿的东西都是我的！”尤列克只是慢慢地点了点头，同时眯缝起眼睛，表示他对我的劝慰之意。我开始冷静下来。我意识到：被盖世太保抢去的衣物与被他们所杀害的任何一位同志的生命相比，那都是微不足道的。后来，当我有机会和尤列克交谈几句时，我再也不提那些东西了。直到两个月以后，尤列克才向我透露：盖世太保不只抄走了我的西服上衣，而且还把我们的房子洗劫一空，因此，现在我们已经是一无所有：既没有衣服和藏书，也没有家具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及早告诉我。他说他不愿使我伤心和痛苦。尤列克在失去自由以前，他对人总是体贴入微的。然而，当我们两人的生命都危在旦夕时，他对人却依旧是那样关怀备至，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尤列克是怎样得知盖世太保把我们的寓所洗劫一空的呢？尤列克的难友什普林格尔同志曾谈到了这一点。什普林格尔同志是在尤列克被捕前几个月被捕的，于1943年1月获准释放。他是盖世太保洗劫我们房子的目击者。他说：“当对我的审讯基本结束以后，我被分配到佩切克宫的所谓‘书籍清查小组’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盖世太保查抄和销毁布拉格各出版社内非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当

这一行动结束，布拉格各书店已被洗劫一空后，盖世太保便开始查抄和销毁在押的或者被处决的政治犯的私人藏书。盖世太保的这一行动开始于1941年。

1942年5月10日左右，在庞克拉茨监狱我第一次见到了伏契克同志。当时在把犯人们押送（也是伏契克同志第一次被押送）至佩切克宫审讯的囚车上我们正好同路。对于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伏契克同志来说，走完庞克拉茨监狱长长的走廊该是多么的艰巨和困难啊。我们不是领着他而是架着他来到院子里，然后又把他架上汽车。从那个时候起，伏契克同志每天都乘车去佩切克宫等候审讯，我则作为一个杂役也同车去‘书籍清查小组’上班。我们两人每天一同早出晚归几乎达九个月之久。

1942年6月的一天，在从庞克拉茨监狱去佩切克宫的囚车上，伏契克同志谈到了书籍、文学作品和他自己的丰富的藏书。他谈得眉飞色舞，兴奋异常！当时每天和我们同车的是‘400’房间工作的杂役雷内克·特林格尔、瓦茨拉夫·雷泽克、约瑟夫·贝尔维达、雕塑家兹登涅克·德沃夏克和英德日赫·艾尔布尔。稍后，我自己也跟他谈到了他的私人藏书，并且小心谨慎地向他暗示，盖世太保可能要没收和销毁它们。我向他介绍了盖世太保的具体作法，以及运回佩切克宫的书籍的可悲下场。但我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盖世太保有可能选派我们这些在‘书籍清查小组’中工作的某个囚犯参与这一行动。我还向他暗示，他们选派的人很可能就是我。果真如此的话，我将想方设法把他的私人藏书尽量抢救

出来。

我问他首先应该抢救那些书？我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眼睛里放射着光芒，他认为这种计划不妨一试，也许某些藏书能抢救出来。他抚摸着他的山羊胡子，显出满意的神情。那天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些。我们能够偷偷地交谈几句的时间并不多。一般地说，或者是在庞克拉茨监狱，每天清晨当我们站在墙边刮脸的时候（当然只有当看守阿道尔夫·科林斯基或者伊·赫费尔值班时我们才能交谈），或者当我们早出晚归一同坐在卡车里（当然最好是坐在囚车里）的时候，最后甚至在佩切克宫这个法西斯魔窟里，我们也能够偷偷地谈上几句。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智谋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伏契克同志认为，需要尽力抢救的书籍主要有：第一，他在学生时期从事文学研究的第一批学习笔记；第二，1793年克拉麦里尤斯编辑出版的《皇家爱国报》的合订本（全国保存下来的这一报纸总共没有几份）；第三，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文著作。在那个危急关头——当时他每天都有被处死的可能——我答应他，我将竭尽全力把那些书籍和笔记抢救出来。

几天后，盖世太保把我们这些在‘书籍清查小组’工作的人和一大筐一同装上卡车，然后就出发了。我们这些囚犯是：兹登涅克·斯姆尔奇卡，伊果尔·兹比罗夫斯基，约瑟夫·克利麦什和卡·雅内巴。我们估计，这次要‘大干一番’，不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带往何地。我

问过警官队长格·克吕费尔。他回答说，我们要‘消灭一位大名鼎鼎的捷共头目的私人藏书’。我一听便知他这话指的是谁。我们的卡车在德伊维采区列特茨卡大街11号停了下来。盖世太保驱赶着我们飞奔上了七楼。当时他们显得任务紧迫，因此不停地用德文喊着“lós! lós”“Lós!Lós!”（“快!快”）——在纳粹监狱和集中营中我们习以为常的命令——驱赶着我们跑步前进。

我们打开了房门，冲进我们十分尊敬的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家。我呼吸困难，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我焦急不安、紧张万分，因为我想到：随着他的寓所和藏书的‘被消灭’，盖世太保也许会在当天晚上还要消灭他的生命！我问自己：莫非这一切都在梦中？今天早上在去佩切克宫的囚车里，伏契克还指示我应该抢救那些书籍和笔记呢！

房子里的东西全被弄得乱七八糟。在我们到来之前，盖世太保早已经把整个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也许他们想找到共产党干部的金银财宝吧。衣柜敞开着，里面空无一物——这大概是伯姆一伙人干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某个囚犯被带去审问时，他会看见某个德国警官或者捷克密探穿着他的衣服。不等这个囚犯处决，他们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明火执仗了。

我迅速地察看了书架上的格子——伏契克向我暗示过，要抢救的书籍和笔记本大概放在什么地方。果然，我在一个格子里看到了一本书背上烫有《爱国报》金字的书。在不被人注意的一瞬间我迅速地把那本书抛在一旁，而其它的书则

统统扔进筐里，然后把它们抬下楼装到车上。回来后我又在书堆中间寻找，果然又发现了伏契克的笔记本。是的，正是这些装有硬壳封面的笔记本，上面还写着尤拉的名字和年月日。我也把这些笔记本扔在一旁。

盖世太保们在室内到处搜查。抢先的同伙万一把好东西落在房子里呢？有时候强盗也会忙中出错、丢三落四的呀！因此，盖世太保都单枪匹马地各自进行搜查，这样便放松了对我们的监视。随同我们来的盖世太保共有四人：三名警官和一名司机，司机也有监视我们的任务。然而通常是反过来我们监视他，因为我们必须提防所有的敌人。

我找到了别人寄给伏契克的一叠书信，伏契克和古丝塔的一些证件和文件。我把这一切都放进筐子里带到车上。突然，一位盖世太保决定把衣柜也一齐抬走。他这样做想必也出于无奈，因为他本以为可以搞到一个更大、更漂亮的黑市便宜货，但后来他的计划落了空。他忿忿地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因此，能搜罗些剩余物资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迅速把衣柜抬到楼下，装上汽车，然后向布拉格驶去。我们在斯巴达运动场附近新建的大楼前停了下来，把衣柜抬上三楼。当时天气炎热，我们累得满身大汗，然而从盖世太保嘴里听到的只不过是‘快抬，快，快！’的斥骂声。

我们把书运到了佩切克宫，然后把它们从车上卸了下来，我把自己的‘战利品’收藏好。我为我的成功而暗自高兴。当然，只要这些书和笔记本还留在佩切克宫，我的任务便没有最后完成。当务之急是：必须迅速找到把它们安全地

转移出去的途径和办法。虽然我事先已考虑到这一点，但这确实不那么容易。我对自己说，既然我能把这些东西带回到佩切克宫，那么我也一定能把它们送出去。

中午，盖世太保领我们去一楼吃午饭。我们吃的是煮干菜汤，我第一次觉得这个菜十分香甜可口。不久，我们又到伏契克家去取最后一批图书，那里见不到一个人影，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可怕的寂静也使我们毛骨悚然。我们装好了最后一筐书，向尤列克的写字台看了最后一眼。从此，他那丰富的私人藏书便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盖世太保就这样把伏契克所心爱的藏书全部销毁了。

晚上，当盖世太保把我们和伏契克同志一起从佩切克宫押回庞克拉茨监狱时，我没有告诉他查抄他家藏书的事。直到戒严令取消后，在米洛什·内德维耶德同志在场的情况下，我才把那个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后显得十分伤心。当时我们发现他情绪低落，精神状态和从前大不一样。那天，别的消息他再也不愿意听。此后不久，他便被押去受审了。

伏契克同志最心爱的一部分图书资料是抢救出来了。如果我们中的另一位杂役不那样胆小怕事的话，那么，别人写给伏契克同志的许多私人信件大部分也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可惜，抢救这些信件的努力没有成功。

在抢救伏契克同志的图书资料工作中，拉德利采牛奶厂所属的一个牛奶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奶铺就在紧靠着佩切克宫的弗尔赫利茨基公园里。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我们如果忘记了牛奶厂售货员博热娜·维塔斯科娃太太为我们

所提供的大力协助，那是不公正的。博热娜·维塔斯科娃太太是一位非常勇敢、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女人。她不怕困难，不畏强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直到1943年1月，她一直是我和外界的出色的联络员。我成功地把抢救出来的伏契克同志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偷偷地带到牛奶铺，因为警官克吕费尔不时带着我到那边去。到牛奶铺去的人绝大部分是盖世太保和佩切克宫的职员。当无人注意的时候，我便把书偷偷交给维塔斯科娃太太。然后，我的妻子再设法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还向克吕费尔建议，从伏契克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藏书里挑选一些供纳粹分子进行科学研究之用。我认为，这种办法也可以使伏契克同志的某些藏书保存下来。我的建议得到了采纳。我和佩皮克·帕察尔同志一起（他是卡尔林区霍夫曼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伏契克同志长期的合作者），把挑选出的书籍分别装进四个木箱，准备运往利贝雷茨。几天后，盖世太保的确把这些木箱寄给了设在利贝雷茨的党卫军司令部。解放后，寄往利贝雷茨的、满满的四木箱书却没有找到。

尤利乌斯·伏契克一生中悲壮的一页就这样结束了。”



1942年8月28日，这一天跟往常一样。对我来说，它所不同的是：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和命名日。在这样一个精神高度紧张、不断遭受折磨的环境里，我宁愿把生日忘掉。但是

尤列克并没有忘记它。那天早上，当盖世太保把我带进“400号”房间时，尤列克已经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每天早上7时至8时之间，他总是乘第一辆囚车到达这里。每一次，当我一迈进“400号”房间，我总是朝他的座位的方向先看一下。当我看到他坐在那边时，心里会感到踏实许多；当我发现他的座位空着时，心里总是充满了忧虑。有时候同志们会立即告诉我，尤列克正在受审。此刻我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担心盖世太保又将把他毒打一顿。有时候同志们也无法告知我有关尤列克的任何消息，因为他们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此刻，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那时节，在戒严令期间以及戒严令取消后，军事法庭继续存在，盖世太保随时都可能把任何一个人拉到科比利西刑场去枪决。当时的情况是凶多吉少、人心惶惶。虽然我默默地、安静地坐在长凳上，但是我的心时而猛然刹住，时而又急速跳动起来，热血涌上了太阳穴和脸上。

这样的危险每时每刻也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盖世太保可能突然了解到，我和叶林内克夫妇，和莉杜什卡、维苏希尔、卡雷尔（即杨·切尔尼）等人认识，他们也可能了解到我的工作情况。但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是一个“局外人”，因为盖世太保没有抓到我的任何把柄，同志们中没有人出卖我，我也没有出卖他们中的任何人，因此盖世太保还如同蒙在鼓里一样。

1942年8月28日那天，当我一迈进“400号”房间的门口，朝尤列克座位的方向张望时，我就看到了他。他向我微

微一笑，我则跟平常我们相遇时那样投给他温柔的目光。他翘起二郎腿坐着，右手慢条斯理地抚摸着胡子。只有扎卢斯基看守在这里值班。我刚一坐下，尤列克便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站到了我的旁边。他的座位与我相隔只有三、四步远，然而对他来说，走完这几步路比上高山还要困难。如果他要起身到坐在前面的某一位囚犯那里去（只是在个别情况下他才这样做），他便弯着腰向前走，尽量不让人发现囚犯中有人在来回走动。现在他已站在我的身旁。他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向我探过头来，此刻，在左面颊上我感到了犹如清风吹拂般的轻吻。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即逝的几秒钟之内。同时他还低声对我说：“古丝蒂娜！预祝你在来年的生日时将获得自由！”说完，他把一小张四方形的图画纸和一小块方糖塞到我的手里，然后迅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我们俩又各自坐在那里，相隔只有三米的距离，但我们却不能走在一起，我不能去拥抱他，向他表示感谢。我极力压制住盈眶的热泪，心里充满对他的感激与爱怜，可怜他落到了盖世太保的手里，而他们是决不会让他活着出去的。我深情地望着他，他正在向我微笑呢。他的笑容好似在对我说：不用着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一定猜到了我的心思了吧！？

我手里拿着他送来的礼品：一张小小的彩色图画，上面画着用蓝色的矢车菊、黄色的报春花和一朵红色的罂粟花组成的花束，花束上方是用黄色颜料写的日期和落款，它们组成了一个半圆形。日期和落款是：“1942.8.28.送给古丝塔，尤列克赠。”整个画面用金黄色的框框装饰着。

在图画的右角上我看见了几乎无法辨认出来的两个字母“Z.D.”^⑥我微微侧着头，朝雕塑家兹登涅克·德沃夏克同志座位的方向望去。他应该是背对着囚犯，因为他坐在正前方靠墙的一张写字桌旁。但是，他常常侧着身坐在那里，面前放着狱吏们请他画的画。他不时地抬起头，望着铁窗外面的列特纳山坡出神。

囚犯们常常请兹登涅克·德沃夏克同志办这办那，他总是欣然接受、乐于从命。在“400号”房间里，他是唯一可以偶尔来回走动的人，比如：到洗脸池旁边去洗一洗调色盘和画笔。在来回的路上他常常在某个囚犯的座位旁稍稍停留一下。他在完成着伟大的、值得称颂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兹登涅克朝我看了一眼。我一只手拿着那张小画，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指了指他，接着又指了指画。不错，这画的作者就是他。他亲切地作了一个鬼脸。他从我的眼睛里明白了我的问题：“你怎么敢画这个？”而我也在他的眼睛里找到了答案：“喏，就这样画呗！盖世太保什么也没有发现，你也是一无所知罢！我和尤拉是有意让你惊喜一场的。你瞧，我们不是如愿以偿了吗？”

尤列克的那块方糖又是从哪里弄来的呢？当时，囚犯们还无法收到任何邮包。盖世太保又不允许他们的亲人前来探监。至于尤列克和我，我们就连写上一封下面这样“官样文章式”的家信也遭到盖世太保的禁止：“我们一切都好，望勿悬念。即使以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得不到我们的消息，你们也不用为我们担心。”在最初的日子里，是谁给我们寄来

了内衣？到目前为止尤列克的双亲和妹妹们都还没有得到我们的消息，那么是谁在关怀着我们呢？

我想向尤列克打听一下那块方糖的来历。他就在我的眼前，然而相隔又是多么遥远。我仿佛是在用望远镜看着他，他虽然近在咫尺，但是我却无法听到他的声音。我必须等到中午，当我们集合去吃午饭时，才能向他问个明白。

关于那张小画的历史还得补充几句。当时我翻来覆去地想：怎样才能把它带回到牢房中去。当盖世太保把我们从佩切克宫押解回监狱时，每一次都必然要对每一个囚犯进行严格的全身搜查。此刻，女看守便会仔细检查我的衣领和裙边，把手伸进我的口袋，两只手搜查我的全身，有时还命令我把鞋脱掉，生怕我把一根火柴头、一根铅笔、一小块报纸、一根香烟或一丁点儿食物带到牢房中去。不过，囚犯把亲友的来信带到牢房中去还是允许的。

狱中的书信来往是极其罕见的。尤列克在庞克拉茨监狱所度过的十四个月内获得批准投寄的家信前后总共只有四封。寄给囚犯们的每一封信则首先必须经过盖世太保的手。如果信的内容没有触犯他们的法令或者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盖世太保便在信上加盖带有“Geprüft”(验讫)字样的公章，然后把信交给囚犯。

如果要把小画带回牢房，它必须加盖上述公章才行。这一点扎卢斯基可以办到。午饭后，当盖世太保把我们押送回“400号”房间时，尤列克便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请求。他从抽屉中取出公章，把它交给了尤列克。尤列克朝我点了一下

头，我拿着小画跑步走到写字桌前。他在小画的背面上盖上公章，然后把放在桌子上面的一支蘸水钢笔拿在手里，看了扎卢斯基一眼，而后者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接着，尤列克便在公章上签署了日期和潦草难辨的名字。现在对我来说，这张小画已变得倍加珍贵。我把它带回到查理广场狱中，在那里它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们离开该监狱为止。盖世太保在把囚犯们转运至一个秘密地点之前，他们把尤列克被捕时扣押的东西——手表、钱包、小皮夹子等物取了出来，让他寄回家去。我把那张小画也放进我们的包裹里，然后寄给了莉巴。今天，那张小画依然挂在我房间的墙壁上，挂在马克斯·什瓦宾斯基^⑦所作的尤列克肖像旁边。



1942年夏天，有一次（那是在宣布戒严令以后），“400号”房间里突然活跃起来。捷克的和德国的盖世太保来回奔跑着。我们估计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但愿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没有落入魔掌！我们都非常担心。然而整个上午我们都未能打听到任何消息。直到下午，瓦茨拉维克才听说了一些，雷内克·特林格尔也听说了一些（特林格尔是杂役中唯一能在五楼和一楼的走廊上自由走动的人），另外，捷克看守莱布内尔也把他们所听到的消息告诉了我们。这样，我们才逐步得知了：盖世太保曾到小城区去逮捕某位同志，带队的是弗里德里希。据说，他们赶到时一位同志正在用油印机印刷地下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他们围上去要逮捕他，他掏出

手枪射击。子弹击中了弗里德里希的腹部，那位同志便成功地突围了。到底还是有人狠狠地把他教训了一顿！长期以来，他干尽了折磨和枪杀我国人民的坏事。

第二天，瓦茨拉维克走了进来，大声告诉扎卢斯基说，弗里德里希的伤势不重，子弹仅仅擦破了他的肚皮；他在医院里做了手术，他们把他的盲肠也一并摘除了，一个月之内他便能出院。真是可喜可贺啊！

盖世太保把一大箱东西抬进“400号”房间，这些东西是从拒捕后逃跑的那位同志处缴来的。当一个盖世太保打开皮箱时，尤列克在动荡的1938年夏天写成的小册子《红军会前来帮助我们吗？》首先映入眼帘。这本小册子放在共产党地下报刊、杂志和第一共和国时期的进步书籍的最上面。同来的盖世太保把它拿在手里，意味深长地看着尤列克。

后来，内尔格尔命令尤列克给箱子里的书报编写摘要。我还记得，尤列克花了大约三周的时间才把它搪塞过去，但同时他仔仔细细地阅读了全部书报。从箱子里的材料可知，它的主人是某位姓德拉日尔的同志，他的职业是饭馆的服务员。我们大家都不认识，也不想去认识这位德拉日尔同志。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他在敌人追捕时成功地逃脱了。我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却保全了自己的狗命。

然而，在弗里德里希这个刽子手重新回到“400号”房间以前，盖世太保竟抓到了德拉日尔同志，并把他带了进来。据说，当他们把此事报告了还未“上班”的弗里德里希后，他允许他们提审德拉日尔，但是他又传下话说，他要亲自来

收拾这个人。几天后，弗里德里希又出现在“400号”房间。他身体结实，活象个凶神恶煞。现在，被他提审的同志们要吃更大的苦头了。弗里德里希首先提审了德拉日尔同志，把他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他要报复，因为德拉日尔同志竟敢把他打伤。他要报复，因为德拉日尔同志胆敢溜掉，害得盖世太保们费尽心机才把他捉拿归案。他要报复，因为德拉日尔同志死不交待印刷地下报刊的材料（手稿和纸张）的来源，以及印好的东西他又交给了什么人。他要报复，因为他发现：德拉日尔同志常常把他带去搞假接头。盖世太保们担心德拉日尔同志重新跑掉，因此给他带上脚镣，用车押送他到接头地点。而德拉日尔同志却故意甩动两腿，把脚镣弄得当啷作响，以免自己的同志落入敌人的圈套。

“400号”房间的同志们尽一切可能去减轻德拉日尔同志的痛苦，他们送给他止痛药、一支香烟、一小块面包。“400号”囚犯们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他都能够忍受。我们非常敬佩他那无所畏惧的勇气。每当他在提审完毕后被押回“400号”时，他总是昂首挺胸、紧握拳头，向我们表示：他决没有丝毫的动摇！但是，他的脸却日益显得苍白和疲惫不堪，双眼也越发凹陷进去。后来，他实在无法忍受非人的酷刑，结果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推倒了一张铁床，让它砸断自己的脖颈而自尽了。

1942年夏天，戒严令取消后不久，有一次，盖世太保纯属偶然地在街上逮捕了我们的一位同志。在对他进行全身搜查

时，盖世太保找到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着约二百名布拉格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的名字，各个名字下面还开列了所捐献的钱数，订阅地下刊物的书报费，以及资助被迫害的捷克爱国者的捐款数目。

盖世太保开展了大搜捕。它的总负责人是伯姆。“400号”房间开始挤满了身穿灰黑色制服的司机和售票员。被捕者人数之多使人回想起了“库比什案件”^⑧，当时，在海德里希被暗杀和刺客的名字被透露出去以后，盖世太保在整个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逮捕了所有姓库比什的人。这些嫌疑犯挤满了所有的监狱。当时，盖世太保甚至逮捕了刚满四个月的小孩，还在“400号”房间里把他的名字登记在被捕人员名单上，原因是：这个小孩也姓库比什。实际上，绝大部分姓库比什的人彼此互不相识，他们更不知道有关刺客的消息。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们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同姓的人竟有如此之多。然而，这一切对盖世太保来说都无关紧要。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必须把姓库比什的人从地球上消灭掉。

尤列克是直接从被捕的同志那里得知司机和售票员名单的。每当盖世太保逮捕了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名反纳粹战士时，他总是深感惋惜；而每当我们把这名最普通的战士从盖世太保的魔掌中抢救出去时，他又是多么地高兴啊！他认为，援助被捕者进行狱中斗争这是共产党员的天职。只要他一息尚存，就决不放弃斗争。

当值班的捷克看守们在玩着扑克牌的时候，当盖世太保

在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根据缴获的名单搜捕电车司机的时候，尤列克低声地和米拉·内德维耶德交谈了几句，后者又把话传给了雷内克·特林格尔，雷内克又告诉洛伦茨、瓦舍克·雷泽克、兹登涅克·德沃夏克和维苏希尔，洛伦茨再把话告知了我，而我又把话传给杭兹尔。我们这些人的任务是：当被捕的司机和售票员们坐在或者站在我们附近时，或者当盖世太保领我们上厕所时，或者当我们呆在囚车里时，我们要告诉这些被捕的人：他们要一口咬定说，名单上所列举的钱数是他们捐赠给穷人、失业工人和老人的救济金，他们对地下活动一无所知，他们从来没有接济过任何受追捕的人。他们这个口供要坚持到底，决不更改。

不久，盖世太保开始把电车司机们押送到“400号”房间。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对他们的审讯无法立即开始。杂役们得到命令，要他们填写事先印制好的被捕人员表册。轮到填表的电车司机必须站在杂役面前，其他的人暂时坐在长凳上或者站在墙边等候。每一个杂役大声询问着被捕者的履历，而被捕者必须逐一回答。如果回答的人不向那位杂役弯下腰去，杂役便装成没有听懂一般，又把问题重复一遍。当被询问的电车司机向他探过头去时，杂役便立即低声告诉他，盖世太保提审时他应该准备怎样的口供。

坐在后面的尤列克跟坐在他前面的那些人低声地说着话，替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米拉·内德维耶德也前来帮忙：他站在洗脸池边往茶杯中放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盖世太保们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尤列克和坐在他旁边的人在干

什么。这样，在“400号”房间和囚车里，在杂役们的帮助下，甚至在庞克拉茨监狱，我们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这一共同工作的结果是：从大约二百名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中，有一百五十位左右不久便获得了释放。当尤列克看到他们一批一批获释时，他不停地抚摸着胡子，眯缝着眼睛，露出十分满意的神情。

在被捕的司机和售票员中间有一位其貌不扬的男人，他身穿用深色线缝制的浅灰色毛料制服。后来，他的这身服装使我们弄清楚了他的本来面目。一天，一个德国盖世太保带着一封信来到“400号”房间，吩咐要把它译成德文。负责这件工作的雷内克看完信后，装成天真无邪的样子大声地问捷克看守：“扎卢斯基先生，您记得不记得有一个叫马舍克的人？”扎卢斯基想了想，但是他并没有想起这个人来。雷内克便把头从桌子上转向囚犯，又大声地问他们说：“你们中有人认识叫马舍克的吗？”这时，一个囚犯如同学生一样把手一举，接着说道：“我认识一位电车司机，他也叫这个名字。”雷内克又问：“这个司机住在什么地方？”“他住在庞克拉茨区。”另一位司机补充说：“马舍克也被捕了，不过他现在已经放出去了。”“您记不记得他的样子呢？”“他小个子，年纪稍大，头发花白，穿一身用深色线缝制的浅灰色毛料制服。”我们中有好几个人都想起了他。这个家住庞克拉茨区的马舍克在给盖世太保的信中写道：他信守获释时许下的诺言，他现在把布拉格有轨电车司机和售票员中煽动反帝国活动的、首要的共产党员名字开列如下……我还记

得，在马舍克向敌人告发的名单中，就有乌赫尔同志^⑨的名字。此后每一位获释的司机或者售票员都从难友们那里得知，马舍克是一个告密者。



1942年8月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在继续向前推进。当时他们正从四面八方对斯大林格勒发动进攻。希特勒吹嘘说，九月份他们必将拿下这个城市。盖世太保们都陶醉在他们所幻想的、即将取得的胜利之中。我们囚犯们却怀着坚定的信念：总有一天，红军必然会给纳粹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九月初，希特勒宣称，斯大林格勒已被攻占。尤列克以巨大的关注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尽力捕捉着有关红军和法西斯国防军争夺这个神话般的城市的信息，他从新来的囚犯那里，从瓦茨拉维克和扎卢斯基那里，同时也从反面，即从施刑者那里探听各种消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紧张的日子里，盖世太保又把佩切克宫所有办公室和牢房中的收音机打开，以便使囚犯们也能听到有关斯大林格勒陷落的专题广播。然而，收音机里仅仅播送着被击沉船舶吨位的报导。

当时，只要我能和尤列克说上几句话，我们谈话的中心便是英雄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它是千千万万的难友们日夜思念和谈论的城市，因为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是通向自由的关键所在。尤列克从没有怀疑过，即使要付出最大的牺牲，苏联军队和苏联人民也决不会让斯大林格勒落入纳粹

之手。他还向其他难友进行宣传。他是多么熟悉苏联，熟悉她的人民和斯大林格勒的历史，而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个城市已经成了苏联人民胜利的象征。

秋天，在尤列克被囚禁了四个多月之后，盖世太保第一次准许他给家里写信。1942年9月4日，他在给爸爸和妈妈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亲爱的人们，我问候并拥抱你们大家。谢谢你们寄来的内衣和上装，我穿起来都非常合适。令人担心的是，我这张不太雅致的脸配上黑色的衣服恐怕够吓人的。当然，深色的衣服今后将更为实用。因此，如果你们能把那些旧的、黑色的衣服给我修补一下，我将非常感谢你们。

我和古丝蒂娜的身体都很好。你们不用为我们担心。请你们来信谈谈你们的情况：爸爸、妈妈好吗？我两个尊敬的妹妹和她们家里好吗？我们家的小山雀和小燕子现在怎样了？我的地址是：

布拉格Ⅰ，布雷多夫斯卡大街20号，

国家秘密警察424办公室

尤利乌斯·伏契克 收

你们还可以到上述办公室向警官先生申请探监。如果你们未能立即得到回音，也请来信告知一声。好了，我再一次多多地问候你们，吻你们。再见！

你们的尤拉。”

盖世太保“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外面的人，生怕他们收到自己亲人从纳粹监狱的来信时会大吃一惊。因此，获准写信的囚犯必须按照事先印好的一份“家书范本”去安排书信的内容。这样一来，囚犯们从佩切克宫寄出来的所有信件总是千篇一律。尤列克不愿意使妈妈、爸爸和妹妹们伤心，因此在他写的信里充满了无忧无虑的气氛。然而，这封信还是使家里的亲人们痛哭了一场。

1942年9月14日全家给尤列克写了回信。妈妈第一个这样写道：

“心爱的儿子！接到来信，惊喜交集。感谢上帝，我们大家平安。今年，我们家的小山雀没有回来，虽然我们这里的小山雀还是相当的多。小燕子常常坐在房顶上和电铃线上呢呢喃喃。你知道，我们一直是在回忆中过日子。现在，这里的天气好极了，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工作很忙，因此日子过得飞快。耶里克还是老样子，它连一只小耗子也不会放过。好了，我们的重要消息都告诉你了。尽早给我们回信！你爸爸也要写几句话。我必须给他留些地方。多多地问候你，吻你，你的母亲。”

爸爸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尤尔恰！我钓到鱼时便想起了你。我虽然能够走动，但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如果把那条病腿锯掉，那也是不足为怪的。这里没有什么新闻。一切如故。衷心问候你，爸爸。”

尤列克的大妹妹莉巴写道：“敬爱的尤尔卡！接读来信，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虽然来信不长，但没关系，我

可以反复看它几遍。现在我几乎能背诵它了。给你的衣服合身，这使我很高兴，同时，我们将把你要的深色衣服赶制出来。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厚实的毛袜子，由于天气暖和，所以暂时没有给你寄去。你需要什么，请来信告诉我，我想，你大概需要冬天穿的长衬裤和便鞋。你需要不需要运动裤和毛衣？你瞧，我的问题太多了吧！？我能把孩子们的照片寄给你吗？你恐怕已无法认出他们来了。我还是跟从前一样，身体瘦弱不堪。现在我正在学骑自行车。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学会骑车。你知道，我这个人笨手笨脚，结果，把自行车、把自己和所有的亲友好都折腾得够呛。现在，我总算能独立骑车了。不过，细说起来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哩！你真好，你还回忆起了我们家的小山雀。它们今年没有回来，这是因为雨水灌进了桌腿的缘故。好了，再见。深深地吻你，盼望你早日回信。你的莉布卡。”

尤列克的小妹妹这样写道：“敬爱的尤尔卡！这是我出生以来给你的第一封信，虽然我已经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日子过得飞快，对吗？自我出嫁以来，不觉已过去了两年，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孩子，虽然我很想当妈妈！我必须等到情况有所好转后再说。我喜欢唱歌，因此，乘自己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参加了城市剧院的工作，当上了话剧和喜歌剧演员。当然，我仍旧使用出嫁前的闺名。我们盼望着你的来信。我们大家再一次热烈地问候你、吻你。很快会有人去看望你的。你的薇拉。”

这些来信并没有流露出伏契克全家人拿起笔给尤列克写

信时的焦虑不安的心情，同时也没有泄露为什么他们都挑选了这样的话题，这些话题与大家极想知道的尤列克的生活和思想情况相距是多么遥远！

九月，伯姆警官首次同意让尤列克的两姐妹前来看望我们。对于她们的探监，我与其说是感到高兴，还不如说是感到担心，我担心她们言多语失，生怕她们也被抓了进来。当盖世太保波希克把尤列克和我带到伯姆的办公室时，莉巴和薇拉已在那边等候。自1940年夏天算起，两年来，这是她们第一次见到尤列克。两年前，尤列克晒得黑黑的；两年前，他、我和薇拉在霍季姆涅日村住宅的院子里玩汽枪射击比赛，他的枪法真可谓百发百中；两年前尤列克还没有留胡子，而现在他脸色惨白，而且长着黑色的胡须。两位妹妹还似乎觉得，两年来他好象又长高了一些。两年前的夏天，尤列克在道路上或者在林子里跑呀跳的、身轻如燕，而现在走起路来却是一瘸一拐的，因为刑讯时留下的创伤还没有痊愈。

尤列克对两位妹妹的到来十分高兴。虽然，在场的伯姆监视着我们四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但是，尤列克举止从容，谈笑自若，好象他根本就没有看见伯姆一样，好象两位妹妹是在布拉格我们的寓所探望我们一般。尤列克必须给妹妹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在佩切克宫盖世太保这里仅仅是暂时歇歇脚而已，甚至可以说他不是盖世太保司令部，而是在某一个地方进行访问，不久，他将继续赶路，比如，到他心爱的高山上去远足。尤列克是会见时的中心人物。他用快

活、轻松的语气说出来的头一句话使凝聚在空气中的悲惨气氛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了：“啊，姑娘们，你们给我们送什么好东西来了？”接着，他当着伯姆的面请她们坐。起初，两位妹妹极力抑制住眼泪，惊讶地看着尤列克。但是，尤列克谈笑自若的神情使莉巴暂时地恢复了往日快乐的天性。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生怕沉默下来她便会痛哭一场。而薇拉则一言不发，因为如果她一开口说话，便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莉巴谈到了孩子们，以及霍季姆涅日村和耶里克的情况，她给我们带来了煎肉排，尤列克津津有味地饱餐了一顿；她还给我们带来了香烟，我也兴致勃勃地抽了起来。尤列克询问了妈妈的情况，她在霍季姆涅日村是否依旧不停地整修小路；他还关心着房前的小蔷薇花，他问爸爸是否还去钓鱼——谈话的确是无拘无束的。突然，伯姆装成随便问问的样子打断了尤列克的话说：“你们两位最后一次见到你们的哥哥是在什么时候？”他用尖刻的男低音操着捷语问道，希望立即能得到回答。莉巴略略考虑了一下说：“那是在1938年的圣诞节。”说完，她又转身对着尤列克问道：“尤尔恰，你想不想吃李子馅包子？我知道你可喜欢吃了！”尤列克当然说想。接着莉巴又问伯姆：“先生，我们下次能不能带李子馅包子来？”她称呼伯姆时总是只叫他“先生”。伯姆点了点头。我们都感到非常惊奇，但是，莉巴却抓住时机说，她要从比尔森家里把它弄来，天一亮就烧好它，放在铝锅里，用布裹好，免得凉了。伯姆提醒说，过十四天以后她才能再来探监。

十五分钟的探监时间飞也似地过去了。伯姆站起身来通知我们，谈话到此结束。尤列克的两位妹妹在离开之前和我们拥抱、吻别。此刻伯姆严密地注视着我们，生怕我们咬着耳朵说些什么。我们把食物和香烟带回“400号”房间以后便分给了难友们。

此后，她们还来看过我们两次。1942年秋，我在纳粹占领时期最后一次见到莉巴和薇拉。1943年春，尤列克还和她们见过一面，那是在佩切克宫对面的法庭侦查员办公室里，盖世太保在把尤列克押往德国的鲍岑监狱以前把他交给了那位法庭侦查员。

一次审讯时，伯姆问我：“您丈夫是干什么的？”“我们一起翻译东西，”我回答。伯姆根本不相信我和尤列克的话，我们说，为了躲避盖世太保，尤列克一直是住在德伊维采区我们的寓所里的，因为米雷克——克列仓已经交待说，尤列克曾经住在巴克萨夫妇家中。尤列克极力希望能向伯姆证实自己是正确的。前面已经谈到，我有过一次机会对尤列克说，我把一册秘密出版的《联共（布）党史》放在家里了。他想，这本书可以为他提供有力的证据。问题是：他必须事先知道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这就要求我必须较详细地讲给他听，这样一来就不只要花上几分钟、而是要花上整整两天的时间，但是当时我们又很难在一起作较长时间的交谈。1942年4月，我把《联共（布）党史》带回家以后，便把其中一册放到存放政治书籍的黑色书架的格子中去了。这

里似乎一句话就能把问题讲清楚。但是，其它灰颜色的书架我们有好几个。1940年夏天，当尤列克离家出走时，黑色书架放在靠门的地方。后来我把所有的书架都移动了。现在的困难是：我必须向尤列克说明，黑色书架现在放在哪里，放在哪一个位置上。当我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向他描述了一番之后，他告诉伯姆说，在我们寓所保存着一册《联共（布）党史》，他还准确地说出了它所在的位置，在哪个书架上的哪一个格子里。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联共（布）党史》和所有的书架早已经不复存在，盖世太保已经把我们的住宅彻底捣毁了。

1942年秋，有一次，伯姆把提审后的尤列克押回“400号”。当他一走了出去，尤列克便猫着腰走近我的座位（当时只有扎卢斯基看守一人值班），低声告诉我说：“古丝蒂娜，他们可能要放你出去了。”

我觉得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低声回答说：“他们为什么要放我出去？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房子和一切东西，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尤列克低声说：“如果他们真的把你放出去呢？那时你更要格外小心，别给他人造成不幸。”我对他说的话还是莫名其妙。他接着说：“他们想把你变成他们的诱饵嘛！”

我心里一怔，略加考虑了一下回答说：“尤列克，我不愿他们放我出去。你走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他对我说：“放冷静些！当然你绝对不会当他们的诱饵的。因此我

现在告诉你，以便在伯姆提出这样的建议时，你思想上能有所准备。我再去和米拉·内德维耶德商量一下，看你假装得一种什么病合适，以便在他们真的放你出去之后，你使用不着再到这里来走动。”说完，他弓着腰回到了他的座位上，而我的心里却乱成了一团。当诱饵——就是说和外面的同志们接上关系，然后到盖世太保这里来探监，告诉尤列克，我和谁谈了话，我和哪个人都说了些什么，以便让窃听我们谈话的盖世太保去逮捕一批又一批的同志！

第二天，伯姆来到“400号”，把尤列克和我叫去审问。他把我们俩带到他的办公室里。他指着一张椅子请我坐下。我心里想，他今天怎么突然变得彬彬有礼起来。他打开香烟盒，请我吸烟。我拒绝了。我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名堂。然而他不知道，尤列克早已经给我打了招呼。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尤列克在一旁站着——脸上露出了友善的神色，接着用捷语对我说：“伏契科娃太太，如果我们把您放了，您打算干什么？”

我盯着他的两眼瞧了一下，坦然自若地回答：“我去工作。”

“嗯。您能不能每隔一天或者每天都到我们这里来看望您丈夫，跟他谈谈您在做什么，您常常到哪些地方去，跟谁来往……”

“警官先生，”我打断他的话说，“你们最好是把我丈夫放了，把我留下！”

伯姆由衷地笑了起来，就象是我说了一句饶有风趣的俏

皮话一般。我的话也把尤列克逗得哈哈大笑。然而我的的确确是这样想的。

后来，伯姆又把我们送回“400号”房间。

尤列克向米拉·内德维耶德打听，如果盖世太保真的放我出去，我应该假装得了什么病，这样我便能避免再到盖世太保司令部来。当尤列克想到我很可能离开这个地狱时，他感到十分高兴；而我却担心这将成为事实。米拉·内德维耶德博士考虑了一下，认为最好是装成得了神经错乱症。此后，他陆续告诉我装病时的注意事项，发病特征等等。为了这一切，我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但是后来伯姆再也没有问我，如果我获释，我将作何打算。我则宁愿呆在监狱或集中营里，而决不（哪怕是间接地）去充当盖世太保的诱饵。

稍后，伯姆曾多次向尤列克保证，说他们会放我出去。1943年6月14日，尤列克从鲍岑候审监狱给家里寄来一信，该信是由布拉格盖世太保检查后转寄的。他在信中写道：

“我是带着秘而不宣的希望离开布拉格的，但愿古丝蒂娜能平安出狱。管我的警官曾再次向我保证，他一定会释放她。我希望他的这些话不仅仅是我出发前对我的‘安慰’而已，也许她正在和你们一起阅读我的这封信了。假如她没有回来，请你们争取去看看她，替我拥抱她……”

尤列克的这几行字大概就指的是那个无耻的盖世太保的诺言。但是从字里行间可知，尤列克并没有相信他的鬼话。

阿尔诺什特·洛伦茨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子旁边，这个位

置正好在两扇窗户的正中央，终日不见阳光。我和他一样，整天面对着那堵阴暗的墙壁。我这个座位是维科娃同志被处决以前常坐的地方。在洛伦茨的桌子上摆着一台打字机，他不时地敲打几下，就象一位蹩脚的钢琴手断断续续地弹奏着乐曲。

一天早上，我和阿尔诺什特发现，在我们前面的墙壁上突然挂着一个温度计。难道说，盖世太保会对我们的健康如此关怀备至吗？其中必有名堂！我们开始怀疑这是他们安装的窃听器。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在交谈时必须把声音压得更低些，我们还常常用手遮住自己的嘴巴。阿尔诺什特背对囚犯们坐着，但是任何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熟悉每一位被捕的男女同志。他也随时准备着心甘情愿地去完成交给他的传递消息的任务。他从不惊慌失措。尤列克常常把捷克看守莱布内尔带给他的报纸偷偷地塞给阿尔诺什特。而他则把它放在自己的桌子上，上面再用一张干净的纸把它盖好，然后掀开一点盖在上面的纸，细心地读起报来；如果某个盖世太保走进“400号”房间里来，他便立即用上面的干净纸把报纸盖好。1942年夏天，我们看不到任何鼓舞人心的消息。然而在囚犯们中间，也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对苏联必将最后战胜希特勒的信念产生过动摇。

阿尔诺什特工作十分积极。他从“400号”房间和监狱里把情报和他对下一步反占领者斗争方针的建议送给监狱外面他那个小组的同志们。他用密码（用数字）书写夹带。我替他抄写，以防盖世太保认出他的笔迹。他善于把这些情报妥

善地藏在内衣中从庞克拉茨监狱送出去。有时候，夹带是由雷内克·特林格尔带到佩切克宫的一楼，把它交给捷克司机基杨内克，后者再把它投进外面的邮筒。有时候，阿尔诺什特或者其他囚犯的夹带是由尤列克塞进瓦茨拉维克的口袋中，瓦茨拉维克再把它送出去。收件人是阿尔诺什特的妹妹，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她也不时地到盖世太保司令部来申请探视她的哥哥。

1942年11月7日，苏联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绝大部分的囚犯都寄希望于苏维埃国家，坚信只有她才能帮助我们万恶的纳粹占领者驱逐出去。他们坚信，苏联将给我们民族，也将给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带来自由。这样想是很自然的，如同我们自然要吸进新鲜空气一般。我们感觉到，在抗击希特勒的斗争中，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和苏联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我们深信，苏联军队、传奇式的勇敢的苏联人民必将象开创11月7日这个伟大的节日一样开创出另一个伟大的节日——彻底打败纳粹第三帝国的日子。如果某位囚犯对这一信念一时产生了动摇，那么，他的难友们会立即帮助他重新树立起这样的信心。

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靠不住的。早在一年前，丘吉尔就已经答应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第二战场在哪里呢？只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任何诺言——哪怕是说得天花乱坠的诺言——从来都未能使人免遭苦难。能够拯救朋友跳出苦海的只有行动，而苏军正是以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尤列克还定期为囚犯们编辑新闻提要。他的消息来源有二：一方面由瓦茨拉维克和新来的囚犯提供，另一方面从盖世太保送来翻译的、地下出版的共产党杂志中收集。在一楼吃午饭时，在只有杂役们才允许进入和彼此能够交谈的走廊上，米拉·内德维耶德、洛伦茨、雷泽克、雷内克和什普林格尔——他们都是编辑委员——又把其它的消息告诉尤列克，尤列克再把他脑子里汇总编辑的新闻提要提交这个编辑委员会批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在囚犯中间刹住不负责任地传播各种小道消息、传播各种不真实的和毫无理由地过分乐观的消息的歪风。在“400号”房间里，在囚车里，在牢房里，或者早晨当男犯们在走廊上刮脸时（如果是赫费尔，或者是科林斯基，或者后来是捷克警察荷拉值班时），同志们便把这个新闻提要的内容向难友们进行广泛的宣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来到了。铁窗外面天色阴沉。但是对“400号”的囚犯们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早上，当盖世太保波希克把我带到“400号”时，我发现尤列克已经坐在靠洗脸池的椅子上。波希克走下楼去继续押解犯人，这里只剩下扎卢斯基和我们。尤列克看了我一眼，我们俩的目光碰在一起。他把一只手举过眉梢，握成一个拳头。这是节日的问候！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放了下来，向我微微一笑。又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正望着铁窗外面出神，他的思想飞向远方——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怀着战胜法西斯匪徒的坚定信念，

正列队行进在红场上。“400号”的长凳上坐满了人。我看见尤列克在向旁边的难友耳语着什么，接着那位难友又把话传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又把话传下去。“十月革命周年纪念！”这句话一传十、十传百。等候着残酷审讯与非刑拷打的囚犯们脸上露出了庄严的表情。“400号”房间——这个刑讯室的前厅——渐渐变成了闪耀着囚犯们坚毅目光的大厅，那些炯炯有神的眼睛好似在对你说：是的，即使我们要向死亡走去，我们也将永远忠于社会主义思想！

尤列克向捷克看守扎卢斯基耳语了几句。当时没有盖世太保在监视我们。在庄严肃穆的气氛里突然响起了“起立！”的口号声。我们立即心领神会。大家都兴冲冲地站了起来，默默地立正站着。我们在心里唱起了国际歌。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向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她的军队和人民致敬，宣誓永远忠于十月革命的思想。我们就这样在佩切克宫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庆祝了苏联二十五周年国庆。

当尤列克日复一日似乎无所作为地呆在“400号”房间里时，那些前来提审囚犯或者把审讯完毕后的犯人押送回“400号”的盖世太保们，必然会注意到尤列克审察着他们一举一动的眼睛，必然会发现他那惹人注目的神情。有些盖世太保认为让他闲着没事太便宜他了。因此，一个盖世太保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当时是战争时期，物品奇缺，连手纸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利用囚犯去解决物品短缺的问题嘛，”那个盖世太保这样说，最后他竟选中了尤列克去承担这个任务。

盖世太保拿来了很薄的办公用纸，命令尤列克把它折成手纸形状。我听后真是火冒三丈。但是尤列克却称心如意地微微一笑。他起先轻轻地摸了摸黑胡子。他的任务是折纸，他便无法再把纸拿在手里，因此，他请坐在他前面的囚犯帮忙。折好的纸还必须找个地方放起来才行。扎卢斯基的桌子很合适，但是，干嘛尤列克要自己动手呢？他又请了另一个囚犯也来帮忙。而囚犯们都非常热心，因为此刻他们可以不担任何风险地和尤列克谈话。许多囚犯正是这样取得了直接和他接触的机会。一遇机会，他们便把凳子靠得更近些。而这样的机会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比如，当盖世太保押着我们去上厕所或者吃完午饭后把我们押回“400号”时，囚犯们可以离开原来的座位坐到别的地方去。尤列克的工作让盖世太保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尤列克曾帮助许多囚犯互通了口信，在他的协助之下又有多少人把消息送出了监狱！不过好景不长。几天后伯姆注意到，尤列克正背着他在进行活动。谁布置他折手纸的？差不多所有的盖世太保都怀着醋意地加紧了对自己负责的犯人的控制。而尤列克是归伯姆主管的犯人。“谁布置你这样干的？”他问尤列克。尤列克天真无邪地回答说：“绍埃尔万先生。”伯姆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不一会儿绍埃尔万走了进来，把布置尤列克干的“全部工作”收走了。他也是一言不发地出去了。囚犯们心里明白，那两个盖世太保肯定在办公室里吵架了。

就这样，尤列克显赫一时的工作在干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就完结了。他和其他的难友都深感惋惜。

1942年冬的一天，弗里德里希和维尔克走了进来，命令“400号”的全体囚犯集合整队。我们疑惑不解地面面相觑。不久我们便明白了其中原因。原来盖世太保要搬家。在走廊上他们把我们分成三个组，然后把每一个组分配到不同的办公室去搬东西。弗里德里希分组的原则是：尤列克和我不得分在同一个组里。我和另外三个囚犯分到弗里德里希的办公室干活。当我们把大衣柜从办公室里抬出来时，藤条和棍棒象雨点般地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最后连棍棒都打折了，藤条的两端也抽打得如同开了花一般。的确，每当弗里德里希拷打囚犯时总要使用棍棒或藤条。而当他给囚犯们几棍子或抽上几藤条之后，在他们的身上必然会留下道道伤痕和斑斑血迹。当我们这些囚犯暂时地呆在一起时，每一个在弗里德里希手下干活的人便会立即走上前去，看一看哪根棍子或藤条曾经抽打过自己的身躯，看一看它们中的哪一根还沾满了自己的鲜血！而且叫我们大家无法理解的是：弗里德里希为什么还要把这些凶器精心珍藏起来。

我们把办公室的家具搬到走廊上。我不时地看见了尤列克，他正在和别的囚犯一起抬桌子，或者抬卡片柜，或者搬椅子。在他的安排下，我们故意拖延时间。每搬动一件家具，都得花上半天工夫。当囚犯们正在议论警官们还需要哪些家具时，尤列克说：“你们先等一等，现在我要告他们去。”接着，他向监视我们工作的捷克盖世太保提出，他有事要向他的警官报告。原来，尤列克探听到：其他警官把伯姆负责的犯人调去搬家，伯姆本人是根本不知道的。捷克

盖世太保果然把伯姆叫来了。尤列克向他报告说，他的犯人正在为别的警官搬家，这件事他知道不知道。起初尤列克的“胆大妄为”使伯姆真有些不知所措，接着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囚犯，果然全都是他负责的那些犯人。他冲着我们大叫一声：“集合！”接着命令说：“齐步走！”于是，他又把我们领回到“400号”房间。

1942年10月中旬左右，党卫军分子门茨尔——佩切克宫一楼候审室的残暴统治者——来到“400号”房间，要求扎卢斯基派几个男囚犯给他。扎卢斯基挑选了尤列克、米拉·内德维耶德、维苏希尔、兹登涅克·德沃夏克、杭兹尔、雷内克和雷泽克。他们出去以后，半天我都没有再看到他们。

第二天早上他们全又回到了“400号”房间。我抓住有利时机，起身到尤列克坐在旁边的洗脸盆处去“喝水”。“昨天你们干什么去了？”我问道。“腌白菜去了，”他悄悄地回答，一边用手捋着胡子。“他们吃腌白菜时，如果白菜会开口说话那才有意思哩！”当我们排队去吃午饭以及下午只由扎卢斯基一人看管我们时，我从米拉和尤列克那里得知：他们昨天到地窖里去腌白菜，然而他们首先是唱了许多歌。尤列克说，自从佩切克宫——昔日的银行大楼，今天的盖世太保司令部——落成以来，革命歌声在它的室内荡漾恐怕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唱了《红旗歌》、《千百万双臂膀在黑暗中高高举起》、《游击队员之歌》和许许多多其他的捷克和俄罗斯的革命歌曲和民歌。在这座灰色大楼的地下室里——纳粹分子们在那里对捷克爱国者进行着严刑拷打——响起来

的不是哀乐，不是悲歌，而是充满力量和朝气的战斗歌曲。
在那里甚至还响起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共有的无产阶级的庄严
歌曲——《国际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第四节 “400号”被瓦解

1942年秋，大概在10月里，弗里德里希极度残暴的助手、捷克盖世太保内尔格尔把一张夹带拿进“400号”房间，这张夹带是一块手帕大小的普通白布，上面用蘸水笔写着楷体字。内尔格尔把它放在雷内克的桌子上，吩咐他把上面的捷语译成德文。

当内尔格尔走出“400号”以后，雷内克使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夹带的两个上角，把它高高举起，对着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审视起来，如同要猜出上面的密码一般。其实，他这是在给囚犯们通风报信，示意夹带的收件人主动站出来报告一声。当时在“400号”房间里除扎卢斯基以外还有一位看守在值班，因此，他不能在那位看守面前随便和囚犯们说话。

然而，所有在场的囚犯对这张夹带都反应冷淡。这就是说，它的收件人不可能在这些囚犯中间。雷内克便把这块写满字的白布放在桌子上，放在米拉·内德维耶德和尤列克能

够看到的地方，然后，再把它放在阿尔诺什特·洛伦茨的坐位旁边。夹带的作者是一位小女孩，它的内容包括对盖世太保的斥骂。

中午时分，杂役们聚集在他们专用的一楼走廊上（在这里他们与其他囚犯完全隔离开来，但是，他们彼此却能相互交谈）议论纷纷。他们的结论是：夹带可能是随着内衣包裹寄到了庞克拉茨监狱，那边的党卫军发现了它，现在把它转交给了盖世太保；其次，夹带与弗里德里希负责审讯的、由反共科负责调查的囚犯有关，因此，才由他的捷克助手内尔格尔拿到“400号”里来。尽管杂役们在“400号”房间和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尽力查找夹带收件人的下落，然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盖世太保似乎已停止了追查工作。然而，两个星期以后弗里德里希又来到“400号”房间，他带来新查获的一张夹带，吩咐把它翻译出来。如果把上次和这次的两张夹带加以比较，人们不难看出，它们是从同一块布料上撕下来的。依旧无人招认。谁是玛妮亚（夹带作者的名字）——依旧无人知道。但是盖世太保已经掌握了案件的线索。他们相信，玛妮亚和夹带收件人已经逃不出他们的手心了。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而玛妮亚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敌人的圈套之中。当杂役们的查找工作毫无结果之际，一天，盖世太保突然把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小伙子带到“400号”房间。小伙子怀里抱着一件袖子和衬里被撕裂开来的冬大衣，如同刚入考场学生一般。囚犯们以好奇的目光看着这个

小伙子，他们的眼睛好似在说：“年轻人，你这个样子完全成了一个魔法师了！”盖世太保为什么要这样去捉弄他呢？

小伙子苦笑着。盖世太保把他家里人探监时给他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弄成了这个样子以后才交给了他。盖世太保把小伙子的冬大衣撕得乱七八糟，以为在衣服里儿内缝有夹带。内尔格尔把年轻人带到后面，因为盖世太保们也都坐在后面，这样便于监视他。当年轻人路过桌子时，他的眼睛看见了桌上放着的夹带，雷内克正紧张地坐在它的旁边。每当雷内克离开“400号”房间时，囚犯们才能松一口气。现在，这位年轻人尤其盼望他早些离去。果然，当雷内克在镶着玻璃的大门后面消失以后，几秒钟前如同凝固了的空气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年轻人对坐在他附近的尤列克耳语了几句，消息便马上传开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便听说，这些夹带是这位年轻人的女朋友寄给他的。

上午瓦茨拉维克走了进来。尤列克请求他帮个忙，让夹带的女作者有所准备。瓦茨拉维克果然照办了。两天后他进来说，姑娘已安全脱险。我们这才愉快地松了口气，因为我们机智地战胜了盖世太保。

但是，两个星期后，盖世太保又把那位姑娘书写的新夹带带进“400号”房间。怎样才能说服她暂停活动——我们实在是无计可施了。

1942年12月8日，“400号”房间里有两个人获得了自由：盖世太保因无法搞到“罪证”，只好把女演员博热娜·普尔潘诺娃和电影工作者（杂役）英德日赫·埃尔布尔释放

了。普尔潘诺娃的获释应归功于尤列克和瓦茨拉维克。一方面，尤列克不断地和令人信服地向伯姆证明，米雷克（克列仓）关于普尔潘诺娃是戏剧工作者民族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另一方面，在尤列克的建议下，瓦茨拉维克充分利用几个德国盖世太保的贪财而买通了他们。

几天后，事件的发展却戏剧性地急转直下。盖世太保逮捕了夹带的女作者，逮捕了掩护她的一对青年夫妇，接着又逮捕了另一名妇女（联络员），这样，瓦茨拉维克四周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给他致命打击的是他的老朋友、捷克盖世太保多列伊希，这位多列伊希打听到，把奥尔加·沃尔德日霍娃带进“400号”房间的就是瓦茨拉维克。现在，他把这件事向德国盖世太保告发了。

12月10日上午，衣冠楚楚的盖世太保斯莫拉走了进来。他站在房子中间，大声地、慢条斯理地、一板一眼地说：“好，洛伦茨，现在咱们就去逮捕令妹吧！”洛伦茨镇定自若地坐着。房间里死一般地静寂。斯莫拉走到阿尔诺什特·洛伦茨的面前说：“洛伦茨，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阿尔诺什特故作镇静地耸了耸肩膀。只有他那微微涨红的脸才说明他心里焦急不安。他能说什么呢？盖世太保的手里已经掌握着所有的王牌。他们要逮捕他妹妹已经是易如反掌。如果瓦茨拉维克在场（上午，瓦茨拉维克还能自由行动），也许还能想出一些补救的办法来。但是，瓦茨拉维克没有到“400号”房间里来，因此，无人能去向洛伦茨的妹妹通风报信，也许她就在佩切克宫附近的某个地方呢。现在盖世太

保可以随时逮捕她：立即逮捕，或者一、两个小时以后。斯莫拉走出去时把门摔得“乒乓”作响。这已经是他的习惯了。

我低声问阿尔诺什特：“他们在那里会搜查出重要的材料来吗？”阿尔诺什特沉思着摇了摇头。我想起了他写的那些密信，那些密信都是我替他抄好后由他寄给妹妹的。

整个上午我们是在万分焦急之中度过的。突然，一个盖世太保走进来提审尤列克。当尤列克从我座位旁走过时，他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肩膀。中午时分他被带了回来。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我看了看尤列克。他闭了一下眼睛，好似在说：放心吧，平安无事！然而我不相信，因为情况并不顺利。不久，灾祸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第二天（12月11日），盖世太保把我带入“400号”房间时，我立即预感到事情不妙。房间里静得可怕。我没看见尤列克。几个盖世太保监视着囚犯。他们彼此也不交谈。就是说起话来，三言两语也就了事。他们的注意力不停地集中在囚犯身上，囚犯们连稍稍大声地咳嗽一声都要遭到斥骂。在“400号”房间里我发现有两位新来的犯人：一位是年轻漂亮的女人（显然，她很快便要当妈妈了），另一位是黑头发的青年男子。他们俩都是犹太人。稍后，我才听说，他们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书写夹带的那位姑娘曾隐藏在他们家里。他们俩后来都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洛伦茨坐在自己的坐位上。我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胳膊，意思是说：出了什么事？不久，他稍稍侧过头来低声说：

“瓦茨拉维克被捕了！”

“什么时候被捕的？”我惊奇地低声问道。几秒钟后，洛伦茨轻轻回答说：“昨天下午。”“他交代了没有？”阿尔诺什特·洛伦茨微微地耸了一下肩膀。他的这一动作可以有各种解释：或者说现在尚不得而知，或者说瓦茨拉维克已经开始交代。我们不知道瓦茨拉维克未来的表现会怎么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低声问洛伦茨：“尤列克在哪儿？”洛伦茨说：“他在受审。”我又问：“米拉·内德维耶德呢？”他低声回答：“也在受审。”不久，盖世太保也把洛伦茨带去审问了。

我如坐针毡。杂役们一定知道出事的情况，但是他们都装成泰然自若的样子。兹登涅克·德沃夏克正在画一张风景画，杭兹尔正在用小刷子刷着打字机上的铅字，雷内克则漫不经心地、慢条斯理地、轻轻地敲打着打字机的字键……

我焦急不安地、不断偷偷地向房门处侧过头去，希望看见他们把尤列克押送回来。在内尔格尔的押送下，米拉·内德维耶德终于进来了。他的脸上明显地留着红色的血斑，他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内尔格尔把他带到他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房间里依然是静寂无声。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盖世太保才把尤列克押送回来。当他从我身旁走过时，他没有忘记摸摸我的头发。他这样做是为了安慰我。我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他。他眨了眨眼睛，好象在对我说：用不着担心！

终于等到了吃中饭的时候。盖世太保把我们排成单行，

押送我们到楼下去吃午饭。米拉·内德维耶德乘机凑近我，迅速耳语了几句：“你要转告奥琳卡^⑩，叫她别提密信和副教授的事，只承认寄过三个小邮包！多列伊希把瓦茨拉维克和她都出卖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一定照办。原来，奥尔加被捕了！现在，我不能错过时机，我要站在女犯队伍的最后一个位置上去，站到尤列克旁边去。可惜没有成功。我向尤列克瞥了一眼。他微微摇了摇头，眨了眨眼睛，好象在说：“不用担心就是了！”

在一楼女犯饭桌旁边，我认识了夹带的女作者。她是一位年方十八、缺乏经验的姑娘。她一声不吭地把两腿伸给我看。腿的背面，从上到下被打成了青紫色。

我心急如焚，太阳穴怦怦直跳。盖世太保对“400号”集体为囚犯们所干的好事究竟知道了哪些情况？

盖世太保已把阿尔诺什特·洛伦茨从杂役队伍中除名了，他们再没有把他带到“400号”房间里来。他们又先后提审了尤列克和米拉·内德维耶德。

后来我听说：瓦茨拉维克是于12月10日午饭后被捕的。当天晚上扎卢斯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尤列克。其余的囚犯对此都一无所知。盖世太保没有把瓦茨拉维克送到“400号”房间，也没有把他带到楼下的“电影院”去。然而，尤列克需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米拉·内德维耶德和洛伦茨，让他们做好应变准备。当时他们两人正在受审，尤列克无法见到他们。因此，他托雷内克——那位手拿抹布、装成勤于职守的杂役——传话给在盖世太保的图书馆工作的杂役什普林格尔，告

诉他尤列克必须找他谈一次话。虽然雷内克可以离开五楼到一楼去，但是，如无看守陪同他是不得擅自进入图书馆的。幸好他在一楼偶然碰上了捷克司机基杨内克，他便派基杨内克去找什普林格尔。“你必须设法最后一批回去，他们有事找你商量”，基杨内克这样告诉什普林格尔。

什普林格尔问他：“谁叫你来找我的？”

“伏契克，是特林格尔告诉我的。”

什普林格尔想了一下，然后去找他的上司，一个盖世太保。他说他有些工作必须今天做完，请求最后一批回去。盖世太保同意了他的请求。

尤列克和什普林格尔原来以为，盖世太保会用带篷的囚车把他们从佩切克宫送回庞克拉茨监狱，这样他们便能交谈了。然而，最后一批回去的总共才四个人，更糟糕的是盖世太保用的又是敞篷车，车上四面又各有一名党卫军把守。这样一来，你就是动一下嘴唇也会被他们发现。直到在庞克拉茨监狱乘下车之际尤列克才对什普林格尔耳语了一句：“今天我必须找你谈谈！”

他们两人算了算，当天夜里值班的应是赫费尔。在1942年冬为囚犯们提供过帮助的只有他和科林斯基。

每一个囚犯在进入牢房之前，必须等候站在大门旁的党卫军点名。当叫到他的名字时，他必须跑步到自己的牢房门口，经党卫军搜身检查后才得进入牢房。经过大门口的例行手续之后，什普林格尔以从未有过的最快的速度跑步上了二楼，看看值班看守是不是赫费尔。果然是他。他仔仔细细

地、长时间地检查着什普林格尔的全身，此刻什普林格尔低声告诉他说：“我有要事和伏契克商量。今天夜里请你带我到他的牢房里去，或者带他到我的牢房里来！”赫费尔开始犹豫起来。接着他也低声回答说：“你知道，他满脸胡须太招眼了。这样吧，当这儿都安顿好了之后我来找你。”

他愿意帮忙，不过要冒很大的风险。他考虑了很久，思付着怎样干才能万无一失。然后他来到走廊的墙角处，那里堆放着摔破了的瓶瓶罐罐、放衬衣的纸盒和其他杂物。他在那里找呀找呀，最后找到了一只破旧不堪的皮鞋。他拣起它，如同找到了什么宝贝一样，转身离去。走廊上空无一人，牢房都上了锁和门闩。整个监狱鸦雀无声。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接着再抬头望了望三楼，低头看了看一楼，到处是一片寂静。他悄悄地走到什普林格尔的牢房跟前——夜里，党卫军们都穿着便鞋在牢房四周巡逻——他轻轻地开了锁，再向四周张望一下，说不定查哨的要走了过来，但依旧是寂静无声。他推开牢房门走了进去，把那只破旧的皮鞋交给什普林格尔拿着。万一他们给别人碰上了，赫费尔可以借口说，什普林格尔要把破皮鞋扔到垃圾堆去。他们两个人偷偷地从牢房里溜了出去。什普林格尔脚上只穿着袜子，赫费尔穿着便鞋，一前一后悄悄地向尤列克的牢房走去。如果路上碰见党卫军，什普林格尔便说去借双鞋，以便第二天早上能穿着它到佩切克宫去。这些编造出来的话能不能骗过党卫军的耳目，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终于来到了尤列克所在的267号牢房。监狱已进入梦乡。赫费尔熟练地打开门锁，什普林格

尔一溜烟钻了进去。赫费尔再把门锁好，接着便转身走开了。

什普林格尔同志告诉我，在那令人不安的一天尤列克是怎样向他讲述了事件的始末，谈到瓦茨拉维克是怎样被捕的。然而，当时米拉·内德维耶德和洛伦茨都还不知道这件事。必须尽快通知他们。因此尤列克请什普林格尔给予协助，让他们能作好一切准备。果然，什普林格尔及时地通知了他们两人。12月11日晨，他们还以杂役的身份乘车前去佩切克宫上班，但是到了下午他们便再也不是杂役了。盖世太保再也没有把他们带到“400号”房间里来，而是在审讯后直接把他们关在楼下的“电影院”里，交由盖世太保门茨尔和其他党卫军严密监视。

捷克盖世太保大发雷霆，因为他们挨了德国警官的一顿臭骂，说他们在“400号”玩忽职守、看管不严。于是，捷克盖世太保便迁怒于囚犯了。

当米拉·内德维耶德要我把行动部署通知奥尔加时，我才发现：盖世太保根本就没有把她带到“400号”房间中来。显然她正在受审。盖世太保肯定会把她押送到庞克拉茨监狱，而我几个月以来一直被关在查理广场监狱。我怎么能把米拉的口信转告她呢？

晚上六时以后盖世太保把我们带到楼下，党卫军门茨尔用蹩脚的捷克话念着囚犯们的名字。他每叫到一个囚犯，不是给他一巴掌就是踢他一脚，然后，赶我们跑步爬上密闭的囚车。在这个“活动监狱”里还有一个单间，单间很小，它只

能容纳一个囚犯，此外，它还有自己的门和周围分隔开来。党卫军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在此以前我一直怀着这样的希望：奥尔加也会上这辆车，这样我便能把口信告诉她。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可能了。

许多囚犯继续迅速地爬上车来，他们全是男犯。突然，在阴森的通道里，在这些男犯中间，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党卫军打开我这个狭小的单间的门，把那个女人硬塞了进来。就是她——奥尔加！我们俩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致我们的手都无法动弹。我们两人几乎都透不过气来。然而，这一切我们都毫不在意。

党卫军们关好囚车的门，发动机开足了马力，囚车上了街道，我和奥尔加开始谈起话来。我向她转达了米拉的口信，同时告诉她，在监狱里跟任何人都别谈自己的事，因为盖世太保在这里安插了密探。奥尔加姊妹俩都在那个医院工作，而他们又不知道哪一个是奥尔加，因此，把两姊妹都逮捕了。

第二天，盖世太保把我送到佩切克宫后，他们一反常态，把我留在一楼的女牢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捷克盖世太保波希克走了进来，他用食指示意我到他那边去。我跟着他出了牢门。我们乘电梯来到了“400号”。那一天，我没有看见过尤列克。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尤列克在哪儿？”一会儿后我低声问杭兹尔同志。“他在受审。”“很久了吗？”

“不。”我知道，杭兹尔是同样不会吐露真情的。但是，沉思片刻以后我还是轻轻地追问了一句：“真的这样吗？”他

微微地点了点头。

晚上，当盖世太保们押送我们回监狱时，我还是没有见到尤列克。有时候我也能和尤列克同乘一辆囚车回监狱去。当然这样的机会少得可怜。狠毒的门茨尔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我和尤列克分开。只有当别的盖世太保替他值班时，我们有时才能同车。此刻，囚车里的人马上给我们让出座位，叫我们俩并排坐在一起。有一次，尤列克在囚车里告诉我说，他和老爹佩舍克住在同一个牢房里，他们已经一同唱完了800多首各种各样的歌曲。

12月13日，出事后第三天，当盖世太保刚把我带进“400号”房间时，忙得不可开交的伯姆立即走了过来，叫我前去受审。也许他们已经知道了洛伦茨的密信？我跟在伯姆后面，一种不祥之兆占据了我的心。我们走过了伯姆的办公室，也走过了弗里德里希的办公室。他要带我到哪里去？他一言不发，我更不便开口。后来他终于打开一扇房门，我们两人走了进去，肥胖的警官维尔克腆着个大肚子舒坦地坐在办公桌旁，桌上放着好些根藤条。有几根藤条两端已裂成碎片，这说明它们已派过用场。维尔克对着我打量了一下。他咧开一个嘴角，但是并没有笑。他向我注视了一会儿，便张开大嘴，故作镇静地、老谋深算地说：“伏契克太太，您不必害怕，我们只向您打听点事儿。但是，您必须老实回答。您如果讲老实话，没有您的事儿。”我十分警惕地站在他的面前。他指的是什么事？他知道了哪些情况？我看了看伯姆和他，然后，我也故作镇静地说：“警官先生，我不会讲假话。”

维尔克点了点头，接着说：“洛伦茨要您出来说话。您若能如实招供，您还能救他！”

那一定是关于我替他抄写密信的事！

维尔克突然改变了腔调，厉声问道：“您认识瓦茨拉维克吗？”

我感到，这一问吓得我睁大了眼睛。“瓦茨拉维克？”我重复了这个名字，然后停了停，如同要极力回忆起他来一样。“瓦茨拉维克这个人我不认识！”

“您撒谎！”维尔克冲着我大叫了一声。

“我没有撒谎。名叫瓦茨拉维克的人，一个我也不认识。”

“您会不认识瓦茨拉维克？那好，我们让您瞧一瞧他吧！”

大腹便便的维尔克动作却异常敏捷。他从座位上富于弹性地跳将起来，转眼功夫便跑出门去，不一会儿就带着瓦茨拉维克走了回来。我以深切同情的目光看了瓦茨拉维克一眼，但是，只看了一秒钟左右，免得被盖世太保们看出我们的秘密，接着我便以一种冷漠的神情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位素不相识、毫不相干的路人一般。几天的监狱生活已使瓦茨拉维克判若两人：他两眼深陷，脸色发黄，他那纤细蓬松的头发现在耷拉着，如同害怕别人又要使劲地去揪它们一样。瓦茨拉维克进来后不久，盖世太保又把洛伦茨同志带了进来。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同样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瓦茨拉维克一看到洛伦茨，便冲着他大骂起来，接着，装出要向他扑过去撕打的样子。当时瓦茨拉维克的确想把洛

伦茨狠狠地揍一顿，因为洛伦茨同志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把寄给他妹妹的两封密信说成是由瓦茨拉维克带出去投进邮筒的。而瓦茨拉维克对此一无所知，受审时便矢口否认。结果，用我们囚犯们的话来说，让盖世太保足克了一顿。午饭时，雷内克伺机告诉了瓦茨拉维克：洛伦茨的两封密信是他——雷内克——带出去的，他确信瓦茨拉维克在下次受审时会把事实说清楚。但是，当盖世太保把瓦茨拉维克重新带到警官的办公室时，他却突然一口咬定说：是的，没错，那两封密信是他带出去的。然而，盖世太保的调查证明，把密信偷偷带出佩切克宫去的不可能是他，因为当时他不在布拉格。这样，他又遭到了一顿毒打。盖世太保还把他两只手的指甲拔掉了，但是，他死也不改变自己的第二次口供。

盖世太保们用力把瓦茨拉维克和洛伦茨分开，然后把他们两人都带了出去。

“您不认得瓦茨拉维克吗？”维尔克又冲着我嚷了起来。我看了看他的眼睛。它们是狡黠诡诈的，然而除了我所说的以外，它们也无法猜到更多的东西。

“那位警官先生我见过，”我装成对瓦茨拉维克的被捕毫无所知的样子说。“但是，我不知道他就叫瓦茨拉维克。”

“胡说八道！”维尔克大叫起来。“谁不知道那家伙整天泡在‘400号’房间。”

“我不知道。我在那边只见过他两三次。我对什么事从来都是不闻不问，对什么东西都漠不关心。伯姆警官先生可以作证！”我转身看着伯姆，如同他是可以信赖的证人一般。

这些话我说得理直气壮，因为当任何一个盖世太保来到“400号”房间时，我们这些囚犯以及杂役们都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装有玻璃窗的房门日后却给我们帮了大忙。

伯姆沉默不语。维尔克则用手指敲打着桌面。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焦急不安，然而也可能说明他还没有拿定主意。突然他的手停了下来。他说：“洛伦茨要您出来说话。他要您证实一下，他曾经在瓦茨拉维克面前谈到了他负责翻译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品，他还说：这些东西读者一定很感兴趣。您这样做，对他以及对您自己都有好处。”

“警官先生，”我把一只手放在怦怦直跳的心口上回答说，“我如果听到过这些话，决不会对您隐瞒。但是，我的确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不明白，洛伦茨为什么一定要我出来说话。”

“您害怕了！”维尔克大叫了一声。

“我没什么可怕的，警官先生。我说的句句是真话。”

是的，我心里确实害怕。但是，当我感觉到维尔克再没有更多的问题时，我心里的千斤石板就落了地。现在我才恍然大悟：阿尔诺什特·洛伦茨在盖世太保面前什么也没有说；盖世太保并没有掌握我的任何情况；他们审讯我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在“400号”房间里我坐在洛伦茨的旁边。

维尔克怒冲冲地把手一挥，大叫了一声：“滚！”

我轻松愉快地走了出来。伯姆又把我带回到“400号”房间。

自从瓦茨拉维克、沃尔德日霍娃两姐妹、洛伦茨的妹妹、写夹带的小姑娘、她的房东夫妇、以及介绍小姑娘到他们家居住的一个妇女被捕以后，“400号”这个集体已经是岌岌可危了。在盖世太保大肆逮捕和不断刑讯的日子里，尤列克的妹妹们按计划要来看望我们。我和尤列克商定：她们最好暂时别来探监，理由是：首先，盖世太保很可能不予批准；其次，即使批准她们前来探监，他们又可能把她们予以拘留，借以逼迫尤列克开口说话。盖世太保十分怀疑尤列克参与了把情报偷送出监狱的工作。但是，他矢口否认参与了此事，尽管又惨遭了毒打与折磨。1942年12月14日他在给莉巴的信中写道（这封信伯姆不知道，只有扎卢斯基看守知道）：“亲爱的莉巴和薇拉！原定在圣诞节前的探监现已无法实现，因此，你们已无必要来布拉格。圣诞节后再见吧，准确的日期下次我会函告你们。在收到我的或者古丝蒂娜的信之前，你们就不要来探监了。不过你们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寄一个食品邮包来——给古丝蒂娜的清寄查理广场监狱，给我的请寄庞克拉茨监狱——里边放一点儿圣诞面包，一些饼干，以及其它食品就可以了。东西不宜太多，最多不超过两公斤。我们预先向你们表示感谢。祝圣诞节好！我们多多问候你们。古丝蒂娜和你们的尤拉。”

1942年12月中旬，“400号”存在的基础不只受到了震动，而且它开始倒塌了。我们感觉到，为囚犯们造福的这个候审室已摇摇欲坠。盖世太保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在审讯共产党或她的同情分子时不用从五楼跑到一楼的“电影院”去

提审犯人，因而设立了“400号”房间。当时，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便替囚犯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年轻姑娘一时的轻率行为——她根本就没意识到她的所作所为纯粹是轻举妄动——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然而，盖世太保所掌握的关于“400号”的情况，仅仅是它为囚犯们所做的大量工作中的“零头”而已。

1942年末至1943年初，“400号”已奄奄一息、行将垮台了。然而，就在好几位盖世太保同时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囚犯们还是找到了商议对策的机会，找到了给庞克拉茨监狱或者查理广场监狱中的难友通风报信的机会。当然，那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在“400号”房间里，囚犯们必须和在一楼的“电影院”里一样坐得端端正正，两眼必须看着前面发灰的墙壁。但是，即使这样，盖世太保看守工作中的那怕是极微细的疏忽也逃不过囚犯们的眼睛。只要盖世太保彼此交谈一句，囚犯们也就交谈一句，也许只是比他们稍晚一点儿，但是，有时却要比他们谈得更多一些。如果被盖世太保波希克（或者贝尔卡，或者斯莫拉，或者多列伊希）发现，那么他们要把说话的人叫到前面去面对墙壁罚站。如果碰上德国警官，那么处分就会更重。现在，捷克盖世太保自己也不敢玩扑克牌了，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之中谁是告密者。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来“400号”值班的看守正好都是善良的人。除扎卢斯基以外，到这里来就坐的还有莱布内尔和拉什托维奇卡。此刻，我们好像又回到了昔日的黄金时代，“400号”又变成了囚犯们的会议大厅。不过，这样

宝贵的时刻实在太短暂了，短暂得一瞬即逝。这个由善良人组成的看守小组马上会被另一伙残暴的捷克看守所代替，如果此刻他们有空，即：他们如果没有跟着上司参与惨无人道的审讯的话。囚犯们利用短暂的有利时刻进行磋商，传递音讯和打听东线战况的消息。当时，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军队的喜讯已经陆续传进我们的耳朵。因此，我们更能信心百倍地去忍受刑讯时的拷打，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复仇的日子已经来临，在我们大街小巷欢庆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这种形势下迎来了1942年的圣诞节。圣诞日那天，盖世太保虽然把囚犯们押送到了“400号”，但是很少进行审讯。他们仅仅是开动了机器，为了让人看见，连圣诞节他们也没有休息而已。在被带来的囚犯中间，有少数几位并不是德国警官们所传讯的，而是——它几乎叫人难以置信——是由尤列克“请”来的。当时给犯人的传票和给杂役的通知单是每天填写的。负责填写通知单工作的有尤列克。1942年夏天，扎卢斯基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尤列克，而他出于特殊考虑，便愉快地接受了。在给杂役的工作通知单上开始出现了非杂役的名字，出现了需要给予帮助的难友的名字。比如：必须把受审时的谈话口径及时通知他们；某位难友生病，必须请医生米拉·内德维耶德给他看看，尽管所谓的“看病”往往只能利用上厕所几秒钟的时间三言两语问一问而已，而且当时唯一的药品就是止痛片；又比如：某位被长期关押的老难友饥肠辘辘，需要送给他一点儿食物，请他吸上几口香

烟。尤列克常说，“400号”的工作如果不为难友们谋福利，那算什么工作！尤列克私自填写传票和通知单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在整整几个月的时间里连一个警官也没有发现。知道此事的只是那些同意尤列克这样干的杂役，扎卢斯基有时候也知道。原来，尤列克发现：检查传票和通知单填写工作的只有扎卢斯基一人；其次，任何一个警官都有权传讯所有的犯人，即使他所传讯的犯人并不属于他专门负责的那个案子。比方说，负责尤列克案件的警官是伯姆，但是，弗里德里希和赞德尔也有权传讯尤列克，他们也可以签发传票。每天，当尤列克从“400号”被押送回庞克拉茨监狱之前，他便坐在靠近扎卢斯基的座位上，翻阅着堆放在他书桌上的传票，把囚犯们各种各样的名字记在心里——尤列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熟悉各个案件。这样，他便能把消息传递给他们的难友们。尤列克还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让他们在审讯时能统一口供，不泄露外面同志们的名字。在监狱里，一句话要比金银财宝更可贵。你可以对难友说许多话，但是，在审讯时警官们妄图用严刑拷打从你嘴里捞到的那一句话，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

不只在“400号”房间，也不只在警车上，就是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在杂役们的帮助下，在刮脸时，囚犯们也能进行磋商、互通情报。

庞克拉茨监狱中男犯们的刮脸本身便构成了斗争活动的新篇章，当然，只有当值班看守是科林斯基（或者是赫费尔，或者是汉瑙尔，或者1943年2月以后的捷克警察荷拉）的

时候才行。官方规定：男犯们每周刮脸两次，一次在星期二，另一次在星期五。这两天，所有男犯无一例外地必须办理“刮脸手续”。那些前去受审的囚犯以及杂役们则每天必须刮脸。刮脸室安置在二楼一条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里。房子里一边放一条长板凳。在一条长凳上放着盛有一点儿水的脸盆，在另一条长凳旁站着理发师（他们也是囚犯）。看守把囚犯分成15人一批，把他们从牢房带到刮脸室来。此刻，每一个囚犯必须尽可能快地用小刷子在脸盆里蘸点水，尽可能快地往自己脸上涂点儿肥皂。脸盆中的一丁点儿水要供数十位囚犯刮脸使用！听到口令后，每个囚犯必须立即跑步坐到理发师面前的长凳上。负责刮脸的理发师通常为2—3人。他们用钝刮脸刀飞快地给囚犯们刮着胡子，这些囚犯们常常来不及把脸上的肥皂上匀。整个“刮脸程序”不过几秒钟而已。

尤列克对于监狱中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除难友们以外，看守科林斯基、赫费尔、荷拉都向他提供了许多情况。如果他们中的一位在刮脸日值班，尤列克便请他把某某犯人带来刮脸，因为这位难友正需要他的帮助。三位看守由于性格不同，所以他们完成这项任务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赫费尔把整个刮脸室变成了一个“舞厅”。他先让尤列克站在靠墙的地方抹肥皂，然后让一个个囚犯不停地变换着位置，此刻，他便把某某犯人叫出来，让他站在尤列克旁边。整个过程中赫费尔都大声吆喝着，这样，他就能把其他党卫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从和尤列克低声说话的囚犯身上引

开。每次刮脸时都有许多囚犯轮流和尤列克谈过话。当荷拉谈起他时，常常说：“尤列克是一个哲学家，因此，抹肥皂都需要抹一个钟头，而且总是像英国绅士那样不慌不忙。”

在敞篷囚车里，囚犯们无法说话，因此，尤列克总是试图把押车警察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以便让其他的囚犯能彼此交谈几句。尤列克能讲德语，说话又非常风趣。但是，有时候警察对于他的攀谈是不屑一顾的，甚至会用粗鲁的语言冲着他破口大骂。然而，这一切从来都不会使尤列克知难而退。

1942年圣诞节那天，我在“400号”房间收到了尤列克亲手制作的圣诞礼品：他用绿色图画纸剪成纤细的松枝，在一小块白色图画纸上左半边画了一棵有六个树杈的绿色小树，树下有一朵红色的小花、一本书、一盒香烟和一个猴子头；画面右半边画着监狱的铁窗，铁窗下面写着：“祝圣诞节快乐、1943年幸福！尤拉赠。”图画的背面打上了扎卢斯基借给他的红色图章（上写“验讫”字样），然后是他亲笔签字“于1942年12月24日”和隐约可见的密码。尤列克把这张画折成四折，放进黄褐色的信封内。当我接到他的圣诞礼物时，我回忆起沦陷前的那些日子：多少个圣诞日他为赶排圣诞节出版的《红色权利报》而费尽了心血、跑断了腿！他当时又吸了多少支香烟、喝了多少杯黑咖啡啊！他在拿到刚刚印好的《红色权利报》以前，当他还没有翻阅它的各个版面、用手去抚摸它、用批判的目光去仔细检查一遍以前，他

是从不离开印刷厂的。当这期报纸成功地出版后，他又是多么地高兴啊！然后，我们才匆匆跑到火车站，去赶乘开往比尔森的火车。在上车前的最后一刻，再为妈妈、爸爸和两位妹妹购买圣诞礼物，在这些礼物中书是决不能少的。现在他又在圣诞树下给我送来了“书”！我把尤列克的这一礼品带回牢房。几个月后，当盖世太保把我押解出布拉格时，我把它随内衣寄给了莉巴。又过了许多年，现在，我以万分激动的心情把这张小小的画片拿在手里。它是“400号”的见证人！它是尤列克用手抚摸过的、用眼睛看过的永久纪念！

“400号”房间事败以后，这个插入盖世太保司令部心脏的反法西斯战壕还顽强地坚守了约一个月，后来便被彻底破坏了。

“400号”的集体遭到了盖世太保的严厉惩处：不久，米拉·内德维耶德、兹登涅克·德沃夏克、佩皮克·维苏希尔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洛伦茨同志、杭兹尔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都惨遭枪杀；尤列克也被处决了。

1940年以来一直存在的“400号”的英雄篇章结束了。这个时期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合作者们反对纳粹占领英勇斗争的时期。

1943年1月末或者2月初，尤列克给斯坦尼斯拉夫·什普林格尔同志（他于1943年1月9日获释出狱）写了一封密信，密信是由杨·赫费尔从狱中带给外面的什普林格尔的。尤列克在密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朋友！

你秘而不宣的问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快乐。可惜的是：你已经不在这（当然仅仅是呆一会儿），我们已不能再聊上几句，du, Mensch, du!（德文，意为：你呀，你这个家伙！）看起来，我们重新欢聚的希望已经越来越小。最近他们又抓来了一些人。这些人的口供——虽然并非出于恶意，但却愚蠢地——使我的案情进一步加重了。我那位警官对我虽然依旧相当客气，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形势已变得对我十分不利，如果说从前还不算太坏的话。总之，时间拖得太长了，这便是问题的所在。如果清醒地估计一下形势，我肯定看不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了。

你大概已经知道，‘400号’已被彻底破坏了；你也许已经听说，我也再不是‘杂役’了。瞧，当一个人老是呆呆地坐在牢房里时，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啊——这一点也许不用我向你赘述了，然而我的心情很好，如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

朋友，如果你能不时地把当前形势及其发展情况扼要地写信告诉我，我将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只求你如实相告，不要掺加水分。你的消息越详尽越好，我们这里非常需要它们，尤其是在现在我无法外出的时候（指去佩切克宫——作者注）。望多加保重，切切。

现在，小伙子，我祝你幸福地、trotz alledem（德文，意为：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再见！

你的J.①”

第五节 在查理广场监狱

1943年2月初，当法西斯德国举国上下哀叹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的灾难性的失败的消息传到囚犯们的耳朵里时，监狱里到处洋溢着无法形容的欢乐气氛。

当时我在查理广场监狱当烧火工人。生火的炉子装在牢房里，但是暖气管道通到走廊上。一次，当我利用掏炉灰的机会把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中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通过炉口悄悄地告诉其他难友时，我听到一个女看守的声音。她就是一年前在庞克拉茨监狱接收我的那个女看守。当时，她叫我跟她走一趟。在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她停住了脚。她看了看我，然后以一种在她的“同胞”面前不敢流露出来的真挚的神情对我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我们打输了。现在我知道，我们整个这场战争都打输了！”

查理广场监狱的四个女看守中，有三个是苏台德人，第四个来自德国本土，她一句捷克话也不会讲。虽然，她也像亨尔特洛娃一样不鞭打犯人，但是，当女犯们挨打后伤口发炎时，她是不允许给她们上消炎药鱼石脂磺酸铵油膏的。她从来不叫医生给诺瓦科娃太太治病。当后者的疯病发作时，她总是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并且还说，疯老婆子现在死或者两个月以后死反正都一个样！我和诺瓦科娃太太的女儿、十六岁的斯拉芙卡同住一个牢房。虽然她们母女俩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但是，女看守们不让诺瓦科娃太太出牢房门一

步，就连早上15分钟的放风也不让她参加，也许这是为了不让她们母女俩能在监狱院子里见面的缘故罢！斯拉温卡^②非常想念妈妈。我们大家——当时在我们小小的牢房里一共有十七位女犯——都不敢把他母亲精神失常的消息告诉她。斯拉芙卡想给妈妈写封信，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尽管门禁森严，但我们还是弄到了纸和铅笔。斯拉温卡还是秘密地给妈妈写了信。她劝妈妈回忆一下往事：在一生之中，妈妈还没有休过假，还不知道别墅为何物呢！现在妈妈尽可以这样认为，目前她正在这里度假。为什么“别墅”装有铁窗、而且窗子又小、房间又黑呢？她可以这样假设：这是价格低廉的小房间，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那么多钱去租住豪华的别墅啊。如果说她不能到外面去走动，那么她可以这样想，这是由于天气不好的缘故。斯拉芙卡曾在牢房里把信念给我们听。在那封信里饱藏着这位年轻的女裁缝师令人赞叹的机智和勇敢。

斯拉芙卡向我们叙述了他们全家被捕的经过。众所周知，她十四岁的妹妹给暗杀海德里希的刺客送去了一辆自行车，并把家里的一件干净衬衣送给了他。回来后，妈妈叫她立即去理发店烫了头发，为的是不让人认出她就是盖世太保紧急通缉的刺客的“帮凶”。自从纳粹分子处决了成千上万的捷克人以后，据说她母亲便整天精神恍惚、心惊肉跳。斯拉芙卡说，她父亲给全家准备好了毒药，每人一份，如果被捕，便服毒自尽。后来，盖世太保终于逮捕了他们全家，据说斯拉芙卡在盖世太保那里一整夜都坚持说：她对暗杀活动

一无所知，虽然她曾向她的裁缝老师亲口叙述了这事的全过程。清晨，盖世太保把小妹妹带了进来。她当着他们的面对斯拉芙卡说：“斯拉温卡，我已经全都说了，你也招了吧！”后来，当斯拉芙卡和妈妈并排站在佩切克宫的墙壁旁时，她低声劝妈妈把毒药扔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妈妈果然听从了她的劝告。

我回忆起戒严令时期，当我们还被关押在庞克拉茨监狱时，一天，女看守们把全体女犯押解到后面走廊里——起初我们全以为是要处决我们了。走廊上有一张条案，条案上放着一张照片，上面拍的是：一辆女式自行车，一件普通的男式风雨衣，以及一个平平常常的皮包。纳粹狱吏企图知道，是否有人认识照片上拍摄下来的这些实物。但是全体女犯都矢口否认。最后，我们大家必须签字画押，说明从未见到过照片中的东西。

在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以后，有一次，盖世太保又重新提审了诺瓦科娃太太。当时大概是在1942年8月末。他们把我和她以及其他受到传讯的女犯同车押到佩切克宫，然后，把我们关在“电影院”后面的女牢里。我们大家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突然，诺瓦科娃太太从自己的座位上跳了起来，一个箭步跑到一位小姑娘跟前，大声地问道：“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小姑娘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膀。她对这样的怪问题无法答对。我跑到诺瓦科娃太太面前，低声对她说：“您叫诺瓦科娃，叫诺瓦科娃！”她放声大笑起来。她用恍惚的眼神呆呆地看着我，然后开始嚎叫起来：“诺瓦科

娃！诺瓦科娃！”她每叫一句，便向后转身一次，嘴里不停地喊着：“诺瓦科娃！诺瓦科娃！”我低声对她说：“诺瓦科娃太太，别叫了，您要吃苦头的。”所有的女犯都伸出食指放在嘴边，示意她安静下来。然而，她一概不予理睬，只顾一声高过一声地喊叫着：“诺瓦科娃！诺瓦科娃！”

诺瓦科娃的喊叫声被残暴的门茨尔听见了。他突然出现在门口。再一个箭步便冲到她的跟前。接着，他左右开弓给了她两记重重的耳光，直打得她踉踉跄跄、几乎倒在地上。然后他揪着她的衣领，拳打脚踢地把她推到“电影院”里，一把将她推到了墙边。

不久以后，诺瓦科娃太太和她的三个女儿（一个14岁，一个16岁，一个18岁）以及她的丈夫和一个儿子都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煤气室里惨遭杀害。

被关押在查理广场监狱的犹太妇女是无权食用跟其他囚犯一样的饭食的。我们每周有两顿午饭可以吃上一盘浇上了一点儿调味汁、带有几小根肉丝的白煮土豆和一碗清汤，其他时候吃的都是发霉的干菜或者麦片糊糊；至于晚饭，我们每周有一次可以分到一小块薄薄的乳酪。然而，监狱中的犹太妇女每日吃的中饭和晚饭都是一个样：一碗不见油花儿、淡而无味、里面只漂着几小片土豆的清汤。

我们这些女杂役极力希望能改善她们的悲惨境遇。每当我们要求分一些食物给犹太女犯们时，唯有苏台德出生的德国女看守萨帕罗娃才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她使用捷克话说：

“好吧，动作要快！”她打开犹太女犯们的牢房，我们迅速地、

默默地把一个盛着饭食的木桶放进去，她再把牢房门迅速锁上。这样做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凶恶的党卫军看守达尔豪斯——他把拷打囚犯，特别是拷打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作为最大的乐趣——可能随时前来巡查。

如果早上15分钟放风的值日看守是达尔豪斯的话，那么男犯们便要受尽不可名状的折磨。在通往放风的院子的入口处站着两个看守，他们手里都拿着皮鞭。光着上半身的男犯们冒着雨点般打来的鞭子跑进院子里去。在这里，在牢房窗台下面的铁钩上，正晾晒着一根根新的皮鞭，皮鞭末端吊着一块重重的石板，皮鞭不停地在铁钩上晃来晃去。

男犯们一跑进院子，就必须站成一个圆圈，达尔豪斯站在圆圈中央，他用老酒鬼特有的那种粗野声调喊着口令：“跑步走！”所有的犯人，不管是老的、少的、健康的或有病的，立即跑动起来。达尔豪斯让他们转着圈子不停地跑着，直到许多囚犯都累得喘不过气来。然后他命令囚犯们立定，接着又响起了“卧倒！”的口令声。当所有的囚犯都卧倒在他的跟前时，他便象奴隶主那样绕着圆圈转来转去，他的皮鞭不停地落在奴隶们赤条条的脊背上，他的皮靴不停地踩着他们的脑袋，因为依他看，这些脑袋还没有深深地埋进泥巴中去。他心狠手毒。只有当他发现某个囚犯昏死过去之后，他才暂停对他的折磨。然后，另外两个囚犯把被打得半死的犯人抬出去，放在大门口的地上。他能不能从昏死中醒过来，这一点无关紧要。每逢达尔豪斯值班，早上15分钟的放风往往要延长到一个小时。整个院子里响彻皮鞭的抽打声，

以及伴随着的粗鲁的斥骂声。盖世太保每天都用没有刨过的粗木板钉成棺材，把被他们毒打至死的囚犯尸体从监狱中拉出去。

被关在牢房里的女犯们是透过铁窗看到这些骇人听闻的残暴行径的。达尔豪斯不止一次地赶到女牢中来调查，是哪一个女犯敢于偷看的。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从院子里看见了偷看的女犯人，或者他听到了某一位女犯的可怕的喊叫声，这位女犯认出了她的丈夫或儿子正在遭受非人的刑罚。

1943年1月里，有一次，苏台德出生的德国女看守亨尔特洛娃吩咐我，要我到楼下看守办公室去领一个灯泡。在通常情况下她是应该跟我去的。但是，当时的值班看守是勒斯莱尔（稍后他被调到庞克拉茨监狱）和哈德维格尔，他们两人对她的这种疏忽总是眼开眼闭。空无一人的走廊昏暗无光，尤其在一楼更显得阴森可怕。所有的牢房门都紧闭着。然而，我发现有一扇门却是敞开的。我从房门口闪身进去。原来是堆煤用的储藏室。我看见两位囚犯，在一个党卫军的监督下，正把一个年轻男子软弱无力的躯体放在煤堆上。死者赤身裸体，党卫军哈德维格尔正冲着他大骂共产党猪猡。在办公室旁边，某个囚犯正在数着数做下蹲动作，这是党卫军勒斯莱尔命令他这样做的。我听见气喘吁吁的数数声：856、857、858。但是，勒斯莱尔纠正那个囚犯说：801,802。囚犯在继续做着下蹲动作，上气不接下气地重复着：801,802……

查理广场监狱的走廊上有一扇窗子正好朝向一条人迹罕至的死胡同，这条死胡同的出口通向车水马龙的拉扎尔斯卡大街。在我成为杂役之前，很早以来监狱里便有这么一种习惯：女犯们有时候给外面的丈夫、父母或孩子们写去密信，叫他们到拉扎尔斯卡大街上来。每当进行清洁扫除时，大多数的女犯都簇拥到朝死胡同方向的那扇窗子上去擦玻璃。他们可以从这里看到站在那边的亲人，给他们飞吻，向他们招手。亲友们在这种“约会”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下面一层楼也有一个窗户，窗前有纳粹看守们放哨。达尔豪斯曾多次怒不可遏地冲进女牢，因为他从街上行人的举动中看出了他们正在给囚犯们打信号，因此，他要把当时站在窗前的人查出来。

女犯们每天有三次要把牢房里的便桶抬出去，因此，她们要三次路过那扇窗户。她们不得停留，但是，敞开着的窗户对她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快到它的跟前时，她们总是放慢脚步，盼望着能透过窗格子看到没有栅栏的世界。纳粹女看守亨尔特洛娃和库内尔托娃故意用她们肥胖的身子把窗子挡住，用粗野的声调喝令女犯们“快走！快走！”我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象那些路经窗口的女犯们那样，眼睛里充满了对自由无限的渴望。如果碰上萨帕罗娃值班，那么许多女犯都可以在那个窗户前停留几秒钟，有时候还可以透过窗子看见站在相隔约五十米远的拉扎尔斯卡大街上的亲友们，他们为了能看上一眼站在窗前的妻子、母亲或者女儿，也许已在那里等候了足足好几个钟头了。我曾看见喜气洋洋的在

押的母亲，她透过窗子看到了亲友们给她抱到大街上来的她的小宝贝。我曾看见伫立在大街上的妇女正在用手帕揩拭着泪眼，但是，我从未见过有某一位女犯在这种“约会”时会放声痛哭。这不是因为她生就一副铁石心肠，而是因为她不愿意给外面的亲人带来更大的悲伤。

我们常常成功地把女共产党员伊日娜·皮茨科娃从犹太女犯的牢房里叫到走廊上来。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她是一位中学教员。但是在纳粹占领时期，她只能在犹太学校里教小孩子。她参加了反占领者的地下斗争，1943年1月被捕并遭到严刑拷打，致使腰部以下和两腿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此后她的血管发炎，我们这些女杂役便把从捷克看守那里偷偷买来的鱼石脂磺酸铵油膏给她敷上，以减轻她的痛苦。当时，她的肺结核病又正值开放期。每当罗特罗娃女看守值班时，我们几乎总是说服她把伊日娜从牢房中放出来帮助我们打扫卫生。我们把伊日娜领到杂役牢房内，取出家里寄来的食物请她吃，从1942年12月起除犹太犯人以外我们已可以收到食物包裹了。

伊日娜·皮茨科娃是一位勇敢、坚强的女同志。伯姆曾企图迫使她交代，她是从什么地方给地下斗争组织搞来左轮手枪的。起初他残酷地折磨她。当严刑拷打无法奏效时，他便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企图软化她。他开始对她说，她是一位有学识的女人，她会明白过来的，会把她所知道的一切说出来的。尽管如此，伯姆还是无法从她的嘴里掏出任何消息。她毫无怨言地、勇敢坚强地忍受着痛苦的熬煎。我们常

常偷偷地把伯姆、赞德尔、弗里德里希、甘斯以及其他盖世太保警官所签发的传票拿给她看，然后，她从传票的签发人是谁这一点来研究它们的性质和目的。后来，盖世太保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把伊日娜·皮茨科娃同志枪杀了。

安尼奇卡·波列尔托娃也是查理广场监狱中的一名女杂役。作为一个犹太女人，她是不得和非犹太女犯——杂役同住一个牢房的。这样便产生了非常可笑的问题：她作为一名女杂役必须与其他女犯严格地分隔开来——这一点在杂役守则中有明确的规定；所谓杂役就是纳粹分子挑选出来的、从事楼道卫生工作和分发饭食的犯人——而现在她又和她们住在同一个牢房里了。当然，这样对牢房十分有利，因为安尼奇卡常常偷偷地送来报纸、食物、甚至严禁使用的铅笔和纸张，同时，又把狱中书信带出牢房，转交给一位捷克看守，再由他把这些书信投寄出去。

监狱中新来的男女囚犯越来越多。当所有的牢房都出现了人满之患以后，盖世太保便考虑把犯人转移出去。有些犯人被送到特雷津要塞监狱，有些犯人被送到第三帝国的纳粹法庭，有些犯人则被送进了集中营。盖世太保就象命运女神一样总会给每个囚犯安排好他们的归宿。腾出牢房之后，犯人数又会上日益增多，直至如同一口快溢出水来的大锅，此刻他们又把大锅里的水倒掉，然后重新把水注满一样。



1942年的圣诞节来到了。纳粹分子们希望至少在形式上粉饰装点一番。他们在监狱的走廊上也布置起了圣诞树，尽管在这些圣诞树下他们可以把人活活打死。然而，到底是有了圣诞树了，而且是一棵不小的圣诞树！

1942年圣诞节那天，查理广场监狱夜里的值班看守是罗特罗娃。她吩咐女杂役们把圣诞树上的蜡烛点亮，然后，把牢房里的女犯们都叫到走廊上，在她面前集合。那一天，许多女犯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她们真想痛哭一场。因此，有些女犯拒绝到圣诞树下面去排队。我们从牢房的门缝里，从取暖火炉的加料孔里，低声劝说她们：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她们的心情也许会好些；大家一齐唱唱歌，时间就会很快地过去。然而怎么劝也没有用。她们还是呆在牢房里痛哭起来。

我们大多数的女犯都聚集在圣诞树前。罗特罗娃还把犹太女犯从牢房中放了出来。起初她不同意这样做。但是我们对她说：既然耶稣原是个犹太人，那么，犹太女人当然也应该到圣诞树下来纪念这个节日。罗特罗娃女看守在我们四周和中间走来走去，禁止我们谈话。然而，她却无法叫我们沉默下去。当我们都站在走廊上时，她叫我们唱些歌。我们开始唱了一首古老的圣诞歌曲（“圣子耶稣诞生，我们多么高兴；啊，玫瑰花儿盛开，我们普天同庆！”），女看守还要求我们用德文演唱，遭到了我们的拒绝，因为我们不会德文歌曲呀。但是，有几个女犯却用德文演唱了《平安夜，圣善

夜》，接着，女共产党员们齐声高唱：

“我们在这里坐牢，
身上带着手铐、脚镣，
我们的主义却不会动摇！
只要一息尚存，
我们便快乐地歌唱，
不论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地方。”

接着，另外十来个女犯也跟我们一齐唱了起来。我们还演唱了沃斯科维茨和维里赫的歌曲。起初，我们唱得有点儿不自然，闷声闷气地，心里有些紧张，不清楚女看守会怎么说。然而她却默不作声，只是虔敬地站在圣诞树前。我们的歌声越唱越响亮：

“手铐、脚镣和锁链，
哪能把我们捆住？
手铐终要生锈，
锁链又岂能捆住自由？
自由岂能锁住？
我们宁愿抛弃头颅！
手铐终要生锈，
废铜烂铁岂能把我们锁住？”

解放戏院上演过的这些进步歌曲，许多女犯是不知道的。我们这些会唱的人越唱越起劲，特别是因为其他的女犯们都聚精会神地在倾听着歌曲的内容，她们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她们的眼睛放射出快乐的光芒，因为我们唱进步歌曲骗过了那个女看守。我们冲破了压在我们心上的沉闷气氛，我们把纳粹监狱中的圣诞夜变成了反击囚禁我们的人的斗争之夜。充满乐观主义的歌词作者沃斯科维茨和维里赫以及作曲家雅罗斯拉夫·耶热克，多次使我们在敌人的监狱和集中营里保持了旺盛的斗志。

当我们唱歌时，党卫军勒斯莱尔从男牢向我们走了过来。我们坚持把歌曲唱完，因为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反正他不懂捷文，他更不会去研究歌词的意思。就连会说捷语的罗特罗娃对歌词也不感兴趣。说实在的，她这个人相当笨。勒斯莱尔听了一会儿后，觉得这种旋律的歌曲不怎么象圣诞歌曲。罗特罗娃虽然立即命令我们停住，并且问道：“你们唱的是什么歌？”但我马上回答说：“是民歌。”接着，我们又继续唱了起来。

最后我们还演唱了《哪里是我的家乡》（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第一段——译者注）。勒斯莱尔听了一会儿后也跟着唱了起来。他不会歌词，但他会唱曲子，因为他出生在雅布罗内茨城。

当我们的歌声一落，勒斯莱尔便自言自语地说，这首歌他非常耳熟。罗特罗娃也说，她也听见过这支歌曲。令人无法相信的是，他们竟不知道我们唱的是捷克国歌呢。

对我来说，圣诞夜及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宛如梦幻一般。圣诞树上点着几支小小的蜡烛，在闪烁不定的烛光中，墙壁上晃动着恶魔一样的两个人影：它们一会儿变成了又瘦又长、头顶天花板、身子七扭八歪的高个子，如同童话《飞毛腿》中的主人公一样；一会儿又变成了弯腰驼背、长手长脚、耳朵或鼻子不成样子的怪人。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压迫者。我注视了一下勒斯莱尔和罗特罗娃，后者已渐渐忘记了看管我们的差事，她已不再左看右看，两眼只是凝视着勒斯莱尔。她偶尔也想起了我们这些女犯们，便用“斯施不分”的、破锣般的嗓子，操着捷语大声地斥责我们：“那边的人别说话！否则我要去报告了！”起初，女犯们分成两排静静地站着，不久她们的队形在昏暗中乱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堆一堆的人，大家都想找自己的同案犯探听一下消息。结果，有些女犯在继续唱歌，而另一些女犯则在秘密串联。

小蜡烛点完了，圣诞夜结束了。罗特罗娃女看守吆喝着把我们赶回牢房，我们身后的牢房门又锁上了。然而，我们并不因对被捕前所度过的圣诞夜的美好回忆而感到忧伤，我们现在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世界属于我们。现在，再也无法瞒过任何一位囚犯，纳粹国防军在斯大林格勒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英雄的红军正日益缩小对他们的包围圈。对我们这些政治犯来说，这就是最丰厚的圣诞节礼品！

早在1942年12月，米拉·内德维耶德在囚车中曾要求我

设法再给奥尔加·沃尔德日霍娃传个口信，要她在受审时也承认：米拉曾托瓦茨拉维克给她带去三封信（不能多说！）信的内容是询问他女儿汉妮奇卡的病情，因为他已经听说小女儿生病的事；但是，千万不能谈有关一位副教授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情况，那些人都是米拉的战友，他们现在还没有被捕。

1942年12月至1943年初，当“400号”即将瓦解之际，盖世太保没有提审过奥尔加。后来，“400号”被撤销以后，我已经无法把米拉的口信转告给奥尔加了，因为我被关押在查理广场监狱，而她却被关押在庞克拉茨监狱。当时，我也无法把米拉的口信托人带出去，因为在查理广场监狱里我没有找到一位认识奥尔加的女犯。米拉托办的事象千斤重担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1943年2月23日，正值尤列克四十岁生日，盖世太保又传我去受审。这一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英雄的红军建军廿五周年纪念日。就在最近几天里，红军又将自己所建树的伟大功勋载入了人类的史册：她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彻底打败并围歼了纳粹军队。

然而，我却带着不安的心情乘车前去佩切克宫。他们为什么要提审我？他们要我干什么？

在佩切克宫，一个党卫军把我带进“隧道”——大楼一楼狭长的走廊，我被捕后的头一个夜晚就坐在这里，“400号”被撤销以后共产党囚犯也在这里等候提审。党卫军让我坐在靠门的一条长凳上。对面靠墙的地方也放着同样的一条

长凳。两条长凳上都坐满了犯人。我打量着坐在对面的囚犯。在几乎是快到走廊尽头的地方我看到了尤列克。他也正朝我看着。当那个党卫军从他面前走了过去、背对着他时，他微微露出了笑容，非常快活地向我眨着眼，同时十分满意地用手理着胡子。我也向尤列克微笑着。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我们俩都为红军的辉煌胜利而高兴。我真想整天、整月、整年地这样看着他。那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相见。当然，那时我尚无法知道这一点。当时我只能好好地看一看他，连一句话也不能跟他说，连他的手也不许我摸上一下！

那一天，我在那边还碰到了奥尔加·沃尔德日霍娃。在看见尤列克之前我便先看见了她。她正好坐在我的对面。当党卫军从我们面前走过以后，我便向她探过头去，用手指了指自己，然后又指了指她，同时张大嘴，装出说话的样子。或许她能明白我的意思：我有话告诉她。但是怎样才能告诉她呢？当那个党卫军在走廊尽头转身又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迅速站起身来，跑过去向他报告说我要上厕所。我心里暗想：如果他放我去，奥尔加一定也会提出要上厕所的。但是，如果这个党卫军说上一声“先等一等”，结果一等就是几个钟头，象他的同僚通常所干的那样，那么我又该怎么办呢？然而——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惨败一定起了作用——他对我说：“去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谁还要去？”奥尔加立即站起身来。跟我们一起上厕所的可能还有一个妇女，但是，这我根本就没有注意。我心里想的只有奥尔加和米拉托带的口信。党卫军领我们到了厕所。他不象其

他的盖世太保那样跟进厕所里去，而是等在门外，我和奥尔加便消失在门后面了。

当我们回到“隧道”时，尤列克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没有进去受审。我不明白，那一次盖世太保为什么把我押送到佩切克宫来。我坐在“隧道”的长凳上一直等到吃午饭。午饭后，他们把女犯们带到“电影院”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不久，他们提审了奥尔加。奥尔加出来后，她低声告诉我说：“我可以回家了！”她当时穿着两件毛衣。她立即把它们送给了两位女犯，让她们在收到亲人寄来的内衣之前用以御寒。不久，盖世太保便把她带走了。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傍晚，盖世太保从庞克拉茨监狱押来了一批女犯。在这批女犯中我看见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其中还有奥尔加！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怎么回事，她还在这里！他们不是答应要放她出去吗？可我无法跟她交谈，因为女看守亨尔特洛娃正在监视着我们。每逢她担任值班看守时，女杂役们必须自己填写新进来的犯人卡片，因为她不怎么会写字。亨尔特洛娃只负责对女犯们的监视工作。站在她面前的每一个新来的女犯都必须把全身的衣服脱得精光，尽管这个女犯来自另外一个监狱，明知道她身上不可能有任何违禁品。亨尔特洛娃把女犯脱下来的内衣一件一件地拿在手里，对着太阳光仔细地察看，用手检查吊带，然后把一切都扔在地上，女犯们再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从地上拾起来。奥尔加被关押在几乎是走廊尽头的一间牢房里。

夜里，亨尔特洛娃来到牢房，叫醒了我们大家，然后，

通知女杂役安内什卡·费莉波娃说，她马上就要准备出发。半睡半醒的安内什卡惊恐失色，慌乱地收拾着几件零星衣物。几分钟之内她必须准备停当。她无法知道，他们是要把她送回集中营去呢，还是要把她送交法庭。我们匆忙地互相拥抱和握别。

我在牢房里成了孤身一人。

第二天早晨，前来值班的女看守是库内尔托娃。我对她说，在杂役牢房里现在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库内尔托娃问我：“您看哪一个女犯人合适当女杂役呢？”

我立即想到了奥尔加。然而我不愿直接提她的名字。以免引起女看守对我的怀疑。我只是向女看守说，在昨天傍晚押送来的女犯人中，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妇女，她一定是个干活能手。“她住在哪个牢房？”库内尔托娃问道。“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虽然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她叫什么名字？”女看守问我说。我耸了耸肩膀。“好，跟我来吧！”她这样吩咐我。说完，她那肥胖的身躯向前移动起来。我跟在她的后面走着。我们透过每个牢房门上的小窗寻找着奥尔加。直到走廊尽头的一间牢房里我们才找到了她。库内尔托娃问她：“您叫什么名字？”“我叫奥尔加·沃尔德日霍娃，”奥尔加敏捷地回答。“沃尔德日霍娃，您愿意当杂役吗？”女看守审慎地说着话。我躲在她的背后向奥尔加点了点头，奥尔加便说了一声“愿意”。

“好吧，”库内尔托娃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接着便把牢门锁好。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走廊和办公室都需要打

扫，不久还要分发午饭，给我帮忙的人是谁呢？

“我必须请示一下索帕。”库内尔托娃说，接着，便把我带回牢房。她自己去给监狱长打电话。回来后她对我说，索帕没有批准。据说沃尔德日霍娃是一个案情重大的女犯人。他推荐了另一名女犯担任女杂役的工作。我感到奇怪的是，既然沃尔德日霍娃案情重大，为什么索帕还把她押送到查理广场监狱中来？在查理广场监狱通常只关押案情较轻的犯人。女看守相信了我的貌似天真的提问，回答说她自己也不知道。按照人名目录，我们在犯人登记卡中找到了索帕所推荐的那个女犯所在的牢房号码。

库内尔托娃前去看望那个女犯。当她叫到她的名字后，一位年约十七岁的姑娘走了出来。女看守问她是否愿意在楼道里工作。姑娘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原来，她完全不懂德语。我把女看守的问话翻译给她听。姑娘用十分亲昵的声调回答说，这件事她没有想过，因为过两天她就要回家了。当我把她们的话翻译给库内尔托娃听了以后，她怒气冲冲地向那姑娘大喝一声：“滚！”然后把我们两人押送到杂役牢房里锁起来。

在牢房间里姑娘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坐在木板床上，双手安详地放在膝上。

“他们为什么抓你？”我问。

“因为我不想干活，”她微笑着回答。然后她接着说：“他们告诉我说，明天就要释放我了，我干嘛要留下来自讨苦吃呢？”

“你有道理，否则你就太傻了，”我诚恳地对她说。她不信任地看了看我。不过，她还是感觉出来我的话是郑重其事的。接着我又补充说：“即使女看守去告你，她同样也没有道理。他们不应该对你说，他们就要放你了。当两天女杂役，这里的地方你还看不过来呢！”

姑娘继续安详地坐在木板床上，我在一旁洗着锅勺碗盘。不一会儿，女看守又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然后冲着姑娘，一只手指着牢房门，以命令的口气大声喝道：“滚出去！”姑娘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来，慢慢吞吞地走了出去。（顺便说一句，第二天，那位姑娘便被释放出狱了。）女看守把姑娘送走以后，又回来对我说：“我还是把沃尔德日霍娃调来当杂役吧。”她可以不听监狱长的命令而这样做，因为她的男人也在佩切克宫里任职，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不久，她便把奥尔加带到我这里来了。

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们立即拥抱起来。我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照说她早该自由了，为什么她现在还呆在这里？她是否按米拉的口信照办了？等等。

奥尔加告诉我：自从我们在佩切克宫的厕所里密谈以后，警官维尔克传她到五楼受审。他问她：“那么说，您真的全都交代了？您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奥尔加恭顺地回答说：“不，警官先生，我对您说的并不全都符合事实。”

维尔克立即露出关注的神情，惊愕地问道：“怎么回事？”接着，奥尔加便按照在牢房里想好的一套，说她在上次受审时隐瞒了一个重要情况，后来受到良心上的责备，

因此，今天乘提审她的机会，她要主动地作一个补充交代。

据说，维尔克专注地听着她的“坦白交代”。当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时，他十分温和地催她快说下去。她根据米拉·内德维耶德的指示“交代”说：她曾经收到过内德维耶德寄来的信，上次她把这件事隐瞒了。维尔克好奇地问她接到过几封。她假装想了想，回答说“三封”。他对这一回答很满意，因为它与瓦茨拉维克的交代完全符合。“信里说些什么？”维尔克继续查问着情况。奥尔加又按照米拉的口信说，信里谈的是有关米拉·内德维耶德小女儿汉尼奇卡的事，当时小姑娘正病得厉害。内德维耶德十分钟爱她的女儿。当他听说女儿生病后，心里非常着急。因此，他在信中不断地询问汉尼奇卡的病情，并且请奥尔加多多关照她。

维尔克显然相信了奥尔加的“补充交代”，因此对她说：“由于您对我说了实话，我决定释放您。”

现在，奥尔加正等候出狱。不过奇怪的是：他们目前并没有放她回家，而是把她关进了另一个监狱。

奥尔加成了查理广场监狱里非常得力的好助手。她是医学院的学生，可以弄到狱医从来不给开的许多药品。

奥尔加在查理广场监狱里当了三个星期左右的女杂役。她是一位快活的人。她那乌黑明亮的眼睛永远闪耀着内在的力量和乐观的神情。她很幸运，她没有遭到毒打和折磨，因为她已经彻底“坦白”了全部“罪行”！

1943年3月18日晨，女看守把一份红色的公函带到女杂

役牢房，要奥尔加在上面签字。一年前我也收到过类似的公函，但是当时不许我看。当时我对女看守说，我必须知道要我签字的是什么东西才行。女看守一听，左右开弓抽了我两个耳光，而我还是莫名其妙地在她上面签了字。自从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获全胜以来，已是另一番情景了，我们俩也可以读一读给奥尔加的那份公函了。原来如此！盖世太保对她实行保护性拘留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是“共产党的地下领导干部”。奥尔加大错特错的是她竟相信盖世太保警官会把她无罪释放！

我安慰她说：她一定能被释放出狱；有的囚犯第一天签了字，而第二天便被释放了，这也是常有的事。诚然，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但是，当你要安慰一个受骗上当的孩子时，舍此又有何妙法呢！？

第二天，盖世太保提审奥尔加。“他们一定是来通知你要释放你了，”我以肯定的口气对她说。“或者他们要送我进集中营了。或者，我的案子又节外生枝了！”奥尔加这样说。

我们已经听说，在特雷津、在拉温斯布吕克已经建立起了集中营；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消息也时有所闻。但是，总觉得是那樣的荒诞不经，难以置信。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消息是由一位从庞克拉茨监狱来的女犯人带来的。据她说，在二月里，盖世太保把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的女犯关在她的牢房里，那位女犯说：那边的纳粹分子把犯人活活用煤气毒死。听了这个无法令人相信的消息后，某些女难友

常常在新来的那个女犯背后用食指在自己的脑门上划圈圈，意思是说：新来的那个女犯是个精神病患者！当时我们没有料到，1943年1月末，查理广场监狱的许多妇女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也被纳粹分子送进煤气室杀害了。

盖世太保把奥尔加叫出牢房带走了。早上和上午都过去了，午饭也吃过了，但还是不见她回来。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午后很久她才回到牢房。

“我被释放了！”她愉快地告诉我说。“怎么回事？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还让你到这儿来吗？”“是我借口说，我在这里还有东西的。我是专门到这里来跟你说一声的。”

我们俩相互道别。奥尔加对我说，她决不会把我忘记。果然，在我被关在集中营的全部日子里，她每个月总给我寄一包食品。

她从监狱中走了出去，她自由了。同志们把她从盖世太保的魔爪下拯救了出来。米拉·内德维耶德已经无法知道，他为了拯救她而传递给她的口信终于开花结果了。

查理广场监狱的女杂役牢房里又补充了一位新来的女杂役。我们又一天一天地过着铁窗下的监狱生活。

第六节 去向不明

1943年5月下旬，查理广场监狱中的许多女犯又将被押

往他处。一月份被押送走的女犯中有许多是我们的熟人，她们中有玛莉安娜·德沃夏科娃——雕塑家兹登涅克·德沃夏克同志的妻子。她已经预感到，由于精神上受尽了折磨，由于非人的待遇，由于单调的监狱伙食，她的末日即将来临。在监狱里她的两腿已经浮肿。在起解之日她偷偷地对我说，她已经心力不济，恐怕难以继续忍受纳粹的残酷迫害了。果然，她在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一月份被押运走的女犯中还有博热娜·波罗娃同志，玛莉亚·叶林科娃同志，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同志，伊尔萨·玛尔莎尔科娃同志，科普日沃娃同志，里瓦·弗里多娃同志和其他许多妇女。她们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便再没能从它的大门内走出来。

五月份，盖世太保要把我们押送到一个从未披露过的地方。我们必须随时作好准备。只要他们一叫名字，我们就得马上动身。他们告诉我们：不许携带任何包裹，至多可以把一小块犯人吃的面包带上。因此，我们把两三套衬衣内裤一齐穿在身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何时何地才能脱下来洗换；我们还穿着一、两件毛衣，以备冬日穿用。许多人在外衣里面再穿上绒线衣裤。我们就这样“全付武装”地“枕戈待旦”。然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而我们的起解却一拖再拖。在1943年的5月份里，温度计的水银柱直线上升，监狱里闷热难耐，加上我们全都穿得严严实实，这就更使人喘不过气来了。

尤列克也知道了押解犯人的计划，庞克拉茨监狱也在积

极准备之中。当时，查理广场监狱有几位女犯要到庞克拉茨监狱的牙医那儿去看病。她们抵达以后，捷克警察荷拉立即把此事告知了尤列克，并说他有办法把给我的夹带送到。尤列克的夹带写好后，他把它折得小小的，用包装乳酪的锡箔纸把它包好。荷拉把夹带从尤列克的牢房中带出后，便把它交给了男杂役斯科热帕，斯科热帕又把它偷偷塞到查理广场监狱来的一个女犯的手里。尤列克在夹带中还附上了三片防治伤寒病的药片。

下午，女犯们被送回查理广场监狱。当她们站在墙边，等候女看守前来带路时，一个女犯轻轻地用手向我示意，她有事找我。我迅速来到她的跟前，她把一个手帕塞到我的手里，并低声说，这是我丈夫捎来的。我把手帕藏在绒线裤的裤腿里。我激动得全身颤抖着。过了一会儿，我带着水桶走进厕所去看手帕中的东西。我在手帕里找到了尤列克手写的一张夹带，上面写着：女犯们将被解往波兰去服劳役，虽然那种苦活将极其繁重，但是，我作为一个女杂役也许已经习惯了，因为我已经经受了良好的锻炼。尤列克还对我说：他将被关押起来，终日无所事事地等候审判，而我却要象牲口一样去服苦役——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尤列克还告诉我：红军正向西乘胜追击着纳粹军队，过不了多久战争可望结束，不过，我应该估计到，在1943年里战争还结束不了。他要我勇敢坚强地去应付一切。尤列克最后说：密信读后立即销毁！密信的最后几个字是：“我的古丝蒂娜，再见了！你的尤拉。”

当我读着尤列克用蝇头小楷写就的密信时，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不是被关在几乎有200年历史的、小小的牢房里过着铁窗生活的囚犯，而是铁窗外面的自由人；尤列克正以他明亮的男中音向我诉说着信的内容。过去，我对于他能够生还的希望已如同行将熄灭的火种；但是现在，当我看到了他所写的“再见”两个字后，我心中时隐时现的希望之火却突然变成了熊熊的烈火，我坚信：我和他一定还能再见。我似乎看到，苏军正向柏林挺进，它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给法西斯强盗以最后的打击。我真想放声歌唱，我真想尽情跳舞。然而，尤列克下面这些话又使我不安起来：他将被拘押起来听候审判，他还要求我勇敢地、坚强地去应付一切。当红军把纳粹匪帮最后驱逐出自己的国土时，当给我们带来自由的太阳从苏联升起时，尤列克却静候着死神的来临！不可名状的悲哀猛地向我袭来：尤列克恐怕再也看不到从万恶的法西斯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祖国了。但是，一会儿后希望又代替了悲哀：尤列克一定能活到那一天……

他在密信中还谈到，他给我寄来了三片防治伤寒的药片，并附有用法说明。我十分感激给我带信的那位妇女，因此，我决定把这些药片赠送给她，因为她也要到波兰去服劳役。

我想把尤列克的来信送给正在前面擦洗地板的安尼奇卡·波列尔托娃看看。我把密信和药片用手帕包好，接了一桶水，提着它找到了安尼奇卡。我低声告诉她：我有要紧的话对她说。当我们又擦完了一段地板以后，我们一同去倒脏

水。在厕所里我从绒线裤的裤腿中取出尤列克的密信，把它交给了安尼奇卡。当她读完密信以后，我们商议：必须把押往地点设法告知所有等候起解的难友们，这样有助于使紧张的气氛和缓下来。对我们来说，到波兰去服劳役如同到某个农民家去干活一样，那还是可以忍受的。

第二天的值班看守是罗特罗娃。我要求她放几名女犯人出来帮我们擦窗户。只要是她值班，我们便安排卫生扫除。她的脑子比较迟钝，猜不到我们大搞卫生的真实目的。我们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把窗子擦洗干净，而是为了让几位难友能到牢房外面来呆上一两个小时，为了我们能和她们说说话。我们这些女共产党员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样的工作：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哪位妇女需要把口信传送出去，哪位妇女需要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哪个犹太女犯的牢房需要得到一点点食物补助，而我们就设法让这些女难友能到牢房外面来。

这样，我还跟把尤列克的密信带给我的那位妇女谈了话。她告诉我：当庞克拉茨的杂役把夹带塞到她手里以后，在她靠墙站着的全部时间内，她一直把夹带攥在手里。后来，党卫军领她进入囚车时，她把夹带偷偷塞到嘴里。她幸运地通过了三道检查：在庞克拉茨监狱，在查理广场监狱男牢和女牢。她把防治伤寒的药片藏在手帕的边角里，然后把手帕打了一个小结。

我把那三片药送给她用，然后把尤列克的密信撕成碎片，扔进厕所中冲掉了。

五月底，党卫军把等候起解的女犯立即出发的命令传到

了女牢。女看守罗特罗娃象一只受惊的母鸡奔跑着。她打开牢房门，冲着整个走廊高声尖叫着：“开拔了！出发了！快！”就连我也必须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儿，穿上外套，在走廊里面对墙壁站好。根本无法准备，出发到哪里去也无人知道。我们就这样站了很久，然后，一名党卫军把我们带下楼去。我们来到监狱院子里，然后上了一辆带篷的卡车。卡车前面坐了两个党卫军分子，后面一个党卫军押车，我们就这样来到布拉格的大街上。外面是一派明媚的春光。我们中的许多人已有好几个月没在布拉格的石子路上行走了。从前当我们自由自在地在布拉格街头漫步的时候，我们常常诅咒这些凹凸不平的石子路。根据卡车上下颠簸着的情况来判断，我们依旧在布拉格的街道上走着，因为这些石子路是我们行车时所能感觉到的（而不是看得到的——因为盖世太保不让我们往外看）唯一熟悉的东西。此刻烈日当空，我们在汽车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一些妇女坐着，另一些相互拥挤着站在车里；卡车在路上颠簸着，震得我们全身不停地颤动。难道非如此他们就不能把我们送到波兰去吗？

约两小时后卡车终于停了下来。响起了男人的说话声，然后沉重的铁门打开了，卡车开了进去，穿过过道，接着又停了下来。党卫军们把我们赶下卡车，我们定睛四下张望。原来我们来到了特雷津要塞监狱。

党卫军把我们集合好，发出了“起步走！”的口令。他们把我们带到另一个院子里。在一个办公室的门旁，一个党卫军命令我们面朝墙壁站好。每一位女犯都象一台机器那样

听从指挥。我们象机器一样朝墙根走去，又象机器一样在它面前停了下来。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瞒过党卫军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里千斤石头落了地，因为我们还留在祖国，我们还留在故乡的怀抱里。我们轻声地相互诉说着这种快慰之情。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绝望的人，而是充满美好希望的人！虽然自由对我们来说还十分遥远——它仍在千万里以外的东方，但是红军一定会来的，法西斯压迫者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

在特雷津要塞，我被关押在一楼的一间宽大的、圆拱形的牢房里，牢房中央放着一张用窄薄木板条钉成的长桌；牢房门对面靠近厚实的石墙边放着一张双层的架子床，床上铺着薄薄的草垫，草垫上放着肮脏的毯子。关在牢房中的女犯总共超过50人。不过，在这里我们都感到要比在查理广场监狱时自由得多。我们可以自由交谈。对我们的审讯已经结束。在1943年，特雷津成了犯人转运站：盖世太保从这里出发把一些犯人押送到集中营去，又把另一些犯人送上法庭。犯人在牢房中的关押时间都不超过一天，然后被送往各个工地，有些工地离那里足足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德国纳粹分子给我们女犯安排的工作是当缝衣工、当勤杂人员、在附近的菜地里干活、收土豆、放牧利季采山羊。事隔一年以后，我们在特雷津才听说：1942年6月海德里希被刺以后，纳粹分子为了镇压我们民族的反抗，把克拉德诺近郊的利季采村夷为平地，他们枪杀了所有的男人，把该村妇女全部送进了集中营。利季采村的所有缝纫机都被运到特雷津监狱供女犯

们使用，该村的山羊也被运到这里叫女犯们负责放牧了。

我在特雷津监狱被关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又把我送回了布拉格。谁也不愿意再回去受审，审讯结束对我们来说是最幸福的事。他们又把我送到佩切克宫。我紧张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提审。但是，当我空等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却把我押送到庞克拉茨监狱，然后准备再转车回查理广场监狱去。当时我独自站在男牢区靠墙的地方。周围寂静无声，连牢房内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好象整个监狱里都空无一人。突然我听到了一位捷克人悄悄的说话声。原来我的背后站着一个捷克警察。他低声告诉我说，尤列克问候我，他还一直留在这里。我轻声问：“他好吗？”据说他很好。我请求那位警察转告尤列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我从特雷津押送回来；我也衷心地问候他。不久，警察便从我身后走开了。尤列克怎么会知道我在庞克拉茨监狱里？也许是某个杂役看见了我，然后再通过捷克警察告知了关在牢房里的尤列克。

这是来自庞克拉茨监狱内部有关尤列克的最后消息。我是在1943年6月初得知这个消息的。

直到1945年我从集中营回到家里以后，才从尤列克从鲍岑监狱寄给他两位妹妹的信中知道：当时，伯姆警官曾对他许下了要释放我出狱的诺言。也许这就是把我从特雷津押送回布拉格的原因。但他们并没有把我释放，仅仅是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罢了。

我回到查理广场监狱以后又当上了女杂役。此时，他们已把尤列克送到德国的监狱中去了。当时我对此尚一无所

知。我每天都期待着传我前去受审，每天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能再看到尤列克。但是日子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提审我，也没有人告诉我有关尤列克的任何消息。

六个星期以后，他们又把我押送到特雷津。当我靠墙站着时，兹登涅克·诺瓦克同志看见了我；他是于1943年1月因其它案件被捕的，现在在特雷津要塞院子里当勤杂工。几天后他托博热娜·斯沃博多娃同志给我带来消息：他们已把尤列克押送到鲍岑监狱，尤列克离开时情绪极佳。

在特雷津监狱里我度过了约六个星期。一天清晨，当我们站在监狱院子里进行早点名的时候，女党卫军用手指了我一下要我出列，然后问我会不会烧饭。她要收我当她家的佣人。我盯着她的两眼回答说：“我不会！”给党卫军的家庭烧饭我才不干呢！

两位女同志——托妮奇卡·哈洛娃和米尔卡·什特罗波娃——把我领到她们的牢房中去，她们是在我之前便从布拉格的监狱被押送到这里来的，现在每天在菜地干活。此后，每天早上七点左右，我们十名女犯在一个党卫军的带领下从要塞来到菜地劳动。每天清晨，当我们步出要塞的大门时，拔地而起的米列肖夫卡山在迎接我们。每天我都在想：它曾多少次经受了暴风骤雨的袭击，它上面又有多少百年古树曾被推倒、被砍伐、或者被雷电劈成了碎片，但是，米列肖夫卡山还是那样的庄严、雄伟，任何力量也无法把它摧毁。它就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希特勒匪徒们把无数同胞毒打和折磨

至死，但是，他们却不能把我们这个民族摧毁！

当我们极目远眺那四周迷人的景色——那连绵起伏的山峦和苍翠茂密的果林——时，激奋之情油然而生。它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此，我们都快乐地走向菜地。每天当我眺望米列肖夫卡山时，我便不由地想起了尤列克。在我们被捕以前，我们常常一同路过这里，我们也常常乘车到这里来；尤其是当尤列克需要为《创造报》和《红色权利报》构思文章时，有时候他便坐上往北开的火车，到莫斯特去，到乌斯季或者到杰钦去。尤列克是多么热爱易北河所浇灌的、美丽的中捷克丘陵地区啊！

在菜地里我们回忆起往事，梦想着未来。我们避开带队的党卫军的视线，消失在树木背后，消失在一丛丛的西红柿中间。我们蹲在地里偷偷地和从雷特津监狱犹太区来此干活的犹太人交谈。他们忍饥挨饿，其处境比我们更为凄惨。当我们收到家中寄来的食物包裹时，我们常常把其中的一些东西偷偷地分给他们。

中午，党卫军又把我们押回要塞去吃每天千篇一律的土豆汤午餐。生活还不算太坏。折磨人的审讯已经过去。但是，每天我们还是在紧张、不安中打发日子，因为我们或者死亡或者自由的最后时刻正一天一天地临近了。

妇女们从没有象在盖世太保的监狱中那样强烈地关心着政治形势和地理知识。她们所关心的政治形势就是：红军的挺进情况，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在何时开辟第二战场，如果他们信守诺言的话。美英政府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拖延一天，

囚犯中便会有更多的人成为它们新的反对者。红军向我们这个方向已推进了差不多500公里，然而，她离我们还十分遥远（2,000公里以上）。在半年的时间内，红军向西前进的速度是500公里（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照此计算，红军到达我们这里尚需一年半的时间，也许纳粹分子越到后来逃跑得也就会越快。

然而，1943年7月初，我们又感觉到战争变成了胶着状态。法西斯分子试图在东线发动新攻势。我们都替红军捏着一把汗。我们紧张异常，心焦如焚。许多个晚上，当我们被锁在牢房中时，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对形势作了种种估计，相互争论，或者同声责骂那些对美英政府抱着幻想的女犯（她们的人数已越来越少）。许多人指出，美英两国政府根本就不管纳粹占领区各国人民的死活，它们一心想把红军拖垮；但是，他们的这一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我们的牢房里渐渐分成了两派。我们指责对方说：英国人在法国的迪埃普登陆，但是，几小时后又被德国人赶了回去，他们连豆腐兵还不如呢！我们说话时都带着这样一股情绪，似乎上面这一切都应该由我们的对立面负完全责任。

当我们听到红军重新攻克了奥勒尔和别尔哥罗德、现在又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西挺进的消息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呀！这些消息是通过曲折的途径零星地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我们在菜地干活时从犹太菜农那里、从在办公室当清洁工的女同志那里（她收听了广播）、还有在院子里放风时从男犯那里听到这些消息的。

这一切尤列克知道吗？在我的脑海里唯一的念头是：他千万不能有个三长两短！我暗自祈求苍天多多保佑他去战胜那些杀人成性的刽子手。

正当红军在前线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却常常看到：从工地上临时找来的囚犯们把惨死的难友们的尸体用手推车推了回来，这些死难者直挺挺地躺在车上，两眼望着特雷津的天空，他们是被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看守活活打死的。我们回到牢房后又焦急不安地谈论起来，气愤地躺在架子床上，从睡梦中惊醒，为死难者叹息，然后，又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

有时我也产生过天真的想法：既然尤列克要出庭受审，那么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他们还要关押他多久？我多么希望他们能把他一直关到战争结束！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看见用手推车拉回来的一具具尸体时，我马上联想起了尤列克，我的心里便象针扎一般地疼痛。自从我被关押在特雷津监狱以后，我从没有收到过他两位妹妹的来信，也许她们还知道些有关他的消息吧。然而，当我接到她们给我的第一封来信时，一切都已经完了……

第七节 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

每星期六早上，当我们在特雷津要塞的院子里集合好进行点名时，总会有一位女看守手拿一份押往外地女犯的名单走过来，大声地念着她们的名字。我觉得它如同抽签一样：

把写好的号码放进小口袋，摇晃一下口袋，然后，伸手进去把号码一个一个地取出来。我们就这样被选中要押往外地去了。现在我们被关进了与外界隔绝的特种牢房里。我们能带着上路物品只有身上穿着的衣服，一支牙刷，一把梳子，一块肥皂和一点儿面包。我们在特种牢房里共呆了两天，星期一我们被送到了博胡肖维采火车站。

1943年8月下旬，我们一群女犯就这样离开了特雷津要塞监狱。我们没有到院子里去乘卡车，这就是说我们不是去布拉格。我们共有二十人左右。当他们把我们押送出要塞时，我们身后的大门便永远地关上了。在火车站，年轻的齐娜·博乌什科娃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她突然惊恐万状。她把整个身躯紧紧地贴在我的怀里，我低声地劝慰着她。然而，党卫军们立刻把我们俩分开，然后，把我们分别押到不同的车厢里。直到今天，齐娜可怜的呼喊声依旧在我的耳边回响：

“你不能丢下我呀！我要跟你去！”

火车开动了。我们告别了风景如画的中捷克山区。我还能和她们重逢吗？

晚上，他们把我们送进德国萨斯卡·卡梅尼采的监狱里。一个看守把三层或四层的牢房分给我们，一名囚犯（杂役）领着我们沿铁楼梯而上走向我们的牢房。他低声告诉我们说：他是捷克人，家在布拉格。此刻，我们虽然身在德国监狱，但是，却没有沦落异乡的感觉。夜里，大群大群的臭虫从草褥子里爬出来，咬得我们无法安睡。

天刚蒙蒙亮，党卫军们又把我们押送到了火车站。我们

登上车窗上装有栅栏的、押解囚犯的专列，然后向纳粹帝国的
心脏驶去。火车在沿途的许多车站上都停车，因此，直到
晚上我们才驶抵柏林。在夜幕笼罩下，党卫军们把我们送到
亚力山大广场的老监狱里。监狱看守把几个妇女带到一间宽
大的牢房里，那里已满满地关着300名左右各个民族的女犯。
我和另一个名叫玛莉亚的捷克姑娘来到一间小得多的牢房
里，那里挤满俄国姑娘和几个德国女人。我们在监狱最高一
层闷热的牢房里，在只能打开一手指宽缝隙的铁窗下面度过
了一个星期。我们两人一组挤在一张满是臭虫、肮脏不堪的
小草褥子上睡觉，那些臭虫咬得我们连白天也不得安宁。

一天晚上我们都躺下了，突然响起了闷雷般的爆炸声，
铁窗外面亮起了耀眼的光芒。接着又是一声轰鸣。玻璃在哗啦
作响，墙壁也在颤动，又传来了密集的轰炸声，如同直接命
中了我们这个监狱一般。这是空袭！在每一次的爆炸声里，
俄国女人都使劲地鼓掌，德国女人畏缩在墙角里，跟我们同
来的那个捷克姑娘则放声大哭。她还不满二十岁啊！然而俄
国女人比她还要年轻得多。她们已经没有眼泪了。“但愿我
们的飞机把整个柏林炸平才好呢！”她们大声地倾诉着自己
的愿望。对她们来说，她们是否会与柏林同归于尽，这已经
无关紧要。柏林被挑起大战的法西斯分子控制着。她们清楚
地知道，他们必将受到惩罚。纳粹分子把许多年轻的俄国女
人和乌克兰女人运回德国，强迫她们象女奴那样干活。然
而，她们生长在苏维埃的土地上，无法忍受惨无人道的奴
役。因此，她们大批大批地开小差。虽然她们把带在左胸前

的名签——耻辱的标记撕掉了，然而，在当时情况下绝大多数德国人还不懂得应给她们以同情和支持，反而把她们告发了。盖世太保便把这些逃跑的俄国女人和乌克兰女人关进监狱，然后，再把她们送到集中营去。

一个星期后，党卫军们把我们带到监狱院子里。几百名妇女——捷克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茨冈人、荷兰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天晓得还有从哪些国家来的女犯——聚集在阴森可怕的监狱院子里。她们中有形形色色的女人：有长期监禁和残酷审讯使他们的脸色变得苍老不堪的妇女；有年轻的、脸色红润的姑娘；有栗色皮肤、穿着百褶裙的吉卜赛女郎；有早在冬季被捕的、身穿皮大衣、脚踏毡靴的女人；有身穿春大衣和单薄的西装的女人；有头戴夏日头巾、光脚穿着凉鞋的女人；以及戴着珍贵耳环的女人等等，如同化装舞会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唯一缺少的是那舒畅的笑脸。尽管看守们不停地喊叫着“安静！安静！”，但是，院子里嘈杂的人群依然无法安静下来。

所有这些妇女都将成为离此不远的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牺牲品——不久之后，它将把她们全部吞噬掉。从它那贪得无厌的血盆大口中死里逃生的妇女可以说寥寥无几，其余的全都惨死在这个集中营里。从这个五光十色、纷乱繁杂的人群中，多少妇女将在两三个月内死去，又有多少妇女活不到新年的来临！但是，从她们的神态中你会发现：自暴自弃、听天由命者只属少数。每一个妇女的心里都怀着一定要活下去的强烈愿望！

八月末，柏林的党卫军把这几百名妇女押上了火车。我们默默地坐着。看押我们的党卫军们无法从我们刻板的脸上发现我们的思想活动。但是，我们都心如刀绞，因为我们正日益远离我们的祖国，远离我们的母亲，远离丈夫和孩子们。

约两个小时以后，火车便把我们送到了位于柏林北面80公里、麦克伦堡省的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军们大声吆喝着把我们赶下火车。在拉温斯布吕克土地上，当地的男党卫军和牵着狼狗、穿着肥大裙裤的女党卫军分子用震耳欲聋的斥骂声“欢迎”了我们。我们排成五列纵队——它成了我们后来监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动作必须十分迅速，因为集中营正如饥似渴地盼望着我们这些“食粮”能尽快运到。接着，队伍前面由一个男党卫军带领，两旁是手牵狼狗的女党卫军分子，后面又有许多男党卫军押队，我们就这样出发了。虽然，凶猛的狼狗狂叫着、奔跑着，铁链子发出铿锵的响声，其间还夹杂着粗鲁的吆喝声，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我们都希望至少能看上一眼这里美好的景色。在蔚蓝色的天幕上飘着白云，明亮的阳光洒满大地，空气清新、透明。在不远处是静谧的松林。它的对面是一望无际的湖水。美丽的、然而是该诅咒的土地。

我们的队伍走进了集中营的大门，集中营四周是高大、厚实的围墙，围墙上面装着好几层铁丝网，使它显得更加巍峨高大。我们来到一间木板房的跟前，他们命令我们原地立定。一会儿后，木板房的房门打开了，几位女犯走了进去。

她们全都再没有回来。我们队伍的人数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少。在我们跨过木板房——所谓的“浴室”——的门坎以前，我们站着等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真想猜透这个集中营的秘密。在上午这段时间内，它如同渺无人迹一般。我们看见的只有那一排排低矮、昏暗、象长方形盒子一样的木板房，它们都面对着街道。第一眼的印象是：一切都整齐清洁、井井有条。我们彼此耳语着，为他们没有把我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而感到万分庆幸，虽然我们对两个集中营的生活情况同样是一无所知。突然，我们的注意力被令人惊奇的场面所吸引：四名女犯（她们中大多数身穿条纹衣服）拉着一辆板车，板车上停放着三具用木板条随随便便钉成的、没有油漆的棺材；由一名女看守，手牵狼狗押送着的这一小群女犯，口中唱着欢快的德国小调，就象在搬运最普通的货物一般；拉棺材的板车摇晃着穿过大门走了出去。

终于轮到我了。我走进木板房，一位袖子上标有紫红色三角形标志的女犯抓住了我。后来我们才知道，带有这种袖标、在浴室或其他工地甚至在党卫军家中干活的这些女犯是被取缔的宗教异端分子。那位女犯用一根长长的、扁平的细木棍儿拨弄着我的头发，看看是否长了虱子。所有的俄国女人和乌克兰女人则概不客气地被剃了光头，因为根本就不值得用细木棍儿去拨弄她们的头发！我们虽然已经没有了眼泪，但是当我们看见：从惊魂未定的俄国金发姑娘头上剪下来的粗大、漂亮的辫子在带有紫红色三角形袖标的女犯手中晃动的时候，我们禁不住伤心地痛哭起来。她们夺走了我们

手上带着的戒指（连结婚戒指也不能幸免），一切首饰和耳环，还有上衣、皮大衣、内衣裤、皮鞋等物，直至使我们一丝不挂为止。我们的私人物品只剩下一把梳子和一支牙刷。每个人还领到一个名签，我的名签号码是22262。最后，我们每人还分到一小块暗绿色的肥皂，接着让我们走进一间巨大的浴池，浴池的天花板上象电灯一样装着许多淋浴用的莲蓬头，我们赤条条地站在它们下面，等全体女犯到齐以后，给我们放了一点儿水。洗澡完毕后，我们都分到了内衣和外面穿的衣服：衬衣洗得污七八糟，上面还残留着伤口的脓血痕迹；其次是一条老式的、和衬衣一样洗得污七八糟的麻布长衬裤；再次是用人造纤维制成的、单薄的、灰蓝色的衣服，它们被压得全身发皱，上衣短袖口的布边已磨得破烂不堪。他们还发给我们一双木屐。我们的内衣裤、外面穿的衣服和高级皮鞋都到哪里去了？穿着这些东西我们根本就无法走动！一个女人看着我这身打扮突然苦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我们光着脚穿着宽大的木屐，极力试图让两只脚放得舒服一些，但是枉然。当我们刚一迈步时，硬邦邦的木屐便硌得我们的脚疼痛难忍。

他们领着我们走出了浴室。我们变成了一群没有区别的人——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鬼——我们彼此都无法区分开来，虽然有些妇女是光头的，有些是披散着长发的，另一些妇女的头发是半黑半黄的，或者半灰半黑的；有些妇女的头发是平直的，另一些妇女的头发还残留着电烫的痕迹，没有发夹，也没有梳子，身上穿着满是皱褶的、没有腰带的衣

服，手里拿着一支牙刷和一把梳子；有些妇女则两手空空，只是两脚穿着木屐，集中营收下了我们这般打扮的妇女。

在那边度过的最初一些日子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我们跌跌撞撞地来到给新到的女犯们居住的木板房。集中营里的每一个囚犯——只要他还没有断气——都必须干活。所有的妇女都被编入各种各样的劳动小组里。比如，第一小组帮厨，第二小组洗衣服，第三小组在医务室，其余的在缝纫厂、在公路上、在安哥拉兔房、在猪圈、在打字室等地干活。没有被编入各种劳动小组的妇女则从事临时性的突击工作。因此，我们这些新来的便成了供人任意驱使的“听差”。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分配到往地窖里搬运土豆和圆白菜的一个小组里的。我们到达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第二天，一个身穿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到关押新来女犯的第10号木板房，要求分给她10个名签（即我们这些女犯），以便把圆白菜搬到地窖中去。带有刑警队绿色三角形袖标的这个维也纳女看守挑选了几个妇女，其中也包括我，然后，把我们带到厨房前的空地上，那里的圆白菜已经堆成了山。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搬走。每两个女犯分到一付铁担架——那是用铁棍、铁钉钉成的，用上一百年也保险不会损坏！抬这样的空担架我们已经非常吃力，更何况还得把圆白菜装得满满的，把它们抬到离地面很深的、弯弯曲曲的地窖里去。女看守不时地走过来，冲着我们吆喝着：“快抬！快抬！”当女看守不在时，我们小组的头头、带有黑三角袖标的一个德国女人——人称母夜叉——便照样地咋呼起来。沉

重的铁担架不一会儿便把我们累得半死了！

起初，我们真的把铁担架装得满满当当，但是越到后来——只要我们听不见她们的吆喝声——我们停下来休息的次数就越多。这种笨家伙能当饭吃该多好啊！我们都留心观察着其他搬菜的人是否还在干活。只要有人稍一松劲，其他的人便竞相效法。那些狠心的德国女人不停地斥骂我们，催赶我们快干，而我们就装成听不懂德语的样子。每一次，我们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木板房。午饭是清汤红球甘蓝加上四只冰冷、干瘪、带皮的小土豆。下午我们又接着去运圆白菜。晚饭与午饭完全相同。夜深人静之际，当我和玛丽亚蜷缩在一条肮脏的薄被子里冻得浑身打颤时，女楼长又会以凶狠的尖叫声发出命令：“赶快起床运圆白菜去！”这就是说，我们又必须马上起来去干活了。精疲力尽的我随着其他疲惫不堪的妇女们走了出去。此刻又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没有任何雨具。我们的头发淋湿了，露在短袖外面的两只手淋湿了，没有袜子穿的两只脚也淋湿了，身上单薄的衣服湿透了、变硬了。约一小时后我们又把一大堆圆白菜运到了地窖里。

然而，我们还没有睡上两个钟头，尖厉的呼叫声又把我们 from 梦中惊醒：“把咖啡端上来！”为了不听到这该诅咒的声音，我用肮脏的被子堵住了耳朵。我们新来的犯人都必须经受这样的“磨练”。白天黑夜他们都从不让我们有半点儿安静的时间。这是榨取你全身脂膏的苦役！

我在想：假如他们把我送进集中营去的话，那么他们一

定会把我的案子从头至尾复查一遍，结果尤列克便要跟着倒霉。我想起了他在布拉格盖世太保司令部候审室里对我说过的话。他说：“古丝蒂娜，我知道我是无法活着出去的了。除非出现某种奇迹，我才能从死亡的魔爪中挣扎出来。但是奇迹是不会有。请你相信，我从来就没有把死放在心上。”无法更改的、日益临近的这种结局使我焦急万分。我陷入无言的绝望之中。失掉了尤列克，生活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不！这不可能，尤列克是不会遭遇不测的！

我跟着我们小组的难友们走了出去，女楼长无数次地、不管白天或者黑夜、老是逼着我们去搬运圆白菜和土豆。谁也无法偷偷溜走，或者找个地方躲起来。组长和她的狗腿子紧紧地监视着我们。不管你跑到哪里，她们都会把你抓回来，她们手里的皮鞭会照例劈头盖脸地向你抽去。

当我一闭上眼睛，我便仿佛看见了一大堆红球甘蓝，它们如同被党卫军们砍下来的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一般。在集中营的厨房里，每天要为千千万万被关押在这里的女犯们煮几百公斤的红球甘蓝和同样数目的土豆，把它们做成千篇一律的饭菜：清汤红球甘蓝，再加三、四个干瘪、冰冷的带皮土豆。而我们这个小组则一天到晚不停地抬铁担架，把圆白菜搬到地窖里去放好。

我在院子里拾到一根破草绳，我把它缠在腰间，再把分来的一小块面包、一把小木梳和一把木汤勺挂在草绳上。一位女难友对着我喊了一声：“嘿，真花哨！”是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花里胡哨的丑八怪了。

被捕前我所认识的一些捷克女同志有时会到木板房前来找我，在这间木板房里新来的难友们已住了三、四个星期了。这些捷克女同志是：萨波托茨卡，杜什科娃（契斯塔太太），布拉格音乐学院女生弗拉斯塔法贝罗娃，和我一起在查理广场监狱里当过女杂役的安内什卡·菲莉波娃。为了不致把我冻坏，她们还送我一双袜子和两只从衣服上剪下来的毛线袖子。九月初，早上已开始霜冻。袜子我留作自用，毛线袖子我则转送给了玛丽亚，让她戴起来也可以暖和些。

按照集中营的规定：犯人每月可以写一封长十五行的家信。本来我要到十月里才能发出第一封信，但是，在捷克女难友们的协助下，我在九月份的上半个月便给尤列克的大妹妹莉巴写了信。因此，她知道了我的新地址，9月13日便给我来了回信：

“亲爱的古丝婷卡：

当我收到你从特雷津寄来的内衣包裹时，我以为你很快便可以回家了。但是，你却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结果，我们这儿还只是我们孤零零的几个人。我曾收到了尤列克的来信，发信地点和日期是：鲍岑，8月9日。信的一半是写给你的，他获准给你写信，他请你也给他回一封信。他现在在柏林普勒岑湖监狱。我每天都盼望着他来信。只因路途遥远，书信往返甚费时日。我已向你们集中营管理处提出了请求，请求他们准许我把尤列克的来信转寄给你。尤列克说，你尽可以放心，心情要好，没有必要焦急

不安。他时刻都在惦念着你……希望你很快便能来信，或者如果你只能写一封信时，我求你还是把信写给尤列克吧。他的地址是：柏林，普勒岑湖——施特兰范施塔尔特。”

我立即向集中营管理处提出申请，请求批准我写封急信。我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却不置可否。因此我还是必须等到月底——犯人法定写信的日子。

1943年9月，纳粹分子把约什卡·巴克索娃押解到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对我说，在德累斯顿监狱里她曾见到了她的妹妹莉杜什卡，她是在盖世太保押送下从柏林法庭途经那里回布拉格的。莉杜什卡告诉她：8月25日，柏林的纳粹人民法庭对尤列克、米雷克和她（莉杜什卡）作出了判决，她获准释放。

“尤列克结果怎么样了？”我紧张地问道。

“他的结果你定能想象得到，”约什卡回答。我呆呆地望着她。是的，他的结局是我意料中的事，但是我始终不愿意承认这种现实。现在我担心约什卡会说出那可怕的字眼：他已经死了。

当时我已经不再住在十号木板房里，而是住在八号木板房里，大家简称它为“八号”。那里一半住着从利季采来的妇女，另一半住着其他捷克女犯。象其他木板房一样，“八号”的女犯也越来越多，最后整个房间被挤得水泄不通，如同木盆里膨胀起来的发面面团一样。据说从前每个女犯都有一个铺位，而现在是两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在被关押在“八号”的全部时间内，我必须常常把被褥从一张床上搬到另一

张床上。当某位女同志上夜班时，我便睡在她的铺位上去，当这位女同志改上白班时，我又得另找一个上夜班的女犯，到她的铺位上去休息。

和约什卡·巴克索娃谈话后，我茫然若失地沿着集中营装有电网的围墙走来走去，电网下面挂着的木牌上画着骷髅脑袋，它告诉人们：碰一下电网便有生命危险。“我的尤列克啊！我的尤列克啊！”我不停地低声呼唤着他的名字。我已处于绝望的边缘。但是最后我还是振作起来。是的，他已经被判决，但他仍然活着。他至少还有100天的执行判决期限。而一百天共有三个月，不，比三个月还多，有三个半月哩！我计算着到期的那一天，它将是12月3日。然而在这一天来到之前将出现许多足以挽救尤列克生命的机会！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必须把尤列克抢救出来！

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尤列克。许多个夜晚我都梦见了他被盖世太保围追堵截的可怕场面。我梦见他在前面拚命地跑，盖世太保在后面拚命地追，接着他们伸出杀人的魔掌向他扑了过去。我死命地向尤列克呼喊，但是他听不见我的喊声。无数个夜晚我从这样的恶梦中惊醒，醒后满身冷汗。从我得知法院已作出了判决的那个时候起，我的思想深处便经历着两种命运激烈的决战：是法西斯主义先行被消灭呢，还是尤列克？尤列克的身影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百天——这是他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时刻。每过一天，法西斯主义的末日便早一天来临，然而它也可能意味着尤列克的生命便会早一天结束。一位身强体壮、年富力强的年青人，由于他不承

认异族对自己民族的占领，由于他反对奴役他的民族的外来侵略者，因此便招来了杀身之祸，面临砍头的厄运——这一切是多么叫人无法理解、难以置信和荒谬绝伦啊！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清楚地知道，如果现在让尤列克在下列二者中作一选择：或者在我们民族反对外来占领者的伟大斗争中袖手旁观以换取个人的苟且偷生，或者明知将在斗争中死去而依旧毅然决然地去参加战斗，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重新经受斗争的考验。他积极地进行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反动派和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他积极地为争取我们祖国的真正自由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而奋斗了终生，对此他从来没有感到遗憾。

九月末，我利用我们可以给家人写信的机会，给尤列克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尤列克！

我获准给你——我亲爱的人——写信。莉巴把你的地址告诉了我。我还从与莉达谈过话的约什卡那里知道了关于你的其他消息。我期待着莉巴把你写给我的那几行字给我寄来。也许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想能立即看到它们！我每天都在和你交谈，我每天都在抚摸你，我每天都在吻你，我最亲爱的人！现在我们一同到了克尔科诺舍山，山风送来了夏天最后的问候，骄阳当空，我们如同那次在高塔特拉山上一样被晒得两颊绯红。我们来到山间旅馆，品尝了龙胆草。这个月我们又要到钟比耶尔去，然后去游览波洛尼纳。虽然我们要当心狗熊，但是，跟你在一起我什么也不害怕。最后我

们回霍季姆涅日村去看看我们的家。西科尔卡(捷文,意为小山雀——译者注)是否又回来了?耶里克在干些什么?我们又得上山去打柴,又要忙得不可开交了。特别是你的文学史,你要在霍季姆涅日村把它写完。现在,我的尤列克,让我吻你,握你的手,拥抱你。再见!你的古丝塔。”

当时我没有料到,我的这一封信以及以后所有的信件尤列克再也收不到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出事的情况。

九月里,在博热娜·霍列奇科娃同志、米尔卡·玛耶罗娃同志、特别是来自维也纳的捷克妇女安尼奇卡·瓦瓦科娃的帮助下,我被调到在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基建处干活的一个小组里,该公司当时正在拉温斯布吕克兴建一个分公司。我被分配到新建的车间里劳动。在安装机器的最初阶段,我们干活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我们的工作:从附近一个林子里把砍倒的大树抬回来,把它们锯断,劈成木柴,供西门子公司职工生火取暖。车间建成以后,我们便负责擦洗窗户;后来,我们小组的人数日益增多,整个小组的工作由纳粹工头克尔肖克领导。他分配我当工具保管员,这些工具是从维也纳、柏林、耶纳和其他德国和奥地利城市订购的。车间生产机器零件,它们的用途我们谁也不知道。

大约在十月中旬——在我给尤列克写信后不久的一天早上,“八号”木板房的女管理员在点名时专门叫了我的名签号码。我答应说“在!”我问她叫我干什么,她只是耸了一下肩膀,因为她的确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开始不安起来,我在想,他们又在我身上打鬼主意了。但是点名后我照例

跟大伙去干活，没有任何人前来阻拦。上午，女看守长霍尔特维罗娃来到我们的牢房里，她也专门叫了我的名签号码。我又应声说：“在！”接着她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整个上午我反复地想，她们为什么老在注视着我？到了中午时分，女看守长又来到我们的牢房，命令我跟她走一趟。

“您带我去哪儿？”我问她。

“去集中营管理处。”

“干什么去？”

“难道我知道您干的好事吗？”

“我一点也不明白。”

“没有事是不会叫您去的！”

我们俩一声不响地、默默地走着，也许他们是要把尤列克的来信转交给我，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那封来信。或者又要调我到别的集中营去？此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在集中营管理处，女看守长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两个党卫军正等候在那里。女看守长向他们报告说：她已经把22262号带到。说完她便退了出去。我站在门旁等待着。

一个党卫军把我叫到办公桌旁，桌上正放着我给尤列克写的信。他问我那封信是否是我写的。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您这封信是给谁的？”他厉声问道。

“是给我丈夫的。”

“您怎么会知道他的地址的？”

地址是尤列克的大妹妹莉巴告诉我的。莉巴的来信在集

中营管理处已经过检查，因此我完全可以说是她告诉我的。

“他妹妹告诉我的。”

此后他们便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了一长串问题。还没等我回答完第一个问题，他们便提出了第二个。

“关于他您听到了些什么？”

“听说他被判决了。”

“您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从一位女犯那儿。”

“波洛尼纳是什么意思？”

“是外喀尔巴阡山地区的一座高山。我和我丈夫常常去那里休假。”

“您什么时候到过那里？”

“1937年。”

“您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我们在那里休假。”

“您在信里写熊是什么意思？那是暗号！”

“不是暗号。在波洛尼纳山上就是有熊。”

“你们家里曾经窝藏过——（党卫军查阅着我写给尤列克的信）西科尔卡！”

“不是窝藏。是它们自己住在桌子腿里的。”

“胡说！”

“西科尔卡是一种鸟。我不知道德文怎么说，所以在信里我便写了西科尔卡。我和丈夫住在霍季姆涅日时，这种小鸟在我们家的圆桌腿里筑了窝。”

“霍季姆涅日是什么意思？”

“霍季姆涅日是我们住过的村子。”

党卫军的审问真叫我啼笑皆非。他们规定我们从集中营寄出去的所有信件只能谈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我原想告诉尤列克，我回忆起我和他在霍季姆涅日村共同度过的日子，回忆起我和他在克尔科诺舍山，在高塔特拉山和在波洛尼纳的博尔扎瓦休假时的往事。我暗示他，我已经知道了他被判决的消息。我想让他知道，我没有丝毫动摇。

“耶里克是什么人？”

“那是一只狗。”

党卫军终于发现，他们上当了。

“滚！”一个党卫军冲着我大叫一声。

我走出办公室。接着，那个党卫军也追了出来，命令我面壁站好。我这样站着，直到一位女看守前来把我带回车间。

我从新来的难友们那里打听到，柏林的普勒岑湖监狱曾经受到了飞机轰炸，该监狱的一些囚犯成功地逃走了。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尤列克可能就在越狱者中间！后来，莉杜什卡·普拉哈关进了我们这个集中营。我向她打听尤列克和法庭审判情况。她告诉我：尤列克在法西斯法庭上大义凛然，把所谓“我国一千年以来就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无耻谰言驳斥得体无完肤。他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早在德意志帝国出世之前，捷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很久了。据说他讲了很多，可能讲了一个钟头；他谈

到了苏联，谈到她的强大和坚不可摧，谈到法西斯必然会被粉碎。尤列克从一个被告变成了一个原告，审判员们对他实行了围攻，他们试图剥夺他的发言权，但是尤列克寸步不让，继续慷慨陈词。据说，他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的：“现在你们将宣读对我的判决。我知道，判决书上写的是：判处死刑。然而，我早已对你们作出了判决：判处法西斯死刑！人类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莉杜什卡向我转达了尤列克的遗言：“替我问候古丝蒂娜！我不希望你们都变成悲哀的寡妇。如果你们能活到解放，那就充分地享受自由的幸福吧！”

我第一次听到我要“成为寡妇”这样的话。我心里难受极了。尤列克后来的遭遇莉杜什卡已无从知道。自从法庭将她释放以后，纳粹分子便押着她途经德累斯敦回布拉格去，然后又从布拉格把她送到这里的集中营。我迫不及待地、同时又十分害怕地盼望着莉巴的来信。但是，十月份都过去了，她还是没有信来。到了十一月份依旧是音信全无。就连尤列克托她转交给我的那一封信——她曾向集中营管理处提出过准予转交的请求——我也没有收到。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尤列克常在“400号”相见。有时他会抚摸一下我的头发，有时他又会偷偷地给我一个亲吻。

直到1944年1月我才收到莉巴写给我的、盼望已久的来信，她写信的日期是1943年12月24日。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古丝婷卡！

现在是圣诞前一天早上六点钟。我思念着你和尤列克。我亲爱的人们！我到处在寻找你们。现在这里是多么凄凉。你的信我已经收到。知道你身体很好，同时能接到包裹，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在上次信中已经告诉你，我也常常给尤列克寄送这样的包裹。他热烈地问候你，希望你放宽心，多加保重。他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你。他说你这个人太好了。他的心不停地在向你倾诉衷肠。他说他并不感到寂寞，因为他有你这样一位可爱的人……”

对我来说，这是最有意义的日子。从来信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尤列克仍然活着！他已经幸运地通过了12月3日这一“关”，因为这一天是执行判决的最后期限。他是怎么样过来的？我亲爱的尤列克，他身体好吗？我高兴得心花怒放。我似乎觉得，整个1944年一开头便吉祥如意。莉巴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了尤列克，谈到了活着的尤列克！苏军已推进到波兰边界。现在连集中营的生活我也不感到那么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只要尤列克能活到解放的一天，我便是在这里再呆上几年也心甘情愿！

纳粹分子把许许多多的新犯人运到了集中营，他们又把其他许多犯人从集中营运往新布兰登堡，运到靠近波罗的海的某个地方，或者运到波兰，据说也运到卡尔洛维·瓦里地区去。我向新到的女囚犯们打听，她们是否知道柏林普勒岑湖监狱的情况。她们中的许多人对该监狱都一无所知。其他一些女犯则带来了关于该监狱遭到轰炸的传闻，据说空袭时一些犯人逃跑了。我紧紧抓住这个消息不放，心里翻来覆去

地琢磨着。我开始萌发了这样的希望：尤列克可能就在那些成功地越狱逃跑了的人们当中。比尔森的艾莉什卡·乌尔里霍娃也证实了我的这种判断，她也是被纳粹分子刚运到我们这个集中营来的。她对我说，她曾经和莉巴谈过话，莉巴也是这样对她说的。今天我才知道，当时艾莉什卡不敢向我说出真实情况。不过，即使她说了真话，当时我也不会相信，因为到1944年6月莉巴在给我的来信中还写道：“我知道，你热切地盼望着能听到有关尤列克的消息。但是，长期以来我自己对他的情况也毫无所知。”我对自己说，尤列克不能给我写信那是很自然的，否则他就会暴露自己。他可能住在德国的某个地方，那里的情况肯定是糟糕透顶，因为整个德国几乎每天都会遭到空袭。在给莉巴的每一封信中（每月一封）我都谈到了尤列克。

当我住在集中营的“八号”木板房时，我被分到九号饭桌吃饭，同桌吃中饭和晚饭的都是些党员同志。她们中的某些人年纪很轻，盖世太保逮捕她们时还不满十八岁。我从博热娜·霍列奇科娃和其他人那里得知，在我被关进这个集中营之前不久，纳粹分子运来了五百名左右的女红军俘虏；那些闯进澡塘子观看她们洗澡的党卫军们，对她们健壮的身体和坚贞不屈的品格都甚表敬畏。霍列奇科娃她们还告诉我一个极其秘密的消息：在那些女红军俘虏中还有一批政治工作人员。起初，纳粹分子禁止其他女犯与女红军战士接触。但是，特别是会讲俄语的捷克女同志们却经常暗中和她们来往。女政治工作人员拒绝为纳粹制度工作。后来她们在监狱周围创

地种菜，有些人则在犯人医务所里工作。在这批女政治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同志曾在苏联讲授过《联共（布）党史》。她的名字叫埃夫热尼亚·克伦莫娃，奥德萨人。有人建议：请她向女犯们（当然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讲授《联共（布）党史》。在帮助她打消了起初产生的疑虑之后，终于组成了严格保密的学习班，几位捷克女同志也参加了这种学习班，后来她们又培训了许多其他的女囚犯。

当我们还在“八号”木板房时，D34剧院女演员尼娜·伊尔西科娃从我们中挑选了一些人组成诗歌朗诵小组，并和大家排练了马哈的诗《五月》。星期日我们常常在盥洗室聚会。在冰冷的、用方砖砌成的地板上，在灰色的、用陶土烧制成的洗脸盆旁边，在光着上身擦洗身子或者在冰冷的凉水里洗着衬衣的妇女们中间，在哗哗作响的自来水声的伴奏下，我们在尼娜的带领下热情地朗诵着：

……高高天上飘着洁白的云，
悲哀的囚徒在向它们倾诉衷情：
“你们昂首阔步遨游太空，
你们用神秘的臂膀拥抱大地，
你们是融化了的群星、蔚蓝色天幕的倩影，
你们多愁善感、化作无言的泪，
你们是我心灵上的使者。
不论你们飘向何方，
那怕是飘落在天涯海角，

一路上请替我问候祖国。

啊，美丽的、可爱的国土，

我生命的摇篮、我安息坟墓、我的母亲，

祖先留下的、我唯一的祖国，

辽阔的祖国、我唯一的祖国！……”

这些诗句蕴藏着何等巨大的力量啊！在朗诵这些诗句的每一位妇女以及每一位听众的眼睛里和脸上又流露出多么深厚的对祖国的怀念之情啊！在那广阔的、恶浪翻滚的法西斯兽性的海洋里，这样的诗歌鼓舞着我们去捍卫人类的美德。当我们排练好这首诗后，我们便在“八号”木板房的女囚犯面前表演，听众们总是静静地、全神贯注地聆听我们的朗诵。在捷克女囚犯居住的牢房里还成立了歌咏队，排练了斯美塔纳的作品《嫁妆》、德沃夏克的作品《摩拉维亚二重唱》以及捷克、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民歌。歌咏队也向“公众”演出自己的节目。在牢房门口有专人放哨，如果发现女看守或党卫军分子走来，她们便及时向大家报告。

当西门子公司工头给我分配了工作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进行破坏。起先我独自一人在仓库工作。工头常常交给我一份工具目录单，我根据该目录单去订货。每一份工具目录单我都必须填写一份订单。当订购的工具收到后，我便把它的产品号填在一张卡片上，然后把工具放在架子上标有相同号码的地方。

工头克尔肖克是没有军职的纳粹分子。他对待女囚犯们

极端严厉和粗暴。当党卫军带领我们到尚未盖好的车间的泥土地板上去吃午饭时（每天都是相同的一碗野菜汤），克尔肖克从不允许任何一个妇女把盛放产品的小木箱带到饭厅中去当凳子用。我们车间的绝大多数女犯干活时整天必须站着。在集合我们点名时——他们不时地清点我们这些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女囚犯们，一天往往要清点十一次以上，生怕有人逃跑——工头克尔肖克总会跟女看守一齐前来，仔仔细细地把我们大家检查一遍。如果发现某个女犯拿着小木箱，他会立即命令她把它放回工作台上。我们只能站着吃中饭。这个纳粹工头经常这样刁难我们。

然而不久我便发现：克尔肖克对工作并不真正关心，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他可以不上前线，他要躲在这个避风港里等待战争过去，因此他用鹰隼般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劳动。当时我的工作负责分发擦洗机器用的三氯乙烯和抹布，看守机器的女犯们常常到我这里来领取这些东西。我总是把这些东西大批大批地分发给她们。我们发现，三氯乙烯不仅是极好的机器清洗剂，而且是很好的洗衣剂，同时还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使用的一种药剂。我们用它擦腿，擦手和擦肩膀以防治关节疼痛，我们还用它涂在头皮上和头发上以消灭头虱。当厨师们从下面的集中营用大铁锅给我们送来午饭（野菜汤）时，我们便利用午饭后的空铁锅把大批的三氯乙烯送到下面的集中营去——我们把一瓶瓶装得满满的三氯乙烯藏到空铁锅中。此外，我们还把各车间包装产品用的纸成卷成卷地藏到空铁锅里，当时我们把这种纸代替手绢或棉花使

用——要知道，当时我们要想弄到一丁点儿棉花那简直是白日作梦！

我还发现，克尔肖克对我填写的订货单从不进行检查。有一次，订货单有好几张，邮寄时我故意扣压了其中两份。工头未加清点，其他的订货单便由邮局收走了。我把压下来的两份订货单（原本）撕成碎片，待女看守领我们上厕所时，我便把这些碎片用水冲掉。订货单的副本我插入卡片箱内放好。几天过后依然平安无事。我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不久我得到要预订约20件工具的命令，这些工具一部分要在柏林、另一部分要在耶纳和维也纳才能买到。我填好了订货单，等候工头来仓库时请他签字。我不愿把订货单带到办公室去，耽心工头不立即把它们邮寄出去。现在，克尔肖克往仓库跑得更勤了，因为他给我挑选和配备了一名年轻的波兰女犯作助手，那位波兰姑娘懂得一些德语，同时得到工头的亲自训练。很明显，工头对她颇有好感。当他又来到仓库中时，我把订货单交给他签字。他随便签了个字，根本就没有检查一下到底订购的是什么东西。我把全部的订货单拿走，说是拿去邮寄。然而我并没有这样做。我把它们藏在工作台的抽屉里，因为工头又跟那个波兰姑娘——我的新助手聊天去了。订货单的副本我照例插入卡片箱中。

公司发出的邮件全部送到邮局去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机器专用工具依然渺无音信，我却把工具订货单的原本一张一张地撕成粉碎，然后把它们扔到厕所里去。又过了一些时候，某些班组长开始寻找专用工

具。一位组长前来问我，是否收到了订货包裹。我摇了摇头说“没有”。另一位组长则一声不吭，径直爬上仓库的工具架上寻找了半天，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工头要我把订货单副本找出来给他看看。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从卡片箱中找出各种凭证交给了他。工头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半天，最后耸了耸肩膀走开了。他们连同机器一起又白等了好久。这样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造成了停工待料。

几天以后公司经理来到我们车间检查工作。他和工头谈着话，不时地侧着脑袋看着我和那位年轻的波兰姑娘，他好象在分析是否我们在订货问题上有意捣鬼。然而，波兰姑娘对此毫无所知，而我又守口如瓶，因此公司经理一无所获。他命令火速重订专用工具。当我填写好了新订货单以后，工头进行了认真的检查，然后他极其小心地亲手把它送到厂部办公室去。

过了不久，补订的某些工具果然寄来了，但是另一些工具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收到，虽然曾再三催促要他们赶紧发货来。

我们的仓库和工作台设在车间的入口处，那里还有车间办公室，它用低矮的木板和机器分隔开来。办公室正面放着工头的办公桌，他坐在这里能够一览无余地看到车间的每一个角落。工头办公桌的左面还放着其他一些桌子，一些女犯作为办公室的女职员坐在那里。她们中有几位是捷克女人，一位会说捷语的德国女人，另外还有一位保加利亚妇女。

在西门子工厂干活的女囚犯有数百名，到1944年多达两千名以上。女犯人大组组长是维也纳的捷克女人、共产党员安尼奇卡·瓦瓦科娃。她是厂部办公室的职员，他善于说服经理让女政治犯们进厂干活。这样，她便常常使官方的计划破产，因为集中营管理处希望把大批对纳粹主义死心塌地的德国女人派到西门子公司去做工。当集中营中的女头目斯克内每周选送五名这样的德国女人前去应试时，来集中营领她们进厂的安尼奇卡·瓦瓦科娃便把其中某些人换掉，然后用女政治犯、用她物色好的各国女同志补上。我便是通过这种方法进入西门子公司。如果在集中营掉换被推荐人员的办法不能如愿以偿，那么，安尼奇卡还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她作为厂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持招工考试，经理要哪些人或者不要哪些人，在通常情况下全由她一人决定。甚至选派哪些女囚犯到各工段去的问题，任何一名女看守也无权过问。由于安尼奇卡·瓦瓦科娃的努力，使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的厂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各个国家的女共产党员，而且在每一个车间办公室里都有一名女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她们的任务是保卫女囚犯们的权利。比如，对女囚犯们的所有告发材料都集中在厂部办公室里，而安尼奇卡却在暗中为那些遭受打击的姐妹们做了许多好事。也是在她的大力挽救下，许多佩戴着“N + N”标记^⑩的法国女犯人最后才能死里逃生。事情发生在1945年初。厂部办公室的女同志们得知了要把那些法国女囚犯们送去处决的消息，安尼奇卡和其他同志一起说服了公司经理，使他反对把法国女囚犯

从工厂开除出去。

不久，我们又成功地争取到另一位女同志来仓库工作，她是德国女共产党员玛尔塔·赖霍洛娃，马格德堡的一名普通妇女。她丈夫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受到盖世太保的跟踪追捕。后来，他们逮捕了他，把他带到柏林。他们百般折磨他，审问他，并把他处以极刑。行刑前，盖世太保安排了他们夫妻相见。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妻子也已经被捕。现在，盖世太保正以幸灾乐祸的心情妄图看到他惊恐失色、出尽洋相。那次与丈夫会面是玛尔塔长期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她被捕以前，她也参加了反纳粹主义的斗争；她以帮佣为生，养活自己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来，孩子们只得靠自己干活度日，他们在马格德堡的一家工厂里当工人。玛尔塔·赖霍洛娃同志身体小巧而丰满，是一位讨人喜爱和非常勇敢的妇女。她的一生是历尽千辛万苦的一生。

所有的女囚犯，不论是德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捷克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妇女，大家都衷心喜欢玛尔塔·赖霍洛娃同志。对年轻人来说她是一位慈祥的母亲。为了让某个女囚犯能在炉子旁边用热水洗头或者洗一件衣服，她善于及时地把女看守的注意力引开。她常常在我们的工作台前拦截住不停地在车间里转来转去、监视着女工干活的女看守。如果女看守发现，某个女工在那里休息，那么她便会立即跑过去，粗鲁地把她斥骂一顿。玛尔塔就以一种天真无邪的或者煞有介事的神情和女看守攀谈起来。这里的女看守多数是年

轻妇女，常常轮换，她们在西门子公司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来此实习而已，然后再被派到其它单位去监督女囚犯们劳动。某些女看守对玛尔塔的寒暄并不理睬，她们忠于职守地在车间里来回巡视。但是另一些女看守却和她聊起天来，而且一聊就是半小时。玛尔塔所以能和女看守们相互寒暄和聊天，是因为她是德国人的缘故。对于其他国家的女人，这些女看守是不屑一顾的。

我们车间的某些女囚犯还用铁皮制作简单的小刀，借以“改善”一下生活。她们用砂轮把小刀磨得飞快，再装上木制的刀把。你用一份面包便可以“买”一把这样的小刀。工头、女看守以及班组长没收了多少把这样的小刀啊！但是，又有多少女囚犯在偷偷地制作这样的小刀，这些小刀不只是为了供应我们车间的“顾客”，而且还为了满足其他车间妇女们的需要。在毛毡车间里——当时羊毛奇缺，纳粹工头对每一克珍贵的羊毛都精打细算；平时他把车间细心锁好，门上的钥匙只由他一人亲自掌管——妇女们，特别是法国女人，偷偷地缝制了逗人喜爱的玩具小狐狸，借以增加一点儿“收入”。一只用战争物资（用毛茸茸的、洁白的羊毛绒）制成的玩具小狐狸——它浑身雪白，长着两只黑色的耳朵，吐着鲜红色的舌头，脖子上带着用花布制成的蝴蝶结——只须两片面包，有时只用一片面包便可以“买”到。另外，当时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特种橡胶，女囚犯们把它们连接起来，用作衬衣裤的松紧带，因为在集中营里根本没有这类东西。

这些怠工活动后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当妇女们

工作完毕、排成五人一组、准备离开车间时，工头常常突然下令进行搜身检查。就是在抽查时，女看守也常常能在女囚犯们身上找到用重要的战略物资制作的東西。常常有几位妇女被拉走去受体罚，接着被关进工事中或者禁闭室内，她们必须从事最繁重、最肮脏的劳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吓倒女囚犯们，无法迫使她们放弃新的怠工斗争。

我常常在上班时候偷偷地把一些诗歌默写在小纸片上，这些小纸片是在基建办公室干活的女囚犯薇拉·菲娅洛娃同志带给我的。我抄下了马哈的诗歌《五月》，沃尔克尔的《恭顺》、《乞丐》、《邮筒》、《事物》、《叙事诗：未出生的孩子》、《片断》、《叙事诗：司炉的眼睛》、《海员之歌》、《在爱克斯光机面前》和《垂死者》。当时我最喜欢他的下列两首诗：第一首是《恭顺》——

我变得日益渺小，
我将成为世间最渺小的人。
在夏日的草地上，当晨曦隐去，
我要拣一朵最小最小的花儿。
当我拥抱它时，我要轻轻地告诉它：
“光脚的小娃娃，
你身上的露珠啊，
那是天穹留下的手印，
有了你——苍天才不会倒塌。”

第二首诗是《片断》：

在昏暗的城头上飞舞着雪花儿，
在你的眼睛里它化作铅灰色的水洼儿。

钟声象被抛弃的姑娘，
它从钟楼上飘落在石湖般的广场。

你带着病弱的心只身从这儿走过，
你感到无比痛苦和凄凉。

你呀，只有你这个人，
才沉浸在个人的悲哀里。

站在车站的大墙旁，听一听火车的呼啸吧！
它们正把爱和恨送往城市和村庄。

再坐进车厢，在神奇力量的驱使下，
愿你跳出苦海，奔向各个地方：

在这广阔的、对你的伤痕一无所知的世界上，
在这拚死地进行着争斗的世界上。

战胜你病弱的心吧，因为你不仅属于它，

如果你希望赢得胜利，你自己就不能被它击败；

战胜你心中的痛苦吧，快忘却悲伤。

投身战斗，永不下战场！

那么，在昏暗的城头上飘落的雪花，

不过是包扎在你前额上的白色绷带，

钟楼上的钟声将随着鸟儿飞向四面八方，

战胜痛苦比忍受它要求你更坚强！

当悲哀和对尤列克捉摸不定的命运的思念折磨着我的时候，我便常常朗读起这一首诗。在难友们中间，我们彼此很少谈论个人的伤心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账！

在集中营的捷克女犯中间还广为流传着史拉麦克的诗歌《水闸》、《报告》、《假如我是一个牧马人》和《田野上的战士》，年轻的弗拉斯塔·法贝罗娃朗诵起来精彩极了。我还常常在仓库里偷偷抄写内兹瓦尔的诗《出征书》。我常常回忆起在1942年冬的“400”号房间里，尤列克经常把这首诗轻轻地朗诵给我听的往事。

抄诗的不只我一个人。而且这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所有的——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能够弄到纸笔的妇女都这样做。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到底默写过多少首诗。我把这些

诗歌抄下来赠送给熟人当生日礼物。玛尔塔替我放哨，免得我在抄诗时被女看守或工头发现。只有一次，当我正全神贯注地默写着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塔吉雅娜的信时，女看守探身在我头上已看了好几分钟之久。当我发现她时已经太晚了。女看守没收了我默写的诗，玛尔塔费尽了唇舌，请求她不要把它交给女看守长。幸好当时已经是1945年的春天。我把抄下来的诗歌夹在我用榛木刻成的小木板夹里藏好。我还从仓库里找来生漆，把木板夹子油漆了。

在我们车间里进行最广泛的怠工活动的人是俄罗斯女人和乌克兰女人，她们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姑娘，她们清楚地知道：决不能老老实实在地替法西斯分子干活。她们彼此都心照不宣。纳粹分子班组长先为每一位女囚犯调整好机器，然后给她们示范表演，怎样把材料送进压力机内去进行冲压，怎样在车床上加工其他零件。班组长无法用言语去向那些外国女人——女囚犯们——进行讲解，因为尤其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法国人都不懂德文。当小组长进行操作表演时，女囚犯在机器旁站着或坐着。然后班组长便站在一旁，检查女囚犯的机器活干得怎样。当他检查俄国女人时，她们的活计还算马虎可以。但是，当他一离开这里向另一台机器走去时，这位俄罗斯姑娘便会随心所欲地、而且还加大马力干起来。她也把自己的产品如数上交。但是，进行质量检查时可就热闹了。大部分产品都是废品。此刻，班组长走过来，责骂她不好好干。女囚犯只是耸耸肩膀，不停地用这样的德国话去回敬对方的指责：“我不懂，我不懂。”然后又貌似顺

从地干一阵子，免得让工头把自己从车间轰出去。过不了多久又是废品成堆。红军解放我们以后，我们和安尼奇卡·瓦瓦科娃在杂物房的地下室里——我们在狱中时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发现了我们车间制造出来的、堆积如山的废品。

在集中营里囚犯们随时都有被枪杀的危险。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我们五人一组放工回木板房时，站在工厂大门口的党卫军忽然叫了一声某个女难友的名签号码。我们以万分焦急的心情等待着那位女难友的归来。但是她没有回来。然而她是不可能两手空空被送到别的地方去的呀，因为他们还是允许女囚犯们至少带上一把梳子和一把牙刷。被叫走的女难友的确再也不会回来了。在附近的林子里响起了枪声。我们悲痛欲绝。有时候，纳粹分子又会把我们中的某一位难友——不论是捷克女人、俄国女人或是法国女人，我们亲爱的姐妹——送进煤气室去。当我们听到这种消息时，大家都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整个晚上木板房里谈论的唯一话题便是法西斯分子的滔天罪行，和他们的暴虐无道。此刻，在每一位难友的心底都积聚起了如此巨大的仇恨，如果把它比作一朵鲜花，那么，只需要花香的一粒原子便足以置任何一个法西斯分子于死地！以后是恶梦萦绕的黑夜，接着又开始了新的一天，集中营里洪水般涌来的新的忧虑、新的不幸和突如其来的灾难又会把昨天的痛苦、悲哀和绝望冲得烟消云散。对我们的难友的回忆和悼念只得埋藏在心田的深处。每一位难友心中所承受着的个人的痛苦、悲哀、忧伤和焦虑都被整个牢房、工地和整个集中营所遭遇到的痛苦所代替。比

如：挑选病号，把她们集体屠杀在煤气室中，或者把她们运往位于卢布林的死亡营地；挑选年老体弱的女囚犯，把她们送到乌克尔马克去，在那里她们身穿单衣在冰天雪地中站上几个小时，直到全部冻死为止。集中营里艰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其中每一天都显得如此漫长，长到好象望不到尽头一样，然而当每周结束时我们又会对自已说：尽管我们被关在牢里，但依旧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

1944年年底，有一次，当党卫军把我们从车间押送回集中营时，我们发现捷克女囚犯居住的木板房不见了。我们在马路上找到了自己的、能够找回来的东西。“八号”木板房变成了专门收容肺结核病人的医院。当天，医院便有人满之患。患肺结核病的病人主要是年轻的俄罗斯姑娘和乌克兰姑娘。纳粹分子把“八号”的全体捷克女人分别安插进其它的板房中去。我们和在西门子公司干活的其他几个妇女被分到主要是由法国女人居住的木板房内。那间板房很大，它和其他一些板房并排着，用铁丝网和老集中营隔开。每一间这种长长的、用木板搭成的平房的一半用于安置约一千名妇女。我们三、四个人挤在一张狭窄的床上睡觉。然而，当上千名妇女挤在一个大厅里时，谁还能够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啊！夜里，女犯们彼此常常吵个不停。睡在大厅中央第四层架子床上的女犯抱怨说，她们热得无法入睡，她们大声地央求着快把窗户打开；但是，睡在靠窗床铺上的妇女又埋怨道，由于被子单薄，她们已经冻得受不了了。架子床上摸黑下床的人往往会踩着躺在下边的人的脑袋或者两脚，接着便是痛苦

的喊叫声和粗野的咒骂声。大厅里上厕所的人接连不断，她们都穿着笨重的木屐，走起路来呱嗒呱嗒地响个不停。被吵醒的妇女又大声地嚷着，说她们走路必须轻手轻脚才是。她们的这一声喊叫又会使更多的人从梦中惊醒过来。夜里，许多女囚犯还常常被送到别的集中营去。因此，我们总是睡不踏实，从来也没睡上一次好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练就了特殊的本领，我们能够在排队集合时站着睡觉，在干活时打盹，而同时却能机警地注意着不让女看守或工头抓住。

到了1944年底，纳粹分子把我们在西门子公司干活的人迁入新建的、离工厂车间不远的木板房中。在五座木板房里他们安置了两千余名各个民族的妇女：有捷克人、德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荷兰人、挪威人、奥地利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我无法知道的其他民族的妇女。新板房中的生活要比旧板房内的生活好过得多。在这里，至少在初期，每一名妇女可以分到一个自己的床位。

纳粹分子在把我们送进新盖起来的集中营之前，我们在澡塘子外面、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一整天。我们必须进去洗个澡，以便纳粹分子能乘机掠夺我们身上的宝贵财产——毛线衣、厚长统袜、以及其他我们非常心爱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很难弄到。新集中营银装素裹、白雪皑皑。美丽的景色使我们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木板房的四周，一些小松树枝在茫茫的雪地上探出头来，看上去宛如有一片建筑物在快活的林中空地上拔地而起。长久以来我们的双手

一直没能抚摸一下柔软的针叶了。我们好奇地围着这些小松树看了又看，我小心地折了一根小针叶，在手中搓了搓，闻了一闻——啊，香极了！伊尔萨顺手揪住一小把，试图把它们折断。她用力稍稍过猛，整棵小松树猛的倒在了地上。仔细一看，原来从雪地上探出头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小松树，而是倒插在雪地里的松树枝儿。我们虽然难免感到失望，但是这又是多么美好的行为啊。谁能知道，在这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这种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好主意究竟是谁想出来的？

在新集中营里我们不用象在老集中营里那样长时间地集合点名、听纳粹头目训话。可是他们却把我们干活的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此外，集中营的司令官、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常常向我们发动突击搜身，尤其是当我们在洗淋浴或者在上茅房的时候。在劳动了十二个小时以后我们还必须到离集中营不远的一个深山峡谷中去挖土，然后用筐把土挑到板房上首的地方。据说司令官先生要在那里开辟一个菜园子。但是，他并没有活到菜园子建成的一天。

1945年4月13日漆黑的夜里，警报器呜呜地叫着。女看守们来到木板房里，一会儿功夫我们已作好了上路的准备，接着她们便把我们带了出去。我们心想，红军必定离此地不远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她们赶着我们来到一间空旷的、充满恶臭的肮脏木板房里。我们迫不及待地盼望着天明，希望弄清楚我们现在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在沉沉的黑夜里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老集中营早该走过去了。然而在迷茫的晨曦中，我们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西门子公司附近的

新集中营和这个老集中营之间的巨大差别使我们惊愕不已。在西门子公司厨房里烧饭的捷克女囚犯们能够用配给量相同的一点点粮食，用同样数量的野菜和一点儿人造黄油，烧制出足以维持我们生命的食品。和老集中营的难友们相比，我们显得红润、健壮，如同刚从疗养院回到家中一样。而那个老集中营又显得多么的破烂不堪和一片荒凉啊！在它的道路上行走的简直不是人，而是一些步履艰难的幽灵。我们走路时都要格外小心，以免踩上那些慢性肠炎患者在板房之间的土路上遗留下来的粪便。到处肮脏不堪、泥泞满地。再看一看集中营大门后面清澈、碧绿的湖水，那湖岸上活泼、嫩绿的小草，以及野鸭和天鹅遨翔着的蔚蓝色的天空，这一切都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啊！

纳粹分子们又沿着火葬场旁边的老路领着我们前去干活。从火葬场烟筒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给周围披上了一层悲哀的黑纱。入夜，血红色的火舌在集中营的上空跳跃着。空气里充满着被烧焦了的头发和骨头的恶臭。当我们还居住在上方的那个集中营里时，我们曾焦急不安地、不时地注视着火葬场。在火葬场的三个炉子里，我们病死的或者被纳粹医生用煤气毒死的女难友们化成了灰烬。正是因为她们年老体衰、瘦骨嶙峋、头发斑白、面无血色，她们的双腿肿胀成青紫色，疮口溃烂，所以再不能博得纳粹分子的欢心，于是就被他们毒死了。然而，她们中绝大多数的妇女是何等热切地盼望着能活下去啊！当党卫军们挑选老弱病残送去处死时，她们又以何等巧妙的方式骗过他们的眼睛啊！她们用包装纸

的纸灰和润滑用的黄油或者皮鞋油（这是某位妇女的亲属给她寄来的）制成黑色“染发剂”，头发灰白的妇女就用它把头发染成黑色。有一次，我在老集中营的炉渣路上还捡到了一管唇膏，它是某位新来的女囚犯由于害怕搜身时被发现而扔掉的。看牌子是意大利产品。我细心地把它收藏起来。当挑选老弱病残的工作开始时，每天清晨这管唇膏就在女囚犯们的手中辗转传递，因为她们可以用它在自己的脸上增加“健康”的色彩，以免被党卫军或党卫军医生看出自己苍老的病态。

在西门子公司附近的那所集中营里，我上面一层——第四层——的架子床上睡着伊尔萨·玛尔莎尔科娃同志和年轻的奥琳卡·基肖娃，后者是一位娇嫩的姑娘，虽然她经受住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种种折磨，但是当她来到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时身体已经彻底垮了。从拉温斯布吕克老集中营搬到西门子公司附近的新集中营时，由于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她得了重感冒，现在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她整夜整夜地咳嗽，浑身出着虚汗。伊尔萨·玛尔莎尔科娃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的生活。夜里她替她把干衬衣换上，帮她把枕头垫好。在药物全无的情况下，她想以此来减轻她咳嗽发作时的痛苦。伊尔萨自己也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呆过七个月，而且还得过斑疹伤寒。每当短暂的午休时间开始时，她三口并两口地吞食完那份用野菜制成的午饭，接着使用难友们从亲人处收到的一些罐头食物为奥琳卡准备病号饭。她用煤球炉子微弱的炉火热上点水为她沏茶，又从厨

房间取来专为女看守准备的、捷克女同志差不多每天都为奥琳卡收藏起来的几汤匙肉汤。当时，奥琳卡几乎连站起来的气力也没有了。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把她送回老集中营的医院中去，党卫军医生必定会让人把她拖到煤气室去毒死的。伊尔萨正竭尽全力以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去挽救奥琳卡可怜的生命。伊尔萨希望奥琳卡能活到解放，因为只有那时她才能恢复健康。当我们在新集中营里必须从党卫军医生和女看守身旁正步通过时，我们总是替奥琳卡做好必要的准备，给她的脸蛋上涂上点红色，然后把她从第四层架子床上抬下来。奥琳卡迈着踉跄的步子，在狱吏们凶狠的目光注视下走了过去。女看守长霍尔特维罗娃发现了她，立即命令她在她面前重走一次。当时，奥琳卡用尽了最后一点儿力气平稳地从她跟前走了过去。她得救了。此后，我们便把她终日藏在木板房里。如果某个女党卫军分子前来查房，我们就骗她说，上面睡觉的是刚下夜班的工人。就这样，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长久地保护了奥琳卡。然而她还是没有能活到解放的一天。最后，她还是被送到老集中营的医院中去了，在红军解放我们的前十天，她因患肠结核和肺结核终于与世长辞了。

第八节 红十字会对大屠杀置若罔闻

1945年春，火葬场开足马力地工作着，它的炉子从没有一天停下来喘息。两个烟筒不知疲倦地向四周喷吐着灰黑色

的烟雾，这些烟雾注满了我们的心肺，涌上了我们的脑际。在下面的老集中营那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数百名身患重病的难友，她们传染上了肺结核、斑疹伤寒、白喉、猩红热、严重的皮肤溃烂等疾病，她们缺医少药，又无必要的护理。死神在威胁着每一个人。无情的饥饿笼罩着每一个角落。

当时，我们透过西门子公司附近新集中营的铁丝网看到了一种令人十分诧异的现象：在拉温斯布吕克老集中营高大的院墙前面，停着三辆从未见过的、漂亮豪华的旅游车。车身上那种给人以温暖感觉的奶油色和集中营令人作呕的铅灰色以及电网的乌黑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宛如一位身披白纱的新娘出现在乌黑的矿井中一样。我们瞪大了眼睛，心潮起伏地望着旅游车——在这个脏得不能再脏的地方，在地狱般阴森可怕的集中营里，出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东西。真如同奇异的梦幻一般！

然而，这不是梦幻，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又开始挑选犯人了。这一次，我们的法西斯狱吏们却要挑选年轻、健壮的女囚犯。他们首先挑选法国女人。女囚犯们肺都要气炸了！为什么要选年轻和健壮的？她们挑了去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单单要法国女人？有个妇女从下面的老集中营带来了这样的消息：纳粹分子将把所有从西门子公司中挑选出来的法国女人送到老集中营里去。以后还要把她们带往何处？我们全气得浑身发抖。有些被选上的法国女人为了免于一死，甚至藏了起来。难道会把她们送到其他别的地方去吗？另一个妇女又带来了这样的消息：据说那些

豪华的旅游车是属于国际红十字会的，它们是来接运获释的女囚犯的。这种传闻纯属幻想，因此不足置信。难道纳粹分子会突然大发慈悲起来？尽管他们的末日已经不可避免地临近了，但是他们必然还要采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

几天后我们不得不相信上述消息的可靠性。在老集中营门前出现的、叫人眼花缭乱的、清洁、明亮、舒适旅游车的确属于国际红十字会。我们透过铁丝网看见它们停放在那里，听说它们是来接运法国女人、荷兰女人和挪威女人的。我们还亲眼看见一辆旅游车载着八名挪威女人开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一辆大型轿车一次仅载了八名妇女，这是何等的无人道啊！这不可能，它肯定会掉头开回来的，它还可以再装上四、五十个女人，这样她们便可以跳出火坑得救了。毫无疑问，车里再多装一些人也不成问题，每个妇女都会愉快地挤上车去，因为旅游车将把她送往自由的世界。然而装载着八名妇女的大型轿车再也没有回来。它开走了。

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什么纳粹分子只让年轻、健康的妇女离开，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为什么不要求把老弱病残带走，她们这些人很快便要送往乌克尔马克集中营去，在那里死亡正等待着她们！她们如果被带到检疫站，还可能得到所需的药物和必要的医治，这样她们便可以活下去！我曾亲眼看见，被关在狱中的女医生、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同志曾质问国际红十字会小组长，为什么他们只把西方国家的女公民运走，为什么把俄罗斯女人、乌克兰女人、南斯拉夫女人和捷克女人丢下不管。那位小组长简单明了地回答说：

“因为我们只得到这样的命令。”他们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样的命令。

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从1945年4月起开始逐步撤退。一部分女囚犯（她们来自西方国家）由国际红十字会的大型轿车运走了，另一部分女囚犯由纳粹分子运到乌克尔马克集中营处决了，还有一部分女囚犯被纳粹分子运出集中营的大门以后便去向不明。男女党卫军们和他们的警犬常常在夜里突然闯进木板房来，把熟睡中的妇女一一叫醒，几分钟之内她们必须作好上路的准备，然后在当夜便被党卫军们带走了。

1945年4月14日晨，夜间撤退工作完毕以后，党卫军们又押着我们去上班干活。我们发现，西门子公司附近的新集中营里迁来了一批男性居民。这个集中营四周没有围墙，只有铁丝网，透过这些铁丝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中营里面的动静。女党卫军们大声地斥骂着我们，禁止我们回过头去观看关押男囚犯的集中营，但是，对于两千双眼睛来说，几个女看守实在是少得可怜。我们当中有几个女囚犯成功地从车间的后门溜了出去，看到了男犯集中营里的一些情况。

男犯们被饥饿折磨得精疲力竭。他们长途跋涉，最后才来到这里。他们到达的那天早上，正好遇到了去上班的老百姓。在我们车间里有一个小组长名叫诺尔曼。我们一到，他便跑到仓库来找玛尔季奇卡，非常气愤地向她叙述说：他亲眼看到残酷的党卫军分子把不能走动的男犯枪毙了。我听后发表了一通议论说：“瞧，法西斯分子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从前，当我们告诉您，他们在女犯集中营里干了哪些

‘好’事时，您还不相信。现在您自己可相信了吧。”这位小组长反驳说：“他们不是法西斯党员，他们是党卫军成员。”我回答说：“他们反正是你们党的成员，而你们党还对这样的行为大加赞扬哩！”他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地走开了。

党卫军老让男囚犯们呆在外面，从不让他们到木板房子里去。原因很简单，木板房里装不下那么多人。所以，男犯们必须白天黑夜都呆在露天地里。他们瘦得皮包骨头，两条腿几乎已无法正常走动。卡保分子（指从犯人中挑选出来的工头——译者注）经常用木棍没头没脑地毒打他们。卡保分子中有一个口操捷语的人。我们开始冲着他大叫起来，要他住手、停止打人；我们警告他说，如果他回到祖国，他将逃脱不了正义的惩罚。我们的警告果然起了作用。

纳粹分子把男囚犯押送到集中营来的头一天，连一点吃的也没有发给他们。第二天，党卫军才开始分发野菜汤。我们目睹了饥饿的男囚犯们彼此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可怕的、血淋淋的打斗，卡保分子们的大棒同时又落到了打斗双方的头上、身上。结果是：所有的男犯都没有抢到食物，在洒满食物的土地上凭空增添了许多尸体，后来它们被抬到铁丝网的后面，象堆柴堆那样被摞了起来。从那个捷克卡保分子那里我们得知：饥饿的男犯多达三千人，而吃饭用的盘子只有三十个！

每天我们都成了目睹男犯集中营里一幕幕惨剧的见证人。但愿红军早日赶到，彻底推翻法西斯分子的野蛮统治，那些法西斯分子当时还在继续横行霸道，好象红军根本就没

有向离此只有几十公里的柏林进军一样。就连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普通德国人也依然抱着幻想，在1945年4月这些日子里，他们依旧希望德国将能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期待着希特勒和戈培尔所允诺的神奇武器的出现。小组长诺伊曼在我们面前毫不掩饰这一点。他还常常谈论着《狼人潜伏计划》，宣扬每一个德国人都要用一切手段去保卫第三帝国不受敌人侵害，比如：搞武装暴动，纵火，破坏敌人（指俄国人）手中的工矿企业等等。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纳粹分子们的这些阴谋都被红军彻底粉碎了。

1945年4月20日左右，工头命令玛尔塔·赖霍洛娃和我尽快地把工具装箱以便起运。我们俩来到存放工具的仓库里。我们商定：要把装箱工作尽量地拖延下去。当我们装好一箱工具后，我或者她又假装发现还有一个零件忘在架子上。我们重新把工具箱打开，把零件放进去，然后又仔仔细细地、慢慢腾腾地把它们包装好。工头不时地跑过来，责骂我们动作太慢。玛尔塔反驳说，我们的工作无法再快了。接着，工头还派来了一名女看守专门监视我们的工作。我们当着她的面进行装箱，接着又把箱子打开，有时要反复三次以后才能把一个工具箱装好。玛尔塔不断向那个女看守解释，说她不应该指责我们，因为装箱这活儿她一窍不通。这样，我们把工具装箱工作一直拖到了4月27日，虽然工头还派来了一名女囚犯充当我们的助手，但是我们的工作离结束依旧是遥遥无期。那天上午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西门子公司干活。纳粹分子已经来不及把工具箱带走了。我和玛尔塔配合得天衣无

缝。形势的发展告诉我们，红军的到来已指日可待了！



伟大的解放时刻临近了。当我们迁出老集中营时，我离开了一位可爱的人——米尔卡·施特罗波娃同志。我们是在特雷津要塞监狱里认识的。我来到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要比她早几天，几天后我们又在这里重逢了。米尔卡·施特罗波娃同志在集中营的医院中干活，她的任务是把女尸从病床上搬出去。她长得小巧玲珑。我在心里暗自佩服她，象她这么一个娇小的女人竟能够搬动三、四十公斤重的东西——每一具女尸约等于这个重量。当集中营分阶段撤退时，按照纳粹分子的计划，这里将留下全部（大约一千六百名）女病号和三十名由党卫军医生特赖特挑选出来的女犯人护士。米尔卡便是这批女犯人护士中的一个。三十名女囚犯要看护一千六百名生命垂危的重病号，而且无法向她们提供最必需的医药护理——没有药物，连绷带甚至食物也没有。

在重病号中有两位是米尔卡的朋友，她们是哈拉姐妹俩，在被捕前米尔卡便认识她们，并一起从事过政治活动。当时哈拉姐妹俩正患着斑疹伤寒。为了至少能给米尔卡一些安慰，我对她说，如果我把处境困难的她丢下不管，那么我就太不够朋友了。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将和她一起留在集中营里。和我一起在西子公司干活的同志们并不十分赞同我的这个主意，她们认为，我最好还是和她们呆在一起。当然对我来说，和自己的人呆在一起要方便得多，因为我们

人多势众，而米尔卡是九号木板房中唯一的一个捷克女人和共产党员。然而我难道忍心和在西门子公司干活的同志们呆在一起而把米尔卡抛弃吗？真叫人左右为难！

1945年4月里，每天都有一批批的英国和美国飞机从我们的集中营上空飞过。如果在我们干活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女看守们便和所有的德国老百姓逃进防空洞去，而把我们锁在车间里。由于大家都在一起，我们也不感到害怕。我们纷纷跑到窗前，以欣喜的眼光目送着联军长长的轰炸机队，它们在自己巨大的机体内正装载着毁灭和死亡。虽然它们同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安全，但是我们都衷心希望能早日看到那万恶的希特勒德国末日的来临。

1945年4月27日午饭后，我们那个小组便再没有到西门子公司去上班了。夜里，从外面传来了一阵嘈杂声把我们惊醒。后来我们听说，这是隔壁木板房的党卫军开始撤退。在西门子公司中干活的捷克女人、女共产党员们早已商定，她们将尽可能久地留在集中营里，因为有一位女同志曾经带来了这样的消息：红军在传单里号召居民们不要离开自己的住所。我们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同时还争取到了许多党外人士也这样做。

现在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低沉的说话声、咳嗽声、以及煤渣路上杂乱的脚步声一齐传进我们的耳朵。在那沉沉的黑夜里，隔壁板房的女居民们被驱赶着上路了。啊，又有谁能告诉我们她们的去向！？现在该轮到 我们了。这就是说，纳粹分子们随时都可能把我们带走。但是，我们

决心死也不离开集中营。不久，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其他一些说法也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如果我们同意撤离的话，这对我们也许、大概会更好些，说不定这样一来我们反而可以保住性命哩。架子床的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到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整个木板房活象蜂窝一样吵吵嚷嚷。争论的结果是：我们一致同意，在漆黑的夜里谁也别想把我们带走，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上哪儿去。待到明天早上看看情况以后再说。而现在呢，我们要悄悄地、一声不响地立即离开这座木板房，钻到隔壁那座空房子中去，那里的女囚犯在几分钟以前刚刚被党卫军带走了。如果党卫军今夜回到这儿来押解我们，他们将发现木板房里空无一人。我们迅速穿好衣服，以最快的速度静悄悄地离开板房，钻进隔壁的空板房中去。我们都轻轻地踮起脚尖走着，宛如在空中随风飘动一般。只有脚下的炉渣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这一夜我们平安无事，但是清晨党卫军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高声命令着：“全都出来！快！快出来！”我们同声回答说，我们哪儿也不去。他们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搬来了配备着警犬的援兵，他们要把我们从木板房中撵出去。我们立即商议对策。如果我们拒不服从，当时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他们甚至会开枪把我们统统杀死。然而，当自由就在门坎上向我们招手时，我们多么希望能活下去啊！我们决定离开木板房。我记得，我们的决定是由里娅·博科娃转达给党卫军们的。我们要求他们不要骚扰我们，一刻钟以内我们出发。奇怪的是：党卫军们对我们的

决定很满意。

我们走出木板房，在党卫军们的带领下，沿着集中营的大马路来到一所楼房前，大楼里存放着国际红十字会在最近一个时期寄来的许多包裹。我们被编成五列纵队，每四个人分到一包东西。我站在伊尔萨·玛尔莎尔科娃旁边，脑海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质问自己：你曾答应说你不会离开米尔卡的，你曾经对她说过，你如果丢下她不管，你就不够朋友；而现在你却站在这里，这是对朋友的背叛。我突然说了一句：“姐妹们，我找米尔卡去！”

我从队伍中跑了出来。九号板房离此不远，过了马路便是。我偷偷地跑到米尔卡的面前。当她看见我时，不但不表示高兴，反而变得忧虑起来。她说，如果她知道留在集中营里比在外面安全的话，她是会让我留下来的；但是，万一留在集中营里要比在外面危险呢？然而我留下来的决心已定，即使要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心甘情愿了。

集中营的司令官颁发了一道命令：凡能走动的妇女必须撤离集中营。党卫军们死心塌地地执行着各种命令。当集中营已处于垂死挣扎时，某些女犯头头也仍然顽固地执行着上级的命令。现在，以残忍著称、遭众人唾骂的女犯头头瑟莉正在充当临时医院的木板房内一间一间地进行搜查，把每一个腿脚稍能动弹的妇女赶下床来，然后迫使她们站成五列纵队等候出发。

在九号板房里，我爬到第三层的一张床铺上，这一层早已经空无一人了。我躺在那里思索着，万一被查出来我该怎样

回答。我就说，我从三层床上摔了下去，摔成了脑震荡，一站起来头便晕得厉害。当时我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我这个摔成了脑震荡的人怎么能够重新爬上三层来呢？这不是无法自圆其说吗？后来，查房的瑟莉真的来了。我在木板床上缩成一团。瑟莉也没有想到要爬上来看看，因为她相信她已经把所有的妇女都从上面赶下去了，现在那里再也不会有人了，况且她自己也要赶快撤退哩！

我考虑着，我能为病友们做些什么。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护士。我得去找人商量商量。一小时后我从架子床上爬了下来去找米尔卡。我在前后房间里都没有找到她。我走进盥洗室，她也不在那里。地板上却躺着许多尸体。最近几天，尸体再没有被运到火葬场去，经过几个月长时间的、日以继夜的工作后，火葬场首次熄火了。

我们应该把尸体掩埋好。这种工作我也许尚能胜任。我走出木板房来到大马路上。外面空无一人。撤退的大队人马哪儿去了？纳粹分子已经把应该最后撤离的、在厨房工作的女犯们都带走了。她们的房间也是空空的。我遇见了英卡·卡特纳罗娃和安妮卡·霍尔瓦托娃。她们谈到了病人的情况，说既没有药品、也没有粮食。当我们沿着大马路往前走时，我们发现一间木板房的窗户敞开着。我们走向前去往里一瞧，板房内全是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品袋。安妮卡爬上窗户跳了进去。“我递给你们！”她对我们大声说道。如果我们一包一包地扛回板房去，这样会太耽搁时间。不知是谁想起了板房后面停放着一辆旧式四轮板车，我们中有人曾经说

过：有朝一日我们回家时，就把病号放在车上，没病的人负责把她们拉回去。我、英卡和米尔卡·斯克尔布科娃一起把四轮板车推到木板房旁边。安妮卡把食品袋一个一个地递了出来，我们再把它们装到车上。说来奇怪，突然间出现了一批饿鬼般的妇女——可见，她们还没有完全撤退完毕，有的人象饿狼似地埋伏在附近，等待时机，以期能抢到一些食物。她们太饿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批捷克的和俄国的女政治犯，以及肺病区八号木板房的护士。当她们看见食品袋时，她们的眼睛里放射出快乐的光芒，因为这一回饥肠辘辘的肺病号们总能吃个饱了！新来的人们自愿帮我们装车。当四轮板车装满以后，我们驾着车辕，同心协力把食物包裹运到了八号板房，接着又把另一些包裹分送到其他病人居住的房间去。要知道，这里共有1,600名病号呀！天晓得，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人能坚持多久。我们这里正是缺少足够的食粮。使我们非常焦急的是，我们如何才能保证起码的粮食供应。最糟糕的是：食品袋中又没有一袋面包，只有一些小面包干，此外全是肉罐头、大油和黄油，但是主食吃什么呢？

在我们头上，在蔚蓝色的天幕下，轰炸机和驱逐机如同雨前的小燕子在飞舞盘旋。拉温斯布吕克迷人的天空一直使我赞叹和称颂，因为我从未在其他别的地方见过如此美丽的天空，我也从未见到过如此清澈、明朗的色彩。这也许是由于近海的缘故吧。然而我依旧仇恨这里的一切。

警报再也不响了。为什么还要拉警报呢？过去发警报也从

来不是为了要我们这些女囚犯躲进防空洞去。留下来的党卫军门卫在喝酒壮胆。而我们却在各处随随便便地走来走去，如同不存在任何危险一般。在无穷尽的紧张和焦虑中，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不只来自天空，而且来自地上的那些党卫军。

集中营的厨房门口开来了一辆卡车。从卡车上下来了许多党卫军，他们冲进厨房，一会儿后，他们抬来两口袋面粉装到车上，然后又转身奔入厨房。我和安妮奇卡·里帕奇科娃向厨房跑去。“我们必须给病号留些面粉。不能让党卫军把面粉全部抢走！”此刻，党卫军又忙着把一口袋面粉抬出去。他们刚一转身。我和安妮奇卡也从厨房里抬出一口袋面粉，把它靠在墙上，上面再用一个大筐罩住。党卫军回来后又扛走了半片猪肉。我和安妮奇卡立即把另外一半拖到墙根，然后用盛土豆的大木盆把肉盖上。猪肉不供应犯人。昨天，党卫军们刚从附近一所猪圈里赶来了几口猪，接着便把这些猪宰了。猪的尖叫声在女囚犯们中间引起了一阵慌乱。她们以为党卫军在屠杀我们的人。一口猪从厨房逃到集中营的大马路上，党卫军们摸黑追了好一阵子才把它抓住。今天，那口猪的一半给他们抢去了，另一半我们拿来了。当时党卫军已经乱成一团，因此把另半只猪也忘记了。我和安妮奇卡把这半只猪放进一只大筐里，用面口袋盖好，然后抬到1号木板房去。此外我们还抢救出了另一口袋面粉。由于党卫军忙着逃跑，所以我们才走了运。

党卫军们开走了。集中营的厨房被洗劫一空：炉膛里冷

冰冰的，锅里空无一物。一群群饥饿的“黑鬼”在大马路上游荡。

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医生来到我们中间。“病人喝的水连一滴也没有了，”她抱怨起来。“哪儿都没有水。”法西斯分子把集中营的供水系统摧毁了。我们就解决用水问题进行了讨论。我知道，在通往西门子公司路上有一个猪圈，猪圈里有一口水井。但是怎样才能把水运到这儿来呢？用大锅去装吗？水井虽然不远，但是要把一大锅水拉回来恐怕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要把盛满水的大锅装到老式的四轮板车上（我们曾用它运回了红十字会送来的食物包裹），那又太重了。

突然，我们的目光落在了一辆平板车上。我们对它可熟悉了。它曾经把各个木板房中的死尸运到停尸间去，那里有一小队党卫军负责这一工作。那些党卫军把死者身上唯一的衬衣裤剥掉，豺狼成性的党卫军医生再把死者嘴里的金齿冠敲下来，然后把死尸重新装到平板车上，由两三名妇女驾辕，另外两三名妇女从后面推着，在一名女党卫军、一条警犬和轻松乐曲的伴送下，“灵车”徐徐向火葬场驶去。此后，女掘墓人又哼着轻松的曲子回到集中营里，再把死尸装到车上，又向火葬场走去。在最近几个月里，她们象钟摆一样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地来回奔走在集中营和火葬场之间的土路上。

现在“灵车”也休息了。由出身低贱、举止粗野的德国女人组成的掘墓队或许也已经撤离了，但是停尸房和当医院

用的木板房中的尸体已达到超饱和状态。我们把车子拉来了。前来帮忙的还有女红军战士多莉娅——伤成残疾的一位瘸子，米拉德卡·诺娃和另外两名步履踉跄、身体孱弱的难友。她们都非常热心相助。我们走进厨房，挑选了四口大锅装到车上，然后两人驾辕，三人后面推着，我们终于上路了。在大门口我们遇到了麻烦。铁栅门紧锁着，栅门后面一个醉醺醺的党卫军抱着自动步枪在来回晃动。我们大声地向他喊话。兹登娜以医生的身份向他解释：病人渴得厉害，但是没有水。我对那位党卫军说：“我们要去猪圈取水。”他却摆出一副臭架子，长时间地摆弄着手中的自动步枪，一会儿用枪口对准这个，一会儿又对准那个，但是最后还是把大铁门打开了。

我们走出了大门。在平静的湖水后面菲尔斯滕堡城在痛苦地呻吟着。它那里的建筑物仍在冒着浓烟，有些地方还喷射着火焰。党卫军慌作一团，他们正穿过菲尔斯滕堡城向西逃窜。这是他们向西逃命的唯一通道。我们沿炉渣路把平板车一颠一颠地拉到了猪圈。在离此不远的西门子公司附近的集中营里，干渴的男囚犯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两个党卫军站在大门口监视着他们。我们装满了水，然后一起把大锅抬到车上。我们想把水先送给附近的男囚犯。我们朝两个党卫军门卫大声喊叫，告诉他们我们送饮用水来了。但是他们却不理睬我们，反而用自动步枪向我们瞄准。他们不许我们靠近一步。我们万般无奈，只得掉转车头回去。我们真有点担心，怕两个党卫军从背后给我们一枪。对我们来说，头顶上

的轰炸机倒没有什么，而站在我们身后端着枪的党卫军却要危险得多。

我们终于平安地回到自己的集中营里。突然，我们看见一个德国兵，背着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品袋往外走。接着又看见了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心中一阵紧张。这些德国大兵干吗跑到集中营来？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食品袋的？他们千万别越来越多、千万别带着武器住下来不走！这样，红军不得不又要和法西斯国防军交起火来。唾手可得的自由又将付之东流！我们相信，红军不会轰炸和扫射我们这个集中营。但是，集中营里决不允许留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忽然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立即拦住了一个德国兵，问他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说，这是女犯集中营，这里到处是可怕的传染病，他和其他士兵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了最大的威胁；我告诉他，整个集中营已经全部撤离，留下来的都是患有伤寒、斑疹伤寒和急性痢疾的女人。我说的全是实话。那个德国兵吓了一跳，拔腿就跑，同时还招呼着其他士兵。他们甚至把手中的食品袋也全扔在地上，火烧眉毛似地逃命去了。

当我们再次从大门出来时，我们碰上了整队整队的德军。他们正向西开去。我们每次通过大门时，醉醺醺的党卫军门警总要威胁我们。我们向那天还出现在大门口的集中营司令官提出要求，要他给门警下一道命令，让我们取水时能自由出入。司令官虽然对那个党卫军交待了让我们通行的命令，但他同时又“规劝”我们——他明白表示，他只是规劝我们

而已——能够走动而又无值班任务的妇女应该到大门口去集合，等候女看守前来把我们带走。如果女看守没有来，那么我们可以排成五列纵队向马尔霍夫（即向西）方向出发。4月28日下午，真有那么十五、六个德国女人在大门口几次排好了队，她们全是些粗野庸俗、偷鸡摸狗的家伙。她们的装束打扮使我们瞠目结舌！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貂皮大衣，脖子上裹着银狐或水貂皮围肩，手里还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箱。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她们从仓库里偷来的。她们拖着这些东西气喘吁吁地来到大门旁边。有些这种打扮的女贼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溜出了大门。天晓得她们能把这些东西拖到哪儿去。如果她们想去马尔霍夫，那么她们得走完40公里的路程，而且天上还有飞机不停地进行轰炸。为了能保全性命，人们都巴不得把一切多余的东西甩掉呢！有些女贼在离开集中营前被我们截住了，最后她们不得不把偷去的东西全部交出来。当最后一个母夜叉和女贼从集中营滚蛋时，我们无不拍手称快。

我们对来到大门口的集中营司令官说（他不敢进入大门了，也许是担心会传染上疾病，或者是害怕我们），我们准备把尸体拉到火葬场去，因为许多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他颇为严肃地回答说，我们最好在集中营后面挖个坑，把尸体埋在坑里，然后在坟头上埋一个木头十字架。正是这位司令官先生，他首先下令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妇女，现在当红军逼近、他的末日来临之际，他倒要给死难者的坟头上埋十字架了！我们气坏了，我们决不能这么干。我们完全做得对。我

们为什么要替法西斯分子掩盖罪行呢？让全世界看一看他们骇人听闻的罪行吧！

停尸房的地板在尸体的重压下塌陷了。病人区木板房巨大的盥洗室里女尸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死神不断地吞噬着一批又一批病号，最后只得把尸体一层一层地擦起来。

夕阳西下，我们和几位被关押的女红军战士正向西眺望，那里，在太阳没去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朵朵巨大的乌云。红军女战士多莉娅清楚地辨认出那是苏联精良的喀秋莎和运射程炮在怒吼。她如此准确地、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它们，以致我们这些从未见过这种武器的人，也从奇异的云彩图案中开始知道哪些是大炮、哪些是喀秋莎——苏军有名的武器。我们站在集中营的马路上，贪婪地望着远处的地平线，热切地期待着自由的来临。

第二天我们还是冒着隆隆的炮声和落在离菲尔斯滕堡城不远的炸弹的爆炸声来回运水。有一次，当我们刚走出大门时，迎面驶来了一辆军用小轿车，它在集中营大门口停了下来。我们也把平板车停住了。汽车的玻璃窗敞开着，方向盘后面坐着一名德军士兵。我好奇地往车里望了一眼。后面座位上坐着一名法西斯高级军官。他脸色发黄，显得疲惫不堪。我问他说：“您知道不知道，集中营是否会受到轰炸？”我的意思是说：法西斯分子会不会轰炸集中营。他把头伸出窗来，厉声反问我：“怎么，还没有撤退吗？”我不想向他透露任何有关集中营的情况，不想让他在最后时刻再给我们送几枚炸弹来。我也用问话反问他：“红军离这里不远了

吧？”我注意到，他那过分疲劳的脸抽动了一下。他没有回答便把头缩了回去。他喝令司机开车，接着他们便飞也似地跑开了。

晚上，漆黑的夜空突然亮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大地强烈地震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团火球，大地又在颤动。晚风吹过，我们闻到了刺鼻的硝烟气味。出事地点离此不会太远。根据巨大的爆炸声来判断，炸掉的是一个火药库。我们不知道，这是法西斯分子干的呢，还是我们的人干的。

在木板房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我们找到了米尔卡和其他几位女难友。从隔壁的病号房里响起了一位妇女临终前嘶哑的惨叫声，这声音传遍了静穆的板房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找不到任何药物，没有镇静剂，那位妇女在死亡线上已挣扎了整整一天。近处响起的巨大的爆炸声把单薄的木板房震得来回晃动。据说躲在房间角落处最保险，那里最安全，这是某位妇女说的。然而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如果落在集中营附近的炸弹中有一颗命中木板房，那么它早就会被夷为平地了。叫人无法相信的是，当我们的生命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竟能象正常人那样行动和说话。但是，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我们真的都是正常人吗？

今天，当我回想起这一切时，有一点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在隆隆的炮声中，在雷鸣般的炸弹声中，在大地剧烈震动的情况下，我们却能安然入睡，如同躺在摇篮里一般。但是，当时我们的确睡得很熟！

我们度过了漫长的两个整天。病魔缠身的妇女并不知

道，我们的四周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她们听惯了飞机的轰鸣声。当炸弹爆炸、她们的床铺晃动时，“护士们”便会安慰她们说：离这里还远着哩！亲切的话语和一点儿水，这些便是我们能够给重病号提供的唯一的“药品”。

第九节 苏联红军带来了自由

1945年4月30日，天气晴朗。一大早我们便走出木板房。一种特殊的、不寻常的、节日的和奇异的宁静使我们惊呆了。昨天夜里如同进行了清洁大扫除一般。碧蓝的天幕上没有飞机呼啸而过，四周也听不见枪声，明亮的阳光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硝烟的痕迹。

我听见有人走路脚步声。一位拉脱维亚女同志向我走了过来。“庆祝胜利！”她郑重其事地向我打招呼。“快走！”我们两人向大门跑去。大门敞开着，门里空无一人。站岗的、醉醺醺的党卫军不见了，再没有人用自动步枪顶着我们的胸膛来寻开心了（象他们那两天所干的那样），再没有人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们了。地上到处是那些该死的家伙的制服、军上装、被撕下来的肩章、领章、酒瓶子和反坦克手雷。看样子纳粹分子已从集中营仓皇逃走了。

我们走出集中营大门。到处是一片寂静。太阳静默地、慈祥地露出它那明亮的面容，空气清新，凉意袭人。我们在湖边停住了脚步。湖面泛着涟漪，湖对岸便是菲尔斯滕堡城。那里，在钟楼和屋顶上，大块的白布条在临风飘舞。整

个城镇被装扮成天真无邪的样子，而昨天它还是法西斯统治的地方。现在它也宣布投降了。鬼才相信呢！这些年来，我们被关押在集中营这边的囚徒们是深知这位邻居的为人的。在我们亲眼看到红军抵达之前，我们是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我们想象着，我们的解放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这里开来。然而目前尚未到达。法西斯分子为了掩盖其骇人听闻的罪行，还可能把我们这个集中营炸掉。当时，我和那位拉脱维亚女同志坐在清澈见底的湖水旁边，就是这样想的。

那时天色还很早，我们突然看见了一个红军战士。他骑着自行车，从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不久前我们挑土筑路的那个地方——走来了。他身材矮小，衣衫褴褛，满面灰尘。他是红军！我们解放了！

我们，还有几位妇女，一齐向他跑了过去。在无限的欢乐和幸福的感情的驱使下，我们拥抱他、吻他的脸、头发和衣服。我们七嘴八舌地、滔滔不绝地说着道谢的话。我们诚挚的握手和拥抱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我们对他的感激和爱戴之情简直要把他窒息过去。“红军在哪里？”我们这样问道。他从拥抱中挣脱出来，豪迈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微笑着用俄语说：“他们马上就到！”从他的手势和说话的方式中流露出了巨大的力量和信心，因此我们心里原有的一切恐惧都不见了，我们畅想着他后面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正向这里开来。

“法西斯分子们哪儿去了？”他认真地向我们打听起来。“好象都逃走了。集中营里面没有。”这一点我们很清

楚。然后，我们指着不远的菲尔斯滕堡城及其周围的林子说，他们很可能藏在那里。“他们还会轰炸我们吗？”不知哪位妇女问了一句。“他们用什么来轰炸你们？”他笑了，接着骑上自行车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连他叫什么名字我们也没有打听出来。日夜盼望的解放者就站在面前，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问一声他叫什么！

唯一的一位骑自行车的红军战士，他就是我们心目中解放我们的红军师团。然而他却足以使我们这里的党卫军们从此销声匿迹了。

难道这就叫做解放？我们果真是自由了吗？过了一会儿，我们就这样互相询问起来。一天的功夫，我们甚至开始怀疑，那位战士是否真的是红军，或者我们是在做梦。幸好当他来到时在场的有好些人。大家都肯定说他是真正的红军战士。然而，目前我们正处在无人过问的国度里。未来如何，很快便知分晓。

我推着我忠实的“伴侣”——平板车——不停地来回拉水。跟车帮忙的人不断地轮换着。大部分人在久病初愈以后身体都十分虚弱，她们都无法承受这种繁重的劳动。

红军战士离开不久，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一个男人艰难地拖着两腿，他身上穿着肥大的新衣服，象稻草人一样来回晃动，手里还提着一只箱子。他的举止活象一个醉鬼。现在他把箱子扔在马路中央，然后朝女犯集中营的方向踉踉跄跄地走去。他后面跟着另外两三个男人，他们也同样吃力地拖着双腿；脸色灰白，双眼深陷，完全象个

活骷髅。在他们后面，又跟着其他这样的男人。所有的人都穿着崭新的衣服，有的拿着箱子，有的空手走着。我和一位男人攀谈起来。他不懂我的话。他把一件衬衣塞到我的手里。他是法国人。我也不懂法语。我又叫了另一个男人。他也是法国人，但是，我们可以用德语交谈。我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说，他们是上边那个集中营的男犯人。他们又是从哪儿弄到的新衣服呢？他说那边有一个木板房，房子里全是衣服。这些男人的样子可怕极了。

西门子公司附近的男犯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了，骨瘦如柴、肮脏不堪和满身虱子的男囚犯们——法西斯集中营的产品——纷纷从集中营内涌了出来，在大马路上蹒跚着。

一群群幽灵相继涌进我们集中营对面的大楼——过去党卫军的司令部。他们纷纷钻进存放着大批罐头和酒的地窖里。没有起子或小刀，罐头是难以打开的。但是，酒瓶子的瓶颈却容易敲断。因此，这些饥饿的男犯们为了欢庆解放便开怀畅饮。然后他们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从地窖来到办公室，把那里的一切东西——桌椅板凳、收音机、公文柜等统统都捣毁了。另一些男犯来到了党卫军们的住地，来到法西斯将军们和纳粹党头目们在离集中营不远的地方修建起来的别墅。其中一座别墅是属于纳粹将军古德里安的。他们之所以把自己的官邸建在这里，是因为他们相信，集中营不会受到轰炸。在这些别墅和住宅中，这些被解放了的男犯们把自己对法西斯暴政——它已被胜利的红军所粉碎——的愤怒和仇恨统统倾泻出来。结果，几小时以后，他们彻底捣毁了这些

住宅或别墅中的所有陈设，大部分成为一片废墟。在他们的仇恨风暴的冲击下，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们用脚把钢琴踩塌，他们用刀把高级家具劈成碎片。他们所向披靡、无人阻挡，法西斯分子逃跑了，而红军又还没有到达。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这里的一切在几小时以前还是属于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的。仇和恨在他们的心中燃烧，他们已失却了控制自己的能力。既然他们不能亲手杀死敌人以报仇雪恨，那么他们起码要拿他们的财产发泄一下心头的愤恨。

可是过了不久，在集中营司令部的地窖里，在别墅和党卫军住宅内外，却有许多解放了的男犯死去了。长期挨饿、孱弱和衰竭的肌体经受不住烈性酒和暴食豪饮的压力（他们在法西斯头目们的别墅的仓库里找到了大批食品）。几天以后，我们妇女和另外一些男人还不停地四出寻找熬过了监狱生活、却未能熬到胜利的死者。

在通往西门子工厂路上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马厩，里面的草堆中隐藏着好几位德国籍囚犯。在愤怒的其他民族的囚犯面前，他们感到生命没有保障。在打水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他们。为了使他们免于饿死，在其他犯人的怒气平息下来以前，我们每天给他们送去了食物。

起初，在我们集中营大门口站岗的只有一位红军女战士——身材瘦小、一只腿微瘸的多莉娅。后来她告诉我们说，当时她的步枪里连一颗子弹都没有。但是，男犯们并没有骚扰女犯集中营。他们首要的问题是弄到食物。其次，集中营

周围有大墙和铁丝网——这一点使他们十分恼火。是的，他们深恶痛绝的东西莫过于集中营了。有时候，个别被解放了的男犯虽然也跑到我们集中营门前来，但是，经过解释，说不许入内，他们接着便走开了。

在离集中营不远的马厩里养着20匹左右的马。某些法国人和俄国人解开了拴马的缰绳，在马路上进行激烈的赛马表演。有时，某些发了疯似的骑手在我们集中营的大门口停下来，但是，女红军战士手中的步枪却使他们望而生畏，所以他们都未敢贸然入内。

下午五时许，红军终于出现了。他们是从集中营后面遍布缝纫作坊的所谓工业区过来的。红军的骑兵部队，炮兵部队，我们从未见过的、但在最近两天听到过详细介绍的喀秋莎部队，以及坦克部队和步兵浩浩荡荡地从集中营的大马路上开了过去。红军战士多极了。但是，他们只从集中营穿了过去，接着便继续往前赶路。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红军战士留了下来。

我们就这样获得了解放！我真应该痛痛快快地高兴一番，我真应该尽情地欢呼和跳跃。然而我心中的激情好象在早上和那位我所看见的、骑自行车的红军战士拥抱时已全部消耗殆尽。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占据着我的全身，那就是：尤列克怎样了？他还活着吗？突然，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如同猜透了我的心思一般，向我走了过来。她给病人医治疾病的唯一良药便是她所拥有的、用之不尽的微笑。当她身穿白色大褂、梳着整洁的头发、满面春风地走进病号们居住的木

板房时，她微笑着问道：“姑娘们，睡得好吗？”此刻，她宛如驱散满天乌云的一轮朝阳。她用美好的话语和无限的耐心去劝慰每一位妇女。她赢得了各民族女犯们的共同爱戴。现在她来到我的身边对我说，她相信尤列克活着。“你知道他的消息吗？”我问道。“不，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种预感，尤拉没有死，他还活着。”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尚未获得解放。红军和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继续在和法西斯占领者激战。

红军战士们不再让我们自己去运水了。他们到达的那天下午，一位苏军军官对我说：“你们替他们干得够多的了。现在该他们替你们干了。”

一位捷克女人从仓库里找来了一些红布。我们把它剪开，做了许多小红旗和红头巾，用来庆祝自己的解放和五·一节。

5月1日清晨，我和米尔卡从集中营走了出去。一切都显得多么的神妙莫测！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比如现在，自由自在地出出进进，而党卫军没有了，女看守也没有了！然而我们彼此发现对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转过头去，望着两天前头戴骷髅帽徽的党卫军值班的岗亭。此刻是一年半以来米尔卡第一次走出集中营的大门。

我们迎来了自由的1945年的五·一节。然而，家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又怎样呢？我们还没有电，我们还无法收听广播。党卫军在撤离集中营以前把一切都破坏了。苏联朋友告诉我们，在我们国内，战斗还在继续不断地进行

着。

湖岸上一丛丛白色的延命菊盛开着。我从前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它们呢？要知道，一夜之间它们是不可能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我们采集了许多，要把它们送给生病的姐妹们。她们一定会惊喜交集的！突然我们发现，在我们前面不远的湖岸旁有一头黑白花的奶牛正在吃草。我们可以挤些牛奶带回集中营去！这可是对五·一节的献礼啊！我向米尔卡提出：“我去挤奶。”但是往哪儿放呢？我们手边没有任何盛奶的东西。我回到厨房去取提桶，米尔卡留下来继续监视正在吃草的奶牛。后来我们把它赶回牛圈。在槽子旁边还拴着好几头哩。在奶牛之间的草堆上躺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带条纹的囚服。我和米尔卡交换了一下眼色。这家伙是不是装扮成囚死的党卫军呢？我用德语问这个陌生人：“你在这儿干什么？”他用蹩脚的德语回答说他身体有病。“你是哪国人？”“我是荷兰人。”啊，荷兰人！他肯定会挤奶。荷兰有许许多多的奶牛，那是个“黄油之国”。我问他挤过奶没有。他说挤过。我要求他挤给我看看。我从前还没有挤过奶呢。他试着站起身来，但是不行，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在奶牛身边蹲了下来，用手摸了一下牛的奶头。它撩起一只脚挡住了。米尔卡不停地拍着它的背，同时用捷语柔声细语地对它说：“乖呵，黑白花，别动！”我不停地揪奶头，但是牛奶就是挤不出来。

荷兰人在一旁注视着我们。当他看到我的努力毫无结果时，便叫我们把奶牛牵到他的跟前，他说让他试试看。可是

他连坐起来的气力也没有。米尔卡取体温计去了。荷兰人则向我讲解着挤牛奶的要领。据他说，我接触奶头的动作不能过于拘谨，否则奶牛会立即知道我是个外人，而且还是位生手呢。现在他用荷兰语吆喝着奶牛。终于，牛奶象涓涓的泉水一样喷射出来，落在桶底上发出叮咚的响声。荷兰人鼓励我说：“瞧，不是行了吗？”牛奶越来越多。此刻，米尔卡拿来了体温计，把它交给了荷兰人。他正在发着高烧。怎么办？他不能留在这里，在这里他是不会恢复健康的。米尔卡对他说，我们去取担架来把他抬走，抬到一个板房中去。“你不能留在这里！”他勃然大怒说道：“你们敢这样做！现在我是自由人了。如果你们把我抬回板房去，我又要进铁丝网了，我又会象一名囚犯！”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表示坚决不让我们把他抬回集中营去。我们向他解释：现在集中营没有了；这里的法西斯分子也已逃走了；我们不过是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回去与家人团聚罢了；在板房里他将得到治疗和护理，他在那里将舒服得多，他可以早日痊愈，早日返回家园。然而怎么劝他也没有用。他说，他决不离此一步。“回板房去我又要成为囚犯，而在这里我是自由人。我如果高兴，便可以走出门去（他的话叫人发笑，因为他现在连从地上站起身来的气力都没有了），举目四望，那儿也没有铁丝网，我可以看到自由的天空，宽广的大地，我会知道我是个自由的人。你们谁也别打算把我重新送进铁丝网里面去！”我们知道，我们是无法说服他的了。

约两小时以后我挤了满满一桶牛奶，大概有十公斤那么

多。挤奶弄得我精疲力尽，奶牛也显得疲惫不堪。当我离开它时，它瞪着大而忧伤的眼睛睨视着我，好象在说：“谢天谢地，可完了！”我们答应荷兰人，我们不会把他丢下不管，我们会给他送饭，并替他请医生来。

解放我们的红军先头部队又开走了，只有那无法忘却的回忆留在我们的心中。稍后，以布拉诺夫少校军医为首的特遣队来到了。他们带来了药物和食品，同时，把集中营改组成妇女医院，把尤根德拉格尔地方的木板房变为被解放了的男犯医院。布拉诺夫率部到达的当天，他便指示赫伦尼科夫大尉尽快修复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在自来水厂重新供水以前，命令菲尔斯滕堡城的德国人用马拉水车去运水。有一批德国女人负责收拾青菜和土豆。布拉诺夫少校还吩咐让所有生病妇女（实际上集中营的女居民们无一例外）和生病的被解放了的男犯们能够吃到含有必要热量的食物。

“你们在这儿吃尽苦头了！然而我们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一位从菲尔斯滕堡城来的德国女人试图用这样的话来哄骗我。我压住心头的怒火回答说，希望她别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说话。“这些年来，你们难道没有瞧见，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即使在寒冬腊月也赤身露体和光脚走路的、骨瘦如柴和饥肠辘辘的妇女从你们的菲尔斯滕堡城穿过吗？而菲尔斯滕堡的公民们却朝她们身上吐唾沫！难道你们没有看见火葬场的烟囱成年累月、不分昼夜在冒着烈焰和浓烟吗？难道那焚烧死人头发和尸骨的满天恶臭你们就闻不出来吗？”她对我说：“当时我们也没有法子去帮助你们呀！”我回答说：“那

起码也别说什么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呀！正是你们这些菲尔斯滕堡人把从集中营里冒死逃走的女犯们又抓回来交给党卫军去受那惨无人道的毒刑拷打的。因此你们别再说什么当时没有法子帮助我们了！”她在我面前再也无法狡辩，只得默不作声了。

我们向布拉诺夫少校报告了牛圈中生病的荷兰人的情况。他跟着我们来到牛圈。他诊断后发现，那位荷兰人（过去的囚犯）已经到了心力极度衰竭的程度。但是，希望他能搬回到板房中去的建议他连听都不愿意听。布拉诺夫同志告诉他，只要他自己不愿意，他们就不会让他搬回去。此后，我们定期给他送药、送饭，还给他带来替换用的衬衣。几天后他同意把他抬到木板房里去了。在马厩里我们还找到了几位类似他一样的生病的男人，他们都害怕被抬到板房中去，担心会再一次被关进集中营。布拉诺夫和我们的捷克女医生们对他们十分耐心。对所有的病人决不强迫命令，决不采用强制手段。布拉诺夫常说，强迫他们搬出来和让他们留在原地再呆上一些时候相比，前者对他们的健康情况会更加有害。

布拉诺夫少校曾答应我们要把发电厂修好。前面谈到，这个任务交给了赫伦尼科夫大尉。菲尔斯滕堡城的德国人被派到遭到了破坏的发电厂里，他们干活也确实十分卖劲，但我总是信不过他们。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赫伦尼科夫大尉，并且坦率地对他说，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希望他多多注意，因为在发电厂里除他一人之外全是德国人。赫伦尼科夫

笑得流出了眼泪。他说，德国人能把他怎么样？现在他们不敢了。我象影子一样地跟随着他，生怕他发生意外。他不会说德国话，我便替他当翻译。傍晚时分集中营里的电灯亮起来了。

我们把一些收音机从原党卫军司令部和其它一些住宅与别墅中搬到集中营里，这些收音机是红军抵达前一天，愤怒的、解放了的男犯们捣毁党卫军驻地时的“幸存者”。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知道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情况。那里依旧在进行着激战。我们从红军战士那里得知，5月2日红军已攻克柏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然而，5月5日我们却从收音机里听到布拉格绝望地呼救的消息。假如这个消息只是一个女人听到的，我们完全可以不信。但是这个消息是由许多女同志同时在几个房间里收听到的！我们马上找到布拉诺夫同志，请他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他无可奉告。我们被吓得惊恐万状。我们跑遍了整个集中营，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同志。另一些女同志守候在收音机旁，以便把最新消息随时告知我们。我们当中不少人的父母和亲友都住在布拉格，我们想念着他们，为他们的生命安全提心吊胆，我们都为我们的布拉格的未来焦急万分。大家不停地向苏联同志们打听有关布拉格的最新消息。他们安慰我们说，红军一定会用援助去回答布拉格的呼救的。法西斯分子还能干些什么呢？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打败了。当我们的耳边不停地响着布拉格电台绝望的呼救声时，这些劝慰的话又有什么用处呢？纳粹军队的残部出于报复，出于已经意识到自己末日的来临，

他们在布拉格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当其他各民族的妇女正在为她们的祖国肃清了法西斯敌人而欢呼胜利时，我们这些捷克妇女却焦急不安地、担惊受怕地打发着日子。吃了败仗的德国将军们已经签字无条件投降，但是在布拉格却仍旧进行着激战。

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5月9日，希特勒德国宣布彻底失败，战争结束了。这一天，红军赶到了布拉格，消灭了残存的法西斯禽兽。我们的布拉格也自由了！这是我们能够告慰病友们的最令人兴奋的消息。这对她们说来也许是一副最好的良药。

前面已经提到，红军到达后首先关心的是把过去的集中营改建成医院。他们带来了德国人，叫他们把病区木板房中架子床的第三层和第二层拆掉，只剩下最下面的一张平板床。统计结果表明，这里共有3,000名左右的男女病人。现在，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床位，领到了清洁的内衣，得到了医疗和护理。

为了使病人尽早恢复健康，他们的伙食和护理必须得到保证。尽管他们都热切地盼望着回祖国去，但是严重传染病患者是不许离开医院的。身体健康的、获得解放的捷克、俄国、波兰的女难友们主动表示，在大部分病员恢复健康以前，她们愿意留在拉温斯布吕克。这些留下来的人都是女医生和主动承担炊事工作的妇女，她们把红军送来的食物烧成病号饭。布拉诺夫少校军医亲自编排了营养丰富的菜单。

停放在木板房中、停尸间里和火葬场旁木板棚里的尸体必须抬出去最后安葬。面对此情此景，即使是麻木不仁的人也无不触目惊心、悲痛万分！许多尸体已经腐烂。德国人挖了许多公墓，把它们集体安葬了。他们带着口罩，掩面而视，据说他们也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些可怜的死者！

解放后不久，我想可能是第二天，我们几个妇女到拉温斯布吕克郊外去散步。同去的还有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医生和米尔卡·什特罗波娃。当时正值傍晚时分。几小时前的喧闹和激动被一种很不自然的寂静所代替，我们如同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自己也无法相信这一切。湖面清澈如镜，公路上空无一人。火葬场的烟囱直指天空，它们呆呆地耸立着，看不出丝毫有生命活动的痕迹。我们信步来到火葬场前面的空地上。正对面有一座没有门的巨大的木板棚，如同张着血盆大口蹲在那里。木板棚里象柴堆似的垒满了一堆堆高达棚顶的女尸。有的死者圆睁双眼呆呆地望着前方；有的死者保持着垂死挣扎时的姿势；有的死者伸开双臂、张着大嘴，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许这些嘴正在呼救，或者在呼喊孩子、丈夫或母亲的名字！现在，解放只几个小时，我们却在思想上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了。突然，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我们怎么能在这野蛮的法西斯监狱里既不失却人的尊严而又能生存下来的呢？我们担心的是，那些没有经受过这一切暴行的人们是不会相信我们的，他们不会相信从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出来的囚犯们的，因为他们讲述的一切是那样的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囚犯们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决不是为了博得人们的怜悯和同情。对所有的人来说，死去的和活了解放的囚犯们将永远是镜子和号角，它召唤我们去仇恨法西斯主义，去仇恨培植了和正在培植法西斯主义的家伙，我们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以任何方式重新复活。我们就这样一边谈论着，一边向火葬场走去。

在火葬场旁边我们发现了一个煤气室的颓垣断壁。原来，过去当党卫军押送我们小组到西门子公司去上下班路过此地时我们所闻到的、苦杏仁般醉人的气味正是从这里泄漏出来的。我们曾苦思冥想，但就是无法知道每天把挑选出来的囚犯活活熏死的煤气室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在它和我们相隔只几米之远。从这些颓垣断壁可以看出煤气室的结构极端原始。它是一座用木板条钉起来的、有两个单间的房子。在较小的、狭长的单间里至今还放着许多盛有烈性毒药的铁桶，上面贴着“注意！生命危险！”的标签。纳粹分子戴好防毒面具后（我们在这里也找到了这样的防毒面具）再把烈性毒药通过一个小孔放入隔壁四方形的大单间里去，在这个大单间里沿木板墙放着普通的木板凳，靠门处木板地上活动地牢张着大口。这里，在这个煤气室里，法西斯分子再也用不着煞费苦心去给囚犯们制造这样的印象：似乎它是一间带有喷头的浴池，如同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初期干的那样。那些一迈进煤气室门槛的女囚犯们会立即明白，她们究竟来到了什么地方。

现在，当我们走进煤气室时，被千千万万死难者的脚印弄

成污黑色的木板地上，在斑斑血迹中间，我们发现了一只浅蓝色的、脱了漆的洋铁罐子。它是从哪一位难友的手中掉下来的呢？是从生肺病的俄国姑娘手里掉下来的，还是从利季采妇女手中、或者是从生病的法国女人、波兰女人或者南斯拉夫女人手中掉下来的呢？洋铁罐子不会说话，它无法把它所看见的和所经历过的一切告诉人们。不久以前我们收工时常看到的景象又一幕幕映入我的眼帘。当时我们必须在集中营的大门口停下来，等着一辆敞篷卡车开出去以后我们才能进去。在那辆卡车上站着、坐着、或者躺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她们穿着破烂的囚服或者只穿一件单薄的衣衫，全部赤着双脚。有的妇女泪流满面，有的妇女两眼呆滞无神，而所有的人都活象哑巴。党卫军正把她们押去处死，或者把她们送到乌克尔马克集中营（在那里许多女犯甚至活不到第二天），或者便直接送进煤气室去。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令人震惊的路线。我们走进火葬场去。火葬场大门上写着醒目的标语：“不准入内！传染病危险！”三个焚尸炉已无法满足要求了。炉膛里尚未被烧成灰烬的残骸圆睁双眼在瞪着我们：每个炉膛里都有三、四具骨瘦如柴的尸体，炉膛口的地板上放着巨大的铁叉，炉子后面是两大堆银灰色的骨灰。这些焚尸炉曾吞噬了千千万万具尸体，才堆积起一座座痛苦之山，悲愤之山，绝望之山，对人类幸福的梦幻之山。我们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自己的脚步。

我们来到火葬场侧翼的一条小走廊上。这里幽静昏暗。突然，我们被一种沙沙声惊呆了。我们屏息静听。有党卫

军！他们有多少人？而我们全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呼救已无济于事，因为谁也听不到我们的喊声。只有尽快地离开这里！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终于摸到一扇门旁，她转动了一下门把，门打开了。但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火葬场出口，而是它的附设监狱。在朦胧中我们辨认出了有两个男人正围站在燃烧着的煤油炉前。“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大家急切地问道。一阵可怕的寂静。接着一个男人用法语回答说：

“我们在热罐头。”“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热？”“因为我们相信，这里谁也不会发现我们。大门上不是写得明白：‘不准入内！传染病危险！’吗？”

他们是解放了的法国囚犯。他们藏在火葬场里，以免被党卫军发现！而我们又把他们当成了潜伏在这里的、化了装的党卫军！

当我们走出火葬场时，我们都极不自然地大笑起来。



红军给我们送来了《真理报》和《消息报》。我拿着这些报纸，贪婪地读起来。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看到的、真正的报纸。集中营里的其他妇女，如米尔卡、兹登娜·内德维耶多娃、薇拉·菲亚洛娃、英卡、米拉德卡·诺娃等人，对这些报纸必定也很感兴趣。我从西门子公司搬来一台打字机，用它把编译成捷语的《要闻摘译》打出来。打字机上缺少长音符号和钩形符号^⑭，我就用钢笔把它们补上。每一次我总是把《要闻摘译》复打五份，然后散发给同志们。从报纸

上我们得知，当时正在美国的旧金山举行新的国际会议——联合国各国代表会议，它将为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创造条件。

我编译捷文版《要闻摘译》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下午进行的。上午我要下厨房去监督菲尔斯滕堡的德国女人刮土豆和收拾青菜。我们这些过去的女犯们曾多次要求苏联朋友，应该让现在来老集中营干活的德国人每天至少吃一顿野菜，他们的同胞们就是用这种野菜长年累月地“款待”我们这些囚犯的。但所有的苏联人都回答说：“我们不是法西斯分子。只要他们好好干活，他们就有吃饱饭的权利。”

我们还游览了昔日集中营周围的地区。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座古怪的房子面前，它和对面山坡上漂亮的别墅形成鲜明的对照。它是一座两层的住房，用深色木头盖成；它有房基，窗子很小，而且被低垂的房檐挡住；房顶上铺着灰色的石板。我们询问了路过此地的昔日的囚犯们，这种别具一格的房子是干什么用的。他们一无所知。我们中的一些妇女后来打听到：这种房子是专供斯拉夫人居住的标准住房，德国人计划在打赢了战争以后把所有的斯拉夫人都迁到西伯利亚去。此后不几天，我们又发现了一所同样的为斯拉夫人设计的标准住房，但是，它已经被火烧得精光，如同纳粹分子要把斯拉夫人强迫迁往西伯利亚的计划被彻底烧毁了一样。纵火者是谁却一直无人知道。

随着病号健康情况的好转，在昔日的集中营里要求回家的呼声也愈加强烈。他们不停地要求说：“我们要回家去！”

要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但是，要实现这一愿望并不容易，比如，铁路遭到破坏，火车运输全部中断。离我们女犯集中营不远的男犯集中营里有几位捷克人，他们已先行动身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他们许下诺言，他们将设法派卡车来迎接我们。他们一定会信守诺言的。他们决不会忘记我们。

此后，昔日集中营的大门口开始出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汽车。它们都是些私人的小型汽车。丈夫在寻找妻子。大部分已无法找到。她们或者在撤退时转移到别处去了，或者早已经不在人世。这是最令人伤心的消息，但是我们必须如实相告。

同乘一辆从捷克斯洛伐克开来的卡车回国的除了有杜什科娃同志（即契斯塔太太）、克拉德诺的帕特罗娃老奶奶、以及其他几位妇女以外，还有萨波托斯卡同志。第二天，她丈夫萨波托斯基同志也到了拉温斯布吕克集中营，他是来找自己的爱人的，他在离此不远的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集中营里经过六年的关押后已变得骨瘦如柴、沉默寡言，前后判若两人了！

和许多其他囚犯一起，萨波托斯基同志也曾经被迫向死亡的深渊走去。沿着苦难的道路他来到了拉温斯布吕克西边的施威林监狱，后来红军解放了他们。当时，苏联人想立即送他回捷克斯洛伐克。但是，他怎么能把那些选他为领导的难友丢下不管呢？况且，大批难友都要求回国，交通工具十分缺乏。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难友们深信萨波托斯基不会忘记他们，因此一致推举他先回捷克斯洛伐克，让他 在 家 里

负责把他们从德国接运回国的组织工作。他们的生活目前暂由苏军照管。

萨波托斯基同志归国途中，在拉温斯布吕克作了短暂的停留，他爱人被关押在这里已有三年。可是她现在已经先走了。一回到布拉格，他便把工人同志们发动起来。第二天，布拉格工人便派出了三十辆大卡车到德国来接运被解放了的囚犯们。

我们这些捷克女人——健康的或有病的——在原集中营里一直呆到1945年5月底。在此期间，由于红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难友们的忘我劳动，来自世界各国的大部分患病难友的病情都有了好转，身体都得到了恢复，都能够乘车回国了。1945年5月28日，红色莱托夫厂的工人们派卡车前来接运我们。他们没有忘记我们。一些被解放了的囚犯们同车来到拉温斯布吕克，他们向我们叙述了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到处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他们还讲述了那些被抓去做苦工的捷克人、那些从集中营获得解放的囚犯们、那些在死牢里等死的人们是怎样回到祖国的。我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我心里渐渐燃起了这样一种希望：说不定尤列克仍然活着。如果他能从普勒岑湖死牢中逃出来的话，那么他肯定还活在人世。我向他们打听他是否也已经回到家了。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5月29日，我们告别了我们的解放者苏联红军，登上备有木凳的卡车。我们离开了拉温斯布吕克，告别了死难的同志们的骨灰和坟墓。我们自己也感到奇怪，我们居然能熬到

今天。许多人心情仍然十分紧张，他们不知道家里、国内目前的任何情况。

我们在路上走了两天。在德国的公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德国人，他们推着奇形怪状的手推车或者儿童车，车里放着他们的全部家产。有些德国人迎面向我们走来，另一些德国人走在我们的前头，一会儿后又被我们追了过去。我们的卡车穿过柏林的瓦砾堆，从断壁颓垣中孤零零的布兰登堡大门旁边驶了过去，又穿过被炸成废墟的德累斯顿。德国人在瓦砾堆中继续寻找着死难者。到处是贫困和死亡——一片惨绝人寰的景象！

我们迫切地盼望着能早日看到祖国：她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离祖国越来越近，终于越过了边界。卡车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我们的双脚接触到了祖国的土地。过去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和他的祖国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跪了下去，亲吻了第一把捷克的泥土，亲吻了第一株捷克的小草，亲吻了第一块捷克的石头。我的心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尤列克，他在1938年秋常常援引维克多·迪克的下列诗句：

母亲在向你召唤：

“保卫我吧，孩子！

去吧，哪怕要走向死亡。

你如果离开了我，我不会死，

你如果离开了我，你就会死去！”

5月30日我们回到了鲜花盛开、然而弹痕累累的布拉格。德国法西斯在垂死挣扎的最后几分钟里给我们的首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我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去打听尤列克的下落，同时填写报到登记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布拉格已经举行了“在反纳粹斗争中死难的作家和记者的追悼晚会”，在许许多多罹难者的名字中间就有尤列克的名字。

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确切的消息。

我无法找到我们昔日生活的任何痕迹：我找不到尤列克，我也找不到我们的住宅和书籍。

我在波多利的一家客栈中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便动身到布拉格去，希望能盼到尤列克回来。当时，许许多多的人源源不断地从德国回到布拉格。我在索科尔大街接待站前站了好几个钟头，我和每一批获得解放的囚犯都到这个接待站办理过登记手续。我在那里等啊等啊，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

他没有回来。

我乘车到比尔森去找莉巴。火车根本无法正常运行！夜里我才来到比尔森。那里住满了美军，我如同置身于异国一样。我已经习惯了苏联人诚恳的面孔，他们明朗的笑脸，我对苏军的感情如同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然而这里的一切使

人感到十分陌生。

我没有能叫通莉巴房间里的电铃。经过长时间的敲门以后，二楼的一个窗户终于打开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谁在敲门？”“我，”我回答说，“古丝塔。”不久，妹夫给我开了房门。他领着我向楼上走去，希望我今夜先不要去打扰莉巴，因为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妹夫的意思是要我在她面前千万别提尤列克。

翌晨，当妹夫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离开家后，房子里就留下我和莉巴。妹夫在迈出家门以前还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使莉巴激动。“莉巴，尤列克出了什么事？”我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她突然哭了起来。她的眼泪是饱含悲痛、然而快要枯干了的眼泪。而对我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两年来，我一直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说。莉巴走到书柜前，在纳粹占领时期她曾准备把这个书柜送给尤列克。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了我。我的心骤然跳了起来。我精神恍惚、有气无力地接过信封，打开它，从中抽出一张信纸。

那是尤列克的死亡通知书。

突然，我在佩切克宫盖世太保那里时经常感受到的一种异样的感情占据了我的全身：我好象已经不是我自己，而是成了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舞台上的悲剧的另外一个陌生人。我从死亡通知书上看到的那些句子：尤列克“死于”1943年9月8日4时55分，以及莉巴所说的话，这一切似乎都与我无关。我好象在遥远的某个地方听到过这些消息，而且它也不

是说给我听的。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昏乱蒙眛的感觉。我在两年前最后见到过的、我朝思暮想的尤列克，难道真的已不在人间？当年五月在佩切克宫一层长长的走廊上，在盖世太保背后捋着连腮胡子、对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由衷地感到高兴而笑眯了眼的那个尤列克，把手握成拳头、对胜利充满信心并要求我坚持斗争的那个尤列克，难道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死亡通知书是谁签发的呢？是柏林夏洛滕堡的户籍科签发的。可是，尤列克是在普勒岑湖监狱呀！死亡通知书上尤列克的住址也没有写对。我们一直是住在布拉格十九区，而不是十七区。这里面一定有些蹊跷！“我不相信！”我说。“我不相信，莉巴，我不信！多少杳无音信、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不是都回来了吗？你自己不是说，普勒岑湖集中营在1943年9月里曾遭到轰炸吗？我也听到过这个消息。据说有些犯人还成功地逃出了监狱。为什么尤列克不能在他们当中？你自己对埃莉什卡·乌尔里霍娃就是这样讲的。纳粹分子把她抓到集中营来以后，她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莉巴没有回答。

1945年6月9日的《红色权利报》上，刊登了一则莉巴寄去的“寻人启事”：“作家、布拉格出版的《创造报》编辑尤利乌斯·伏契克曾被关押在庞克拉茨监狱，后被押至鲍岑，再后被送往柏林的普勒岑湖监狱，并于1943年9月8日被判处死刑。凡知悉他在这一时期中的任何详细情况者，请通知莉巴·纳赫季加洛娃——伏契科娃。地址：比尔森，克

拉马日公园八号。”

当时，在布拉格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留胡子的男人。我不知道，这是赶时髦呢还是因为当时买不到刀片。只要一看到留着连腮胡子的男人，我就象被磁铁吸引那样向他们走过去。我曾经走到数十位男人身边，用无比激动的心情去察看他们的脸。但是没有一张脸是尤列克的。在这些面孔上我没有找到尤列克。

同志们把我和尤列克共同生活过的、昔日的住所重新布置了一番。起初我没有勇气走进房子里去，因为在它的走廊和楼梯上，尤列克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最后我终于打定了主意。同志们把我安置在另一间别人住过的房子里，那里深色的橡木家具寒气逼人，那里的陈设永远无法使我感到亲切。我永远忘不了我们那些令人愉快的软杂木家具，忘不了尤列克亲自设计、装饰着灰色塑料贴面的那张灰色写字台，忘不了我们装得满满的、五颜六色的书脊使满室增色的那些书柜，忘不了蓝色桌面的小茶几和带有深蓝色座垫和靠背的椅子。而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一种绝望的感情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快到傍晚时分，太阳已从窗台上爬下去，突然，有人按响了我新居的门铃。我去开门。来客是《红色权利报》的老编辑博霍乌舍克·诺沃提尼同志。他谈了尤列克和《红色权利报》其他编辑的情况，如：爱德华·乌尔克斯，弗兰季舍克·克日热克，瓦茨拉夫·克然，杨·克雷奇，库尔特·康拉德，杨·史维尔马，弗拉季斯拉夫·尚特罗赫，斯坦尼斯

拉夫·布隆茨利克，还有约什卡·雅布尔科娃。这些同志已全部遇难。他们都是非常年轻、非常能干的人。这对我们党、对我们大家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怎么能肯定，他们全都牺牲了呢？你有证据吗？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我忿忿不平地这样说。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后说：“尤拉已经去世了。你不要再哄骗自己说他还活着。这是你迟早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不管这个事实令人多么痛心。”博霍乌舍克的这一席话当时使我对他十分生气。

我在派出所办了登记手续。谁也没有强迫我在“婚姻情况”一栏里填上‘寡妇’字样。如果我这样写了，那就意味着我已经承认尤列克已经死了。我在表上写上“已婚”。工作人员希望知道尤列克的地址。我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呢？结果他们填了“住址不详”。

多少个夜晚我紧张地侧耳倾听，希望能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或者他在我的房门口停下来，用手按响门铃。我梦见过：为了不让他在门外多等上一秒钟，我翻身起床，飞也似地跑出去开门，接着，尤列克走了进来。可是，此刻楼梯上依然是寂静无声，没有任何人在我家门口停下来，也没有任何人按过我家的门铃。我眼睁睁地等待着，但是毫无结果。有时我睡着了，某种轻轻的沙沙声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灯，但不管是在前厅还是在走廊上，依旧是没有半个人影，只有那脚下的嵌木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当我在尤列克和我的好朋友拉季斯拉夫·什托尔的面前，因忍受不了疑虑的折磨而放声痛哭时，他劝慰我说应该

坚强起来。

真是令人痛不欲生啊！

使我坚强地生活下来的是工作。当尤列克活着时，他和我多次谈到，解放后他打算出版一些著作——文学和政治文集，报告文集和戏剧评论集等。在过了好几年以后，我又重读了他在《创造报》和《红色权利报》上发表的文章，把它们抄录下来，同时把各期杂志上他所发表的专论文章做了目录。我还设法找到了在纳粹占领时期尤列克受地下中央委员会委托所撰写的和准备出版的一些秘密期刊。

第十节 《绞刑架下的报告》发现始末

我又到比尔森去找莉巴。她收到了一封与寻找尤列克有关的给我的来信。该信内容如下：

“无比尊敬的夫人！

拜读您于本月九日刊登在《红色权利报》上的寻人启事以后，请允许我把有关您丈夫尤拉·伏契克先生的‘消息和旁证材料’抄件一份寄给您。同时我还把另一份相同的抄件呈送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格市委会。

此刻，我极力用理智去控制自己十分矛盾的心情。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给您的消息将唤起您痛苦的回忆，重新勾起您亲身经受过的惊骇与恐怖，您在庞克拉茨监狱中一想到您丈夫正在惨遭毒打时的那种惊骇与恐怖。但是我认为，您应该知道这份‘消息和旁证材料’，这份材料是我代表中学校

长约瑟夫·佩舍克先生转寄给您的。佩舍克先生原是一名政治犯，他和您丈夫曾被关押在同一个牢房里；可惜他所经受的折磨和苦难使他在被送回解放了的祖国以后于前几天不幸逝世了。我现在只不过是履行我自己对他许下的诺言而已。

尊敬的夫人！我无法忘记，尤尔恰称之为‘老爹’的佩舍克校长对尤尔恰怀有的慈父般的爱。他每天都回忆起尤尔恰，每天晚上他还要为尤尔恰唱一首他心爱的歌儿。他也使我对尤尔恰——一个坚贞不屈的英雄和成绩卓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家——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亲自认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

在和佩舍克‘老爹’进行了多次谈话以后，我对尤尔恰高尚品德的崇敬之情，这封短信和旁证材料决不能表达其万一！因此，尊敬的夫人，当您来布拉格时，请允许我和以我夫人的名义邀请您来我家作客。不论您何时光临，我们都将热烈欢迎。

最后，请允许我预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并医治好心灵上的创伤。我相信，您所蒙受的苦难必将激励决心为实现尤尔恰·伏契克光辉一生的遗愿的人们。

劳动光荣！

弗拉吉米尔·卡兹达工程师

住址：布拉格十二区，洛布科维采广场1号。

1945年6月12日于布拉格。”

随函所附卡兹达工程师的旁证材料抄件如下：

“关于《红色权利报》编辑尤·伏契克的旁证材料和情况介绍

签字人弗拉吉米尔·卡兹达工程师，家住布拉格十二区洛布科维采广场1号，原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犯，在和已故原政治犯、中学校长和捷克教师协会布拉格分会会长约·佩舍克先生进行了多次谈话的基础上，特提供关于《红色权利报》编辑尤·伏契克的旁证材料和有关情况如下：

1944年春，我被押送到庞克拉茨纳粹监狱丙门2号走廊上的248号牢房，在那里我认识了约·佩舍克校长。我们很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我听说，佩舍克‘老爹’曾长时间地和尤尔恰·伏契克呆在同一个牢房里（大概是在乙门Ⅱ.267号牢房）。他们俩成了莫逆之交。尤尔恰——佩舍克总是这样称呼伏契克——开始叫佩舍克为‘老爹’。

几乎没有一天‘老爹’不向我谈起尤尔恰。后来他还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他去世以后，希望我把这些消息和证明材料呈送有关单位。

佩舍克‘老爹’谈话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天，纳粹分子们把一个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人——还不如说是一具尸体——扔进我们的牢房里。他就是尤尔恰·伏契克。看样子他恐怕连一天也活不了了。他从头到脚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他只能趴着躺在地上。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喘气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象他这种样子的人竟被送到牢房里来，而这里唯一的医疗手段就

是同牢的难友们从自己身上撕几块布条，然后蘸上点水敷在他的伤口上。监狱医生（大概是纳瓦拉博士）对血肉模糊的尤尔恰的抢救工作已表示怀疑。佩切克宫的警官是不允许把他送到监狱医院去的。他曾经这样说：‘他要死，便让他死在牢房里好了！’

然而，尤尔恰却出人意料地熬过了性命攸关的这一天。

‘老爹’和另外一位难友（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停地、每隔一个小时便给他换一次湿布。在监狱医生查房时再一次重申了不得把病人送往医院的命令。大约是在第三天，突然来了一副担架把尤尔恰抬走了。他和难友们都以为他可以进医院了。但是，他却被抬到了一楼的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两名盖世太保对他进行了野蛮的审问，尽管他不时地昏死过去，尽管他的大脑已经失去了思维的能力。经过惨无人道的审问之后，他又被送回牢房。

几天过去了，纳粹分子们暂时没有来打扰他，遍体鳞伤的尤尔恰慢慢地好起来了。共同度过的每一个钟头都使同监难友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当时的第三个难友可能是一位波兰伞兵（他自始至终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后来被押送去波兰），或者是一位十五岁的小男孩‘米雷克’，后来他同父母亲一起被枪杀了。

佩舍克‘老爹’非常了解尤尔恰：从他的学生时代起到他任《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从他从事建筑工地上共同劳动的工人那里获得最初的社会知识起到沙尔达教授推荐他专攻文学当教授的接班人，从他漫游法国，认识俄国直到坚定地信

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佩舍克‘老爹’还了解他对自己的妻子伏契科娃太太美好的感情，了解他对一切善良的人们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尤尔恰·伏契克不只赢得了无所畏惧的难友们的友谊，而且他还博得了‘较开明的’德国看守们的同情；那些德国看守有时会伺机来找尤尔恰，征求他在听到一些消息以后——那些消息是他们自己告诉尤尔恰的——对政局发展的看法。尤尔恰·伏契克在他们面前永远是一位从不妥协、坚信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和理想必胜的共产党员。正如佩舍克校长所说的那样，尤尔恰作为一个勇敢、坚定的人，而且持有与纳粹主义完全敌对的观点的人，却受到某些德国看守的尊重，这必然会招惹是非。后来，一个德国密探假扮成囚犯被关进牢房，他的任务就是专门收集伏契克在无人监视时所宣扬的观点。可是，这个密探在头一天便被尤尔恰和‘老爹’所揭穿，因而受到了一个特务应得的那种‘尊敬’。后来，当一个德国看守又来到露出小小门缝的牢房门前征求尤尔恰对‘未来时局’的看法时，尤尔恰不得不向他暗示说，牢房里有密探。稍后，那个密探大概把某些看守十分尊敬共产党分子伏契克的情况向审理此案的警官作了报告。因此过了不久，伏契克便被押解去德国，这个密探也便从牢房里消失了。

在这期间，伏契克经受了被‘老爹’称之为‘冷水澡和热水澡’的多次审讯。有时候纳粹分子们会把他惨无人道地毒打一顿；为了能从他的嘴里骗取口供，有时候他们又会对他‘彬彬有礼’起来；他的警官有时甚至会邀请他乘上小汽

车到赫拉德恰尼城堡去兜风，让他去领略布拉格明媚的春光，去体会游客们自由自在的心情，据说，那些游客才是聪明人，他们是决不会为了政治观点和从事政治活动而甘愿坐牢的。当敌人的‘特殊礼遇’和封官许愿都完全不起作用时，在下一轮的审讯中尤尔恰必然会再一次遭受严刑拷打。在这一时期，他曾怒斥了某些知识分子，他们经受不了敌人野蛮的刑罚，便把重大案件的有关情节泄露给了敌人，从而使另外一些捷克人也惨遭杀害。对尤·伏契克所进行的无数次的审讯证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是坚贞不屈的。甚至审理他案子的警官也因此对他肃然起敬。后来，当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他也开始给尤尔恰人道主义的待遇，并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敬意。

根据佩舍克校长的回忆，这期间，伏契克常常谈起一个名叫克列仓的人和德国看守科林斯基。我的印象是，当谈到克列仓在敌人面前的表现时，伏契克总是十分生气、怒不可遏；在谈到科林斯基时，伏契克又总是满怀感激之情，因为他在牢房里所写的狱中笔记和材料都交由他代为保管了。据佩舍克校长谈，那些东西都是与伏契克本人的案情和狱中情况有关的重要材料，上面还记录了伏契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能这还是他给党留下的遗言。伏契克十分清楚，象他那种地位的人是不会有生还的希望。‘老爹’曾多次要求我，在他身后，我必须把伏契克留有遗言的消息向有关单位报告，而且要想尽办法把那些遗作找到。这份‘消息和旁证材料’将为寻找科林斯基和伏契克的遗作提供必要的线

索。

就我所知，佩舍克校长对尤尔恰·伏契克性格和人品的评价是：他是一位‘堪称楷模’的男子汉。

弗拉吉米尔·卡兹达工程师

1945年6月11日于布拉格。”

我从上述消息得知，佩舍克“老爹”已与世长辞了。他就是在“400号”候审室托尤列克问候我的那位佩舍克“老爹”！我虽然没有看见过他，但我觉得他有着一付慈祥的面孔，因为尤列克曾向我谈起：在第一次审讯时盖世太保把他的衬衣撕得粉碎，后来正是佩舍克“老爹”把自己的衬衣借给了他。也正是佩舍克“老爹”，在我生日时托尤列克把一小块方糖送到“400号”候审室向我表示祝贺。他是解放后才逝世的。至少他活到了亲人们能为他送终的一天。然而尤列克呢？

卡兹达工程师在报告中谈到尤列克在庞克拉茨监狱曾进行秘密写作。我回忆起在1943年1月，在“400号”候审室被取缔之前，尤列克曾在那里对我说：“古丝蒂娜，我在庞克拉茨写东西哩！”我问他：“谁把东西送出去的？”尤列克小声告诉我：“是一个德国看守。”我也小声地对他说：“你可要当心啊！”他回答：“此人可靠。”其他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决定马上去寻找科林斯基。我请求公安局的同志们给予帮助。寻找工作开始了。我来到庞克拉茨监狱。我是沿着

两年半以前盖世太保押送我们的囚车所经过的路线到这儿来的。现在我自由自在地坐在电车里，悠然自得地向车外眺望，我可以大声地说话，坐在我旁边的人们也正在高谈阔论。猛然间我心情沉重地向四下张望起来，生怕党卫军们听见我们的说话声。他们的魔影还经久不断地、长时间地笼罩在我的心头。

我走进监狱大楼。我不断默默地对自己说：你现在自由了，盖世太保不复存在了；我的心激动万分。当我问到科林斯基的名字时，捷克看守们都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他们说，是否指那个卖身投靠了德国人的家伙？我解释说，我不知道他投靠了德国人，但我知道他本人就是个德国人。一位看守告诉我，庞克拉茨监狱曾经有过两个名叫科林斯基的人。其中之一在纳粹占领时期就被送到特雷津去了，不过，他也是耳闻而已。

我又到查理广场监狱跑了一趟。依旧是一无所获。

一天，哈沙同志告诉我，他听说有一位太太保存着一份尤列克给我的遗嘱。尤列克还写了遗嘱？这肯定是某些人瞎编出来的。我的心又慢慢平静下来，特别是当哈沙同志无法回答我的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位太太是什么人？她姓什么？她又住在什么地方？那么是谁告诉哈沙这个消息的呢？据他说是他的一位内弟。我立即给拉吉斯拉夫·特赫尼克——哈沙的内弟——挂了电话。他一口咬定说，是的，没错。不过那位太太的名字他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消息又是谁告诉他的呢？这一点他又记不起来了。现在解放了，要办的事情实

在太多！他想了一会儿后补充说了一句：他想，可能是奥塔卡尔·温施告诉他的，可惜他现在不在布拉格。

年轻的雅罗斯拉夫·波科尔尼同志来看我，他是1942年夏天在英诺尼采区的沃尔特洛夫卡工厂被捕的。纳粹分子曾数次把他带到“400号”候审室来。我曾从他那里得到过带给两位女难友的口信，告诉她们在敌人审问时如何编造口供。现在他告诉我，他在集中营里曾经碰到一位也被判处了死刑的青年人，这位青年和尤列克一同被关押在普勒岑湖监狱。不过后来纳粹法庭把他的死刑改判为十年集中营监禁，现在肯定也回到家了。据他说，那位青年还和尤列克住在同一个牢房里，直到最后一天凌晨，突然有两个打手冲了进来，把尤列克从木板床上拖起来，松了手铐，命令他把衣服脱光，然后再把他的手铐重新锁上，接着，便把他拉出去枪杀了。

此刻我心里又乱成一团。“你的话我不信！告诉你这些话的那个青年叫什么名字？他是什么人？”据说他是一位老成持重的青年人。“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是的，我知道。妈的，他叫什么来着？我和他天天都在一起，他常常跟我谈起尤拉，我准能想起他的名字来的！”然而他并没有回忆起他的名字来。“我给这位比尔森的朋友写封信，妈的，他叫什么来着，我真的忘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现在连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都叫不出名字来了！”“我要是不能亲自跟他谈谈，我就不能相信他说的话！”后来他终于回忆起了在集中营里呆过的那位比尔森朋友的名字。我马上把纸和笔递给了他，要他当着我的面给那位朋友写了一封信。

莉巴终于改变了主意，决定让我看一看尤列克的狱中书信。其中还有他在1943年8月31日所写的最后一封遗书，上面洒满了莉巴的眼泪。一滴一滴的眼泪已使字迹变得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了。

我继续寻找着科林斯基。经过多方查访以后，公安局的同志们终于告诉我说，科林斯基现在在科林。他离布拉格只有60公里的路程，但是怎样到那边去呢？火车照例是开开停停，秩序依然是杂乱无章。在布拉格的街道上，遭到破坏的马路和残缺不全的街垒仍旧比比皆是，它们是不久前我国人民和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恶战的见证。我和公安局的同志们商定，由他们亲自送我到科林去。我在《红色权利报》大楼里上班，那里我有一个办公室供收集和整理尤列克的遗著之用。几位同志已经用打字机把他发表在《创造报》上的文章抄写下来了。第二天一早，当我刚和一些同志谈完话后，大楼的内线电话响了。他们叫我立即到《红色权利报》秘书处去。据说找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我忽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尤列克回来了！

我急急忙忙来到秘书处办公室。他们叫我去找总编辑巴雷什同志。我推开他办公室的大门。里面坐着四位男人：总编辑坐在他自己的写字桌旁，靠门的椅子上坐着公安局的两位同志，在小茶几旁边还坐着一位陌生人。当我一走进办公室时，陌生人立即站了起来，微笑着对我说：“我是科林斯基。”

“科林斯基先生！我找您找得好苦啊！”

“我也一直在找您呢，”他回答说。

我看了看他。一个德国人，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话。尤列克曾对我说过，他的狱中笔记就是由一个德国人送出去的。当然，他没有告诉我那个德国人的名字。

灰黑色的头发，瘦长脸，脸色呈淡淡的紫红色，如同受冻以后的那种肤色，高个儿，年龄还不到四十岁。

短时间的寂静。

在科林斯基和我坐着的桌子上放着一些纸片。

“您有东西给我吗？”

他把两份对折好的白纸片交给我。我打开其中一份。原来是爱多·乌尔克斯同志在被押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前夕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他偷偷地在牢房里写成的，”科林斯基向我解释说。上面的日期是1942年3月31日。二十天以后，乌尔克斯同志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惨遭杀害。

第二张纸片也是一封遗书，也是在1942年3月31日写的，写信人是瓦茨拉夫·辛库列同志，他与乌尔克斯同志同一天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遇难。他们俩都是尤列克在《红色权利报》编辑部的好友，两人同是在1941年2月被捕。

科林斯基看守把这两封信从纳粹监狱带了出来，而且一直保存至今。此刻，经过三年多以后，它们才得重见天日。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它们。当法西斯分子杀害我们的这两位同志时，乌尔克斯当时才三十九岁，辛库列才三十七岁！

科林斯基慢条斯理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皮包，打开它，从里面抽出几张长条形发黄了的小纸片，然后把它们递

给我。我看了看上面的字迹，立即认出那是尤列克用他特有的蝇头小字写成的手稿。我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我放声痛哭起来。我无法继续往下看。刹那间，盖世太保先后把我们逮捕的那天夜里的可怕情景又重现在我的眼前。我又看到了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的尤列克，他多么想笑，他又慢慢地把手攥成了拳头。

同志们劝我先离开一下，一切由他们和科林斯基接洽商谈。我没有走。我又盯着眼前的纸片。我念了起来，但不知所云。我又是一遍一遍地读着：

“他不是他们的人。只此一点他便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成为他……”我全然不懂其中的意思。后来我看到了这样的字样：“科林。那是在戒严时期的一个夜晚。一位身穿党卫军制服的看守把我关进牢房，他敷衍了事地搜查了一下我的口袋。

‘您出了什么事？’他悄悄地问我。

‘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明天就要枪毙我了……’

阿多尔夫·科林斯基，来自摩拉维亚的捷克看守，出生在一个旧式捷克家庭里的捷克人，他冒充德国人，为了到赫拉德茨·克拉洛维的捷克监狱、而后又转到庞克拉茨监狱来当看守。”

我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地翻动着这些纸片。科林斯基带来的、尤列克谈到他的纸片只有那么几张。忽然我发现，每一页纸片的角上都标着号码：136, 137, 138, 139, 140, 141。这就是尤列克对我说过的：“古丝蒂娜，我还在庞克拉茨写东

西哩！”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写了这么多。我急忙问科林斯基：

“其它的小纸片在哪儿？”

“我正要把它们找回来。有些在依赫拉瓦，有些在洪波列茨……”

他慢慢吞吞的谈话方式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打断他的话问道：

“您什么时候可以把那些纸片送来？”

“要是顺利的话，也许用不了一个星期。”

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我多么想尽可能地缩短这个期限。我真想跟他去走一趟。但是同志们百般劝慰我，要我最好留在布拉格等待，要我放宽心，不愁纸片找不回来。杜马同志悄悄对我说：“您尽管放心，他一定会把纸片送来的，要知道这些东西救了他的命哩！他作为德国秘密警察的一分子是上了战犯名单的。”

后来科林斯基领到了一张介绍信，他可以持信搭乘任何一列火车，同时，当有人认出他是原盖世太保监狱看守时，介绍信又可以使他避免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过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他心中有数，获得解放的囚犯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看守，他曾经大力地和无私地帮助过他们。

那个星期真要把人忙坏了。我终于找到了确切知道有个太太保存着尤列克给我的遗嘱的那位男人。他就是编辑温施，但是他不知道那位太太的住址。他必须亲自去打听一下。1945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六，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在信

箱里找到了一张纸条，它的内容是这样的：“那位手里持有尤拉给你遗嘱的太太名叫斯科热波娃，住在布热弗诺夫的乌赫维耶兹迪，纳奥克拉依街八号。她每星期三都要到斯拉夫岛去，我们可以到那边去找她，免得要到白山去。那地方太远了。”

那地方远吗？！若不是已经夜深人静，我真想立即动身到那边去，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手科热波娃太太从床上拉起来。

我把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我不时地看看闹钟，似乎我已经躺了很久很久。可是，时针却刚从午夜一点走到两点的地方。我又捧起闹钟，把它贴近耳边。它发出清晰、满意的嘀嗒声，而把我希望它快走的焦急心情抛在脑后。斯科热波娃太太——她是谁？尤列克的遗嘱怎么会落到她的手里？是谁把它交给她的？尤列克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难道他真的不会回来了吗？许多长期杳无音讯的囚犯在获得解放以后依旧在陆续返抵家园。战后的交通根本就还没有恢复。

现在几点了？刚刚三点。天快亮了。鸟儿开始歌唱。离庞克拉茨监狱不远的地方每天都可以听到乌鸫愉快的叫声。当我们和尤列克一起居住在霍季姆涅日村时，我们常常听到它第一个唱起伏契克（尤列克的叔父）所写的《草帽进行曲》头几句的旋律。我和尤列克常常漫步林中、聆听百鸟争鸣的日子不觉又过去五年了！

我开始打起盹来。我梦见了尤列克。我们一起来到郊外的一个火车站上。他站在前方的铁轨旁边，我站在月台的另一

端。我们无忧无虑地相视而笑。突然我看见在他背后出现了两个党卫军。我大惊失色，冲着尤列克大叫，要他赶快逃命。但是，不管我如何拼命喊叫，就是无法喊出声来。情况危急万分！我向他猛跑过去。然而没等我跑到他的跟前，两个党卫军便对他一阵拳打脚踢，把他带走了。

我从恶梦中惊醒过来，吓得一身冷汗、魂飞天外。此刻，天色已经大亮。我恍然大悟，尤列克已不在人世。我必须到白山去找斯科热波娃太太。当时是五点正。过了不多久我便在一所房子的铁丝网大门边按响了门铃。一位穿戴整洁、和蔼可亲的少妇出来开门。我向她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并说明了取丈夫遗嘱的来意。她领着我走了进去。在卧室里她打开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个长方形铁盒。她又打开那只铁盒，从里面抽出一叠放得十分平整的小纸片递给了我。我摊开这些纸片，迅速用眼睛向它们扫了一下。我立即认出了上面都是尤列克的手迹。我浑身颤抖着，心跳到了嗓子眼。我小心地把这些纸片放进我的手提包里去。

“斯科热波娃太太，这些东西是怎样落到您手里的？”

她告诉我，是她丈夫寄给她的。当尤列克被关在庞克拉茨监狱时，她丈夫也被关在那里当杂役。她丈夫常常把许多囚犯的信寄给她。囚犯的信件是由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荷拉带来的。这些纸片是她丈夫于1943年春托荷拉交给她的。

“您丈夫现在什么地方？”我问斯科热波娃太太。

“1944年被枪决了。”

斯科热波娃太太把这些小纸片放进铁盒子里，藏到地窖里的土豆堆中。敌人是决不会在那里找到它的。她又把她丈夫托荷拉带来尤列克手稿时一同寄来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上面写着：“我亲爱的，备尝艰苦者又何止我们两人？现在我只把其中之一、我的好朋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情况告诉你……”

我把他在庞克拉茨写成的狱中回忆录的一节随函附上，这一节是他敬献给他妻子的，其中还有他的遗嘱。这几张纸片片是极其重要的遗物，读后望妥为保存，切切。”

我告别了女主人，外面是夏日明媚的早晨。在不远的田埂上我坐了下来，又翻阅着尤列克标有记号的小纸片：78，79，80，81，82，83，84。每页的左上角是页码，右上角写有“R”字母^⑤，科林斯基带给我的那些小纸片也有这么一个完全相同的字母。

我开始阅读起小纸片来：

“1943年5月19日。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丝蒂娜送到波兰去。送去服苦役，送到伤寒病的死亡区去。也许她还能活上几个星期，或者两三个月。我的案子据说已移交法院。也许我在庞克拉茨监狱还要被关押四个星期，再过两三个月我的生命也就要结束了。这个报告看来是写不完了……”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啊，我的尤列克！我的尤列克啊！我痛苦万分。我一直无法理解，他已经不在人世，我再也看不见他了。两年多以前他留下的这些手稿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可是我又觉得，当我一回到家时，尤列克一定会在那里

等候着我哩！理智终于战胜了感情。他曾经说：“你应该明白，被法西斯分子拷打、迫害至死的人真是成千上万啊！”尤列克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5年7月初，科林斯基带来了标有页码的尤列克的手稿共158页，在第一页上写着：

《绞刑架下的报告》

—jef—

1943年春写于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

我把斯科热波娃太太交来的七页手稿和科林斯基带来的手稿加在一起，但是发现仍少了一页，缺第91页。我又寻找了很久，然而毫无结果。这期间，《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已交付排印。1945年10月出版的第一版因而缺了一页。第二版的情况也是如此。

1946年春，我在布拉格霍列肖维采区的一次青年集会上就尤列克的英雄事迹作了介绍。会后，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来找我，她对我说：“伏契克同志，我真对不起您！”“为什么？”我惊奇地问。她告诉我说，她是洪波列茨人，1945年春我国解放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到洪波列茨的扎沃茨基夫妇家去作客，据说在纳粹占领时期他们家里藏有伏契克的手稿。当时主人把这些手稿从密室中取出来放在

桌子上，这位小姑娘便拣起几张读了起来。正好她父母亲要她赶快回家。她还有一页没有看完。由于她对上面的内容很感兴趣，因此把剩下的一页夹在一本书里带走了。后来她又把书借给了别人。不久，她想起了那张小纸片，但是，她记不起来把书借给谁了。直到最近，夹有那张小纸片的那本书才还了回来，现在，她才能把它交还给我，因此她觉得很对不起我。

那张小纸片正是我寻找了很久很久、原以为永远也无法找到了的尤列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手稿第91页。此后出版的第三版以及后来的各版才最终得以把缺页补上。

第十一节 历史的见证

科林斯基谈《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怎样写成的

“伏契克先生在很长时期内都不相信我。我在很早以前便给他提供了纸和铅笔。但他首先必须仔细地考察我。有一次他说：‘科林斯基，我们写点东西吧。但它决不能落到别人手里，这完全取决于您了。您知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要上绞刑架的人了。’

我对他说：‘您别怕，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也决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在值班时趁机把纸（每次几小片）和一只铅笔带进他的牢房。我把这些东西藏在草垫子里。检查完每扇牢房门后——牢房门共有三扇，站在小窗口前一间一间地查看牢房最

少需要20分钟——我在关押伏契克先生的267号牢房门口停了下来，轻轻地敲敲门，小声说：‘继续吧！’这时他就知道他可以动手写了。他写东西时，我便在他的牢房周围来回巡逻。当楼下走廊上有人招呼我到下面去时，我就在牢房上敲两下，伏契克先生便立即把东西藏好。他经常是写写停停，一会儿把纸笔和手稿藏到草垫子里，一会儿又把它们拿出来继续写。他只能在我上白班时才能写东西。有时候他写上两小页就满不错了。他会敲敲牢房门，说明他没有情绪再写下去了。有时候，常常在星期天，这天牢房里比较安静（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就一口气写上七小页。此刻他也敲敲牢门，让我给他削削铅笔。有时候，当他心情沉重时，特别是当他得知某一个同志牺牲了时，他也不能写东西。

他一旦搁笔，便马上敲敲门，把写好的小纸片交给我。铅笔也总是一同归还。这些手稿我藏在监狱厕所里连接水箱的水管后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水箱，水箱里的水由此输送到所有的牢房里去。值班时我身上不带任何东西，既没有犯人托我寄给他们亲友的信件，也没有任何其它书面材料。

晚上下班回家，我便把伏契克先生写好的小纸片藏在皮包盖麻布层衬里下面，以防备他们对我的皮包进行检查。我随时准备着把皮包打开，此刻我便把一只手拿住皮包盖，这样他们就无法发现我的夹带。有几次伏契克先生还把他的手稿交给了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荷拉保管。

有一个时期我把部分手稿保存在我的弟媳妇那里。后来我结识了伊日娜·扎沃茨卡，我又把伏契克先生的某些手稿

交给了她。她把那些手稿带到了洪波列茨的父母家中，交由他们代为保管。”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手稿。奇怪的是，为什么尤列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每页右上角都注有一个“R”字母。他是否还打算再写点别的什么东西，或者后来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写？

当我和科林斯基再次相见时，我问起了这件事。他回答说，尤列克的确还留下了另外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在哪儿？”

“在什普林格尔那里。”

我立即与什普林格尔同志通了电话。他手里拿着尤列克的狱中手稿，可为什么只字不提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什普林格尔什么也不知道。他说他已经把他手中所有的手稿都如数交给我了。不错，我已经从他那儿收到了五本尤列克的笔记本，那是他从我们家的书架上抢救出来的。然而，现在说的是狱中手稿！

他什么也想不起来，而我则一再坚持说他还有东西。突然他说：“也许就是科林斯基在纳粹占领时期交给我的那几个信封。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那里面还有尤拉的东西！它们都放在我的兄弟那儿。”

几天以后我终于又得到了尤列克在盖世太保监狱中秘密书写的另外八页手稿，每页的右上角都标有一个“L”字母。^{①⑥}

在第一页手稿上还写着弗·克·沙尔达一首诗歌的片断：

我的果实是晚熟的品种，
经过阴霾的洗涤会更加甜美芬芳，
当浓雾从忧伤的草原和阴森的湖面上升起，
当初冬的白雪飘落在山岗。

其余三页手稿是一封“给古斯蒂娜”的信。尤列克写道：

“我亲爱的！

要想再有那么一天，我们俩又象小孩子一样手挽着手到那风和日丽的临河斜坡上去追逐嬉戏，这样的希望实在是太小了。要想再有那么一天，我还能安安静静地、舒舒服服地、在书籍的友爱的怀抱里去写下我们一起谈论过的、二十五年来积压在我的心头而且成熟了的一切，这样的希望实在也太小了。当他们破坏了我的藏书以后，他们也就把我生命的一部分埋葬了。但是我不会屈膝投降，我不会让我生命的另一部分也这样不留痕迹地在267号白色牢笼里无声无息地死去。因此，我利用从死神手里偷得来的一点儿时间写下了这些捷克文学札记。请你永远也不要忘记把这些札记交给你的那个人吧，是他没有让我默默无闻地死去。他给我送来的铅笔和纸张如同初恋那样激动着我的心，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可以意会而无法言传的。当然，手头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要进行写作也许是不可能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所能清楚地看见和

直接接触到的某些东西对于我的读者来说却是不明确的和不现实的。因此，我首先给你，我亲爱的，给我的助手和第一个读者写信，因为你最能理解我的心思，同时，你还可以和拉扎（即拉季斯拉夫·什托尔——作者注）以及我那位白发苍苍的出版家（即吉尔加尔——作者注）一起作必要的补充。心和脑子都装得满满的，但是牢房里却空空如也。你既要写文学评论，但是你却连一本哪怕只能瞟上一眼的参考书也没有——这岂非咄咄怪事！

命运的安排是多么的荒诞不经。你知道我是多么热爱旷野、太阳和清风，我多么希望能成为生活在它们之中的宇宙万物的一分子：我要变成一只小鸟或者一簇灌木，一片白云或者一个流浪汉。长期以来，命运的安排使我象树根一样一直生活在地下。这些树根是丑陋的、发黄的，它们被黑暗和腐烂物包围着，然而它们却使生命之树昂首挺立。任何风暴也无法把根深蒂固的生命树吹倒。这就是树根值得骄傲的地方。这也是我的骄傲之所在。我并不后悔变成了树根，我对一切都决不后悔。我已经做了、而且我是愉快地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但是，我热爱光明，我多么希望也能破土而出、直指青天，我多么想也能开花，也能结出可供人食用的果实来呀。

嗯，有什么法子呢！

在由我们支撑的、并且支撑下来的树上，一代一代的新人将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他们是一代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诗人，也有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在将来他们会更加出色地去评论我所不能评论的一切。那时，我的果实也

许才能变得更加香甜和丰硕，虽然连白雪也不会飘落在我的坟头上了。

1943年3月28日于267号牢房。”

在其余四页手稿上尤列克写道：

论捷克文学的性质问题

五年来这个题目一直在追逐和吸引着我。我曾回避过它，不久重又挑选了它并着手收集资料，后来我又躲开了它。我有点儿害怕。我觉得它过于迷人，过于类似有关民族史的意义问题、民族特征问题的专论文章，如同那些论文集的名称一样，它显得过分华丽，但因而也显得十分幼稚可笑。现在，尽管缺乏资料，我也要凭借自己的一些记忆来谈谈这样的命题了。

能不能说捷克文学具有某种统一的性质呢？

难道果真存在着某种统一的民族性吗？正是在这一点上，所有关于民族特征的专论文章都碰得头破血流，因而显得幼稚可笑。因为一个被分裂成利益完全相互抵触的几个阶级的民族，它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民族性。说明这一论点的例证俯拾即是。我国全部历史上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1938年以及后来我们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

你认为什么是捷克民族的特征：是捷克人民用以推翻了投降政府的那种激情甚至称之为狂热呢，还是捷克统治阶级用以策划和实行投降政策的那种冷漠态度？是占领军席卷全

国时捷克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具有远见卓识的英雄胆略呢，还是油滑的捷克商人那种可怜的、盲目的自鸣得意（他们拍着大腿沾沾自喜地说，现在他们终于能生财有道了）呢？

据说我们总是在东西方之间犹豫不决地摆来摆去——马哈尔曾经发现了捷克民族性中的这一主要特征。这些年来可以看出，这样的摇摆不定确实存在。这里丝毫没有犹豫不决，相反，它具有极大的坚定性和必然性。捷克资产阶级分子把肉体 and 灵魂象押宝一样押向西方，而捷克人民却是心向东方。这不是因为那边是西方、这边是东方，不是因为那边是欧洲、这边是亚洲，不是因为那边有日耳曼人或者罗马人、这边有斯拉夫人，而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机器还勉强地转动着，但是在东方人民已经自己起来，按照自己的方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如果有朝一日社会主义在西方——在法国、英国或者德国——取得了胜利，而俄国成了资本主义的最后希望，那么，尽管磁针所指示的方位没有变化，捷克人民和捷克资产阶级的意愿必然又会被吸引到相反的方向上去。

阶级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相一致，那么另一个阶级的利益便会和它水火不能相容。因此我们不能谈什么民族性问题，也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性格，因为各个大集体的性格也不是根据某种浪漫主义的标准创造出来的，而正是在利益冲突之中锤炼出来的。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能谈什么一个民族在政治和精神方面所有表现形式的统一的性格问题。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能谈什么每个民族的文学的统一性问题。

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才不揣冒昧地提出捷克文学的性质问题。

我也找到了原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荷拉，他从1943年的2月起至同年12月止在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里共服役十个月。他因援助过囚犯而被捕，并被送进毛特豪森集中营，后来又转到古森集中营里。

荷拉谈《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怎样写成的

“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我和科林斯基在同一层楼里值勤，因此我们常常相互帮助、协同工作。其他一些党卫军分子很快便怀疑我们两人的这种友谊。他们之中有人向监狱长索帕告发了我们，要他注意我们两人的行动。1943年4月初，索帕本人亲眼看见我们呆在一起。他把科林斯基叫到警卫室，用德语申斥了他一顿。后来他也把我叫了去，也是用德语冲着我大叫大嚷，但是我不会德语，听不懂他说的话。结果还是我想我的，他也无法知道我在想些什么。那次事件以后，科林斯基被调到上一层楼即三层楼去值班。不过这对我们并无关紧要。

和索帕的这场风波发生后，科林斯基对我说，关押在二楼的伏契克先生要写东西，让我把纸和铅笔送到他的牢房里，并且要给他放哨，以免被人发现。当时（1943年4月）

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庞克拉茨监狱中有许多人都希望写一些关于个人案件的材料，写点诗歌或其它什么。科林斯基告诉我，伏契克写的东西是作家和记者才写得出来的重要资料。伏契克已和科林斯基商定，写出来的手稿由科林斯基收藏，待解放后再交给有关的人。后来，当我和伏契克商议此事时，他高兴极了。他梦寐以求的两个奇妙的词汇“铅笔”和“纸”终于变成了现实。

后来的一切飞也似地过去了。我带给他一支铅笔（那不过是一根小铅笔头，有时只是一小节铅笔芯），一些发给犯人使用的、纸厂切下的纸边。我特意挑选了最大块的纸片送给伏契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让伏契克在写东西时被别人发现。科林斯基调离以后，与我一起值勤的是其他一些党卫军分子，多半是哈瑙埃尔。我很快发现，我能够看住他，如果情况危急，我也能及时地通知伏契克。为了能更隐蔽地在牢房里进行写作活动，伏契克把一条床单当作台布铺在桌子上。他背对牢门坐在桌旁，掀起床单的一角，把纸放在光桌面上写东西。如果某个党卫军分子突然闯了进来，伏契克便立刻用床单把桌子上的手稿盖好。佩舍克老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牢房门边，警惕地听着牢房外面的动静。我用钥匙敲一下门——就是说：伏契克可以开始写；如果我敲两下，那就是叫他停止写的危险信号，此刻或者我必须离开，或者是有党卫军分子正往这边走来。当伏契克写完一页（至多两页）时，我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们取出来，不能让它们留在牢房里，否则太冒险！然后我再把

它们藏到位于走廊尽头、用于存放刷洗用具的厕所里去，这样我就不必把它们带在身上。当伏契克书写完毕，他同时也把铅笔交还给我。对我们三人来说，这是最最美好的时刻，因为这一天我们又顺利地过来了。我们大家都松了口气。佩舍克老爹常常是噙着眼泪听尤拉把自己写好的东西念给他听。接着他们又计算着什么时候该我值班，什么时候伏契克又可以继续写下去。

有时候我在监狱里就把伏契克的手稿交给了科林斯基。但为了不致引起外人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早晨下班时把它们带出门房，然后在街上或者在有轨电车里再把它们交给科林斯基，如果我和他同路的话。科林斯基后来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不知道，同时我也不想知道。

尤拉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当他已经得到了铅笔和纸张时，他又会说，作为作家的一种莫大享受，他又热切地盼望着能再得到即使是很小的一段香烟，因为它可以唤起作家的灵感。据说吸上几口你便能文思敏捷、妙语泉涌。当然，

‘在狱中写作，而且还要叼着香烟进行写作’这不过是一种梦想，伏契克决不会如此不切实际地胡思乱想。我还记得，他谈论起香烟来时的那种兴致勃勃的神情，我这个从不吸烟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有一次，当他又那样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香烟时，我偷偷地（他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塞给他两支香烟，两根火柴和一小块火柴盒的磷面，他坐到桌子旁边，贪婪地吸起烟来。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为了驱散牢房中的烟雾，佩舍克老爹用毛巾扇着风，让烟能慢慢地从牢房

里的小窗散掉。

在狱中进行写作要承担多么大的风险，写作的环境又是何等的险恶，这一切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有一次几乎就要闯下大祸。党卫军分子哈瑙埃尔从一楼跑上来，直奔二楼关押伏契克的牢房。我已经来不及给伏契克报警。我只看见，哈瑙埃尔在伏契克的牢房门前停了下来，迅速地把钥匙插入锁孔，打开牢门，但接着用德语骂了几句，旋即把牢门关上，走到隔壁关押着一个新犯人的牢房那里，把新犯人叫去审讯了。我跑步来到伏契克的牢房门口，只看见哈瑙埃尔正在关门、上锁，佩舍克老爹脸色苍白地站在门边，伏契克站在他背后，脸色也十分难看，我自己当时吓得浑身冰凉。

1943年5月，伏契克突然被叫到佩切克宫去受审。警官通知他说，他的案子已移交法院审理。他被地方法庭传讯了好几次。这种情况说明，尤拉不久就要离开庞克拉茨监狱，被押解到德国的法庭去了。有鉴于此，伏契克必须把他的狱中作品大大缩短，以免他的突然离去会使我们措手不及，而他的作品也会成为未竟之作。果然，六月中（确切的日期我已记不清了）突然接到了决定：尤拉在第二天早上将被押往别的监狱。那天正好是我值班。当时他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取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说，几小时后他便要上路了。最后一夜的情景经久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和佩舍克老爹根本就没有睡觉。凌晨三时，叫醒被押解到别处去的犯人的闹钟响了。穿衣和告别的时间是极其短促的。尤拉迅速起床，他分到了一小块上路的面包，此刻从一楼传来了德语的喊叫

声：‘犯人集合！’在打开牢房门时，我故意留出一点儿时间让尤拉和佩舍克老爹拥抱告别，接着我把灯关掉，迅速溜了进去，最后一次握了握他的手，最后一次拥抱了他，相互吻别，也许只说了两个字：他叫了我一声‘雅尔达！’，我叫了他一声‘尤拉！’

以后，他快步走下楼梯，面壁站好，等着叫到他的名字，然后用德语回答一声‘到！’，迅速排好队，等待着最后一次点名。然后是德语口令‘跑步走！’我两眼望着下面。当囚犯开始跑步走时，尤拉最后一次偷偷地往上瞧了一眼。一会儿后大门关上了。这就是伏契克最后告别庞克拉茨监狱时的情形。”



1943年5月21日布拉格纳粹人民法院侦查员签发了对尤列克的逮捕证。那是一张红色的逮捕证，上面用德文写着：

“尤利乌斯·伏契克，编辑，1903年2月23日生于布拉格，已婚，不信教，最后住址为：布拉格十九区，列特茨卡大街11号，目前受保护性拘留，保护国公民，现准予将其逮捕法办。

被告尤利乌斯·伏契克，身为保护国公民，于1941年至1942年长期与其同伙一起策划旨在以武力分裂帝国部分领土的叛国阴谋；

该犯的罪恶阴谋还在于维护奸党组织上的团结，并妄图书写和发表具有叛逆内容的文集以蛊惑群众。

——上述罪行违犯国家法令第80条第1款第83项，第2款和第3款第1项甲、第3项、第47项以及第73项的规定。

他是犯有刑事罪的严重嫌疑犯。

鉴于上述罪行应予提起公诉，根据法律可以认为，伏契克为在逃嫌疑犯。

对此逮捕证有权提出申诉。

政府法院顾问 克尔龙格”

同一天，法院侦查员克尔龙格通知尤列克，他已经签发了对他的逮捕证，并允许他给两位妹妹写信。1943年5月21日，尤列克写道：

“亲爱的莉巴和薇拉！谢谢你们美好的来信，它使我十分高兴。现在我也告诉你们一个愉快的消息：请你们来看我吧，不过地址已有变动，届时请到佩切克宫对面的布雷道埃尔斯特拉斯大街21号3楼，找der Ermittlungsrichter des Volksgerichtshofs（德文，意为人民法院侦查员——作者注）即可。

请于1943年5月29日星期六上午来，越早越好（最好在9点至12点之间）。

衷心地问候你们，拥抱和亲吻你们，再见！

你们的尤拉。”

5月22日，即尤列克被移交给纳粹法院侦查员后的第二天，他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正值捷克警察荷拉值勤——又继续写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案子已经了结并签了字。我在法院侦查员那儿的事昨天已经结束。一切都进行得比我所预料的要更快些。他们似乎在抓紧办理。同我一起被起诉的还有莉达·普拉哈和米雷克。米雷克对敌人的卑躬屈膝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在侦查员那里是那样的严厉而冷酷，以致使人见了就要寒心。在盖世太保那里还可以感觉到一些生活气息，虽然是可怕的，但毕竟还算是生活。那里有热情，一边是战士们热情，另一边是猎人、掠夺者、或者简直就是强盗的狂热。另一边的人中某些人甚至还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而在这里，在侦查员处，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衙门。外衣翻领上的那个大卐字章表明佩带者内心不存在的那种信仰。它不过是一种盾牌，在它后面躲着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他总得苟且偷安地熬过这个时代。他对被告既不好也不坏。他脸上既无笑意也无愁容。他只是在例行公事。他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一种稀薄的液体。

他们写好了报告，签了字，分条列目整理停当。其中罗织了我的六大罪状：阴谋颠覆德意志帝国、准备武装暴动以及莫名其妙的其它种种罪状。其实只要有其中随便哪一条就足够了。

十三个月来，我在这里为其他同志和我自己的生命进行着斗争。我既大胆又狡黠。他们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们的惩办条款之中。我想我也是精于此道的。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除了狡黠之外，手里还握着刀把子。

这次较量算结束了。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再过两三个

星期起诉书就可以炮制出来，然后启程到帝国去听候审讯和判决，最后还有一百天等着处死。前景就是这样。因此我大约还可以活四个月或许是五个月。其间可能有很多变化。一切都可能改变。可能的。在监狱里我无法作出判断。但是，监狱外面情况的急速变化也可以加快我们的死亡。因此结果还是一样。

这是希望和战争的竞赛。死和死在比赛。这要看谁先死：是法西斯死得快呢还是我死得快？这仅仅是我的问题吗？不，千千万万个囚犯，几百万士兵，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亿万人民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些。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给全世界带来的恐怖致命地威胁着每一个人。那些幸存者将会这样回答：我从法西斯时代活过来了。但是在他们说出这样的话之前，几十万人——而且是多么优秀的人才啊！——却正在倒下去。

决定性的时刻只有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才显得特别的残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一粒子弹射入胸膛，这该是多么伤心的事啊！但是总得有人去当这最后的一名士兵。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名士兵就是我的话，我将心甘情愿地立即死去。”

1943年5月27日，柏林帝国首席检察官要求布拉格德国地方法院的国家首席检察官把被告尤列克的刑事案审讯记录

全部呈送给他。

1943年5月29日，尤列克的两个妹妹前去探监。解放后她们向我介绍了那次探监的情况：

当莉巴收到尤列克的来信，看到信上写着的德文字Er-mittlungsrichter des Volksgerichtshofs时，她不懂是什么意思，因为她根本就不会德语。她去问正在学校里学习德文的小女儿。小女儿的德语水平如何，可以从下面她的翻译中清楚地看出来。她说：尤列克将在林业局(Volksgerichtshof)里当翻译(Ermittlungsrichter)了。莉巴听了非常高兴。她立即去找妹妹薇拉。“嘿，尤尔恰到林业局去上班了，这可好了，他到底脱离了佩切克宫那个鬼地方。”薇拉觉得这不可能，但她没吭一声，她现在不愿使姐姐再担惊受怕了。

她们俩准备着去布拉格看望哥哥。她们搞来了食物，弄到了当时非常不好买的炸肉排（当时肉是凭证供应），还包了些巧克力（当时是长期缺货）和生菜。她们带着这些东西去布拉格看望尤列克。

她们在布雷道夫斯卡街找到了21号门牌。她们走进楼去。莉巴还一直在想，她们现在来到了林业局。但是，当警察把尤列克带出来，让他站在桌子后面，以便把他和两位妹妹分隔开来时，当侦查员禁止他们握手问候时，莉巴才吓呆了。她极力忍住眼泪。但是尤列克却在向她们两人微笑。这使她们振作起来。她们迅速打开食品包，迅速拆开香烟，把它们全摊在桌上。尤列克看着这些东西，突然半开玩笑似地

说了一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不过给我太可惜了。”莉巴哭了起来。她感觉到了这些话里包藏着某种可怕的东西，但是，当时她还无法把握它们的全部含义。她有这样的预感，她又竭尽全力要把这些可憎而又可怕的念头赶跑。

尤列克隔着桌子看着正在哭泣的妹妹，然后——尽管在警察和侦查员的监视之下——坚定地说：“莉巴，别哭了！现在是战争，亿万人并不希望战争，但他们正在战场上倒下去。我也不希望战争，然而我也要死去。人类的生活如同蚁穴。你可以踩死其中的一只蚂蚁或者一百只蚂蚁，但是它们的事业你是无法摧毁的。”

尤列克本人就是人类蚁穴中千千万万正在倒下去的人们中的一个，但他们的事业却是无法摧毁的。这正是他临别时要说的话。

纳粹法官宣布探监结束。尤列克托两位妹妹问候妈妈和爸爸。现在法官允许他和两位妹妹告别。在法西斯分子们的监视之下，尤列克拥抱和亲吻了每一个妹妹——千里迢迢来此探监，然而道别却是如此的短促！警察很快就把尤列克带走了。两位妹妹如同在梦中一般从三楼走了下来，通过走廊，来到街上。在大楼前她们停住了脚步。她们希望能再看一眼哥哥。果然，一会儿后警察带着尤列克也从大门中走了出来。他从她们的身旁走过去，朝她们微笑了一下，妹妹们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看着他手提网袋，里面放着临别时她们俩匆忙塞进去的食品，绿油油的生菜叶子从网袋中露了出来；现在尤列克正拿着这些东西横过马路，如同刚刚采买回

来一般。走在马路中间的尤列克猛地一回身，向两位妹妹跑了过来。警察紧追不放。尤列克刚握了一下薇拉的手、向她说了一声“薇拉，再见了！”，警察便把他从她身边拉开，押着他朝对面的盖世太保司令部所在地佩切克宫走去。

1943年6月9日，尤列克秘密地在庞克拉茨监狱里用下面的话来结束《绞刑架下的报告》：

“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副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是要把我押解到别处去的标志。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送往帝国法庭去听候审判了……如此等等。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庞克拉茨监狱中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又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又将怎样度过呢？……”

6月10日清晨，盖世太保把尤列克押解出布拉格，经过德累斯顿，再把他送到鲍岑的拘留所中。当天下午他们抵达德累斯顿。

比尔森的迈内尔同志叙述了当天的押送情况：

“在德累斯顿中转监狱里关押着约二十名囚犯。6月10日下午3时左右他们又押来了六名男犯。其中一名与众不同，他留着黑胡子，而其余的人脸部全刮得精光。这位蓄黑胡子的人站在牢房中央，在他那漂亮的面庞上浮现出了欢笑，他大声地问道：‘这里谁是捷克人？’我应声说是。

‘你是哪儿人？’他问我。‘我是比尔森人。’‘我也是比尔森人，但我不认识你，’他对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我是伏契克。’他自我介绍说。这样我们就相识

了。我们如同回到了老家比尔森，我们互相谈论着这个城市。尤列克一边说着话，一边把大衣脱掉，坐在长板凳上。他随身带来了一些食物。当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们得知尤列克要被押往别处时，就把他们所有好吃的东西都送给了他。他的裤兜和衣服口袋里全装满了食物。他现在又把这些食物全都从口袋中拿出来，分发给同牢房的难友们。”

他们让尤列克在德累斯顿监狱里过了一夜，6月11日清晨把他押解到了鲍岑莱辛街7号。拘留所办公室的犯人登记簿上注明：尤列克是在上午8时10分到达的，登记号码是203/43。

1943年6月11日，布拉格的捷克国家代表机构给布拉格德国地方法院的检察院转去了由列萨克博士签署的对尤列克刑事审判的档案（摘要），上面写着：

“1、布拉格州刑事法庭于1931年4月2日（审讯记录编号为Tk I 1987/30）根据1923年3月19日所通过的第50号法令中的第15条，判处该犯4个月监禁并罚款1,000克朗。

2、姆拉达·博列斯拉夫州刑事法庭于1932年3月29日（审讯记录编号为Tk 487/31）根据1923年3月19日所通过的第50号法令中的第15条，判处该犯14天监禁。

3、布拉格州刑事法庭于1932年4月13日（审讯记录编号为Tk IV 689/32）根据新闻法第11条，判处该犯罚款100克朗或者监禁两天。

4、布拉格州刑事法庭于1931年10月23日（审讯记录编号为Tk X 763/31）根据1923年3月19日所通过的法令中的

第3条、第15条、第18条第1款判处该犯四个月监禁和罚款1000克朗。”

多么荒唐可笑！德国纳粹法庭竟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的司法机关提供有关尤列克为捍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触犯了”法令的政治罪审判档案摘要！更有甚者，在1938年的大赦中上述全部处分都已获准撤销。但是，在所谓的保护国时期，布拉格的捷克国家代表机构对这一切却置若罔闻，竟把审判档案奉献给了法西斯法庭，该法庭在起诉书中就利用这些材料当“炮弹”，妄图证明尤列克已多次触犯了法律。

到达鲍岑拘留所的第三天，尤列克获准给家里写信。1943年6月14日他写道：

“亲爱的妈妈、爸爸、莉巴、薇拉和所有的人们！

正象你们所知道的，我的住址已有变动，我来到了鲍岑拘留所。走出车站以后，沿途的印象是：这里是一座恬静、整洁而且令人愉快的城市——它的监狱也是这样（当然，如果监狱也能使囚徒感到愉快的话）。犯人的待遇很好，伙食也不坏，工作是生产纽扣——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佩切克宫喧嚣后那种寂静这里似乎多了一些，因为我们大家都住单间。但是干起活来时间便过得飞快，我还可以借阅图书——如同你们从附寄的监狱规则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也可以阅读某些杂志，因此我不能再抱怨说寂寞无聊了。况且，寂寞无聊往往是庸人自扰。比如有这样一些人，即使在别人生活得很好的地方，他们也感到寂寞无聊。而我总是觉得，任何地方的生活都充满着乐趣，即使在铁窗下面生活也是如此。

处处都能学到东西，处处都可以找到对未来有益的东西，当然要是你还有未来的话。

我是带着秘而不宣的希望离开布拉格的：但愿古斯蒂娜能平安出狱。负责我的案件的警官曾再次向我保证，他一定会释放她。我希望他的这些话不仅仅是我出发前对我的‘安慰’而已，也许她正在和你们一起阅读我的这一封信了。假如她没有回来，请你们设法去看看她，并替我拥抱她。她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她应该享受最大的幸福。你们千万别丢下她不管，请帮助她去得到幸福吧，假如万一我已经无能为力的话。

快来信告诉我你们那儿的新情况。请遵守附寄的监狱规则，即不要寄包裹，至多可寄点钱来，寄交上开地址（我收即可）。我再一次请你们相信，我生活得非常之好，你们尽可以放心。

现在，我衷心地问候你们大家，我亲吻和拥抱你们，希望能够见面！

你们的尤拉。”

尤列克完全了解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写信时总是安慰双亲和两个妹妹，不愿给他们增添任何忧愁和烦恼。尽管如此，莉巴却认为，必须利用一切途径去挽救他的生命。

她一接到信后便立即写了回信。但是信被退了回来。因此，1943年7月7日她又给鲍岑拘留所的尤列克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我热爱的尤尔恰！”

你一定会认为我们很少想到你，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给你写信。你如果这样想，那可就冤枉我了。我曾立即给你写了回信，但因为里面夹了钱，邮局不准邮寄，所以连信带钱全都退了回来。你一定很着急，这叫我十分不安。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大家都非常健康，两位老人也非常快活，他们的草地已经收割完毕，其余的活茬就不多了。树叶全没有了，只剩下几棵草莓，青菜大部分被虫子吃了。这都是旱灾的结果，尽管雨后情况大有好转，但终究是今非昔比了。上星期二我给古斯蒂娜写了信，目前尚未得到回信。她还是从前那样，喜欢看信而不喜欢动笔。我们经常定期地寄包裹给她。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我却不能把包裹也给你寄去，哪怕能寄些麦乳精也好。现在我将耐心地等待，说不定今后他们也会允许对你这样做的。此外，你的来信使我们十分放心和高兴。我没有把你迁往别处的消息告诉两位老人，我不愿去惊动他们，我要力争使他们尽可能愉快地度过晚年。你知道，他们时刻在惦念着你。不过惦念跟惦念也不一样。他们心气平和，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我也从不和他们争辩，我什么也不说。告诉你，尤尔卡，我已经给你请到了律师，虽然霍尔斯特·佩尔克曼博士和卡尔·霍夫曼博士还在柏林，过几天他们会前来要求你就授权问题签字的。尤列切克，我为此可伤透了脑筋。请你相信，我决不会去做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只希望能设法减轻你生活中的痛苦。我请求你，为了让我们大家放心，你就签字吧！你也许会认为这是

屈服的表现而犹豫不决。但是我请你别这么想。相信我吧！信仰可以移山。我问你，我这样想念你、这样跟你说话，你是否感到难受？每天晚上10点至11点时，我都跪在阳台上，向两颗星星倾诉我的衷肠。一颗星星是你，另一颗是古斯蒂娜。我现在又有了第三颗星，我称它为‘上帝的眼睛’。我嘱托它给你捎去问候和亲吻。在漆黑的夜晚，当阴云密布、星光隐去时，我耐心地期待着，希望至少那‘上帝的眼睛’能看我一眼。我相信它每天都是这样。尽管我看不见它，但我的心却感觉到了它。当这种感觉变得十分明朗之后，我才回去睡觉。我感到欣慰的是，你还可以读书和工作。你将想象不到，我会多么地珍爱每一颗纽扣啊！我要好好地看看它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能送我一颗的话那该多好啊！你能寄给我吗？衬衣还能穿吗？我是否可以要求给你寄些必需品去？殷切地盼望着你的下一封信，希望它能写得长些。

学校一放假，我便立即去布拉格看望古斯蒂娜，我多么希望能早日见到她啊！我们天天盼，夜夜盼，盼她回来，然而就是不见她的踪影。我真想马上去把她领回家来！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常常寄些包裹给她。现在，她每周都能得到麦乳精，这东西还不错，是吗？我还给她寄过带罂粟子的蛋糕，她可喜欢吃了，但愿我也能给你寄去。今天我正等妈妈从霍季姆涅日村来这里检查身体。象她那般结实的老人，今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了。但愿如此。她现在胃口极好，喝羊奶，干活劲头可足了，整天忙个不停。爸爸还是老样子，有时不用拐杖也能走上较长的一段路了。他已经到林子里去转了

转。现在他们呆在霍季姆涅日村心里很难过。你知道，从前我们大家都在那儿欢聚、多么热闹，而现在只剩下他们俩了。放假后我将把汉妮奇卡送到那边去，对两位老人来说她可太顶用了，她现在已长大成为一个好管家了，她能很好地照料我们家的所有家畜，从耶里克起到莉津卡止。提起莉津卡，真可以写上一本童话，它太机灵了。东拉西扯写了一大堆，够你看上一阵子的。我亲爱的哥哥，现在就此搁笔。

也许你也会写一封很长很长的回信来。我向你转达咱们全家对你的最美好的问候，我们大家祝你身体健康、心情平静。我亲爱的尤尔卡，千百次地吻你，心中拥抱你，永远想念着你！

你的莉布舍^①。”

小妹妹薇拉在信中附加了如下一段内容：

“亲爱的尤列克：

莉巴已经给你写了许多，所以我再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告诉你了。你知道，我象咱们爸爸那样从来不是一个读书人。看起来我这个人谈吐粗俗、不易接近，但是我心里却隐藏着十分丰富的感情，只不过我不善于向别人表达罢了。正因为这样，当我们前去探望你时，你也许会觉得我不象莉巴那样喜欢你。但是，亲爱的哥哥，也许没有一个人会象我那样焦急地盼望着你的归来。虽然，你一定知道，我从来没有做过礼拜，但是为了你，我却朝朝暮暮祈求上帝保佑你。尤列切克，我是多么想念你！当我独自一人时，我把最美好的称呼献给你。同时我坚信你一定会回来。你必须坚忍不拔，也

必须象我们大家一样坚定自己的信念。再见了，我亲爱的，祝你勇敢坚强！我在心中偷偷地亲吻你，如同你用湿润的嘴唇给我亲吻那样。

你的薇拉。”

1943年7月11日，尤列克又获准给家里写信：

“我亲爱的人们！

时间过得飞快。自上次我从这儿给你们写信至今，似乎只过了几天光景，但是在我的桌子上又摆好了钢笔和墨水……一个月又过去了！整整的一个月！你们也许会认为，监狱里的时间是多么漫长——不，不是的。也许，正是因为这里的人在数着钟点过日子，因此这里能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多么短促，一天、一个星期、整个一生都是多么短促。

我独自一人住一间牢房，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在这儿有好几个好朋友：书，我做扣子用的纽扣机，口小肚大、盛水用的坛子（人们常常拿它开玩笑，它使人想起宁愿喝酒而不愿喝水的酒鬼），以及下面墙角里的一只小蜘蛛。跟这些好朋友你可以尽情地谈天说地、回忆往事和歌唱，这真是叫人无法相信！连那台纽扣机说起话来也娓娓动听，它也能随着我心情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彼此太了解了。当我有时忘了擦它，它就会发脾气，就会嘟囔个不停，直到我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为止。

此外，我在这儿还有许多朋友。不是在牢房里，而是在我每天去放风的院子里。那个院子不大，它和种着参天古树

的大花园只有一墙之隔。在小院子的草地上长满了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花草，在这么小的一块草地上看到这么多的花草，我还是第一次。它看上去有时象山谷里的一片草地，有时又象一块林中空地，到处是三色堇，象美丽的洋娃娃似的雏菊，象牧鹅少年似的凤铃草和春白菊，以及各种蕨类植物，真使你赏心悦目、流连忘返。跟它们同样有说不完的话哩！——这样，又过了一天、一个星期，啊，一个月又过去了。

是的，一个月又过去了，但是没有得到你们的任何消息。要不是几天前我收到了莉巴寄来的十个帝国马克，我甚至不会相信，你们已经接到了我的信，你们已经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到目前为止，你们的信我一封也没有收到。也许是在路上遗失了。给我写信吧，写吧，你们可以每月写信谈谈：你们情况怎样，生活过得怎样，古丝蒂娜的情况又怎么样。你们如若方便，请给我寄个包裹来，请寄：睡衣一身（就那套红色的），衬衫一件，毛巾一条，肥皂一块。不要寄食物。没有必要，也不允许这样做。就此搁笔。亲吻和拥抱你们大家，再见！你们的尤拉。”

尤列克和两位妹妹的每一封信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尤列克在信中不得谈论政治或者涉及案件的情况，莉巴和薇拉在信里只能谈些日常琐事。

1943年7月20日莉巴又给鲍岑监狱中的尤列克写去了一封信：

“亲爱的尤尔卡！

今年7月17日收到了你的第二封信，它使我们无限欣慰。主要的是知道你身体健康、心情很好。

7月7日我给你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最近几天想必你便能收到。因为我是用捷语写的，所以它会耽搁一些时候。今天莉布什卡把我的这封信译成了德文，因此，我想，它会早些到达你的手中。你必须知道，我们大家的身体都好，我们时刻都在想念着你。

直到7月17日为止，古丝婷卡一直呆在布拉格，现在她已到了特雷津。正好在昨天她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叫我给她寄些零用杂物，面油和头巾也要。由此可知，她可能常在烈日下干活，说不定是在菜园子里或者在地里劳动。古丝塔喜爱这种工作，她熟悉它和喜欢它。我可以每星期寄食物，份量也可以多些。这使我感到宽慰。古丝塔日夜为你担心，想念着你的生活情况，你是否给我们写信。我真高兴，我现在可以用你刚刚寄来的信去安慰她了。

尤列切克，我只求你一件事：假若柏林的律师要求你授与全权的话，请你千万不要在签字上犹豫了。请想一想我们的妈妈吧，她还以为你正在办公室里写东西哩！请想一想我们吧，我们大家只希望你好。你也许无法知道，我多么想念你，我常常在心里向你诉说衷情。

我还要告诉你，虽然我们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很久，但我从来还没发现过蜘蛛。可是你想，当我在星期六收到你的来信，连忙跑到隔壁去告诉薇尔卡时，我却看见一只美丽的小

蜘蛛从钢琴上落了下来。起初，我以为是由于泪眼昏花而看见了幽灵，可是大家都看到了它。你一定能想象得到，我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我知道，在你那里也有一只这样的蜘蛛，而现在我的这只蜘蛛正吊在钢琴上，吊在这个充满美妙乐音的乐器上。

你知道，从你的来信中我能清楚地想象得到你的生活情况。你那个小院子不正是你的花园吗？

这里的天气好极了，我们常在园子里干活，星期日我们将带汉娜到霍季姆涅日村去住上一个星期，能暂时让两位老人高兴高兴也好。

莉布舍将留在商店里，那里的工作非常需要她。

爸爸和妈妈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我真为他们高兴。妈妈又象从前那样在修整小路，爸爸则在修理大大小小的锁，他埋怨说又没有烟抽了。

耶里克再也不追鸡了，因为我们这里一只鸡也没有了。

我们这里生活依旧。就此搁笔。吻你，尤列切克，盼望着你的回信，愿我们能早日见面！

所需衣物明早寄出。 莉布舍。”

1943年7月28日，柏林人民法院帝国总检察院的首席检察官内贝尔完成了起诉书的起草工作。起诉书说：

“1、被告尤利乌斯·伏契克，职业：编辑，住址：布拉格十九区，列特茨卡大街11号，已婚，保护国公民，1931年至1932年间曾多次被判处徒刑，1942年4月24日受拘

禁，自1943年5月21日起，根据布拉格人民法庭侦查员于同日所签发的逮捕证——编号为556b1007/43——在押，现被关押在鲍岑拘留所；受聘辩护律师卡尔·霍夫曼和霍尔斯特·佩尔克曼已获批准。

2、被告雅罗斯拉夫·克列仓，职业：经济干事，住址：布拉格十三区，荷兰大街10号，1914年3月2日生于后兹博罗维采，未婚，保护国公民，1934年至1935年间曾多次被判处徒刑，1942年4月24日受拘禁，自1943年5月19日起，根据布拉格人民法院侦查员于同日所签发的逮捕证——编号为556b 1008/43——在押，现被关押在鲍岑拘留所，无辩护人。

3、被告莉德米拉·普拉哈，职业：职员，住址：布拉格十三区，荷兰大街10号，1921年2月24日出生于姆涅斯特茨·克拉洛维，未婚，保护国公民，到目前为止从未触犯刑法，1942年5月22日受拘禁，自1943年5月20日起，根据布拉格人民法院侦查员于同日签发的逮捕证——编号为556b 1009/43——在押，现被关押在德累斯顿乔治·贝尔大街24号的拘留所里，无辩护人。”

首席检察官控告说：

“1、被告伏契克和克列仓为共党显要干部，自1941年起至他们于布拉格被拘禁时为止，两人曾密谋策划建立非法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委员会，妄图在组织上和宣传上为叛国、投靠帝国敌人作准备。

此外，伏契克还非法私藏枪支。

2、被告普拉哈

在同一时期内为被告伏契克所进行的叛国和敌对活动效劳，这些活动她是清楚的——因此，“根据国家法令第80条第1款，第83条第2和第3款第1和第3项，第91条乙，第47条、49条和73条，根据1940年5月6日所通过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帝国保护国关于武器管制办法的命令第1条”，上述三名被告均犯有罪行。

可见，那时尤列克一直被关押在鲍岑监狱，我则被关押在特雷津小小的要塞里，我当时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1943年8月8日，尤列克又获准给家里写信。他写道：

“Moji mili（我亲爱的）！”

其实我应该写成moje milé（我亲爱的）^⑧，因为在你们那里你们全都是女性。那么，moje milé，我生活如常，光阴飞快地过去，我正如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心情平静’。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保持平静的心情呢？我已经接到了你们的两封来信，我一直为它们感到快活不已。你们想象不到的是，你如果在这两封信中努力寻找的话，能找到多少东西啊！甚至能找出你们在信里没有写到的那些东西。你们希望我的信能写得长些。我心里的确也还有许多要说的话，但是信纸却不能再长了。因此，你们至少能感到满意的是：曾经经常受到你们谴责的我的蝇头小字现在写得更小了。今天这封信里的一半是给古丝蒂娜的。请你们把它剪下来寄给她。当然，你们自己也先读一读吧。它也是写给你们的。

亲爱的莉布卡，我已经得到你给我请来的两位律师要求

我授予全权的签字。我认为那完全是多余的，不过我还是签字了。我这样做不是由于我存在着幻想，而是为了将来你再不会这样说：当初他假若听从我的劝告就好了，当初他如果签字的话就好了，等等、等等。当然我坚信，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让你感到高兴。孩子们，等到你们给古丝蒂娜写信时，请把我的地址也告诉她，让她提出申请，准许她给我写信。薇尔卡，我了解你的感情，你不必担心！关于爸爸的那些话你说得妙极了。

也许你们会这样想，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心里会老惦记着死，并为此而感到痛苦。这是一种误解。打从第一天起我便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一点，我想，薇尔卡是知道的——同时，你们也许从来没有看见我痛苦过。我根本就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死只对那些活着的人，对那些还留在世上的人才是沉痛的。因此，我预祝你们变得坚强和勇敢。不过，我想，这些话也是多余的。请你们尽快、多多地写信来（你们可以写得勤些）。拥抱和亲吻你们大家，再见！

你们的尤拉。”

尤列克在信笺的另外半页上写道：

“我亲爱的古丝蒂娜！

我获准给你写几行字，因此我立即伏案疾书。莉巴来信告诉我，你已换了住址。我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彼此相距并不远哩。假若早上你从特雷津出发北上，我从鲍岑出发南下，那么晚上我们就能会面了。那时我们将拚命地向着对

方跑去，对吗？总的说来，我们是在家乡的土地上旅行。你现在特雷津，那是我叔叔（指作曲家尤利乌斯·伏契克——作者注）赢得崇高声誉的地方，我就要被押解到柏林，那是他逝世的地方。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姓伏契克的人都必须死在柏林。

也许莉巴已把我的生活情况写信告诉你了，我住单间，制造纽扣。我干活不错，所以有伙食补贴。在牢房墙角里靠近地板的地方有一只小蜘蛛，在窗外有一对小山雀。它们离得很近，近极了，所以我听见了它们孩子般唧唧喳喳的叫声。现在它们领着幼雏飞走了，为了养育雏鸟它们可是操碎了心啊！此刻，我回想起你曾经为我把它们唧唧喳喳的叫声翻译成了人类的语言。我亲爱的，我老在跟你说话，而且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我等待着，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和你当面交谈。那时我们都有多少心里话要相互倾诉啊！我亲爱的，你这个小鬼！要勇敢坚强！热烈地拥抱你和吻你。再见！

你的尤拉。”

我从未收到过这一封信。纳粹分子们没有把它交给我。我是在1945年夏天，当我回到祖国以后，才第一次读到它的抄件，它是莉巴把原信寄出之前抄录下来的。

解放后，霍日采的斯坦达同志在给作家彼得·伊列姆尼茨基的信中（1945年6月13日）谈到了尤列克在鲍岑拘留所

里的情况：

“……当尤列克来到鲍岑拘留所的那一天，说真的，彼得，他便成了我们新的灵魂，漫长岁月之后的一种新希望，我们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而且是我们这些长期身陷囹圄的人的共同看法。彼得，我感觉到，我不再只身处于那些可怕的思想之中。这里已出现了这样的人：他能鼓舞我，他能给我力量，他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非常之清楚，他抵达时的情况——那一天叫你永远不会忘怀。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从庞克拉茨来的。朋友们说他留着大胡子。我从未看见过他。直到后来有一天，他也跟我们一起被带到院子里去放风时才见到了他。他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微笑着走了出来。

我还记得，他在门口停了下来，环顾四周，微笑着，向我们招了招手。我说，我并不认识他。但是当我一看到他时，我心里说，他一定就是尤利乌斯·伏契克。

他的那双眼睛永远在微笑，每天都在微笑，它们给人以生活的新的力量。他知道我们大家需要他。

那一天，以及后来的每一天，我和我们大家一样心里都非常痛快。彼得，真的，我多么希望能再一次见到尤列克，希望他又能‘告诉’我们一些消息。每星期五是我们刮脸的日子。一个理发师在走廊上给我们刮脸。每次我们大概是五人一批。我总是事先来到74号牢房的门口。那是尤列克的牢房。我敲了敲门，接着门开了。彼得，我们能看见尤列克那是多大的快乐啊！我能听见他的声音又是多大的安慰啊！我

知道，他还是一个‘老百姓’时你便认识他。当你回想起他时，你会和我今天一样，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在一次放风的时候，尤列克偷偷地（为了不让看守发现）扇了扇两个臂膀，然后有气无力地垂下两手，耷拉着脑袋。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着，尤列克的动作暗示的是什么东西，它是什么意思。下午轮到刮脸了。我又来到他的牢房门口。我敲了敲门。他说：‘奥勒尔^⑨完了’（奥勒尔为苏联城市，1943年8月5日苏军在反击希特勒国防军的战斗中重新攻克了这个城市——作者注）。原来，他扇动两臂就是这个意思。晚上，当夜阑人静之际，这个消息便传遍了所有的牢房，正象我告诉你的那样，我们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进行‘通风报信’。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谈话时被他们发现了，结果我们受到了三天不给饭吃、三天睡硬板床的处罚。

当我问到他对个人前途的看法时，他又以同样平静的语调回答说：死了就是了。我不知道他后来结果怎样，但是我有一种预感。彼得，我希望你能把他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我了解他生命的伟大意义。说实在的，你知道，我还因为我曾经和尤尔卡·伏契克谈过话而感到有点儿骄傲呢！彼得，有关尤列克的情况就是这些。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你自己也定能感觉到，他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最后再说一句：这样的人——具有纯洁品德的人——牺牲了，这实在太可惜了！”

第十二节 人民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1943年8月19日纳粹法院第一法庭审判长弗赖斯勒博士决定：法庭将于1943年8月25日上午9时正对尤列克开庭审判，同时命令把尤列克、克列仓和莉杜什卡·普拉哈“立即分别押送至柏林”。

1943年8月24日下午5时，尤列克从鲍岑拘留所被押解至位于柏林西北40区、老莫阿比特大街12号的刑事法庭监狱。

根据弗赖斯勒的提议，纳粹法庭于1943年8月25日开庭。审讯记录如下：

“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审讯记录

编号： $\frac{8aJ91/43g}{1H218/43}$

出庭法官有：

人民法院院长、审判长弗赖斯勒博士，

地方法院院长史列曼博士，

最高统帅部部长顾问里尔茨利布博士，

海军上将V·V·冯·诺尔德克，

州办公厅主任、市行政长官阿梅尔斯，

帝国最高检察长代表：国家首席检察长内贝尔。

1、尤利乌斯·伏契克，编辑，住布拉格十九区，1903

年2月23日出生于布拉格；

2、雅罗斯拉夫·克列仓，经济干事，住布拉格十三区，1914年3月2日出生于后兹博罗维采；

3、莉德米拉·普拉哈，职员，住布拉格十三区，1921年2月23日(原文如此——译者)出生于姆涅斯特茨·克拉洛维；

上述三名被告被带上法庭，他们报了自己的履历；辩护人计有：

1、法律代表霍夫曼博士，柏林，第一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2、法律代表魏曼博士，柏林，第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3、法律代表埃克尔特博士，柏林，第三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最高检察长代表宣读起诉书。

被告对起诉书进行申辩。

各同案犯审讯结束以及宣读了各审讯记录以后，被告人仍可陈述自己的意见。

接着，审判长宣布预审结束。

帝国最高检察长的代表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发言进行辩护。

帝国最高检察长的代表谴责了被告们的罪行，他建议将伏契克和克列仓判处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同时建议将普拉哈无罪释放。

辩护人进行了辩护，并建议给伏契克罪罚相当的判决；

建议判处克列仓终身监禁；建议将普拉哈无罪释放。

帝国最高检察长代表和辩护人的建议被翻译成捷语。

被告进行最后发言。

审判长宣布休庭。

合议庭进行审议。

接着审判长宣布并说明了下述判决：

以德国民族的名义！

尤利乌斯·伏契克，非法的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联络员，曾进行了重要的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活动，特别是致力于建立受共党控制的、统一的捷克知识分子组织。

雅罗斯拉夫·克列仓，伏契克和知识分子小组组长之间的联络员，曾积极参与了上述阴谋活动。

上述两名被告曾为我们的敌人效劳。应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死刑。

鉴于无法证明莉德米拉·普拉哈曾自觉地参与了上述两名被告的罪恶活动，因此准予无罪释放。”

根据记录可知：纳粹法庭于1943年8月25日12时零5分宣读了上述判决。审判是从上午9时开始的，即总共进行了三小时零五分钟。

从干巴巴的审讯记录中我们无法知道法庭审判时的情况。幸好当时的目击者莉杜什卡·普拉哈幸存了下来，她在回忆尤列克的文章中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审讯情况的：

“1943年8月24日他们把我从德累斯顿、把尤拉从鲍岑押解到柏林听候审讯。傍晚时分，在毛比特监狱的办公室里，男看守把我移交给了一个女看守。

翌晨，他们把我们连同其他几个囚犯带到签到办公室，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块面包，然后押着我们前往法院大楼。我们乘囚车行驶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在一个大院子里停了下来。他们驱赶着我们穿过一道道小门来到地下室，那便是候审室的所在地。接着他们分头把我们关进牢房。我和一位女犯同住一间，男犯们住另一间。牢房很大，用混凝土浇灌而成。在它们的墙壁上来自各国的死难者们用各种文字写下了临别赠言。许多遗言是用捷克文写成的。我多么希望自己具有过目成诵的记忆力，以便能在人们都喜欢忘却过去的今天，再把烈士们的遗言详详尽尽地讲给大家听。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他们把我们叫到牢房外面，命令我们按照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庭号码依次站好。因为我们由第一法庭审判，所以我们站在头排。不一会儿，他们押着我们沿中央楼梯来到楼上一个宽敞的大厅里。那里的陈设今天我依旧记忆犹新。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将军们的肖像，大厅正前方是法官席，两旁是被告席和坐着军官们的旁听席。他们命令我们坐了下来，我们的左右两旁各有一名刑警守卫。一会儿后，在我们面前就坐的有我们第一次看见的、由他们指定的辩护律师。又过了一会儿，法官们和各军兵种的高级军官们也来到法庭，开庭时他们还举行了宣誓仪式。

他们首先叫了尤拉的名字。在问明他的简历以后，他们

问他为什么要转入地下，据说当时他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我记得，尤拉听到这个问题后冷笑了一下，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在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天便逮捕了我的许多好朋友？当时他们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对帝国的事情。为什么我的这许多朋友都早已不在人世？’

当然他们没有回答。接着他们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历史已经证明，捷克和摩拉维亚一向是大日耳曼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为什么还要进行反对帝国的活动？

尤拉捋了捋山羊胡子，如同他在谈笑风生时惯有的那种动作一样，回答说：‘先生们，你们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是谎言，是无耻谰言！你们正根据你们的需要在捏造历史。’当纳粹分子们挨了这当头一棒、又尚未回味出这些话语的真意时，法庭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寂。

后来法庭问他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尤拉发言了。他谈到了苏联，谈到她的力量之所在，谈到她的坚不可摧和法西斯主义的必然失败。他控诉了法西斯主义及其惨无人道的罪行。尤列克慷慨陈词，从被告变成了原告。法庭乱作一团。法官们全站了起来，冲着他大叫大嚷，勒令他‘住嘴’但是尤拉继续说：‘你们将宣读对我的判决书。我知道，上面写着判处一个人死刑。但是我早就宣布了对你们的判决：判处法西斯主义死刑！人民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莉杜什卡·普拉哈回忆说，在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以后，纳粹分子给尤列克上了手铐，然后把受判决的囚犯押回牢房。各法庭结束审讯之后，他们便把全体受到判决的犯人集

体押送回毛比特监狱。翌日（1943年8月26日）晨8时正，尤列克被押解回普勒岑湖监狱。

1943年8月31日，他从普勒岑湖监狱给两个妹妹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

你们也许已经知道，我的住址已有所变动，8月23日我在鲍岑正等着你们的来信，可是得到的却是去柏林的传票。8月24日我途经格尔利茨和科特布斯，8月25日上午开庭，中午时分审讯结束。结果不出所料。现在我正和一位朋友坐在普勒岑湖监狱的牢房里，糊着纸袋，唱着歌儿，等着轮到我们的时刻。还有几个星期，说不定也会拖到几个月。希望象枯萎了的树叶无声无息地、轻轻地凋落在地上。看着那飘零的落叶，多情善感的人们往往会触景生情、悄然落泪。但是树木却不会感到痛苦。这一切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理所当然。一个人也会象一棵树那样经受严冬的考验和锻炼。相信我，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丝毫没有夺去我的欢乐，欢乐活在我的心里，欢乐天天以贝多芬的曲调表现出来。人并不会因为被砍掉脑袋而变得渺小。我热烈盼望着：当一切都变为陈迹之后，你们在回忆起我时不是心怀悲哀，而是心怀欢乐，如同我在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那种欢乐一样……”（下面一段被德国当局删去——作者注）“这只不过是一些想法而已，我知道，你们今后不管干什么事都必须亲自动手了。但是当你们遭遇到挫折时，千万不要绝望，也不要苦恼。在每个人身后总有一天大门是要关上的。请你们考虑一下父亲的问

题：你们是否应该把这件事直接告诉他，或者只暗示一下。最好不要再用任何不幸的消息去惊扰他的晚年。你们自己决定吧，现在你们比我更接近他和妈妈。

请来信告诉我古丝蒂娜的情况，并望代我向她致以最美好的问候。愿她永远勇敢坚强，希望她不要怀着她那种我时刻都能感觉到的真挚的爱情独守空房。她还非常年轻，非常富有感情，她没有理由要为我守寡。过去我曾竭力要使她幸福。现在，我希望她失去了我仍然能够幸福。她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代替的，不论在工作方面还是在感情方面都是如此。不过，这一切你们现在暂时不要告诉她。等她回来后再说——假如她还能够回来的话。

也许你们现在很想知道（我非常了解你们）我的生活状况。我生活得很好。在这里我还有工作，我也有书和报纸，而且不是独自一人呆在牢房里，所以时间过得很快……甚至太快了，象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们在这里，如同我到过的德国所有地方一样，待遇是蛮不错的。比如，我在鲍岑监狱时，每星期可以收到家里寄来的食物包裹，里面放的都是些能够存放的食物（糕点，白糖，苹果，腌猪肉等等）。虽无明文规定，但每个囚犯都可以这样做。你们知道，我对德国民族从来不心怀敌意，我在这的经历再一次向我证明，德国人民象过去一样心地善良。不过，当然，现在是战争时期。

我亲爱的妹妹，现在我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你们大家。再

见了——虽然它听起来有点儿奇怪！

你们的尤拉。”

当尤列克在给家里的两位妹妹写信的那天，柏林的纳粹人民法院帝国最高检察长于下午4时50分用电传打字机给布拉格的盖世太保拍去了电报，电文说：“尤利乌斯·伏契克和雅罗斯拉夫·克列仓因阴谋进行叛国活动和为敌人效劳而被判处了死刑”。最高检察长希望知道，“是否能够、同时又根据何种理由可以给予赦免；如果他们的亲友要求收尸进行安葬，盖世太保是否持反对意见。”

“我请求你们，立即把你们的意见直接告诉我。同时，我要求你们把现在关押在柏林普勒岑湖监狱的、被判处了徒刑的罪犯的照片——身穿便服，一式三份——寄来。”

接着是一片寂静。

1943年9月7日在柏林纳粹法庭的公文袋中出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用打字机打下了这样一段话：

“1、根据首席检察长沃列克先生的口头通知，国务秘书罗滕伯格博士决定：1943年8月25日由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判处死刑的所有罪犯一律不得赦免，同时判决应立即执行。

2、此条应存入有关第一点执行情况的卷宗内。

人民法院帝国最高检察长

1943年9月7日于柏林

签字（字迹不清）。 ”

1945年8月8日我见到了尤列克在普勒岑湖监狱的同牢难友，当时他也被判处了死刑，但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该难友就是鲁道尔夫·贝德日赫。他叙述了下面一段往事：

“我已经变得万念俱灰、呆钝异常。我什么都不想，甚至连家乡也不想了。我只等待着到时候被处决了事。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把尤列克关进我的牢房。他快活极了，如同没有被判处死刑那样。他歌声不断、谈笑自若。他向我讲述了你们生活过的多马日利采附近的那个小村庄，以及在你们桌子腿中筑巢的小山雀。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谈到苏联，他证明苏联是不可战胜的，红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追击着法西斯军队！他给了我生活的新希望，此后我也跟着他放声唱起歌来。白天我们糊纸袋，晚上收工以后，他们又给我们带上手铐。牢房里的灯光彻夜通明，只是在空袭时他们才把电灯关上。我知道，1943年8月30日或31日尤拉曾给家里写过信。

9月3日夜至4日凌晨，普勒岑湖监狱遭到了飞机轰炸。我们所在的监狱侧房被炸弹击中。看守们把全体囚犯赶到了院子里。有些囚犯说着泄气的话。尤列克听到后，向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使大家相信苏联是不可战胜的，红军一定能打败希特勒德国。我们虽然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我们要永远忠于自己的信念。从午夜时分至翌晨四时，我们一直呆在四堵围墙紧锁的院子里。我紧紧地拉着尤拉，一直偎依在他的身旁。

后来他们又把我们关进了一号楼中的第144号牢房。从

9月4日起，不管是白天、黑夜，他们都让我们带着三公斤重的手铐。9月7日太阳下山以后，大约有十名狱警突然来到监狱走廊上，他们打开牢门，把一些囚犯押了出去。我们呆在牢房里，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我们听见，每隔半小时左右，这些狱警又走了回来。午夜时分，留在牢房里的囚犯们已经听到了处决犯人的风声。有人在走廊上说了一句：统统拉出去枪毙。囚犯们顿时乱作一团。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变得歇斯底里，有的大声祷告起来，而我和尤拉却不停地唱着歌。我们镇静如常。尤拉跟我说了这样一些话：你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死的，而且我们的牺牲将带来好处。混乱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清晨。五时许，两个看守突然冲进我们的牢房。其中之一把尤拉的手铐取去，命令他脱下身上穿着的唯一一件衣服——衬衣。当两个看守把他带走之前，他猛地跳了过来，跟我握了握手说：‘问同志们好！’”

两年来，我一直相信——有时是坚定地、有时又梦幻般地相信：尤列克没有死，普勒岑湖监狱遭到轰炸时他已幸运地逃离了虎口，他那苍白、消瘦的面庞一定会出现在成千上万被认为早已离开人世、而现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正返回家园的囚犯队伍中间。然而，两年后的今天，我的这个信念彻底破灭了。

他的生命结束了。

他留给人们的书信——他的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的

生命却刚刚开始。这封书信是藏在玻璃瓶里、埋在地下、解放后才被挖出来的。它真的变成了“藏在瓶子里、投进了时间海洋的书信”，正象尤列克在《给彼得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

它成了全世界人民明白易懂、竞相传诵的书信。《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我国人民中间激起了无比深厚的同志情谊，苏联人民怀着极大的信任前来向我表示慰问，来自世界各国的书信——它们象给尤列克的回信一样——纷纷寄到我的身边。这不是因为《绞刑架下的报告》记录了一个人的悲惨遭遇，记录了一个奇特的、空前绝后的时代，而是因为它是千百万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非正义制度的斗争的真实写照，而且，千百万为争取本国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今天又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时代。

因此尤列克便成了贝劳扬尼斯^②和卢蒙巴的兄弟，因此尤列克的语言便成了我和古巴朋友——在古巴获得解放以前——相互了解的交际工具。

许多十五至二十年前出生的年轻人常常来找我，他们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此我试图把《绞刑架下的报告》所记录的那几年的情况写出来，那几年比我的寿命还要长，它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它们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写这本回忆录时，我常常为了一个单词或一个句子而停了下来，整天整天地让它们空着，因为它们勾起了我对往

事的无穷的回忆。我还常常因自己笨拙的表达能力而仰天叹息！但是同志们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诚挚热情地缅怀起尤列克。青年人也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他们在座谈会上长时间地倾听我的发言。他们对尤列克的热爱给了我新的勇气，我决心为巴勃罗·聂鲁达^②在关于尤利乌斯·伏契克一诗中所歌颂的美好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聂鲁达的那几行诗是这样的：

无数先烈用生命播种在你心中的种子
已经发芽，
你的坚贞不屈
又孕育出了无数新的生命，
播种下了无数新的种子……

幸福啊，你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
目光坚定的母亲，
欧洲可爱的花瓣，
你人民享有的和平
正是你顶戴的桂冠……

我向你祝贺，
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
质朴的孩子们的母亲，
沉默的英雄们的故乡，

充满雾和水晶的共和国，
葡萄、麦穗、钢铁和人民！

注 释

- ① 弗拉季斯拉夫·万楚拉（1891—1942） 捷克进步作家、共产党员、反法西斯战士，后被纳粹分子杀害。
- ② 指捷克克拉德诺城附近的利季采村。1942年5月底德国法西斯借口为被刺身亡的纳粹头目海德里希“报仇”，集体屠杀了该村的所有男性公民，并把妇女和儿童全部送进集中营。
参看第二章注③④
- ③ 布拉尼克 地名，在布拉格郊外。
- ④ 薇尔卡 为薇拉的爱称。
- ⑤ 博什卡 是博热娜的爱称，指博热娜·波罗娃。
- ⑥ Z.D. 为雕塑家兹登涅克·德沃夏克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 ⑦ 马克斯·什瓦宾斯基（1873—1962） 捷克著名画家，布拉格美术学院教授，人民艺术家。
- ⑧ 扬·库比什（1913—1942） 在英、法成立的捷克军团成员，排长，参与了对侵捷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的暗杀活动，后自杀身亡。
- ⑨ 米洛什·乌赫尔（1914—1945） 斯洛伐克西部游击队领导人之一。
- ⑩ 奥琳卡 为奥尔加的爱称。
- ⑪ J. 是捷文尤利乌斯的第一个字母。
- ⑫ 斯拉温卡 为斯拉芙卡的爱称。
- ⑬ “N + N”为德文Nacht und Nebel（夜和雾）两词的缩写。
- ⑭ 长音和钩形符号是捷语字母所特有的书写符号。

- ⑮ “R”字母指“报告”（即《绞刑架下的报告》）一词开第一个字母。
- ⑯ “L”字母为“文学”（指“文学评论”）一词开头第一个字母。
- ⑰ 莉布舍 为莉巴的爱称。
- ⑱ 在捷语中，形容词词尾也有性、数、格之分。第一个“Mo-jimili”为阳性、多数、第一格，意为“我亲爱的”（男人们）”（或指男女在一起时的人们）；第二个“Moje milé”为阴性、多数、第一格，意为“我亲爱的（妇女们）”。
- ⑲ “奥勒尔” 意为“鹰”。
- ⑳ 尼科斯·贝劳扬尼斯（1916—1952）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员。1941年希特勒德国占领希腊后被捕。1943年逃出集中营，参加希腊人民解放战争。1946年—1949年希腊内战期间，担任临时民主政府军事领导工作，1949年该政府被颠覆，1951年被捕，次年被害。
- ㉑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 智利诗人，1971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XzEwMTE3MTI4LnppcA==",
  "filename_decoded": "_10117128.zip",
  "filesize": 41038351,
  "md5": "d7c981731b112241a5503f7c8e0a00b5",
  "header_md5": "4985f69d1ce635b1800c2fe7c89668c1",
  "sha1": "3d0145d32b61c22a941ce1476851b173407e8a5a",
  "sha256": "4bff7fcd88b7826c66d5b8b17d113c73b749238f4b38ae667a0cb352d1d4e918",
  "crc32": 2357808023,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42345050,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658,
  "pdg_main_pages_max": 658,
  "total_pages": 674,
  "total_pixels": 264135470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